

冯存诚 编著

全球追捕  
审判纳粹战犯史鉴



中国海关出版社

# 正义之剑

全球追捕审判  
纳粹战犯史鉴

建议上架 \ 人文历史

ISBN 978-7-80165-53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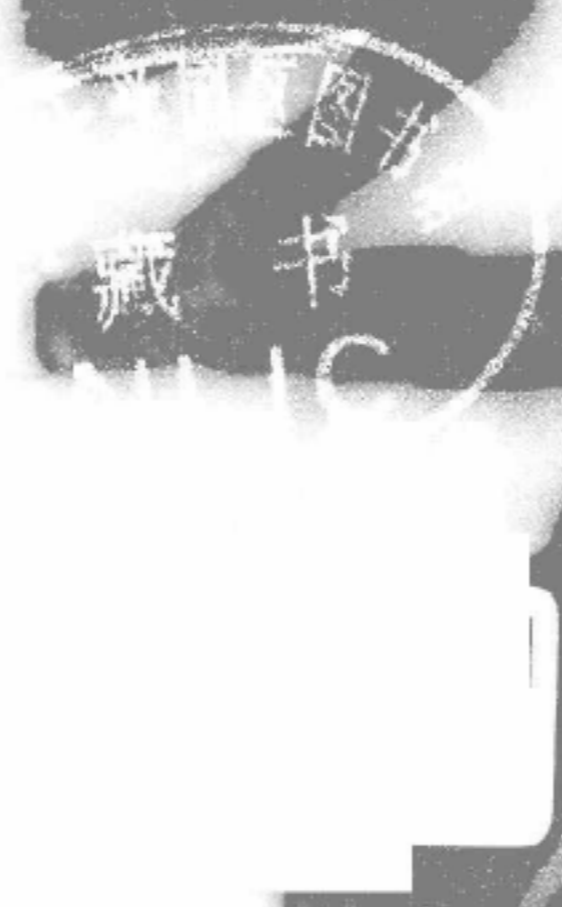


9 787801 655387 >

定价：58.00元

冯存诚 编著

全球追捕  
审判纳粹战犯史鉴



中国海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义之剑/冯存诚编著. —北京: 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80165 - 538 - 7

I. 正... II. 冯...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6295 号

**正 义 之 剑**  
**ZHENG YI ZHI JIAN**  
——**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  
**QUAN QIU ZHU IBU SHEN PAN NA CUI ZHAN FAN SHI JIAN**  
**冯存诚 编著**

选题策划: 高峰  
责任编辑: 高峰  
助理编辑: 冯雪松

出版发行: **中国海关**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甲 9 号 (100013)

发 行 部: 010 - 84252703

编 辑 部: 010 - 85271833 - 653

网 址: <http://www.haiguanbook.com>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经销

版 本: 2008 年 10 月第 2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16 787mm × 1092mm 印张: 30.5

字 数: 4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65 - 538 - 7

定 价: 58.00 元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作品推荐

冯存诚同志的专著《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4月版），是国内学术界研究德国纳粹和“二战”史领域中脱颖而出的一部力作。

作者首次对审判追捕纳粹战犯进行了全方位、深层面、多视角、富有历史纵深感的研究和论述，以深邃的见解、极富创新的构思、蕴涵丰厚的哲理、丰富确凿的史料，再现了纳粹战犯的滔天罪行和“二战”的历史画面，在学术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依寡闻所及，国内学术界在近期之内，在德国纳粹罪行研究领域，将很难有超越这一专著研究水平的作品问世。

该书的再版，将再一次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反响，警示世人，反思历史！

邸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郭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教授

2008年8月8日

## 再版序言

冯存诚同志的力作《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问世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不少省市的网友在各自的网站上全文登载了本书的内容。许多学者、作者在撰写相关的文章时，整段甚至整节地引用或借鉴本书的内容。迄今为止，本书依然是研究有关追捕和审判纳粹战犯问题最为系统、翔实，最具权威性的中文资料，也是研究有关纳粹战争罪行及“二战”相关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时光已历五年，作者由于辛勤耕耘而产生的深厚功底，使本书经受住各方面的考验，再次印证了我们关于本书属于填补空白和没有硬伤的观点。我们再次向社会各界推荐《正义之剑》，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著作，可收到开卷有益的效果。

2002年，本书出版之时，由于某些技术性的原因，《正义之剑》的推出没有达到预期的愿望，尤其是在北京各大书店未能上架。有鉴于此，中国海关出版社副总编高峰建议作者对本书充实内容，予以再版。

根据出版社的要求，作者较大幅度地调整了全书的架构，断然删减了一章（原第十一章外籍战犯）多的篇幅，使本书更为紧凑、精练。对于原来存在的不足之处：马尔梅迪惨案分量单薄问题，作者精心选择补充了大量资料，使内容增加了数倍。对于原本展开不够的T-4医务人员审判案，作者增补了多个案例。对于学术界意见不一的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案，经反复查证咨询，确认该审判案实际上由7个小型审判案构成，而否定了多数作者认为的由3个小型审判案构成的观点，并进行了比较翔实的论述。

本书出版后，作者仍然在不懈地跟踪研究，使不少人物事件的阐述更为准确细化。在观点方面，作者根据最新资料，肯定了“二战”后前10年内，奥地利政府特别是人民法庭在追捕和审判纳粹战犯所做的大量工作。对于最重要的乙级女战犯之一荷尔塔·欧勃霍泽，直至20世纪90年代仍有许多外文资料认为其下落不明。作者反复钻研德文报刊后发现：其已于1978年1月24日病故于德国小城利兹，于是做了更

正。并根据最新德文资料，将她的家乡由什-荷州调整为科隆。对于一些看似细枝末节之处，作者也尽量做到一丝不苟。如本书对一张照片的注释为：如狼似虎的纳粹集中营女看守；现在则根据最新资料证实，她的姓名为荷尔塔·波特，直到2005年还生活在德国西北部某社区，并一反常态接受了一家刊物的采访，故为其补做了简历。对于纳粹女战犯的简介，由以前的110人增至201人，全部有名有姓，个人的情况尽可能详尽。集中营司令官的简介也比以往更为详细准确。

根据与时俱进的原则，再版后采用的事例截至2008年4月底，新近增补的资料达10万字。

自然，出于对受害者的保护和对犯罪情节较轻的从犯的宽容，本书一律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

作者至今仍承担着非常繁重的本职工作。由于时间紧迫，作者只能在业余修改书稿，加之出版社又有时限要求，以致未实现全部意图。对纳粹德国高级将领中的战犯未能增加多少内容。看来，这项工作可能要有待第三版时才能完成了，这要算做本书的一个遗憾之处。

因历史原因，作者文中保留了对“苏联”、“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名称表述，特此说明。

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71周年，我们将本书再版视为一个献礼之作。让一个个怙恶不悛而心存侥幸的纳粹战犯的可耻下场；让天理昭彰、天网恢恢的确凿事实，给那些顽固不化，一心妄图重温旧梦的军国主义分子发出严正警告。

邸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郭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 目 录

<b>第一章 煞神登台，欧洲陷入空前灾难</b> .....	1
第一节 疯狂发动侵略战争，战火席卷欧洲北非 .....	2
第二节 纳粹分子建立的所谓新秩序 .....	5
<b>第二章 大屠杀的酝酿、预演与逐步到位</b> .....	13
第一节 隐秘的种族灭绝——强制绝育 .....	13
第二节 T-4 行动——大屠杀的前奏和预演 .....	16
第三节 公然践踏《日内瓦公约》，肆意杀害战俘 .....	25
第四节 亘古未见的大屠杀——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 .....	29
<b>第三章 吞噬千百万生命的魔窟——纳粹集中营</b> .....	46
第一节 集中营——灭绝营，大屠杀的主屠场 .....	46
第二节 各具特色的纳粹集中营 .....	72
第三节 大屠杀的尾声——死亡行军 .....	79
<b>第四章 纳粹战犯的人员构成</b> .....	82
第一节 纳粹战犯的确认标准及其规模 .....	82
第二节 纳粹战犯的数量究竟有多少 .....	86
第三节 艰巨复杂的取证工作 .....	87
第四节 对纳粹战犯审判的序幕 .....	98
第五节 纽伦堡审判 .....	98



第五章 主要战犯的归宿 .....	103
第一节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的首要战犯 .....	103
第二节 纳粹侵略军中的战犯 .....	129
第三节 党卫军中的主要战犯 .....	143
第四节 纳粹德国政府中的甲级战犯 .....	145
第五节 乙级战犯 .....	147
第六节 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中的纳粹战犯 .....	153
第七节 丙级纳粹战犯中的典型案例 .....	156
第八节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取缔的犯罪组织 .....	158
第六章 各个盟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	169
第七章 纳粹战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地利战犯 .....	247
第八章 灵魂错位，救死扶伤竟成屠杀专业 .....	253
第一节 门格尔追捕记 .....	257
第二节 极端残忍的恶魔医生——霍斯特·舒曼 .....	264
第三节 专家屠户——卡尔·克劳贝格 .....	269
第四节 大规模挑选和活人试验的集大成者——爱德华·维尔策 .....	275
第五节 残害儿童的恶魔医生——库尔特·赫斯梅耶尔 .....	278
第六节 解剖刀也是屠刀——希尔特医生的“科研活动” .....	280
第七节 行径令人发指的两名恶魔医生 .....	283
第八节 嗜杀成性的 T-4 医生 .....	284
第九节 纳粹杀人医生的下场 .....	287
第九章 凶狠歹毒、罪恶累累的纳粹女战犯 .....	290
第一节 伊尔玛·格蕾泽——酷好杀害美女的美女 .....	291
第二节 荷尔塔·欧勃霍泽——以宰割活人为乐趣 .....	295
第三节 伊尔丝·科赫——酷好杀人剥皮 .....	304

第四节	索菲·艾哈德——以给儿童绝育为科研目标	314
第五节	赫尔米娜·瑞恩·布隆施特奈尔——虐待和杀人狂	319
第六节	玛丽安娜·裘尔克——专门杀害儿童	323
第七节	玛格蕾特·敦科夫斯基——以杀害病人为己任	324
第八节	玛丽亚·门德尔——成批处死女囚	327
第九节	多萝塞亚·宾兹——专事折磨和拷打囚犯	329
第十节	玛格蕾特·缪斯——令人非死即残	331
第十一节	凯特·哈克巴特——启动毒气室开关	334
第十二节	爱尔萨·艾利希——深藏杀机、满手血污	337
第十三节	薇拉·莎尔弗夸特——为虎作伥	341
第十四节	卡琳·玛格努森——以挖人眼睛为业	345
第十五节	伊丽莎白·玛赛尔——丧尽人伦	346
第十六节	玛蒂尔德·维波——身负几百条人命	349
<b>第十章</b>	<b>大批战犯曾逃离法网</b>	<b>387</b>
第一节	冷战使大批战犯绝路逢生	387
第二节	B-B航线，上万名漏网战犯的救命天桥	388
第三节	驻德美军占领当局是庇护纳粹战犯的始作俑者	394
第四节	纸夹计划——专家型纳粹战犯的保护伞	396
第五节	殊途同归，美、苏共同庇护纳粹医学战犯	399
第六节	放手使用纳粹战犯，将其推上反苏第一线	403
第七节	西方盟国紧步美国后尘	404
第八节	拉美国家对纳粹战犯的庇护	408
第九节	西德政府如何对待纳粹战犯	410
第十节	各大洲都潜藏着漏网的纳粹战犯	416
<b>第十一章</b>	<b>众志成城，追捕纳粹战犯再起高潮</b>	<b>423</b>
第一节	大智大勇，千里外擒拿艾希曼	423
第二节	机关算尽50载，老战犯终落法网	429
第三节	史海沉迷有望揭开——海因利希·密勒	431

+++++ **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 +++++

第四节	追捕纳粹战犯的天罗地网正在形成 .....	434
<b>第十二章</b>	<b>纳粹战犯远未绝迹，也不肯冬眠 .....</b>	<b>436</b>
第一节	进入新千年之际又揪出老纳粹战犯 .....	437
第二节	最后一个“果酱杀手”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	439
第三节	至今依然踪影难觅的纳粹战犯 .....	443
第四节	纳粹余孽并未全部冬眠 .....	451
第五节	揭露和惩办纳粹战犯离不开德国人民的觉醒与参与 .....	453
第六节	纳粹战犯的奥秘有望基本揭开 .....	457
第七节	追捕纳粹战犯的急先锋——维森塔尔中心 .....	458
<b>尾声</b>	.....	459
<b>附录：各主要集中营、灭绝营司令官简历</b>	.....	<b>463</b>
<b>参考书目</b>	.....	<b>474</b>

## 第一章 煞神登台，欧洲陷入空前灾难

万字符本是一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宗教标志，早在4000年前波斯原始居民制造的陶器上即有发现，是“致福”与“包罗万象”的象征。以后，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均曾使用过；在印度、希腊、小亚细亚半岛、以色列、埃及、伊拉克、意大利等地均曾出土过绘有万字符的陶器。在古代梵语中，它是太阳和火的象征，含有吉祥百集的意义。在佛教中也是“万德吉祥”之意。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武周朝女皇武则天于万寿二年（693年）下诏，赐它读音同“万”，取义则是“福寿绵长”的寓意。1910年，德意志帝国的统治阶级接受了这一被他们称做“带钩十字”的符号，将其视作“血统高贵的日耳曼民族的象征”。世世代代，没有人会预料到，万字符一旦落入凶神恶煞手中，也可能逆变为灾难深重的象征。突出的例证是，“二战”元凶希特勒亲自设计了红底白圆心，中间嵌有黑色万字的纳粹党旗，并对其中的万字的含义作了这样的解释：“万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的斗争使命。”而这一争取胜利的斗争使命，仅仅在1933年1月至1945年5月15日，就给全人类特别是欧洲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历史上曾经令几代欧洲人谈虎色变的所谓“黄祸”——匈奴人席卷欧洲大陆和蒙古大军如入无人之境、在史籍上留下令人发指的记忆的宗教裁判所、令人刻骨铭心的30年战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敢于与敌国俄罗斯串通的150万亚美尼亚人的大批处决……凡此种种，如若与纳粹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所荼毒人类的程度相比，简直成了小巫见大巫。以往获胜的侵略者或压迫者所留下的只是几十万具至多上百万具尸体。他们虽嗜杀成性，却允许投降或改宗自己信仰的敌人活下来，即使他们杀尽了拒绝投降的男子，却往往给对方的妇女、儿童充当奴隶的机会，更没有从肉体上灭绝整个民族的罪恶计划。而纳粹分子却毁坏了数千个城镇村庄，吞噬了4500

万生灵，还要把列宁格勒、华沙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从地图上抹掉。他们要通过现代化的工业技术手段灭绝整个犹太民族、茨冈民族，不分男女老幼，也不放过新生的婴儿和母腹中的胎儿。他们要把拥有3亿人口的斯拉夫人，杀掉大部分，同化小部分，剩下的当奴隶。他们要把同样拥有上亿人的拉丁各民族的大部分，赶去当劳工，余下的也必须同化或消灭。纳粹德国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留下千古难忘的暴行，真所谓罄南山之竹，亦难书其罪；决东海之波，亦难流其恶。

### 第一节 疯狂发动侵略战争，战火席卷欧洲北非

希特勒在其恶名昭著的著作《我的奋斗》和《通往崛起之路》（又名《希特勒的第二本书》）两部书中，为其发动侵略战争大造舆论准备：他宣称，以德国人为主体的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是有权支配其他一切民族的统治民族。为了使雅利安人充分发挥其领导作用，德国必须沿着其祖先神圣罗马帝国和条顿骑士团的足迹，从各个邻国夺取“生存空间”。他说：德国要以4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养活6200万人，平均136人只占有1平方公里土地。自1871年以来，德国人口明显增多，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并没有解决德意志民族的给养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德意志民族就不能增殖，不久的将来就要发生饥荒，一年将有16000人自杀，18万人移居国外，30万个孩子不能出生。因而，德国唯一的生存可能便是移民，要“在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并使之彻底日耳曼化”。希特勒同德国的一些军国主义分子有着明显的区别，他绝不满足于恢复德国1914年以前的疆界。在1928年发表的《希特勒的第二本书》中，希特勒大声疾呼，重新恢复1914年的边界“从民族的观点看，这个目标是不够的；从军事观点上看，这个目标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从展望未来的民族观点看，这个目标是不可能的，而从其结果来看则是荒谬的”。希特勒的侵略野心无边无涯。1930年11月13日，希特勒在埃尔兰根公开宣称：“每个人都致力于自身的扩张，每个民族都要求世界霸权”，“一个民族奋斗的目标就是统治世界”。基于这个远大目标，希特勒认定必须建立起“从挪威直到意大利北部的”大德意志帝国，把全欧洲的德意志人都囊括进去。大帝国的领土还应包括波兰西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奥

地利。此后，帝国还将向东扩张，同波兰东部、白俄罗斯、匈牙利、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巴尔干各国以及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建立联盟。“但这种联盟的成员之间关系不是平等的，这些国家不得拥有独立的军队，独立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只能作为德国的附属国”。希特勒还要同瑞典、丹麦、芬兰建立北部联邦，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建立西部联邦。即使对于法西斯盟友意大利，也只允许其在地中海沿岸称王称霸。他还明确宣称，要在拉丁美洲建立“新的德国”。他认为，要实现这一神圣使命，只能借助血与火，为此不惜一战。他狂妄地宣称，不仅要称霸欧洲，而且要征服全世界，“不是几个省，而是地理政治范畴；不是几个少数民族，而是几个大陆；不是打败敌人，而是消灭他们；不是结盟，而是要卫星国；不是改划一下国界，而是要重新安排整个地球上的国家；不是签署和平条约，而是宣布死刑——这就是伟大战争的目的”。这种论调，在饱受英法等战胜国强加的“凡尔赛条约”凌辱，并进而遭到法国和比利时武装入侵的德国民众当中，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共鸣，相当多的一大批人被希特勒牵着鼻子走，最终成为侵略战争的炮灰。从1933年开始到1939年的六年半时间内，德国的军费以每年15%以上的高速度激增，累计9000亿马克，占同期国家预算支出总额的60%左右。为避免在纳粹德国羽翼未丰之前遭到西方各国的打击，狡猾的希特勒宣称德国的扩军备战是为了抵御“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并纠集了日本、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建立了反共产主义军事联盟。首先，他抓住西班牙叛军首领佛朗哥起兵反叛该国的民主政权之机，打着防止共产党势力蔓延的旗号，发兵5万公开支持佛朗哥颠覆西班牙的合法政权，把数十万进步人士置于血海之中。当他感到时机已趋成熟之时，便公然发动侵略战争，一举吞并了与德国同文同种的奥地利。他觉察到英法等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的苏联同床异梦、貌合神离，无法结成有作为、有实力的联盟，便放开手脚大干起来。首先，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联手，将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先通过《慕尼黑条约》将具有高度经济和战略意义的苏台德地区划入德国，半年之内又将捷克吞并，使之沦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接着，希特勒在1939年初春，下令攻占波罗的海沿岸的战略要冲克莱彼达。紧接着，纳粹德国于1939年8月23日又拉拢苏联与自己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以西乌克兰和西部白俄罗斯为诱饵，暂时稳住了苏联。一周以后，纳粹德军出动

70万兵力，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后，德国自1940年4月至6月又相继侵占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希特勒及其最高统帅部还制订了代号为“枞树”的秘密军事计划，准备在攻占法国之后，顺势入侵瑞士，只是在最后时刻才宣布取消。1940年7月10日，纳粹德国开始对英国实施代号为“海狮行动”的战役，对伦敦和其他许多英国城市肆意狂轰滥炸；企图在英军的战斗力和斗志被摧垮后，随即在英国东、南部海岸登陆。党卫军中的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甚至已经拟定好应当立即予以处决的英国犹太人和反法西斯人士的详尽名单，首批应予处决者即达2000人；并且早已组建了执行上述屠杀任务的特别行动支队，还预先下达了“特别行动”的具体任务，一旦英国沦陷就要付诸实施。但是由于丘吉尔政府和英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使这份黑名单落得变成废纸的命运。纳粹德国占领英国的图谋虽未得逞，但仍然给英国军民造成30多万人的牺牲。纳粹德国的典型战争犯罪事实是实施于1940年11月14日的“月光奏鸣曲”行动：在持续10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德国空军对拥有25万人的工业城市考文垂投下15万枚燃烧弹、1400枚高爆炸弹以及其他类型的炸弹，将该城化做一片废墟。不仅造成1万多人死亡或重伤，而且把英国的国宝之一、奠基于1043年的圣迈克尔大教堂炸成灰烬。1941年4月，希特勒又挑起新一轮战事：首先不宣而战入侵南斯拉夫与希腊，继而撕毁了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实施不宣而战的闪击战。纳粹军队的铁蹄，几乎踏遍了整个欧洲。欧洲大陆8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亿多人口都处在纳粹德国的残暴统治中。瑞典、瑞士这两个拥有中立传统的国家，也只是卑躬屈膝，暗中作出了种种迎合纳粹德国要求的承诺后，才没有遭到入侵。算来算去，大概只有爱尔兰和冰岛这两个弹丸小国得以置身局外。

希特勒之流的胃口并不局限于欧洲大陆，1941年2月，希特勒派遣隆美尔率领的由两个德国师组成的“非洲兵团”和第十航空队，登陆北非突尼斯，攻入利比亚，大败英军，控制住北非局面，并将英军一直赶到埃及边境，兵锋直逼吉撒萨大金字塔。在亚洲，希特勒、里宾特洛甫之流软硬兼施，迫使亲德的土耳其政府和一些西亚国家保证，只要德军攻占斯大林格勒，他们便迅即对苏联宣战，并向苏联的高加索地区进军。1942年8月，当纳粹军队在苏联领土上推进到最大限度——登

上高加索山脉的顶点厄尔布士峰之时，希特勒又野心勃勃地制订了登陆拉丁美洲，与日本会师印度、共占天山的计划，妄图称霸全世界，奴役各国人民。一时间，欧洲和北非上空乌云密布，狂风怒号，炮火纷飞，血流成河。广大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在战争和纳粹暴政下，欧洲先后有4 000多万人丧失了性命，其中2 000万人左右牺牲于纳粹分子疯狂推行的恐怖政策，约1 100万人丧生在集中营、灭绝营或强制劳动营。至于物质财富损失，更是数不胜数。

## 第二节 纳粹分子建立的所谓新秩序

所谓新秩序，实际上不过是纳粹德国不择手段地灭绝“劣等种族”，最大限度地掠夺、剥削、奴役被占领国家和地区，从而使德国一小批垄断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及其政治代理人获得最丰厚利润的代名词。这种秩序是通过以下野蛮手段建立的：

### 一、吞并他国领土

吞并被占领国家的领土，是纳粹党上层集团拓展德国生存空间的根本途径，是其所有剥夺和抢掠行动的重要政治和法律基础之一。为此，纳粹德国的领导人授命德国的理论家和行政管理专家进行了广泛的论证：

根据1943年3月21日《德意志总汇报》的文章，大欧洲的生存空间“只有伸延到东方草原和四周沿海时”，其安全才有可能永远获得保障。而同大亚洲空间的联系也就得以建立起来。“对苏联作战并占领东方领土，能使原来已经过于偏西的重心移回到大陆的中央，从而达到恢复欧洲均势的目的。因此，把东方地区合并进来，乃是一个联合的欧洲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既要建立大空间就需要接受全新的概念，并要修改一些原有的概念。以德国本身而言，它必须突破“俾斯麦帝国”的狭窄边界，因为今天的德国是“作为一个超国家的主宰者”，正“承担起超出民族国家范围的责任”。因此，“德国的概念”不再受“地图上任何标明的边界”的约束。此外，大空间本身“并不是一个地球物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因为“整个领土可以成为一个国家领土之上的



一个统一体”。这样，大空间的地理界限不需要以任何现存的边界来划定。

每当希特勒考虑重新安排欧洲地图时，他所想到的就是征服，接着就在可以办到的地方直接吞并。希特勒改组西欧的初步计划表明，他当时已决定要把挪威和卢森堡变成德国的组成部分。比利时的地位则仍在考虑中，因为德国有可能给予佛来明人特殊的待遇并建立一个勃艮第邦。至于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将重新并入德国，同时还将成立一个布列塔尼自治邦。希特勒还打算吞并法国北部和东部的大片土地，“因为这些地方根据所谓历史的，或者人种的、政治的、地理的理由，或是根据任何其他的理由，都可以被认为是属于中欧而不是属于西欧的”。故此，希特勒授权帝国内政部总顾问威廉·施图卡特根据这种方针拟订一个肢解法国的计划。

1941年4月20日以后，罗森贝格以希特勒“东欧地区问题中央研究代表”的身份，制订了一项改组东方地区的宏大计划。按照他的观点，德国必须集中力量在苏联被占领地区建立三个庞大的国家单位，按照三种不同的法律加以管辖。第一个是波罗的海地区。它开始时应成为德国的保护国；以后“通过对适当的种族成分德意志化，通过德国移民向该地迁徙，再通过把不良成分全部清除出去”，它将变成德国本土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个地区不仅将移去一些伏尔加河居留地的德国人，还将移去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而且——在战争胜利结束后，还将移去英国人。”对于白俄罗斯，将作出政策上的显著的区别。由于性质完全不同，它只能充当波罗的海地区、波兰总督辖区和瓦尔特兰的种族渣滓的垃圾堆。第二个地区是乌克兰。它将成为“与德国结盟的一个独立国家”。第三个地区是高加索，它与“同北面毗邻的地区一起”，将成为“一个有一名德国全权代表常驻的联邦国家”。在南端，必须把所有的外国人从克里木和“可能的最大的内陆地区”清除出去。然后，由德国人移居进去，再使它像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侨民居留地和“巴库周围地区”那样，成为德国的领土。

纳粹德国把被占领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的行政管理模式，最终的目的是把所有的占领区完全转变为德国领土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 （一）合并区

被纳粹占领的国家，同德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所谓的“合并区”。合并区或者以德国新增的行政区形式出现，或是以德国原来已存在的州、行政区或省的增添部分的形式出现，由第三帝国实行直接统治。在东方，这类合并区包括：

1. 原属波兰的但泽—西普鲁士行政区（包括但泽、马林威德尔和布罗姆堡专区）和瓦尔特兰行政区（包括伊诺弗罗茨瓦夫、波森和卡利什专区）。

2. 并入西里西亚省的波兰卡托维兹专区。

3. 并入东普鲁士省的波兰泽希瑙专区。

4. 并入东普鲁士省贡宾南专区的波兰苏道恩专区。

5. 并入东普鲁士省阿伦施泰因专区的波兰佐尔道地区。

6. 原奥地利共和国。

7. 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

8. 立陶宛的默麦尔。

在西方，这类合并区有1939年以前比利时所属的圣维特市、欧本市和马尔梅迪市；它们被并入莱因省的亚琛专区。

## （二）民政长官管辖区

在东南欧，这类地区有过去属于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北部的下斯蒂里亚地区和上卡尔尼奥拉、米埃斯塔耳，以及丹麦的谢兰地区。根据希特勒1941年4月12日颁发的“分裂南斯拉夫的紧急指示”，纳粹当局决定将上述地区分别划归第三帝国的斯蒂里亚马尔克行政区和克恩滕行政区。还包括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的比亚威斯多克。

在西方，这类地区有：

1. 法国的摩泽尔省（洛林）和上、下莱因省（阿尔萨斯），前者并入萨尔—法尔茨行政区，成为新的威斯特马尔克行政区；后者并入巴登行政区，成为新的巴登—阿尔萨斯行政区；

2. 卢森堡，整个国家于1941年2月划归科布伦次—特里尔行政区，成为新的摩泽尔行政区。

虽然纳粹分子始终没有公开通过法律宣布将上述地区最终并入德国，但事实清楚地表明，他们完全有意把这些地区最终吞并。例如，阿尔萨斯行政长官瓦格纳公开宣称，他的任务“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是一项将阿尔萨斯收回大德意志帝国的任务”。希特勒本人曾要求瓦格

纳在10年内使洛林和阿尔萨斯完全德意志化。为了使洛林、阿尔萨斯和卢森堡的行政管理制度同第三帝国的性质行政管理制度完全一致，这三个地区的立法须由各地的行政长官与德国的有关政府部门共同提出。在此三个地区，义务兵役制于1942年8月开始实行，接着第三帝国的内政部长颁布法令，把德国公民的身份授予参加德国武装部队或武装党卫军的当地居民，或是在其他方面表明自己不愧为德国人的当地居民。在这三个地方，纳粹当局还采取了各种步骤使当地的地名以至姓氏德意志化；同时还强迫当地居民讲德语以代替本民族语言或是法语。在这些地方的海关、邮电及铁道部门，则完全成为第三帝国各个部门的有机组成部分。

1941年8月，前波兰公国——比亚威斯托克省，也被纳粹当局划入民政长官管辖区的系列。东普鲁士行政长官科赫奉命出任该地区的行政长官，而该地区改隶属于东普鲁士行政区。纳粹官方坚持，比亚威斯托克也属于最后应并入第三帝国的地区之一。

### （三）附属区

这一类地区的行政机构也几乎完全是德国类型。这类地区包括波兰的残余地区内的总督辖区、德国专员管辖的乌克兰与奥斯特兰的白俄罗斯地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虽然在法律上还有本国的“自治”政府，上面还有一个德国监护机构，却可以被认为也属于这一类，特别是因为它们已被纳粹当局视为大德意志帝国的组成部分。

为了掠夺和统治被占领区，纳粹党首先于1934年在自己的中央机构中设立了殖民政治管理局，1940年升格为殖民事务部。战争爆发后，又在内阁中设立了东方领土事务部。

## 二、对被占领国家敲骨吸髓的掠夺

纳粹侵略者每当侵占了一个国家，便立即伸出魔爪，肆无忌惮地掠夺该国的人力和物质财富，使这个国家迅即陷入极度贫困之中。1939年10月19日，纳粹巨头戈林对下属发布指示：

“要使各个合并区的经济尽快纳入大德意志帝国的经济体系，要把各个总督区的全部资源和物资统统运到德国。”很快，这一指示便成为纳粹分子剥夺各个被占领国家和地区总纲领。

还在入侵苏联之前，纳粹德国统治集团就对即将率军开赴前线的各

级军官颁布指令，内称：“确保德国得到尽可能多的粮食和石油，这就是战争的主要目标。”

为了有效地掠夺被占领国家的农业资源，纳粹经济管理当局成立了“东方农产品总商会”，有 250 家德国公司参与了这项掠夺活动。依靠掠夺被占领国家的资源，法西斯德国保障了粮食需求的 24%、煤炭需求的 27%、钢和初炼铝的 35%、石油及其产品的 88%。仅 1942 年一年，被占领各国就被迫为德军提供了 40 多亿马克的粮食和原料。

随着纳粹德国军队挺进的全德最大的私人银行——德意志银行占有了奥地利的信贷和银行协会、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银行协会与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银行协会、罗马尼亚商业银行、希腊国家银行、保加利亚信贷银行、卢森堡总银行、荷兰的巴利金融公司，并且还在波兰开设了十多家分行。

全德第二家私人银行德雷斯頓银行也不甘落后，它所强占的外国银行和金融公司包括：维也纳的奥地利联邦银行及其在华沙的分行，波兰的克拉科夫商业银行、波森的东方银行和科尼斯堡的上西里西亚贴现银行；在捷克斯洛伐克，它强占了布拉格的波希米亚-厄斯康勃特银行和布拉迪斯拉发商业与信贷银行；在南斯拉夫，它夺取了克罗地亚地方银行；它还把罗马尼亚银行协会、希腊雅典银行、保加利亚商业银行和匈牙利总信贷银行攫取到手。仅从奥地利一国，纳粹德国就掠走黄金和外汇储备 4.5 亿先令。

由于这两家德国大银行强占的各国金融机构各自都控制着本国上百家重要的工业企业，所以，这些外国企业也就随之转入德国金融资本手中。

第三帝国的工业巨头们对外国的掠夺更甚于金融资本。驰名欧洲的法国洛林钢铁企业，被德国 5 家康采恩所瓜分：戈林工厂分得文德煤矿和钢铁厂，克吕克纳康采恩分得克诺丁根钢铁厂，洛希林康采恩分得迪登斯霍芬的卡尔钢铁厂，弗利克康采恩分得隆姆巴赫钢铁厂，而斯杜姆康采恩分得赫金根的工厂。1941 年，德国石油巨头们组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拥有 8 000 万马克资本的“大陆石油公司”，“其任务在于国境线以外”，说穿就是要对罗马尼亚、波兰、苏联里海和高加索地区的石油进行全面掠夺。从该公司监事会的组成情况可以发现，这是一个纳粹党的首脑同财政寡头为了掠夺外国而勾结起来的范例。该监事会主席由纳粹

德国政府经济部长冯克兼任；至于监事会成员，除去政府代表以外，便是垄断资本家的代表：德意志银行的阿布斯，德雷斯頓银行的拉希，商业与私人银行的莱因·哈特，柏林贸易公司的维尔奇恩，全德最大的钾托拉斯文特斯哈尔的罗斯泰格和布洛赫豪斯，法本托拉斯的克拉赫、弗希尔、布特费歇以及德国石油公司的希纳尔等人。

纳粹分子更以加倍的热情来攫取战败国的军工生产能力：他们从捷克斯洛伐克缴获了30个师的武器装备，从西线得到了法国92个师、比利时22个师、荷兰18个师、英国12个师和挪威6个师的武器装备，他们获得的军用汽车就足足可以装备90多个德国师。1941年，在被占领的西欧各国，有近5000家工业企业被迫按照纳粹占领军当局的命令，完成德国要求的军事订货。被占领各国的军事工业，如捷克的斯柯达、奥地利的阿尔彼内·蒙塔纳、罗马尼亚的马拉克萨等数十家大企业，均被置于克虏伯康采恩的全面监督之下。仅法国一家就有80%的飞机制造企业、40%的黑色冶金企业、70%的金属加工企业被紧紧拴在纳粹德国的战车上。

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认可的数字，纳粹德国从西欧各国掠走的各种矿产和工业原材料累计799.6亿法郎，工业制成品97.6亿法郎，农产品1266.6亿法郎，总计2163.8亿法郎。

纳粹占领当局还丧心病狂地向被占领国家强行征收近似天文数字的占领费。1944年8月以前的四年内，德国仅从法国就强征了340亿马克，占德国征收的占领费总额的40%；这个数目也相当于一次大战结束后德国向法国赔款额的4倍以上。德国从荷兰强征的占领费为77.2亿马克、比利时45.2亿马克、希腊23.7亿马克、乌克兰13.5亿马克、挪威12.8亿马克、塞尔维亚5.6亿马克、阿尔巴尼亚0.3亿马克。纳粹德国从欧洲各个被占领国共获得占领费600亿马克，连同从这些国家得到的罚金（例如对荷兰62个市政单位罚款2024万盾），合计掠夺到1040亿马克。

1947年，由美、英、苏三国代表组成的纳粹黄金分配委员会经认真估算后得出结论，纳粹分子从各个被占领国和被杀害犹太人手中掠夺走的黄金达337吨，以现在价格折算约为14亿美元。

“二战”期间，纳粹占领者从欧洲20个国家的犹太人手中掠走的各种艺术品，占当时欧洲收藏的艺术品总额的1/4。其中一半得自德

国、波兰犹太人，1/4 得自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希腊的犹太居民。据德国官方的一份秘密报告，截至 1944 年 7 月，从西欧各国运送到德国的艺术品共计 137 列铁路货车车厢，4 174 箱，21 903 件，其中绘画 10 890 幅。另据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设立的纳粹大屠杀问题总统咨询委员会公布的报告，1945 年 5 月上半月，攻入奥地利境内的一支美军，截获了一列纳粹分子从匈牙利发往德国的货车，共 24 节，满载着从匈牙利犹太居民手中强掠来的黄金、珠宝、艺术品以及高档衣物、名贵地毯和宗教文物。因此，纳粹有关人士称之为“黄金列车”。据美军方面当时的估计，这些财产价值 2 亿美元以上。

“二战”结束后，盟国情报人员根据举报，从大战犯戈林密藏的地下室内，查获他掠夺来的 5 200 多幅名画、16 万多个珠宝镶嵌珍品和 6 500 多件稀世文物。从德国梅尔斯克盐井中发现了纳粹分子隐藏的大量文物珍宝，总共装满了 2 600 多辆卡车运回。

第三帝国究竟从欧洲和北非各国抢掠走多少财富（不包括各种固定资产、农产品和矿产品），恐怕是一个永远揭不开谜底的无头案了。“二战”后 50 余年来，经过审讯纳粹战犯和战俘，查阅数以万计的受害者的举报和证言，盟国情报人员的多方搜索，再加上民间人士的疯狂挖掘，我们也只能高度概括地提出一个或许是近似的数值：11 000 亿法郎以上，其中 3 500 亿法郎是储存在德意志国家银行中的黄金、其他贵金属和外币；剩下的 7 000 多亿法郎则是被第三帝国和大小纳粹分子掠自被占领国的首饰、珠宝玉器、高档工艺品、稀有文物、孤本书籍、金银、外币等。仅仅盟军有关人员在首要战犯之一的卡滕勃伦纳的奥斯克里加别墅花园中就搜查出价值 10 亿法郎的财产。至于建立在前东普鲁士地区（今波兰马祖里湖一带）地下数十米的希特勒大本营“狼穴”内储藏的财宝（所谓大德意志宝藏），因其始终未见天日，就不好妄加评论了。据有的专家考证，其中至少包括价值 3 500 亿法郎的黄金、外汇和价值 7 000 亿法郎的珠宝首饰与珍贵文物。这一宝藏中的一部分，大致价值为 190 亿法郎，已被艾希曼率部于 1944 年冬先期转移，下落不明。随后，1945 年 4 月，依照希特勒的指示，党卫军和国防军总共出动了近千辆卡车，将上述财宝从柏林等大城市，秘密转移到德国南部和奥地利西、南部山区。据一些专家认为，主要的藏匿地点在奥地利境内格拉茨至克拉根福一带的深山区。

纳粹德国对被占领国家的横征暴敛，使这些地区的居民顿时陷入极度贫困之中，经济状况倒退回几十年以前。以致既不能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水平，也难以抗拒疾病和寒冷的侵袭，最终只有死路一条，成为一无所有的鬼魂。他们总共有 700 多万人。

## 第二章 大屠杀的酝酿、预演与逐步到位

### 第一节 隐秘的种族灭绝——强制绝育

纳粹党执政并逐步巩固了政权以后，该党一向倡导的种族优生学说便很快由务虚的纲领，变成实实在在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由一个党的独家见解变成带有强制性的统一的国家行为。

1933年7月14日，纳粹德国政府颁布的俗称绝育法的《防止具有遗传性疾病后代法》，就是其种族优生立法的一个典型。该项法律要求对一切患有各类精神和肉体疾病的病人实施强制性绝育，并对被社会上加以排斥的群体进行定义。该法拉开了迫害残疾人的序幕，并成为纳粹政权推行种族优生立法的奠基石。

绝育法针对的是患有遗传性疾病的病人。它一发端就开宗明义地道出其主旨：“任何患有遗传性疾病的人，如果通过医学诊断认定为其子女也将受到遗传性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损害，都将被进行绝育。”该法律还对患有遗传性疾病的人进行了定义。任何患有下列疾病之一者，均自动成为绝育手术的候选人：

1. 先天低能；
2. 精神分裂症；
3. 躁狂—抑郁性精神病；
4. 遗传性癫痫症；
5. 亨廷顿氏舞蹈病；
6. 遗传性失明；
7. 遗传性耳聋；
8. 严重遗传性身体畸形；



9. 任何情况下的严重酗酒。

该法律具体实施的法律框架为：一方面，残疾人可以申请绝育；另一方面，公共卫生部门的医生也可以提出申请。对于在医院的病人和在押的囚犯、医生、护理院和监狱的负责人也有权提出申请。新成立的遗传卫生法院隶属于具有司法判决权的最低一级法院，它们可以独立地对案件进行判决。遗传卫生方面的上诉法院也随之出台，它们隶属于地区巡回法院，而且也是由两名医生和一名法官组成：其中一名医生来自公共卫生部门，法官则来自巡回法院。巡回法庭作出的判决属于终审判决。该法律还包括强制性绝育的条款，一旦法院判定进行绝育，不管当事人是否同意，都将被实施绝育手术。如果有必要，警察部门还有权使用强制性手段迫使当事人就范。据不完全统计，1934—1945年，在整个纳粹占领区，至少有17 000名聋人被实施强制绝育，其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个女孩，只有9岁。

1934年元旦，绝育法正式开始实施。数以万计的德国男女，由于医生和健康部门判定他们患有遗传性疾病而被迫进行绝育手术。1935年10月，第三帝国又颁布婚姻卫生法，要求对整个人口进行甄别审查，防止患有遗传性退化疾病的人结婚，特别是那些绝育法所针对的人们。随后，纳粹政权连续颁布了大量对上述两部法律加以详细说明和扩大化的条例。

希特勒上台还不满一年，纳粹德国的卫生部门即已出台了对国内的白黑混血居民（主要是指1921年占领德国的法国和比利时部队中的黑人官兵和德国妇女所生的子女）进行强制绝育的计划。早在1935年9月的《纽伦堡种族法》颁布之前，纳粹德国的专业医务人员在地方当局的支持下，就已经对这些混血种人实施强制绝育。

1935年前后，此项针对3 000余人



仅仅因失聪，即遭纳粹分子强制绝育的9岁德国女孩

## 第二章 大屠杀的酝酿、预演与逐步到位

的“种族卫生”工作已告终结。在此项工作实施过程中，纳粹卫生当局的施政重点已从混血种人转向被他们视作第二个劣等种族的吉卜赛人，逼迫他们在立即离开德国和迅即接受强制绝育手术之间选择其一。以后，同样的打击的锋芒又指向具有一半甚至1/4犹太人血统的德国居民。

大战初期的节节胜利，使得纳粹德国的政治家、思想家、行政管理专家和卫生界负责人，也随着他们的元首而得意忘形，从而着手制订一项令所有被征服或占领国家的民族充当奴隶，并且逐渐消亡的隐密性种族灭绝计划——高效率、大规模的强制绝育。为此，数以百计的纳粹医生、教授、专家甚至护士，在行政管理专家的通力合作下，相继提出了几十种绝育方法，十余种实施方案，并且在奥斯维辛、拉芬斯布吕克、布亨瓦尔特、达豪等十多个大型集中营内对数以万计的犹太、吉卜赛囚犯，因从事抵抗运动而被捕的政治犯和男女战俘进行了残酷的手术试验，造成他们大量死亡或者终身残疾、终身不育。仅仅臭名昭著的党卫军旅队长、妇科专家卡尔·克劳贝格一个人，就曾给奥斯维辛和拉芬斯布吕克的700多个犹太和吉卜赛女囚进行过严重摧残其健康的绝育手术，至少造成其中1/3死亡。另一个恶魔医生霍斯特·舒曼在1942年秋至1945年3月，几乎每周都要给30—60个犹太或吉卜赛少女甚至10岁以下女孩，实施惨绝人寰的单侧或双侧卵巢爱克斯光超高强度照射手术，目的就是寻求一种高效率的绝育方法，此举致使近百名女孩当场死亡。“死亡天使”尤塞夫·门格尔不仅杀人如麻，而且在实施绝育手术方面也“颇有建树”，他虽然不曾发明新的绝育方法，却积极执行德国法本和拜尔两家大型化学企业的委托，给3000—6000名集中营女囚注射了这两家公司新推出的未经临床实验的绝育药剂，其中许多人因此死亡或致残。此外，德国国内的不少处决中心也兼具实施强制绝育手术的功能，许多医生和护士都接受过实施绝育手术的系统培训。在这些中心被实行强制绝育的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受害者，多达数千人。

此外，被实施强制绝育的对象还包括在德国从事强制劳动的欧洲各国的女性劳工，首当其冲的是被纳粹德国视为最危险敌国的苏联和波兰

妇女。无论妊娠时间长短，她们都必须接受风险很大的人工流产手术。为此，即使出现手术后死亡，纳粹医生也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据德国《明镜》周刊2001年第31期公布的最新研究资料，1934年1月至1945年4月，纳粹德国医务人员对40万属于“无生存价值”或“劣等种族”男女实施了强制绝育手术，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妇女。直到1970年，上述40万人中还有6万多人健在。

纳粹医学界为希特勒之流制订的绝育计划十分庞大，除日耳曼血统和极少数欧洲国家的卖国贼集团外，其他民族均有可能被列入需要进行绝育手术的范围内。假如纳粹德国真的占领并统治了整个欧洲，将有2亿—3亿人成为绝育手术的受害对象。

## 第二节 T-4行动——大屠杀的前奏和预演

纳粹分子的屠刀首先指向的目标，并非犹太人，而是被希特勒称为“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即精神病人和其他难以治愈的重病人，如结核病人、残疾人。这当然首先是指德国人中的重病人和残疾人。对重残病人的大屠杀，是头号战犯希特勒亲自下令加以部署的：1939年9月19日，亦即入侵波兰之战爆发不久，希特勒召见了帝国元首府办公厅主任菲利普·比勒和党卫军卫生部门负责人卡尔·勃兰特、莱奥纳多·康蒂，向他们下达了消灭全国重残病人的命令，近期内至少要杀掉一半。他认为，精神病人和其他重残病人都是些“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而他们长期难以治愈，徒然占据着大批病床，造成许多光荣负伤的战士得不到及时医治，这是不能容许的，因此，所有重残病人均应消灭掉。至于消灭上述病人的手段，康蒂主张使用注射毒药的办法，希特勒则坚持使用毒气，结果是两手并用；反正是贯彻了无痛死亡的“安乐死”原则。

卡尔·勃兰特和菲利普·比勒是希特勒直接任命的执行“安乐死”计划的最高全权代表。他们负责编制行动纲领、讨论重大问题、经常向希特勒汇报情况，并接受和迅速贯彻他的指示。但是，此二人并未参加

## 第二章 大屠杀的酝酿、预演与逐步到位

灭绝残疾人计划的日常工作，儿童和成年人“安乐死”计划的具体负责人是维克托·布拉克，他的正式官职是纳粹德国元首府办公厅第二办公室主任。实施灭绝残疾人计划的办事机构如下：中央办公室，由格哈德·勃恩博士负责（1940年夏天后，由迪特利希·阿勒斯负责）；医学办公室，由维尔纳·海德博士负责（1941年12月以后，由保罗·尼彻博士负责）；行政办公室，主任由格哈德·伯恩兼任（1940年夏天后由弗里德里希·蒂尔曼负责）；中央财务办公室，由维利·施奈德负责（1941年3月后，由弗利茨·施米德尔负责；1942年1月后，由弗里德里希·罗伦特负责）；运输办公室，由莱因霍尔德·福尔贝格负责，副手为格哈德·希勃特；人事办公室，由弗里德里希·豪斯和阿诺德·奥尔斯负责；监察员办公室，由阿道夫·古斯塔夫·考夫曼负责。其中，前三个办公室的负责人均为全国有名的专家教授。上述负责人中的一部分曾作为美军军事法庭举行的医生审判案的主犯出庭受审，如卡尔·勃兰特、维克托·布拉克，且均被处以死刑。保罗·尼彻在德国举行的另一个审判案中被判处死刑，维尔纳·海德则被缺席判处死刑。总之，上述各个官员均已成为够格的战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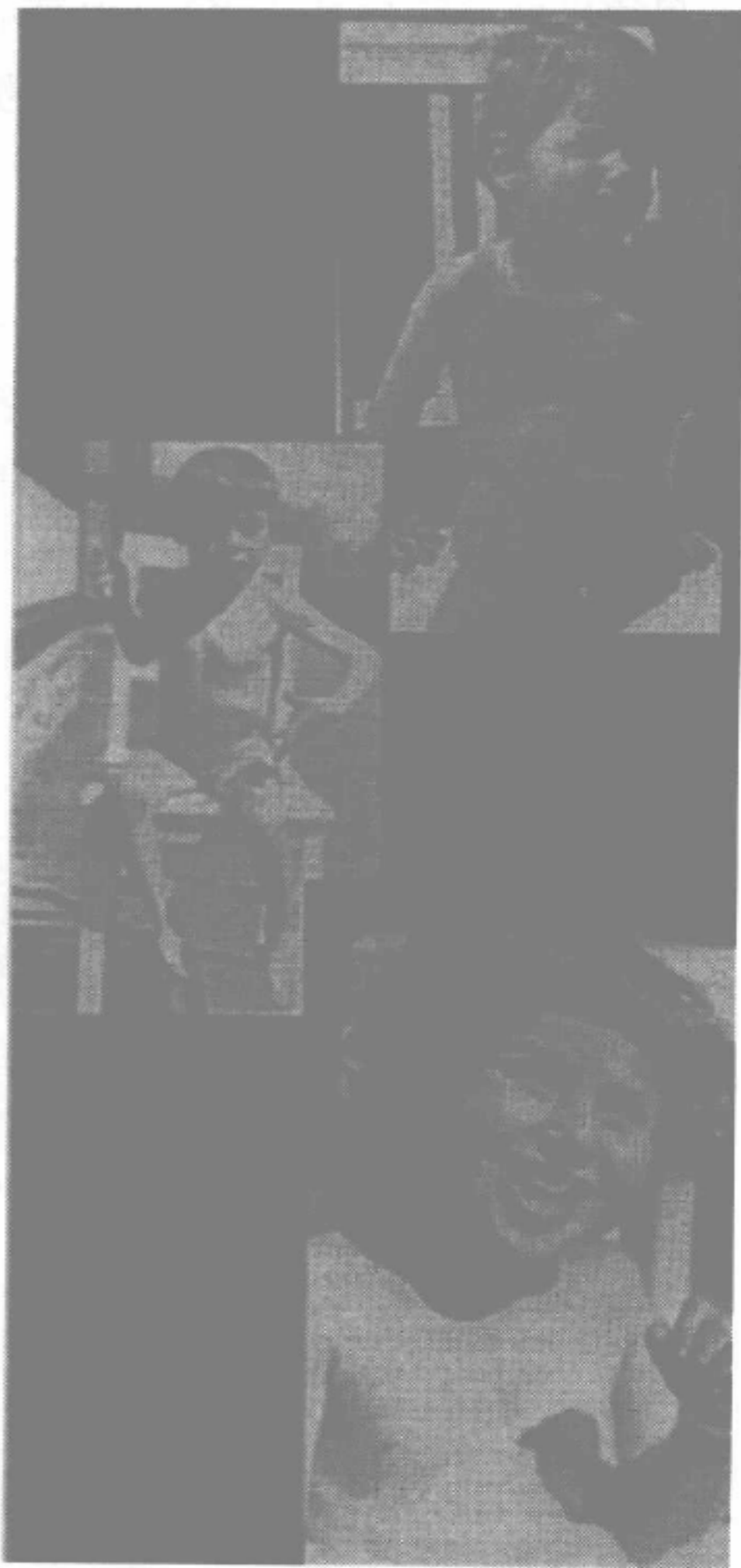


格拉芬奈克处决中心及其杀害病人用的毒气室

纳粹党和帝国卫生部门的负责人雷厉风行地贯彻落实元首的命令。经过月余的拼搏，思想已经完全纳粹化的医学专家、法学家和行政管理专家以及教授们，炮制出一套系统的、主要依靠医疗单位消灭重残病人的计划。由于该计划是在柏林市动物园大街（Strasse Tiergarten）4号的总部中一座别墅内拟订的，为保密起见，该计划的代号简称为T-4

计划，具体执行该计划的护士被称为T-4护士。消灭重残病人的刑场，由原来的精神病院、疗养院、儿科诊所等略加改造即成，主要是要修建若干间可导入毒气的“浴室”和培训一批掌握用医疗手段杀人技术的医生护士。由玛丽亚·阿萍捷、葆琳·克奈斯勒等二三十名未婚男女护士组成的首批T-4护士经过秘密宣誓后，开始接受培训，至多数周以后即上岗操作。至于实施“安乐死”的场所，纳粹卫生部门连忙将4个过去的精神病院、疗养院先后改造为专门以毒气和医疗手段杀害重残病人的机构——它们是格拉芬奈克、佐恩施泰因、勃兰登堡、哈尔特海姆。1940年以后，格拉芬奈克和勃兰登堡停止运行，分别由新成立的哈达马尔和贝恩堡取而代之。

第七个大型机构出人意料地设在被纳粹侵占的苏联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附近，存在时间比较短，但处决规模也在万人以上。一些资格较老的T-4医生、护士曾多次到此指导高效杀人的运作门径，如玛丽亚·阿萍捷等。这数以百计的以杀人害命为专职的医院、疗养院和精神病院，在纳粹的秘密文件中被称为“处决中心”。不久，全国各地的重残病人均接到地方当局的通知，为使他们的身体尽快痊愈，国家决定对他们进行集中治疗，须于指定期



被T-4医护人员残杀的病残儿童

限内到指定医院报到并住院治疗。在这些医院和疗养院里，陪同病人的亲友得到医生们耐心、细致的住院咨询，病人则被一群年轻、热情、善解人意的护士搀扶着，或用车推入医疗条件优越的病房。看到这一切，亲友们还有什么可放心不下的事情？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病人的生命从此只能以小时计算了。大多数病人，在入院后的一周内就得到了“治疗”：他们或是在“入浴”时，吸入致命的气体倒下毙命；或是被女护士喂饭后，腹部绞痛而死；或是经美貌的女护士温存的劝说，接受了注射、灌肠、洗胃、穿刺等常规治疗后“意外”身亡。对有些病人，特别是那些不肯合作的病人，纳粹医生和护士，往往采取逐步消减营养的办法，最后将病人活生生地饿死。其他病人的性命，至多延续了数月后，也无不遭受同样的下场。总之，病人的亲属们在接到住院单位的死亡通知后，再也没能见到病人一面，不但尸体，连骨灰也往往不是本人的。不仅成年人，就是儿童，也同样必须接受类似的“治疗”。开始，当局只要求3岁之内的残疾儿童接受“治疗”；不久，必须接受“治疗”的儿童年龄上限提高到17岁。

为了杀害残疾儿童，纳粹当局竟建立了22家儿童安乐死诊所：柏林市立医院、柏林温兹勒医生诊所、巴伐利亚的安斯巴赫医院和考夫布伦医院、勃兰登堡-戈登医院、慕尼黑郊区的埃格尔芬-哈尔医院、艾尔特维尔附近的艾希贝格医院、汉堡的朗根霍恩医院、汉堡的罗森伯格索尔特医院、伊德斯滕附近的卡尔门霍夫医院、莱比锡大学儿童医院、莱比锡的多森医院、卢勒堡医院、梅舍里茨-奥布拉沃尔医院、卡塞尔附近的涅德玛尔斯堡医院、施维林附近的萨斯森堡医院、施塔德特罗达医院、斯图加特市立儿童医院、乌施茨普林格医院、海德堡附近的维斯罗希医院、沃尔德尼尔医院、维也纳的安斯皮格尔格伦德医院。在杀人的手段方面，儿童处决中心同成人处决中心有一个重大的区别：纳粹医生和护士在杀害儿童时，从未使用过毒气，而只使用注射毒剂、毒剂灌肠、过量抽取脊髓、喂给过量麻醉剂和含有毒素的食物等医疗、护理手段；而杀害成人时则两者并用，且使用毒气的概率更高。大约有五六十名纳粹医生（其中至少有4名女医生）参与了组织杀害儿童的罪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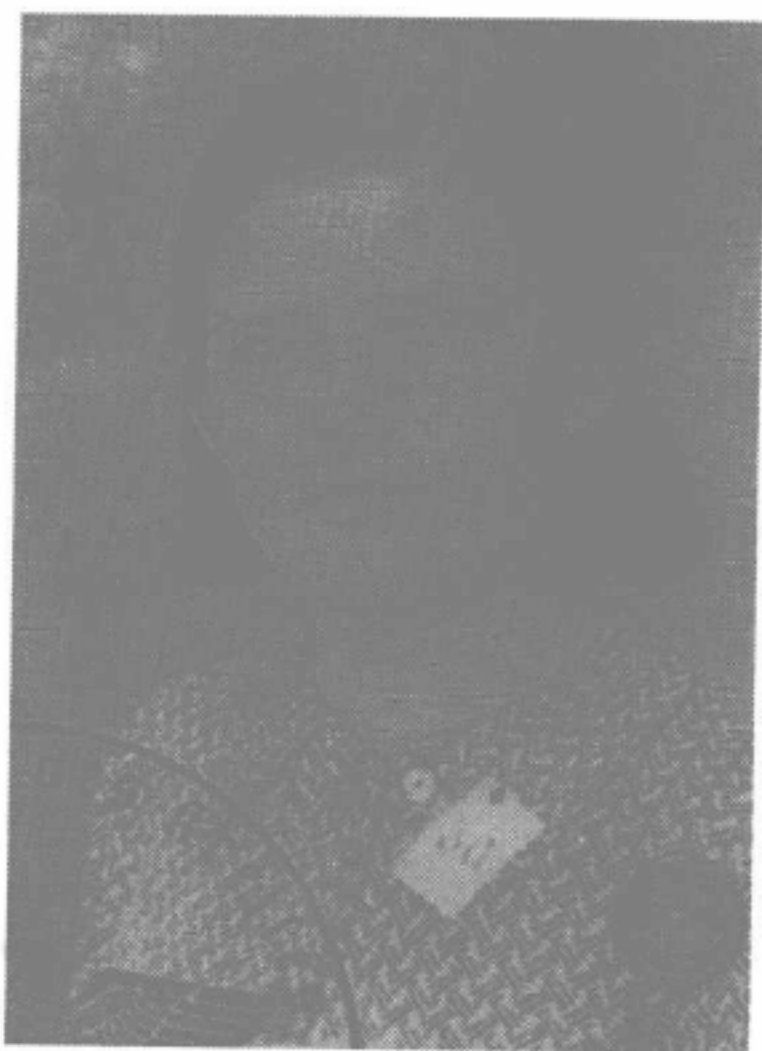
动计划，甚至直接下手杀害残疾儿童，从而堕落为可耻的纳粹战犯。

起初，必须接受“治疗”的还只是德国居民，后来，随着纳粹占领区的不断扩大，被占领国的重残病人也必须接受“治疗”。再往后，就是那些被赶到德国做苦工的外国人，只要身患上述疾病，也必须到指定医院接受治疗。1939—1941年不到两年时间内，大致有10万名重残病人，包括近万名儿童在处决中心内惨遭杀害。加上波兰、苏联、捷克等国的受害者，死亡人数至少在50万以上。这些惨无人道的医生护士，当然都是够格的战犯。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境外，都受到过严正审判和应有的惩罚。在德国的哈达玛尔和勃兰登堡两个处决中心审判案中，有数十名纳粹医生和T-4护士被判处死刑或徒刑。哈达马尔有4名罪恶累累的纳粹医生，每个人都曾通过注射毒药杀害过1000多名病人。罪行最为严重的女性是哈达玛尔中心的护士长伊姆嘉尔德·胡勃，经她布置杀害或她亲手杀害的病人估计为500人左右，她被判处25年的重刑。另一个T-4护士葆琳·克奈斯勒被判刑20年，她亲手杀害的德国、波兰、俄罗斯病人高达150余人。创直接杀人纪录的女杀手大概是勃兰登堡中心的T-4护士玛格蕾特·敦科夫斯基，她用饭食中掺入毒药、注射毒液和灌肠液中掺入毒剂的手法，足足杀死了220多个病人，然而，她直到1964年才被揭露出来，那时德国早已废除了死刑。另外一名长期逍遥法外的T-4护士是玛利亚·阿萍捷。她可以算是T-4护士的元老。阿萍捷早在1932年即加入纳粹党，1939年12月，柏林警察部门通知她速去接受一项紧急派遣任务。1940年1月4日，她在当时的T-4总部哥伦布大厦与其他已被聘用的T-4护士会合。在那里，这些男女护士被告知他们未来工作的杀人性质，但没有一个人加以拒绝。随后，他们被派遣到格拉芬奈克处决中心。阿萍捷在此一直工作到1940年5月。以后，她的工作单位改为佐恩施泰因处决中心，在那里工作到1942年夏初。以后，在派往明斯克一个名为研究所的隐蔽处决中心工作5个月后，继而又被派到一家儿童处决病房工作，1943年离去。她的主要业务是押送已被确定为处决对象的病人乘坐汽车或火车到所在的处决中心，然后将受害者带进毒气接待室，间或，她也从事给病人注射

## 第二章 大屠杀的酝酿、预演与逐步到位

各种毒剂的工作，打发他们去见上帝。由于六大处决中心的犯罪事实，只有哈达马尔一家在战争结束不久即为盟军获悉，其工作人员受到审判；而其他5个处决中心的罪恶却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盟国执法人员抓住足够的证据，不曾在哈达马尔供职的阿萍捷等人，也得以长期逍遥法外。

在T-4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各式各样的纳粹医生。从事这一勾当的数百名医生和护士中，既有老资格的专家教授，也有刚刚走出医科大学或护士职业学校校门的年轻学生。他们的共性在于都是纳粹种族主义的忠实信徒，或者是纳粹党员，或者是希特勒主义青年团团员，或者是德国医师联盟、或者是德国少女联盟的成员。



T-4 行动的一名女性受害者

战后曾被盟军审判的纳粹医生威廉·古斯塔夫·舒埃普博士，就是亲身参与了这种披着医学外衣的屠杀的一个范例。从1941年9月基辅陷落到1942年3月，舒埃普受纳粹德国医学领袖莱奥纳多·康蒂派遣，到基辅病理学研究所任职。实际上，他担任一支由20多个医生和身着医生制服的保安警察组成的特别突击队的领导，其任务就是“毁灭无生存价值的生命”。具体地讲，是把被运到该研究所内的残疾人和属于劣等种族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土

库曼人通过注射毒剂和其他医疗手段杀死。据他估计，在基辅工作的半年左右时间内，被杀死的受害者超过10万人。

杀害精神病患者并非只是纳粹医生和护士们的专利，明火执仗杀人的特别行动队也负责杀害被占领国家的精神病患者。例如，在波兰被占领的但泽地区，党卫军上尉赫伯特·朗格领导下的瓦克斯图伦巴奈曼行



动队不仅杀害了大批波兰知识分子，驱赶波兰人和犹太人出境，而且首要任务就是杀害精神病人。他们在波美拉尼亚精神病院使用毒气车杀死了1 400名精神病人，在康拉特施泰因精神病院使用毒气车杀死了2 000名精神病人。运用同样的手段，他们以后在东普鲁士的索尔多集中营又杀害了1 558名重病人以及后来运进来的300名波兰“疯子”。在波兹南附近的欧文斯卡精神病医院，朗格等人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处决中心。1944年夏，该中心关闭时已使用毒气、枪决和酷刑折磨的手段杀害了15 000多名重残病人，其中不少是儿童。在波兰的海尔姆、科别热恩，纳粹也建立了类似的处决中心。正是朗格一伙，于1942年在瓦尔特兰地区建立了纳粹德国范围内第一个灭绝营——海乌姆诺灭绝营，专门用于实施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

T-4计划并非进展一帆风顺。由于处决中心一般都设在大中城市内，有些就设在原来一些医院的某一部分，因此，受害者被焚尸后产生的带有特殊臭味的黑烟，往往引起周围居民的怀疑。长此以往，T-4计划的奥秘终于被泄露出去。在德国宗教势力甚至纳粹党内部一些人的极力抗议下，希特勒被迫于1941年8月颁布停止杀害精神病人和残疾人的命令。然而，这一命令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它实际上仅仅适用于某几个处决中心。对残疾人的大规模处决仍然通过其他方式继续进行，而且，停止屠杀的命令也不适用于从未使用过毒气室的儿童安乐死计划。因此，尽管停止屠杀的命令使某些精神病患者进入毒气室的过程得以延续，但纳粹医生、护士们仍可以通过诱骗病人服用毒剂、注射毒药、中止饮食的手法继续杀害残疾儿童和成年残疾人。所以，在“停止屠杀”的命令下达后，死于安乐死行动的受害者较之命令下达之前不是减少了，反而有所增多。其中，对患病的苏联、东欧国家劳工的屠杀，自1943年以后呈现愈演愈烈的局面。1944年9月6日，纳粹德国内政部通知各级地方政府：务必将由于精神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东欧劳工集中到指定的11家地方国营医院接受治疗。其实，这些劳工中有许多人患的不过是略加治疗即可痊愈的轻症。而纳粹当局却不分青红皂白，把他们一起纳入应予处决的范围内。这11家医院包括：东、西普鲁士和瓦

尔特兰地区的蒂根霍夫医院、巴伐利亚的考夫布伦医院、奥地利的冒尔-奥林医院、黑森的哈达马尔医院。名义上已经不复存在的 T-4 中央办公室对东欧劳工的运输加以安排，并对这次屠杀行动提供了财政方面的支持。在哈达马尔医院，这次屠杀行动是由医院的行政主管阿尔方斯·克莱尔全盘负责的，具体操作则是由护士长伊姆嘉尔德·胡勃、代理护士长玛格蕾特·敦科弗斯基、护士葆琳·克奈斯勒等 30 余人进行的。数千名男女东欧劳工被 T-4 护士们假借打防疫针名义注射毒剂杀害后，医院的医务主任阿道夫·维尔曼经检查确信所有劳工已经死亡，便着手准备伪称死者死于各种病因的死亡通知书。进入其他 10 家医院进行“治疗”的东欧劳工的命运基本上也是殊途同归。这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 T-4 行动，一直延续到 1945 年春，大概有两万多人在纳粹医生和 T-4 护士的注射器下命归黄泉。

此后，小批量的 T-4 行动依然在继续进行，直到纳粹德国彻底垮台。一个例外的小插曲竟然发生在德国投降一个多月以后：由瓦伦丁·法特豪泽尔担任院长的考夫布伦国营医院及其位于爱尔希的附属医院，在希特勒下令停止 T-4 屠杀的命令后成为一个从事“任意”安乐死的处决中心。该医院还设有一个儿童处决病房。1945 年 4 月底，美国军队占领了考夫布伦医院；但由于国营医院被列入禁止入内的区域，美军并未干预医院的运行。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该医院的儿童处决病房在距离美军最高司令部和宪兵总部，均不到半英里的一个田园小镇上，不受任何干扰地照常运行，而 T-4 行动也在暗中继续进行：1945 年 5 月 29 日下午，该医院的医务人员最后注射杀害了一名儿童——年仅 4 岁的里查德·杰恩。瓦伦丁·法特豪泽尔还煞有介事地在杰恩的死亡鉴定书的死亡原因栏内写上“伤寒”的字样。这一罪恶勾当直到美军接到举报，于 7 月 2 日进入该医院才最终被制止。

在 T-4 时期，各个处决中心的毒气室已然开始崭露头角，它们勾魂夺命的能力，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从 15 人猛涨到 150 人。后者已经同灭绝营时期规模较小的毒气室的杀人能力持平。只消把掌握使用毒气设施的医生、护士们调动过去，把原有的毒气室成倍扩大，专事杀害重

残病人的 T-4 阶段，即可轻而易举地转入大规模处决犹太人的莱因哈特阶段。从 1941 年 T-4 行动暂停，到灭绝营大显身手的莱因哈特阶段于 1942 年春天启动，其间隔不到一年，足见 T-4 阶段正是莱因哈特阶段（亦即人们常说的“大屠杀”）的前奏和预演。当然，后者也与前者有所不同：纳粹杀手吸取了处决中心的黑幕被暴露的教训，把灭绝营纷纷建立在远离德国本土的波兰东部，而且一律设在偏僻荒凉的村镇附近。

1941 年以来，由于 T-4 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转入地下状态，所需的医生、护士减少，纳粹卫生当局便将数十名 T-4 医生、护士、监工派往从事“莱因哈特行动”的灭绝营继续从事屠杀事业——包括波兰总督区内的贝乌泽茨、索比博和特列勃林卡以及奥斯维辛、马伊达奈克。以后，还有一些处决中心的杀手被调遣到第里雅斯特附近的专门用于杀害南欧国家犹太人的圣萨巴集中营。到 1943 年秋该行动结束时，已经杀害波兰、苏联、捷克等地的犹太人 150 万人以上。

到集中营或灭绝营任职，对披着白色工作服的纳粹杀手的工作性质毫无改动，只不过要求杀人的效率成倍增长而已。因此，这些医生、护士的杀人才干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罪恶也日见严重。霍斯特·舒曼、弗里德里希·梅内克等不少医生就是在调动工作之后，由丙级战犯跃升为乙级战犯的。从原来在格拉芬奈克和哈达马尔两个处决中心工作，后来调至波兰的特列勃林卡、索比博以及圣萨巴集中营工作的刽子手弗兰茨·霍都的经历来考察，人们难以发现他的工作的屠杀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在新的岗位上，他开始负责焚烧受害者的尸体，以后调入医务室，穿上白大褂。但他从来不给押送到此的妇女和她们的幼儿看病，只是大声地命令她们立刻脱光衣服，面向墙壁站立等候诊治。然而，根本不具备医科学历的霍都从来不曾使用听诊器，他的器械只有勃郎宁手枪。只是当他需要换弹夹时，为了遮人耳目，防止受害者看透他的伎俩而进行反抗，他往妇女们的肛门内插进一根体温计作幌子。一旦子弹上膛后，他马上就朝着被害妇女的后脑开枪。有时，进来的妇女带着的孩子很小，他便不使用枪弹，结果了孩子的母亲后，又猛地抡起枪柄，把

幼儿的头骨砸碎。

### 第三节 公然践踏《日内瓦公约》，肆意杀害战俘

“二战”期间，盟国战俘特别是苏联战俘也早于犹太民族而遭到系统的大屠杀，这类的集体屠杀始于1941年夏。整个战争期间，惨遭纳粹分子毒手直接杀害或蓄意谋害致死的盟国战俘，数量大约150万人以上。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有580万苏军官兵遭到合围，突围失利后成为德军的战俘。由于苏联政府未曾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纳粹当局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不肯给予苏军战俘以应有的战俘待遇。多方面的档案材料已经证实，无论是德国武装力量最高指挥部还是党卫军、盖世太保当局，均曾下达秘密指令杀害不肯屈服就范的苏军战俘。1941年3月，纳粹德国对苏进攻前夕，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秉承希特勒的意图，制定了“特殊纲领”，其中规定：对苏军战俘中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政委，一经发现即可就地处决。1941年11月9日，盖世太保的总头目海因利希·密勒对其部下发布指示：苏军战俘中凡明显不能干活或不能进行短暂行军者，今后不必送往集中营处死，允许对其就地处决。1942年初，德军大本营战俘事务局在柏林召开秘密会议。会议由该局局长冯·格雷维尼茨将军主持，议题是讨论如何处置那些因病弱伤残而已失去劳动能力的苏军战俘。许多出席该会议的军官，其中包括一些医生均声称，应该把这样的俘虏集中在营地或战地医院，并且把他们毒死。根据会议精神，冯·格雷维尼茨将军下达命令，把丧失生活能力和劳动能力的战俘处死；为此目的可以使用医务人员。至迟到同年夏天，“毒死俄国战俘的办法已经被付诸实施”。此举给纳粹党卫军和国防军官兵对苏军战俘大开杀戒提供了堂而皇之的依据，导致无数起虐待、折磨、拷打、杀害苏军战俘的事件。仅在白俄罗斯，就有70多万战俘被德军以各种方式虐杀。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是德国陆军驻白俄罗斯部队司令官古斯塔夫·弗雷海尔将军、纳粹中央保安总局驻白俄罗斯警察长官爱德华·瓦格纳将军和盖世太保驻明斯克地

区首领盖奥尔格·豪泽尔。

纳粹分子大肆杀害盟军战俘特别是苏军战俘的罪恶行径，大部分是在集中营或灭绝营内完成的。在奥斯维辛和毛特豪森、萨克森豪森等集中营，苏军战俘作为极端的异己势力被蓄意大量杀害。1941年9月3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部门负责人、党卫军上尉弗利奇，在主营进行新型毒气奇克隆-B的功能试验。他挑选出来的试验对象不是犹太人，而是600名苏军战俘和250名波兰重病囚犯。集中营当局还故意加重苏军战俘的劳动强度，削减其营养标准，甚至只因轻微的过错，就把他们以对抗当局、破坏营内秩序的罪名送往政治部严刑拷打，直至大批处决。从1941年8月到1945年初，仅在奥斯维辛一处，被杀害的苏军战俘即多达15万人以上。布亨瓦尔特集中营的纳粹医生还独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简便易行，且不易为受害者觉察的日常杀人方法，专门以苏军战俘为对象：每天，都有一批苏军战俘接到通知，要求他们逐个进入医疗所测量身高。一进入指定房间，站好位置后，医生就开始按电钮。不过，落到他们头顶上的不是卡尺，而是一块急速下降的下端极为尖锐的圆锥形大铁块，一经扎入脑颅，就造成测量者当场毙命。党卫军护士只需拉走尸体，再擦去少许溅在墙上、地上的血迹，就笑盈盈地叫喊下一个受害者进来接受检测。每天，受害者的数量往往在5人以上。

在斯莫棱斯克，德国军医舍姆、盖特勒、米勒、奥特、施泰芬、瓦格纳，在其他军医部门人员协助下，在给予新药的幌子下，对被俘的苏军官兵肆意进行各种医学试验，其后，又通过注射砒霜和羊角拗质等剧毒制剂将他们杀害。驻扎在斯莫棱斯克的德军第551战地医院卫生员莫迪什，使用注射毒剂的手段杀害了24个苏军伤病战俘。此外，他还从6—8岁的苏联儿童身上抽取大量血液输入到德军伤员体内，而这些可怜的孩子大量因过度失血死去。在1944年8月开始的华沙起义中，不少德军军医也对战俘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例如，德军在华沙切尔尼亚科夫斯卡大街的奇特罗恩工厂占领了一个起义者的医院，德国军医舒尔策发现了两名需要立即进行手术的重伤员，他不但拒绝给他们做手术，反而掏出手枪将二人击毙。至于德军枪杀被俘的盟军医院军医和护士的

## 第二章 大屠杀的酝酿、预演与逐步到位

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在德国三军对被俘人员实施人体试验的罪行中，空军是最积极、参与最广泛的一家。在空军医务系统内，上至空军元帅米尔希、医务总教授希普克博士，下至军医中尉奥斯卡·施罗德，许多医生、教授、博士都参与了使用集中营囚犯进行高压仓实验和冷冻实验的残暴行为，他们的“科学研究”直接造成至少数以百计的战俘痛苦不堪地死亡。

苏军战俘尤其是其中的女战俘，还被大量用于代替豚鼠作为惨无人道的活人试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布纳分营，纳粹的医生、药剂师和化学家，使用苏军女战俘进行新药和新型制剂的试验，每次被试验人数都在100人以上。此前，这些新药和新试剂往往未经任何动物试验，因此带有极大的风险。从战后盟国人员掌握的部分材料分析，至少有三批接受注射荷尔蒙新型制剂的苏军女战俘在经过注射后数日内全部死亡，死亡人数分别为150人、170人和200人。另有确凿证据证实，至少有数十名年龄在26岁以下的苏军被俘女官兵，被送进奥斯维辛主营10号楼，接受舒曼和克劳贝格医生的绝育试验手术，并在多次试验后，因不再具有试验价值，而被驱赶进比克瑙分营的几个毒气室杀害。在布亨瓦尔特、达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苏军女战俘在经历其他种类的医学试验后，又被特列宾斯基等纳粹医生注射毒剂杀死灭口。有些面貌出众的女战俘，还被集中营当局选中，强迫她们在营中妓院充当营妓。其中染上性病的不幸者或被迫怀孕者，最后依然逃脱不了被毒杀的悲惨命运。

1944年11月，纳粹德军奉命将手中的所有苏军战俘移交给盖世太保，此举进一步加剧了苏军战俘被杀害的规模和速度。

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对其手下肆意杀害苏军战俘的行为持纵容和支持的态度。1944年9月，他竟亲临毛特豪森集中营视察，观赏集中营司令官特意为他安排的一场“处死50名苏军军官的精彩表演”。到战争结束，被纳粹德军俘虏的580万苏军战俘中，除100多万人参加了卖国贼安德烈·弗拉索夫的伪军——俄罗斯民族解放军或充当纳粹集中营看守外，只有100多万人幸存，另外的300多万人全部被有组织地杀害或死于疾病与饥寒交迫。

美、英以及西欧国家落入纳粹德国手中的战俘，其生活待遇一般来讲要明显优越于苏军战俘，但也多次遭到被杀害的结局。突出的一例是47名美、英、荷兰被俘飞行员的悲惨境遇：1944年夏天，上述47名飞行员在对德国的一次轰炸中飞机被击落，跳伞后被俘。他们全部被纳粹法庭判处死刑，并押送到素以杀害战俘闻名的毛特豪森集中营执行死刑。集中营司令官马克斯·齐雷斯认为，无论使用枪决还是绞刑，都对飞行员们太便宜了。他于是采用了一种让他们吃尽苦头的处决办法，送他们去采石场做工，让不堪忍受的苦役和毒打把他们慢慢地折磨死。他们惨死的情景是后来由幸存的战俘讲述的：毛特豪森集中营的采石场是一个巨大的盆地，从地面上有一条用80块粗糙的大岩石块垒起的阶梯通往盆地底部。这47名空军战俘，每天光着脚，只穿衬衣和短裤，有的光着膀子，他们抱着或扛着25公斤到30公斤重的石块，沿着石台阶往上走，时不时地饱尝拳打脚踢，甚至被有意投下的石块砸伤。搬到地面还来不及放下，就又被赶下去，强迫他们搬一块比前一回更重的大石块。这样折腾了一天，到晚上收工时，已有21人活活累死。次日，党卫军又用同样的手法对付还活着的人。到第二天晚上，就只剩下一个活人了。

闻知战友们惨遭杀害，被关押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萨冈分部“3号空军战俘营”的数百名美英飞行员决定越狱。他们以难以想象的毅力，挖通了100条越狱隧道。1945年3月24日，80名英国飞行员越狱成功。希特勒闻讯大怒，亲自下令杀害敢于逃跑的飞行员。3月26日，盖世太保总头子缪勒下命令给布雷斯劳地区的盖世太保头子、党卫军突击队中队长沙尔贝文克，要他执行杀害重新被捕的飞行员的任务。尽管不少纳粹大员出面做希特勒的工作，还是有50名飞行员被杀害。这就是“二战”中有名的萨冈事件。战后，这两起惨案的罪魁祸首、毛特豪森集中营司令官马克斯·齐雷斯及其主要帮凶，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在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几十名文身的法国年轻战俘，被集中营司令官汉斯·科赫的妻子伊尔丝挑选出来，她以注射防疫针的幌子给他们注

射了致命的毒剂。其实，这些法国青年完全是无辜的，伊尔丝之所以杀害他们，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剥取他们的人皮，去制作各种工艺品，以满足自己酷爱“艺术”的嗜好。

在纳茨维勒集中营，纳粹医生甚至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抓获到盟军的女官兵，一律使用注射毒剂的办法处死。为此，战后盟军法庭曾对这些沦为战犯的纳粹医生进行过严正的审判，直至判处死刑。这就是闻名欧洲的纳茨维勒集中营罪犯审判案。

#### 第四节 亘古未见的大屠杀——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

“二战”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统泰奥多尔·豪斯在1949年12月7日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就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进行大屠杀严词谴责：“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全体德国人的耻辱。”1951年9月21日，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针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血腥罪行明确表态：“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全体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罪行，并且有义务做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是令人信服的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1970年12月，当时的西德总理勃兰特专程抵达华沙犹太区凭吊。尽管他是一名与纳粹政权坚决斗争的抵抗战士，与纳粹政权屠杀犹太人毫不相干，他却和华沙犹太区双膝跪下，以表示对德国人当年给犹太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的歉意。1998年11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纪念大会上郑重宣布：“60年前，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德国历史上最恶劣、最无耻的事件，国家本身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凶手。”历届德国领导人的深刻悔悟，从反面揭示了当年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种亘古未见的弥天大罪。

犹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命运乖蹇的民族。早在公元前即开始遭受强大异族的迫害和奴役、屠杀：古代埃及人的长达400多年的高压和奴役政策，引出了领袖摩西的出埃及记；古罗马帝国残酷地镇压犹太人的三次谋求自由的武装起义，总计杀害了150多万犹太人，把60多万犹太人抓去当奴隶，并迫使其他的犹太人远离巴勒斯坦。于是，犹太人



开始了为期 1800 多年的大流亡。随即，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将耶路撒冷完全夷为平地，并严令禁止一切犹太人进入该城，违者格杀勿论，从而导致以后的“哭墙”的出现。中世纪时，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戮又掀起新高潮：11 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曾提出一个口号“杀死一个犹太人，拯救你的灵魂”。13 世纪时，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下令从威尔士全部驱逐犹太人，并绞死 300 名犹太教长老，在欧洲范围内开驱逐犹太人之先河。15 世纪初，德国国王卢波特曾颁布敕令，从莱因和巴伐利亚驱逐全部犹太人，犹太人必须身穿 200 年前教皇英诺森三世为他们特别指定的服装。在 15 世纪晚期的西班牙，以托马斯·达马托克为首的西班牙最高宗教审判厅用高压手段来对待不肯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蛮横地驱除 20 万犹太居民出境，将另外的 10 万犹太人付诸审判，其中 9 000 多人被绑到火刑柱上活活烧死。1648 年，乌克兰人发动了反抗波兰人的民族大起义，打击的锋芒也同时指向作为波兰国王代理人的犹太移民。在不到两年时间内，300 多个犹太城镇遭到毁坏，10 万多名波兰犹太人被杀害。此乃纳粹德国产生之前犹太人遭受的一次惨烈的民族灾难。1881 年 3 月，沙皇暗探局借口一名犹太女青年参与了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策划和挑起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大肆屠杀犹太人的浪潮。1903—1908 年，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与东欧，再次掀起迫害和杀害犹太人的新浪潮。起因是一本名为《锡安贤达议事录》的小册子，其内容大意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济会员曾于 1897 年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秘密会议，图谋瓦解基督教的精神体系，在全世界建立犹太人主宰的统一国家，以实现非犹太人的奴役和统治。该书于 1903 年刊登于俄国的《旗帜》月刊上，1905 年发行单行本。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是如此荒诞不经，以致连暴君尼古拉二世都不以为然。其实，这正是沙皇暗探局某些阴谋集团的杰作，其目的就是要煽起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民族仇恨，以实现分而治之的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不幸的是，这些黑帮的阴谋居然得逞了：1903 年，在莫尔多瓦首都基希涅夫，一天内杀害犹太人 500 多人；在萨拉托夫，四天内屠杀犹太人 400 多人；1905 年奥德萨也发生了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苏联内战时期，还发生过彼得留拉白

## 第二章 大屠杀的酝酿、预演与逐步到位

卫军大批虐杀犹太居民的丑闻。即使在早已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欧，反犹太主义依然根深蒂固，对犹太人的种种偏见仍旧存在于各个阶层居民的头脑之中。在许多地区，只要当地犹太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稍有增长，反犹太主义情绪就要滋长，反犹浪潮就要抬头。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发生在20世纪之初，被许多法国人引为国耻的对于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的非法审判案。但是，同纳粹的大屠杀相比，古代的暴君、酷吏乃至现代的无耻政客无疑还算是善人，因为他们既没有从肉体上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计划，也不曾操纵现代化的生产线似的杀人设施。只有在万字旗下，犹太人才痛切地感受到了身陷灭顶之灾的民族危机。绝大多数欧洲的犹太人家庭，均有一个或更多的成员惨遭杀害或被关进集中营。《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一家4口人全部被关入集中营，其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她和姐姐病死在贝尔森集中营，仅其父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死里逃生。前南斯拉夫共青团第一书记伊沃·罗拉·里巴尔的女友、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校花斯洛波达，仅仅因为是犹太人，全家8口人都被特别行动队装进了毒气车。

到战争停止时，全欧洲900万犹太人中有595万人不复存在，其中100万人是儿童。在死难的犹太人中，1/3死于疾病或饥寒交迫，2/3死于纳粹分子有组织的大屠杀。1985年，美国“二战”史专家劳尔·希尔伯特的专著《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出版，该书认为：“二战”期间犹太人的死亡人数为510万人。1991年年中，欧洲18位著名历史学家宣布，他们经过10年研究后确认：仅据他们掌握的资料，纳粹德国屠杀的各国犹太居民达到529万人；加上未曾掌握的材料，这一数字可能突破600万人。

然而，犹太人问题最后解决是逐步出台、层层加码，而不是一蹴而就式地完成的。

自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即存在歧视和迫害犹太人的历史传统。但只有在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纳粹德国大肆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始作俑者是该帝国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他看来，犹太人身上体现了他所痛恨的一切。他自担任纳粹党魁

以后，就在其大作《我的奋斗》一书中系统地阐发了仇视犹太人、消灭犹太人的极端主义思潮。纳粹政权为什么疯狂排犹？这曾是历史学家探讨了几十年的难题。其答案当然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而是具有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首先是欧洲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使然。如前所述，自古以来，欧洲的基督教徒就有强烈的排犹传统，世世代代将犹太人视为异己和敌对势力。封建等级观念极其严重的德国，自然难以置身局外。正如国际著名的历史学家乔治·莫塞所言：“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是德国思想史的一部分，而并不在其范围之外。”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由于德意志迅速跨入世界强国之林，德国民众的民族优越感明显增强，反对犹太人的思潮也随之迅猛抬头。法国前驻德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在其回忆录中深刻指出：“反犹太主义在德国一直广为传播。它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这是一种为广大公众所能够接受的激情和偏见。这种反犹太主义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很猖獗。犹太人在魏玛共和国和左翼政党中所起的作用，又使反犹太主义有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希特勒并没有与国民背道而驰，他把他们更紧地拉拢到自己一旁。他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愿望。他所推行的激烈的反犹太主义并没有损害他的威望，反而是他享有威望的基本因素之一。”远在1879年，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海因利希·冯·特来切尔就曾指责犹太人是德国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犹太人就是我们的不幸。”他的著作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都足以产生出一种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的运动。因此，在几个政党的政纲中都单独列有反犹太主义的专门条款。19世纪末出现的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泛德意志同盟的主席艾·哈塞，就明确宣称，欧洲各地的日耳曼人应当统一在一个大德意志帝国之内，并向四周扩张，成为整个欧洲的主人。他提出的“人种优劣论”、“生存空间论”和“武力决定论”后来成为希特勒之流的纳粹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

纳粹上台执政后，反犹思想就逐步转化为行动。然而，羽翼未丰的纳粹政权，不能不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应，因而，对犹太人的迫害是逐步升级的，甚至是有张有弛的。直至入侵苏联的战役初战告捷，纳粹分子

认为他们将无敌于天下，才完全暴露出其全部灭绝犹太人的狰狞嘴脸。早在1920年2月24日，希特勒主持制定了纳粹党党纲25条，其中就有5条属于或包含反犹太内容。早在1925年，希特勒就曾极其恶毒地污蔑犹太人，称他们是“腐烂尸体上的蛆虫，是比黑死病更加可恶的瘟疫……是人类的寄生虫，是人类的吸血鬼”。希特勒担任总理不久，就一次又一次地接连策划并导演了一幕幕反犹活动。他的代表作《我的奋斗》，日后成为指导第三帝国各个领域一切行动的总纲，人称“纳粹主义的圣经”。这本书自始至终贯穿着的主线就是反犹太主义。

第一阶段：从舆论导向和法律上搞垮犹太人（1933年1月—1938年10月）

这一阶段主要是纳粹发起反犹的宣传鼓动和从政治、法律方面实施排犹，尚不涉及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

希特勒上台刚刚一个多月的3月9日，柏林就出现了全市性的反犹骚乱。3月30日，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德国政府决定对犹太商人进行抵制”，并宣布4月1日为全国“抵制犹太人活动日”，对犹太商人、医生和律师的经营进行抵制，从而掀起了第一次排犹运动。随后，第三帝国颁布法令，规定从国家机关中清除犹太公务员，从文化领域清除犹太艺术家，从教育部门清除犹太教师，从公共卫生部门清除犹太人医务人员。此举使数以千计的犹太人排挤出国家机关、文化、教育、卫生领域。

4月1日，柏林又发生了全市性的抵制犹太人所经营的商店的活动。1933年4月7日出台了《重建公务员制度法》，明文规定，非雅利安人和非纳粹党员，不得担任各级政府的公务员。同年10月，柏林市宣布，该市的所有医院已经将犹太医生清除出去。当年年底图林根省宣布，该省已将所有的犹太人从一切公务员岗位上驱除。1935年，对犹太人的迫害升级为新阶段。这一年，根据希特勒9月15日在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反犹法令，德国政府颁布了《纽伦堡种族法》，掀起了第二轮更为激烈的反犹太人高潮：根据该法令，宣布剥夺所有犹太人的公民权，禁止犹太人出任一切公职，禁止犹太人同雅利安人通婚

及进行其他各种形式的性行为，禁止犹太人行医和任教。从此，德国各地的商店、旅馆、啤酒酒店和公共娱乐场所，均挂出“犹太人恕不招待”的招牌，犹太人已沦为社会的最底层。不过，在如何处置被剥夺生活条件的德国犹太人问题上，纳粹党上层还存在较大的分歧。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和盖世太保首脑海德里希主张应将犹太人悉数驱除出德国，而主持四年计划的戈林则担心全部驱除犹太人出境会导致德国外汇随之流失。这样，对犹太人的迫害暂时未能继续加深。即使是这样，到1935年底，已有7.5万名德国的犹太居民被迫出走，8000多人不堪迫害而自杀。1936年，国际奥运会在柏林举行。为了粉饰太平、欺骗国际社会，掩饰纳粹排犹真相，希特勒下令暂时取消大部分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致使当年有18000多已离开德国的犹太人重返祖国。然而他们很快又陷入绝望的境地，目睹了对犹太人大打出手和横加杀害的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

第二阶段：从经济上彻底剥夺犹太人（1938年11月—1941年5月）

1938年11月初，17岁的德国犹太青年赫舍尔，因全家均被纳粹当局无端驱赶出境，生死未卜，在巴黎奋而将纳粹德国驻法国大使馆三等秘书击毙。纳粹党上层抓住这个事件掀起了规模更大、程度更高的反犹活动。在戈贝尔的公然教唆下，纳粹暴徒于11月9—10日两天内，制造了全国性的反犹事件。（因被暴徒们砸毁的犹太人商店的玻璃碎片遍布各地，人们又称此事件为“水晶之夜”。）

从此，犹太人开始被大批关进集中营，几天内即有2.5万—3万人被送入集中营，仅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犹太人即达10911人，其余的被送往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同时，全德国有7500家犹太人经营的商店被捣毁（其中柏林814家）、被洗劫，171家犹太人私宅被捣毁，191家犹太教堂被焚烧（其中柏林28座），200多座犹太人的其他设施被毁坏。纳粹当局还强令犹太人社团赔偿10亿马克。11月12日纳粹当局颁布法令，宣布将犹太人赶出全国一切经济部门，关闭犹太人经营的所有商店，强行对犹太人经营的一切企业实施“雅利安化”。经此运作，德国犹太人被剥夺的财产高达10亿马克以上。同时，纳粹当局还禁止

## 第二章 大屠杀的酝酿、预演与逐步到位

犹太人进入公共浴池、旅馆，禁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取消犹太儿童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强令每个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幼，必须佩戴一枚黄色六角星标记。

从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起，纳粹当局开始强迫大批居住在奥地利的犹太人（约有18.5万人）出境，而且必须支付大量手续费方可离境。为此，由阿道夫·艾希曼主持的犹太人出境办事处在维也纳成立。1939年2月，柏林也成立了犹太人出境中央办事处，隶属于中央保安总局领导。1939年9月初战争爆发时，第三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只剩下27.5万人。同年底，由戈林挂帅的帝国中央移民总局，已从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将50多万名犹太居民驱逐出境。1939年10月，未来的大刽子手艾希曼接任犹太人出境中央办事处主任，为他今后大展屠刀提供了机会。由于战争爆发，犹太人迁往国外的难度明显加大。而留在德国的犹太人，不是被投入集中营，就是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

1940年，柏林市两万名犹太人被关押进强制劳动营。1940年底，德国已有27万名犹太人被迫逃离德国。甚至以后各级纳粹官员又绞尽脑汁地试图把犹太人赶到巴勒斯坦和马达加斯加。1940年7月，纳粹当局根据阿道夫·艾希曼之流的提议，把他们驱逐到波兰东部卢布林地区一块面积大致为100平方公里的荒凉沼泽地带——尼斯科建立“民族家园”，让严酷的环境把犹太人自然淘汰。1939—1940年冬天，纳粹当局从奥地利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向尼斯科遣送去第一批犹太人，从1940年2月开始，又从德国向尼斯科遣送犹太人，同年秋天，法国败亡后，纳粹又从阿尔萨斯—洛林、萨尔和巴登地区向法国南部集中犹太人，再把他们遣送尼斯科。

第三阶段：特别行动队——犹太人被大批押送刑场（1938年11月—1942年）

“二战”初期，纳粹领导集团对如何处置犹太人，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杀害犹太人还不是普遍政府行为。从1939年9月1日到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之前，在纳粹统治地区被杀害的犹太人

只有 30 万多人。

入侵苏联是纳粹分子开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起点，苏联、东欧各国的犹太人，从此面临灭顶之灾。而作为种族灭绝犯罪组织的特别行动队，也开始登台亮相。1941 年 5 月，中央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召集保安警察、秘密警察、刑事警察首领开会，决定成立 A、B、C、D 四支特别行动队，跟在入侵苏联的陆军部队之后，专事杀害当地的犹太人以及共产党骨干分子。A 支队：先由党卫军少将施塔勒克指挥，他被抵抗运动处决后，归党卫军少将海因茨指挥，其任务是穿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向列宁格勒方向行动。其总部设在加特斯奇纳，在卢萨和雷瓦各设一个特遣队，在里加和考纳斯各设一支突击队。B 支队：首任队长是党卫军少将阿图尔·奈比，继任是党卫军少将艾利希·璠曼。其任务是向莫斯科方向行动。其总部设在斯莫棱斯克，在维亚兹马和莫吉廖夫各有一个突击队驻防，在图拉和里埃沃各有一个特遣队驻防。C 支队：先由党卫军少将奥托·拉施指挥，继而由党卫军少将托马斯指挥。其活动范围是除去南部之外的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其总部设在基辅，在基辅、哈尔科夫、波尔塔瓦、斯大林诺各设一个突击队。其中，党卫军少将波罗尔率领 7 个特别行动分队，驻扎在基辅四周，每个分队有千人左右，还吸收了一批当地的乌克兰惯犯和流氓。1941 年 9 月底巴比雅尔大屠杀，就是波罗尔及其下属犯下的滔天罪行。D 支队：首任指挥是党卫军上校奥托·奥伦道夫，继任是党卫军准将布莱察普。其任务是在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半岛和高加索一带行动。其总部设在辛菲罗波尔，在塔甘罗格—罗斯托夫、雅尔塔、斯卡多沃斯克、敖德萨、斯大林诺各设一个突击队。这四个支队全部建于 1940 年冬末，直属海德里希领导，队部分别设在易北河畔的普雷奇边防警察学校、穆尔德河畔的小城迪本和巴德施密德贝格的边防警官学校。各个特别行动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营。以 A 支队为例，其组成人员为：秘密警察占 9%，保安警察占 3.5%，刑事警察占 4.1%，治安警察占 13.4%，外国辅助警察占 8.8%，武装党卫军占 34%，其余为技术和文职人员。一个特别行动队的总人数，多则 990 人（如 A 支队），少则 500 人（如 D 支队）。各个

## 第二章 大屠杀的酝酿、预演与逐步到位

特别行动队均为摩托化装备。每个队一般分为两三个分遣队或者规模更小的特遣队，各为70—120人，分别配合指定的军团作战。基层单位是小队，每个小队约20—30人。

1941年5月，中央保安总局的头子海德里希和他的人事处长布鲁诺·斯特雷肯巴赫先后在普雷奇和迪本召开多次极端秘密的会议，向特别行动队的队长、分队长和特遣队长传达了著名的“元首命令”：为保证被征服国家的政治安全，在德军占领地区及其后方作战的各特种部队要无情地镇压针对民族社会主义的一切反抗，不管这种反抗是以前、现在，还是将来发生的。于是，在苏联欧洲部分的每一个地区，犹太人、共产党员以及游击队员，都成了纳粹的首要消灭目标。稍后需要消灭的目标是吉卜赛人和居住在克里米亚、讲土耳其语的克兰特查泰斯人（纳粹的种族专家也没有证实他们具有犹太血统，仅仅是个别党卫军将领如此认为）。同苏联开战不过一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犹太居民就成为苏联境内第一批牺牲者。仅仅20多天，足有上万名犹太人被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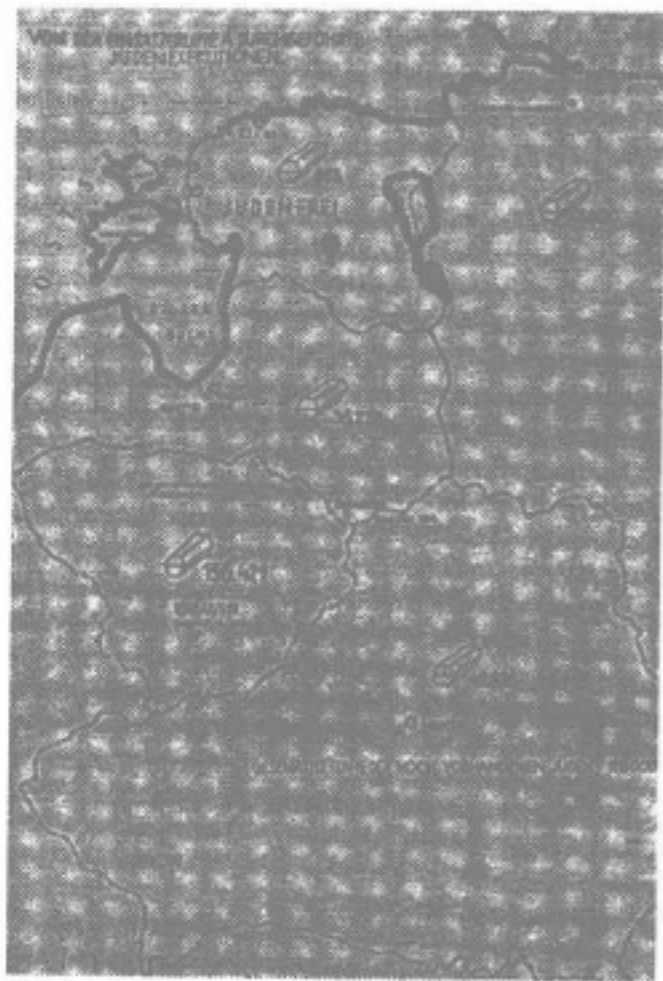


一群即将惨遭特别行动队杀害的苏联犹太妇女



粹指使的当地歹徒打得脑浆迸裂，横尸街头。1941年7月1日，纳粹德国军队占领了苏联拉托维亚首都里加。8月1日，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的第一个特遣支队进入里加，随后便开始清除计划，力求使奥斯特兰（对被占领的波罗的海三国的重新命名）的犹太人绝迹。纳粹当局决定把里加作为将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和灭绝营的中转站。1941年8月1日至1944年10月14日之间，近20万纯粹的德国犹太人和奥地利犹太人被运到里加，其中8万人留在当地，全部被杀害。余下的12万人继续运往波兰南部的6个灭绝营（包括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奈克）；只有400多人活着出来，其中的一半又死于施图特霍夫集中营或死在去马格德堡的“死亡行军”途中。

紧接着，苏联其他被占领地区的犹太人接到通知，务必于指定日期到指定地点集合，迁移到其他地方。行进到旷野荒郊后，又被强制挖大坑或战壕，随后是密集的机枪扫射，葬身坑内。特别行动队最为得意之笔是1941年9月底发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远郊巴比雅尔（乌克兰语的含义为“老太婆峡谷”）的大屠杀。两天之内，33 771名和平居民（绝



纳粹的秘密档案揭示了特别行动部队在苏联各地杀害犹太人的数量

大部分是犹太人，包括数千名幼儿）被射杀，事后只有1名从基辅前来探亲的女演员死里逃生。在纳粹占领基辅的两年多时间，共计20多万犹太人在此峡谷化为冤魂。在立陶宛、里加、明斯克、乌克兰的基辅和罗夫诺，被特别行动队杀害的犹太人均达1万—15万；1941年8月27—28日，特别行动队在卡门涅茨—波多尔斯基杀害犹太人23 000多人；同年11月7—8日，在罗夫诺杀害犹太人21 000多人。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德国一家建筑公司驻乌克兰分公司经理兼工程师赫尔曼·格雷贝作证说，他亲眼目击特别行动队在杜布诺一日内屠杀5 000名犹太人的暴行，

受害者当中有不少是老人和幼儿。总共有近百万苏联犹太人被无端杀害。

从1942年初开始，特别行动队对苏联、波兰犹太人的大屠杀，披上了同游击队员作战的幌子，以减轻刽子手们极其沉重的心理负担。希姆莱是编造谎言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曾对意大利法西斯魁首墨索里尼说：“在俄罗斯，我们不得不枪毙了一批为数不能说不多的犹太人，而且男女都有，因为那个地方连妇女和半大的孩子都给游击队送情报。”犹太人“到处都是怠工者、间谍、抵抗运动和匪帮团伙的基础”。纳粹刽子手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寻找借口：一方面称犹太人传染疾病，另一方面则称犹太人普遍是抵抗运动的天然同盟军。在不同的地区，刽子手们使用不同的借口。在波罗的海地区，纳粹称犹太人是由于袭击德国军队而被消灭的，在乌克兰，他们称犹太人被消灭是因为纵火和进行骚扰，在其他地区，他们说犹太人传播敌对思想而受到应有的惩罚。

纳粹分子还阴险地策划通过东欧各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杀害当地犹太人居民。例如，驻扎在波兰东北部的切哈努夫的党卫军司令部就曾于1941年7月初，策划过利用波兰居民来杀害波德拉斯地区所有的犹太居民的险恶计划。在纳粹分子的唆使和纵容下，1941年7月10日，位于波兰东北部靠近立陶宛的小镇耶德瓦内，一大批波兰歹徒手持棍棒、钉子鞭、砍刀、石头对本镇的犹太人大开杀戒，甚至将大批犹太人关进木板房内点火烧死。一时间，1600名犹太人全部魂归西天，幸存者不到10人。

类似的集体屠杀，也同样发生在波兰和南斯拉夫。纳粹对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希腊的犹太居民动手较晚，这里的犹太人大部分躲过了特别行动，但以后又被保安警察大批驱赶到集中营，仍未能最终逃脱“最后解决”。

根据希姆莱本人的命令，1941年秋天以后，纳粹杀害犹太妇女和儿童不再采用枪毙的方法，而使用适当的、更加有效的办法。他的部下瓦尔特·劳夫等人人为此制造出同样恐怖的毒气卡车。从此，毒气车队在苏联和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的城镇中肆虐横行。这种专用车一般

由载重汽车改装而成，车身涂上草绿色的油漆，车厢两侧写着“犹太区公共汽车”的字样，全部密封，没有窗户。每辆小车可装15人，每辆大车可装30人，10分钟即可致人死命。深谙毒气车杀人技术的中央保安总局三局局长奥托·奥伦道夫——他于1941年7月至1942年7月，担任负责在乌克兰南部地区灭绝犹太人的特别行动队D支队队长，一年中杀害了9万多犹太人。他战后在纽伦堡法庭的特别行动队案件审判中供认：“这是一种封闭式载重汽车，从外表上，看不出这种汽车的独特用途。马达启动后，毒气就被排入车内，10分钟到15分钟就会导致车内的人们死亡……在该汽车驶往埋尸坑的途中，受害者已经死于车中。毒死犹太人和运送尸体的工作可以一次完成。车厢内一般可容纳20—25人。行动队员对犹太妇女儿童谎称把她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或是强行把她们赶上车。只要车门一关闭，完全封闭的车厢就变成了行驶中的毒气室。绍雷尔载重汽车厂接受了制造这种车辆的任务。1942年春天，我们用这种特别载重汽车装备了特别行动队。”一个特别行动队的司机战后作证说：“我们从车的后门拉出裸体死尸时，粪便和血腥味叫人受不了。尸体奇形怪状，眼睛暴出，身上红一片青一片，嘴巴歪斜着，个个像是在极度痛苦中死去的。”特别行动队使用这种汽车杀人的行为尽管严格保密，日子一长，还是被许多居民摸清了底细。他们称之为杀人汽车。于是，杀人汽车的发明者贝克尔博士，不得不再费一番苦心。不久他就向顶头上司、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瓦尔特·劳夫呈上报告：“我在汽车两旁安装了两扇百叶窗，看上去像乡下农民的住房，这样的汽车可以伪装成居住用的大篷车了……我认为汽车可以伪装，但不能长期隐瞒……用毒气杀人并不十分顺利：为了加快完成杀人任务，所有的司机都开足马力。这样一来，那些被处死者不是按照规定那样死于睡眠，而是死于窒息。我的指导如果奏效，一旦正确地校准操纵杆之后，死亡很快就来临了。这时，犹太女人安详地睡着了，以前所看到的那种因中毒而走了样的脸和大小便乱泻的现象，此时再也看不到了。”尽管毒气车的寿命只有一年多，以后即被灭绝营中的固定毒气室所取代，但特别行动队成员靠这种方法，足足使得10万名左右的犹太

妇女儿童在车中毙命。南斯拉夫的犹太妇女、儿童大部分死于毒气车。1942年春，党卫军支队长富克斯率领一个特别行动分队和几部毒气车抵达塞尔维亚，目的是杀害被关押在贝尔格莱德郊区泽蒙集中营中的犹太妇女和儿童（犹太男子已于半年前被基本杀害），经过一个多月，不太费力地便于5月底完全彻底地完成了任务。而据波兰罗兹地区的盖世太保头子布劳恩·菲舍尔供认，驻扎在波兰赫尔姆诺的库姆霍夫特别行动分队，在行驶着的毒气车中总共消灭了34 000名犹太人。曾参与制订特别行动计划的党卫军将领艾利希·冯·戴姆·巴赫-杰列夫斯基后来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认：“这场斗争大大超过了纯军事性质的需要。它常常只不过是掩盖有组织有计划的种族灭迹的借口。假如德国对东方地区的占领再持续几年，按照希特勒等领袖们的计划，这种灭绝行动将导致大约3 000万人死亡。”

各级纳粹头目，对于上述罪行负有直接的责任，他们是灭绝犹太人的鼓吹宣传者。对苏战争爆发以后，希姆莱在一次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会议上讲道：“清除犹太人，灭绝犹太民族……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你们中的绝大多数必须懂得，当100具尸体，或者500具、1 000具尸体横亘在原野上时，这意味着什么。要干到底……这是我们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光辉篇章。”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许多国防军的高级将领，也同希姆莱保持一致。1941年10月，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在训话中要求部下做到：“在东部地区，士兵们不仅要成为一个遵循战争艺术规则的战斗人员，而且也要成为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旗手，成为对强加于全体德国人民或与其血肉相连的民族的兽行的复仇者。这就是士兵们为什么要充分理解对于低人一等的犹太民族必须坚决、干脆地加以惩罚的原因所在。另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国防军背后的反抗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历次经验证明，这种反抗活动总是由犹太人一手策划的。”

保安警察，作为党卫军的辅助力量，也是完成大屠杀使命的组成部分。保安警察总部所属的各个刑警营，则是最直接参与大屠杀的骨干力量，成为特别行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前夕，保安警察只有131 000名官兵，到1943年初增至310 000名。它是维护纳粹德国到处

推行的“新秩序”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安全组织。随着德国占领的“劣等种族”居住的地区不断扩大，他们的任务大量增加。例如，对游击队进行讨伐，转移民众，屠杀和平居民，特别是屠杀犹太人。

特别行动一直延续到1943年春，即大型集中营普遍建立之时。在此期间，大约有150万—200多万名苏联东欧的犹太居民惨死在特别行动之中。特别行动队是纳粹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初始阶段。因其具有效率低、易遭反抗、不易保密等缺陷，以后便为杀人效率更高、保密效果更强的灭绝营所取代。参与特别行动的纳粹分子建队时有四五百人，但因他们与中央保安总局和地方保安警察经常轮换，故实际上大约有4000多名（其中有1600多名武装党卫军官兵）参加了对和平居民的大屠杀，包括一些女性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均已堕落为战犯。美国驻德军事占领当局曾于1947年在纽伦堡专门进行了特别行动队案件审判。

#### 第四阶段：全欧洲犹太人的墓场——集中营与灭绝营

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希特勒1939年1月在德国国会的讲话，其中提道：“如果欧洲和欧洲以外的金融界国际犹太主义者要把各国人民推进一场世界大战的企图能够得逞，那么，战争的后果将不是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从而使犹太主义取得胜利，而是欧洲犹太民族的毁灭。”战争爆发后，纳粹政府便借口英国政府不肯合作，无法将犹太人再驱赶到马达加斯加，于是开始对犹太人实行肉体上的最后解决。最早提出“最后解决”的是纳粹党和国家的第二把手赫尔曼·戈林。还在1938年，希特勒已经任命他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高协调人。1941年7月31日，他致信中央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委托他尽快制订出对犹太人“最后解决”的计划：“为扩大我1939年1月24日委派给你的关于尽快在最方便的时候通过移民或转移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任务，兹指示你在组织后勤和物资方面做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彻底解决德国在欧洲势力范围内的犹太人问题。有些涉及其他政府部门权限的地方，要与之协商。我还指示你迅即交给我一份说明为实现设想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所必须的组织措施和行动措施的全面计划。”在信中，戈林并指派海德里希去执行“全部和最后解决犹太人

问题”的重大任务。不久，外交部的阿尔布莱西特博士、鲁特尔、魏兹泽克，内政部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和总顾问格罗布克，司法部博士弗莱斯勒，根据海德里希的要求，均提交了关于犹太人问题最后解决的详尽方案。当年年底，海德里希向希特勒和戈林呈交了对犹太人进行最后解决的详尽方案。同年11月29日，海德里希向相关部门国务秘书及以上级别的官员发出宴会请柬，试图举行一次专题会议，以便就如何执行犹太人最后解决问题达成共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次会议直到1942年1月20日才得以召开——这就是给欧洲犹太人带来悲剧性后果的万湖会议。

1942年1月20日，海德里希受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委托，召集党和国家各有关部门、党卫军各大员在柏林西南郊的万湖别墅区国际警察总部大楼，召开了在纳粹迫害犹太人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万湖会议。与会者包括内政部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博士、司法部国务秘书弗莱斯勒、东方领土部部长代表梅耶尔博士和莱勃兰特博士、四年计划国务秘书诺伊曼，外交部副国务秘书鲁特尔，波兰总督区代表比勒博士，纳粹党中央办公厅官员、党卫军少将克罗普费尔，帝国内阁代表、部长级主管科里钦格尔，中央保安总局代表、秘密警察总监海因里希·缪勒，中央种族与移民局代表、党卫军少将霍夫曼，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代表、党卫军中将舒恩加特等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保安警察和保安勤务处驻拉托维亚和奥斯特兰地区总负责人、党卫军上校朗格博士总共16人。艾希曼则充当这次会议的秘书，为与会代表准备了有关统计数字和相关材料。海德里希主持会议，向与会者传达了戈林的指令，并向在座的各部门高官说明，元首和戈林特意遴选他负责执行“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当某位代表询问实施“最后解决”犹太人的区域范围时，海德里希解释说：“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涉及1100万犹太人。在德国旧有的版图上，还剩下13万余犹太人，在俄罗斯还有500万，乌克兰是300万，在波兰总督区还有225万，在法国还有75万，在英国还有30多万。”意即包括德国和整个欧洲被占领地区。海德里希接着阐明了“最后解决”的具体运作办法：“移居的办法已经失败了，谁也不想要

这些犹太人，美国不要，英国也不要，其他国家也不要。再说，要把他们，特别是东欧犹太人从瘟疫流行的村镇里赶出去，我们的后勤负担不了。所以必须加快步伐，把他们迁移到东方去——主要是波兰……这些被迁居的犹太人，可以作为劳动力使用。把有劳动力的犹太人按性别分开，编队送到波兰等地去筑路。许多人在这样的劳动中肯定会受到自然淘汰。剩下来终于能活下来的人，可能是犹太人东山再起的祸根，必须受到相应的处理。”代表波兰总督区的国务秘书尤塞夫·比勒博士在会上提出，波兰犹太人将近250万，这些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不是送走的问题，“我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尽快解决总督区领土上的犹太人问题”。贝勒还认为，海德里希关于强令犹太人干活直到把他们拖垮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波兰的大多数犹太人贫病交加，根本不能从事劳动。艾希曼的答复是，要建立新的集中营。至于处理东欧原有的犹太人的途径，则是在入侵苏联时即已采用的特别行动队的办法。这次会议使纳粹党政军各部门统一了思想，决定尽快从肉体上灭绝全欧洲的犹太人，首先是灭绝犹太人当中不具备劳动能力的老少病弱。他们一致通过了海德里希提出的一个把全欧洲犹太人一律关押到波兰东部集中营加以灭绝的秘密计划。同时根据希特勒本人的要求，对于“全部具有劳动能力的犹太男子和妇女”暂时予以豁免。这一原则以后便成为纳粹集中营、灭绝营对犹太人进行“挑选”、分类管理的指导思想。

1942年3月6日，即万湖会议召开数周后，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线负责人艾希曼，再次召集有关部门代表开会，议题是如何解决混血犹太人问题。一份标有国家机密事务字样的该次会议文件被保留到战争结束，出现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席上。它指明会议的出席者包括：国民动员和宣传部总顾问卡尔斯滕与施密特-布尔格博士，内政部顾问费尔德舍尔博士，司法部全国顾问马斯费尔德，东方领土部法律顾问班茨尔博士，外交部公使衔参赞弗兰茨，拉德马歇，四年计划代表利格纳与司法学博士佩格勒，帝国内阁法律总顾问勃雷博士，党中央办公厅总顾问莱绍尔、安克尔，中央保安总局总顾问希尔芬拉尔，种族移民局代表、党卫军上校格罗茨博士与党卫军少校普鲁什，波兰总督区代

## 第二章 大屠杀的酝酿、预演与逐步到位

表哈迈尔博士。此次会议产生了如下结果：经内政部顾问费尔德舍尔宣读有关文件后，该部副国务秘书什图卡特明确宣布：只将第一类范畴的混血犹太人列入强制绝育计划。这业经全体会议通过。会议还决议对第一类混血犹太人的强制绝育将没有例外。会议虽然提出了一个对混血儿概念的完全是生物学方面的解释，但是混血儿的社会学定义只有留待混血犹太人完全的生物学解决，只有当其他混血犹太人均被强制绝育后才能实现。全体代表一致认为应实行行政性强制绝育措施，有必要出版一份快报登载绝育法规。建议设置一些机构，调查混血犹太人的生存环境以便颁布有法律效力的法令。无论如何，这是否适用于法律基础还存在疑问。根据内政部副国务秘书什图卡特博士的建议，第一类混血犹太人经过绝育手术后，将获准在帝国范围内生存，但必须限制他们的谋生途径。

万湖会议标志着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政策开始发生重大转折，进入了更为残忍、野蛮的集中营、灭绝营阶段；亦即开始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的高效率手段，来实施对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



## 第三章

### 吞噬千百万生命的魔窟——纳粹集中营

纳粹集中营可以说是纳粹暴政中最为黑暗、最为残酷的一章。它是纳粹分子杀害犹太人、吉卜赛人、苏军战俘、抵抗运动成员和反法西斯人士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和场所。1942年夏天以来，集中营及其变种灭绝营、劳动营成为纳粹当局实施“最后解决”的基本工具。在“二战”中欧洲死亡的4600万军民中，竟有1100万—1200万平民和战俘死于各种各样的纳粹集中营，其中包括450万犹太人和300多万苏军战俘。在集中营、灭绝营供职的司令官、政治部官员，党卫军官兵，男女医生、护士构成纳粹战犯中乙、丙级战犯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几乎百分之百地参与了虐待、折磨甚至杀害囚犯的罪行。在各类纳粹战犯审判案中，集中营罪犯被判处极刑的比率是最高的一类。集中营案件也是盟国司法人员审判最多的一类案件。奥斯维辛、布亨瓦尔特、达豪、拉芬斯布吕克、马伊达奈克、贝尔森、萨克森豪森、瑙因加默等集中营的罪犯均被各个盟国列为专案进行审判。

#### 第一节 集中营——灭绝营，大屠杀的主屠场

纳粹集中营始建于希特勒上台不久的1933年3月，截至1945年5月初。大型集中营总共只有26个：其中设在纳粹德国本土的主集中营10个，即达豪、布亨瓦尔特、萨克森豪森、拉芬斯布吕克、弗洛森堡、毛特豪森、贝尔森、瑙因加默、尼德哈根—威维尔堡和多拉—诺德豪森；设在波兰的主集中营7个，即奥斯维辛、马伊达奈克、施图特霍夫、格罗斯—罗森、华沙、雅诺夫和普瓦绍夫；设在爱沙尼亚的主集中

### 第三章 吞噬千百万生命的魔窟——纳粹集中营

营两个，即韦瓦拉和克卢加；设在拉托维亚的主集中营一个，即萨拉斯皮尔斯；设在立陶宛的主集中营两个，即考恩、考那斯；设在荷兰的主



仅次于奥斯维辛的纳粹第二大屠场——马伊达奈克集中营

集中营一个，即海尔佐根-布施；设在法国的主集中营一个，即纳茨维勒；设在捷克的主集中营一个，即特列森施塔特；及设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争议的德里雅斯特的圣萨巴。

“二战”前，各个集中营总共关押囚犯 8.5 万人，大多为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进步人士，范围限于德国本土和刚刚被兼并的奥地利。但 1939 年 9 月大战爆发，特别是 1941 年 6 月纳粹入侵苏联之后，纳粹集中营的数量和规模急剧扩展，仅德国境内 7 个最大的初期集中营所关押的囚犯，就从 1939 年的 2.1 万人剧增至 1940 年底的 80 万人。其主要职能也由对政治犯和反社会分子进行惩罚或“重新教育”，转变为对犹太居民进行惨无人道的集体屠杀。1939 年 9 月至 1942 年底，纳粹当局又建立了 8 个主集中营，其中 2 个在德国，5 个在波兰，1 个在法国的阿尔萨斯（纳茨维勒集中营）。1943 年，纳粹分子又建立了 7 个主集中营，其中 2 个在德国，在波兰、荷兰、立陶宛、拉托维亚、爱沙尼亚各 1 个。在纳粹集中营的鼎盛时期，党卫军在德国本土及各个占领区共设立了至少 10 005 个集中营、强制劳动营及其衍生物——灭绝营，其中主集中营 25 个，下属 1 300 多个分支集中营（其中仅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即下属 129 个分营）内主要关押女囚的分营 329 个，主要关押男囚的分营 843 个，囚犯性别不明的分营 60 个。在押的囚犯来自欧洲各国以及美国、土耳其、埃及等国，高达 1 100 万以上，以各个国籍的犹太人为主。其他主要群体还包括苏军战俘及其他盟国战俘、茨冈人、共产党员、抵抗运动战士、反法西斯进步人士，也有刑事犯罪分子、妓女甚至同性恋者。由于纳粹分子蓄意的折磨、虐待和屠杀，集中营囚犯的存活率很低，一般仅达 20% 左右，至于纳粹政权存心灭绝的犹太人，则更只有 5% 左右。初期的纳粹集中营，由国家政治警察管理，从 1936 年起，改由党卫军管理。只有党卫军官兵才有资格充当集中营守卫部队成员（看守），以后，根据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兼全国警察总监希姆莱的命令，组建了党卫军特别部队——“骷髅队”，专门负责看守集中营。在党卫军内部，总揽全国集中营事务的大权，首先落入中央保安总局手中；1942 年以来，又转入与之并列的经济管理总局手中。直接掌握数

### 第三章 吞噬千百万生命的魔窟——纳粹集中营

百万囚犯生死存亡命运的先是中央帝国保安总局局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及其继任者卡登勃伦纳，以后则是经济管理总局局长兼集中营事务总监泰奥多尔·艾克及其继任莱因哈特·格吕克斯，以及1943年底升任集中营事务副总监的原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霍斯。

到“二战”开始之时，包括奥地利在内的第三帝国境内，已有8个规模较大的集中营从上百个劳动营、改造营当中脱颖而出，它们是：达豪、萨克森豪森、布亨瓦尔特、毛特豪森、弗洛森堡、瑙因加默、多拉-诺德豪森集中营，以及专门关押女囚的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1941年6月进攻苏联以来，纳粹当局迅速改建了一大批以大规模杀害犹太人为职能的灭绝营，并且使原有的大型集中营兼而具有部分灭绝营的职能。

负责具体实施对犹太人“最后解决”的职能部门是中央保安总局，直接承办这项事物的单位则是该局下属的第三局——国内保安勤务局的第四处——犹太事务处。该处处长即是臭名昭著的阿道夫·艾希曼。他手下有3名得力的副处长——狄特尔·维斯里塞尼，负责搜捕希腊、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犹太人，并把他们押送到奥斯维辛、马伊达奈克、毛特豪森等集中营或特列勃林卡、贝乌泽茨、索比堡等灭绝营；阿洛伊斯·布鲁诺，弗兰茨·阿布洛麦特，分别负责匈牙利、南斯拉夫和法国、荷兰的“最后解决”任务。艾希曼的得意之笔是他几乎灭绝掉匈牙利的犹太人社会。到1944年初，欧洲的犹太居民已被纳粹杀害了一半以上。欧洲最大的犹太人群体——波兰犹太人，总数330万人中已有250万人魂归西天，苏联200多万犹太人中已有一多半不复存在，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也所剩无几了，只有匈牙利例外。匈牙利的犹太人共有81万人，但由于匈牙利执政霍尔蒂只同意歧视犹太人，而坚决不同意灭绝，所以几乎无一人被解决。1944年3月14日，希特勒鉴于霍尔蒂政权存在离心倾向，派大军强行开进匈牙利，从而为艾希曼灭绝匈牙利犹太人打开方便之门。在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卡登勃伦纳的全力支持下，尽管各条战线的运输形势万分吃紧，艾希曼仍得到大批列车，用于把匈牙利犹太人运往东方各集中营，最主要的是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1944

年5月14日至7月7日，在艾希曼和阿洛伊斯·布鲁诺的直接组织和监督下，45万犹太人被押上148节车厢，运往奥斯维辛，另外10万左右的犹太人被运送到其他集中营。这55万匈牙利犹太人当中，仅仅有不到10万人活到战后。然而，事情忽然出现转折：霍尔蒂在同盟国和国内进步势力的压力下，于7月8日下令停止将犹太人外运，不久，又将艾希曼驱逐出匈牙利。这样，匈牙利犹太人的命运才发生了转机。直至10月15日，匈牙利极端亲纳粹的箭十字党党魁萨拉希夺取政权，赶走了霍尔蒂，艾希曼才得以重返匈牙利继续作恶。但此时艾希曼面对的局势更加不利，纳粹德国已处于两面夹攻的颓势之中，无论谁也不可能再拨给艾希曼大量车皮。穷凶极恶的艾希曼仍不肯放过犹太人，同年11月，他又指挥党卫军开展押送6万犹太人去东北部边界的死亡行军，沿途中又有1万多犹太人饥寒劳累而死或遭到党卫军枪杀。此外，他还将能够控制的15万多犹太人集中关押在布达佩斯的大、小两个营地，准备伺机加以消灭。1944年12月下旬，艾希曼因苏军已开始围攻布达佩斯而被迫撤离，行前他还下令将已被集中关押的6万多犹太人尽数消灭。只是由于瑞典驻匈牙利公使瓦伦堡大智大勇，不顾个人安危，只身赴敌营，义正词严地震慑住负责指挥这项行动的党卫军将军施密特·胡贝尔，迫使他取消这一罪恶行动，匈牙利犹太人才得以避免被灭绝的厄运。不仅如此，艾希曼还抓住英美两国反应迟钝、意见不一的机会，下令驻意大利的党卫军和保安警察的首脑，将居住在罗马的8000多犹太人尽数解往纳粹集中营，乃至其中的大部分人遭到灭绝。令艾希曼深感遗憾的是芬兰和保加利亚两国，虽然充当了纳粹德国的附庸，却始终在“最后解决”问题方面拒绝与希特勒合作，而且一直坚持到盟国军队进入本国。从而使两国的犹太居民有惊无险，最后安然无恙。

从1942年春天开始，设在波兰西里西亚和总督区内的海乌姆诺、贝乌泽茨、索比堡、特列布林卡四个劳动营经装备了专门的杀人毒气室和焚尸场后，调来一大批曾专门从事T-4行动的医务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摇身一变成为第三帝国的四大灭绝营。其中的每一个，均具备每天“处理”8000—12000人的能力。到了这四个灭绝营随着苏军的挺

### 第三章 吞噬千百万生命的魔窟——纳粹集中营

进被迫关闭时，它们已分别杀死 35 万、50 万、60 万和 90 万犹太人。这类灭绝营的特点是，囚犯几乎是清一色的犹太人，将其运抵此地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将他们尽数杀光；即使暂时留下少数青壮年不杀（每次留下的不超过 1 000 人），也仅仅为了完成某些紧急任务。一旦完工，他们的死期就会来临。曾运来 90 万名犹太人的特列布林卡灭绝营，只有 9 人侥幸逃生。四个灭绝营的幸存者总共只有 82 人，其中没有一个是儿童。因此，运抵灭绝营的人数即等于该灭绝营杀害的人数。马利-特洛斯特尼茨灭绝营是纳粹建立的第五个灭绝营，也是唯一一个设在波兰以外的灭绝营。1942 年以来，使用毒气室杀害了来自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 30 多万犹太人。其中，为了报复海德里希遇刺，一次就将从维也纳运来的 1 000 名犹太人全部杀害。

此外，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纳粹在波兰建立的奥斯维辛、马伊达奈克、施图特霍夫、格罗斯-罗森等大型集中营，以及在德国本土的布亨瓦尔特、拉芬斯布吕克、达豪、毛特豪森、萨克森豪森等集中营，也均在营区内部辟出专地作为灭绝营。1941 年冬天，毛特豪森集中营开始使用现代化的大型毒气室杀害犹太人；1942 年 5 月奥斯维辛，1942 年 9 月马伊达奈克，1942 年秋瑙因加默，1943 年上半年纳茨维勒，1943 年秋萨克森豪森，1944 年 6 月 22 日施图特霍夫，1944 年 12 月拉芬斯布吕克先后使用上述毒气室，即使最小的一间，每次也可以毒杀 150 人。除在本土和奥地利、波兰外，纳粹分子及其外国帮凶，还在德军占领区和卫星国内建立了一系列集中营。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挪威的格里尼集中营，爱沙尼亚的韦瓦拉、克卢加集中营，拉托维亚的萨拉斯皮尔斯集中营，立陶宛的考恩、考那斯集中营，捷克的特列森施塔特集中营，南斯拉夫的雅塞诺瓦茨、塞姆林、普里什蒂纳集中营，的里雅斯特的圣萨巴集中营，荷兰的海尔佐根-布施、威斯特勃克、古森集中营，法国的纳茨维勒、德朗希、康边集中营，等等。其中，萨拉斯皮尔斯、雅塞诺瓦茨、普里什蒂纳、纳茨维勒以及考那斯集中营均为杀人过万甚至十几万人的“名牌”魔窟。

还有一类规模较小因而知名度也不高的灭绝营，即 1941 年 7 月秘

密延续下来的几个处决中心，主要分布在德国本土及奥地利境内（纳粹当局在内部文件中称之为处决中心），杀人数量多为数千人至数万人，即所谓处决中心。包括勃兰登堡、贝恩堡、格拉芬奈克、艾希堡、哈达马尔、佐恩施泰因、哈尔特海姆等，其中贝恩堡一家就处死了5万多名犹太囚犯。

至于劳动营，犹太人生活在这里也并不意味着生命有了保证。其实，纳粹分子只是出于劳动力紧缺，才暂时放过他们，对其执行慢性的处决——让超负荷的苦役、营养不良、寒冷与瘟疫在无形中夺取他们的性命。一旦他们的使命告终，他们随时会被党卫军拉去枪毙或驱赶进毒气室。《辛德勒的名单》中的主人公奥斯卡·辛德勒所拯救的1200多名犹太人，就是波兰普瓦绍夫集中营中的犹太劳工。1943年秋冬，该劳动营被纳粹当局解散，并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绝大部分犹太囚犯面临被送进毒气室的危险。

在上述各个集中营、劳动营和灭绝营当中，对于揭示纳粹分子丧尽天良和人性泯灭的众多罪恶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在上万个各类集中营中，奥营囚禁犯人的规模是最大的，每天有18万—25万名囚犯在这里生活（其实是在受罪），到1944年夏最盛时，高达43万人以上；它杀害囚犯的数量是最大的，是唯一一个杀人逾百万的灭绝营。（“二战”后，波兰和苏联的官方报告曾认定，马伊达奈克集中营一灭绝营杀害了150万名囚犯；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波兰在内的欧洲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数字明显偏高；该营遇难人数估计只有50万上下。）它处死犹太人的方式是最为骇人听闻的，它折磨囚犯的手段是最惨无人道的，它给予囚犯的生活待遇是最为恶劣的，因此奥营中囚犯的残存率也是最低的，大概只有3%—5%。这不仅低于设在德国的各个集中营，也低于设在波兰和其他占领国的集中营。相比之下，马伊达奈克、格罗斯-罗森、施图特霍夫等设在波兰的纳粹集中营，杀人规模均未突破60万。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希姆莱根据党卫军驻波兰弗劳茨瓦夫地区最高司令官兼保安警察管理局局长艾利希·冯·戴姆·巴赫-杰列夫斯基于1940年2月的建议而批准兴建的。

### 第三章 吞噬千百万生命的魔窟——纳粹集中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位于波兰的上西里西亚地区小镇奥斯维辛附近，总面积15平方公里，东北距华沙200多公里，距古都、第二大城克拉科夫只有30多公里。它地处维斯瓦河上游，一面靠山地，三面都是开阔的平原。这里交通便捷，是西欧通往东欧的道路交会处，有铁路通往欧洲各主要国家，便于纳粹实施放逐各国犹太人到集中营的罪恶计划。然而，这里的自然环境又恶劣到极点：春秋两季连日里刮着大风；夏天浓雾弥漫，酷暑难当；冬天严寒刺骨，滴水成冰，气温低到零下20多摄氏度。流经奥斯维辛的维斯瓦河区段的河水已被严重污染，河中密布有毒的化学物质，使得河水与附近的空气均被毒化。前集中营囚犯奥托·克劳乌斯战后回忆当时的生活环境时，如此这般地描写道：“比克瑙（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二分营）位于沼泽地带中，气候恶劣，死神在那里到处向人们招手，疟疾、伤寒、痢疾及其他疾病无情地折磨着骨瘦如柴的囚犯们。重病人遭受着高烧的折磨，却哪儿也找不到可以饮用的水。酷暑季节，蚊虫云集，包围着奥斯维辛沼泽群。从早到晚，整个地区都被沼泽中升腾起的蒸汽笼罩着，蒸汽中还包含着焚尸的恶臭气息和焚尸场烟囱冒出的浓烟。囚犯们穿着木鞋，不时陷入泥泞的淤泥中，耗尽他们最后的一点体力。”1941年2月，比克瑙分营动工前夕，希姆莱派遣德国大学教授、工程博士岑卡尔前来奥斯维辛化验水质。岑卡尔于同年3月26日写的书面报告提出，奥斯维辛集中营所使用的水水质极差，不但不适于饮用，就是连洗漱也不宜。党卫军驻奥斯维辛守备部队长官处为此下发命令：奥斯维辛的水质和空气都有害于健康，因此禁止党卫军官兵饮用未经煮沸的水，也不得用此水洗涤，以免引起严重疾病。尽管如此，纳粹当局仍然坚持在这里建立集中营，其险恶用心不外乎就是尽快加速囚犯们的死亡。

1940年4月，正在达豪集中营任职的党卫军上尉鲁道夫·霍斯，因工作成绩显著，被希姆莱提升为即将成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他的班底包括：从克拉科夫党卫军骑兵队中调来的一批官兵，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要来的几十个德国刑事犯，当地的纳粹占领当局拨给他的200名犹太劳工。不久，以当年奥匈帝国时期的一座火药库的20间平



房和前波兰烟草公司下属的一家分公司的建筑为依托，霍斯及其下属开始在奥斯维辛镇外围的扎索拉区兴建这座后来闻名全球的杀人魔窟。两个月后的6月14日，第一列载着728名波兰政治犯的列车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为最初的囚犯。一批党卫军中下级军官也到此担任各级管理人员，守备部队也扩充到上百人。同时，纳粹地方当局开始迁移当地居民，1940年11月，扎索拉区的居民全被迁出，巴比迪、布达、雷斯科等远近村庄的居民也被陆续迁出。

根据中央保安总局的规划，维斯瓦河与索瓦河河汊地带大约40平方公里的大片空间，都属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范围之内。继1940年夏天接见霍斯后，希姆莱又于1941年3月第一次视察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全面巡视了集中营与邻近地区后，他指示霍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面积应扩大，以便能够关押3万人；还要在通往比克瑙的铁路两侧建造一座能够关押10万名苏军战俘的新集中营，这个新营要远离奥斯维辛镇。1941年10月，工程博士汉斯·卡姆勒率领的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三处的一批官员来到奥斯维辛。汉斯提出，要在比克瑙建造一座足以容纳20万战俘的大型集中营。计划中的大集中营立即动工，比克瑙铁路两侧的庄园全被拆毁。这个新营包括三个营区，整个可以容纳14万人；第四个营区未及建成，计划容纳6万人。奥斯维辛地区的集中营经过不断扩建，到1943年已经容纳了3万人；而比克瑙分营已经关押了15万人。杀人规模的不断扩大，要求集中营当局继续扩建。到战争结束，奥斯维辛已经包括主营（又称1号营）、比克瑙分营（又称2号营）、布纳分营（又称3号营）。此外，主营还管辖着另外39个卫星营，遍及上下西里西亚的广大地区。

奥斯维辛主营里驻有集中营长官处、管理处，党卫军司令部、政治部，医学试验中心以及为德军服务的军工企业。2号营的主要职能就是杀人，其主体部分是使用现代化技术杀人和焚尸的焚尸场。它下设几个支营——雷斯科蔬菜营、哈尔麦策养禽营、布达农业营和化学试验室，还有主要供对囚犯进行绝育手术和其他人体试验的医院。3号营主要由一系列化工企业及相关化学、药品试验室组成；它也设立了一些小型集

中营，囚犯们在此进行合成汽油、人造橡胶、水泥的生产，并从事建筑和采煤等劳动。

### 一、毒气室——吞噬犹太人生命的基本手段

奥斯维辛集中营最令囚犯和外界犹太人胆战心惊的是号称“死亡工厂”的毒气室和焚尸炉。使用毒气大规模地杀害重病人和犹太人，这并非奥斯维辛的专利，也不是其他集中营的发明。因为早在1939年底，T-4行动的医生护士们就已经在打着医院和疗养院招牌的“处决中心”，使用毒气杀害病人了。被结果的受害者人数以万计。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灭绝营不过是借鉴了“处决中心”的经验，并进一步扩大规模，改进技术而已。奥斯维辛的特色在于，它用来灭绝囚犯的毒气，不是“处决中心”使用过的造价比较昂贵的一氧化碳，也不是特列勃林卡等几家灭绝营使用的汽车废气——它杀死囚犯的速度太慢，而且性能不够稳定，它所使用的是一种名叫齐克隆-B的氢氰酸类杀虫剂，经反复试验证明，它兼具杀人快速和成本低廉的优点。

齐克隆-B是一种用剧毒剂氢氰酸加工成的化学制剂，主要用于杀虫，形状呈黄豆大小的晶状体颗粒。在高温、潮湿的条件下，它能够将所含的高浓度的氢氰酸成分迅速分解释放；而氢氰酸是一种极为快速高效的毒剂，在1公升空气中只要含有0.12毫克，人体吸入即可致死。氢氰酸一经被人吸入，便能迅速破坏人体内的发酵作用，使红血球不能供氧，造成窒息而死；它同时还能导致并发头晕、呕吐、神经中枢损坏。如果空气中氢氰酸的含量较高，人体一经吸入就会立即死亡。大量向纳粹集中营供应齐克隆-B，可以给原本生意并不红火的杀虫剂生产厂家带来丰厚的利润。因此，他们积极参与了纳粹集中营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罪恶活动。向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奈克等集中营提供齐克隆-B的生产企业是总部设在德国拿骚的德国杀虫剂有限公司（简称为德格奇公司）。1942—1943年该公司向奥斯维辛集中营提供的齐克隆-B由7479公斤迅速增加到12174公斤，从中所获纯利也从45736马克增长到127986马克。

1941年夏，受艾希曼派遣去特列勃林卡灭绝营考察大规模毒气杀人的霍斯，总结了克里斯蒂安·维尔特、鲁道夫·朗格等毒气专家使用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毒气杀人的经验教训后，决定在第三帝国范围内率先使用齐克隆-B。他于同年9月3日，委派其副手党卫军上尉弗利奇，在主营11号囚室进行首次试验。试验受害者是从医院里挑出的250名波兰男性重病人，还有政治部送来的600名苏军战俘。当他们全部被押进11号囚室的地下室后，刽子手们密封上窗户，从门口直接往室内投入齐克隆-B晶体。24小时以后，一名党卫军士兵戴着面具走进室内观察，他发现仍有少数人还活着，便再次投入齐克隆-B晶体。又经过3个小时，所有的受害者才尽数死去。从此，11号囚室的地下室，也就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个死刑毒气室，大规模屠杀苏军战俘也从此开端。霍斯对试验结果并不满意，他要求部下继续提高杀人的效率。至于改进的情况，霍斯4年后在纽伦堡法庭受审时有所交代：“后来有一次对900名苏军战俘的毒杀……那是在第一次试验后不久，在原先的焚尸场陈尸棚内进行的。当运送苏军战俘的军列到站，战俘们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我们临时在陈尸棚的天花板上凿开几个小孔。战俘被分成几批，安静地走进去，他们以为要接受一次例行的消毒。最后一个战俘进去之后，沉重的门在他身后严严实实地关闭了。接着，一个党卫军士兵通过天花板上的小孔，把氢氰酸晶体投了进去。当我们往室内撒毒剂时，从陈尸棚里传出一阵阵喧哗声。几个战俘叫喊起来：“毒气，毒气”，接着听见恐怖的喊声，战俘们猛烈地撞门……几个小时以后，门才被打开。”此时，900名战俘全部变成了僵硬的尸体。霍斯承认，这是他头一次见到这么多人被毒剂毒死的场面，但他感到“工作上的满足和欣慰。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开始更大规模地灭绝犹太人，而当时不论是我还是艾希曼，都在为此事发愁；直到那时，我们都还没有找到能够大规模处决囚犯的好办法。我们曾设想，要大规模处决犹太人，最好使用某种毒气，而不采用枪毙的办法。但采用何种毒气，具体使用何种办法，我们还不清楚。这次试验使我们明确了应该使用的毒气与使用它的具体办法”……此次试验使用的陈尸棚随后变成主营的第二座

毒气室。1942年夏天比克瑙的现代化毒气室尚未运转之前，这两座由囚室或陈尸棚改建的毒气室，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以后，霍斯又下令在比克瑙分营建立了两个由木板房改建的毒气室。经过技术改进，到1942年春，这4个毒气室均已达到在15—30分钟内杀死所有人内的受害者的水平。由于杀人规模相对有限，无须大型焚尸设施，故此直到1941年底，奥斯维辛主营才建造成第一座焚烧毒气受害者尸体的焚尸炉。

1942年夏天，希姆莱亲抵奥斯维辛主营视察，杀人规模从此大上档次。希姆莱批评奥斯维辛主营的毒气室过于简陋，大坑焚尸实在原始；他严令霍斯尽快建立现代化的大规模杀人设施，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高潮。根据帝国司令官的指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行政、建筑两大办公室急忙投入力量，加班加点地进行部署。他们挑选了德国艾尔富特市的托普夫父子公司作为供应厂家，由它承担在比克瑙分营建造4个特大型毒气室和焚尸炉的项目。根据苏联方面缴获的党卫军总部建工局的档案材料（奥斯维辛集中营自身的档案材料在其撤退前，已全部被销毁），人们可以知晓这笔生意的订货情况：艾尔富特托普夫父子公司受托于1943年2月12日致电奥斯维辛集中营建筑管理处，事关第二集中营（比克瑙分营）安装焚尸炉。“贵方2月10日来电收悉……我们再次收到贵方要求提供5座三层焚尸炉的订货单，其中包括两座运送尸体的电动升降机和一座运送尸体的双层升降机。列入订单的还有一座以煤气为燃料的加热设备和一座清除骨灰的设备。贵方应交付3号焚尸炉的全套设备。我们期待贵方即着手建造上述机器和设备，设备务必于1943年4月10日投入使用。”然而，远水不解近渴。订货合同未及签字，从1942年3月起，运送犹太人的火车一列又一列地开到比克瑙。主营和分营的4间毒气室、一个焚尸场很快就显得不够使用，集中营当局于是采取应急措施，将分营内一座桦树林旁的两家已搬迁的农舍改造为毒气室，即后来的1号库和2号库。在这两座农舍之间修建了两间脱衣室。这两所农舍外面，则圈起高高的围墙。这样，又设置了4间毒气室，共可同时容纳2000人。为了遮人耳目，防止被处决的囚

犯看穿真相，奋起反抗，集中营当局千方百计巧加掩饰：毒气室的正面立着一块大招牌，上面写着醒目的大字：消毒站。毒气室的入口则挂着通往淋浴室的牌子。党卫军刽子手们还假惺惺地发给每个囚犯小块肥皂，嘱咐他们千万别弄丢存衣柜的钥匙。如此，杀人的秘密往往能保持到最后一刻，囚犯们100回会有99回顺顺当当地走进“淋浴室”。当时，比克瑙还不通火车，待处决的男女老少犹太人，要靠卡车运到比克瑙。卡车在更衣室前面一停稳，几十个党卫军士兵就把犹太人立即赶下车，并告诉他们必须进行例行的消毒。随后，男子、妇女、儿童被分别领进更衣室或桦树林去脱光衣服，最后是一丝不挂的人群无一例外地走进“淋浴室”。如果有些犹太人，特别是害羞的少女，拒绝脱衣服，就会遭到枪托驱赶或狂吠不止的大狼狗的威胁。为避免犹太人可能的反抗，党卫军命令男子先进毒气室，抵抗力较小的妇女最后进入。这样，刽子手们关闭毒气室的大门时，就不会有什么障碍。关门、封窗之后，一名专司此业的党卫军士兵，就熟练地遵照命令，把足够的氢氰酸颗粒从投毒孔扔进去。犹太人在室内一般会喊叫、哭号、呻吟10分钟，半小时以后打开大门时，无论如何也见不到活人了。门一打开，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就开始投入紧张的工作，把受害者的尸体全部拖出来，送往远处的焚尸坑内焚烧；用高压水龙冲掉地上和墙壁上的血污和粪便，再喷洒香水，把一切又恢复为“淋浴室”的样子。根据战后在焚尸场工作的一些战犯交代，灭绝犹太人的全过程——从把他们带进脱衣室，到毒死他们，拖走尸体，清理毒气室，总共需要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每次被运到的两三千犹太人，在半天内分做两批，就可以并不费力地被消灭掉。即使如此高效的屠杀速度，仍不能为希姆莱所接受，他依然一再催促特大型灭绝设施尽快完工。

1942年秋天，计划中的现代化杀人工厂破土动工。依照合同，该项特大工程由托普夫公司负责承建，主要由集中营囚犯组成的建筑队负责施工。该项工程的平面图和施工计划是奥斯维辛主营的建筑办公室绘制、提供的，技术图纸早在1937年即已绘制完毕。这充分证明，纳粹高层领导集团灭绝犹太民族的罪恶由来已久，他们早就在暗中组织各方

### 第三章 吞噬千百万生命的魔窟——纳粹集中营

面的杀人专家和技术专家，极为详尽地制订了这项种族灭绝计划。

1943年春夏，被集中营当局命名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号焚尸场的4所附设毒气室的超大型焚尸场相继投入使用，比克瑙于是变成一座完全按照现代化方式建筑并附以精细装饰特大型杀人工厂。其中，第二、第三号焚尸场靠近囚舍，四周用高压电网与囚舍相隔开；第四、第五号焚尸场则被一大片高大茂密的白桦树所环绕，外界人们的视线老远就被挡住。前两座焚尸场各有两个地下室，其中一座较大一些，充当脱衣室，有时也临时充做停尸室。更衣室犹如一个大厅，它的墙壁被粉刷得一片雪白。大厅中央每隔4米立起一根水泥支柱，支柱四周和四面墙下摆着不少条凳，条凳上方设有写着号码的固定挂钩。墙上用德、英、法、俄四种文字写着“肃静”的字样。在出入口的上方也有“消毒站”、“淋浴室”等字样。与更衣室相毗邻的就是伪装成淋浴室的毒气室，它比更衣室面积小一些，室内装有不少淋浴喷头，房间中央除去水泥支柱外，另有两根用铁丝网裹着的铁管。这两根铁管四周钻上许多小孔，一直通过屋顶伸向院子的地面。出口处装上了封闭阀门，党卫军士兵从阀门将氢氰酸颗粒投进毒气室。第一、第二焚尸场各有两间毒气室，每间均能同时容纳2000人。毒气室内设有通往焚尸场的双扇门，门后装有升降机，以便把遇难者的身体就近送到焚尸炉。焚尸炉设在焚尸场内一座楼房的一层。第二、第三焚尸场设有15座三级台阶式的焚尸炉，一级是鼓风，二级是炉膛，三级上设有砖棚，炉算上面可同时放入3具尸体，20分钟之内即可烧成骨灰；炉口由沉重的铁门关闭。第四、第五号焚尸场比前两座面积稍小，每座设有3个毒气室8个焚尸炉，以后又增设了第四个毒气室。这4个毒气室分别可以容纳1500人、800人、600人和150人。以上4个焚尸场拥有的各个毒气室，总共可以容纳15000人，5—10分钟即可把他们尽数杀害。此外，第一、第二号库的使命也在继续，被送到这里的犹太人，被党卫军用皮鞭和枪托，再加上狼狗，驱赶进毒气室。他们的尸体也是送到焚尸场火化。

受害者的尸体被焚化以前，还要经过一道处理手续：妇女的头发被剪光，镶有金牙者的金牙则被囚犯中的牙医拔下来，交到焚尸场里特设

的黄金熔化室。

比克瑙各个焚尸场中还设有尸体解剖室和死刑执行室。前者显然是供集中营内外的纳粹医生们进行科研之用。借调到比克瑙分营帮助党卫军医生进行“特别行动”的医生克莱默，经常到这里寻宝，趁尸体尚未僵硬，剖开腹腔，取走心脏、肝脏、肾脏以及子宫、卵巢，从而解决了在原单位多年解决不了的难题。后者则是为对付那些觉察到纳粹的杀人阴谋并敢于进行各种抗争的犹太人。刽子手最害怕他们揭露毒气室的真相，往往好言相劝，甚至做一些小的让步，避免他们扩大事态；再把这些人迅速带到行刑室进行“解释”，在这里用发声较小的手枪杀害，以免自己的阴谋为更多的受害者知悉，进行鱼死网破的暴动。这样的暴动，在比克瑙的焚尸场内确实发生过，而且不止一次。

1944年春天，为了实施对匈牙利犹太人的空前规模的大屠杀，加快毒杀和焚尸的进度，集中营当局不仅进行了上述硬件方面的安排，对焚尸场负责人也进行了调整：他们把对元首忠心耿耿的党卫军小队长奥托·莫尔派来担任比克瑙四大焚尸场的总负责人。他是个典型的纳粹狂热分子，奉行的座右铭如下：“命令就是命令，必须绝对服从。”即使是元首命令他烧死自己的妻子儿女，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即照办。由于他对在焚尸场工作的囚犯和即将被送入毒气室杀害的男女囚犯异常的凶狠、残暴、粗野，囚犯们在暗地里都称他为“魔鬼”。他几乎没有常人的嗜好：喝酒、抽烟、嫖女人、去教堂礼拜……人们见到的只是他无时无刻地肆意杀人。然而，说他全无嗜好也不是事实，至少他经常饶有兴趣地从事三样勾当：第一，是想方设法地把人活活烧死。他刚一接管焚尸场，就对焚尸工作进行了大胆的更新，命令除使用原有的焚尸方法外，还要在场区内的空地上挖许多大坑，以便在焚尸炉不够使用时马上采用土法焚尸。莫尔的嗅觉还很灵，没有多久，3个月内被纳粹医生们挑选出来准备处死的匈牙利犹太人就达到40万人的空前纪录，有时医生们一日内竟必须进行5次挑选，接受检查的犹太人数高达两万多，以至于一些从事挑选的纳粹医生抱怨说，他们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当源源不断的匈牙利犹太人行列走进比克瑙的八大毒气室时，奥斯维辛创

### 第三章 吞噬千百万生命的魔窟——纳粹集中营

下每天毒死 16 000 人的纪录，是 1943 年同期焚尸数量的 4 倍！而焚尸场即使 24 小时连轴转，至多也只能烧掉 8 000 具尸体。于是，莫尔的焚尸大坑立刻火势熊熊，浓烟滚滚，成百上千具尸体被投入其中。莫尔积极主动地为司令官分忧，他把相当一部分等待进毒气室的候选者，分流到烟火弥漫的焚尸大坑旁边。对身强力壮的中青年，莫尔及其部下进行排枪扫射。把他们解决以后，再把那些走向焚尸场的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和幼儿，和颜悦色地请过来，或用糖果把他们引诱过来，待他们靠近了焚尸大坑，他便一把抓住他们，推入或抛入坑中，然后双手叉腰地站在一旁，欣赏他们垂死的惨叫。有时，他在集中营内发现了一些被纳粹医生进行了绝育试验后丧失了生育能力的年轻女囚，因为身体受到 X 光强辐射或宫内反复注射的严重摧残，体质明显下降，变得周身伤痛，软弱无力，步履蹒跚。没等医生作出生死判决，莫尔就以分配轻工作为诱饵，主动把这些人骗到焚尸场，凶残地把她们一个个地推入火坑。在一阵脂肪被烧化的唧唧声中，少女们怀着满腔悲愤，化作缕缕青烟。第二，莫尔骨子里是一个淫虐狂。他多次命令几百个犹太妇女同时在自己面前一起把衣服脱光，待他过足了“裸体艺术”的欣赏瘾之后，再把她们推进毒气室。谁要是对他的欣赏加以拒绝，他就以皮鞭、棍棒和狼狗迫使她们屈从自己。第三，他随时会闯进毒气室的前站——妇女脱衣室，把那些年轻美貌的犹太妇女赤条条地拖出来，但不是豁免她们进毒气室的厄运，只不过是变换一下屠杀的手法，笃信纳粹种族卫生信条的莫尔，自然不会强奸被列为劣等种族的犹太妇女，尽管他承认被他挑出来的个个都是美女。这是他精心策划的一次打活靶的“奇妙极了”的游戏：他命令这些少女和少妇在场区内的草地上狂跑，欺骗她们说只要跑足里程即可免死。当她们跑得筋疲力尽，速度越来越慢时，莫尔随即掏出手枪向她们射击，把她们一个个击倒。过一会儿，再穿过一片片血迹，走来猛踢她们的裸体，并向那些还在喘息的妇女补上几枪。饱受他折磨的囚犯们当然不会忘记他，战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审判中，莫尔被判处死刑。一些大难不死的囚犯专程赶来观看行刑，有些人尽管用力地踢他的尸体，还感觉仇恨难消。



1944年盛夏，奥营的杀人规模达到疯狂的程度，不仅各个大型毒气室超负荷运转，而且连原来已停止运转的小型毒气室也恢复使用，每天可毒死16 000多人，最多时每天毒死2万人以上。

需要提及一下的是，随着被关进集中营的各国囚犯日渐增加，进毒气室也不再是犹太人的“特权”。从1943年春开始，非犹太人甚至德国囚犯，如果身患难以治愈的沉疴，也会被纳粹医生或党卫军男女看守毫不留情地推搡进毒气室。

从1941年9月3日纳粹在奥斯维辛主营进行毒气杀人试验到1944年11月1日全面停止使用毒气杀人，刽子手至少杀害了100万人以上，其中90%左右是犹太人，仅1944年5—8月被毒杀的匈牙利犹太人即多达近40万人。据有关文献记载，走进奥斯维辛—比克瑙的各个毒气室而又能活着走出来的犹太人只有一个人——她是来自爱沙尼亚的犹太女孩萨拉·罗森鲍姆。

## 二、其他常用的杀人方式

毒气杀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局处死犹太人最普遍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其他杀人手段还包括：因劳累过度造成重病或身体极其虚弱的囚犯，怀孕的女囚，尚不能参加劳动的幼儿，被送入集中营医院特设的诊室，由党卫军的医生、护士给他们的心脏内用长针注入致命毒剂，使他们在几分钟内命归黄泉。

奥斯维辛主营的7号楼名义上是囚犯医院，实际上却是一个经常性地从囚犯中甄别挑选“特别处理”对象的转运站。在此被确定为需要“特别处理”者，除成批地输送到毒气室杀害外，大多数被零星地送进20号囚室，那里设有令许多囚犯心惊肉跳的死刑注射室。凡是到7号楼就诊的病人，一入院就被分成两大类：在纳粹医生看来，经短期治疗即可痊愈重新从事劳动者，编入一组，医生给他们进行真正的治疗。凡是医生认为需要经过长时间治疗方可痊愈者或难以治愈者，编入另一组，送到20号楼的“注射室”进行“治疗”。不过，医生的这种分类相当不科学，因为医生只要求病人脱光衣服，然后在他们身上扫上几

眼，根本不进行任何诊断，连体温也不量。采用注射的方法对病人进行“特别处理”，逐个被带进死刑注射室，由党卫军的医生们给他们进行静脉注射。注射用的药剂是30%的苯酚溶液，剂量为致死的10—12厘克。他们改进了杀人技术，用带有超长针头的注射器，刺入受害者的心脏部位进行苯酚注射。从此，接受注射者进入注射室后，就被按在类似牙科手术椅的注射专用椅上，由两名囚犯护士把他的双手分别摁在椅子扶手上，另一个护士用毛巾蒙住他的眼睛，并用力固定住他的头，这时，党卫军医生走过来，将长针用力刺进受害者的心脏，再把针剂推进去。受害者马上就失去知觉，不到一分钟就断气了。注射室的负责人是集中营医官、党卫军少校弗里德里希·恩特莱斯博士。他曾在4天内，用长针注射的手法杀死了300多个病人。平日给病人进行长针注射的主要是两名党卫军医士、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小队长尤塞夫·克莱尔和赫伯特·舍尔拜，辅以三四名德国、波兰的囚犯医生。酷好长针注射的党卫军医士克莱尔，常常认为医生们挑选出来接受注射的病人太少。因而，他在处死所有的由医生们认定应处死的病人之后，还经常到医院去，亲自从候诊的病人群中再次挑选注射对象，即使那些仅仅受了轻伤的病人，也可能被他挑中。来自维也纳的犹太人赫波尔，仅仅因为腹部存在一条切除盲肠留下的疤痕，就被克莱尔送去进行死亡注射。他自己亲口供认的数字即达1200多人。这种残酷的治疗，使病人把医院视为畏途，他们有时宁可病死，也不愿登医院的大门。1942年7月到1943年2月，是死亡注射的高峰期。每天上午，当班的纳粹医生都要到医院和各个囚室挑选体弱多病的男女囚犯，少时20多人，多时120多人，而且不容拖延，当天必须到20号楼或13号楼的注射室进行注射。为此，集中营药房遵照医生们的要求，每隔几天就要往注射室输送苯酚，每次5—6磅，而对每个病人的注射致死量不过几十毫升。

据被迫在比克瑙分营医院担任门格尔医生助手的匈牙利囚犯医生尼斯利揭发，奥斯维辛的刽子手们还有一种经常性的杀人方法：每天晚上挑出70名失去劳动能力的女囚，命令她们逐个脱衣走进诊室进行“体格检查”。她们刚一走进房间，刽子手就用大口径手枪向她们的后脑射

击，一枪即可毕命。被这种方法杀害的妇女足有数万人。

对于企图逃跑的囚犯和犯有大过的囚犯，则有经常性的枪决和绞刑在等待着他们。

对于犯了重罪的囚犯，不分男女，则使用活活烧死的残忍手段。1943年，一个在比克瑙焚尸场工作的捷克籍囚犯泽林斯基，因为向一个进脱衣室的朋友之妻吐露了毒气室的真相，结果非但未能解救这位女士，自己也被五花大绑地抛入焚尸炉。1944年，一位试图逃跑又被抓回的波兰女囚，在自杀未遂后，仍被丢入炉火中化为灰烬。

总计被纳粹用毒气以外手段杀害的各国居民在60万人以上。奥斯维辛已成为160万—200万欧洲各国人民的坟墓。1945年1月27日，当苏军解放奥斯维辛主营和两个分营时，总共只有7600名囚犯还活着（其中比克瑙分营5000人，内3000多人是女囚），而且其中不少人已经奄奄一息。这无疑可以载入吉尼斯纪录。

### 三、入营劳动——缓期执行的死刑

当然，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同于特列布林卡那种绝对意义的灭绝营，它在大量灭绝犹太人的同时，又暂时留下为数不少的犹太人服苦役，当牛做马，允许他们筋疲力尽后自然地死去。每当新来到一批囚犯，党卫军的医生就会赶到火车站台上，对他们进行挑选：适合从事繁重劳动的青壮年男女被挑出来排成一队，走向劳役营，经过剃发和消毒、刺上囚犯号码后，发给囚衣入营劳动。而老人、15岁以下的儿童、孕妇、病人、残疾者则排成另一队，走向毒气室内被消灭。被选中准予入营参加劳动者，一般均低于被送往毒气室处死的人数，前者往往只占抵达者总数的1/4到1/3，有时甚至只有1/10左右。纳粹医生对女性劳动能力的要求往往高于男性，有时即使是年富力强的少妇，只要拖儿带女，也会被认定为不适合劳动，而被医生赶进走向死亡的队列。即使被纳粹医生送进劳役营，也不意味着绝对安全：医生们一般每月一次到劳役营内进行抽查，发现了因超负荷劳动而体质明显下降者，就随时把这些人带走，补充到下一批走向毒气室的人群中。

### 第三章 吞噬千百万生命的魔窟——纳粹集中营

被纳粹医生准许入营充当奴隶者，过的完全是一种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无怪乎集中营的传令官、党卫军上尉弗利奇（不久以后晋升为主营副司令官）在向新进入劳动营的囚犯们致“欢迎词”时，毫不掩饰地向他们交底：在集中营的生活条件下，“犹太人最多可以活一个月，其他人最多可以活三个月……你们想离开这个地方，那只有一条路，就是从焚尸场的大烟囱中飞上天”。由于女囚的生活、劳动条件往往比男子更差，故此女囚的情况更具有代表性。1943年1月27日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国女政治犯克勒德·瓦扬-古久里，两年半以后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所作的证词，足以勾勒出女囚在该营中的悲惨遭遇：“我是与230名法国妇女同车被押往该地的……230个人当中，只有49人在战后重返法国。一位67岁的老太太，入营4天就因不堪折磨而死去。一位女歌唱家，因为安装了一条假腿，在进行挑选时，立刻被纳粹医生驱赶进毒气室。还有一名年仅16岁的女学生，也很快被摧残致死……到了比克瑙分营，我们被带去进行消毒。我们都被剃光头发，在前臂上刺上囚犯编号；随后又去洗浴，先洗蒸汽浴，再洗冷水澡。当着男女党卫军的面，我们都必须脱得一丝不挂，然后给我们分发了肮脏的破旧衣服，一条粗毛纺的麻袋片似的裙子和一件粗质料的上衣。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后来我们被带进居住的囚舍。屋里没有床，地上只有一块两米见方的铺板，没有草垫，更没有被褥。我们在这样的囚室里熬了好几个月，整夜都难以入睡，9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动弹一下就会打扰别人。凌晨三点半，女看守的号叫声就把我们吵醒了。我们从棍棒的殴打下从铺板上爬起来，被驱赶着去参加集合与点名，连濒临死亡的人都要被拖出去。我们被分成五人一行站队，一直站到东方破晓，在严寒的冬夜中要站到七八点钟。如果碰上雾天，有时要站到正午，等待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女看守来点名。她们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人人手持棍棒，随意打人凌辱人。一个名叫热尔梅娜·勒诺的法国女教师，在集合时，竟被女看守打得头破血流。点名之后，才编成大队去上工。我们在比克瑙的劳动主要是清理被拆毁的房舍、筑路，最艰苦、最折磨人的活儿是排干沼泽。这项工作也最具危险性，整天要赤脚站在水里，随

时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政治部的盖世太保和男女看守时时刻刻都在监督着我们，随使用棍棒打人，指使狗咬人，很多女囚犯活活被咬死。而那个纵狗咬人的女看守陶贝尔却站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狞笑着。”

“妇女落到比克瑙这种地方，致死的原因实在太多了，但主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最起码的卫生条件。我们12 000名女囚仅有一个供水龙头，水还不能饮用，而且时有时无。这个水龙头偏偏又安装在德国女囚的盥洗室里，要通过一道岗哨才能达到。站岗的都是些罪犯出身的德国女看守，她们寻找一切借口拼命毒打我们。因此，对女人来说不可缺少的洗澡和洗衣，在这里几乎是不可能的。3个多月过去了，我们未能穿上一件干净衣服。碰上有积雪，我们就化雪水洗涤；春天来了，我们就在上工路上找个水坑，连洗带喝，洗衬衫又洗裤子，最后还要洗手洗脸。我们渴得要命，由于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两次1/8升的草汤水喝，有的难友活活被渴死了。”

不要以为进毒气室只是犹太妇女的专利。1943年以来，集中营当局出台了新政策，所有国家的女囚，包括德国女囚中的政治犯，一旦染上重病，同样要被选送到毒气室处死。古久里女士叙述道：“1943年2月5日清晨三点半，整个集中营的人都被叫醒，集中在营区外的一块开阔地上，而平时的集合地点是在营区内。天上下着雪，我们一直等到五点钟，都饿着肚子。突然，随着发出的一声信号，每个女囚都必须一个接一个地穿过一道门。党卫军强迫我们尽力跑快，每个人身上都挨了棍子。那些因太衰老和太虚弱而跑不快的妇女，都被一个个用挠钩钩住，并押送25号囚舍，也就是进毒气室的等候室，女囚们称之为升天之门。这一天，仅我们组就有10个法国妇女被送到25号囚舍。死在25号囚舍会比死在其他地方更加恐怖。因为关在这里的都是注定要死的女囚，所以只有当伙房有了多余的残汤剩饭时，才拿过来给这里的女囚吃。这意味着她们可能一连几天也喝不到一滴水。许多党卫军都是些淫虐成性的家伙，比如比克瑙女营的长官赫斯勒、党卫军班长刁巴尔，他们连这些即将死亡的女人也不轻易放过。对这些浑身赤裸的女囚又踢又打，放纵凶狠的狼狗，把她们咬得血肉模糊，则是他们取乐的惯常手段。25

### 第三章 吞噬千百万生命的魔窟——纳粹集中营

号囚室的院子里，经常摆着成堆的尸体。尸堆中间，不时会伸出一支手或一颗脑袋，试图从尸堆中挣扎出来。如果有的女囚擅自去照料关进25号囚室的女囚，一经发现，她们就会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罚——关进25号囚室，成为同样不幸的受害者。法国女囚的地位，在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中是比较高的，享受的待遇尚且如此，那些处于最底层的犹太女囚的命运就更加猪狗不如。法国女囚的居住条件虽然相当简陋，但一间囚室内，毕竟只安排9个女囚住。而比克瑙的犹太女囚们，住的是不经改造的仓库或马厩，一个囚室内要安排1500—2000人。许多人因面积过于狭小，夜里根本不能躺下，只能缩成一团地坐着。如果像法国女囚那样，每天每人得到两次草汤，她们必定会欢呼跳跃，因为她们1000多人每天只能得到一桶水，连喝带洗都用它。她们每天不管犯不犯过失，也会遭到鞭打，党卫军为的是让她们不要忘记自己是犹太人。她们的劳动时间更长，劳动强度也更高。一旦患上疾病，她们没有权利去医院就诊，也不敢求助于纳粹医生，他们正巴不得发现有病的犹太人，以便随时对她们进行特别处理，也就是送进25号囚室等死，或带到20号囚室接受心脏注射。因此，患病的犹太妇女只能强忍苦痛，继续劳动，直至筋疲力尽毙倒在地。由于她们是种族灭绝的重点对象，根本就没有生育的权利。不到出现临产前的阵痛，党卫军女看守绝不会准许她们中止劳作。婴儿出生后，平时根本不在囚室露面的党卫军医生护士，就闻讯赶来，但他们不是来照料产妇，而是来给婴儿注射毒药针的，这是他们的一项必须履行的职责。遇到喜爱恶作剧的纳粹护士，婴儿的命运就更悲惨， she 会把婴儿放到一个僻静无人的房间，听任婴儿活活饿死或冻死，或者把婴儿送到焚尸场的恶魔奥托·莫尔那里，由他把婴儿抛入火势熊熊的焚尸炉。碰上门格尔这样的杀人医生，生孩子也足以构成死罪，产妇只剩下进毒气室一条路。因此，不少临产的犹太孕妇往往横下一条心，宁可由同情她们的女囚医生秘密做人工流产，也不愿让无辜的胎儿到世间活受罪。”

负责维护集中营的恐怖统治、镇压囚犯反抗的职能机构是政治部。它是盖世太保的派出机构，设在奥斯维辛主营。政治部主任是奥地利的

纳粹分子马克西米连·格拉布纳，他和属下卡杜克、勃格尔、布罗德、霍夫曼、胡斯台克、拉赫曼、维南德等十余人，个个都是对囚犯如狼似虎的杀手和恶棍。政治部的第一项日常工作就是执行死刑。主营10、11号楼之间的一大片空场被辟为专用行刑地。每天，政治部人员都会把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苏军战俘、政治犯、企图逃跑或其他犯有重罪的囚犯从牢房带到这里，执行枪决。有时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尤其是对试图逃跑又被抓回者，要在全营进行大点名时，把他们公开绞死。其次，是对犯有过错的囚犯进行刑讯。他们实施的刑法五花八门，据格拉布纳战后在克拉科夫法庭交代：根据集中营司令官霍斯的命令，政治部在进行审讯时，经常使用如下刑罚：

1. 荡秋千。即绑住囚犯的双手，然后让囚犯蜷曲起双腿，再把捆绑的双手放在上面，在腰窝和双手之间穿一根竹竿，让囚犯头朝下摇晃，同时用鞭子和木棍抽打。

2. 摧残男女囚犯的生殖器。用长针刺入他们的睾丸，或者狠命地踩睾丸；对于死不吐口的囚犯，就干脆踏碎睾丸，使他们在难以忍受的巨痛中死亡。对女囚，则把作用强烈的坐药，塞进她们的阴道，叫她们领受近似下地狱的滋味。

3. 灌水。握住囚犯的鼻子，强行往嘴里灌水，经常要灌进10公斤一桶的水。同时，对其进行抽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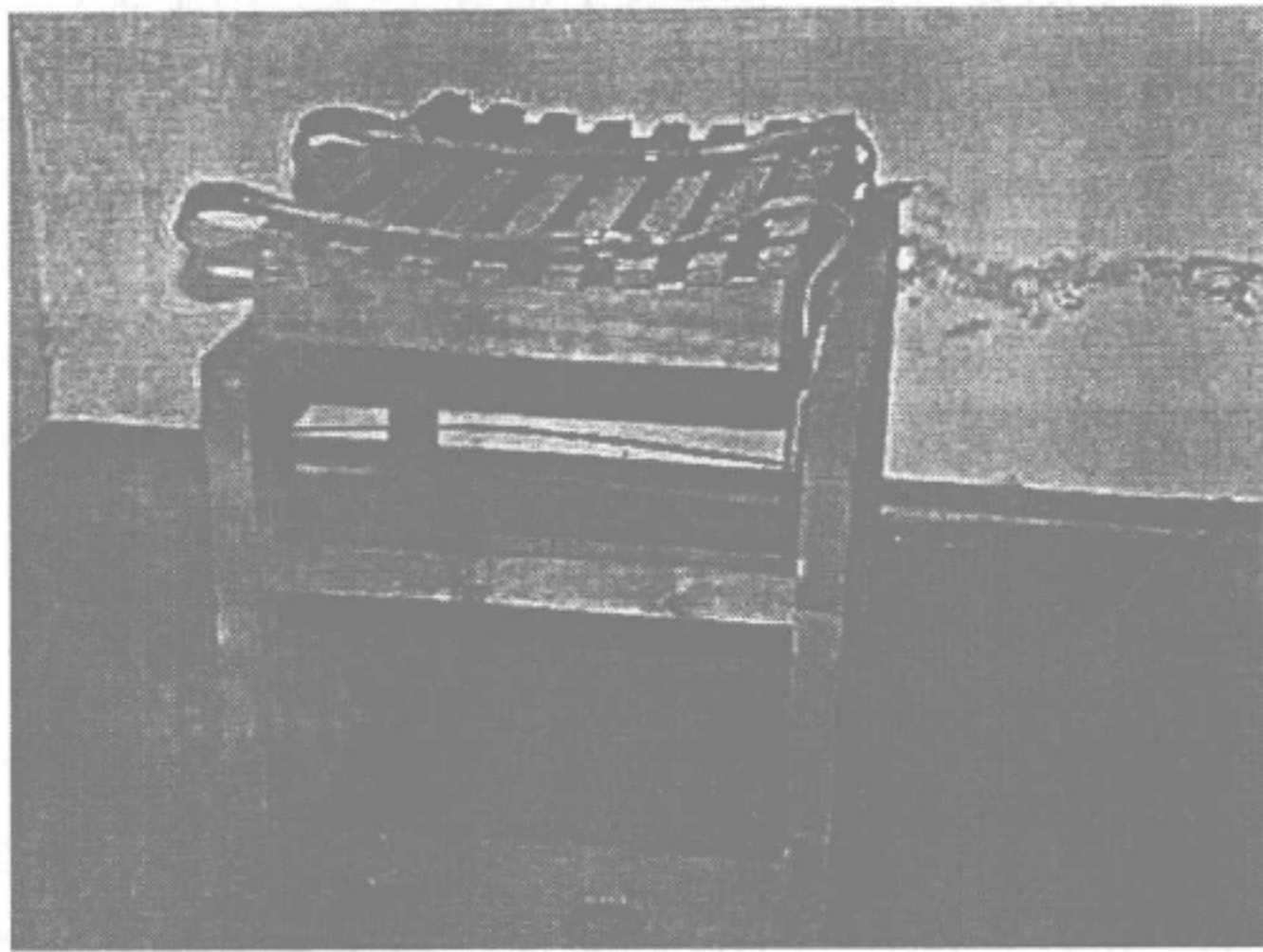
4. 骨折。即打断囚犯的肋骨、颌骨。

5. 关入地牢。所谓地牢，其实只是一个烟囱型的特殊建筑。里面暗无天日，不见一丝光线。由于空间极为狭窄，囚犯们只能站立或蹲着，而无法躺下。看守们不提供任何饮食，囚犯们饿得发慌时只得吃食死去难友的尸体，最后仍不免一死。

培养卡波，也是政治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所谓卡波，即是卖力地干活，同时又能模范遵守集中营各项纪律甚至甘心充当纳粹分子走狗的囚犯。一旦获得政治部的认可，给他们带上黄色臂章，他们立刻就获得监督、拷打、折磨甚至杀害其他囚犯乃至自己同胞的特权。他们的特权还在于可以蓄长发，完全不参加劳动，饮食也比一般囚犯的标准高10倍

以上，非犹太人的卡波甚至经允许后，可以进入焚尸场的女脱衣室，挑出犹太美女，供自己发泄兽欲后，再把她们推进毒气室，或者进入供党卫军一般士兵有权进入的营中妓院享乐。一经尝到甜头，卡波们就以加倍的忠诚来回报主子，折磨囚犯的招数，无所不用其极。战后不少幸存的囚犯证实，对于捅娄子的囚犯而言，落到卡波手里甚至比落到党卫军手里更惨。卡波对有过失囚犯的惩罚办法包括：

1. 最轻的过失也要打 25 鞭子；
2. 过错较重的囚犯送进惩罚室，最终的结局往往是死亡；
3. 不给发全份伙食，整夜拷打，使之无法睡觉，患病也不准治疗；
4. 罚女囚裸膝跪在棱角尖锐的碎石上，双手各举一块大石头，而且必须高高举过头顶，稍一弯动，就会遭到一顿毒打。



集中营的刑罚室

通过卡波制度，纳粹分子既分化了囚犯营垒，又给自己培养出一批得力的走狗，从而加强了对各个囚犯的监管，在集中营的各个层面安插了耳目。

政治部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对广大囚犯队伍进行监督，制止其逃跑、抗争、怠工、建立地下组织，严防囚犯和内部工作人员泄露集中营



的各项秘密。他们以威逼利诱的种种手段，在主营、两个分营和 39 个卫星营中，布下一张特情密探网，在各国囚犯、雇工乃至党卫军男女看守中都安插了耳目，日夜监视着全营各方面人员的一举一动，盖世太保的影子可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每天，盖世太保指挥的巡逻队 24 小时乘坐汽车或摩托车往返巡逻，随时搜查他们认为可疑的囚犯，并禁止男女囚犯、各营舍之间的囚犯、不同民族间的囚犯进行接触和串联。为了更加直接、密切、及时地监督、跟踪不轨行动，盖世太保采用各式各样的卑劣手法，收买囚犯中的败类充当奸细，破坏了不少酝酿中的抵抗斗争。不过，一旦内奸的身份被囚犯们揭破，他们的主子马上就会打发他们进毒气室，丝毫不手软。尤为阴险的是，盖世太保为了侦破某些重大案件，往往屈尊冒充囚犯，穿上破旧的囚衣，故意让同伙把自己打得鼻青脸肿；进入囚室以后，就大骂卡波和看守，引来他们把自己痛打一顿，以骗取囚犯们的信任。果然，有不少缺乏对敌斗争经验的囚犯上当，他们甚至在走向刑场的前夕，把埋在心底多年的机密，吐露给这些伪装成勇士的险恶敌人。

#### 四、以“劣等种族”代替豚鼠进行惨绝人寰的医学试验

在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纳粹医生还允许一些年轻的犹太男女、吉卜赛人和非犹太政治犯不从事苦役，也不杀死他们，但他们的命运却往往比迅即被毒杀者更悲惨——他们将像试验用豚鼠一样，被纳粹医生和专家、教授们多次进行活体试验。即使在惨无人道的手术中没有因难以忍受的痛苦死去，也往往会在失去试验价值后被杀害，或者枪杀，或者驱入毒气室。就算极少数幸运者苟全了性命，也必然会变成终身残废或至少丧失掉生育能力。

根据主管部门——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的指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男女囚犯，可以由全国的纳粹医务工作者共享。医生们只要向集中营当局支付 6—15 马克，即可任意支配一名健康的男女囚犯的生死。这样，在奥斯维辛主营以及比克瑙、莫诺维茨分营的医院和手术室，经常有数十名党卫军或大学、研究所的医生或科研人员，利用男女囚犯的身体和

各种器官进行名目繁多的残酷试验。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医生和科学家进行活人试验的最大场所，战后据纽伦堡国际法庭确认，这里至少进行过21种医学科学实验：1. 从女囚的子宫颈上切下人体组织，直至切除掉子宫颈甚至整个子宫；2. 借助专用特殊器械通过高压将一些未经试验的新制剂注射进女囚子宫内，从而对其子宫和输卵管拍摄X光照片，然后进行性器官功能检查；3. 对年轻女囚的盆腔照射超大剂量的X光射线，以后并摘除她们的两侧卵巢；4. 子宫颈癌细胞接种试验；5. 腹腔局部炎症手术；6. 对年轻犹太男子进行睾丸部位X光超大剂量照射，并切除睾丸；7. 根据法本、拜尔等德国化学公司的要求，将多种新药和新型化学制剂注入年轻女囚体内，观察其反应，研究相应的完善办法；8. 在男囚的腿部皮肤上使用化学刺激试剂，造成人工溃疡和发炎性肿瘤试验；9. 强制遭受绝育试验的男女同健康的异性囚犯进行性交，以检测绝育手术的成效；10. 人工剥离活人的皮肤；11. 人工传播疟疾；12. 人体高压仓负压试验；13. 被冷冻人体的回暖试验；14. 人工受孕试验；15. 人体心脏对酚类药物的反应试验；16. 制作人体医用标本；17. 化脓性蜂窝组织发炎的人工培养；18. 孪生儿童的测量与研究；19. 强制性改变性别试验；20. 人体皮下注入煤油的敏感性试验；21. 眼球颜色变色试验。其中最大宗的一项医学试验是强制绝育。以德国著名妇科专家卡尔·克劳贝格为首的一批纳粹医生，受希姆莱的委托，旨在发明一种经济、便捷的女性绝育方法。他们以进行常规的妇科检查为由，骗取了大批女囚的合作。随后使用一种超长的注射器，将一种效果尚不肯定的溶液，通过宫腔强行注射到她们的输卵管内。这种溶液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它是借助腐蚀输卵管内壁造成堵塞引起绝育效果的，因而，承受这一试验的众多犹太妇女遭受到极疼痛的侵袭，有的人还因医生的草率形成的宫腔创伤，导致大出血而死亡。战后，据一名曾为克劳贝格医生服务过的党卫军小队长回忆，在他任职期间，每周都要从克劳贝格医生工作的奥斯维辛主营10号楼内，运走几具已被解剖过的女尸送往焚尸场烧掉。德国化工巨头法本康采恩也没有放过奥斯维辛的廉价囚犯。他们与集中营的党卫军医生、药剂师勾结起

来，利用女囚的身体试验种种正在开发的新药。服务于这一宗旨，纳粹药剂师克劳修斯给 200 名苏军女战俘，注射了比正常剂量高十几倍的荷尔蒙，此举使这些姑娘的内分泌功能发生严重紊乱，几天内就在极度痛苦中全部死去。正在实习中的党卫军医生和德国医学院校的学生，也纷至沓来，任意截下囚犯们的肢体和内脏，摘除女囚的乳房、子宫和卵巢，以便使自己的技能迅速提高。

其实，集中营中的囚犯早已一无所有了。一到奥斯维辛的站台，他们所携带的一切物品即被强行夺走。获准留下的工作者，被榨干全部血汗。他们的人格与尊严，根本无人考虑。不但被看守们打来骂去，还被强迫吃掉别人的粪尿。更有甚者，一些党卫军别出心裁地搞“人狗结婚”，即唆使受过特殊训练的大型警犬，对三四岁的茨冈女孩进行强暴。不仅如此，恶棍看守还强迫女孩的母亲到现场观看。

即使对被大批处死的犹太人的尸体，敲骨吸髓的纳粹分子也还要进行最后的掠夺：妇女们的长发被剪下来，编制成绳索或坐垫；人皮被纳粹艺术家精心剥取下来，制成各种艺术精品；死者的金牙被拔下来，回炉炼制成金砖或金条；身体遭火化后留出的人油，被无孔不入的专家加工成肥皂；甚至被害者的骨灰，也被刽子手们碾碎，作为肥料廉价出售给德国农场主。

集中营的囚犯被人为地分成八大类，各自享受不同的待遇。德国人是第一类，北欧各国人属于第二类，法国人属于第三类，巴尔干各国属于第四类，俄罗斯人属于第五类，吉卜赛人属于第六类，犹太人属于第七类；原本只有这七类。1943 年 9 月以后，纳粹当局又把背叛了自己的意大利人列为最底层，以示惩罚。

## 第二节 各具特色的纳粹集中营

纳粹在波兰共建立了四大集中营，除奥斯维辛外，还有马伊达奈克、施图特霍夫和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其中，马伊达奈克同奥斯维辛的关系最为密切，1944 年夏秋，该营因苏军逼近，营中的全部官员、

看守和囚犯一律转移到奥斯维辛，实际上并入该营。这三个集中营的规模小于奥斯维辛，灭绝囚犯的设施也不如奥营那样多，因而在外界的知名度较低。但是，每个营杀人总数均达到30万人以上，马伊达奈克最高，据专家20世纪80年代统计、估算，受害者的数量达56万人，而苏联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提供的数字是138万。但专家学者们达成共识的是，1943年11月3日，纳粹分子在该营一日内就杀害了1.7万人。有鉴于此，西德政府继法兰克福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后，又于1975—1979年在杜塞尔多夫进行了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审判。

另一个较有特色的集中营是拉芬斯布吕克。这个位于柏林以北100多公里处菲尔斯腾贝格的集中营，共关押过13.2万多囚犯，其中12万多是女性，大部分是来自欧洲各国的犹太妇女。应当承认，出于宣传以及欺骗国内公众等方面的考虑，1944年以前，德国本土内集中营囚犯的生存条件略好于设在波兰境内集中营囚犯的生存条件。以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为例，其1942—1943年女囚的月平均死亡率为0.23%，而同期，奥斯维辛为3.61%，马伊达奈克为4.41%。这一方面是因为女囚所得到的食物优于奥营和玛营，另一方面则是该营长期没有建立自己的灭绝设施，当局只能将医生挑选出来的不合格女囚，每周两三次运往附近的贝恩堡灭绝营杀害。然而，党卫军管理部门后来就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并很快予以解决。1944年12月，拉芬斯布吕克当局在其青年集中营——乌茨马尔克建起了很大的毒气室和焚尸场。同时，从1944年中起，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批刽子手——比克瑙分营的司令官施瓦次胡贝尔、恶魔医生卡尔·克劳贝格、霍斯特·舒曼、文克尔曼等纷纷转移到该营。于是，女囚们的厄运来临了。大规模的挑选频繁地进行，有时一天竟要进行两次。年轻孕妇经强制人工流产后，被允许留下来继续劳动的做法也被废止，现今的政策是孕妇和胎儿统统处死。1945年3月的一天，文克尔曼等纳粹医生一次就挑选出150名孕妇和12个哺乳婴儿的产妇，连同婴儿，当天就全部送入毒气室。所以，女囚的月平均死亡率从一年前的0.23%直线上升到3%以上，增长了10倍。此外，恶魔医生们的到来使大屠杀的花样翻新，克劳贝格要在这里推广自己发明的

经济、高效的克劳贝格式绝育法，舒曼则企图同克劳贝格平分秋色，尽量使用虽然成本较高但一劳永逸的舒曼式绝育法。但是，最终倒霉的还是营中的女囚，特别是那些尚未成年的吉卜赛少女。幸运一些的女囚在备受宰割后，落下多种妇科疾病，长年遭受疼痛难忍的折磨，不幸者则经过不成熟的手术后，含恨而死。被舒曼残害而死的女囚中，年长的不过30岁，年纪最小的只有6岁。

拉芬斯布吕克的另一个特色是，它是党卫军为各个集中营培训女看守的总基地。许多德国少女，虽然来受训前，已经开始接受纳粹主义，但是具体到真刀真棍地杀人打人，还免不了瞻前顾后，犹犹豫豫。可是经过3个月至半年的强化培训后，顿时判若两人，良心全被纳粹主义的反犹理论浸黑，她们变得如狼似虎，凶狠残暴，再没有少女的纯洁与同情心。数年以后被押上法庭、送上绞架的不少女战犯都在此接受过培训，其中包括：贝尔森集中营的副长官伊尔玛·格雷泽，奥斯维辛女囚营看守长玛丽亚·门德尔，马伊达奈克女囚营副看守长赫尔米娜·布隆施特奈尔，绰号“血腥的布里吉达”的女看守希尔德加特·莱谢尔特，亲自杀害女囚至少10人以上的女看守露易丝·丹茨，残忍地虐杀孕妇的女看守格特鲁德·哈本施泰因等，均为拉芬斯布吕克培训班的高才生。她们的下场不是走向绞架，就是被判终身监禁。

最初的集中营是位于德国西南部大城慕尼黑远郊的达豪集中营。这里先后关押过25万（一说是206 206人）欧洲各国的囚犯，其中7万多人被害死。在该营被美军解放之前的一个月里，刽子手们达到疯狂的地步，平均每天杀人1 800人。该营也是纳粹医生所谓医学试验的发祥地，早在1940年初就开始进行罪恶的活人试验，共做过各种医学试验5 000多次，至少有3万多人是在试验中不堪忍受剧痛而死，在这方面它甚至超越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另有不少于数千人事后死于后遗症。达豪集中营的纳粹医生所进行的海水代食试验堪称残忍的典型。他们挑选了100多个强健的吉卜赛小伙子作为试验对象，试验期间，吉卜赛青年们得不到任何食物和饮水，而由纳粹医生将导管插入他们的肛门，把高浓度的海水灌注到他们的胃里。这一招往往导致青年们面容迅速衰老，脸

### 第三章 吞噬千百万生命的魔窟——纳粹集中营

上顿时布满皱纹。此后，医生还要用长针穿刺他们的肝脏，抽取肝液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手术经常引起剧痛和内出血，所以即使强健的小伙子也常常难以忍受。有40多个小伙子在手术中当场死亡，当时侥幸未死的接受试验者，事后也大多逃不脱被枪决的下场。

这里孕育出以后各个集中营的司令长官、看守长以及其他骨干。例如，鲁道夫·霍斯，20世纪30年代中期还不过是达豪集中营的一名看守中的小头目，因工作积极有成效，被集中营长官艾克相中，以后被一再提拔，先担任达豪集中营的看守长，又担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司令官。

位于德国文化、艺术圣地——魏玛附近的布亨瓦尔特集中营，是来自欧洲25个国家的56000多个犹太人、苏军战俘和反法西斯主义战士的墓场。德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台尔曼，经过11年的摧残后，被纳粹分子暗杀在这里。使这座集中营远近闻名的又一个因素是，女战犯伊尔丝·科赫伙同其他纳粹医生，在这里残杀囚犯，目的仅仅是剥取他们的皮，加工成高档工艺品。艾塞尔等医生“酷好人体造型艺术”，他们仿照拉丁美洲某些原始部落的做法，把英俊少年或美貌少女亲手杀死，割下他们的头；再往脑腔中灌进烧红的沙砾，使头颅逐渐萎缩，最后变得只有甜橙大小，而面容毫不改变。医生们把这种“艺术人头”当作珍品，逢年过节时，用来馈赠同事和密友，或者专门请同事们到家中欣赏。布亨瓦尔特集中营还是纳粹医生积极利用囚犯代替豚鼠进行残酷的活人试验的场所，除进行其他集中营搞过的各种试验外，还对大量的同性恋男囚强制切除两侧睾丸而著称，大约有近百名男囚因此死于纳粹医生的手术刀下。1944年冬天到1945年初，囚犯当中流行疟疾，纳粹医生非但不予救治，反而视为大显淫威的好时机。丁格、瓦格纳、艾塞尔、布鲁纳（女）等医生，把大量病人带进注射室，给他们注射煤油和汽油，每天经他们这样“治疗”而死的妇女和儿童，少则上百人，多则300多人。

萨克森集中营以其大批屠杀苏军战俘而闻名，估计有18万名苏军战俘在此毙命。屠杀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营内的医院中进行的：对女战

俘，医生们则使用注射毒剂的手法将她们杀死。当苏军大踏步地向德国境内挺进时，屠杀便不再那样从容不迫，成群的战俘被赶去挖大坑或壕沟，事成之后，他们所得到的报酬是机枪扫射，随后尸体又被踢入坑里埋掉。

还有一些知名度较低的中型集中营，然而其杀人规模之大和屠杀手法之残忍，同样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例如，设在波兰东部的雅诺夫集中营，在欧洲各国论述纳粹战争罪行的主要著作中鲜少提及。但是，在它存在的短短两年时间内，竟有 15 万多男女囚犯死于非命，其中包括 8 000 多个儿童。该营未设毒气室，杀人的方法是枪杀甚至更原始的方法。集中营的司令官名叫布鲁姆·维尔豪茨，军衔是党卫军上尉。这位长官的日常工作之一便是“打活靶”。他经常带着夫人来到高高的阳台上，观看囚犯们劳动。一旦觉得哪个人不顺眼，马上端起自动步枪对他开火。这种运动常常进行半天，几十名囚犯毙倒在地。他的妻子爱尔弗里德，也是一名残忍的纳粹女杀手。在阳台上，她经常从丈夫手中抢过枪来，同样向囚犯人群中频频射击，许多囚犯非死即伤。维尔豪茨哄女儿的游戏也充满血腥味，他拉上女儿来到犹太儿童附近，然后突然抓起一个三四岁的幼儿，使劲儿向上抛去，并在这一刹那向他开枪，鲜血从空中洒到地上。久而久之，4 岁的女儿也开始纳粹化，爱上了这种残忍的游戏，一再要求爸爸“再来一次”，而她的战犯爸爸从来不曾拒绝女儿的要求。上行下效，凶残的司令官必然带出一帮凶残的下属。党卫军中士维普克，正是一个这样的下属。他曾不止一次地向同僚们夸口，自己一斧子就可以把人劈成两半。他的同行艾利希对此表示怀疑，提出以 10 瓶啤酒来打赌，随后就拉来一个八九岁的犹太男孩。维普克命令男孩跪在地上，闭上眼睛，随后抡起斧子比试一下，然后即铆足全身力气，抡圆了大斧，奋力从男孩的脖子旁边劈下去，无辜的男孩就果真被劈成两半。“棒极了”，艾利希带头喝彩；“好哇”，“太妙了”，刽子手们一齐欢呼；随后就在男孩血肉模糊的尸体旁边，痛饮起啤酒来。盖世太保警官海涅杀了人，还把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因为他们太愚蠢，连最简单的问题也回答不上来。他的那些问题其实既无聊也无边，不论

你的答案如何，最后的结果都被他说成是错误，然后对准答题者就开枪，一枪未打死，就连续开枪，或者拿起刺刀在受害者身上乱割乱刺，折磨够了，再把他们开枪打死。除这些富有个人特色的杀人手段外，刽子手们也有共同使用的屠杀方法：在冬天，他们把受刑者捆住手脚，扔进装满冷水的大桶内，把他们活生生地冻死。在夏天，凶犯们把受刑者绑在室外的水泥柱或电杆上，让他们成天顶着三四十摄氏度的高温酷暑，直到把他们晒死。他们也借助于军犬来行凶，把囚犯五花大绑再高高地吊起来，或者把囚犯打得半死，此时他们放出凶恶的军犬，在毫无抵抗能力的囚犯身上猛咬一通，把他们撕成碎块，把刚才的活人迅即变成一具具骷髅。还有一种酷刑是，两人分别抓住受刑者的两腿，用力往不同方向拉扯，硬性把人撕裂。甚至3岁以下的走路还不稳当的幼儿，也成了党卫军刽子手们滥施淫威的对象，他们抓住幼儿的双脚，把他头朝下地浸入水中呛死。如果需要处理的囚犯太多，刽子手们便改用简便的杀人方法：先把囚犯打得迈不开步，再抛入防范严密的惩罚室，让他们自然地冻死或饿死。

另有一些更加微观、名不见经传但杀人力度并不小的小型集中营，也是一些不折不扣的屠场。例如：

1. 布伦东克集中营：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以北20公里处，这里本是比利时在“一战”时期的一个防御工事，“二战”中成为纳粹德国的一个集中营，是关押、迫害和虐待犹太人及武装抵抗人员的人间地狱。在1941年9月建营一周年时，已杀害犹太人和抵抗运动成员1万余人。1944年，这里关押的3500多人中又有164人被枪杀、21人被绞死，约100人被折磨致死。

2. 纳粹设在苏联爱沙尼亚共和国境内的克罗沃克集中营。

3. 德国本土的维兴根集中营。

这两个集中营也都是灭绝营，但杀害的对象不完全是犹太人，也包括反法西斯人士和游击队员；大批杀人的手段不是毒气室，而是枪毙或活埋。每一家的杀人规模都在数万人，被解放时只见遍地尸体。





遍地横尸的克罗沃克集中营

在所有的纳粹集中营中，唯一与众不同的是特列森施塔特集中营。它位于捷克境内，距离布拉格有 50 公里之遥。纳粹当局称它为模范营，允许甚至邀请外国记者和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代表前来参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的看守人员确实对犹太囚犯和颜悦色，非但不打不骂，还给他们提供各种服务。囚犯们的生活条件也相当优越，住在舒适的两层小楼里，饮食包括牛奶、香肠、鸡蛋、矿泉水，定期放映电影，党卫军的医生护士们还经常给他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对于犹太人来说，这里真像乐园一般。恐怕大多数犹太人所要求的生活标准也不过如此吧。其实，这不过是纳粹领导集团精心制造的一个超级骗局，完全是为了欺世盗名，掩盖他们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真相。纳粹的宣传部门在此专门拍摄了一部放映时间长达 120 分钟的纪录片《元首赐予犹太人一座城》。其实，在这里居住的犹太人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经过纳粹当局特许的，只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立功受奖的犹太官兵、父母一方或祖父母一方是日耳曼人的混血犹太人，以及经过绝育的犹太人。正是因为特列森施塔特集中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国际视听，纳粹刽子手得以放手大干杀人勾当。丹麦红十字委员会派来的一个

### 第三章 吞噬千百万生命的魔窟——纳粹集中营

考察组在来此探视后撰写的报告称特列森施塔特“较为近似一个理想的郊区社会”，“而不像一个集中营”。不过，到纳粹政权行将崩溃之际，希特勒一伙仍没有放过这里为数不多且为他们起到宣传作用的犹太人。从1944年起，该营3/4的犹太人，乘着11趟死亡列车被送到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由于这些人大都属于老弱病残，很难逃过门格尔之流的纳粹医生的挑选，其命运可想而知。1944年9—10月两个月，从特列森施塔特运到比克瑙18 000个犹太人，可是只有10%的人获准进入集中营劳动；其余的万余人排着长队，直接被押解到毒气室。

位于汉堡附近的瑙因加默集中营，因对犹太儿童进行惨无人道的医学试验并加以杀害而闻名于世。纳粹医生赫斯梅耶尔等使用100多名15岁以下的欧洲各国犹太儿童进行肺结核新疗法试验。他给每个儿童都注射了超量的肺结核病菌，使他们长期遭受病痛的折磨。孩子们最后得到的报酬是被残酷地绞死。刽子手医生赫斯梅耶尔在“二战”后数次逃脱惩罚，20世纪60年代，被民主德国司法部门捕获，判处终身监禁。

米特尔堡—多拉集中营也是较有特色的集中营之一，它是纳粹德国研制秘密武器——V-1、V-2火箭的主要场所。党卫军将军维尔纳·多恩伯格在此研制成功的V-2火箭，有500多枚发射到英国，造成6 000多名英国军民丧生。为了保守V-2火箭的机密，集中营当局在撤退前夕，大肆屠杀该营从事与科研活动相关的囚犯，大约有数千名囚犯被杀害；仅4月13日一天，党卫军看守就枪杀或烧死1 016名囚犯。在整个集中营存在的不到两年时间内，另有两万多名囚犯死于饥饿、疾病和折磨。

### 第三节 大屠杀的尾声——死亡行军

1944年10月下旬，希姆莱下令奥斯维辛集中营停止使用毒气室杀害犹太人，以后并要求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释放数千名法国、丹麦等国的女囚。然而，希姆莱没有下令全面彻底地终止对集中营囚犯特别是犹

太人的屠杀，经过长期纳粹教育而变得凶残成性的党卫军刽子手，尤其是集中营男女看守也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犹太人的杀戮仍在继续，只不过杀人的规模有所减弱；直至第三帝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4年秋天，由于苏军全线攻入波兰境内，纳粹设在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施图特霍夫（马伊达奈克集中营此前已撤退完毕，集中营工作人员和囚犯已并入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及许多中小型集中营、劳动营不得不开始向西撤入德国境内。对集中营囚犯的“死亡行军”就此开始。死亡行军是大屠杀的继续和尾声，是犹太人囚犯的又一次劫难。鉴于纳粹当局对犹太人最后解决的政策并未取消，负责押解集中营囚犯的党卫军和集中营看守，对非犹太人囚犯和犹太人囚犯采取了存在重大差别政策。包括俄国囚犯在内的欧洲各国囚犯在撤退时，一般都得到了一定数量的食品和服装，住宿时有房子供栖息，走得筋疲力尽跌倒在地，遭到的只是殴打或被遗弃，因此，绝大多数人活着到达新的集中营。而对于犹太人，看守们的态度则10倍的凶残。他们在撤退时往往得不到食品和衣物，甚至连水也不给，任何个人的物品均被没收；住宿时往往住不上正经的房子，能住进马厩即属不易，一旦筋疲力尽无法继续行走，就会遭到就地枪决的厄运。这样一来，经过死亡行军，犹太人囚犯的死亡率常常达到20%甚至更高。以奥斯维辛的撤退为例，1945年1月17日，该营的绝大部分囚犯被党卫军押解着，走向通往德国内地集中营的艰难道路。在总计10万名左右的囚犯中，大约90%是犹太人，抵达德国指定地点后，至少有1万名犹太人在途中因饥饿、劳累、疾病和枪杀而死去。再如，1945年1月20日，关押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一个卫星营施莱西尔希的970名犹太女囚，被党卫军看守驱赶着走上前往格伦堡的路程。她们走了八九天，只走了60英里。一路上就有150人死去，其中130人因体力不支遭枪杀，另外20人死于饥饿和劳累。抵达格伦堡的第三天，幸存的犹太妇女和格伦堡的犹太女囚共1100人，又被驱往德国巴伐利亚弗洛森堡集中营的卫星营赫尔姆布列希茨，五个星期以后到达该地，女囚的总人数下降到621人。1945年4月13日，又一次死亡行军开始，580名犹太人女囚踏上西行路。

幸好这次死亡行军未能完成，行进到5月6日，她们被美军所解放。这时，已有275人永别了人世，剩下的女囚因为过度疲劳和严重营养不良，个个显得面容憔悴，虽然她们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姑娘，却被营救她们的美军官兵误认为是一群老太婆。

此外，1999年刚刚被公诸于世的“帕尔姆尼肯”大屠杀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1945年1月，大约7000名来自波兰境内集中营的匈牙利和立陶宛犹太妇女，被党卫军押解着踏上通往哥尼斯堡（今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的死亡之旅。她们大都只穿着不能遮体的破烂衣衫，拖着笨重的木鞋，她们冒着刺骨的凛冽寒风，不停气地走了两天两夜，来到尚在德军控制下的海滨小镇帕尔姆尼肯。由于饥寒交迫和党卫军的毒打、枪杀，已有3000人左右死于途中。剩下的4000人被暂时关押在一家废弃的厂房中。4天之后，党卫军刽子手将她们分成50人一组，分批押送到海滨，用机枪疯狂扫射。即使当场未死的，也被刽子手们拖到一个矿井内杀害。最终，仅仅多拉·豪普特曼等极少数人因迅速跳入大海而幸免于难。正是因为她们的揭露，这宗惨案才得以大白于天下。尽管苏军对这桩惨案有所了解，但某些将领出于冒功领赏等原因，将有关资料作为绝密文件严密封存，使其真相久久不为世人所知。

据专家估算，仅在“死亡行军”阶段，即1945年1月初至5月初的4个月里，就有10万名左右的犹太人惨遭杀害。

经过特别行动和集中营、死亡行军三个阶段的大屠杀，战争结束时欧洲的犹太人剧减了2/3，由960万人降为320万人左右。

## 第四章 纳粹战犯的人员构成

1938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欧洲人口总数为39 060万人，而战争结束的1945年欧洲人口总数为38 090万人（苏联人口未计算在内）。如果没有战争，根据以往的出生率和死亡率，6年期间欧洲总人口本应净增1 200万人，但实际上净减少了1 000万人以上，加上苏联损失的2 800万人，欧洲总人口损失了5 000万人左右。这在欧洲历史上无疑是一场空前的劫难。

在当时德国8 000多万居民中，尽管绝大多数公众对纳粹的暴行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但毕竟不应由他们承担战争责任，应当对战争罪行负责的只是纳粹分子——他们仅占德国总人口11%，亦即800多万名纳粹党员及附属组织成员、上百万名党卫军官兵和秘密警察、数万名涉嫌直接屠杀和平居民的国防军官兵（例如1941年10月在塞尔维亚制造克拉古耶瓦茨大血案，1942年8月在苏联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进行大屠杀的德国陆军两支部队的官兵）。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罪行较轻，真正应对战争罪行负主要责任的，乃是其中的决策者与骨干分子及积极参与者，亦即战争罪犯（以下简称战犯）。

### 第一节 纳粹战犯的确认标准及其规模

纳粹政权肆虐12年以上，其犯罪行迹遍及欧洲17国和北非大陆，其党徒和杀手，为数之多，竟高达全国居民总数的1/10以上。因而，纳粹战犯的规模远比一般人想象得要更多。对纳粹战犯通过公开审判加以惩办的思路是反法西斯盟国经过多年的探讨、协商后逐步产生的：第二

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纳粹当局对犹太人、战俘的大屠杀尚未开始，对重残病人的谋杀尚处于极端秘密状态，因而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从大战爆发到入侵苏联，由于各国均忙于战事，一时也不可能发现纳粹德国的大量战争罪行。只是到了1941年下半年，纳粹分子在苏联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战争罪行才逐渐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1942年，纳粹当局推行灭绝犹太人的“最后解决”计划又由抵抗运动人士通过瑞士传送到盟国手中，于是引起国际社会的无比愤慨和高度重视，审判和惩办纳粹战犯的思路由此逐步形成，也才有可能提上盟国政府的议事日程。这一过程的主要环节如下：

1941年12月4日，苏联政府以斯大林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在战争结束后，将对希特勒等战犯进行严正的审判。同年，迁至伦敦办公的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八国流亡政府，成立了专门研究惩办战犯的联络会议。次年1月3日，该联络会议发表《圣詹姆斯宣言》，确定了通过司法程序来惩办纳粹战犯。1943年10月，该会议初步提出了纳粹战犯名单。

1943年10月27日，美、英、法、中等17国政府成立了联合惩办轴心国战犯委员会，以英国内阁处置战犯委员会主席维斯康特·西蒙大法官为主席。

1943年10月30日，美、英、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闭幕时，通过了《关于希特勒分子及其战争罪行责任问题的宣言》。该宣言由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署名，宣布“二战”结束后将追究和惩办纳粹德国的种种暴行。主要内容为：盟国已查获纳粹德国军队和党卫军在许多国家所犯下的暴行、屠杀以及执行集体死刑的罪证。为此，苏、美、英三国代表32个联合国家的利益严正宣告：凡曾经负责或同意参加上述暴行的德军官兵和纳粹党徒，将被解回到他们所犯罪行的国家进行审判和惩处，必定要追赶他们到天涯海角，将他们交给控诉他们的人，以使正义得到伸张。对于首恶元凶，他们所犯罪行并不限于特殊地域，他们将依照盟国政府的共同决定加以惩处。此宣言成为战后司法追究和惩治纳粹战犯的原则基础。

根据美、英、苏三国首脑开罗、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达成的共识，三国和其他盟国就确认战犯规模和追捕、审判战犯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在三强德黑兰峰会（1943年10月28日至12月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式提出惩罚主要战犯的建议，他要求拟定一份包括希特勒、墨索里尼匪帮在内的战争罪犯的名单，该名单应涵盖联合国32个成员国根据国际法庄严公布的50—100名战犯，并通过一个由法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加以审查、确认。无论哪个成员国处决该名单上的战犯，都不会受到其他成员国的任何责难与处罚。丘吉尔进一步提出建议：该名单上的任何一个人只要落入盟国军队或地方武装力量手中，当地最高军官或与少将相当的官员有权立刻召集调查委员会，确定被告的犯罪材料，一旦证据确凿，该官员可在6小时内将战犯处决，无须征得上一级官员的意见。

丘吉尔重申了他关于即刻处决名单上最主要战犯即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的观点，并要求该委员会尽快拟出一份50—100名德、意、日三国主要战犯的名单。英国外交部认为这50名主要战犯应包括33名德国人和8名意大利人。英国政府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则认为，战犯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纳粹党成员，“那些破坏先前为从事光荣职业的人所接受的战争原则的战犯，如托词他们是执行德国政府的命令而逃脱惩罚，是令人不快的”，艾德礼认为还应惩罚那些对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提供经济支持的大工业家。

1944年2月15日，西蒙大法官领导的联合惩办轴心国战犯委员会，提出了对丘吉尔于3个月前提交战时内阁的原计划重新研究后的看法，宣称：现在应公布一份发动战争的政治核心人物的名单。联合国在适当时候要公布他们发动战争的野蛮手段，严正宣布他们为国际战犯。

同年，在伦敦起草惩罚战犯的三国代表，联合发表了一项谴责纳粹德国在欧洲被占领地区所犯暴行的宣言。它庄严宣布：“只要在德国可能成立的任何政府一旦无条件投降，就必须把那些对大屠杀暴行负有责任的或自愿参加的德国官兵、纳粹党成员遣送到遭到他们蹂躏的国家，以便根据这些解放了的国家和即将成立的自由政府的法律进行审判、惩

处……无论在何地制造暴行的主要战犯都将受到同盟国各国政府共同决定的惩罚。”

同年3月中旬，莫斯科主要报刊均长篇登载了苏联政府调查德国暴行特别委员会的一项通告，指出德国人除杀害大批战俘之外，还谋杀了200万苏联公民，而且仍在准备类似的大屠杀。这个特别委员会公布了必须为此承担罪责的战犯名单，强调必须加以严惩。

1945年2月，美国新任国务卿爱德华·斯蒂丁纽斯、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和总检察长弗朗西斯·比德尔共同签署了提交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他们建议：不但要起诉纳粹德国领导人以及如冲锋队、党卫军和盖世太保这样的组织犯下的残暴罪行，而且要起诉与他们共同参加的包括广泛的、罪恶的冒险行为，或者计划制造暴行的机构和个人的罪行。他们要求将德国最高领导人交付国际军事委员会或军事法庭审判。

1945年4月初，苏、美、英三国外长伦敦会议开始讨论盟国对待战犯的共同政策。美国代表团团长塞缪尔·罗斯曼提议把战犯划分为三大类：一类是首要战犯，另一类是可被证明作为战争暴行的参加者或煽动者的普通战犯，中间则是一大批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领袖及积极分子。

1945年6月22日，美、英、苏、法四国外长开会，商定了审判纳粹战犯的诸方面的具体问题。

1945年8月8日，美、英、法、苏四国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办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伦敦协定，共7条，主要内容包括：

1. 建立国际军事法庭，“以审判那些罪行没有特殊地理位置的战犯”；
2. 国际军事法庭的组织、管辖和任务，根据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
3. 各签字国应采取必要措施以便利对于各签字国所拘留的并将由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主要战犯的罪行进行侦查和审判，应尽最大努力以便利对于不在任何一个签字国领土内的主要战犯的罪状进行侦查，并由国际军事法庭予以审判；



4. 本协定不影响 1943 年 10 月 30 日《苏、美、英三国关于德国暴行的宣言》关于将战犯解回他们犯罪国的规定，也不影响为审判战犯在任何盟国领土内或在德国建立的或即将建立的任何国家的或占领军的法庭的管辖或权力；

5. 联合国的任何政府都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加入本协定。截至 1945 年 12 月 22 日，有澳大利亚、捷克、比利时等 19 个国家加入。

此外，四大盟国还通过了建立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30 条，确定苏、美、英、法四国各自派出两名法官，组成审判团，从而为顺利进行纽伦堡审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久，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成立。

基于以上有国际权威的会议文件，盟国在德国和许多被纳粹侵占的国家组织了一系列军事法庭、刑事法庭，于 1945 年 5 月已初步确定了多达 10 万余人的纳粹战犯名单，其中除数十名首要战犯外，还包括尤塞夫·门格尔、克劳斯·巴比（名列第 239 号）这样的乙级战犯。战后，经过深入核查，战犯名单上的一小部分人因缺乏足够的起诉证据，而被撤销战犯身份，如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任职的党卫军医生威廉·明希。

## 第二节 纳粹战犯的数量究竟有多少

够格的纳粹战犯的确切数字究竟是多少？联合国和有关盟国均未提供口径一致的系统翔实资料，但享有国际权威性的追缉纳粹战犯的民间组织——设在美国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认为，以上三类战犯的总数合计为 15 万人左右，其中至少包括近两万名党卫军官兵（内含上万名纳粹集中营男女看守，其中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军男女官兵即达 3 342 人——1944 年 9 月 8 日数字）和 7 万名秘密警察、保安警察。据设在西德路德维希堡专门调查纳粹战争罪行的 Z 委员会估计，各类纳粹战犯的总数达 17 万多人。据估计，在纳粹战犯总数中，女性至少占到 1/10，她们主要是为数达 5 000 多人的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党卫军骷髅队的女看守，数以千计的女性专职党团骨干，总数为近千人的参与杀害

“劣等种族”和战俘的党卫军女医生、女护士、女药剂师、女工程技术人員，数百名从事“种族卫生、无痛死亡”与活人试验的女科学家、女教授、女学者，纳粹军、政机构中的数以百计的中层及中层以上的女性官员，特别行动队中的几十名女性。但是，在甲级战犯中，只有两位女性：曾影响纳粹党中、后期不少重要决策的宣传部长戈贝尔之妻、希特勒的密友玛格达·戈贝尔和纳粹妇女组织全国首领汉娜·莱奇。此二人均曾积极参与纳粹党高层的有关发动侵略战争的密谋策划活动。例如，1940年初，汉娜·莱奇就曾主动向希特勒本人献策，主张使用DF-230型滑翔机装载精锐小部队，向比利时视为固若金汤的艾伯特运河防线的要害部位——艾马尔要塞实施突袭，结果此计得逞，使得比利时投入陆军半数兵力固守的该要塞仅在两天内即被攻陷，随即造成首都布鲁塞尔因无险可守而很快沦陷，比利时政府也被迫于次日向纳粹德国宣布投降。

### 第三节 艰巨复杂的取证工作

濒临死亡的纳粹匪徒在覆灭前拼命地杀害证人，千方百计地销毁罪证，给盟国调查人员的取证、定罪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纽伦堡审判的准备工作，曾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因此陷入裹足不前的困境。但是，经过盟国调查人员、各国抵抗组织、集中营幸存囚犯与广大战争受害者、国际反法西斯人士的通力合作，查证工作又较快地出现突破，取得长足进展。

早在1943年下半年，嗅觉敏锐的鲍曼和希姆莱就感到大事不妙，开始布置下属销毁罪证。为此，至少有一个名叫“101特别行动队”的专门性组织奉命组建，其头目是党卫军少校保罗·布罗拜尔。他们的任务不是杀人，而是把1941—1943年春被4个特别行动队杀害的上百万犹太人、和平居民的遗体，挖掘出来并彻底焚烧掉。随着苏军胜利前进的步伐日渐加快，“101”也拼命加速工作步伐，他们甚至也雇用了一批自认为靠得住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帮忙。孰料，这些人

中的一部分竟成为后来在审判纳粹战犯法庭上指控他们的证人。到头来，“101”也未能全盘完成任务，只干完总量的1/3。但这毕竟给取证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例如，纳粹分子焚毁了巴比雅尔惨案中大部分受难者的遗体，以致起诉书的提出受到延误。由于纳粹分子特别是党卫军到处杀人行凶，所设的屠场难以尽数销毁，被苏联执法部门发现了大量罪证：在乌克兰的罗夫诺地区，发掘出2 000多个大坑，每个坑内掩埋尸体100—10 000具；在拉托维亚首都里加郊区的比克尼克、伦布里两座大森林内，发现填满死尸的特深大坑几十个，总面积2 800多平方米，挖出被害者遗体近10万具。

到了1944年下半年，大势已去的纳粹屠户们开始全面销毁罪证。这次，工作的重点是各个集中营、灭绝营。鉴于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在匆忙撤离中，遗漏掉大量档案文件，为苏军所缴获，负责管理集中营事务的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一再对奥斯维辛等集中营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尽早行动，全面考虑，认真彻底地毁掉一切人证、物证。1944年8月，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局即将一批设备和档案转移到远离战场的格罗斯-罗森集中营。1945年新年一过，奥斯维辛销毁罪证的工作已进入高潮。政治部、管理处、医院、医学试验室、焚尸场的所有文件、档案、名单、登记表、卡片统统被付之一炬。杀人过百的两个恶魔医生克劳贝格和舒曼，连同未经启用的人工受精设备，也被早早地秘密转移到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对于在各个部门协助工作的女囚，借口打防疫针，把她们毒死了。对于最掌握纳粹分子杀人底细的焚尸场工作人员（几乎全部是犹太人），则不能按照惯常的办法干掉他们，否则会逼迫他们暴动。于是，他们大部分被“借调”到毛特豪森等集中营帮忙，在那里被杀害。还有一部分，在奥营撤退时遭到枪杀。1月下旬的头几天内，在借调来的党卫军工兵部队参与下，比克瑙焚尸场的4座焚尸炉相继被炸毁。此后，集中营的大小官员和男女看守才撤离集中营。几天以后，党卫军的一个小分队，再次返回集中营，又杀害了一大批知情较多的男女囚犯。1月27日，当苏军冲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及比克瑙、布纳两个分营时，他们得到的罪证只剩下仓库中的部分掠夺自囚犯的一批衣物，

焚尸坑中的人油以及 7600 名奄奄一息的重病囚犯。由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档案材料荡然无存，就连在该营遇害的囚犯人数，盟国调查人员都难以确定。但仅仅根据纳粹分子撤退时未及销毁的长发，专家们断定这些头发至少取自 14 万名受害妇女。纽伦堡审判时，法庭使用了苏联方面提供的数字——400 万。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以司法界权威达维多夫斯基教授为首的波兰国家调查纳粹罪行委员会确认的数字则为 550 万。直到 90 年代，这一数字仍在不断变化中，波兰政府最终确认为 150 万以上。这样一来，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各个纳粹战犯的身份确认，主要依靠集中营内幸存囚犯提供的数字及犯罪事实。至于德国境内的各个集中营，如达豪、贝尔森、拉芬斯布吕克、弗洛森堡、毛特豪森、布痕瓦尔特等，由于它们大部分是由美、英盟军解放或是通过囚犯暴动自行解放的，纳粹战犯几乎悉数就擒，档案文件也大部被缴获。解放集中营时最为顺利的当数贝尔森集中营。司令官克拉迈和他的情妇、副长官伊尔玛·格蕾泽当时正在饮酒作乐，不料美军部队好似从天而降，尚未反应过来，已被戴上手铐。其他要员，如副长官赫斯勒、女营看守长伊丽莎白·福肯哈特、党卫军医生克莱因以及 50 多名党卫军女看守、200 多名男看守，几乎无一漏网。营中的档案文献，也尚未进行多少破坏。因此，对这些集中营的纳粹战犯，比较容易定罪。

另外，盟国的军事情报机关、被占领各国的抵抗运动组织，甚至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灭绝营中的许多囚犯，也为调查战犯罪行、确认战犯身份做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提出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囚犯们建立的的国际抵抗组织。其成员在极为艰险的条件下，编制了该营罪恶活动大事记，给每一名主要的党卫军军官建立了罪行档案，甚至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抵抗运动组织成员大卫·斯莫列维基，在刽子手莫尔的眼皮底下，将微型照相机夹藏在表层在燃烧的沥青堆底部带人焚尸区，巧妙地拍摄了纳粹看守驱赶大批被迫脱光衣服的匈牙利犹太妇女进毒气室，在林间空地上焚烧上千具被害者尸体的场面，从而为审判霍斯、莫尔等战犯提供了确凿的罪证。就连被集中营当局视为核心机密的绝育试验场所——10 号楼内，也有饱受摧残但经历九死一生而幸

免于难的少数女囚，登上了纽伦堡法庭的控诉席，以亲身经历揭露了克劳贝格、舒曼、维尔茨等恶魔医生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居住在巴黎的犹太妇女豪泽尔即是其中之一，她腹部不止一条的深重手术疤痕，使再能言善辩的纳粹战犯，也只得俯首认罪。

至迟从1942年起，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们就建立起秘密抵抗组织，人员遍及奥斯维辛主营、比克瑙第二分部、莫诺维茨第三分部的各个角落，从工厂、工地到农场，从毒气室、焚尸场到医院，从秘书处到司令长官的家中，甚至在被纳粹分子视为核心机密的活人试验室——奥斯维辛主营10号楼内，都分布着抵抗运动的秘密成员。抵抗组织的领导集团（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苏军战俘）暗中教育男女囚犯，不要只看到焚尸炉每天都在吞噬几千人的生命，也应看到纳粹分子伤天害理、灭绝人性，他们必然会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和惩罚。我们就是牺牲了，也要千方百计搜集他们的罪证，为以后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做好准备，绝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当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遭到惨败的消息，悄然传入集中营以后，广大囚犯更觉得有了盼头，同敌人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倍增。他们每人每天秘密记录下敌人的一举一动，每一件罪行，给每一名党卫军官兵、医生护士甚至为虎作伥的“卡波”建立了罪行档案。正是靠着许许多多无名英雄的奋斗和机智，集中营内纳粹分子中谁的罪恶已达到战犯标准，谁已接近战犯的边缘，盟国审判人员基本上心中有数。凭借抵抗运动成员们一点一滴搜集的材料，“二战”后波兰调查纳粹德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竟出版了一部长达上千页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大事记》。所以，1947年波兰政府组织的华沙和克拉科夫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进行得相当顺利。翔实、系统、确凿的罪证在手，不怕纳粹战犯不老实地低头认罪。1944年春天，纳粹德国由于在各条战线接连败北，而大大加快了灭绝犹太人的进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抵抗组织获悉这一重要情报后，决定派两名同志设法逃出，把他们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报告匈牙利犹太人组织和国际犹太人组织。最后选中的人选是尤里卡（真名维克多·罗申）和菲尔斯，他们都是年轻的斯洛伐克人。尤里卡从1942年6月被关进奥斯维辛，他首先做清

#### 第四章 纳粹战犯的人员构成

理囚犯物品的工作。担任这一工作的小队设在奥斯维辛主营。每当有装载囚犯的军列开到，清理小队就被派去接车。他们先把车厢里的尸体拖走，再把车上的所有行李分类堆放好，然后再去收缴那些被送进毒气室的大部分囚犯的行李物品，并将其分别装进各个专项仓库或直接运往德国。在10个月时间内，他都在现场工作，得以把每趟列车的发车地点和车上人数一一记在心中。1943年6月，尤里卡被调到比克瑙分营，担任囚犯情况的登记统计工作。这项工作使他有会同新人营服苦役的囚犯个别接触，从而得以了解集中营各方面的详尽情况，还可以通过新到囚犯手臂上刺下的号码，推算获悉受害者的总人数。尤里卡的公开身份，也对他掌握全营囚犯的综合状况提供了便利。集中营当局委派给他的任务是定期地把囚犯登记处内囚犯登记情况统计汇总，然后上报给奥斯维辛主营的政治部。这样，他就可以把官方统计和私下了解两方面结合起来，掌握关于不断运抵奥斯维辛的犹太人总数量的相当准确的第一手情报。作为登记员，尤里卡每天有权在比克瑙营区各个区段之间自由往来。他经常随身携带纸、笔，借登记之机，走进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内，隔着铁丝网与捷克犹太人悄悄地沟通情况，交流信息。每当政治部决定屠杀某个营舍囚犯的前两天，党卫军看守就会对该营舍实行宵禁，并把根据号码准备处死的那些囚犯转移到尤里卡所在的隔离营内。面临死亡的囚犯往往能无所顾忌地向尤里卡提供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菲尔斯也是一个掌握集中营大量情报的登记员。他所在的分营内设有行刑场，每天纳粹刽子手在那里枪杀、绞死和打死囚犯。作为登记员，他可以从刑场直走到停尸棚，纳粹的屠杀情况都被菲尔斯记录在案。这两个有心人，在无形之中把1942年4月至1944年4月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和行刑场杀害囚犯的具体人数、国籍，各个分营、营舍的性质和范围等多方面资料全部掌握在心中。另外，他们根据集中营当局在1944年1月15日开始动工建造铁路侧轨，并一再要求加快施工进度以及党卫军看守们戏称该项工程为“匈牙利香肠”、“匈牙利100万单位”等细微情节中，敏锐地洞察到纳粹即将对100万匈牙利犹太人大展屠刀的险恶用心。1944年4月7日至10日，尤里卡和菲尔斯在难友的全力掩

护下，成功地逃离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并于十几天后通过一位斯洛伐克医生，将这些珍贵的系统情报交到匈牙利犹太人救援委员会领导人鲁道夫·卡斯特那和约埃尔·布兰德手中。以后，由于匈牙利犹太人的社团领袖对纳粹大屠户艾希曼抱有幻想，轻信了他的“血换卡车”的谈判条件，拒绝公开纳粹即将在奥斯维辛大规模屠杀匈牙利犹太人的罪恶计划，终于使50多万同胞被驱逐到各个集中营。从这一角度看，尤里卡和菲尔斯的情报似乎没有发挥作用。但是，在不久举行的纽伦堡审判和更往后举行的两次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看，二人冒着生命危险所携带出来的全套情报，无疑发挥了震慑集中营各个战犯的决定性作用，迫使他们一一低头认罪。从奥斯维辛审判案的罪魁祸首鲁道夫·霍斯，到活人试验的主持人卡尔·克劳贝格医生再到毒气室负责人穆斯菲尔德，无一例外。

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案所涉及的纳粹战犯罪行确认，发挥了关键作用的还有在主营管理机关工作的捷克女囚、建筑师薇拉·芙尔吉诺娃。经过集中营内地下抵抗组织一名负责人、法国女囚玛利亚的争取，她怀着为刚刚被纳粹分子在毒气室杀害的母亲报仇血恨的强烈愿望，从1944年初开始，冒着随时可能被抛进焚尸炉活活烧死的极大风险，为地下抵抗组织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其中最大的贡献是绘制成比克瑙分营详尽的平面图。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薇拉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首先，她开始加倍地努力干活，受到纳粹长官的称赞和信任；她还要强装笑颜，与那一帮她恨之入骨的刽子手们拉关系、套近乎，陪他们跳舞、喝酒、打牌，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一次通宵达旦舞会后，营建办公室主任把装有分营平面图和其他机密文件保险铁柜的钥匙交给了薇拉，还喃喃地说：“小姐，我把你当做我们德国人一样看待。”一天晚上，薇拉借口加班，下班后依然留在办公室里。趁着夜深人静，她从保险柜中偷偷取出平面图，并在一些懂专业技术同志的帮助下，一张一张地进行微缩。干秘密工作时，她必须把更大的精力放在房门上，严防敌人突然闯入。几番奋战后，一张完全达标的平面图，交到了抵抗组织手中。从而，这个死亡工厂的基本框架和各项职能，被送到盟国调查人员手中。

比克瑙分营主要由 8 个部分组成：

1. 集中营本部，这是关押囚犯的地区。两条东西向的主要道路把囚犯营区分成 B1、B2 和 B3 三部分。分营的大门坐东朝西，在 B1 和 B2 两个营区之间。B1 营区包括两个大型营舍，即 B1a 和 B1b，均建于 1941 年。这一部分也就是女囚营的主体部分。B2 营区包括 7 座营舍，中间横贯着一条南北向公路。路的东侧有 3 座营舍，即 B2a、B2b、B2c；路的西侧有 4 座营舍，即 B2d、B2e、B2f 和 B2g，建于 1942 年。这个营区本是男囚营区，后来因女囚大量到来，其中的 B2a 和 B2b 营舍被划归女营。上述 9 个营舍每个均可容纳 2 万人，计划总共关押 25 万人。B1 和 B2 两个营区之间存在一条铁路，它的两侧分别是壕沟和医生挑选新来囚犯的所谓“死亡站台”。B3 区原来计划是关押各国战俘的地方，后因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全部竣工，也基本上未能充分使用。

2. 焚尸场。这是比克瑙分营，也是整个奥斯维辛集中营最重要、最具特色的建筑物。其规模在整个第三帝国范围内是最大的，其他集中营、灭绝营远远难以比拟。它包括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这四个焚尸场，至于第一焚尸场，是指最早建立在主营的那个焚尸场。四个焚尸场共设有 46 个大小焚尸炉和 8 间毒气室，每间毒气室至少可容 1500 人，较大的可容 2 000 人以上。第一、第二焚尸场规模较大，毒气室和紧密相连的脱衣室均设在地下；第三、第四焚尸场规模稍小一些，毒气室设在地上，以相毗连的一个树林代替脱衣室。此外，分营还拥有两个由其他建筑物改建的毒气室，当局称为第四号库和第五号库。

3. 洗浴和消毒站。此处确实是不加引号的消毒站。它位于第二焚尸场和第三焚尸场之间。凡是抵达后被纳粹医生视为不具备劳动能力者，被党卫军看守引入毒气室“洗浴”；而那些被视为仍具备劳动能力者，则被送到此处进行实实在在的洗浴，还要剃掉头发，换上条纹囚衣，从此成为奴隶。

营区、焚尸场和消毒站构成比克瑙分营的主体建筑群。整个营区都用双层高压电网环绕着，沿着铁丝网每隔 50 米就设一个瞭望塔。每个营舍周围都围着铁丝网，禁止不同营舍的囚犯进行任何串联。



4. 集中营管理人员生活区。这是3 000名党卫军男女看守、管理人员、驻营医生护士、各部门官员的宿舍区，位置在营区之外。此间的各所营房都装置了暖气和热水设备，并设立了医疗设施齐备、先进的党卫军医院。

5、6、7、8分别为水塔、警犬舍、储存站和农业基地。

可见，这张平面图足以作为揭露纳粹战犯们使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杀害上百万和平居民的罪恶体制的证据。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另一个分营——莫诺维茨（布纳）分营的平面图，保存在另一间办公室的保险柜中。薇拉曾多次试图进行拍照，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得手。最终，由那里的囚犯、另一个捷克人鲁道夫·哈耶克向抵抗运动组织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情况介绍：布纳是法本工业公司化工联合企业的中心，纳粹德国在这里生产各种化学合成产品。它主要以附近的西里西亚蕴藏丰富的煤矿为原料，生产合成汽油及其他炭化物和药品。1943年，法本公司将其全部产品研制开发工作都集中到布纳，在此建立了63座试验室。法本公司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局那里购买囚犯主要是年轻女囚作为试验品，供63个试验室在她们身上进行研制新药品和新型化学试剂的试验，上万名男女囚犯成为这些残酷试验的受害者，其中不少妇女被残害致死。其实，这些试验都是根据党卫军最高当局同德国主要化工企业达成的协议进行的。早在1941年布纳分营初建时，希姆莱就曾给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霍斯下达命令，要求他务必保证向法本公司提供所需数量的健康男女囚犯。纳粹医生克劳贝格、舒曼、门格尔、维尔茨等对女囚进行的各类绝育试验，往往是服务于法本、拜尔等大型化学公司的科研目的。

整个布纳分营的建筑群呈椭圆形，营区中间有8条纵向和8条横向的道路，把分营分割成若干个营区。铁路在纵向道路的中央通过，生产用的原材料和建筑材料由火车运进，产品则由火车运出。整个分营由多层铁丝网、电网和配置有机枪的瞭望塔包围着。分营内最大的营区是劳动营，内有54个棚房，一共可以容纳12 000名囚犯。棚房内的设施非常简陋，犯人们吃饭、休息和睡觉都只能挤在三层的木板铺上。由囚犯

#### 第四章 纳粹战犯的人员构成

营房到法本公司设在分营的工厂群有一条400米长的走廊，是囚犯们上下班的唯一通道，而走廊两侧有高压电网环绕。

至于奥斯维辛主营，因为盟国空军的侦察机已于1944年夏秋几次对其进行侦察拍照，基本掌握了它的主要情况，所以就无须营内抵抗战士再劳神费心了。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囚犯、维也纳一家医院的医生奥托·沃尔肯，也为审判战犯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证据。他被送进奥营后，因为职业是医生，被分配到比克瑙集中营（奥斯维辛第二分营）医院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他发现了纳粹医生们的卑鄙骗局：他们伙同集中营当局用各种手法杀死了数以万计的囚犯，却像煞有介事地开据出一张张死亡证明，厚颜无耻地写上某某囚犯因患何种病症死亡，住院多少天，医院采取了哪些救治手段。沃尔肯医生的心都快气炸了，他决心尽最大的努力揭穿这一阴谋。从此，他一面要承担纳粹医生们下达的繁重任务，一面小心翼翼地避开党卫军医务人员的监视，悄悄地用只有他自己才晓得其含义的符号在衣服上、纸片上、手帕上记下来。即使在集中营撤退时的“死亡行军”中，随时可能被死神呼唤的危难时刻，沃尔肯也依然把这些细心整理的小纸条随身带着，一点也不曾失落。自感精明绝顶的纳粹医生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竟栽倒在这些小纸条面前。在战后的一次集中营审判中，纳粹医生克莱因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护，在比克瑙医院工作期间，他不仅没有作恶，而且加班加点抢救了70多个垂危病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请稍等一下，克莱因先生，”法官打断了他的话，“1943年5月18日，你的确诊治过4名波兰犹太妇女，她们是玛利亚、乌尔苏拉、米拉和利利亚。作为行医多年的行家，你当然知道她们患上了慢性腹泻和营养不良。可是，你却命令党卫军护士格特路德给她们每个人注射苯酚。十几分钟后，你来检查结果，发现米拉还在喘气，就又给她打了一针，并一直盯到她断气。请问，这跟抢救搭得上边际吗？”克莱因哑口无言，虽则是深秋天气，额头上黄豆大的汗珠一个劲往下淌。他心中暗暗怒骂，“格特路德，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婊子，我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把你从东线调到奥斯维辛，你居然把老子出卖

了”。蒂洛医生看到克莱因的窘态，自知内部有人叛变，只得把调子降了一拍：“我给囚犯们做手术时发生过失误，造成了伤亡，我深表歉意。不过，我并非蓄意杀害病人。”“可是事实与你所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亲爱的蒂洛先生，”法官的言语中不乏讥讽，他满怀信心地从卷宗中抽出几张档案材料，对被告念道，“1943年9月7日，你休假后回到比克瑙。晚上，你拉上党卫军护士罗泽和玛利塔去‘练手’。在外科5号手术室，你给希腊犹太病人尤利乌斯做了胃切除，可是他不过是一般的消化不良。三天之后，比利时女囚罗拉患阴道炎找到你诊病，护士已拿来妇科用药，你却说‘把她的那个东西取出看看多有趣’，随后强行摘除她的子宫。诸如此类的恶意伤人的手术，你在年底前至少进行了5起。要不要我一件件念给你听？”“不必了，法官先生。这些事我确实干过，可门格尔、科尼希干得比我还多。”党卫军女护士索菲·普雷斯到底不如那些纳粹医生经得多、见得广，法官刚刚提起犹太婴儿的去向，她便慌了神，觉得已被人家摸了底，赶紧交代：1944年秋，根据爱德华·维尔茨主任的安排，她先后7次给刚出生的犹太婴儿注射毒剂，杀害了这些刚刚来到世界上的小生命。比克瑙分营女囚营首领赫斯勒，于1944年11月19日签署了杀害394名犹太女囚的名单。令人惊叹的是，这份名单的复印件当天就落入营内地下抵抗组织手中，11月21日，它又出现在波兰克拉科夫地下抵抗组织总部负责人的保险箱内，12月，它又进入伦敦盟军调查纳粹战争罪行专门机构的档案库中。一年以后，当赫斯勒在吕讷堡受审时，虽经法官一再提示，仍然拒不交代这一重大罪行。法官于是向他出示了这份来历非凡的复印件，赫斯勒顿时面如土色，浑身颤抖，几乎跌倒在地。

前奥斯维辛集中营女囚、波兰女作家谢维林娜·什玛格列夫斯卡娅，前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女囚、波兰女医生兹登卡·尼德文达尔·涅耶德拉和苏联女军医、前奥斯维辛集中营女囚、法国女作家瓦扬·古久里夫人，前拉芬斯布吕克女囚、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侄媳奥黛特·索姆逊等均曾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时出庭作证，揭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罪行。例如，涅耶德拉医生揭露的关于克劳贝格等纳粹医生在

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多次对 10 岁以下的吉卜赛少女进行强制绝育手术的罪行，即属于集中营当局的绝密行动。他们在杀害了许多可能知情的囚犯护士以后，自以为是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

布亨瓦尔特、拉芬斯布吕克等集中营的抵抗组织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基本掌握了主要战犯的犯罪事实。

接管和查获纳粹党、第三帝国、德国武装部队以及党卫军、各类纳粹组织的系统档案，是确定战犯身份、认定战犯罪责的重要依据。从 1945 年 5 月起到 1946 年底，美、英、苏军中的情报专家与情报人员查获了纳粹分子隐藏到矿井、山洞、坑道、地下和偏远山村中的大量纳粹档案。纳粹政权收藏和保管这些档案的地区中心在其统治的最后一年里增加到 12 个。到 1945 年底，纳粹党中央及地方组织、被取缔的 62 个纳粹主义附属组织和管辖单位以及第三帝国军械和军工生产部等部门的档案，已被英美盟军掌握。1946 年春天以来，纳粹德国外交部、驻外使领馆、海军、空军的档案，也被盟军掌握；盟国情报机关还掌握了有关集中营囚犯状况、被驱逐的犹太人以及第三帝国的国外受害者情况的档案。到 1948 年，第三帝国总理府的档案也落入盟军手中。直到 1947 年 8 月，三大盟国仍在陆续不断地发现和接受重要的纳粹档案。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 1957 年才最终完结。其中，盟国在查获纳粹档案中收获最大的一次是在 1945 年盛夏的那次意外的接收：一天中午，率部巡逻了多时，正待进餐的美军上尉罗伯特，接到一位匆匆赶来的德国居民的举报：有人即将销毁档案。罗伯特立即整队出发，驱车前往慕尼黑远郊一座早已停产的造纸厂。作为厂区的古堡内，二三十个党卫军官兵，已点燃了一个足有小山高的纸堆，浓烟已开始升空。罗伯特和士兵们立即制止住敌人的行动，把这座大纸堆连同党卫军官兵一起押回来。经有关部门鉴定，这座大纸堆竟是原来认为早已被纳粹销毁的党卫军系统全体人员的卡片索引，第三帝国全国一共只有两套。美国军方和司法部门在包括战俘在内的大批德国人协助下，花费了两年时间才把这套珍贵资料复制、整理完毕。不言而喻，这套材料对缉拿纳粹战犯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 第四节 对纳粹战犯审判的序幕

开审判纳粹战犯之先河的是苏联，对纳粹战犯的首次国家级审判是由苏联政府进行的。根据1943年9月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和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签署的命令，同年12月15—18日苏联人民法庭在哈尔科夫对4名纳粹战犯进行了庄严的审判。这4名罪犯是：纳粹陆军上尉威廉·朗海尔德、武装党卫军中尉汉斯·里茨、警察地方机关首领莱因哈特·莱次拉夫以及一名俄罗斯卖国贼。他们被控积极参与了使用毒气车和机枪扫射等方法，对数千名苏联和平居民进行集体屠杀。12月19日，4人均被判处死刑；并于当日在有5000多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后公开执行绞刑，而且暴尸直到1944年1月中旬。此次审判，为以后各个盟国大规模审判纳粹战犯，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 第五节 纽伦堡审判

纽伦堡战犯审判案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刑事诉讼案。从1945年11月20日开始，四大盟国在纽伦堡开始对在押的纳粹战犯进行系统的审判和惩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传讯了200多名证人和140多名知情人，查阅了包括5500多份纳粹党和国家颁发的各种秘密档案在内的30多万份文件和书面材料，数以吨计，20万份代替宣誓的保证书，并有数以千计的受害者保证随时出庭作证，举行了403次公开审判。

1945年8月8日，经杜鲁门总统任命的美国首席检查官罗伯特·杰克逊到任，得到四大盟国的支持。四国共同确认了这次审判的合法性。法庭的地址最后定位在纽伦堡，而不是苏联建议的柏林，也不是英国建议的慕尼黑。苏联和法国作了让步，一致同意使用英美的法律程序。这次史无前例的审判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的德国一片混乱，大多数战犯早已逃得不知踪影。同时，纳粹战犯的滔天罪行是欧洲以往任何罪犯难以比拟的，这又给审判和量刑带来极大困难。四大

盟国初步拟定的应搜捕名单上列名 100 多万人，苏联要求对至少 20 万犯罪嫌疑人提起诉讼。

由于四大盟国和全世界正义、进步势力的支持，各方面事项都较快地出现了转机。在众多当地居民的密切配合下，盟国侦察人员在从挪威到意大利，从荷兰到希腊，从俄罗斯到法国的广大地域内，两个月内就抓获了几千名有分量的甲级、乙级战犯，其中在汉堡抓获到里宾特洛甫，在奥地利拘捕了卡登勃伦纳，在德国的英占区截获了召克尔，在贝希斯特加登抓到了莱伊，军火巨头克虏伯则落入加拿大宪兵手中。除先期已死亡的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畏罪自杀的戈贝尔、希姆莱以及执行死刑前夕才服毒毙命的党国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以及劳工阵线负责人罗勃特·莱伊外，纳粹甲级战犯可以说在纽伦堡法庭照了一张全家福合影。

纽伦堡法庭认定的有关战争罪犯的识别标准如下：

1. 被控犯有发动战争罪、破坏和平罪者定为首要战犯。

战争罪亦称“严重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罪”，战争罪是指有计划地或大规模地，特别是作为一项计划或政策组成，部分地实行各种严重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构成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犯罪行为。战争罪主要是指违反《海牙公约体系》和《日内瓦公约体系》。在纽伦堡审判中，战争罪被作为三项主要罪行之一受到审判和惩罚。根据《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六条，战争罪包括但不限于对被占领土或被占领土内的和平居民的屠杀、为奴役或任何其他目的而对平民的虐待或放逐，杀害或虐待战俘或海上人员，杀害人质，掠夺公私财物，任意毁灭城镇、乡村或非基于军事上必要的破坏。破坏和平罪亦称侵略罪，是指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一种经宣战或不经宣战的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法、条约或保证的战争，或参加为达到上述任何目的的同谋的犯罪行为。侵略罪以非法使用武力为主要手段，入侵或攻击另一国领土，侵犯另一国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严重地破坏了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严重地危害了世界和平与安全，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基本利益，是另一项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在纽伦堡审判中，侵略罪以“违反

和平罪”的名称被列为三项主要罪行之一受到审判和惩罚。此类战犯包括纳粹党、帝国中央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国防军、党卫军高级将领，统帅部成员。例如，帝国元首希特勒、纳粹党和政府第二把手戈林、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纳粹党秘书长马丁·鲍尔曼、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宣传部长戈贝尔、内政部长弗利克、劳工部长召克尔、东方部长罗森堡、驻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驻荷兰总督因夸特、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卡登勃伦纳、统帅部负责人凯特尔和约德尔、秘密警察的首脑缪勒等，共计122人（其中缪勒、鲍尔曼等一批人负案在逃）。

2. 被控犯有戕害人类罪和违反人道罪（当时“种族灭绝”的罪名尚未出台）的组织者，定为乙级战犯。违反人道罪是指有计划地或大规模地实行，由某一政府或组织或团体唆使或指挥的对任何平民的谋杀、灭绝、奴役、放逐和其他各种非人道行为，以及基于政治、种族和宗教等原因进行的迫害行为。这种罪行比战争罪的性质和危害性更加严重，不但直接对人类的生命和尊严造成严重后果，而且还严重地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严重地阻碍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反人道罪属于引起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的国际犯罪，属于国际罪行中“核心罪行”的范畴。与战争罪相比，反人道罪具有两个战争罪不具有的特点：一是它不仅可以对敌国国民实施，而且还可以对本国国民实施。反人道罪不仅可以发生在战争或武装冲突期间，而且可以发生在战争之前，甚至发生在和平时期。反人道罪包括11种罪行：谋杀；灭绝；奴役；驱逐出境或强行迁徙人口；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监禁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他人的人身权利；酷刑；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强迫受孕、强制绝育或其他严重程度相当的性暴力；基于政治、种族、民族、族裔、文化、宗教、性别，或根据公认的为国际法所不容的其他理由，对任何可以被识别的团体或集体进行迫害，而且与本款提及的任何行为有关的行为；强迫人身失踪；种族隔离；故意对他人造成重大痛苦，或对他人的身体或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其他性质类似的不人道行为。

上述纳粹党、政、军、党卫军、秘密警察的部门和地区负责人，专事屠杀和平居民的“特别行动队”负责人，集中营、灭绝营司令官和

政治部负责人，专门杀害重病患者的“处决中心”负责人，参与制订“种族清洗”的T-4行动计划的医生和科学家，组织实施惨绝人寰的人体实验的医疗部门负责人等，共计四五千人。

3. 上述罪行的实施者和执行者，被定为丙级战犯，包括直接杀害、严重虐待被占领国和平居民、战俘的党卫军、国防军官兵，特别行动队成员，秘密警察骨干分子，集中营和灭绝营看守以及参与对“劣等种族”进行非人道的活人试验、以医疗手段大批杀害犹太人、茨冈人、苏军战俘和重病患者的党卫军男女医生和护士，T-4护士等，共计10多万人。

经过将近一年的取证审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10月庄严宣告：以战争罪、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三罪并罚，判处第三帝国前外长里宾特洛甫、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劳工部长召克尔、东方领土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纳粹党中央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尔、驻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驻荷兰总督塞斯·因夸特、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卡登勃伦纳、武装力量大本营总参谋长威廉·凯特尔以及作战部长约德尔死刑；党和帝国前三号人物鲁道夫·赫斯、中央银行行长瓦尔特·冯克、海军总司令艾利希·雷德尔被判处终身监禁。希特勒主义青年团首脑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被判20年监禁；前外长康斯坦丁·冯·牛赖特被判15年监禁；第三帝国新任元首、前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兹被判10年监禁。仅纳粹党中央秘书长马丁·鲍曼负案在逃（被缺席判处死刑）。纳粹党中的财金奇才和传奇人物雅尔马·沙赫特，虽然为第三帝国的财政金融繁荣出过大力，但因参与谋杀希特勒的“七·二〇”事件，被对他不无好感的美英方面从宽处理，宣布无罪释放。被宣布无罪释放的还有前副总理冯·巴本和纳粹宣传鼓动家弗里茨彻。纽伦堡法庭还宣布纳粹党、党卫军、秘密警察、中央保安总局、中央种族移民局、武装力量总指挥部为犯罪组织，立即加以取缔。苏联政府的代表鲁坚科认为，纳粹党第三号人物鲁道夫·赫斯应判处死刑，沙赫特、巴本、弗利茨均应加以惩处，纳粹德国内阁、国防部也应定为犯罪组织。因美、英、法三国代表不予支持，鲁坚科的意见未被执



行。这次纽伦堡审判被称为对首要战犯的纽伦堡审判，因为紧随其后，美军占领当局又在纽伦堡对一大批犯有各类罪行的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纽伦堡审判也是基本公正、合理的，得到了历史学家和各国公众的认可，经住了时间的考验。

不仅是战争的受害国如此看待纽伦堡审判，就连德国公众的大多数也持同样的观点。1946年底，美国新闻调查机构在德国对数千名群众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80%的人认为纽伦堡审判是公正的，对战犯罪行的指控是无可辩驳的；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当对战犯处以死刑；只有4%左右的人持否定态度。

任何想从根本上或主流上推翻或否定纽伦堡审判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 第五章 主要战犯的归宿

### 第一节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的首要战犯

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年）

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头号纳粹战犯，对犹太民族和其他“劣等种族”进行大屠杀的始作俑者和最高策划者。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党魁、大德意志帝国元首兼总理。美国一些评论家认为他是最近1000年来最邪恶的统治者。

早在1937年，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斐迪南德·绍尔布鲁赫就曾对希特勒进行过心理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希特勒是那种人性介于魔鬼与疯子之间的家伙，对于人类来说将是一场大劫难，我断言希特勒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疯狂的罪犯。希特勒将作为前所未有的疯狂罪犯被人类终结。”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授权希特勒组织新一届政府，出任德国政府总理。上台伊始，希特勒就撕下社会主义者的假面具，暴露出自己作为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忠实代理人的嘴脸。2月7日，针对日益兴起、党员总数已达36万人的德国共产党，希特勒伙同戈林等纳粹党领导成员，精心策划了诬陷共产党人的“国会纵火案”，开动一切新闻媒体，大肆宣传共产党即将暴动、夺取政权，为血腥镇压共产党人进行舆论准备。在此后6周内，纳粹当局逮捕了包括德共主席恩斯特·台尔曼和议会党团主席托格勒在内的德共领导人和骨干分子1.8万人以及共产国际西欧局主席、侨居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格奥尔基·季米特

洛夫，蛮横地取消了德共在国会中的全部 31 个议席，最后于 3 月 14 日宣布取缔德国共产党。以此为契机，希特勒伙同戈林、戈贝尔炮制了《总统关于保护人民和国家的紧急法令》，并诱使兴登堡总统于 2 月 28 日晚颁发生效。该法将魏玛宪法给予国民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统统取消，宣布国家有权对公民的信件、通信进行干预，中央政府有权暂时接管邦、州政府，并将对叛国罪和叛乱罪的最高惩处由终身监禁提高为死刑。从此，在整个德国掀起了一个迫害、镇压德国共产党人的浪潮。此举也是纳粹党实施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先声。

1934 年 8 月 2 日兴登堡总统逝世后，希特勒自任元首兼总理。自此，他对内残酷镇压共产党和其他民主进步势力，取缔了除纳粹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就连那些老牌的右翼政党也未能幸免；并变本加厉地迫害犹太人，彻底剥夺他们的一切公民权，亲自发出要求最终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号召。对外则肆意践踏国际准则，破坏欧洲和平，疯狂发动侵略战争，力图扩张领土，建立囊括大半个欧洲的大德意志帝国。早在 1933 年 7 月，根据希特勒的授意，纳粹德国成立德国经济总委员会，开始逐步将德国经济纳入总体战争经济体制。1935 年 3 月 16 日，希特勒公然对抗《凡尔塞条约》，下令在德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并立即组建 36 个师共计 50 万人。从此，纳粹德国在扩军备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悍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亲自颁发镇压西欧各国抵抗运动的“夜雾命令”，并多次下令对被占领国家的抵抗运动实行“10 倍报复”的命令。1936 年 3 月 7 日，下令出兵占领莱因非武装区。1937 年 11 月 6 日，由纳粹德国发起，结成德、意、日三国反共轴心。1938 年 3 月 12 日出兵开进奥地利，同日，纳粹德国政府宣布：奥地利与德国合并，作为德国东部的一个行政区；3 月 15 日，希特勒在霍夫堡宫得意洋洋地说：“我向德国人民宣布我一生中所做的最伟大的事业。”同年 9 月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1939 年 3 月 16 日又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1939 年 5 月，纳粹德国同法西斯意大利缔结了钢铁同盟，互相保证在对方发动侵略战争时予以支持。

1939年9月1日，下令德军入侵波兰，悍然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把欧洲和世界蛮横地拖入血海之中。1940年，他勾结法西斯意大利、日本等国签订了“共同防止国际共产主义活动的协定”，图谋占领并瓜分世界各国。1940年4月1日，发兵攻占挪威和丹麦，5月10日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1940年8月7日，对英国实行全面封锁，并对伦敦等地进行狂轰滥炸；纳粹空军的野蛮轰炸，使得工业城市考文垂完全化为一片废墟。1941年4月6日，出兵侵占南斯拉夫和希腊；随即又出兵北非。1941年6月22日，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全面发动侵苏战争。1941年12月，又因纳粹海军潜艇悍然袭击美国商船，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并把战火燃烧到北非各国。

在被纳粹德国侵占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纳粹分子按照希特勒的指示，全面推行旨在灭绝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政策；希特勒在1939年11月1日下令：要把“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全部淘汰”，直接发出了杀害德国和被占领国家所有精神病人和重残病人的动员令。

1944年8月1日，华沙居民在伦敦流亡政府领导下，举行了反抗纳粹暴政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希特勒闻知咬牙切齿，下令把华沙夷为平地，不准留下一幢建筑，不得剩下一个活人。经他授意，党卫军和国防军部队屠杀华沙军民25万人左右，其中数万人是已经放下武器的战俘；另有数万名战俘被送进奥斯维辛等集中营杀害。曾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华沙也基本上不复存在。希特勒还曾给围攻苏联列宁格勒的部队下达旨意，要他们在攻陷该城后，立即放水淹没全城，不准放走一个居民。只是由于苏军坚守列宁格勒获胜，纳粹分子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1945年2月，英美盟军已从法国攻入德国境内。此时，就连希特勒最忠实的部下之一希姆莱，也对战争前景丧失信心，谋求以关闭灭绝营、释放集中营中的犹太囚犯来换取盟国的谅解。希特勒闻讯大怒，严厉制止释放犹太人，拒绝与一切同盟国进行谈判的尝试。由于他的顽固立场，终止战争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后果就是：至少又有上百万名各国官兵和数十万名犹太人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失去了生命。

1945年3月19日，鉴于第三帝国失败与灭亡的大势已不可扭转，希特勒颁布“尼禄计划”，即焦土命令的代号。该命令责成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和各个纳粹党大区领袖，在放弃他们所在地区时，施行最彻底的焦土原则，破坏一切军事、运输、通信、工业和供应设备以及全部资源。同月23日，由纳粹党办公厅主任马丁·鲍曼签发补充命令，责成纳粹党大区领袖全权负责，并规定即使是徒步转移全体居民亦应全部撤离。4月22日，希特勒面对大势已去、众叛亲离的局势，不得不承认德国已在战争中失败，但他仍坚持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叫嚣要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不惜把整个欧洲变成一片废墟。他曾说过：“如果我不能统率德国军队获得最后的胜利，我就拖着德国人民一起跳入失败的深渊。”的确，纳粹德国不仅给欧洲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也使500万名德军官兵丧生疆场，250万名官兵被关进盟国的战俘营，300万名德国平民死于战乱。

1945年4月30日，当苏联红军开始围攻柏林总理府之时，希特勒与多年的情妇兼新婚妻子爱娃·布劳恩一起自杀，逃脱了欧洲人民的正义审判。

由于希特勒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80多个国家面临战火，欧洲各国丧失掉4500多万生命，其中欧洲犹太人被惨无人道地灭绝了近600万人，苏联军民死难2800多万人，德国本国也有近800万军民死于战火。这是欧洲有史以来所蒙受的最大灾难。而希特勒本人也作为人类近现代历史上最大的战犯与恶魔而载入史册。

赫尔曼·戈林（1893—1946年）

长期以来担任纳粹党和第三帝国的第二把手，是一个应对纳粹各项侵略政策以及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负有直接责任的首要战犯。

赫尔曼·戈林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罗森海姆一个外交官家庭。中学毕业后进入卡尔斯鲁厄士官学校，从此逐步产生了日益浓重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19岁任步兵中尉，以后改行投身空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在德国空军著名的里希特霍芬狙击队任队长，军衔是空军上尉。战后，在丹麦、瑞典的民航部门任运输机驾驶员。1921年入慕尼黑大学学习，

此期间与希特勒结识，并很快接受了他的学说，次年，加入纳粹党。戈林是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最早和最主要的帮凶之一。他于1935年3月1日出任空军总司令。不到半个月，戈林即不顾《凡尔赛条约》的禁令，公然宣布重建德国空军，打响了纳粹德国扩军备战的第一枪。还在1936年5月27日，他就发出战争叫嚣：“一切措施要从有把握地进行战争这一立场出发。”1936年10月18日他担任帝国四年计划全权代表，负责动员经济力量，重整军备，并明确提出了“要大炮不要牛油”这种公开宣扬侵略战争的口号。

戈林又是纳粹德国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937年11月5日，戈林和其他5名纳粹党首要分子参加了霍斯巴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明确提出了要为德国谋求生存空间的问题，并获得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戈林在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事件中扮演了主要策划人之一的角色。他命令奥地利的纳粹党首领阿图尔·塞斯·因夸特，授意他致电德国政府，请求德国出兵平定骚乱。1939年5月23日，希特勒把戈林等军事首脑召集到柏林的总理府书房内，明确提出“根本不存在放过波兰的问题”。同年8月22日，戈林应希特勒召唤，参加了决定波兰未来命运的上萨尔茨堡会议，波兰制订了更为详尽的计划——白色方案。

1939年8月30日，在德军即将越过波兰边境之时，希特勒任命戈林为帝国国防委员会主席。1939年9月1日，即“二战”爆发的当日，希特勒发表演说，正式指定他为全权继承人。1940年7月19日，被希特勒授予“帝国元帅”称号，获铁十字大勋章。

戈林自1938年即被希特勒任命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高协调人。他不仅应对1938年11月8—9日柏林及其他各地发生的大规模迫害和杀害犹太人的暴行负有直接的责任，而且是对犹太人实行“最后解决”的始作俑者。正是由于他于1941年7月31日给海德里希下达的委托书明确提出了对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导致海德里希召开“万湖会议”和此后欧洲各国上千万犹太人被纳粹关押到集中营和灭绝营，最终造成其中的600万人惨遭杀害。另外，戈林也是导致盟国战俘在集中

营内惨遭杀害的“严厉措施”的3名始作俑者之一（另外两人是希姆莱和凯特尔）。

戈林是纳粹上层集团中靠战争大发横财的暴发户中的典型。1933年纳粹党上台之前，戈林同生产资料占有毫不沾边，然而从此以后特别是“二战”爆发后，他的财产与日俱增，成为纳粹德国少有的几十个超级巨富之一。1937年他利用掠夺来的不义之财建立了赫尔曼·戈林工厂以后，通过不断兼并德国的工业企业，特别是掠夺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工厂企业而日益扩大。1943年初，戈林工厂已拥有177家工业企业、69家采矿业和钢铁联合企业、156家贸易公司、46家运输公司和15家建筑公司，总资本从500万马克急剧增长为4亿马克。利用这些企业对本国工人尤其是对外国战俘、集中营囚犯的残酷剥夺，戈林购置了数不胜数的家产：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德国和被占领国拥有十余处豪华别墅、数百幅稀世名画与上千套超一流的世界驰名服装。

自1940年8月纳粹德国空军对英伦三岛的空袭失利以来，特别是自1943年7月英美联军因德国空军阻击不力、在西西里登陆成功以来，希特勒对戈林的不满日渐上升，因而戈林在纳粹党和帝国内的影响逐步下降。失宠后的戈林被希特勒委派分管征募和调配劳工，不再过问纳粹党和第三帝国的军政核心大政。1944年6月，纳粹空军在与苏联空军的决定性战役中再次失利，戈林的地位进一步直线下降，基本被排斥出纳粹最高决策集团。当苏、美、英三国空军轮番轰炸柏林之时，柏林市内损失惨重，希特勒大骂：“所有的空军都应该被绞死！”1945年4月20日，自感处境不妙、有可能被失去理智的元首慌乱中处决的戈林，悄悄地从柏林狼狈逃往慕尼黑，次日电促希特勒准许他“接管帝国领导权”。4月24日，被戈林的僭越行为气得火冒三丈的希特勒，下令罢黜戈林的一切职务，并以“叛国罪”将他逮捕。同年5月8日，尚未被押上已作鸟兽散的纳粹党的法庭，戈林却被美军俘获。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国际法庭对戈林的判决书指出：“事实证明戈林是纳粹政权中仅次于希特勒的重要人物。在他们关系恶化之前，戈林极大地影响

和帮助了希特勒，对他的量刑绝不能有所减轻。他的地位仅次于他的元首。戈林是发动侵略战争的领导人物，也是奴隶劳工计划的领导者，同时还是德国对国内外犹太人和其他种族实施压迫计划的主谋。所有这些罪行他都供认不讳……他罪大恶极，令人难以置信。对这个人，在全部审判记录中找不到任何宽宥的理由。”该法庭以策划侵略战争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判处戈林死刑。10月16日行刑前夕，由于不上绞架、改用枪决执行死刑的要求被法庭拒绝，戈林瞒过看守，掏出精心隐藏的毒药，服毒自杀，先期追随他的元首而去。

海因利希·希姆莱（1900—1945年）

曾长期担任纳粹党和第三帝国的第三把手，纳粹德国安全事务的总负责人，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应对秘密警察、保安警察和党卫军灭绝犹太人、推行集中营制度、杀害人质、奴役和同化非日耳曼民族等纳粹“新秩序”、使用集中营男女囚犯进行医学试验等罪恶活动承担最高的直接领导责任。

海因利希·希姆莱生于慕尼黑。农业专科学校毕业。1917年自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9年11月开始，希姆莱参加了各种右翼组织的活动。1926年1月26日，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结识了恩斯特·罗姆，并参加了罗姆领导的德国战旗队。1923年8月希姆莱又参加了纳粹党。1923年11月参加了希特勒策划和组织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1925年8月正式参加党卫军，任下巴伐利亚大区副区长。1926—1930年任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29年1月6日担任党卫军全国领袖，此时党卫军成员不足300人。为了扩大党卫军的队伍，提高其地位，希姆莱制订了严格的纪律和周密的训练计划。在招募党卫军成员时，他把种族标准作为最主要的条件，每个申请人均必须提供祖宗三代的血统证明材料。纳粹党上台时，党卫军已发展到3万余人。

纳粹党上台之后，希姆莱出任慕尼黑警察总监，并受命在全国各邦组建政治警察。1934年4月1日，希特勒发布命令，将各邦内政部与帝国内政部合并，把保安警察、治安警察和秘密警察全部划归希姆莱领导。



1934年4月20日，希姆莱任普鲁士邦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副首脑。同年6月30日党卫军全力协助希特勒清除了罗姆的冲锋队势力后，希姆莱开始全面控制全国的警察武装和党卫军，直至第三帝国垮台。1936年6月17日，升任内务部国务秘书、全国警察首脑。

希姆莱是纳粹德国制造发动入侵波兰的借口——格雷维茨电台事件的策划者。他直接授命党卫军特工人员阿尔弗雷德·约瑙克司具体实现这项任务。约瑙克司领到150套波兰军队的制服和若干波军使用的武器，随后命令一批刚刚从集中营里领出的死囚穿上波军制服，配备波军装备，并把他们带进德波边界德国一侧的格雷维茨广播电台。当一名会讲波兰语的德国特务假冒波兰军队的口气，发表了一篇将同德国开战的广播后，纳粹医生按既定计划毒杀了这些身着波兰军装的死囚，造成波兰军队进攻德国电台的假象，从而为纳粹德国进攻波兰制造借口。可见，希姆莱也是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

希姆莱是纳粹德国强制推行“日耳曼化”的最高负责人。纳粹德国侵占波兰之后数日，希特勒任命希姆莱去负责建立一个新机构——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并担任其最高负责人。其任务是先把犹太人和波兰人从波兰被直接并入德国的那几个省驱除出去。1939年10月9日，亦即希姆莱就任新职的第三天，他就命令已并入第三帝国各省中的大多数犹太人和波兰人立即迁往总督辖区。在此后一年时间内，共有120万波兰人和30万犹太人被驱出家园，他们中的不少人在迁移过程中死去。1942年6月12日，希姆莱亲自批准了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制定的旨在奴役斯拉夫各民族的《东方总计划》，其中要求把捷克人的50%、乌克兰人的65%、白俄罗斯人的75%和波兰人的80%—85%强行迁移到西伯利亚，以便为德国移民腾出生存空间。

希姆莱对待犹太人的凶残暴戾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当他还是一个无名鼠辈之时，就制订了一个“保卫德国血统和荣誉”的五点计划，对迫害犹太人的设想可谓淋漓尽致：犹太人不能成为德国公民，禁止犹太人同德国人结婚，禁止德国人同犹太人私通，犹太人不得雇用45岁以下的德国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犹太人不得悬挂和触摸德国国旗。希姆

莱认为世界上一切使他痛恨的事都是犹太人干的，因此要对犹太人实施无情的报复，直至灭绝这一人种。

希姆莱是在第三帝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对犹太人问题最后解决”行动的总体策划和最高层次的组织者，他是组织特别行动队大规模杀害苏联、东欧各国犹太人的最高责任人。他在1941年5月亲自对即将杀人行凶的特别行动队员们训话，唆使他们对犹太人大开杀戒；他于1941年8月下旬视察明斯克某刑场后下达的指示，直接促成了毒气车的出现。1941—1943年，特别行动队杀害的受害者高达150万人以上；他也是建立和推广集中营、灭绝营制度，力图灭绝犹太民族、吉卜赛民族的最高责任人；他两次视察奥斯维辛集中营，导致该营的灭绝设施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杀人能力提高了10倍以上。在各种集中营、灭绝营内被杀害的犹太人、吉卜赛人、苏军战俘、反法西斯主义者以及抵抗战士多达600万人左右。他也是纳粹德国医学界对“劣等种族”和盟国战俘实行惨绝人寰的人体试验的最高组织者和主持人。他创建的遗传研究所，是各个集中营内所有活人试验的发源地，在上述试验中被害死、致残或造成终身难愈疾病、酿成终身不育的受害者数以十万计。

他的罪责还包括：在东欧、南欧强制推行殖民——日耳曼化政策，建立秘密警察全面监视制度，有组织、有计划地杀害波兰、捷克等国知识分子，大肆处决人质等。自希姆莱掌管统率党卫军和警察的大权以来，被他下令杀害及他的下属自行杀害的和平居民和战俘，据最保守的统计也不少于1100万人，在世界史上达到空前绝后的水平。

1943年8月25日，希姆莱兼任帝国内政部长和帝国行政管理机构全权总代表。1944年7月21日，兼任后备军司令和军备部部长。

1945年春天，纳粹德国败局已定。希姆莱竭力组织民族突击队，大力加强武装党卫军，企图阻止德国的军事失败。同时，他与国际犹太人组织的代表谈判关于释放在德国权力管辖范围内的犹太人问题。他还曾与英美政府的代表单独进行秘密谈判，允诺投降，妄图同西方合作，以便在东线继续进行对苏战争。1945年4月底，希特勒对他的一系列我行我素的行径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乃下令解除希姆莱的一切职

务，并将其开除出党。希姆莱本想在邓尼茨的新政府中谋得要职，然而邓尼茨对他毫无兴趣，断然将他拒之门外。纳粹德国宣布投降后，希姆莱不得不从德国北部的弗伦斯堡出逃，南下至吕纳堡时为英军俘获，身份暴露。1945年5月23日，在吕纳堡英军拘留所内畏罪服毒自杀。这种毒药是他下令纳粹医生借助数百名集中营囚犯的生命为代价研制而成的，毒性极强且生效迅速，谁曾想最后竟报应到自己身上。因而，尽管英国军医尽力抢救，也未能令他再次站立起来，登上纽伦堡法庭的被告席。

鲁道夫·赫斯（1894—1987年）

纳粹党前副领袖，首要纳粹战犯之一。

鲁道夫·赫斯于1894年4月26日生于埃及亚历山大，父亲是一位德国批发进口商。他本人1914年自愿参军，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陆军中尉；后来又被调到空军，当上飞行员。战争结束后，因对魏玛共和国极度憎恶，他加入了一个由极右翼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由弗兰茨·艾伯领导的准军事化秘密组织。战后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国民经济、历史和地缘政治学。在此期间，深受豪斯霍菲尔的地缘政治学说的影响。1920年加入纳粹党。1923年11月，参加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同希特勒一起坐牢，并参与了《我的奋斗》一书的写作。1925年出狱后成为希特勒的私人秘书。1932年成为纳粹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希特勒上台不久，即任命他为元首代表；同年12月兼任内阁中的无所任部长。1938年2月任秘密内阁委员会成员，1939年任国防委员会成员。在戈林被指定为元首的第一继承人后，赫斯也于当日被指定为第二继承人。在宣扬希特勒和在国外德国人当中进行纳粹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5月10日，赫斯驾机前往英国的格拉斯哥，并在此降落，被英国俘获，在英国一直被关押到“二战”结束。考虑到他未曾参与1941年5月10日之后纳粹德国领导集团内的罪恶活动，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以鼓动、准备侵略战争和破坏和平罪判处他终身监禁，而没有判处他死刑。1987年8月17日，坐牢42年后，赫斯于柏林施潘道监狱病故。

保尔·尤塞夫·戈贝尔（1897—1945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纳粹党自始至终的核心人物之一，纳粹党和第三帝国教育与宣传部长。希特勒夺取政权与发动侵略战争的得力助手，也是希特勒最为信赖的心腹。

保尔·尤塞夫·戈贝尔于1897年10月29日生于莱茵区雷特镇一个职员家庭。他曾先后在波恩、弗莱堡、维尔茨堡、慕尼黑和海德堡大学学习日耳曼学、哲学和艺术史。1922年在爱尔朗恩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加入纳粹党，追随希特勒的对立面施特拉塞。1926年纳粹党召开班堡会议后投靠希特勒，由纳粹党莱茵兰—北德大区干事长升任柏林—勃兰登堡大区区长。1927年创办《进攻报》，任该报主编，以花言巧语、蛊惑人心等卑劣手法，蒙蔽了大批群众，为纳粹党捞取了不少选票。他在纳粹党的一系列选举活动中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他把希特勒吹捧为一个神话，赞颂他是救世主弥赛亚，将把德国从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拯救出来。戈贝尔还用一种三位一体的形式将这一神话加以概括：“一个民族，一个党，一个领袖。”戈贝尔在宣传方面的出色表现，不久就得到希特勒的回报：1928年当选为德国国会议员。1929年任纳粹党全国宣传部长；1933年3月13日，即希特勒上台仅6周后，即遴选他出任新成立的帝国政府教育和宣传部长，而这个新部集中了以往好几个部门的职权。根据法令，戈贝尔“负责全国的一切文化生活，负责国家、文化和经济的公共关系，负责管理为这些目的服务的各种机构”。从此，他成为全欧洲最年轻、权力最大的部长之一，全面控制了第三帝国的宣传机构，成为希特勒元首神话的主要编造者和宣传者。戈贝尔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其煽动骗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除希特勒之外，任何纳粹高层领导人都没有能像戈贝尔那样拼命地、无所不用其极地煽动反犹太情绪。例如，他在纳粹德国的对外宣传报刊《帝国报》上发表长篇文章恶毒地攻击和诽谤犹太人，其中称：“每个犹太人都是我们的敌人，不管他是在波兰的犹太区中苟且偷生，还是在柏林或汉堡苟延残喘，也不论他是在纽约吹响战争号角。犹太人

也能算是人吗？这就像那些谋财害命的罪犯一样，像强奸幼女犯和靠妓女养活的男人一样。犹太人是寄生种族，他们像霉菌需要健康人来培养一样。对付他们只有一个办法：一刀两断，摆脱他们，毫不留情。至于犹太人还生活在我们中间这一事实绝不能证明他们和我们同属于人类，就如同跳蚤在家里并不能成为家畜一样。”

战争初期，他抓住德军在波兰、法国、南斯拉夫和苏联战场上的暂时得逞，开足全部舆论机器，大肆宣扬德军和纳粹德国“不可战胜”；1943年秋，战局全面逆转之后，他又千方百计地向德国军人、青年甚至儿童兜售“忠于领袖的献身精神”，诱骗德国人民继续为希特勒发动的不义战争充当炮灰。

1941年12月12日，戈贝尔得意洋洋地对其在宣传部的下属宣扬说，他自己在4个决定性的方面加强了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其一，作为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纳粹党领袖，他把纳粹主义从一个以慕尼黑为基地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如此就可以争取并吸引莱茵兰工业区的产业工人；其二，他在柏林取得了胜利，从而为在全帝国夺取政权开辟了道路；因为如果控制不住柏林，纳粹党就只能仍是一个地方性的运动；其三，他搞出了一套党举办公开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如群众示威，举着旗帜行进以及各种重大的党的纪念活动仪式。任何人只要比较一下一年一度在慕尼黑啤酒酒店举行的纪念集会和柏林体育馆举行的盛大示威，就可以看出这方面的成就如何；其四，他创造了关于元首的“神话”。他给希特勒戴上了一个“一贯正确”的花环，给予希特勒凌驾于党之上的魅力，成为德国人盲目服从的“元首”。

1944年7月25日，作为希特勒依然可以信赖的极少数人之一，他得以兼任德国总体战部长。1945年1月30日，身为地道文人的戈贝尔竟被希特勒任命为柏林城防司令。4月19日，希特勒立下遗嘱，以邓尼兹为总统，戈贝尔为总理。希特勒于4月30日自杀后，戈贝尔决定为他尽忠。次日，他首先毒死6个孩子，随后同妻子在总理府中一起自杀并焚尸。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1893—1946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纳粹党最主要的理论家之一。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1893年1月12日生于沙皇俄国塔林的一个巨商家庭，其父为立陶宛人，母为爱沙尼亚人。1910年入里加技术学院学习，1915—1918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建筑学。1918年11月移居德国，在慕尼黑从事反犹写作和政治活动。1919年由埃卡特介绍加入纳粹党。1920年同希特勒相识，1923年11月参加啤酒馆暴动。纳粹党转入地下期间，他建立了其替代组织大德意志工作协会。1925年担任纳粹党的党报《人民观察家报》主编。1927年建立维护德意志文化民族社会主义战斗联盟。1930年创建纳粹党外交政策新闻处。1933年4月任纳粹党外交政策局局长。1934年1月，出任纳粹党整体思想和世界观培训和教育管理元首代表，自诩为全党世界观和外交政策首席理论家。1930—1945年为德国国会议员。1941年7月任东部占领区事务部长，不遗余力地掠夺东欧和苏联的劳动力与自然资源、国民财富，积极推进强制日耳曼化政策。他的主要著作是《二十世纪的神话》，鼓吹真理和法律应服从于“日耳曼种族”思想，要求树立一种新的符合种族思想的世界观。1937年该书获得德意志民族奖金，被赞誉为“科学地和直观地讨论和巩固了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为保持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纯洁性作出了特殊贡献”。

罗森堡还是一个掠夺被占领国家珍贵文物的首要罪犯。1940年他受希特勒本人的直接委派，成立了特别工作处并担任第一把手，其职责在于征收法国和其他被占领国家的艺术珍品。1940年10月至1944年7月，共掠走珍贵文物21903件，其中绘画5281幅，内含伦勃朗等世界大师的名作；手工艺品5825件，包括瓷器、青铜器和古钱币；雕像数百尊以及17—18世纪的名贵家具2477件。仅从法国掳掠的文物价值即达10亿美元。这些珍贵艺术品中的最上乘部分，落入戈林、凯特尔等纳粹头目私人手中，其余则交送德国的各家博物馆。

“二战”后罗森堡被盟军调查人员逮捕。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下发了对罗森堡的判决书，其中指出：“罗森堡完全了

解有关的对东欧各国人民所实施的残暴处置和恐怖活动。他曾发出指示说，海牙陆战法规不适于东方各占领区。他完全知道并积极参与掠夺东欧地区的原材料和粮食，并将这些物资运往德国。他声称养活德国人民是他对东方占领区的要求清单上居于首位的问题，而苏联人民为此则必须忍饥挨饿。他指示把犹太人预先隔离开来，而最后的目标是把他们困在犹太人隔离区内。他的下属开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他所管辖的东方占领区的民政部门认为，有必要把东部占领区内的犹太人清除干净。罗森堡对其所属的民政部门的官员规定了必须送往德国的劳工数目，并且必须采用一切方法凑足劳工人数。1944年6月4日为‘干草行动’发布的命令书上有罗森堡的批准签字。该命令竟规定要把1万—4万名10—14岁的青少年用船运到德国从事劳动……”最后，纽伦堡法庭以战争罪、破坏和平罪和违犯人道罪判处他死刑；10月16日凌晨，罗森堡被执行绞决。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1893—1946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纳粹德国外交部长。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于1893年4月30日生于德国莱茵河畔一个富有的家庭。生父是退伍军官。青年时求学于瑞士和英国。从1910年起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先后担任过新闻记者、铁路工人、酒商、公司商务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潜回德国，入陆军服役，以后晋升为中尉，并获得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战后当了酒商。1925年过继给贵族出身的姨夫，以标榜自己的贵族身份。1929年初识希特勒，希特勒对里宾特洛甫的外交才干大为赏识，也认识到同这位交际极广的香槟酒商的结交日后会给自己的政治前途创造有利的机会和环境。1932年里宾特洛甫加入纳粹党。1933年1月，正是决定希特勒政治生涯的转折时刻，他和里宾特洛甫在巴本陪同下来到大银行家冯·施罗德家中，同一些金融寡头密谈。由于里宾特洛甫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德国银行家决定大力拥戴希特勒上台，从而为纳粹党执政铺平了道路。所以，希特勒一当上总理，很快就对里宾特洛甫给予回报，先是任命他为自己的私人外交事务助理；同年又任命他为纳粹党外交事务代表。以

后，他又组建了“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多方搜集情报，积极推行纳粹党的外交政策。1934年希特勒任命里宾特洛甫为国际裁军事务特别代表和驻国联大使。1935年他又以无所任大使的身份，赴英国谈判并签订《英德海军协定》。1936年8月出任驻英国大使。同年11月返回柏林主持签订德、日《反共产主义协定》。翌年10月又赴罗马促成意大利加入该协定，形成法西斯三国侵略核心。1938年1月2日，作为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在上呈希特勒的报告中阐述了他对时局的看法：他建议德国在东线使用武力解决，同时也应防止英国和法国联盟介入战争。这份报告在很大程度上与希特勒的见解相吻合；不久，1938年2月4日，希特勒就安排里宾特洛甫继牛赖特任外交部部长。上任之初，希特勒就向他提出四个亟待解决的外交难题：奥地利、苏台德、默麦尔和但泽，并提到“某种方式的摊牌”和“军事和武力解决”。里宾特洛甫随即采取了一系列肆意欺骗和背信弃义的手段来落实其元首的侵略外交原则。他于1938年3月13日签订了将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的法律文书，而这正是第三帝国日益扩张的起点。他还为纳粹德国肢解和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等破坏和平的行动出谋划策，奔走效力。1939年8月赴莫斯科，8月23日与当时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共同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从而为纳粹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前提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其在纳粹党和帝国内外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此期间的罪恶活动主要有，为侵占北欧和巴尔干国家做外交准备，加强同意、日等轴心国的联系，并通过派驻的外交代表，在仆从国和傀儡国家推行纳粹党的新秩序，实施灭绝犹太人的“最后解决”。

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起诉人控告他于1944年6月6日参与了一个决定将俘获的盟国飞行员私刑处死的秘密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里宾特洛甫的作用是决定性的。1941年12月他还主持过一个处死一位法国将军的计划。在这次行动中，他还关照下属们不可留下任何破绽，尽量掩人耳目。同时，里宾特洛甫对被占领国家所犯下的残暴的非人道罪行负有重要责任。其部属经他授意在被占领的丹麦和法国强制推行他



的一套经济和政治制度，对被占领国的掠夺和压迫，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此外，他还帮助意大利法西斯在其侵占的南斯拉夫和希腊推行更加残酷的军事政策。起诉人有充分的证据认定里宾特洛甫在纳粹德国大规模残酷迫害犹太人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1942年6月，他授意纳粹德国驻法国大使，命令维希政府限期完成对法国境内犹太人的驱逐工作。因此，5万多名法国犹太人被驱赶到纳粹集中营，其中许多人遭杀害。同年9月，他又向其他仆从国发出驱逐国内所有犹太人的命令。就连意大利法西斯魁首墨索里尼也遭到里宾特洛甫的非议，因为意大利不肯完全按照希特勒的模式对待本国犹太人。1943年4月17日在希特勒与匈牙利首脑霍尔蒂的一次会谈中，里宾特洛甫对霍尔蒂明确强调：“犹太人要么就地处决，要么统统送进集中营，绝不可漏掉一个。”此次针对犹太人的决定实际上也是纳粹德国对待所有犹太人的政策。作为一个顽固不化的纳粹党徒，里宾特洛甫即使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仍然念念不忘地为希特勒开脱，并挖空心思地美化他的元首：“我确实是元首的忠实追随者……元首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磁场般的个人魅力，除非亲身经历，你们是无法理解的。直到现在，元首已逝世6个月，我仍然不能从他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每个人都无法摆脱他的吸引力，就连卓越的学者们在一起讨论的问题，也是为什么这位伟大人物存世虽短，而他个人的光辉和影响却将长在。”“元首有时很坚定，但绝不残酷，而希姆莱则绝对可以称为残酷……他满脑子的残酷念头，从来没有被任何人道的考虑打动过。”

第三帝国覆灭前夕，他于1945年4月逃离柏林。希特勒在其政治遗嘱中，宣布解除里宾特洛甫的一切职务。战后不久即被盟军抓获。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向里宾特洛甫下发了判决书，其中指出：“里宾特洛甫对起诉的辩护是，一切决定都由希特勒作出，身为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和崇拜者，他只是毫无疑义地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对于残酷的屠杀行为，他更是毫无知晓。法庭认为，以上辩护不能成立。里宾特洛甫作为纳粹德国的重要内阁成员和希特勒的精英人士，参加了纳粹从吞并奥地利到入侵苏联的一系列重大侵略活动。虽然

他更多的时候作为外交官而较少地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但由于他的外交活动与战争形势如此密切联系，他绝不可能对希特勒这场完全是罪恶侵略的战争实质和具体行动一无所知。在对被德国侵略占领的国土上推行强权的法西斯统治，是里宾特洛甫的另一重大罪行，这里不但牵涉野蛮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政策，更包括令人发指的迫害犹太民族的活动。另外，足够的事实证明，里宾特洛甫对纳粹党的民族社会主义信条坚定不移，因而也像希特勒及其他纳粹精英们全身心地赞同和投入到毁灭和平、宣扬强权、战争和对基本人权及人道主义的破坏行为中。希特勒的政策与里宾特洛甫的想法是一致的，这才是他如此忠实地追随希特勒以及执行希特勒的命令的真正原因。”该法庭以阴谋策划侵略战争、破坏和平罪、发动与参与战争罪、对人权和人道主义侵犯罪判处里宾特洛甫死刑，并于10月16日凌晨执行绞决。值得一提的是，按照纽伦堡法庭的安排，鉴于戈林已经自杀身亡，里宾特洛甫是第一个走上绞架的首要纳粹战犯。这也许是对他昔日荣耀地位的某种肯定。

威廉·弗利克（1877—1946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第三帝国内政部长。

早年在慕尼黑当警官。1923年11月参加啤酒馆暴动。1925年加入纳粹党。因竭力效忠希特勒，成为该党早期的核心人物之一。1928年任纳粹党国会党团领袖，积极参与谋取政权的活动。1933年1月，纳粹党上台执政，任内政部长。他主持了实施解散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取消议会民主的活动；起草和签发《纽伦堡种族法》等一系列反犹法令，积极协助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恐怖统治。1938年被委任为行政全权总办，统管纳粹德国一切行政机关和事务。同年，参加签署并主持实施将奥地利并入德国的法令，以后又签署和主持实施将苏台德、默麦尔、但泽等地区并入德国的法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负责在各个占领区建立纳粹德国的统治机构和委派行政官员，把纳粹的“新秩序”推行到整个被占领的欧洲。从1943年8月起任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保护国总督。战后为盟军抓获，并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1946年10月1日，该法庭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犯人道罪判处弗利克死刑，10月16

日夜执行绞刑。

汉斯·弗兰克（1900—1946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纳粹德国驻波兰总督区总督。

汉斯·弗兰克早年在慕尼黑、维也纳和基尔等大学攻读经济学和法律，后当律师。从青年时开始，他就是一名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者。1927年9月加入纳粹党。不久就担任该党的法律部负责人。1930年当选为德国国会纳粹党议员。早在1931年前后，他已成为纳粹党核心成员的6个人之一（其余5人为希特勒、施特莱彻、罗姆、戈林和戈贝尔）。希特勒上台后，先后担任或兼任巴伐利亚邦司法部长、德国司法部专员和不管部长、纳粹党法律事务全国领袖、德意志法学院院长。1939年10月始任纳粹德国驻波兰辖区最高行政长官（驻波兰总督区总督）。上任次日即宣布：“波兰人应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奴隶。”他下令强制推行经济压榨政策，巧取豪夺了巨额的粮食和财物运往德国，并强征100余万波兰青年到德国充当劳工。他主持开展“特别绥靖行动”，残酷迫害和屠杀波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积极推行灭绝犹太人的“最后解决”，疯狂地宣称：“犹太人是一个必须予以铲除的种族，抓住一个就要消灭一个……”经他指使和策划，至少有300万波兰犹太人惨遭杀害。

汉斯·弗兰克绝不是那种绝对服从、机械照办的刽子手，而是一个绞尽脑汁、不遗余力、见缝插针地杀害被占领区人民特别是波兰人民的超级刽子手。1940年5月30日，他在训示部下时得意洋洋地宣称：“西线的攻势已于5月10日开始。这就意味着从这一天起，世界舆论对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的主要兴趣消失了。他们对民族社会主义执政者在这个地区的行动进行的可憎的宣传和欺骗报道在世界上所引起的后果，现在对我已经完全无所谓了。现在我们必须利用这个对我们有利的时机。”“我们不应该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推卸给德国本土的集中营……而是在这里就地把他们（指波兰的知识分子）消灭或按规定给以惩罚。”他的这种积极主动进行大屠杀的指导思想引起两种极为恶劣的后果，一则是他的部下肆无忌惮地对波兰人民大展屠刀，二是波兰总督区内不久

就出现了一批大型的灭绝营。尤其恶毒的是，弗兰克利用他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为希特勒的残暴统治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文，替泯灭人性的纳粹理论披上法律的保护色。由苏联代表团提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一份文件即足以证明这一点。这份文件就是弗兰克于1943年10月2日签署并颁发的《打击对总督辖区德国建设事业寻衅的法令》。其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凡属蓄意阻挠或破坏总督辖区德国建设事业而违反法律、法令或当局的规定和指令的非德意志人均应处以死刑。第二条称：主谋和帮凶将同作案犯一样，密谋罪行将同业已构成的罪行一样，均应加以惩处。第三条称：由保安警察临时法庭负责判决事宜。第四条称：保安警察临时军事法庭由当地保安警察指挥部与保安勤务处的一名党卫军军官和上述机构的两名成员组成。第五条第二款称：保安警察临时军事法庭可根据其本身的判决决定审理程序。第六条称：“保安警察临时军事法庭的判决应立即执行。”这一法律的出台立即引发一场对波兰人民大处决的浪潮：纽伦堡法庭在审讯弗兰克时出示的证据证实：“这项法律公布不久，他们（保安警察和保安勤务处的刽子手们）就开始公开行动……成批地枪毙波兰人，每次处决的人数在20—200人之间。这种公开处决发生在城市各区。他们就在公共交通的要道上杀人……在这些处决事件中，德国人所枪杀的人既有在大搜捕中从大街上抓来关进帕维亚克监狱的人，又有在同样情况下被逮捕的人，也有在行刑之前不久被抓来的人。这种公开处决的次数和每次被枪杀的人数越来越多。有时一次被杀害的人数高达200人之多。这种处决行动一直持续到华沙起义的开始……德国人在杀人之前常常在被判死刑的人身上做手术，给他们注射各种化学制剂，致使他们身体虚弱得不能再逃跑和进行任何反抗……仅在华沙一地，德国人在公开的屠杀中就枪杀了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在克拉科夫地区也枪杀了好几千人。”

“二战”结束不久，弗兰克一度潜藏起来，但不久即被盟军抓获，押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1946年10月1日，以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而判处死刑；1946年10月16日夜执行。

恩斯特·卡登勃伦纳（1903—1946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纳粹德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继海德里希之后，成为灭绝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杀害和虐待盟国战俘、镇压被侵占国家抵抗运动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人。

恩斯特·卡登勃伦纳，1903年10月4日生于奥地利一个离布劳瑙不远的村庄——里德；这里距希特勒的出生地很近。许多纳粹高官认为，这是他日后得以飞黄腾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年时就读于林茨，这里是奥地利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发祥地。以后，先上格拉茨的一家技术学院，后入帕格鲁大学。早年继承父业当过律师。不久改行做了萨尔茨堡的助理法官。1932年加入奥地利纳粹党，党证号码是300179。1933年加入党卫军，同年年底他已成为指挥一支1200人的党卫军第37冲锋团的队长。1934年7月25日，他是指挥攻打总理府、杀害陶尔斐斯总理的策划者和首领之一。1935年成为该党党卫军的领袖，积极从事将奥地利并入德国的各种活动。同年5月，由于他同纳粹德国党卫军的密切关系被指控为叛逆罪而再次被逮捕。6个月之后，出庭受审，奥地利法庭指控他图谋叛乱。但因证据不足，只判处他拘留6个月。与此同时，奥地利律师协会也因他参与政治活动而将他开除。1938年3月11日，即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的前夕，塞斯·因夸特任命他出任以自己为阁魁的内阁中的内政国务秘书。

1938年3月13日，德奥合并的当天，经希特勒提名，出任第三帝国奥地利辖区保安部长；军衔晋升为党卫军旅队长（相当于少将）。半年后，军衔又晋升为总队长（相当于中将）。1941年该部撤销，任奥地利辖区党卫军和警察首脑。1942年初，卡登勃伦纳成为党卫军的第三把手，官阶仅次于海德里希。同年6月海德里希遇刺身亡，希特勒和希姆莱经过反复酝酿，决定由他继任中央保安总局局长，1943年1月到任。任内，他以残暴手段继续推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并在集中营内加紧进行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和苏军战俘的大屠杀。卡登勃伦纳是一个极其残忍冷酷的刽子手，一味追求最野蛮的镇压措施。1942年秋，他对毛特豪森集中营进行视察时，曾走到毒气室门外，透过门上的隐形窥视

孔，饶有兴趣地观看犹太人垂死挣扎的惨景，而没有任何异常的表情。1943年初，他又专程来到毛特豪森集中营，观赏和比较三种杀害囚犯的处决方法：绞死、枪击颈部、毒气窒息。第三帝国覆灭前夕，他已升任党卫军帝国副总指挥（上将军衔）。“二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以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判处死刑。1946年10月16日夜执行绞决。

弗利茨·召克尔（1894—1946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纳粹德国战时劳工全权总办。

弗利茨·召克尔早年当过海员和建筑工人。1923年加入纳粹党。1927年任该党图林根大区领袖。1932年8月任图林根邦内政部长，翌年5月升任该邦总理。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成为第三帝国权力最高的机构——国防委员会中负责分配劳动力的委员。1942年3月，被希特勒委任为战时劳工全权总办，根据1942年3月21日希特勒关于劳动力分配全权代表的命令，给予召克尔在招募、使用和分配劳动力方面几乎无限的权力：为了保证整个战时经济，尤其是军备方面获得需要的劳动力，必须建立一定的制度，以指导分配所有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包括被运来做工的外国人和战俘在内，并动员大德意志帝国，包括保护国在内，以及总督辖区与占领区内所有尚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他的唯一的上司就是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戈林。他下令采用暴力手段，从各个占领区强征700多万青年男女及数百万战俘，到纳粹德国的矿山、农场和兵工厂从事繁重的奴隶劳动，导致大量死亡。“二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以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被判处死刑，1946年10月16日夜执行绞决。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1885—1946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反犹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组织者。

早年为小学教员。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纽伦堡从事反犹活动。1921年加入纳粹党。1923年11月参加啤酒馆暴动。同年创办反犹周刊《冲锋队员》，并担任主编，直至纳粹党上台。从1925年起任总部设在纽伦堡的纳粹党弗兰肯大区领袖。希特勒上台后，成为德国国

会议员和反犹运动的首脑之一。1934年晋升为党卫军地区总队长军衔（相当于中将）。他发表过大量反犹文章和演说，煽动“斩尽杀绝”犹太人，积极参与策划和推行“最后解决”。“二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法庭根据第一条起诉理由，指控施特莱彻促成了“纳粹密谋分子的夺取政权，并巩固了纳粹分子对德国的控制，从而构成共同策划或密谋”。法庭根据第四条起诉理由，指控他“煽动了对犹太人的迫害，还参与了上述各种犯罪活动”，构成违反人道罪。法官认为，施特莱彻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和鼓吹仇恨犹太人的观点达25年之久，是尽人皆知的“头号反犹煽动家”。在他发表的演讲和论文中，他以反犹太主义的毒素日益污染德国人的思想，并煽动德国人极力去迫害犹太人；法官并指出，施特莱彻是1933年4月1日抵制犹太人运动的头目。他拥护1935年9月颁布的《纽伦堡种族法》。他对1938年8月10日在纽伦堡发生的捣毁犹太教堂的事件负有责任。11月10日，他还公开支持当时发生的大规模的迫害犹太人的活动。尤其是他创办并兼任发行人且在1933年之前一直担任主编的《冲锋队员》周报，是他反犹太主义煽动的主要阵地。这份印数达60万份的报纸，每期都充斥着色情和令人厌恶的文章，影响极其恶劣。法官列举了许多引自该报的详细论据，证明了施特莱彻的反犹太煽动罪行。法官还认定，施特莱彻在获悉东部占领区大批犹太人遭受屠杀后，还继续撰写并发表鼓吹杀害犹太人的文章。以违反人道罪被判处死刑，1946年10月16日凌晨执行绞决。

阿尔图尔·赛斯·因夸特（1892—1946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第三帝国驻波兰总督区副总督，后升任驻荷兰总督。生于奥地利。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维也纳操律师业，积极鼓吹德奥合并。1937年出任奥地利政府国务顾问，竭力推动本国的法西斯运动。1938年2月，在希特勒支持下，被奥地利当局任命为内政部长；同年3月，组成傀儡政府，配合德军入侵，将奥地利最终并入德国。1938年4月至1939年4月任纳粹德国驻奥地利总督。1939年10月出任纳粹德国驻波兰总督区副总督。1940—1945年升任纳粹德国驻荷兰总督。任内，他把10多名犹太人押送到波兰的纳粹集中营和灭

绝营，致使他们大部分惨遭杀害；他强征了5万多名荷兰青年加入纳粹德军，让他们为第三帝国疯狂从事的侵略战争充当炮灰；他对富饶的荷兰实行敲骨吸髓的盘剥，使荷兰人民顿时陷入衣不保暖、食不果腹的困境；他大肆镇压抵抗运动，动辄出动军警，屠杀无辜居民。塞斯·因夸特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荷兰人民1944年9月的全国性大罢工，沉重地震撼了第三帝国在荷兰的统治基础。这次大罢工被纳粹德国残酷镇压后，因夸特对荷兰人民实施疯狂的报复。他禁止荷兰东部的农产品流通到西部工业区，致使荷兰西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数以万计的人民除了甜菜和野生的山慈菇外，得不到任何食品，大约有两万名荷兰人在大饥荒中丧生。

“二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以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被判处死刑，并于1946年10月16日夜执行绞决。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907—1974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纳粹党青年领袖。1907年3月9日出生于柏林一个富有的家庭。其祖父曾参加美国的南北战争，并娶一个美国姑娘为妻。其父卡尔·巴利罗斯·席拉赫曾在政府任职，以后又成为一位戏剧导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革命中，席拉赫的父亲失去工作，这个曾经富裕的家庭像其他德国家庭一样走向破落。自幼就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早年在慕尼黑大学攻读艺术史和德国民俗学。

1926年，席拉赫遇见了希特勒，后者当时正在维也纳演讲。席拉赫此时已读完《我的奋斗》，并深深地被希特勒的气魄所吸引。他写出《德国最伟大的儿子》一诗，拼命地吹捧希特勒：“他不仅是我们的领袖，更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他高瞻远瞩、纯洁、坚定……他心中装着我们，灵魂高尚犹若星辰，但他仍是那样平易近人。”希特勒因而称赞他说：“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是我们可以信赖的人。”1927年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1928年参与组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合会。1929年被任命为民族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主席，希特勒对此大加赞赏，因为这正是他所希望的。1931年被希特勒任命为纳粹党青年工作领袖，掌管包括希特勒主义青年团在内的所有的纳粹



党青年组织。1933年1月纳粹党掌权后，被任命为全国青年部部长。从1933年12月起成为内阁成员。他积极在青年中煽动民族沙文主义和战争狂热，灌输纳粹主义思想，成为希特勒毒害和控制青年的得力助手。1936年12月1日，青年部从内政部独立，成为德国政府中一个独立的部。年仅29岁的席拉赫成为第三帝国最年轻的阁员，同时也成为少数几个能直接向希特勒汇报情况的人之一。1936年帝国国庆日，席拉赫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的元首，有一件事比你更强大，那就是所有德国青年对您崇敬的爱……敬爱的元首，您的名字是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是我们最引为自豪的象征。我们永远跟随您。”在另一次纳粹党召集的会议上，他恭维希特勒“是全世界的上帝，是救世主，是德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甚至比传说中的上帝还要伟大”。

1940年辞去全国青年领袖职务，出任纳粹党维也纳大区领袖兼该大区总督，同时担任德国国防委员。他在辖区内推行强化战争体制，肆意掠夺广大居民，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政策。1946年10月1日，他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以违反人道罪判处20年徒刑，1966年获释。

瓦尔特·冯克（1890—1960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曾任第三帝国经济部长、国家银行总裁。

早年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法律和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伍。战后在《柏林交易所日报》任主编。1931年加入纳粹党，是希特勒与德国大垄断财团、工业巨头之间的牵线人，对纳粹党上台产生了很大作用。1933年3月被希特勒任命为教育和宣传部副部长，参与了一系列排犹活动。1938年2月出任经济部长和军事经济全权总办。翌年又任国家银行总裁，并成为国防内阁成员。冯克积极参与制定和执行纳粹德国的战争经济政策，尤其是对波兰和苏联的侵略与掠夺。1943年9月又担任中央计划局领导成员，负责确定和分配德国工业所需要的劳工。1946年10月1日，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判处终身监禁。1957年获释。

康斯坦丁·弗莱海尔·冯·牛赖特（1873—1956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曾任第三帝国外交部部长和驻波希米亚—摩拉

维亚保护领地总督。

早年进入德国外交界，历任驻伦敦总领事，驻土耳其参赞，驻丹麦公使，驻意大利、英国大使。从1932年起相继担任巴本、施特莱彻和希特勒政府的外交部部长。希特勒上台次日即加入纳粹党和党卫军，积极推行纳粹党的侵略外交。1938年转任不管部长、政府咨询委员会（秘密内阁会议）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委员。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遭纳粹侵占后，牛赖特出任第三帝国驻波希米亚—莫拉维亚保护国总督。在当地推行德意志化，实施法西斯统治，并把该国工业纳入德国军事生产的轨道。因未获希特勒的信任，他从1941年9月起“休假”。1943年6月获党卫军副总指挥军衔（相当于上将），8月正式离职。“二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1946年10月1日，以共同策划和密谋、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判处15年徒刑。1954年因健康情况不佳而获释，定居于西德。

罗勃特·莱伊（1890—1945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纳粹党组织部门和劳工组织负责人。

罗勃特·莱伊于1890年2月15日生于德国下布来登巴赫。青年时在耶拿、波恩、明斯特大学攻读化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1914年自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施特拉斯堡第十步兵团当兵。1920年退役，后在法本化学公司担任药剂师。1924年在科隆加入纳粹党。1925年任该党莱茵兰大区区长。1928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30年当选德国国会议员。1932年任纳粹党政治组织部负责人，只对希特勒一个人负责。不久，试图争当普鲁士州议长，因戈林不容外人染指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极力阻挠而受挫。1933年5月2日，纳粹党对工会实施一体化之后，经希特勒大力支持，成为纳粹党管辖下最大的群众组织——德国劳动阵线领袖，最盛时拥有成员2500万人。1934年兼任纳粹党帝国组织部部长，继而当选德国法律科学院院士。1945年10月25日，即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开庭之前，莱伊在纽伦堡狱中畏罪自缢身死。

莱因哈特·特里斯特兰·欧根·海德里希（1904—1942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被称为“欧洲刽子手”，曾任帝国中央保安总

局局长兼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略，详情见第六章）。

阿尔伯特·施佩尔（1905—1981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担任纳粹德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多年。1927年在柏林高等专科学校建筑专业毕业。先任助教，后做开业建筑师。1931年1月加入纳粹党。次年成为党卫军成员。纳粹党掌权后，在为纽伦堡召开的胜利的党代会做布置设计等工程中，深得希特勒赏识。自1933年冬起，成为希特勒的建筑师和亲信。1937年被希特勒委任为“振兴德国首都建筑总监”（副部长级）。1942年2月被任命为“托特组织的首脑”和军备与军需部，1943年9月改为军备生产部部长。同年三四月，又先后兼任“军事经济全权总办和中央计划局领导成员”。在希特勒授予全权的支持下，支持整个战争经济，推行新的军事生产体制，动员工业界人士，挖掘经济潜力，大量使用战俘和强制的外国劳工以克服劳力不足，迅速提高军备生产，对纳粹德国后期的战争起了重大作用，被称为德国经济的“施佩尔时代”。1946年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以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判处20年徒刑。1966年刑满出狱。

罗兰德·法莱斯勒（1893—1945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德国人民法庭庭长。血腥镇压德国反法西斯人士的刽子手。

早年担任过律师。1925年加入纳粹党。1934—1942年任帝国政府司法部国务秘书，曾参与起草新刑法，加强法西斯独裁恐怖统治。1942年1月，他是罪恶的万湖会议的15名参加者之一。从1942年8月起出任人民法庭庭长，因残酷无情被人们称为“绞刑法官”。1943年春，他主持对慕尼黑大学反纳粹进步学生团体——“白玫瑰小组”的审判。该小组5名成员中有4名（包括汉斯·朔尔和索菲·朔尔兄妹）被杀害。1944年“七·二〇”事件后，他秉承希特勒的旨意，残酷镇压反对希特勒的军人，包括两名元帅在内的5000多名密谋分子惨遭杀害。1945年3月，在美英空军空袭柏林时被炸身亡。

## 第二节 纳粹侵略军中的战犯

威廉·凯特尔（1882—1946年）

威廉·凯特尔是纳粹德军高级将领中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列为首要战犯，并处以绞刑的仅有的两人之一；他是希特勒在德国武装部队中最忠实的走狗。

凯特尔生于甘德斯海姆，是农场主的儿子。1901年，高中毕业后，凯特尔入伍到德意志帝国的陆军炮兵部队。1914年夏，已升任中尉副官的凯特尔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了纳慕尔、马恩河、凡尔登等重大战役。“一战”后，他依然留在德军中服役。

希特勒上台后，凯特尔积极投靠纳粹党，当年即被任命为国防会议工作委员会主席，并被破格晋升为少将。1935年，经希特勒授意，凯特尔由师长再次被破格提升为陆军部军事政治管理局局长和内阁军事部长的秘书长，开始进入纳粹最高决策层的外围。1937—1938年，又接连晋升为中将和上将。1938年2月，急于发动并吞奥地利战役的希特勒，极力树立自己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大肆排斥异己势力。他伙同戈林，靠施展阴谋，撤销了老牌陆军将领布隆贝格的国防部部长职务；接着又迫使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和另外13名高级将领辞职；同时，戈林任命凯特尔为新近组建的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使之一跃成为希特勒最亲信的军事顾问。从此，实际上形成了最高统帅部与陆军总司令部分庭抗礼进而凌驾于其上的不正常局面。1940年1月27日，凯特尔受希特勒委托，在其1939年12月14日下达的侵占挪威和丹麦的命令基础上，下令制订代号为“威悉河演习”的N计划。凯特尔在计划中提出该计划应在元首的亲自直接监督下制订，一经实施，便为希特勒确立在德军中的“最高统帅地位”铺平了道路。这一计划导致挪威和丹麦两国被纳粹德国侵占。为表示对凯特尔的酬谢，希特勒于1940年7月授予他元帅军衔。凯特尔于1941年5月31日签署了《巴巴罗萨地区特别管辖权和军队特别措施》，公开授权德军任意杀害苏联公民和

战俘。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之日起，凯特尔更加处处迎合希特勒。凯特尔直接参与策划、制定和实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以及从侵占波兰起到德国战败为止的各项战争计划和侵略暴行；并多次下达有关残害、屠杀苏军战俘、游击队员和人质以及掠夺占领国财产等的罪恶命令。根据纳粹德国陆军负责处理战俘的负责人阿道夫·韦斯特霍夫供认，凯特尔是造成1944年50名从纳粹集中营越狱未遂而遭杀害的3名罪魁祸首之一，正是凯特尔、希姆莱和戈林，在越狱事件发生不久，上述3人在希特勒出席的一次会议上，议定出“严厉措施”，即对胆敢逃跑的战俘，一经抓回，格杀勿论，从而彻底沦为不折不扣的战争罪犯。

凯特尔还是炮制纳粹德国屠杀占领区和平居民的“夜雾命令”的两大首犯之一（另一个是希特勒本人）。1941年12月7日由希特勒发布，并经凯特尔签署，“夜雾命令”出台。它规定：任何人在德国占领区“危及德国人安全”，只有在判处死刑的前提下才进行审理，否则都应秘密押送德国，并使其亲属无从得知下落，就像消失在茫茫夜雾中一样。1942年2月，凯特尔又进一步发挥，发布了补充命令，规定囚犯被捕8天后未被判处死刑者，即应秘密遣送德国处决。该命令由“党卫军保安勤务处负责执行”。这一命令造成的受害者确切人数不详，但至少当数以万计。

1945年4月，当战火已蔓延到德国全国，首都柏林已被苏军合围的危急时刻，希姆莱和戈林等要员纷纷离去之时，凯特尔和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约德尔，却表现出对元首的无限忠诚，竭尽全力，试图从外围调集全部机动兵力，为柏林和希特勒解围。同年5月3日，凯特尔出席了希特勒的继承人邓尼兹政府召集的波希米亚问题会议，参与了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军有组织地撤至西部战场向美军投降而避免使其落入苏军手中的图谋。5月8日深夜，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尔斯特正式举行的德国投降签字仪式上，凯特尔和海军上将弗雷德堡、空军上将施图姆普夫代表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宣布向苏、美、英、法四国无条件投降，并在《德国武装部队投降书》上签字。5月13日，凯特尔被

盟国调查人员逮捕。1946年10月1日，经过近一年审判后，凯特尔以战争罪、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被判处死刑，并于10月16日执行绞决。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1890—1946年）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生于1890年。1910年武备学校毕业后入德国陆军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任炮兵连长，战绩平平。战后继续在德国国防军中服役。20世纪20年代入高等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调至陆军总部任作战参谋。纳粹党上台后，开始积极支持希特勒，并受到元首的器重。1935年，升任陆军总部防务处处长（上校军衔），此期间积极参与进军莱茵非武装区的军事作战计划和吞并奥地利的“奥托方案”。1938年10月调任驻奥地利德军某师炮兵主任。1939年8月被破格提升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部长，少将军衔。从此，约德尔成为希特勒在军事作战方面的主要顾问之一，直接参与策划德军的各项侵略扩张计划和行动。在纳粹进攻挪威、丹麦和南斯拉夫的战争中，约德尔起到了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1940—1941年，他是代号“巴巴罗萨计划”进攻苏联作战计划的主要炮制者之一，并签发该计划。战争期间，他曾签发有关屠杀苏军战俘的军令，对德军早已存在的屠杀战俘的暴行起到进一步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1944年晋升为陆军上将。约德尔对希特勒无比忠诚，当柏林被包围后，他仍旧认为，如果德军第九集团军与第十二集团军从南面和东南面夹击苏军，就可能突破苏军的合围圈，救出希特勒，挽救第三帝国。他和凯特尔一起命令德军不顾一切向柏林进行突击，并把不服从命令的将领撤职，把逃兵吊死在树上示众。希特勒自杀后，纳粹上层准备投降。约德尔主张，要投降只能投降英美盟军，而不能向布尔什维克低头；任何一个希望自己不受德国人民永远诅咒的德国人，都不可能签署把数十万德军官兵交给苏联人的文件。1945年5月7日，希特勒的继承者邓尼兹政府看到继续抵抗已无可能，被迫同意接受在各条战线的总投降。同日，受邓尼兹委派，约德尔和弗雷德堡上将一起来到法国巴黎以东兰斯的英美盟军总司令部，代表德军向英美盟军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不久，约德尔以战犯身份被英美盟军司

法人员逮捕，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1946年10月1日，他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被判处绞刑，并于10月16日凌晨1时执行。

艾尔哈德·米尔希（1892—1972年）

艾尔哈德·米尔希是被美国军事占领当局单独立案审判的唯一一个顶尖级纳粹乙级战犯。美军司法当局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之后，单独在纽伦堡审判的12个乙级战犯审判案中的第二个就是米尔希审判案。

米尔希生于德国威廉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军服役，先任陆军炮兵团少尉，又任航空搜索队中尉队长，战争结束时任第六驱逐机队队长。战后，米尔希先后担任德国某民航公司航空队长、警察航空中队长等职。1923年，他又担任了容克斯航空公司飞行管理部主任，3年后转任新成立的德国航空公司经理，1929年升为总经理。在他的出色管理下，该民航公司压倒了其他新兴的民航公司，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航企业。在具有军国主义复仇思想倾向的米尔希的全力支持下，德航公司成为秘密组建德国空军的骨干机构之一。希特勒于1933年1月上台后，其亲信戈林就把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行战友米尔希拉入自己担任部长的航空部，并任命他为副部长兼装备部部长。从此，米尔希全力投身纳粹事业，并得以步步高升。1934年，他在航空部刚刚工作了一年，就被戈林从上校连升数级，成为空军中将。在米尔希指导和组织下，德国空军几年内就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之一。希特勒十分赏识米尔希对于重建德国空军所表现出的重大功绩，于1938年晋升他为空军上将。1939年2月又任命他为空军总监。由于担任空军总监，米尔希在“二战”中几乎没有上过战场（仅在1939年一度指挥第五航空队），而是负责组织协调工作。他对此表现出非凡的才干，顺利地解决了战争期间纳粹空军组织方面的许多问题。故此，德国占领法国之后，希特勒擢升他为空军元帅。1943年1月中旬，他被任命为“领袖特派员”，前往东线指导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德国陆军第六集团军，但希特勒没有采纳其建议。战争中后期，他主要负责空军的军火

生产，组织研究 V-1 火箭和 V-2 火箭，并一度受命同施佩尔一起掌管整个运输部门。

“二战”结束，米尔希作为乙级战犯在纽伦堡美军军事法庭受到审判，并于 1947 年 4 月 17 日被判处终身监禁。1954 年被提前释放，此后定居在西德，直至去世。

阿尔勃特·凯塞林（1885—1960 年）

阿尔勃特·凯塞林是被盟军方面判处死刑的极少数纳粹高级将领之一。

他生于知识分子家庭。1904 年中学毕业后到巴伐利亚的炮兵部队服役，三年后晋升为少尉。不久，进入慕尼黑的炮兵与工程学校系统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凯塞林作为上尉参战。战争结束，他继续留在国防军内服役。纳粹上台之前，凯塞林担任驻德累斯顿的炮兵第四团某营营长。

希特勒掌握政权以后，大肆进行扩军备战。空军更是其优先发展的军种。1933 年 10 月，已被晋升为上校的凯塞林奉命参加空军的重建工作，到新成立的航空部负责行政事务。1935 年，他再次因业绩出色而被擢升为少将。1936 年又升任中将，并担任了空军参谋长的重任。至此，整个空军部队的组织与训练，高炮部队、空军通信部队、空降兵的战斗使用及后勤保障，都掌握在凯塞林手中。1938 年初，第三帝国对空军进行整编，凯塞林由空军第三军区司令调任空军第一航空队司令官。

在 1938 年，凯塞林两度率部出动，参加了纳粹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乃至占领整个捷克的罪恶行动。在纳粹德国侵占波兰的战争中，凯塞林所部奉命支援德军北方集团军的地面作战。他亲自驾驶飞机突击波军，轰炸波兰首都华沙。波兰投降后，凯塞林因指挥有方和作战勇敢，被授予骑士铁十字勋章。1940 年 5 月，已调任第二航空队司令官的凯塞林在西线参战。他首次使用伞兵和空降兵部队对荷兰、比利时的要塞发动攻击。法国即将全境沦陷、英国远征军准备撤回英国之时，又遭到第二航空队的猛烈轰炸。凯塞林高超的指挥能力受到希特



勒的青睐，同年7月19日，希特勒将米尔希、凯塞林、施佩尔三人同时晋升为空军元帅，其中凯塞林是越过上将军衔直接被授予元帅军衔的。侵苏战争爆发后，第二航空队被调往东线参战，负责支援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作战行动，掩护该部突破明斯克、斯莫棱斯克，进而合围莫斯科。每次战役开始，均由第二航空队对上述地区进行狂轰滥炸，取得了一定战果。1941年11月，英军在北非地区大举增兵并开始反攻，德国及其盟国意大利的部队处境危险。于是希特勒任命凯塞林为南欧战场德国空军总司令，管辖驻在意大利南部和希腊南部的两个航空队和其他加强部队。由于凯塞林的空军部队有力地保护住后勤补给线，隆美尔率领的北非德军才免遭厄运并发起反攻，重创英军第八集团军，夺回昔兰尼加，攻占托布鲁克要塞。1942年11月，美军在北非登陆，形势对德军极为不利。在被迫分散兵力的情况下，凯塞林仍然夺得局部控制权，建立了“凯塞林隘道”，并在此击败美国第二军。在北非战役的最后阶段，凯塞林接连获得栎树叶勋章。英美军队在西西里登陆后，意大利与盟国秘密签订停战协议，不仅停止抵抗盟军，而且准备反戈一击。在此紧急时刻，凯塞林与德军驻意大利北部集团军总司令隆美尔一起，抢先采取行动，将意军全部62个师中的43个解除武装。随后，希特勒采纳了凯塞林的意见，并任命他为西南战区总司令。此后，凯塞林率部在意大利中部构筑了多条防线，对盟军展开顽强抵抗，直至1945年初，才撤至亚平宁山脉负隅顽抗。1944年7月19日，当他服役届满40周年之际，希特勒授予他栎树叶钻石勋章。1945年3月，凯塞林接替隆斯德特出任西部战区总司令，负责从北海到瑞士一线的作战指挥；战争接近尾声时，他又出任南线总司令。直至德军彻底崩溃，他才率部向美军第101空降师投降。

1947年5月，凯塞林被送到驻在威尼斯的一个英国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并被宣布以战争罪和破坏和平罪判处死刑。但不久出现了冷战形势，英美方面企图利用这位著名统帅进行反苏活动，因而将他改判为终身监禁；1952年10月，又将他释放出狱。获释后，凯塞林迁居西德，主要活动是撰写回忆录。1960年7月16日因心脏病去世。

费迪南德·朔尔内（1892—1973年）

乙级纳粹战犯，纳粹陆军元帅。

费迪南德·朔尔内 1892 年 6 月 12 日生于慕尼黑。青年时代曾在巴伐利亚近卫步兵团服役一年，以后入慕尼黑大学攻读哲学和近代语言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迅即报名参战。在与罗马尼亚军队作战中，他获得普鲁士高级勋章，并晋升为中尉。战争结束时，他担任第 21 步兵营某连连长；并获准留在部队继续服役。1923 年 11 月，他奉命率部镇压啤酒馆暴动，然而他不久却接受了纳粹主义。波兰战役结束后，他因战功晋升为少将。以后他相继率部参加了入侵希腊和苏联战役，屡立战功。由于狂热地拥护纳粹制度，战争后期成为希特勒的亲信。1944 年 3 月，朔尔纳获得栎树叶勋章，并调任陆军总司令部民族社会主义督导部部长。任该职 14 天后，又被破格提升为上将。同年 4 月，又被任命为苏德战场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7 月改任权力更大的北方集团军群司令。1945 年 1 月担任防守柏林门户的奥得河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4 月，希特勒将他晋升为元帅。在希特勒的政治遗嘱中，朔尔纳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作为一名怙恶不悛的战犯，朔尔纳直到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仍命令驻扎在捷克境内的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对盟军负隅顽抗，阻止了战争进程尽早结束，增大了作战双方的伤亡人数。“二战”后，美军将他引渡给苏军。他作为纳粹战犯受到苏联军事法庭审判，并判处 25 年监禁的重刑。1955 年苏联同西德改善关系，朔尔纳被提前释放，并送到东柏林。但他拒绝留在民主德国，而于同年回到慕尼黑。1957 年，慕尼黑法院的检察官发布公告，搜集朔尔纳的战争罪行材料，不久判处他 4 年徒刑。

艾利希·冯·曼施泰因（1887—1973年）

为希特勒的侵略扩张政策立下汗马功劳的纳粹德军高级将领，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

艾利希·冯·曼施泰因于 1887 年 11 月 24 日生于柏林一个贵族家庭。生父和养父均为陆军少将，母亲出身于东普鲁士的名门望族。1900 年进入少年候补军官团学习，后入高级军官学校学习，正式入伍后又曾

到陆军大学深造。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曼施泰因就主动报名参战。他先后转战东、西两条战线，参加过波兰、塞尔维亚、凡尔登和索姆河等著名战役。战后留在部队，从事陆军重建计划的制订工作。1929年调到国防部参谋本部，并多次出国考察（包括苏联）。希特勒上台后，开始大规模扩军备战，曼施泰因得到了迅速提升的机会。1934年他出任柏林第三军区司令部参谋长，1935年晋升为陆军总参谋部作战处长，1936年再次被提拔为德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长，军衔也晋升至少将。1938年，受总参谋长博克委托，参与了制订入侵奥地利的作战计划；次年，作为集团军参谋长，参加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占领。1939年9月1日，德军发动对波兰的入侵战役。身为参战主力部队——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的曼施泰因，创造性地实施了闪击波兰的“白色方案”作战计划，避实击虚，保证了德军以很小的代价取得首战告捷。以后，在参与制订入侵西欧各国的作战计划时，曼施泰因反对陆军总部模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军实施的“史利芬计划”而制订的“黄色方案”，坚决主张德军应以装甲部队为先导，从地形比较复杂但能出奇制胜的阿登山区实施主要突击，直插加莱海峡，围歼比利时境内的盟军，再从西、北两个方向夹击巴黎，为最后击败法国创造条件。在希特勒的全力支持下，德军最高统帅部依照曼施泰因的意见修改了作战计划，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占领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为此，希特勒下令授予他骑士十字勋章。侵苏战争开始时，曼施泰因任军长的第56装甲军在北方战线进展神速，被希特勒晋升为十一军团司令，受命去攻占克里米亚半岛。在苏军拥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不利条件下，曼施泰因灵活地调整战略部署，集中优势兵力，于1942年5月攻陷苏军的战略要地刻赤，6月30日又攻占了苏军坚守长达8个月的海军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完全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为此，他受到希特勒通令嘉奖，并被晋升为陆军元帅。当年8月，他又被希特勒派往北线，负责攻占列宁格勒。事未奏效，他再次奉派到南线援救已被苏军合围的第六军团。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他还是有力地阻止了苏军的迅速推进，并夺回刚刚被苏军解放的哈尔科夫和别尔戈罗德两座重镇。自库

尔斯克战役以来，曼施泰因与希特勒的分歧日见激烈和表面化，1944年3月希特勒将他解职。1945年，曼施泰因被英军抓获。不久，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被判处18年监禁。1953年因健康原因提前获释。1973年6月11日病逝。

盖尔德·冯·伦德施泰特（1875—1953年）

纳粹将领。曾两次担任西线德军总司令，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

盖尔德·冯·伦德施泰特生于德国军人世家，其父官至骑兵少将。伦德施泰特17岁时毕业于高级军校，随即入伍。后来曾入军事学院深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上尉逐步晋升为少将。战争结束时任西线德军第15军参谋长。战后留在部队继续服役，累任骑兵师参谋长、集团军参谋长、骑兵师长、柏林第三军区司令。纳粹上台前，已任第一集团军司令，下辖6个师。伦德施泰特为纳粹政权服务，始于入侵波兰。当时，他被任命为进攻波兰的南方集团军群司令，下辖36个师。德军迅速灭亡波兰，使他获得铁十字勋章。1939年10月18日，他被调往西线，任A集团军司令。他全力支持其参谋长曼施泰因关于修改“黄色方案”的主张，取得击败西欧四国的大捷，并晋升为陆军元帅。攻苏战役中，他率部全部围歼苏军基辅守军，俘敌66.5万人。1942年3月、1944年9月两度出任西线德军总司令。“七·二〇”事件中，他是最早宣布坚决支持希特勒、谴责政变分子的高级将领之一，受到希特勒的赏识，得以出任“德军荣誉军人法庭”主席，负责审判参与政变的军官。1945年3月，被希特勒解职。“二战”后不久，在疗养地被美军逮捕并移交给英军，被囚禁在英国。1949年获释，定居于西德。

瓦尔特·莫德尔（1891—1945年）

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纳粹德国陆军高级将领。

莫德尔于1891年1月24日生于德国东普鲁士的廷根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其父是师范学校教师，后来又曾担任普鲁士皇家乐队指挥。从1909年起，莫德尔开始在德意志帝国军队中服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西线同英法军队作战，曾参加凡尔登战役。因数度负伤而获得

高级勇敢勋章。战争结束时，军衔已达上尉的莫德尔继续留在陆军服役。纳粹上台前，莫德尔担任团长。1938年晋升为少将。1939年9月，莫德尔作为德军陆军第四军参谋长参加了入侵波兰战役，并因在拉多姆战役中围歼大量波军而立下战功，并升任德军第16集团军参谋长，赴西线同英法军队交战。1940年11月，莫德尔晋升为中将。

莫德尔真正获得希特勒的信任与赏识，始于入侵苏联。1941年6月，莫德尔指挥的第二坦克集团军第三坦克师，表现出一往无前的非凡气概。为此，1941年10月他被希特勒晋升为装甲兵将军，同时任命他为部署于莫斯科以北的第四十一坦克军军长。1942年1月，主攻方向为莫斯科的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包括莫德尔新任司令官的第九坦克集团军）在进攻中遭遇苏军优势兵力的顽强抵抗，并对德军部队实施穿插和包围，切断了德军的后勤补给线。德军的指挥系统也被打乱，各部队之间失去联系，情况十分危急。莫德尔在被苏军围困后依然保持着镇定和沉着，头脑冷静地估量了形势，向希特勒请求增调一个坦克军归自己指挥获准。他亲自指挥部队向苏军防线的最薄弱环节——勒热夫地区展开反攻击退了苏军的猛烈攻势，稳住了自己的阵线。这一战役使莫德尔获得希特勒的信任，获得了栎树叶勋章。从此，莫德尔被誉为“转危为安的人物”。1943年7月，德军发动库尔斯克战役受挫，遭到苏军的强大攻势，再次陷入困境。莫德尔于10月初暂时制止住苏军的攻击，被希特勒誉为“东线的救星”。1944年1月，苏军在列宁格勒东方和北方突入德军防线，莫德尔被希特勒再次重用，出任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他一面指挥大部队机动撤退，一面指挥各个部队伺机反击，终于在短时间内救出了处于危险境地中的部队，使其避免了被苏军分割包围的命运。由此，莫德尔被希特勒晋升为元帅。

在从苏联境内节节败退中，莫德尔下令部队实施焦土政策，对苏联人民犯下严重罪行。莫德尔最大的战争罪行是他作为德军驻军部队的最高司令官，下令对1944年8月的华沙起义进行极为残酷的镇压。德军使用自行火炮加强庞大的警察和党卫军部队，将起义者占领的街区一个接一个地夷为平地，并指使和纵容部下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规模屠杀被俘

的波兰起义者，将华沙起义置于血海之中，造成25万名波兰军民死亡。

1944年初冬，莫德尔又被希特勒任命为不断吃紧的西线德军总司令。同年12月，莫德尔指挥德军在阿登山脉发动阿登战役，一度突破美军防御，全歼美军第十坦克师，西线盟军为之震动。直至盟军于1945年1月发动大规模攻势，德军才被迫开始撤退。4月17日，在鲁尔战役中，莫德尔指挥的B集团军群几乎被美军全歼，鲁尔工业区全部被美军攻占。莫德尔见大势已去，在杜伊斯堡附近的一个密林中开枪自杀，逃避了作为战犯被押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命运。

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雷德堡（1895—1945年）

纳粹德国海军高级将领。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

毕业于军事院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海军中服役。战争结束后继续在海军中供职。纳粹党上台后，积极追随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升任海军上将。1945年5月1日至5月9日继邓尼兹之后任纳粹德国海军总司令。受希特勒的继承人邓尼茨委托，代表德国到兰斯盟军总部谈判并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不久，怀着对希特勒尽忠的心情自杀身死。

瓦尔特·瓦尔利蒙特（1894—1977年）

纳粹德国高级将领，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

1913年入伍，不久即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升任中尉。西班牙内战期间，作为德国陆军部的全权代表率军协助佛朗哥政权作战。1937年提出《瓦尔利蒙特备忘录》，为1938年希特勒改组全国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后成为约德尔的副手。1939年兼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国防处处长，主持新兵补充工作。1940年8月晋升为少将。同年12月，受命同约德尔一同制订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1944年4月获得上将军衔。“二战”结束后，于1948年被判终身监禁。后来因冷战爆发减为8年徒刑，1957年获释。

保罗·路德维希·冯·克莱斯特（1881—1954年）

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纳粹德国陆军元帅。是纳粹德国上层集团策划入侵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南斯拉夫和苏联的侵略罪行的

重要参与者。

克莱斯特于1881年8月8日生在德国布劳恩非尔斯的一位教授家中。他的祖先本是军人世家，其高祖曾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麾下的元帅，其曾祖父、祖父也多是勇敢的军人。他本人高中毕业后，被送往野战炮兵第三团任见习军官，一年后升为少尉；1910年再升为中尉，并考入军事学院深造。1913年军事学院毕业，次年以近卫骠骑兵第一团上尉连长的身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的首次重要战役是坦能堡会战。1917年调任近卫骑兵师首席参谋官。同年11月，该师奉命开往西线，先后参加了兰斯、香宾、马斯河战役。德意志帝国崩溃后，克莱斯特加入义勇民团，以后进入国防部步兵第六指挥部，1921年晋升为少校，1926年晋升为中校，1928年任骑兵第二师参谋长，1929年晋升为上校。1931年任驻波茨坦的步兵第九团团团长，次年升任骑兵第二师师长，军衔也升为少将。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军衔又被提为中将。1936年，由于纳粹党政府大力扩充军备，克莱斯特担任驻布雷斯劳的第八军军长。1938年，鉴于克莱斯特参与了反对纳粹党和希特勒本人的密谋活动，他被要求免职退役。后来，因为发动世界大战的需要，根据1939—1940年的动员计划，克莱斯特重新入伍，并被任命为第十集团军属下的第一坦克军军长。

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克莱斯特的第一坦克军迅速突破波军防线，在拉多姆附近与来自北线的古德里安第二坦克军合围了波兰军队。装甲部队独立作战获得胜利，这在德国军事史上还是第一次，克莱斯特和古德里安以装甲兵一线指挥官的身份获此殊荣。

1940年纳粹德国攻击西欧国家时，克莱斯特出任A集团军群的坦克集群司令，总共统辖2000辆坦克，共有5个坦克师和1个步兵军，共5个摩托化师，成为该战役的突击主力，该部在进攻的第一天夜晚就突破了比利时军队的边境防线。6月5日以来，克莱斯特的部队又接连突破法国军队在贡比涅等地的防线，占领战略要地兰斯和里昂。6月22日，法军宣布投降。随即，克莱斯特获得骑士十字勋章，并晋升为上将。

1941年4月，为实现希特勒控制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克莱斯特指挥德军第一坦克军群，从保加利亚越过边境，攻入南斯拉夫，击溃南军主力第五集团军，占领贝尔格莱德，迫使南斯拉夫军队投降。随后，又入侵希腊，侵占雅典，迫使希腊军队投降；进而南下伯罗奔尼撒半岛，重创英国远征军。

在苏德战役中，克莱斯特指挥的第一坦克集群隶属于隆斯德特元帅指挥的南线德军。作为先锋部队之一，该部能打硬仗，进展神速，曾以600辆坦克击败苏联元帅布琼尼所部2400辆坦克；参加了合围近百万苏军的基辅战役以及围歼两个苏军集团军的亚速海会战。1942年9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希特勒撤换了与自己意见不和的利斯特元帅，提升克莱斯特为A集团军群总司令，并晋升为元帅军衔。他此后的最后一次辉煌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遭到惨败后，能够顶住苏军的凌厉攻势，并伺机夺回战略重地哈尔科夫等地。以后，在苏军的大反攻形势下，他指挥的部队一退再退，屡遭败仗。1944年3月，因不顾希特勒的意见，为保存实力而弃守克里米亚半岛，被希特勒解除一切职务并退役。

战争结束，克莱斯特在巴伐利亚居所为英军俘虏。1946年作为战犯，被引渡到南斯拉夫受审，被判处15年监禁；1948年又被引渡到苏联，关押在莫斯科监狱的单人牢房中。1954年被转移到弗拉基米罗夫卡的将官俘虏营，同年秋天病死于此。

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茨（1883—1948年）

乙级纳粹战犯，纳粹德国高级将领。

1901年入德意志帝国军队服役，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投靠纳粹政权，很快置身高级将领的行列。1935年晋升为中将军衔。1938—1939年指挥德军第三集团军先后侵占奥地利、苏台德地区和波希米亚。1939年9月1日指挥部队进攻波兰，继而任驻波兰德军总司令。后因同党卫军发生矛盾而被解职。1944年重新出任驻守法国的G集团军群司令。同年6月，因被登陆诺曼底的英美盟军击退，再次被解职。1945年春，一度担任驻守荷兰的德军总司令。“二战”结束后，作



为战犯被盟军逮捕，在纽伦堡看守所内等候接受美国军事法庭审判时自杀身亡。

维尔纳·布隆伯格（1878—1946年）

乙级纳粹战犯，纳粹德国陆军元帅。曾任纳粹德国国防部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在德军总参谋部任职，战后留任德国国防军。历任军训处处长、陆军管理局（实际上即陆军参谋部）军队办公室主任、第一军区司令。1933年1月由兴登堡总统委任为希特勒内阁的国防部部长。兴登堡总统逝世后，下令全军向希特勒宣誓效忠。1935年，布隆伯格兼任纳粹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他积极支持希特勒建立独裁统治，尽力主持纳粹德国早期的扩军备战。1936年，希特勒授予他陆军元帅军衔。1937年11月，在最高军政秘密会议上，他对希特勒提出的具体扩张步骤有所保留而触怒希特勒。不久，戈林之流即抓住其新婚夫人早年曾置身青楼一事大肆渲染，迫使他去职。“二战”后，布隆伯格因作为纳粹德国军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仍被视为战犯。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期间猝死于狱中。

瓦尔特·冯·布劳希奇（1881—1948年）

乙级纳粹战犯，纳粹德国陆军元帅。曾任纳粹德军陆军总司令。

1900年军官学校毕业后，即开始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升任炮兵上尉，后又调总参谋部任参谋。战后留在国防军任职。他积极主张重整军备，恢复德军的军威。1933—1937年历任第一师师长、普鲁士军区司令、第一军军长、第四集团军司令。1938年晋升为上将，并升任陆军总司令。随即指挥部队攻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1939—1940年相继指挥德军进攻波兰、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接连得手。1940年7月，由希特勒授予元帅军衔。1941年，指挥德军侵占南斯拉夫和希腊，再次得逞。但不久于6月进攻苏联时却遭到顽强抵抗，使希特勒的预定目标一再落空，于同年12月被希特勒解职。此后，布劳希奇转入预备役隐名度日。1945年作为战犯被英军抓获，后病死于汉堡战俘营。

弗里德里希·埃伯哈特

纳粹德军上将，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最高军事长官。1941年11月2日，他下达命令，如发生对德军的敌对行为，将处决300名人质。当月月底，他又把杀害人质的数量提高到400人。

### 第三节 党卫军中的主要战犯

卡尔·沃尔夫（1900—1984年）

党卫军系统内地位和权势仅次于希姆莱的第二号人物，首要纳粹战犯之一。

20世纪20年代之前任德国黑森大公国近卫团少尉。20年代经营广告事务所，直到1929年前后经济大危机时破产。1931年加入纳粹党和党卫军。因为对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忠心不二，1936年以后，地位迅速上升，相继晋升为党卫军司令官的首席副官、党卫军帝国领袖本部处处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又被希姆莱提拔为党卫军副总指挥衔（相当于上将），成为党卫军系统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1943—1944年受命全权指挥驻意大利德军。战争末期，受希姆莱秘密派遣，赴瑞士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特使杜勒斯谈判，密商驻意大利德军向盟军投降的条件。谈判虽未成功，但他联美反苏的立场却给美方谈判人员留下良好印象。“二战”后被盟军抓获，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作为首要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冷战爆发后，驻德美军当局经杜勒斯指示，下令将他释放。

戈特洛普·勃格尔（1896—1945年）

党卫军副总指挥，党卫军上将。

生于施瓦本，锯木厂主的儿子。早年当过正规学校的体育教师。自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军衔是少尉，战斗中曾负重伤。1935年加入党卫军，因对希姆莱忠心耿耿而很快升任党卫军旅队长（相当于少将）。1938年任党卫军中央技术管理处处长。1939年5月，勃格尔和特别机动部队督导处受命组建党卫军武装部队。当年9月进攻波兰时，这

支部队仅仅 18 000 人，而在两个月之后，激增至 10 多万人以上。同时，勃格尔建立了武装党卫军补充处，在 17 个党卫军地区总队设立了办公室。1940 年 6 月 1 日，他被任命为党卫军中央技术管理局负责人，成为扩充武装党卫军的关键性人物。经他的不懈努力，从境外德国人和西、北欧日耳曼国家中解决了兵源不足的难题，使党卫军总兵力从 1940 年的 10 万人发展到 1944 年的 91 万人。1944 年 8 月，希姆莱调他赴斯洛伐克镇压起义，担任驻斯洛伐克德军总司令。4 周以后，他将起义者置于血泊之中，重新夺得对该国的统治权。1945 年 5 月 9 日，勃格尔畏罪自杀。

泰奥多尔·艾克

党卫军副总指挥，党卫军上将，集中营事务总监，党卫军骷髅师师长。

泰奥多尔·艾克生于阿尔萨斯。1919 年就读于伊尔梅瑙工业学校，由于贫困而中途退学。1920 年以后，先后在多个警察局内任职，但不久均被解雇。由此，他只能把命运寄托于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和党卫军的生涯。1933 年 6 月底，希姆莱任命他为达豪集中营司令官。1934 年 6 月奉命率部除掉了冲锋队首脑罗姆，从此得以担任全国集中营事务总监兼党卫军看守部队领袖。1939 年 11 月，艾克奉命组建武装党卫军，并出任骷髅师师长。1940 年的对法国战役和 1942 年东线杰米扬斯克守卫战中，艾克的部队均表现得身手不凡。1943 年 2 月，在苏联哈尔科夫防御战中，泰奥多尔·艾克饮弹阵亡。

尤塞夫·塞普·狄特利希（1892—1966 年）

党卫军系统内的主要战犯之一。

1911 年参加德皇的军队，几年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参加纳粹党，成为该党的早期党员和希特勒的主要亲信之一。1928 年出任希特勒的警卫队长。1933 年纳粹党上台后，以党卫军地区总队长的军衔统率阿道夫·希特勒旗队。1934 年 6 月亲率人马，受命处决了罗姆等不服从希特勒的冲锋队首领。“二战”爆发后，出任武装党卫军坦克军军长，参加了对法国和苏联等国的入侵。1943 年 9 月意大利发生推

翻墨索里尼的政变后，负责保护被德军特种部队解救出来的墨索里尼。1944年6月英美盟军实施诺曼底登陆后，奉命以党卫军总指挥衔赴西线指挥武装党卫军第六装甲集团军，参加部署对盟军实施阿登地区的突然反攻计划。“二战”后，作为战犯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25年监禁，1955年提前释放。1957年慕尼黑地方法庭又判处他18个月监禁。刑满释放后定居在原西德。

弗里德里希·耶凯伦

党卫军驻拉托维亚地区司令官。他于1942年初承诺：“尽快将该地区的犹太人的数量从29 500人减少到2 600人”，并且提前兑现了这个诺言。在他的指引下，拉托维亚的犹太人遭到灭顶之灾。党卫军把距离首都里加8公里的隆布拉森林当作屠杀犹太人的固定刑场，一次就杀害了4 000名本地犹太人。此后，类似的大规模屠杀至少延续到1943年。德国等地的犹太人也被押解到此杀害。

### 第四节 纳粹德国政府中的甲级战犯

菲利普·布勒（1899—1945年）

主要的纳粹战犯之一，曾任纳粹德国总理办公厅主任。

菲利普·布勒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加入纳粹党，参与编辑纳粹党报《人民观察报》。1933年出任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成员和国会议员，获党卫军旅队长军衔（相当于少将）。1934年任慕尼黑市警察头目，同年兼任元首与总理办公厅主任，直至“二战”结束。他的职责是处理希特勒的各种文件事务等，并兼任纳粹党保护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监察委员会和德国历史书籍与教育资料研究会主席。他也是受命于希特勒，积极推行对本国和被占领国家的精神病人和重病患者实行残酷的“无痛致死纲领”的罪魁祸首之一，这一纲领使10万余名无辜居民丧失生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追随戈林。1945年5月纳粹政权崩溃后畏罪自杀。

施维林·冯·特罗西克（1887—1952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第三帝国财政部长。早年在洛桑大学和牛津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学。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德国财政部任部务主任等职。1932年6月，出任巴本内阁财政部长。纳粹党执政后，继续留任，负责筹措重整军备的资金。1935年2月，授权用赊欠方式积累物资。1935—1938年积极支持纳粹党的反犹政策。1945年4月下旬潜逃到德国北部；同年5月被希特勒的继承人邓尼兹任命为外交部长。“二战”后于1949年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10年监禁。1951年获释。

奥托·蒂拉克（1889—1946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先后任纳粹德国人民法庭庭长和司法部长。早年在马尔堡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加入纳粹党。初任民族社会主义律师联盟负责人；1933年纳粹上台后出任萨克森邦司法部长，1935年任最高法院副院长；1936年任人民法庭庭长；1942年又任司法部长，受权建立纳粹党指导处司法办公室。同年9月18日同希姆莱达成协议，同意第三帝国中央保安总局有权修改法院的判决并驱使被判3年以上徒刑的波兰人和被判8年以上徒刑的其他犯人从事奴隶劳动，有权对东方占领区的非德意志人行使刑事司法权。1943年夏，蒂拉克又向中央保安总局移交对全体犹太人的刑事司法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盟军司法当局逮捕，不久在诺伊明斯特拘留所自杀。

波恩哈德·卢斯特（1883—1945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纳粹德国科学、教育与人民文化部长。早年在柏林、慕尼黑等大学求学。曾担任中学教师。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2年加入纳粹党。1925年出任该党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领袖。1933年2月任普鲁士邦科学、艺术与教育部长，大力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1934年出任纳粹德国科学、教育与人民文化部长，直至希特勒政权垮台。任内大肆迫害进步知识分子，向青年灌输军国主义教育和种族主义思想。“二战”结束后畏罪自杀。

赫伯特·巴克（1896—1947年）

首要纳粹战犯之一，纳粹德国政府食品和农业部长。早年就读于哥廷根大学。1931年加入纳粹党，并被任命为他所居住地区的农民政治组织头目。1933年10月出任政府中的食品与农业部国务秘书，翌年发起“生产运动”，旨在增加国内的粮食产量，减少进口。1936年任“四年计划”食品专员，负责协调农业和工业政策。1942年5月接替达利的部分职务，负责对苏战争的粮食供应。1942年年底任德国“农民领袖”。次年4月1日任食品与农业部长。战后，在纽伦堡法庭的监狱中自杀。

### 第五节 乙级战犯

维尔纳·拜斯特（1903— ）

纳粹德国驻丹麦占领区总督。早年攻读法律。192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纳粹党执政后先后担任黑森邦警察局长、黑森邦政府首脑、盖世太保首席法律顾问和中央保安总局盖世太保局第一处处长。1936年，他代表盖世太保与德国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利斯签订了代号为“十戒”的协议，明确划分了二者的职权范围。“二战”爆发后，于1939年9月至1940年6月任纳粹德国中央保安总局第一处处长，参与了对波兰人民的屠杀。1940年6月至1942年11月任驻法国占领区行政管理部部门长官，大肆镇压法国抵抗运动。从1942年11月起改任驻丹麦占领区总督，积极推行法西斯统治。战争结束时军衔为党卫军地区总队长（相当于中将）。战后于1948年被丹麦法院判处死刑，后改为5年监禁。1951年获释。1958年被柏林非纳粹化法庭处罚款7万马克。1969年3月被控在“二战”期间从事和参与大屠杀而入狱，1972年因健康原因获释。

库尔特·达吕格（1897—1946年）

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先后任纳粹德国治安警察总监和驻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长官。早年在柏林高级技术学校求学。1922年

加入纳粹党。1926年组建并领导柏林和北德冲锋队。1928年转入党卫军，任东部德国党卫军领袖。1933—1945年，任纳粹德国国会议员；还曾担任普鲁士内政部部务主任。1934年提升为党卫军地区总队长，支持清洗和改组东德地区冲锋队。1936年任德国治安警察总监。1942年任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总督，主持了利迪策大屠杀，并残酷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战后，于1946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经审判后被处决。

阿尔图尔·格莱泽尔（1897—1946年）

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纳粹德国驻瓦尔特兰合并区行政长官兼总督。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24年参与组建但泽地区钢盔团。1929年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翌年加入党卫军，并于11月任纳粹党但泽地区副领袖。纳粹上台后，于1933年6月任但泽参议院议长。1939年任波森—罗兹地区行政部门负责人。纳粹德国侵占波兰后，出任波兰境内瓦尔特兰合并区行政长官兼总督和大区领袖。他在纳粹分子中最先提出用毒气杀害犹太人，并在辖区内血腥屠杀波兰抵抗战士和爱国人士，还将大批日耳曼人移入波兰。1943年获得党卫军地区总队长军衔（相当于中将）。“二战”末期逃亡到阿尔卑斯山区。不久被美军抓获。战后由波兰引渡回国，并由波兰最高法院判处死刑。

尤塞夫·泰尔波文（1889—1945年）

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纳粹德国驻挪威占领区总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国军队中任中尉。战争结束后先后在弗莱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求学，后任银行职员。1923年参加慕尼黑啤酒馆暴动；20世纪20年代后期加入冲锋队和纳粹党。1930年当选为德国国会纳粹党议员。1933年任纳粹党艾森大区领袖，深得希特勒青睐。1939年9月任纳粹德国第六防卫区防卫专员。“二战”期间，于1940年4月起出任驻挪威占领区总督和党卫军地区总队长，任内积极镇压抵抗运动和屠杀犹太人。“二战”后在挪威畏罪自杀。

卡尔·汉克（1903—1945年）

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纳粹党下西里西亚大区领袖。

年轻时当过磨房工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参加了纳粹党的活

动。1932年当选为德国国会议员。1933—1941年出任纳粹德国政府的国民教育和宣传部国务秘书，协助戈贝尔工作。1941年外放，任纳粹党下西里西亚大区领袖。1945年4月，希特勒在柏林困守时曾指令其接任希姆莱的一切职务。纳粹德国倾覆后，逃窜至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被击毙。

尤塞夫·比凯尔（1895—1944年）

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纳粹德国驻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民政机关首脑。早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担任教师。1925年离职在家乡组建纳粹党地方组织，翌年任该党莱因兰—法尔茨大区领袖。以后出任国会议员（1930—1944年）。1934年任德国驻萨尔区全权代表，次年该地区归还德国后改任中央专员。1938年4月23日晋升为纳粹德国奥地利总督和纳粹党维也纳大区领袖，受命在一年内使奥地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一于德国。1940年改任阿尔萨斯—洛林区民政机关首脑，任内曾将10万法国籍民众遣送维希傀儡政权辖区。1944年9月，见纳粹德国大势已去，遂自杀。

奥托·阿贝茨（1903—1958年）

主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纳粹德国高级外交官。

大学毕业后任女子学校教师，后从事青年运动，受纳粹党委托负责联络法国退伍军人。1935年1月进入外交界。1937年加入纳粹党，负责在法国进行间谍活动；1938年事泄，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后，出任纳粹德国驻法国大使兼法国占领区高级专员。他伙同盖世太保和保安勤务处，大肆镇压法国的抵抗运动，并对维希政权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加以控制，积极支持法国死心塌地的卖国贼赖伐尔复任总理。1944年8月巴黎人民发动起义时潜逃回德国。“二战”后，于1949年被法国军事法庭判处20年监禁。1954年获释。

鲁道夫·拉恩（1900—1975年）

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纳粹德国高级外交官。

早年在海德尔堡大学获博士学位。1927年在国际联盟秘书处供职，并先后在德国驻土耳其（1931—1934年）、葡萄牙（1937—1939年）



和法国（1940—1943年）大使馆任职。1943年任纳粹德国驻意大利大使，同年改任驻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大使。任内极力控制墨索里尼政权，大肆搜刮财富，并血腥镇压意大利抵抗运动。1945年被盟军逮捕。1951年获释，后以经商为业。

康拉德·亨莱因（1898—1945年）

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法西斯党头目。1933年纳粹党上台执政后，他仿效纳粹党建立苏台德德意志祖国阵线，多次接受纳粹德国的命令和资助。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他奉希特勒的秘密指令，积极参与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阴谋活动，公开要求苏台德地区完全独立自主，并组织暴乱。《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出任纳粹德国驻苏台德地区专员。1945年5月被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抓获后自杀。

弗朗茨·诺瓦克

专门负责处置和消灭犹太人的纳粹机构——中央帝国保安总局犹太人处处长艾克曼的得力助手。生于奥地利的沃尔夫斯堡。1933年加入纳粹党。他对1944年纳粹对匈牙利犹太人的大屠杀负有直接的罪责。1961年被捕，1964年被判处8年监禁。但是，1966年再次受审时，却被法官宣布无罪释放。

奥托·狄特利希（1897—1952年）

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纳粹德国新闻业总头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军。战后在慕尼黑、法兰克福等大学攻读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1921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31年始任纳粹党新闻业头目，次年加入党卫军。为纳粹党的竞选活动大力组织宣传攻势，并利用姻亲关系为希特勒同鲁尔地区的垄断资本家的合作穿针引线。从1933年起主持德国新闻界“一体化”运动。1937—1945年任第三帝国政府新闻处长和宣传部国务秘书，极力向全国民众灌输法西斯思想，垄断战时战况发布权。“七·二〇”事件时在现场，首先向戈贝尔通报了希特勒大难不死的消息。“二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1949年被判处7年监禁，1950年获释。其著作主要包括：《同希特

勒一起夺取政权》、《民族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跟随希特勒 12 年》。

奥托·阿拜茨

重要的乙级纳粹战犯之一，纳粹德国驻维希法国大使。

本为职业外交官，早年加入纳粹党。1940 年至 1944 年出任纳粹德国驻维希法国大使，实为贝当和赖伐尔之流的太上皇。他参与策划或积极推行了诸如向法国索取巨额占领费用、驱逐法国犹太人、强迫法国青年到德国充当苦工、镇压抵抗运动等一系列罪恶活动。1949 年 7 月 22 日，巴黎军事法庭判处他 20 年劳役。1954 年 4 月，当时的法国政府秉承美国的意图极力与西德修好，破例将他释放。

库尔特·拜尔曼博士

纳粹德国布拉格特别法庭法官。1901 年 1 月 29 日生于基尔。他是残酷屠杀捷克抵抗战士与和平居民的刽子手，经他判处死刑的布拉格居民多达百人以上，其中许多并非抵抗战士，但依然难逃其毒手。例如，1944 年 3 月 24 日，他曾将 9 名捷克人判处死刑，其中 5 名系女性。他们无非是私藏了谷物或帮助危难中的犹太人。1946 年他被盟军引渡给捷克比尔森法院，关押在庞克拉茨监狱。同年，拜尔曼被判处终身监禁。1955 年捷克政府同西德实现邦交正常化，拜尔曼受到大赦，回到西德定居。

路德维希·贝尔纳博士

约翰·达奈格尔博士

生于 1905 年 8 月 17 日，1933 年 5 月 1 日加入纳粹党。

瓦尔特·艾塞尔

1904 年 12 月 3 日生。

海因利希·尤利乌斯·马克斯·哈尔鲍尔博士

生于 1905 年。

以上 4 人均为纳粹德国驻布拉格特别法庭的法官。经他们刑后被杀害的捷克平民，每人至少 50 余人。

各个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司令官以及领导层的其他官员都是够格的乙级战犯，例如：

鲁道夫·弗朗茨·霍斯（1900—1947年）

首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头号刽子手。（详见第六章）。

里哈德·鲍尔

党卫军少校。先后在奥斯维辛、多拉集中营担任司令官，应对20万以上的囚犯之死承担责任。自战争结束到1960年，一直逍遥法外。1961年在西德被捕，不久死于狱中。

汉斯·波特曼

党卫军上尉。纳粹德国驻波兰海乌姆诺灭绝营司令官。战争结束后于1946年4月畏罪上吊自杀。

泰奥多尔·艾克

纳粹德国第一个集中营——达豪集中营首任司令官。后升任全国集中营事务总监。1943年2月乘飞机赴东线视察时，被苏军炮火击中，机毁人亡。

赫尔曼·弗罗斯泰特

马伊达奈克集中营最后一任司令官。1945年4月因渎职罪被党卫军内部法庭判处死刑并执行。

奥托·佛尔什纳

多拉集中营司令官。“二战”结束后，被美军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执行。

卡尔·弗里彻

弗洛森堡集中营司令官。1945年4月在柏林战役中被击毙。

阿道夫·哈斯

贝尔森集中营前司令官（尤塞夫·克拉麦的前任）。1945年3月被击毙。

弗里德里希·哈尔特延斯泰因

先后任奥斯维辛集中营比克瑙分营司令官和纳茨维勒集中营司令官。战后先后被英军和法军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行刑前，因心脏病突发死于囚室。

格特利普·海令

贝乌泽茨灭绝营司令官。

1945年在德国斯图加特附近被击毙。

保罗·维尔纳

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司令官。在他的任期内，至少有10万名犹太人和战俘被杀害。战争结束后，他逃过英军的追捕，化名隐居到瑞士，以风景画家的职业谋生。1952年，他认为风头已过，于是回到家乡与家庭团聚。1953年身份败露，被司法部门逮捕。1957年，西德一家法庭以“非人道罪”判处其9年徒刑。1962年获释，在一家保险公司做事。

## 第六节 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中的纳粹战犯

卡尔·豪斯赫费尔（1867—1945年）

德国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推广者，德国地理政治研究所所长，他的理论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

豪斯赫费尔认为，弱小国家人口过少，领土多余，没有权利独立生存；而有的国家对于生存空间拥有自然权利，可以不顾那些无力开发自己领土的所有者的权利。以强凌弱，以多凌寡是自然的。他早就对瑞典、芬兰和波罗的海诸国怀有可侵略的观点，又曾委婉地表示过假定某个强国可能对俄国采取极端行动。他在希特勒1923年11月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入狱期间经常前去看望，传说他几乎向希特勒口授了《我的奋斗》有关外交政策的第16章。1924年豪斯赫费尔创办了《地理政治学》杂志，该刊物以后成为纳粹主义的宣传中心之一。纳粹上台后，他在慕尼黑成立了地理政治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他一生撰写过和编辑过20多本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作品，其中《德意志民族及其生存空间》一书后来成为纳粹青年的入门教材。他所领导的地理政治学研究所雇用了上千人，为纳粹政权提供准备征服国家的图表、地图、统计数字和各种情报。第三帝国垮台后，豪斯赫费尔畏罪自杀身死。

V. 汉斯·尤斯特 (1890—1978 年)

纳粹统治时代的德国戏剧协会主席，希特勒、戈贝尔的帮凶。

早年学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进入文坛。1929 年任德意志文化战斗联盟文学小组主席。1933 年以纳粹党推崇的希拉格特（因反抗法国军队占领德国鲁尔地区而被法国当局杀害的德国人）为素材写成同名话剧而声名大噪。同年任柏林国家剧院艺术顾问和德意志文学院院长。翌年任普鲁士邦参议员。1935 年起任德国戏剧协会主席，直至纳粹政权垮台。任内一贯狂热鼓吹纳粹主义，吹捧和美化希特勒。“二战”后，于 1949 年被慕尼黑非纳粹化法庭判处三年半强迫劳动、罚款 500 马克和禁止写作 10 年。

汉斯·君特 (1891—1968 年)

纳粹德国和纳粹党的得力帮凶，种族主义理论家。

曾在耶拿、柏林和弗莱堡等大学任教。1929 年出版狂热宣扬纳粹主义种族理论、疯狂鼓吹消灭犹太人的专著《缺乏人种学的德意志人民》，受到纳粹党和极右翼势力的大力推崇。1930 年出任耶拿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后又兼任弗莱堡大学种族学教授。他积极协助罗森堡组建和主持“德意志文化战斗联盟”。君特一贯竭力鼓吹北欧日耳曼民族至上论，不遗余力地攻击诽谤犹太人和其他“劣等种族”，从而大受纳粹党头目们的青睐。“二战”后，由于西方占领当局的庇护，君特未曾受到应有的惩处，依然顽固坚持其系统的纳粹主义种族观点。

维尔纳·弗莱海尔·冯·布劳恩 (1912—1977 年)

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德国核物理学家和火箭专家。

出生于普鲁士维尔西茨（今属波兰）。早年就读于苏黎世工学院。1930 年入柏林理工学院学习，同年参加德国航天学会，致力于研制液体燃料火箭。1932 年毕业。1934 年获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同年 12 月，成功地发射两枚试验性火箭，升高达 2.4 公里。从 1937 年起任德国佩纳明德军用火箭实验场技术主任。“二战”期间，领导研制纳粹德国视为至宝的 V-2 火箭，1944 年 9 月 8 日发射成功。在盟军攻占德军火箭发射场之前，德军在 7 个月内共向英国发射 V-2 火箭 3 600 枚。

“二战”结束时，被美军俘虏，随即与其他 112 名纳粹火箭专家连同 100 枚火箭及全部技术资料一同押解到美国。美国当局豁免了他的战犯身份，并要求他在美国继续从事火箭研究。1955 年加入美籍。以后历任美国马歇尔航天中心主任、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局长助理帮办等职，最终逃脱了欧洲被侵略国家的正义审判。1958 年参与了发送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载火箭的设计；1969 年，又作为主要技术专家，参与了阿波罗登陆月球。计划 1972 年退休，1977 年病死。

### 施泰尼茨

纳粹德国著名生物学家，“二战”前夕即担任德国黑林山细菌化学研究中心总监。他伙同纳粹德国的著名化学家施米特教授，于 1937 年研制出毒性特强的军用毒气塔崩，1938—1939 年又研制出比塔崩的毒性强 10 倍的毒气沙林。若非苏军特工人员实施“极点”行动，将黑林山研究中心炸毁，纳粹将使用这些毒剂杀害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1907—1967 年）

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德国垄断资本家、著名军火制造商（详见第六章）。

### 弗里德利希·弗利克（1883—1972 年）

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德国著名垄断资本家。

1913 年开始经营钢铁企业，20 世纪 30 年代初已在德国联合钢铁公司内占据统治地位。1932 年为兴登堡总统连任竞选活动捐款 95 万马克，并向纳粹党捐赠 5 万马克。翌年，他又分别向纳粹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捐赠 12 万马克和 10 万马克。1934—1944 年共向希特勒和纳粹党捐赠了 700 万马克。1937 年正式加入纳粹党，翌年出任“国防经济领袖”。通过积极参与侵略战争大发横财，估计战争后期其财产已超过 15 亿美元。大战期间，他所属的军工企业役使集中营犹太囚犯 48000 多人从事奴隶劳动，其中 80% 因劳累致死。1947 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为战犯，并判处 7 年徒刑。1951 年获释后重整企业，逐渐成为西德的首富，但一直拒绝为“二战”期间役使的集中营犹太囚犯支付赔款。

威廉·凯普勒（1882—1960年）

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德国垄断资本家。1927年加入纳粹党，联合许多大资本家资助和支持纳粹党。1931年组织凯普勒集团；翌年夏组建经济问题研究委员会，后演变为“希姆莱之友会”，积极扶持希特勒上台执政。1933年3月当选为德国国会议员，同年7月任经济事务中央专员。1935年加入党卫军。1936年任“四年计划事务顾问”，主管原料供应。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前夕，任希特勒驻奥地利特别代表，积极推动“德奥合并”的完成，曾一度任纳粹德国驻奥地利中央专员。随后参与策动斯洛伐克“独立”和挑起但泽危机。“二战”期间任外交部国务秘书，同时经营企业，并主管党卫军在波兰和苏联占领区掠夺的工业企业。1942年1月升任党卫军地区总队长。“二战”后于1949年4月被判处10年监禁。1952年2月获释。

阿贝茨·赫尔曼

重要的乙级战犯之一，纳粹德国金融巨头之一，德意志银行总经理。“二战”期间，在他控制了其监事会的许多德国企业——例如联合漆料工厂，使用了大批犹太儿童和波兰儿童做苦工，其中不少人不堪重负而悲惨地死去。当一位正直的德国厂医向他报告一名年仅8岁的犹太女孩非正常死亡时，他却冷漠地回答：“这件事与我毫不相干。”

“二战”结束后，南斯拉夫法庭缺席判处他15年监禁，然而他却连一天也不曾服刑。1950年，在西方占领当局的纵容下，赫尔曼在西德银行界重新谋得高位。他不仅在好几家德国的大银行担任总经理或总裁，而且在20多家大型企业的董事会中任职，其中包括巴登苯胺公司、联邦铁路公司等。

## 第七节 丙级纳粹战犯中的典型案例

丙级纳粹战犯的数量可谓多如牛毛，由于冷战在“二战”结束后不久迅即爆发，抓捕和审判他们的机会一再错过，人们恐怕永远也不能统计其准确数目，更无法弄清每个人的确切罪行。专家学者一般均认

为，丙级纳粹战犯的数量为12万—15万，保守的估算也在10万以上。我们不可能像介绍甲级战犯甚至像叙述乙级战犯那样来陈述哪怕是10%的丙级战犯的具体罪恶；而只能揭露其中罪行最为昭彰、又具有很强代表性的很少一部分。

勒·库尔特

纳粹德军空军第二步兵师第四团自行车连实验员，上等兵。27岁，非纳粹党员，入伍前是电影院老板。他在苏联一个军事法庭受审时供认：“……出于个人兴趣，我把被俘的红军与平民百姓一起开枪打死……除战俘外，我还枪杀过游击队员与和平居民，把房子连同里面的居民一起纵火焚烧。1942年11月，我参与了枪杀92名苏联公民的事件。在1942年4月至12月，即我在空军步兵团服役时，我也参与了枪杀55名苏联公民的事件，执行枪决的人就是我。”“此外，我还参加了惩罚性的讨伐行动和焚烧房子，在各村总共有30多座房子是我纵火焚烧的。我随着讨伐队进村，进入住户，并通知居民，任何人都不许离开住所……我点火烧着一所房子，不让任何人出来。要是有人企图离开房子逃走，就把他们赶回房子或把他们枪杀。我以这种方式烧掉的房子有三十几座，烧死和平居民70人，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我亲自枪杀的人总共有1200人……”

莫迪什

纳粹德军驻苏联斯莫棱斯克的第551战地医院助理医生。从1941年9月至1943年4月，他直接参与了杀害被俘的苏军伤病官兵的勾当。苏联军事法庭的一份材料表明：“莫迪什本人给被俘的红军官兵注射大量的毒毛旋花子疖和含砷制剂，因此丧生者不下24人。另外，他为了给德国军人治病而从6—8岁的苏联儿童身上抽取大量鲜血，导致这些儿童死亡。他还从苏军战俘身上抽取脊髓，使他们由于虚弱而造成下肢瘫痪。他还参与了对斯莫棱斯克市苏联医疗机构的洗劫活动……”

瓦尔特·居麦尔

他在担任诺因加默集中营女囚营看守期间，曾经于1944年12月和1945年2月分别将两名女囚刚刚分娩的婴儿残酷地杀害。战后很长一



段时间里，居麦尔始终不曾被法庭起诉。直到1982年8月，汉堡地方法庭才传唤他到庭接受审判。此前，当年77岁的居麦尔一直是养老金的正常领取者，生活无忧无虑。

## 第八节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取缔的犯罪组织

### 一、纳粹党

纳粹党是希特勒夺取政权的主要工具，也是他上台后统治全国的基本工具。1933年希特勒在取缔和解散其他政党之后，于7月14日颁布《禁止组织新政党法》，在整个德国确立了一党专政的政权体制。

纳粹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其党员人数从1933年1月的100万人增加到同年4月的160万人。1933年希特勒下令减缓发展速度，6月又规定新党员必须有两年候补期，然而纳粹党的人数继续急剧扩大，1935年为250万名党员，1945年达到850万名党员。

纳粹党政权还通过其下属的分支组织——德国公务员联盟控制着全国政府机构的120万公务人员，规定所有的公务人员都必须参加该组织。

纳粹党上台之前，就曾建立过一些外围组织，例如：希特勒主义青年团，民族社会主义妇女团，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等等。纳粹党执政以后，这些外围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而且还大量增设新的社会团体，将其控制网络伸向整个社会。1935年3月，纳粹党颁布了一项有关党务的法令，将其下属的所有社会团体划分成两大类：一类被确定为党的分支组织，从结社法的角度看，是属于纳粹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类组织除党卫军和冲锋队以外，还包括希特勒主义青年团（其中又包括学龄团员组织和少年队）、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盟、德意志少女联盟、民族社会主义机动车驾驶团、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教师联盟、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另一类属于党的附属组织，拥有自己独立的法人地位。这类组织包括德意志公务员联盟、民族社会主义德意

志医生联盟、民族社会主义法学家联盟、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民族社会主义福利会、民族社会主义战争受害者联盟、民族社会主义战争受害者救济会、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技术联盟。上述这些组织的密集网络像蜘蛛网一样，辐射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层面和角落，对全体德国人进行严密控制。在整个纳粹德国，只要属于纯正的雅利安血统，便都是民族同志，不分年龄、性别、行业、职务，均必须从属于某个相关组织。这样，德国全民便都处于纳粹党的监督和社会统制之下（坚定的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以及少数正统的神职人员除外）。大致估算起来，德国当时的8000万人口中，至少有7500万人被积极或消极地纳入这个社会统制之中。

## 二、党卫军

1939—1945年期间，纳粹德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有90%可以准确地归结在党卫军的名下；而在这个“90%”当中，约有80%—90%可以归咎于党卫军总部的两个内设局，即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和帝国经济管理总局。

党卫军全称是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卫军。建立之初，它本是冲锋队下属的党的民兵组织。从1929年起，它的职能增添了维持“种族纯洁”的任务；以后，它便逐渐担负起整个纳粹党乃至全国的监控与镇压职能。伴随着纳粹党在全国执掌大权，党卫军的势力渗入到德国政府、军队、财政、文教等各个领域，监视和镇压一切敌视纳粹党和希特勒政权的活动，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还直接派遣下属武装组织参战，成为纳粹党的主要情报、恐怖和军事组织。在希姆莱掌管党卫军之前，其规模很小，总共只有300人左右。

1929年1月，希特勒任命其心腹希姆莱出任党卫军帝国司令官。从此，该组织不再仅仅是纳粹首领的私人卫队，而被赋予新的使命。他一方面在组织内部强化种族原则，强调只允许“纯种雅利安人”加入党卫军；另一方面，加速从小资产阶级分子、退伍军人、志愿兵团成员、冲锋队员和破产的资产阶级分子中招收新成员，使党卫军人数到

1930年12月增至2727人。到1934年1月，总人数已达52000人。

1930年8月和1931年4月，希特勒两次借助党卫军的力量，平息了若干邦、州的冲锋队的反叛。1934年6月底，他又依靠党卫军彻底清除了冲锋队，击毙了冲锋队的总头目恩斯特·罗姆。从此以后，党卫军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同年7月26日，党卫军完全脱离了冲锋队，升格为与冲锋队平行的党内独立组织，其官员不受正常的司法机关管辖。而冲锋队从此解除武装，其职责大都转交党卫军，本身仅负责对青年实施役前训练和充当辅助警察。而党卫军除继续承担“党内警察”的职责外，还有权作为国家的辅助警察，参与维护国内的政治“秩序”，监控民众可能举行的政治活动。党卫军很快变成纳粹国家机器中超出常规的多功能集团，成为希特勒统治全德国的主要支柱。

随着党卫军的势力急剧膨胀，其下属组织也分类为普通党卫军、党卫军骷髅队和武装党卫军。普通党卫军由原来的党卫军主体力量延续而来。其正式成员必须具有雅利安家谱（一般成员查溯到1800年，领袖和候补领袖查溯到1750年）；18岁那年的11月9日（“啤酒馆暴动”纪念日）成为预备队员；翌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总理纪念日）转为临时队员；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举行宣誓仪式，领取队员证。随后，参加劳动至同年10月1日，再到武装部队受训1个月，于11月9日回到党卫军成为正式成员，并领取党卫军短剑。从此，这些人不再接受国家法律的约束。

普通党卫军沿用1930年确定的建制。全国领袖之下设地区总队，由地区总队长统领；下辖旅队，由旅队长统领；再往下依次是区队、旗队，分别由区队长和旗队长统领。旗队的规模相当于国防军中的团，由1000—3000名成员组成，下辖3—4个突击大队。每个突击大队有250—600名成员，分成3个相当于国防军中连的突击队。突击队是普通党卫军最主要的基层组织，由70—120名队员组成，分成3个小队；每个小队下辖3个小组，由1个组长和8个队员组成。

骷髅队是负责看守纳粹集中营的党卫军下属组织。1933年纳粹集中营设立之初，曾分别由守卫队、守卫先锋、守卫部队和守卫兵团4种

准军事组织看守。1934年4月，希姆莱任命西奥多·艾克为全国集中营和党卫军看守组织总监，负责统一全国的集中营看守组织。艾克将分散的看守组织统一合并为突击大队，统一在队员的上衣制服上加饰骷髅白骨标志。1936年3月29日，这支队伍被正式命名为党卫军骷髅队，当时有3500人。翌年4月，希姆莱之流将骷髅队又编成3个骷髅旗队：驻在达豪的上巴伐利亚旗队，驻在奥兰宁堡的勃兰登堡旗队和驻在布亨瓦耳特的图林根旗队。1938年又增建了第四个，即驻在林茨的东部边境骷髅旗队。

武装党卫军是党卫军的武装组织，是一支受希特勒本人支配的专门常备武装。希特勒和希姆莱曾设想建立一支忠于纳粹政权的警卫部队，一支“被训练成在世界观和征服方面进行狂热而又冷酷的战争”的武装力量。纳粹上层教育武装党卫军冷酷无情，显然也是为了在必要时能够使用他们来对付德国的其他部队。

早在1933年3月，希特勒就指示党卫军的一个地区总队长塞普·狄特里希组建一支称作柏林党卫军本部警卫队的武装力量，作为保卫他个人安全的私人卫队。最初只有120人，驻在柏林近郊的亚历山大兵营。同年9月扩充到两个连，外加一个特遣队，改称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不久，这支部队潜入柏林市内的立希特菲尔德前士官学校总校的营房，并充实进3个经过于特伯格练兵场训练的连队。希姆莱指令各地区的党卫军以驻柏林党卫军部队为榜样，组建装备轻武器的各地区党卫军本部警卫队。一般每个党卫军区队拥有100名左右的武装党卫军成员。每当党卫军人员扩充到拥有几个连队时，改称政治戒备队，按照军队结构编成小组、小队、突击队（相当于连）和突击大队（相当于营）。

1938年2月，希特勒撤去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和陆军总司令弗利奇的职务，自己直接指挥国防军之后，决定进一步发展党卫军的武装力量。同年8月17日，希特勒发表公告，将党卫军的特别机动部队更名为武装党卫军；强调它“既不是武装部队的一部分，也不是警察的一部分。它是一支受我专门支配的常备武装部队。作为这样一支部队和纳

粹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世界观上和政治上应按照由我为纳粹党与党卫军所确定的路线通过党卫军帝国领袖（指希姆莱）来选定”。希特勒规定，武装党卫军将用于执行“特殊内政任务，或执行作战陆军范围内的机动任务”；当用于对外作战时，它在“军事范围内”由国防军最高统帅指挥使用，在政治上仍然是纳粹党的一部分。

此后，武装党卫军的兵力迅速增加。1938年它仅有4个团的建制，1939—1940年间扩充到3个师——摩托化的“帝国师”、“骷髅师”和警察师，此外还有一个领袖警卫旗队（摩托化步兵团建制）。1940年8月，希姆莱将武装党卫军督察处改组为武装党卫军作战指挥部，作为其统一的最高领导机构。此时，希特勒已经控制了国防军，他不愿意以建立一支庞大的第二武装来刺激传统的军人。因此，他规定武装党卫军的总兵力只能达到陆军总兵力的5%—10%。希特勒依然强调：武装党卫军主要是“一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对内代表并贯彻国家权威的警察部队”。

1941年春天，武装党卫军作战指挥部已经拥有4个师和1个旅的兵力，它们首先被投入巴尔干战场，充当德军入侵部队的尖刀。随后，上述部队又被调去进攻苏联，其中领袖警卫旗队（旅建制）和“维京”师编入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帝国”师编入德军中央集团军群，“骷髅”师编入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武装党卫军装备精良，具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狂热精神，作战勇猛，前仆后继；同时，他们也以违反传统军事道德标准的野蛮行为、残杀战俘和无辜平民百姓尤其是犹太人为荣。由于损失惨重，兵源不足，武装党卫军不得不在1942年年底将原来的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从1943年起放弃原来严格的“种族原则”，开始组建外籍师团，包括荷兰师、挪威师、比利时师、匈牙利师、乌克兰师等。即使在原来全国由德国人组成的部队中，后来也招募了外籍官兵。

党卫军的中央最高领导机构，起初是希姆莱的首席副官处，1936年改称党卫军帝国领袖本部。内设若干主管局处辅助全国领袖希姆莱，其中主要有：

1. 以奥·海斯梅尔为首的党卫军中央技术管理局，负责管理除保安处之外的其他所有党卫军单位。由于该局过于庞大，于1942年从中划分出3个独立的中央主管局：人事局，负责所有党卫军领袖的人事问题和普通党卫军的任免事项；经济和行政管理局，总管党卫军的厂矿企业；党卫军副总指挥海斯迈尔办公室，控制全国的政治教育机构。已经缩小了的中央技术管理局，由戈特洛普·伯格任局长；还新增设一个武装党卫军作战指挥部。

2. 党卫军巩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它负责实施境外德意志人移居大德意志帝国的计划，在占领区剥夺和驱赶斯拉夫人，将所谓“劣等种族”分子交付强迫劳动，或送往集中营或灭绝营，为迁来的德意志人提供空间。该委员会下属的机构有种族和移民局、德意志人联络处、中央土地处、中央外来移民处、德国再移居托管公司等。其中党卫军种族和移民局初期作为党卫军婚姻办公室，负责审定党卫军成员未婚妻的雅利安血统，以后扩充为负责保证整个党卫军组织的血统纯洁，并主管移居到东欧占领区的党卫军成员的居住与福利事务。

3. 党卫军法庭。它负责按党卫军自己的“法律制度”，受理党卫军机构委托的特别审讯案件。

4. 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它是一个权力最大，同监控与镇压、屠杀事务关系最直接的特务机构。

党卫军保安勤务处的全称是党卫军全国领袖保安勤务处，德文缩写为“SD”。1931年初设立时称为党卫军“SI”部门，同年4月改称党卫军新闻与情报处，同年夏又改名为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其成立初期的主要任务是监控党卫军下属组织和党卫军成员，清除队伍内部的敌人。1934年6月希特勒清除掉冲锋队之后，它的权力开始扩大。当时，领袖代表赫斯宣布它是纳粹党唯一的情报机构。希姆莱则声称它是“秘密警察的唯一政治谍报组织”。1935年1月，希姆莱再次发布指令：宣称“党卫军保安处是党的、说到底也是国家的大型世界观情报组织”，它“应当成为一种精神警察，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进行思想的控制的工具”；“它负责调查抵制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敌人，并推动国家秘密警

察部门开展打击工作和情报工作”。

党卫军保安勤务处的首领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声称：保安勤务处的使命是成为大德意志帝国的情报局。为实现上述目的，海德里希于1935年初将党卫军保安勤务处一分为二：其一是“党的机构”的保安处，规定吸收所有保安警察参加，成为将全部保安警察并入党卫军的工具；其二是“情报机构”的保安处。它应成为一个“灵活的工具”，成为人民身躯上的、一切敌对集团内的、一切生活领域内的触觉和感觉器官。它的规模和结构不断膨胀。其中央结构设立了3个处：一处为组织处，二处为平息反叛处，三处为国内处；其地方组织划分为7个大区，由大区本部领导；大区的情报网各自划分为2—3个分区；分区的情报网再延伸到县或市的保安处外勤站。外勤站是党卫军保安勤务处情报机构最重要的细胞，它在管辖区内的每个地方设置一名或若干名情报员，每个情报员又拥有自己的联络员。充当情报员的人选，既有纳粹党地方组织头目、冲锋队和党卫军头目、地方农民领袖、公务员，也有医生、教师等。为了更有效地使用情报员，党卫军保安处在内部档案的卡片上，将全部情报员分成5类：V类为可信赖者，A类为代理人，Z类为一般提供情报者，H类为出于私人动机的二流提供情报者，U类为腐败分子。在利用这些人提供情报的同时，也在对他们进行监控。

20世纪30年代后期，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共有正式成员6000多人，另外还雇用了5万名情报员。

1936年6月26日，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头领海德里希兼任国家保安警察总局局长。此后，这两支特务力量相互渗透，走向统一；1939年9月27日，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同国家保安警察总局合并，合组德国中央保安总局。从此，欧洲抵抗运动和犹太人、吉卜赛人出现了一个极为凶残狠毒的死敌，它插手了诸如驱逐犹太人、毁灭犹太区、特别行动队、残杀战俘、集中营和灭绝营等几乎所有与战争罪行有关的事务。

### 三、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

1936年6月17日，希姆莱就任德国警察总监。他立即改组全国警

察系统，把全国的警察划分为穿制服的治安警察（缩写为 SIPO）和穿便装的保安警察（缩写为 OLPO）。治安警察总局由党卫军副总指挥库尔特·达吕格任局长，管辖全国穿制服的警察，包括行政警察、巡警、水上警察、海岸警察、消防队、防空队及其技术辅助人员；保安警察总局由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任局长，管辖全国的政治警察和刑事警察。同年10月1日，全国各邦的政治警察全部更名为秘密国家警察（简称秘密警察，缩写即众所周知的盖世太保），由党卫军旗队长海因利希·密勒统一领导，受保安警察总局下辖的秘密警察局管辖。全国共有57个盖世太保地方机构，包括21个国家警察分局和36个国家警察所。从1937年起，负责控制全德边境交通、逮捕非法越境者的边防警察，也划归盖世太保统辖；1944年夏天，边境海关也成为盖世太保的重要组成部分。



纳粹时期最凶残的犯罪组织——盖世太保总部

盖世太保的主要任务是在党卫军保安勤务处的配合下，镇压一切反对纳粹政权的人士与活动。1937年纳粹官方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刑事警察的任务是对付那些因肉体或道德的堕落而站在国民对立面者；而盖世太保则要处置那些受德国人民政敌

的委托而破坏德国统一和毁灭国家政权者。纳粹刑事警察专员文德齐奥在一份内部文件中具体指明了纳粹政权的具体对象：“我们所说的国家敌人是指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犹太主义、政治化的教会、共济会、政治上的不满分子、民族主义反对派、复旧主义者、黑色阵线、经济破坏分子、惯犯、堕胎者和同性恋者、重大谋反和叛国分子。”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有一个“共同目的”，他们的矛头直指德国人民的精神基础和



种族基础。“根据海德里希的要求，盖世太保不仅有责任制止正在实施的犯罪活动，而且要把犯罪动机和计划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对手还没有产生反对思想、更不用说策划敌对活动之前就将其侦破。”

盖世太保惯用的手段主要有：警告、侦察（包括窃听电话）、劫持、谋杀（有时将受害者伪装成事故或自杀），“监护”和把打击对象押送集中营。据纳粹德国官方记录，仅1935—1936年两年中，就有7000名马克思主义者被关进集中营。纳粹当局的法律规定，盖世太保的行动不必经司法部门批准和复审，法院不得干涉；只要秘密警察是在执行领袖的意志，其行动即属合法。盖世太保的权力来自“新的世界观，不需要特别的法律根据”。1937年，纳粹德国的司法部宣布放弃对盖世太保虐待被审讯者和囚犯的行为进行起诉的权力。同年12月，内政部长弗利克下令，将运用“预防性拘留”的权力授予盖世太保。司法部门对盖世太保早已没有措施约束，以至于法院会对早已被盖世太保处决的人提起公诉。就连纳粹最高当局也不得不要求盖世太保今后应将处决者名单通知法院，而无须说明处决理由。

党卫军保安勤务处也是维护纳粹党独裁统治地位的监控与镇压机构，它同盖世太保的分工、配合关系相当复杂。1934年，希特勒曾授予盖世太保极大的权限：“我禁止党的各部、各总支和各联合分队对涉及盖世太保的事务进行调查和审问。所有政治和警务性质的事项……必须立即通知秘密国家警察的有关部门。”然而，党卫军保安勤务处的许多职能与盖世太保严重重叠交叉。1936年6月，党卫军保安处勤务处长海德里希兼任警察部门保安总局局长。此举有力地推动了这两个机构走向协调、配合与归并。这一年秋天，纳粹党各大区的保安处领袖均被任命为保安警察督察员。1937年7月1日，海德里希专门发布命令，对双方的具体职能明确划分，盖世太保的职责范围是监控马克思主义者、叛国犯和流亡者；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则是监控科学、民族和民族学、艺术、教育、党和国家、宪法与行政、国外、共济会和社团。至于那些必须由二者共同管辖的领域，诸如教会、教派、其他宗教和世界观团体、和平主义、犹太教、右派运动、其他敌视国家的社团、经济、新

闻等领域，党卫军保安勤务处负责“所有带普遍性和原则性的问题”，盖世太保则负责“所有需要考虑由国家警察出面采取具体执行措施的具体案件”。1939年9月27日，二者合并为德国中央保安总局，受党卫军和帝国内政部双重领导。

### 四、人民法庭

人民法庭设立于1934年4月24日，设于柏林法院内。其性质是一种专门法院，主要审理有关反对纳粹党、纳粹政权、纳粹制度和纳粹思想的政治性案件。从当年7月14日起，它取代审理政治刑事案件的最高司法机构——德国国家法院。人民法庭由两名职业法官和5名纳粹党、党卫军及武装部队军官组成。1942年以前由蒂拉克任庭长，以后由罗兰·弗莱斯勒接任。该法庭基本上实行秘密审讯。开庭审讯时，法官席背后放置的不是国徽和国旗，而是弗里德里希大帝和希特勒的半身像及纳粹党党旗。辩护律师都是“合格的”纳粹党员。审判过程类似于战时的临时军法审判，被告绝大部分被判处死刑。德国著名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朔尔兄妹的反纳粹暴政案件（国际著名的“白玫瑰小组”案件）和1944年7月20日德国部分陆军军官谋刺希特勒案件，都是由人民法庭审判、由罗兰·弗莱斯勒主审的。弗莱斯勒为讨得希特勒的欢心，总是本着轻罪重判甚至严刑逼供的原则办案，不惜制造种种冤假错案。经人民法庭判处死刑的德国军民，总数至少在万人以上。仅“七·二〇”事件一案，在被捕的7000多人中，竟有4980人被判处死刑。弗莱斯勒可谓血债累累。遗憾的是，这条希特勒的忠实鹰犬，在1945年2月3日英美空军对柏林的一次空袭中身亡，逃过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

### 五、中央保安总局

中央保安总局，德语缩写为RSHA。下辖7个主要职能局：

1. 人事管理局。前后4任局长分别为维尔纳·拜斯特、布鲁诺·施特莱、肯巴赫、舒尔茨。

2. 法律、经济和行政管理局。前后4任局长分别为维尔纳·拜斯特、瑙克曼、齐格尔特和施帕希尔。

3. 国内情报局。局长自始至终只有一人，即党卫军少将奥托·奥伦道夫。

4. 秘密警察局。局长自始至终只有一人，即党卫军少将海因利希·密勒。大小官员1500人上下。

5. 刑事警察局，简称克里波。大小官员1200人上下。局长由阿尔图尔·奈比担任；他因卷入“七·二〇”事件被处决后，由潘欣格尔继任。

6. 国外情报局。大小官员500余人。先后两任局长分别为海因茨·尤斯特和瓦尔特·舒伦堡。

7. 意识形态调研局。局长为希克斯。

#### 六、党卫军中央经济管理总局

#### 七、种族移民局（详见第六章内有关种族移民局部分）

#### 八、纳粹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

#### 九、纳粹德国内阁

上述组织的官员中，文职处长以上、武职上校以上大部分已具备纳粹战犯资格。

## 第六章 各个盟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鉴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惩办的对象均为纳粹德国最高级领导层中的分子，即危害整个欧洲甚至其他大陆的首要战犯，因而各个盟国和战争受害国以及进行了非纳粹化之后的德国，又相继进行多次审判，审判的对象为那些在本国荼毒生灵的纳粹战犯以及本国为虎作伥的叛徒、卖国贼。

各个盟国独立进行的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一般均以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为对象，只有美军驻德占领当局独自进行的第二次纽伦堡审判案，被告中包括极少数甲级战犯。

### 一、美国驻德占领当局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 (一) 第二次纽伦堡审判

驻德美军占领当局于1946年5月至1949年4月对抓获在案的185名纳粹甲、乙级战犯进行了第二次纽伦堡审判。案犯中包括22名部长和政府官员、43名将军、26名军官和士兵、56名党卫军军官、39名法官和医生，其中女性被告5名。对上述战犯的审判分为12个案件进行：分别为：医生审判案、空军元帅米尔希审判案、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审判案（又称纳粹集中营审判案）、特别行动队审判案、种族移民局审判案、军火巨头弗利克审判案、法本康采恩审判案、军火巨头克虏伯审判案、纳粹德国政府高级官员审判案、纳粹德国“人民法庭”诸法官审判案和纳粹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审判案。

#### 1. 医生审判案——美军占领当局对勃兰特等人的审判案

此乃美军占领当局在纽伦堡组织的对乙级战犯的十二大审判案中的

第一个。被告均为在纳粹全国性卫生部门或机关工作的官员或在国家级医疗研究所供职的高级医务人员（不包括在纳粹集中营供职的现任党卫军男女医生）。他们被控犯有违反人道罪，制定和起草了对重残病人和犹太人、吉卜赛人的“无痛致死纲领”，组织和指导了利用集中营囚犯进行非人道的活人试验，特别是其中最为险恶的企图推广到所有被占领国家的高效率的绝育手术试验。该审判案始于1947年，同年8月20日进行了终审宣判：卡尔·勃兰特、卡尔·格布哈特、鲁道夫·勃兰特、约阿希姆·姆鲁果夫斯基、沃尔弗拉姆·希维尔斯、维克多·布拉克、瓦尔德马尔·霍芬死刑；齐格弗利德·汉德罗瑟、卡尔·根茨肯、格哈德·罗斯、弗里茨·菲舍尔终身监禁；赫尔曼·拜克尔·弗雷兴、荷尔塔·欧勃霍泽20年监禁；威廉·拜格尔波克15年监禁；赫尔穆特·波本迪克10年监禁。其中，荷尔塔·欧勃霍泽是医生审判案中唯一的女被告，也是在第二次纽伦堡审判中受审的所有5名女被告中罪行最严重的一个。被告们的简况如下：

卡尔·勃兰特（1904年1月8日—1947年8月27日）

医生审判案中的首犯，重要的乙级纳粹战犯之一，武装党卫军将军。

生于法国的米尔胡斯。他在德国图林根大学毕业，并获得专业文凭。1928年开始在德国弗里堡行医，职业是外科医师。1932年加入纳粹党，并成为冲锋队员。1933年8月，他开始担任希特勒的私人医生。从此，勃兰特飞黄腾达。30岁左右，他即被遴选为柏林大学的医学教授。1939年9月，“二战”爆发不久，希特勒即委托他全权负责旨在灭绝德国全国精神病人和其他重病病人的T-4行动。他还是在整个纳粹德国范围内进行残酷的人体试验的总负责人之一。1943年，他又被委任为帝国卫生事务专员。1944年因与希特勒发生分歧，辞去元首私人医生职务。

1945年3月，他因将妻子安置到一个即将被美军占领的城市而遭到希特勒的猜忌，被逮捕并经人民法庭判处死刑。不久，因战事逼近柏林，城内一片混乱，死刑未及执行。不过，他很快又被盟军押送到纽伦

## 第六章 各个盟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堡国际法庭的拘留所。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8月中旬，他接连受到美军司法官员的审讯，并以违反人道罪被判处死刑，1947年8月27日执行绞刑。

卡尔·格布哈特（1897年11月23日—1948年5月）

医生审判案的第二被告，主要的乙级纳粹战犯之一，纳粹德国全国红十字会主席，党卫军帝国医院院长，党卫军医务部直属霍亨利辛医学研究所所长，希姆莱的私人医生。

生于德国哈格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大学完成了医学专业的学习。1933年加入纳粹党，并很快成为希姆莱的密友。1937年他开始在柏林执教，同年被任命为教授。自从“二战”爆发，他通过希姆莱的关系，谋取了许多有关战争的要职，其中包括出任党卫军和保安警察的医疗总负责人。他亲自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人体试验，尤其是在集中营男女囚犯身上进行磺胺类药物的试验，也参与指导了强制绝育手术试验。“二战”结束，他被盟军执法人员逮捕。1947年8月21日，以违反人道罪被判处死刑，并于1948年5月执行绞刑。

雷奥纳德·康蒂（1900年—1945年10月）

医生审判案的首犯之一，希特勒死心塌地的追随者。

康蒂于1900年生于瑞士的洛加诺，父亲是瑞士人，母亲是普鲁士人。他先后在柏林和爱尔兰两个大学的医学院学习。还在大学时代，他就以冲锋队员的身份积极参加政治斗争。1923年加入纳粹党。以后，他脱离冲锋队，加入党卫军；1934年时军衔已升到党卫军上校。在此前后，他还担任了纳粹德国普鲁士省内政部的顾问。1939年，康蒂成为纳粹党卫生事务中心医务部门的领导。1942年担任帝国医学总负责人。受希特勒委派，他积极领导了导致数十万德国和外国精神病人死亡的T-4行动；受希姆莱的委托，他和卡尔·勃兰特在整个帝国范围内策划和组织各种类型的人体试验，造成上万名集中营囚犯在遭受极度痛苦后死亡。1945年10月，康蒂隐藏月余后在弗伦斯堡被捕。在纽伦堡看守所等候审理期间，康蒂畏罪自杀。此时，离医生审判案的开庭，只有短短几天了。

瓦尔德马尔·霍芬（1903年2月—1948年）

医生审判案的主犯之一。

霍芬于1903年2月生于德国弗里堡-布里斯高。1933年他进入大学医学院学习医学专业，同年加入纳粹党。1939年，他作为党卫军医生被分配到布亨瓦尔特集中营任职。不久，他就被集中营司令官十足风流的妻子伊尔斯·科赫以妖艳的美貌所勾引，不惜冒着被司令官严惩的风险，暗中充当了她的情人。为了满足她对文身人皮的酷好，他在对新人营囚犯进行挑选时全神贯注，绝不放过一个文身的囚犯，而且亲自把符合要求的囚犯送上门去，供她杀死、剥皮。1942年，霍芬被提升为该集中营的主任医生。从此，他成为布亨瓦尔特所有的人体试验的指挥者和组织者，例如疟疾试验、新药致死剂量试验和黄磷严重灼伤的救治试验等，造成大批囚犯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他还曾亲手杀害一个个健康的生命，包括儿童。他的另一项罪行是对同性恋男子强行切除睾丸，甚至杀死他们。在美军司法人员组织的纽伦堡法庭上，他以违反人道罪和谋杀罪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绞刑。

约阿希姆·姆鲁果夫斯基（1897年—1948年6月2日）

医生审判案的主犯之一，党卫军准将，武装党卫军卫生部最高负责人兼卫生研究所所长。

他不仅在大规模灭绝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和战俘方面发挥了无人可以取代的作用，而且在布亨瓦尔特集中营使用大批囚犯进行磷制燃烧弹的试验，使他们一个个被活活烧死。1947年8月20日，他在纽伦堡美国军事法庭以违反人道罪被判死刑，并于1948年6月2日执行绞刑。

鲁道夫·勃兰特

医生审判案的主犯之一，希特勒的私人法律顾问，纳粹德国内政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党卫军上校。T-4行动的积极参与者，非人道的人体试验和强制绝育手术的组织者之一。

沃尔弗拉姆·希维尔斯

医生审判案的主犯之一，党卫军总部直辖的遗传研究所主任秘书，

## 第六章 各个盟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战地防护研究所所长，党卫军上校。非人道的人体试验的组织者之一。

卡尔·根茨肯

医生审判案的主犯之一，武装党卫军卫生部保健部门负责人，武装党卫军少将。非人道的人体试验的组织者之一。

弗利茨·菲舍尔

医生审判案的主犯之一，霍亨利欣研究所助理医生，党卫军少校。非人道的人体试验的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之一。

齐格弗里德·汉德罗泽

医生审判案的主犯之一，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卫生部部长、陆军卫生总监，上将军医。非人道的人体试验的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之一。

格哈德·罗泽

医生审判案的主犯之一，空军卫生部长顾问、帝国卫生部直属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热带医学部主任、少将军医。非人道的人体试验的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之一。

奥斯卡·施罗德

医生审判案的主犯之一，空军卫生部部长、上将军医。

赫尔曼·拜克尔·弗雷兴

空军卫生部官员、上校军医。非人道的人体试验的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之一。

荷尔塔·欧勃霍泽（女）

医生审判案的要犯之一，党卫军医务部直属霍亨利欣医学研究所助理医师，原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党卫军医生。她被控犯有在集中营组织人体试验、挑选女囚送进毒气室杀害、进行残忍的取骨和接骨试验、进行强制绝育手术、杀害犹太新生婴儿等罪状。

赫尔穆特·波本迪克

党卫军种族移民局医务部主任，党卫军准将。非人道的人体试验和强制绝育手术的组织者之一。他被判处10年监禁。

威廉·拜格尔勃波克

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主任医生，上校军医。非人道的人体试验的组织



者和积极参与者之一。他被判处15年监禁。

由于美、英两国蓄意利用纳粹医学界专家从事拟议中的反苏战争，故此以证据不足或被迫执行上级指令为名，将以下纳粹医生宣布无罪释放：库尔特·布罗姆、阿道夫·波科尔尼、汉斯·沃尔夫冈·隆贝格、保罗·罗斯托克、齐格弗里德·鲁弗、康拉德·舍费尔、格奥尔格·奥古斯特·维尔茨。其中不少人，不久即被美国情报部门网罗到“纸夹计划”中，为美军进行侵略战争提供医务服务（详见第十一章）。

### 2. 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审判案（又称集中营审判案）

纽伦堡第二美国军事法庭于1947年开始审理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案件，全体被告被控犯有违反人道罪。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的职责是管理所有集中营和灭绝营、劳动营，使用集中营囚犯进行奴隶劳动，剥夺集中营的所有财产，配合医疗机构利用囚犯进行活人试验，对被杀害囚犯的尸体进行综合利用。法庭于同年11月3日作出了如下判决：局长奥斯瓦特·波尔、处长弗兰茨·艾伦施马尔茨判处死刑；处长盖奥尔格·略尔纳、卡尔·佐默尔、奥古斯特·弗兰克、马克斯·基弗尔、卡尔·穆曼台判处终身监禁；处长海因茨·卡尔·方斯洛判处25年监禁；处长汉斯·鲍贝尔曼判处20年监禁；处长汉斯·略尔纳、艾尔文·钦特舍尔、海尔曼·波克、汉斯·鲍尔、利奥·福尔克判处10年徒刑。一名主要被告厄尔诺·罗令在被捕前畏罪自杀。宣判不久，冷战的形势日趋紧张，美军当局也日趋庇护被判重刑的纳粹战犯，对两名首犯的死刑迟迟未予执行。直至1951年3月，因受到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美军才将奥斯瓦特·波尔执行绞刑，却将另一名本该处以极刑的弗兰茨·艾伦施马尔茨改判9年徒刑；对其他的案犯的处罚均大大减轻，原来判处终身监禁者，均改判15年或20年徒刑；原判15—20年徒刑者，均改判5年以内的轻刑。

### 3. 特别行动队审判案

该案件的被告共计51人，均被判处重刑。其中包括特别行动队A支队队长尤斯特及其前任施塔勒克、B支队队长瑙曼及其前任奈比、C支队队长托马斯及其前任拉什、D支队队长比尔坎普及其前任奥托·奥

## 第六章 各个盟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伦道夫，副支队长海因茨·舒伯特；A支队所属的1A特遣队队长赞德伯格、1B特遣队队长施特劳赫及其前任艾尔陵格，第二分队分队长朗格及其前任施特劳赫、R.巴茨，第三分队分队长耶格尔；B队所属的7A特遣队队长施泰姆勒及其前任拉普、布鲁姆，7B特遣队队长奥特·拉勃及其前任劳什，7C特遣队队长勃克，第八分队分队长辛德海姆及其前任伊塞尔霍斯特、利希特与布拉德菲什，第九分队分队长维本斯及其前任舍佛、菲尔勃特，莫斯科前方分队分队长克林格尔霍佛及其前任希克斯；C支队所属的4A分队分队长施密特及其前任施泰姆勒、魏因曼、布罗拜尔，4B分队分队长汉什及其前任F.布鲁纳、芬德勒、赫尔曼，第五分队分队长梅尔及其前任E.舒尔茨，第六分队分队长比勃斯泰因及其前任莫尔、克略格尔；D支队所属的第十分队A分队分队长克利斯特曼及其前任吉岑，第十分队B分队分队长佩斯特勒尔，第十一分队A分队分队长查普、第十一分队B分队分队长皮·舒尔茨及其前任维尔纳·布劳纳、比·米勒，第十二分队分队长古斯塔夫·诺斯克及总顾问埃·米勒。4个支队、24个分队的负责人。被上述4个支队及其各个分队、特遣队杀害的苏联、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和平居民多达100万人以上。其中A支队队长瑙曼、D支队队长奥托·奥伦道夫等支队长（A支队支队长施塔勒克被苏联游击队处决，B支队支队长奈比在“七·二〇”事件中被纳粹当局处决）及各个分队长等15名首要分子被判处死刑。以后由于美、英等国法官的庇护，除瑙曼、奥伦道夫等两名支队长和分队长维尔纳·布劳纳依照原判但一再拖延到1951年6月才处以绞刑外，其他12名主犯均被改判15年以内有期徒刑，有些人还获准保释出狱。

此处值得提出的是古斯塔夫·诺斯克，法庭对他豁免死刑，似乎不能认为是蓄意庇护纳粹战犯。他曾获得法学和经济学文凭，1935年加入盖世太保。1941年6月18日至1942年3月出任特别行动队D支队第十二分队分队长。根据他呈送上级的工作报告，他的分队曾枪杀了数千名犹太人、吉卜赛人、游击队员、破坏分子和反社会分子。他还参与了应罗马尼亚政府的要求，将7000名罗马尼亚犹太人驱逐到波兰的集

中营和灭绝营的罪恶行动。但是，诺斯克及其律师在纽伦堡法庭上宣称，诺斯克也曾有悔改表现，而且此事发生在1944年9月，距离纳粹德国垮台还有一段时期。当时，杜塞尔多夫的党卫军和保安警察最高负责人下达命令，要求诺斯克将全城犹太人和带有犹太人血统的混血德国人集中起来并一律处决。诺斯克拒绝执行该项命令，因而受到撤职的处罚。美国军事法官充分考虑了这一事实，将原判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1951年1月31日，美军司法当局又对他减刑，改判为10年监禁。

#### 4. 军火巨头克虏伯审判案

古斯塔夫·冯·克虏伯，原姓波伦-哈尔巴赫，经德皇威廉二世做媒，1906年与宗室千金波莎·冯·克虏伯小姐结婚，并入赘到克虏伯家族，改姓克虏伯，继承了被称为“加农炮之王”的克虏伯家族的在埃森的整个工厂。36岁时他开始经营该公司，很快使克虏伯集团发展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几家大军火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克虏伯工厂每月给德皇的军队提供3000门野战炮，其中的“长麦克斯”，炮管长117英寸，威力极大，1918年春曾重创法军。为此，克虏伯获得德皇颁发的铁十字勋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被协约国方面列入德国901个战犯名单之中。逃脱了惩罚之后，他又积极支持希特勒和纳粹党上台，出任德国工业帝国协会会长和希特勒经济捐赠会董事长。希特勒对此十分赏识，他不仅将第三帝国巨额的军火订单交给克虏伯作为回报，还亲自授予他纳粹党的荣誉金质勋章。到1945年初，该集团的销售总额达到14亿马克，职工人数达到19.7万。“二战”期间，他的集团还役使了5万多个集中营囚犯和战俘，其中不少人因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而死去。在数不清的白骨和鲜血的基础上，克虏伯集团在战争的五年期间赢利5亿马克，仅其中的1944年一年即获利1.1亿马克。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克虏伯集团的财产总额增长了9倍。“二战”后，他再次名列乙级战犯名单之中。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1907年—1967年7月30日）是古斯塔夫·克虏伯的长子。他先后在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和亚琛工学院学习，攻读钢铁专业。毕业后，获工程师职称。1938年，他进入集团理事会，

并遵从其父的指示，专门负责军火生产。同年底，加入纳粹党。战争爆发后，又获得空军上校的军衔。1941年，阿·克虏伯与其他大资本家一起成立了“帝国煤炭协会”，支持希特勒的侵略战争。1942年，他又当上在希特勒战时经济中居领导地位的“帝国炼铁业协会”副会长。1943年，阿·克虏伯正式担任克虏伯集团的董事长。1943年，纳粹德国政府专门通过一项“克虏伯法案”，从法律上保证了克虏伯的产业权由其家族世代继承。1945年4月11日，美军占领埃森，将阿·克虏伯抓获。

纽伦堡审判期间，法庭指控古斯塔夫·克虏伯为主要战犯，但他因车祸受伤和多次中风不能出庭，由其子阿尔弗雷德代为出庭受审。同案受审的还有该集团的9名董事。他们被控犯有支持希特勒篡夺政权、参与发动战争、掠夺被占领国家的经济财富和奴役、剥削外国劳工等罪状。1948年7月31日，阿·克虏伯被判处12年监禁，全部财产被没收；其余案犯也被判处不同年限的监禁。但仅仅两年多以后，1951年1月31日，阿·克虏伯被美国专员麦克罗德下令保释出狱，没收的财产也被全部发还。

#### 5. 军火巨头弗利克集团审判案

1947年，纳粹德国最大的专业军火企业戴纳马伊图·诺贝尔集团总监弗里德里希·弗利克在纽伦堡被美国军事占领当局判处7年监禁。该集团下属的各个工厂曾在非人条件下驱使10多万犹太人囚犯和外国战俘进行奴隶劳动。

#### 6. 法本集团审判案

对欧洲各个占领国的掠夺最为贪婪凶狠的德国垄断资本，当属法本康采恩。法本化学工业公司自1925年成立时起即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公司，它也是全德最大的托拉斯，拥有资本将近8亿马克。1932年纳粹党尚未上台之前，该公司当年的收益仅为4800万马克；到1939年第三帝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该公司的年收益猛增至36300万马克，增长7.5倍以上；1943年，该公司年收益更增至82200万马克，比1932年增长17倍以上。“二战”期间，法本公司与德国国防军的关

系十分密切，建立了长期的谍报合作。法本公司不惜重金，设立了一个活动范围遍及全球的特务网络——NW7。“二战”后，据一些重要的战犯交代，如果没有该组织提供的情报，德军总参谋部特别是空军，可能会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领导这个极为秘密的NW7机构的，正是法本托拉斯监事会主席史密茨的外甥伊格纳博士。1934年，他曾前往日本，为德国与日本以后签订轴心条约进行前期准备工作。1936年，伊格纳又以经济部部长沙赫特的代表的身份，前往智利等南美国家，极力进行破坏前不久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泛美会议。他还在美国开办了一家舒尔茨公司，自任主席。其真正的使命是利用该公司的收益来对那些潜伏在美国的纳粹特务发放津贴，他们的任务是向美国的讲德语居民进行纳粹主义宣传，争取他们暗中为希特勒效劳。

不仅如此，法本康采恩驻在欧美各国的代理人全部由纳粹党骨干分子担任，其中不少人在当地还兼任纳粹党的地方组织负责人。早在1933年底，巴本托拉斯、德意志银行下属的德国海外银行以及梅尔克化学康采恩便共同出资，作为纳粹党驻西班牙和葡萄牙负责人波巴赫的薪金。1937年12月14日，法本托拉斯贸易委员会曾作出一项决议：“凡不忠于新秩序的人，绝不能被分配到我们驻在国外的分公司和营业处工作。他们必须把在外国代表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作为自己的特殊任务。”根据上述决议，法本托拉斯的代理人都成为纳粹党组织的骨干，而其目的就在于把西半球的南半部变成第三帝国的属地。

必须指出：法本托拉斯的大亨们对于党卫军在波兰东部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中使用毒气杀害数百万人的罪行负有重大责任。请看他们的口供：1938年，希特勒政府对于当时的毒气生产状况表示不满而要求法本托拉斯接管此事。于是，法本立即建立起许多生产毒气的新工厂，以致纳粹德国在“二战”当中使用的毒气的95%是法本集团生产的。美、英情报部门通过调查发现：法本托拉斯设在乌帕塔-易北菲尔德的一家工厂生产了一种世界上毒性最烈的毒气，而这种盟国毫无所知的毒气能够透过现有的防毒面具而置人于死地。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基尔格尔参议员在该委员会讨论法本托拉斯巨头们的罪行时作证说：“当我在

法兰克福之时（1945年12月），那里正在审讯法本托拉斯主席史密斯。他在那几天承认，他曾尽一切力量使纳粹德国军队使用一种绝对致命的毒气，因为他相信这样做会有助于德国军队取得胜利。”

1947年，设在纽伦堡的驻德国美国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法本工业公司董事长克劳赫等24名负责人和高级职员进行审判。该公司被指控犯有奴役并大规模屠杀外国劳工，为纳粹灭绝营研制与提供巨毒物质齐克隆-B作为屠杀工具，委托纳粹医生大批利用集中营囚犯进行残忍的人体药物试验，以及在被侵略国家掠夺公私财产等项罪行。根据《苏美英三国波茨坦会议协定书》第12款，该公司被解散，首犯判处15—20年监禁。但不久以后，美国军事法庭又宣布撤销对该公司所有被告的指控。

#### 7. 空军元帅米尔希审判案

艾尔哈特·米尔希，纳粹德国空军元帅。因指示空军医务部门从事残酷的人体实验和强征被占领国家人民充当德国秘密军工厂苦力，于1947年11月，在第二次纽伦堡审判中，被美军司法部门判处终身劳役。但是，1951年1月，被减刑为15年劳役。1954年9月4日被美国占领当局释放。

#### 8. 纳粹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审判案

这是美军占领当局在纽伦堡组织的对乙级战犯的十二大审判案之一。该审判案始于1948年2月5日，结束于同年10月28日。被告包括奥托·施尼文特、胡戈·施佩尔、维利盖尔姆·冯·里普、盖奥尔格·卡尔·冯·居赫列尔、赫尔曼·果特、汉斯·莱因加尔特、汉斯·冯·查尔姆特、卡尔·霍里特、卡尔·冯·罗特、赫尔曼·莱内克、瓦尔特·瓦尔利蒙特、奥托·维奥列尔和鲁道夫·雷曼。他们都是参与并掌握纳粹国家军事核心机密的要员，军衔均为将军甚至元帅。审判结果是，除去奥托·施尼文特和胡戈·施佩尔因证据不足而被宣判无罪释放外，其余被告均被宣告犯有战争罪、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具体罪行普遍包括：（1）执行希特勒关于在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实施“巴巴罗萨军事管制计划”；（2）执行纳粹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关于杀害

苏军战俘的政治委员的指令；（3）对盟国战俘强制进行奴隶劳动，甚至杀害他们；（4）强迫被占领国居民从事奴隶劳动或严重有损健康的工作；（5）抢劫或盗窃、侵吞被占领国国有的财富和居民的私有财产；（6）抓捕人质，残杀游击队员；（7）纵容部下官兵迫害、摧残、奸淫被占领国和平居民。有的人还犯有伙同党卫军或保安勤务处、保安警察杀害战俘，迫害、折磨和杀害犹太居民以及驱赶被占领国居民到德国做苦工，实施“夜与雾”计划等罪行。其中的里普元帅还应对他指挥大军围困列宁格勒期间，该城内近百万名和平居民死于轰炸、饥饿和疾病承担直接责任。

他们分别被判刑如下：赫尔曼·莱内克、瓦尔特·瓦尔利蒙特终身监禁；卡尔·冯·罗特、汉斯·冯·查尔姆特、盖奥尔格·卡尔·冯·居赫列尔 20 年监禁；赫尔曼·果特、汉斯·莱因加尔特 15 年监禁；奥托·维奥列尔 8 年监禁；鲁道夫·雷曼 7 年监禁；卡尔·霍里特 5 年监禁；维利盖尔姆·冯·里普 3 年监禁。

#### 9. 种族移民局审判案

法庭指控纳粹德国种族移民局应对波兰、捷克、波罗的海国家数十万儿童被从其父母身边强行掠走并进行强迫日耳曼化等罪行负有罪责；并宣布该组织为犯罪组织而加以取缔。

“二战”期间，仅波兰一国就有 20 多万名儿童被纳粹分子强行掠走，其中许多儿童经纳粹种族专家检查淘汰后即遭杀害，只有那些完全符合“优等种族”标准的 2—6 岁儿童才有资格进入党卫军开办的“儿童之家”接受系统的日耳曼化。战争结束后，幸存下来的数千名波兰儿童连自己的真名实姓和身世全然不知，同亲生父母团聚者只有不到 1/5。

该案件被告共计 14 人，包括该局正、副局长和主要处的正、副处长，其中一名被告为女性。1948 年 3 月 10 日，法庭宣判结果如下：

##### （1）乌尔利希·格雷费尔特

党卫军和警察少将，纳粹德国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主席兼该委员会所属的帝国种族移民总局 B 局局长。他被判终身监禁。

## 第六章 各个盟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 (2) 鲁道夫·克略茨

党卫军中校，他是格雷费尔特在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的副手，并兼任该委员会 A 局局长。他被判处 15 年监禁，后减刑至 10 年监禁。

### (3) 康拉德·梅耶尔-海廷

党卫军中校，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 C 局局长。他被法庭宣判无罪释放。

### (4) 奥托·施瓦岑贝格

党卫军中校，该委员会 B 局 V 处处长。他被法庭宣判无罪释放。

### (5) 赫伯特·许伯纳

党卫军上校，该委员会驻波兹南地区负责人兼种族移民局驻瓦尔特高地区代表。他被判处 15 年监禁。

### (6) 维尔纳·罗伦茨

党卫军少将，武装党卫军和警察将军，党卫军所属的德意志民族成员回归局局长。他被判处 20 年监禁。

### (7) 海因茨·布吕克纳

党卫军少校，回归局六处处长。他被判处 15 年监禁。

### (8) 奥托·霍夫曼

党卫军少将，种族移民局局长（1940 年 7 月 9 日—1943 年 4 月 20 日在任）。此后，任党卫军和警察德国西南地区指挥部司令官。他被判处 25 年监禁，1951 年 1 月 21 日，被减刑至 15 年监禁。

### (9) 里哈德·希尔德勃兰特

党卫军和警察少将，种族移民局局长（1943 年 4 月 20 日—1945 年 5 月初在任）。他被判处 25 年监禁。

### (10) 弗利茨·施瓦尔姆

党卫军少校，种族移民局驻罗兹移民中心总代表。他被判处 10 年监禁。

### (11) 马克斯·索尔曼

党卫军上校，党卫军德意志种族成员回归局出生处处长。他被宣判无罪释放。



(12) 格雷果尔·艾伯纳

党卫军少校，种族移民总局出生局保健处处长。他被宣判无罪释放。

(13) 君特·泰什

党卫军少校，种族移民总局出生局法制处长。他被宣判无罪释放。

(14) 英格·菲尔梅茨（女）

种族移民总局出生局某处副处长。因证据欠缺，她被宣判无罪释放。

#### 10. 纳粹德国“人民法庭”诸法官审判案

“国会纵火案”结束后，希特勒加快了德国司法部门的“纳粹化”进程。早在1928年，纳粹党就组建过民族社会主义法学家联盟，作为自己的分支机构，1932年其成员已发展到1374人。纳粹党上台之后，力图以该组织作为控制全国司法部门的工具。为了吸引更多的法学家参加进来，纳粹党于1934年将该联盟改组为德意志法律阵线，1936年再次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联盟，成员扩展到8万多人。

1935年，纳粹党向全面建立法西斯独裁体制的目标急剧推进。为了打破法学界崇尚实证论的传统影响，当局于同年颁布了关于修改刑法的法令，规定法官在审判时可以根据刑事法典所包含的原则和民众的“普遍情绪”来进行，从而为抛弃强调一切依据法律的法治打开大门。

1937年1月，纳粹德国颁布《文职人员法》，将公诉人归入政府官员一类，企图由行政当局控制司法。与此同时，公诉人在刑事审判中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加强。至此，德国的法院系统已完全堕落为希特勒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得力工具，许多法官已沦为程度不同的战犯。

本次审判案的被告为人民法庭的副庭长及各个有关部门负责人，共计10余人。由于人民法庭庭长罗兰·普莱斯勒已死，其部下的罪责难以确认，所以被告中无一人被判处死刑。

#### 11. 纳粹德国政府高级官员审判案

此案的被告包括纳粹德国政府各部部长及副部长、国务秘书30余人。其中主要有：

威廉·施图卡尔特

博士，纳粹德国内政部国务秘书。他是纽伦堡种族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主要起草者，他还按照希特勒的指示拟订了肢解法国的方案。他是万湖会议的15名正式代表之一，直接参与策划了灭绝犹太民族的罪恶行动。1949年4月，美军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判处他终身监禁。但不久就被释放出狱。1952年死于西德汉诺威。

阿道夫·冯·毛兰德·施泰恩格拉赫特

纳粹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他被控应对驱逐丹麦和挪威的犹太人到波兰的集中营和灭绝营杀害承担责任。1949年4月，美军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判处他7年徒刑；1950年2月获释。

恩斯特·冯·魏茨泽克

纳粹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1938年3月—1943年在任），后被降职为驻梵蒂冈大使，党卫军旅队长（少将）。他是甲级战犯、外长里宾特洛甫的亲信，由里氏一手从政治司司长提拔为国务秘书；任内积极推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侵略扩张外交政策。“二战”后，被盟军逮捕。1949年在第二次纽伦堡审判中被美军司法部门判处7年徒刑。不久，减刑至5年，并于1950年获释。

爱德蒙·维森梅耶尔

党卫军少将，1944年3月以后出任纳粹德国驻被占领的匈牙利全权代表。他被控应对1944年春夏40万匈牙利犹太人被杀害负有直接责任。第二次纽伦堡审判期间，他被判处终身监禁。1951年，美军占领当局将他特赦出狱。对此，欧洲各国人民表示强烈抗议。获释后，他在西德的达姆施塔特定居，成为一家香水制造公司驻达姆施塔特的代表。

通过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首要战犯的审判和第二次纽伦堡审判，盟国司法部门共计审判了甲、乙级纳粹战犯300多名。这些战犯包括纳粹党核心决策集团的绝大部分成员、纳粹党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地方党务负责人、纳粹德国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各州、邦和总督区负责人，党卫军、秘密警察、保安警察和保安勤务处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最高统帅部及所属部门负责人以及坚决支持希特勒之流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商业

巨头和罪行特别突出的医务界人士。至此，几乎全部甲级战犯和乙级战犯中的知名度较高的顶尖部分均已受到惩处。

## (二) 达豪（各个）集中营审判案

1947—1951年，美军驻德占领当局在前达豪集中营旧址设立了国际军事法庭，对在德国美军占领区内抓获的纳粹战犯进行审判，总负责人是32岁的美军律师威廉·登森。该次审判由一系列单独的小型审判构成，包括对达豪、布亨瓦尔特、毛特豪森、弗洛森堡和米泰尔堡—多拉等集中营案件以及毁灭华沙犹太区的罪魁祸首于尔根·斯特卢普进行了审判，共有被告1672人，历经489次开庭；其中千余人被判决有罪，至少136人被释放。

1. 达豪集中营审判案。该案于1945年12月13日开始进行。在第一阶段，美国军事法庭对40名被告中的36名判处死刑（他们大都是集中营的高层管理人员或杀害大量囚犯的纳粹医生），并随后于1946年5月28—29日执行，其中包括集中营司令官戈特弗里德·维斯和以从事活人试验、致使大批囚犯丧命而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医生谢林。1946年11月21日，审判进入第二阶段，被告116人，均为党卫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他们大都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审判案。该案于1947年4—8月举行。31名男女被告中，有22人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绞决；另外9名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中集中营司令官汉斯·科赫的妻子伊尔斯·科赫因注射毒药杀害囚犯并剥掉其皮肤制作工艺品等骇人听闻的罪行，被判处终身监禁。

3. 弗洛森堡集中营审判案。1946年6月12日至1947年1月19日进行。52名党卫军官兵被提出起诉，其中40人被确认有罪，内15人被执行绞决，15人被判处最高为25年的监禁。

4. 多拉—诺德豪森集中营审判案。1947年7月31日，该案开庭，对该集中营的22名党卫军军官进行审判。12月30日，该集中营司令官汉斯·缪泽尔被判处死刑。此前，他的前任库尔特·马代修斯已于当年5月在狱中自杀。

## 第六章 各个盟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5. 毛特豪森集中营审判案。1946年3—4月进行。1946年5月11日，61名党卫军军官、行刑队员中58名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绞决。其中，集中营警卫队队长维克多·左勒于5月21日绞决，党卫军高级军官约瑟夫·吉什于9月15日绞决。

6. 米尔多夫集中营审判案。1947年5月13日，法庭判处5名集中营党卫军军官死刑，7名被送押监狱。

7. 于尔根·斯特卢普审判案。他不仅是毁灭华沙犹太区的罪魁祸首，而且是滥杀被俘的美军飞行员的策划、指挥者。他被本法庭判处死刑后，经波兰政府的强烈要求，被引渡回波兰受审，并于1952年在他肆虐的华沙犹太区故址执行死刑。



毛特豪森审判

### (三) 马尔梅迪惨案审判案

马尔梅迪惨案发生在1944年12月进行的阿登战役期间。12月17日，在德军占领的比利时城市布鲁日附近的小镇马尔梅迪，由党卫军旗

队长（相当于少校）约阿希姆·派帕率领的德国党卫军第一装甲师的一个团队，俘虏了美军第七装甲师的一连炮兵。在押解途中，因两名美军俘虏试图逃跑，党卫军的指挥官即下达了开火的命令。德方的两辆坦克——731号和732号的所有枪炮一起向俘虏群开火，当即有84人被杀害。他们的遗体被弃置深雪中，直到1945年1月14日美军重新占领此地时才被发掘出来。连同被党卫军杀害的倾向美军的当地居民，被杀害的人数达120人以上。

“二战”结束时，约阿希姆·派帕连同其他73名案犯因其他暴行被押上审判席。后来，又发现他们正是马尔梅迪惨案的制造者，于是两罪并罚。1946年7月16日，其中43人被判处死刑，22人被判终身监禁，2人被判20年监禁，1人被判15年监禁，5人被判10年监禁。

然而，随着冷战爆发，这些刽子手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两个罪魁祸首约阿希姆·派帕和首先发炮的坦克长格奥尔格·弗莱普斯被改判监禁。1956年12月22日，该案的头号刽子手约阿希姆·派帕竟被提前释放，罪恶也一笔勾销。几经波折，他于1972年定居在法国北部一个只有63个人居住的小村庄——特哈沃，靠将军事著作由英语翻译成德语为生。四年之后，正当法国人欢度国庆之时，人们发现他已被杀死，房屋也被付之一炬。据说，这是一个名为“复仇者”的急进组织所为。

#### （四）T-4行动医护人员审判案

##### 1. 哈达玛尔审判案

1945年10月8日，美国占领军主持哈达玛尔审判案在威斯巴登地方法院开庭，该审判延续了7天。这是美国占领区内举行的第一次针对大规模谋杀外国劳工和德国病人罪行而进行的审判。该处决中心杀害重残病人的基本手段是注射毒剂，仅被告们自己承认的杀人数目，累计即达2万人以上。10月15日，所有的被告被宣判有罪。哈达玛尔精神病院医务主任阿尔丰斯·克莱因、男护士海因里希·罗夫和卡尔·维利克被判处绞刑（当月15日执行绞刑），杀人逾千的纳粹医生阿道夫·瓦尔曼判处终生监禁，菲利普·布鲁姆判处30年监禁，女护士长伊尔姆嘉德·胡玻判处25年监禁。她被指控应该对120起案例涉及的近万名

## 第六章 各个盟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病人被密谋杀害负责。杀人逾千的纳粹医生伯德曼、乌尔利希、阿奎林、维德曼均被判处死刑（但尚未执行即发生冷战，均改为10年以上监禁）。



哈达玛尔审判案的第一女首犯伊尔姆嘉德·胡玻

1947年2月24日，第二次哈达玛尔审判案在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开庭。同年3月21日，所有25名被告被宣判有罪，其中医生汉斯·博多和阿道夫·瓦尔曼因被指控应对900起案例涉及的1000多名病人被密谋杀害负责而被判处死刑，其余被告被判处8年到终生监禁。不久，因冷战爆发，两名被判死刑的被告均被改判为终身监禁，以后又被提前释放。不少T-4女护士尽管杀害病人也达到数百人，但没有一人被判处极刑，T-4护士葆琳·克奈斯勒杀人规模也很大，但因坦白比较彻底，仅判处15年监禁。被判处监禁的T-4护士还有米娜·查霍芙和克丽丝蒂尔·奇尔克以及积极参与、配合T-4行动的主管护士凯特·古勃曼。

### 2. 艾希贝格审判案

1946年12月2日，艾希贝格精神病院审判案在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开庭。被告包括该院医务主任、博士弗里德里希·梅内克、主任医师瓦

尔特·施密特、护士长海莱娜·舒尔格、男护士安德雷阿斯·森福特和两名女护士。经法庭调查后，法院确认上述被告犯有大规模谋杀罪，并判处梅内克和施密特死刑，二人策划、组织和实施注射毒剂杀害病人的事例至少都在70起以上。舒尔格被判处8年监禁，森福特被判处4年监禁。不久，梅内克在狱中自杀。施密特以后被减刑，关押7年后获释。



专门杀害病残儿童的艾希贝格精神病院

### 3. 卡门霍夫审判案

1947年1月20日，卡门霍夫精神病院审判案在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开庭。被告包括该院医务主任威廉·格罗斯曼、医生赫尔曼·维斯和女医生玛蒂尔德·维波。同年1月30日，法庭宣布上述三名被告均犯有蓄意杀害大量病人的罪行，并均被判处死刑。不过，三起死刑并没有执行，三名被告以后均被从宽判处有期徒刑。其中，格罗斯曼四年半监禁，维波三年半监禁。



卡门霍夫审判案被告席，居中的妇女为玛蒂尔德·维波

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10月所进行的对首要纳粹战犯的审判，也是占领德国的四大盟国开展的旨在清除纳粹分子在德国社会的影响、惩办和清除纳粹战犯的“非纳粹化”的第一阶段。1946年11月，非纳粹化进入第二阶段，打击的重点转向地方和基层。在西方三大盟国中，美国对纳粹战犯的惩处是最为坚决、严厉的。按照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位总统赞同的财政部部长摩根索的意见，即“法西斯主义是德意志民族的特性。既然绝大多数德国人参与了纳粹暴行，因而应当无情地惩办所有的德国人”，美军占领当局采取了从严惩处、人人过关的政策。按照这种逻辑，德国800万纳粹党员自然都是审查和惩办的对象。这样，在美军占领区1300万人口中，需要惩办的有350万人，占总人口的27%。对这350万人进行审判的时间需要长达20年。这显然是难以做到的。经过初期的盲目实践后，美军当局逐渐积累了经验。他们设立了545个法庭，并招聘了2200名与纳粹分子无牵连的德国人协助审判战犯。他们改变了对所有的嫌疑人搞“一刀切”的做法，而将嫌疑人按



照罪行分成重犯、罪犯、从犯、参与者和无辜者五类。英国占领当局也较快地放弃了一度遵循的由曾于1937—1941年担任英国外交部总顾问的罗伯特·芬西塔特宣扬的“德国居民集体犯罪论”，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务实态度。于是，英、法占领区也借鉴了美占区的经验。到第二阶段非纳粹化于1947年10月结束时，三个占领区共审查了犯罪嫌疑人359.6万，确认93万多人有罪；共审判纳粹罪行嫌疑人7万多，对其中的36000多人判罪惩罚。其中重犯1667人，一般罪犯23000人；对从犯15万人中的纳粹骨干分子10万多人，判处3年以内的监禁；对于纳粹罪行的参与者100万人从宽处理，仅给予行政处罚甚至免于处罚；释放了120万名查无实证的无辜者。

此后，三国占领当局逐渐把审判纳粹战犯的职责交给西德政府。

## 二、西德政府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总的来讲，20世纪50年代之前，德国各级司法机关在盟国军管当局的监督下，还是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进而将相当多的知名度较高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处以比较严厉的惩罚。例如，西德检察部门于1948年在斯图加特市设立了专门侦缉纳粹战犯的特别分队，编制超过100人（即使到两德统一以后仍保留了40人的编制），收集了65万名纳粹战犯的资料和物证。

1950年12月15日，西德议会通过颁布法令宣告非纳粹化结束。而集中地、大规模地审判纳粹战犯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

西德共有10个州，每个州的首府均设有州检察院和州检察长。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每个州检察院内部，都设有一个科，专门调查“纳粹时代所犯残暴罪行”。根据国家总检察长的安排，每个州的首府负责调查第三帝国的一个区域或者被占领国的一个区域，作为它的责任地区。例如，斯图加特负责调查纳粹党和党卫军在意大利、希腊和波兰的西里西亚地区犯下的全部罪行，杜塞尔多夫和科隆负责调查纳粹在特列勃林卡、海乌姆诺、索比堡和马伊达奈克集中营所犯的罪行，慕尼黑负责调查纳粹在贝乌泽茨、达豪、布亨瓦尔特集中营所犯的罪行，汉诺

威负责调查纳粹在乌克兰和波兰罗兹地区的全部暴行，汉堡则负责调查纳粹在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但泽地区和波兰首都华沙所犯的全部罪行。西德各州的检察部门还建立了通缉手册，内容包括被通缉战犯的姓名、出生年月，通常还包括该战犯的犯罪地点。仅对在各个集中营犯下罪恶的纳粹战犯，就审判了1941人，其中1517人被宣判有罪，内324人判处死刑，247人判处终身监禁，946人判处有期徒刑，367人无罪释放。

整个20世纪50年代，受冷战影响和美军占领当局的庇护，西德审判纳粹战犯的进程明显放慢，对相当一批罪恶昭彰的战犯重罪轻判甚至明目张胆地宣布无罪释放的事件也一再发生。这不仅引起战争受害国的强烈抗议，而且引起本国进步人士的反对和不满。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格罗布克和奥伯伦德这两个在西德联邦政府中窃据要职的纳粹战犯被民主德国揭露出庐山真面目，才引起西德政府和各个政党的重视，庇护纳粹战犯的行径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1969年，勃兰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上台后，西德追捕、惩办战犯出现高潮，继法兰克福组织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和哈根市举行索必博灭绝营审判案后，又在杜塞尔多夫举办了玛伊达奈克集中营审判案，在斯图加特等地举办了其他主要集中营审判案。但两德统一之际，又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员，借庆典为名，将狱中关押的纳粹女战犯不问罪行轻重而一概释放，即使是判处终身监禁的重犯也轻松地出狱回家。近年来，由于德国国内反法西斯势力的再次高涨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德国惩处纳粹战犯又趋积极。

### （一）第二次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

1963年12月至1965年8月，在西德第四大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司法部门举行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其实，这已是第二次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1947年12月，波兰最高人民法庭曾在克拉科夫举行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这次审判的意义在于，它是西德司法机关自独立进行审判纳粹战犯后，所开展的一次投入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同时也是继纽伦堡审判以后，西德举行的对纳粹战犯进行的比较公正、严厉的一次审判。它所审判的22名被告，不是纽伦堡审判遗留的漏网分子，就是过去被美英占领当局和西德司法部门明显重罪轻

判的纳粹战犯。由于西德已于1949年废除死刑，本次审判的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战犯有6人，他们是：艾利希·冯·巴赫-杰列夫斯基，他曾任武装党卫军将军、波兰西里西亚地区党卫军及保安警察最高首领。他的罪行除组织灭绝本地区的犹太人和镇压波兰抵抗运动尤其是镇压1944年8月爆发的华沙起义外，还在于，正是根据他的提议，奥斯维辛这个吞噬掉上百万和平居民的杀人魔窟才得以出笼。纽伦堡审判期间，他逍遥法外，直到1950年冷战气氛不断升级，才到美军驻德有关部门“投案自首”。因对其罪行的证据尚不够充分，又有主动自首的良好表现，司法机关只判他10年徒刑，而且服刑数年即被释放。他此次上法庭已属“二进宫”，总算受到了应有的处罚。弗兰茨·约翰·霍夫曼，党卫军少尉，从1943年起任奥斯维辛集中营男囚营看守长，已进入参与策划如何屠杀上百万犹太人的领导层。他曾负案在逃多年，1961年才被捕归案。尤塞夫·克莱尔，党卫军上士。军衔虽很低，却掌握了对患病囚犯的生杀大权，有时比医生杀人还厉害。在奥斯维辛主营医院之中，至少有475个前来诊病的囚犯，被他使用长针刺入心脏的手法加以杀害。他是1960年9月才被捕归案的。施泰凡·巴莱茨基，党卫军中士，是比克瑙分营焚尸场的负责人之一，经常参与或指示党卫军士兵把大批犹太妇女儿童驱赶进毒气室的罪恶活动。1960年4月在德国莱因兰地区被捕。奥斯瓦特·卡杜克，党卫军下士。他直接监督囚犯们，并使用自己独出心裁地创造出来的种种非人的酷刑，将成千上百的囚犯拷打致死。战争结束时，他落入苏军手中，并判处25年监禁，但1956年因苏联同西德改善关系而被释放出狱。因群众的强烈反对，他于1959年再度被捕，以后就赶上这次判决。威廉·伯格，党卫军上士。1942年到1945年他一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政治部供职，酷刑折磨和亲手杀人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于1945年6月曾经被捕，次年判处终身监禁，但1949年被释放。此次，他再次被判处终身监禁。罪行较轻的战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共计11人，其中有：鲁道夫·穆尔卡，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霍斯的副官，参与了多起策划如何杀害囚犯的罪恶活动；海克尔，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一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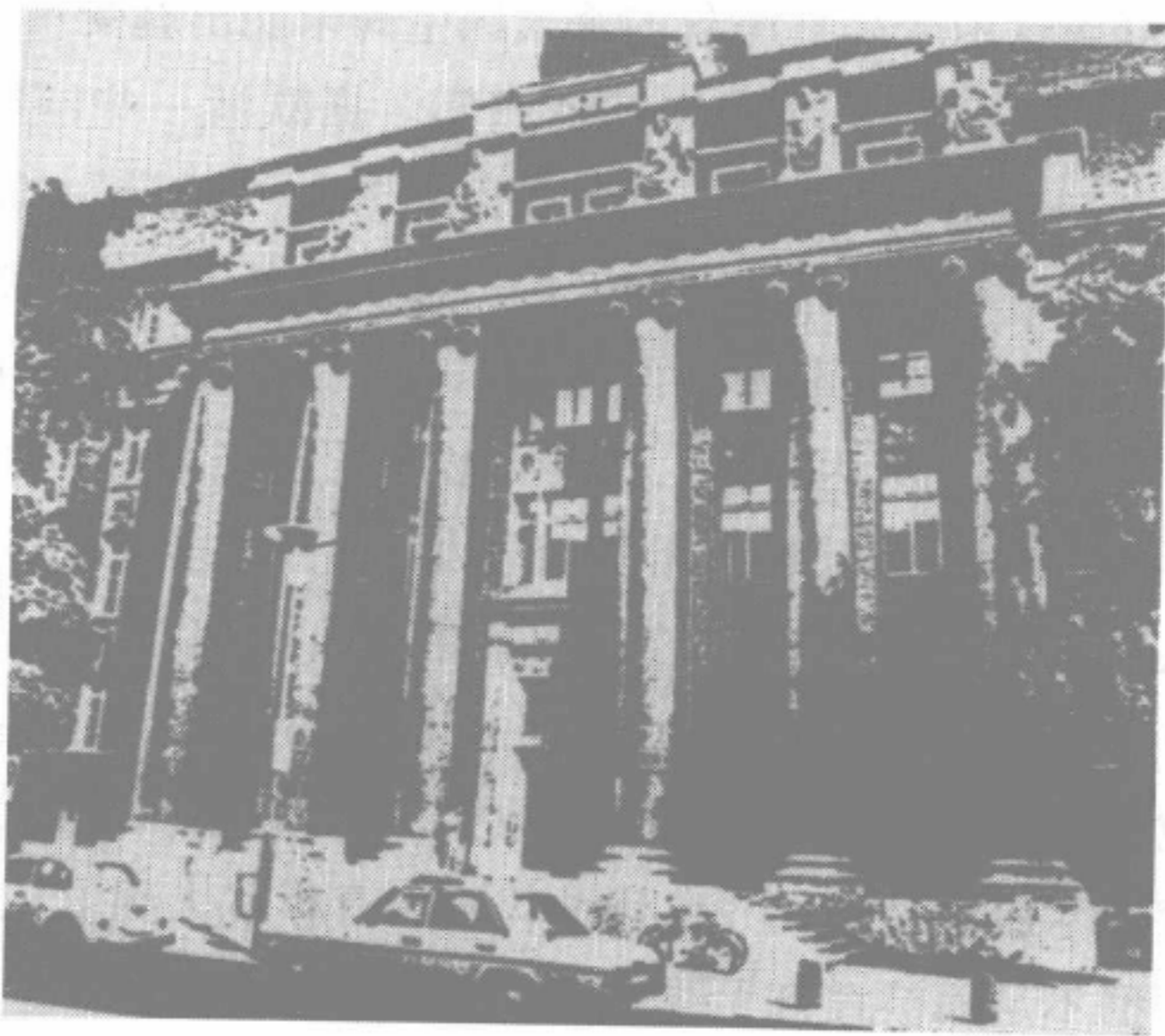
司令官拜尔的副官；汉斯·施塔尔克，他先后在奥兰宁堡、布亨瓦尔特、达豪集中营担任党卫军看守，1940年调至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舍长，不久又调到政治部工作，亲手拷打和枪杀过数百名囚犯。他被判处10年监禁。赫伯特·舍尔普，他是纳粹党员，于1936年加入党卫军。1940年作为医士来到奥斯维辛主营医院病房。他的罪行与克莱尔相似，也是用注射方法大批杀害患病囚犯的刽子手。其恶毒之处在于，他的牺牲者当中有不少是儿童。1943年7月30日晚上，他伙同几个党卫军护士，通过注射毒剂的手段，杀害了整整80个13—17岁的波兰犹太男孩。他被判处4年半监禁。拜恩哈特·弗兰茨·卢卡斯，党卫军上尉军医。他先在党卫军经济和行政管理总局医务处供职，后来相继担任比克瑙、毛特豪森、拉芬斯布吕克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医生，参加过多次“挑选”，也进行过对囚犯的试验手术。他的突出罪状是开具了大量囚犯因种种重病自然死亡的诊断证明书，而这些人分明是死于毒气室、注射毒药或枪决。他被判处3年3个月监禁。遗憾的是，尤塞夫·门格尔和霍斯特·舒曼这两个恶贯满盈的杀人医生尚未能出庭受审。另有一个名声狼藉的纳粹医生科尼希尚未被捕归案。据欧洲一些国家的传媒报道，他藏匿在瑞典某个小城市。他不仅经常参加“挑选”，而且是一个专门给犹太孕妇进行强制性人工流产的行家。此外，他还多次参与对囚犯进行活体试验。据专家估算，经门格尔亲手挑选出来送往毒气室处死的老、弱、病、残、孕达38万人，经他做强制绝育手术的女囚至少3000人，经他“医治”后惨死的孪生子女有2000多人。1941年前后，舒曼医生从尚未设立毒气装置的各大集中营（包括当时的奥斯维辛）挑走了6万多个不适合劳动的男女和儿童，全部押送到由他担任主要负责人的格拉芬奈克和佐恩施泰因两个处决中心杀害。他致力于钻研X光射线绝育手术后，又致死、致残了数千名青年犹太男女囚犯。其余5名被告因证据不足而被宣判无罪。

这次审判经过近10年的准备，参阅了4000多种文献资料，动员了20个国家的356个证人到庭提供证词，起诉书长达17000页，判决书长达700多页，审判材料汇编成88卷。法兰克福审判案，对于漏网

的纳粹战犯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在很长时间内煞住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对广大战争受害者，则是一种有力的慰藉；可以说，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伸张了正气。因此，除苏联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相关国家均认为此次审判是公正的，因而也是成功的。

### （二）第二次玛伊达奈克集中营审判案（杜塞尔多夫审判案）

西德司法界对纳粹战犯的审判经常存在蓄意拖延和重罪轻判的问题。例如，杜塞尔多夫地区法庭对玛伊达奈克集中营罪犯的审判即具有典型意义。该案件的调查始于1962年，而开庭却姗姗来迟，直到1975年11月26日才进行；此期间15名被告中已有1名被告死亡，另一名身患不治之症。虽然传讯了300多名证人，提取了大量物证，但是到1979年4月最后宣判时，竟有4人被宣告无罪，只有9人被判有罪，其中仅该营女囚营副看守长赫尔米娜·瑞恩·布隆施特奈尔1人被判终身监禁。该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赫尔曼·哈克曼仅被判处10年监禁。



第二次玛伊达奈克集中营审判案（杜塞尔多夫审判案）的审判场所  
——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



该案主犯赫尔米娜·瑞恩·布隆施特奈尔

### (三) 索比博灭绝营审判案

1965年西德哈根地方法院对库尔特·博林德、卡尔·弗伦茨、弗兰茨·沃尔夫等12名曾在索比博灭绝营供职的前党卫军管理人员和看守进行了审判。他们被控“杀害或胁从杀害25万名犹太人囚犯和苏军战俘”。其中，博林德一人就参与杀害了86000多人。主要罪证之一是在该灭绝营撤退后发现的一个掩埋了19000具尸体的万人大坑。而这样的万人坑不止一个。由于该法院认定所有的被告所犯罪行为均属于“胁从杀害”，因此最重的判决仅为15年监禁。

### (四) 纳粹医生审判案

1947年，法兰克福地区法庭对纳粹战犯赫尔曼·维斯进行了审判。他在纳粹党执政时期担任库列姆霍夫医学院医生时，不仅杀害精神病人，而且杀害健康的非日耳曼学生。为此，该法庭判处他死刑。

埃格尔芬格-哈尔疗养院的纳粹医生普芬缪勒，自1940年11月14日至12月1日，对2109名精神病人进行了鉴别检查，决定他们的生死，平均每天检查300人。慕尼黑地区法院还指控他用注射留米那尔的手段，杀害了120名精神病患者。然而，西德某地区法庭仅仅判处他6年监禁。

1967年，西德法兰克福法庭对纳粹医生阿奎林·乌尔利希及其同伙海因利希·本克和克劳斯·恩德鲁维特进行了审判。他们被控在纳粹统治时期，在萨尔河畔的奔堡和哈达马尔处决中心积极推行T-4计划，杀害了数以千计的精神病人和其他重病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儿童。

#### (五) 赫尔曼·克鲁梅审判案

赫尔曼·克鲁梅是纳粹大屠户艾希曼的三大助手之一。“二战”爆发后，他开始在波兰负责驱逐和屠杀犹太居民。以后又担任了中央保安总局驻罗兹的“移民中心”主任。在这里，“移民”不过是杀害的委婉说法。经他指示或纵容，1200名犹太居民惨遭杀害，受害者还包括88名从捷克里地策被流放到此的儿童。1944年5月，经艾希曼授权，他站在第一线，将40万匈牙利犹太人驱赶到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和灭绝营，其中30多万人被杀害。克鲁梅曾在战后东躲西藏，直至1961年才被捕入狱。经过长期审判，于1985年判处终身监禁。

#### (六) 威廉·哈尔斯特尔审判案

1967年1月23日，西德慕尼黑地方法庭对前党卫军高级将领威廉·哈尔斯特尔及其女秘书格特鲁德·施罗特克、前党卫军司令官威廉·措普夫进行了审判。法庭指控他们的主要罪状是在占领荷兰期间将大量当地犹太居民驱逐到波兰的灭绝营杀害，其中包括安妮·弗兰克、其姐姐玛格特以及她们的母亲。结果，安妮的母亲一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就被送进毒气室，而安妮姐妹则在被转送到贝尔森集中营后患病而死。

#### (七) 阿道夫·海因茨·伯凯勒审判案

1967年3月，法兰克福法庭对纳粹时期该市的警察局局长阿道夫·海因茨·伯凯勒进行了审判。他被控对该城1万名左右的犹太居民被驱赶到集中营和灭绝营负有罪责。

(八) 洛塔尔·海姆巴赫审判案

1967年4月14日，西德比勒费尔德法庭宣布：判处前党卫军官员洛塔尔·海姆巴赫9年监禁。同时被法办的还有其同伙、党卫军分子里哈特·迪布斯、威廉·阿尔腾罗以及党卫军专员克里珀·海因茨·埃雷里斯。他们被控在被纳粹侵占的波兰比亚威斯托克省驱逐了大批犹太居民到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和特列勃林卡等灭绝营。

(九) 安东·伊普伏里克审判案

1967年5月8日，前党卫军驻波兰斯卡尔宙斯科-卡敏纳劳动营司令官安东·伊普伏里克，被西德纽伦堡地方法庭以谋杀一批集中营犹太人囚犯的罪名宣判有罪。

(十) 弗利茨·希尔德勃兰特审判案

1967年5月12日，西德不来梅法庭宣布判处前党卫军军官弗利茨·希尔德勃兰特终身监禁。他被指控在担任驻波兰的鲍里斯拉夫集中营司令官期间，于1944年6月22日以“谋图越狱”的莫须有罪名，将3名犹太囚犯枪杀。

(十一) 格布哈特·弗利茨·冯·哈恩审判案

1967年5月，前纳粹官员格布哈特·弗利茨·冯·哈恩，因在纳粹侵占的希腊任职时，参与了驱逐2万名犹太居民到波兰的灭绝营，被法兰克福法庭判罪。

(十二) 埃米尔·伯恩多尔夫审判案

1967年6月26日，西柏林警察局奉命出动警力，逮捕了前纳粹德国中央保安总局波兰事务处的官员埃米尔·伯恩多尔夫及其同事弗利茨·沃尔姆、伯纳德·巴茨、约阿希姆·多姆令 and 哈罗·托姆森。他们对数十万名波兰居民特别是其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及波兰犹太人被杀害必须承担责任。

(十三) 格哈德·果德审判案

1967年7月28日，西德达姆施塔特市法庭以谋杀罪判处前党卫军军官格哈德·果德终身监禁，判处其同伙欧文·盖伊8年监禁，弗里德里希·科那克多费尔7年监禁，维尔纳·施文克尔3年监禁。同案犯阿



洛伊斯·米勒和埃伯哈德·许勒则被宣判无罪。

(十四) 瓦尔特·普鲁勒审判案

1967年7月21日，北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州法庭对前党卫军军士瓦尔特·普鲁勒及其同伙卡尔·里德克、弗利茨·瓦普勒进行了审判。他们被指控枪决了15名被怀疑同德国女工发生了性关系的波兰劳工。

(十五) 库诺·卡尔森审判案

1967年，西德达姆施塔特地方法庭对前特别行动队C支队第四分遣队的一批刽子手进行了审判。他们是分队负责人库诺·卡尔森、库尔特·汉，排长海弗纳，党卫军军士阿道夫·延森、亚历山大·里斯勒、维克多·勃伊托恩、格奥尔格·普法尔基谢尔、海因利希·胡恩、恩斯特·孔塞、维克多·特利尔。他们被控于1941—1942年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远郊的巴比雅尔峡谷多次参与对8万名犹太人的大屠杀。

(十六) 维克多·阿莱斯审判案

1979年12月21日，汉堡刑事法庭判处前党卫军驻拉托维亚地区的警察首脑、党卫军旗队长维克多·阿莱斯终身监禁。拉托维亚被纳粹侵占期间，他是施塔勒克领导的特别行动队A支队下属的2C分队负责人，后来又被希姆莱点名列席参加万湖会议。1941年11—12月他曾参与策划在里加郊区的隆布利森林屠杀3万多德国犹太人的罪恶活动。“二战”后他逃脱了特别行动队审判案，并利用化名在法兰克福潜藏了25年，直至1975年才被逮捕归案。

(十七) 布鲁诺·贝格尔审判案

美国著名记者威廉·夏伊勒在其驰名全球的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在记述纳粹刽子手、党卫军上尉尤塞夫·克拉麦的供词时，展现出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1943年8月初，我收到80个囚犯，要我用希尔特（纳粹医生，著名的医生刽子手）给我的毒气杀死。第一次，我在晚上带着大约15个妇女乘坐一辆小汽车驶往毒气室。我告诉这些妇女，她们必须到室内进行消毒……在几个党卫军人员的帮助下，我把那些女人的衣服剥得精光，并把她们赤条条地推进毒气室。门一关上，她们就开始尖声号叫起来。我通过一条管子把一定数量的毒盐

送入室中……从一个窥孔看室内发生的情况。这些女人只呼吸了大约半分钟便栽倒在地上。我打开通风机以后，把门打开。我发现那些女人都已死在地上，浑身都是粪便。”在这里，克拉麦没有交代那几个帮助他行凶的党卫军人员的名字，也许他并不知晓他们的名字。然而，这几个残忍的凶犯最终也未能逃脱走上审判席的命运。请看：

1970年10月27日，西德法兰克福法庭对党卫军下级军官布鲁诺·贝格尔及其下属汉斯·弗莱什哈克尔、沃尔夫·迪特尔·沃尔夫进行了审判。法庭指控此三人参与了希姆莱创立的、服务于种族灭绝的所谓“遗传研究”。他们按照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内的纳粹“遗传研究”机构负责人奥古斯特·希尔特的指示，分批将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115名波兰、犹太、蒙古年轻男女囚犯强行剥光衣服、推进纳茨威勒集中营的毒气室杀害。当时任奥斯维辛集中营某部负责人后来又担任贝尔森集中营司令官的克拉麦在纽伦堡国际法庭受审时的供词现今则成为给他们定罪的重要证据。

#### （十八）赫伯特·哈根审判案

赫伯特·哈根，1913年9月20日生于德国荷尔斯泰因-什勒苏易格州的诺伊缪因斯特。1937年起担任中央保安总局保安勤务处犹太人事务科科长，是未来的特大屠户艾希曼的顶头上司。1940年6月起担任纳粹德国驻法国波尔多地区保安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司令官；1942年5月出任党卫军和保安警察驻法国最高负责人奥伯格的助手，负责领导保安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在法国任职期间，积极参与了历次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重要活动。1955年3月，即使在法国司法部门已经对纳粹战犯采取手下留情的前提下，因罪行累累，仍被缺席判处终身强制劳役。此时，他在西德却不受任何干扰地生活，在一家著名的大型工业公司中担任贸易部总经理。1980年，西德科隆重罪法院以谋杀罪判处他12年监禁。同案犯恩斯特·海因利希森，1920年5月13日生于柏林。从1940年9月起，担任盖世太保驻法国总部负责犹太人事务的官员；从1943年起，出任驻巴黎保安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司令官里什卡的副手。1953年，曾被法国一家法院缺席判处死刑。但他在西德依然逍遥法外，

先后担任西德米腾贝格一家大企业的法律顾问与比尔格市市长。1980年事发，被科隆重罪法院判处6年监禁。

1997年4月，德国梅宁顿地方检察院经过7年调查取证，宣布对长期隐居在沃尔道夫村的前纳粹集中营女看守露易丝·丹茨提出起诉。丹茨因在马伊达奈克和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看守时残酷地虐杀女囚，于1947年12月被波兰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但是10年以后，因东西方关系缓和即被开释。此次，梅宁顿检察院又发现了她的新罪行：1945年4月，党卫军当局将柏林以北的马尔科集中营及其他集中营的17 000多个女囚押送德国西部的集中营。丹茨是负责押解的女看守之一。半途中，一个犹太女孩要求和母亲一起走，而不要分开她们。丹茨闻讯大怒，决定好好教训这个不懂规矩的“劣种”。她对女孩拳打脚踢，又加上鞭笞，直到女孩倒在地上停止呼吸。

1998年3月3日，斯图加特地方法院对当地居民阿方斯·戈策特里德提出起诉，他被控在1943年11月3—4日纳粹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实施的“收获节行动”中杀害了500多名犹太人。

2002年7月初，汉堡地方法院以在意大利热那亚杀害59名意大利战俘的罪名，判处前纳粹德军驻热那亚最高军事长官、93岁的弗里德里希·昂格尔3年监禁。

直至20世纪末，施罗德总理执政的德国又传来审判纳粹战犯的新消息：2000年11月初，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地方法院郑重宣布：前传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阿洛伊斯·布鲁纳（1912年生于奥地利）已经身亡的消息有误，并宣布对他提出起诉。阿洛伊斯·布鲁纳是在第一线指挥“最后解决”犹太人的大屠户艾希曼的少数几个最亲密的助手之一。除积极协助艾希曼迫害和杀害数以百万计的欧洲各国犹太人之外，经他本人下令而被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驱赶到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希腊、法国、匈牙利等国的犹太人至少达到128 500人。因此，战争一经结束，他即被盟军司法部门列入战犯名单。他自知在欧洲难以立足，于是更名为格奥尔格·菲舍尔博士，潜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隐居，已达50年之久。期间，虽曾被复仇的犹太人寄来的炸弹邮包炸断一只手，

但性命却保住了。1997年前后，一家法国小报的记者，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竟无中生有地撰文报道，此公已经死于心脏病，并已埋葬在某某大都市郊外的一个无名墓地等。这个虚假的信息曾在数年内起到混淆视听、庇护罪犯的效果，直到2005年才被彻底揭穿。

### 三、英国政府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 (一) 贝尔森集中营审判案

1945年5—12月，英军占领当局首先对贝尔森集中营案件进行审判，地点在德国小城吕讷堡。被告共44人，均为集中营的负责人、医生及男女看守，清一色的党卫军分子。该集中营成立较晚，而且不使用毒气杀人。然而，在它存在的不到2年时间内，却有6万—8万来自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和战俘死于瘟疫、饥饿、寒冷和拷打。该集中营的司令官克拉麦，因残酷折磨和杀害囚犯，被囚犯们称为“贝尔森的猛兽”；副司令官伊尔玛·格蕾泽，被称为“贝尔森的母兽”。许多国家出版的揭露纳粹集中营罪行的资料中，都附有一张陈尸累累的万人坑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摄于贝尔森集中营；而且，其中就包括《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的遗体。经审理，14人被宣布无罪释放；30人被判有罪，其中19人被判监禁，11人被判死刑。上述11人中，包括集中营司令官尤塞夫·克拉麦，副司令官温加特纳，女囚集中营负责人赫斯勒，党卫军医生被囚犯恐怖地称为“毒针之王”的弗里茨·克来因等，其中还有3名女战犯——集中营副长官伊尔玛·格蕾泽（其罪行详见第九章），女囚营看守长伊丽莎白·福肯哈特，女囚舍长约安娜·鲍曼。

#### (二) 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案

1946年12月5日—1948年7月21日，英军驻德占领当局在汉堡举行了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案审判（包括7次审判案）。受审的罪犯共计38人，其中21名女性。所有被告被法庭确认有罪，其中12人因罪行严重，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绞刑或枪决。被告包括：集中营第二任司令官弗利茨·苏仑，看守长多罗赛亚·宾兹、克莱奈丝·齐莫尔，党卫军

医院主任特罗麦尔，医生容塔克、希特劳斯基、特雷特、奥仑迪和女医生格尔达·容塔克·维根德，护士长伊丽莎白·玛赛尔和玛格丽特·霍夫曼，护士爱丽卡·米莱维尔、维拉·莎尔芙夸特、格尔达·奎因海姆，政治部官员艾米尔、隆多尔、宾德尔，行刑队队长康拉德，女看守露特·诺伊代克、格蕾塔·勃泽尔、安娜·施莱特、费特曼、温格尔，毒气室管理员申克，刑罚室管理员玛格丽特·缪斯以及女卡波卡尔曼·毛莱、欧仁妮·斯凯妮。该集中营的首任司令官科盖尔因后来调任玛伊达奈克集中营司令官，在该集中营审判案中被判处死刑。另外3个重要的女战犯未能到庭，党卫军女医生荷尔塔·欧勃霍泽因1943年调任党卫军全国性的医学研究机关——霍亨利欣研究所，层次较高，已在纽伦堡医生审判中判处20年监禁；前看守长伊尔玛·格雷泽已在贝尔森集中营审判中处以绞刑；前看守长约翰娜·兰格弗里德越狱潜逃，不知去向。还有一些凶残毒辣的女看守安娜·达维多夫索菲雅·尼舍夫、英格贝格、埃玛·佛格尔等6人也无法出庭，她们因杀害和虐待捷克斯洛伐克犹太女囚特别突出，被引渡到捷克斯洛伐克，经审判后在庞克拉次监狱执行绞刑或判处长期监禁。

#### 1. 第一次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案（1946年12月5日—1947年2月3日）

本次审判是该集中营七次审判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共有16人受审。审判结果如下：

(1) 约翰·施瓦茨胡贝尔，集中营副司令官，第二把手。因指挥1944年12月—1945年3月对集中营内女囚的大规模屠杀（该集中营死亡的女囚，有一半以上是在这4个多月被杀害的），被判处死刑。

(2) 古斯塔夫·宾德尔，看守兼行刑队队长。因杀害女囚多达数百名，被判处死刑。

(3) 路德维希·兰多尔，盖世太保驻该集中营督导员。因多次参与策划大规模杀害女囚，被判处死刑。

(4) 格哈德·希特劳斯基，集中营医院纳粹医生，因积极从事以女囚为对象的残酷人体试验和挑选女囚送入毒气室，被判处死刑。

## 第六章 各个盟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5) 罗尔夫·罗森塔尔，集中营医院纳粹医生。因积极从事以女囚为对象的残酷人体试验和挑选女囚送入毒气室，被判处死刑。

(6) 佩尔西·特雷特，集中营医院纳粹医生。因积极从事以女囚为对象的残酷人体试验和挑选女囚送入毒气室，被判处死刑（1947年4月8日在狱中自杀）。

(7) 阿道夫·文克尔曼，集中营医院纳粹医生。因积极从事以女囚为对象的残酷人体试验和挑选女囚送入毒气室，被判处死刑（1947年2月1日在狱中自杀）。

(8) 多罗赛亚·宾兹，集中营看守长。因大批挑选女囚送入毒气室和惨无人道地毒打、虐待女囚，被判处死刑。

(9) 格蕾塔·鲍赛尔，集中营看守。因大批挑选女囚送入毒气室和惨无人道地毒打、虐待女囚，被判处死刑。

(10) 伊丽莎白·玛赛尔，集中营医院护士长，因大批挑选女囚送入毒气室和多次注射毒剂杀害女囚，被判处死刑。

(11) 维拉·莎尔弗夸特，集中营医院卡波护士，因疯狂助纣为虐，大批挑选女囚送入毒气室和多次注射毒剂杀害女囚，被判处死刑。

(12) 卡尔曼·毛莱，集中营卡波看守，因疯狂助纣为虐，残暴地拷打、折磨大批女囚和多次注射毒剂杀害女囚，被判处死刑（1947年4月9日在狱中自杀）。

以上9名被判死刑的罪犯均于1947年5月2—3日在哈默伦监狱执行死刑。

(13) 海因利希·佩特斯，集中营看守。判处15年监禁（1955年5月18日获释）。

(14) 马丁·海林格，集中营医院纳粹医生。判处15年监禁（1955年5月14日获释）。

(15) 玛格蕾特·缪斯，集中营女看守。判处10年监禁（1952年2月26日获释）。

(16) 欧仁妮娅·斯凯妮，集中营卡波。判处10年监禁（1951年12月21日获释）。



第一次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现场，6号被告为多罗赛亚·宾兹，往右依次为玛格雷特·缪斯、格蕾塔·勃泽尔和欧仁妮娅·斯凯妮

集中营长官弗里茨·苏仑和集中营劳动总监汉斯·普弗劳姆在本次审判开始之前一度逃脱。但于1949年落入法国占领区当局手中，并被押上审判台，在德国拉施塔特市举行的另一次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案中受审。二人均被判处死刑，并于1950年6月12日执行枪决。

### 2. 第二次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案（1947年11月5—27日）

该次审判唯一的被告是弗里德利希·欧皮茨。他是集中营内设的一个工厂的领导，以残酷压榨集中营女囚而著称。他被判处死刑，并于1948年2月26日执行。

### 3. 第三次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案（又称乌克马尔克审判，1948年4月14—26日）

乌克马尔克集中营是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的一个分支机构，原来专门关押16—21岁的少女囚犯。从1945年1月起，它根据纳粹上层的指

示，转变成专门杀害52岁以上或体弱多病而不能继续从事劳动的女囚的灭绝营。



第一次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现场，两个沦为纳粹战犯的前女囚薇拉·莎尔韦夸特和卡尔曼·毛莱

本次审判的被告共5人，均为女性，为该附属集中营的管理人员。

(1) 露特·诺伊代克（婚后改姓夫姓格劳修斯），灭绝营时期的看守长，以大批挑选女囚送进毒气室著称，女囚们视为瘟神。她被判处死刑，并于1949年7月29日执行。

(2) 玛格丽特·拉波，灭绝营女看守。她被判处终身监禁，但于1950年改判为21年监禁，又于1959年6月16日获释。

(3) 尔弗丽德·莫内克，灭绝营女看守。她被判处10年监禁，于1952年6月14日获释。

(4) 约安娜·布拉赫，少女集中营时期的刑事督导员。被判无罪。

(5) 罗特·托贝伦茨，少女集中营时期的看守。被判无罪。

4. 第四次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案（1948年5月—6月8日）



本次审判的被告均为该集中营医院的纳粹医务人员及其帮凶。

(1) 本诺·奥伦迪，纳粹医生。

(2) 瓦尔特·容塔克，纳粹医生。

二人均以挑选病弱女囚送进毒气室、对女囚进行非人道的人体试验和多方折磨女囚著称，因而均被判处死刑，并于1948年9月17日执行。

(3) 玛尔塔·哈克，纳粹护士。她被判处10年监禁，于1951年1月1日获释。

(4) 里丝贝特·科尔左克，纳粹护士。她被判处4年监禁，于1951年2月3日获释。

(5) 格尔达·甘策尔，卡波护士。她虽然是女囚出身，但参与注射毒剂杀害女囚、对女囚从事残酷的人体试验方面比起前面两个纳粹护士还要积极、凶狠，因而被判处死刑。但是，本次审判一个多月后，她即被改判为21年监禁；1954年又被改判为12年监禁。最终于1961年6月6日获释，仅仅关押了13年。

#### 5. 第五次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案（1948年6月16—29日）

本次审判的被告均为该集中营党卫军官兵，以疯狂杀害集中营女囚而罪行累累。

(1) 阿尔图尔·康拉德，党卫军看守。他被判处死刑，并于1948年9月17日执行。

(2) 瓦尔特·申克，党卫军看守，后来成为该集中营毒气室的负责人。他被判处20年监禁，于1954年8月3日获释。

(3) 海因利希·舍弗尔，党卫军看守。他被判处2年监禁，于1949年10月28日获释。

#### 6. 第六次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案（1948年7月1—26日）

本次审判的所有被告均为虐待集中营女囚的党卫军看守。

(1) 库尔特·劳埃尔，党卫军看守。他被判处15年监禁，但于1955年5月7日获释。

(2) 库尔特·劳克斯罗，党卫军看守。他被判处10年监禁，但于

1954年9月26日获释。

7. 第七次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案（1948年7月2—21日）

本次审判的所有被告均为虐待集中营女囚的女看守，有些人还积极从事挑选女囚送进毒气室。

（1）埃玛·齐默尔，集中营看守长。她被判处死刑，并于1948年9月20日执行。

（2）伊达·施莱特，集中营看守长。她被判处死刑，并于1948年9月20日执行。

（3）路易丝·布鲁纳，集中营看守长。她被判处3年监禁。

（4）安娜·弗里德里克·玛蒂尔德·克莱因，集中营看守长。因她的犯罪证据缺失，她被判无罪。

（5）伊尔丝·维特曼，集中营女看守。她被判处12年监禁。

此外，苏联和法国也曾在本占领区内举行过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案，时间与英国的审判时间接近，捷克斯洛伐克也举行过此类审判，但规模远不及英国的审判案。

（三）卡尔·硕恩加尔特审判案

卡尔·硕恩加尔特是党卫军将军，1941—1944年任纳粹德国克拉科夫省党卫军和保安警察最高长官。此后直至战争结束，任党卫军和保安警察驻荷兰最高代表。1946年2月11日，一个英国军事法庭在恩舍德将他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四）萨根血案审判案

1944年3月24日，被关押在德国西里西亚萨根第三空军战俘营中的50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越狱逃跑。希特勒闻讯大怒，亲自下令要求将这些越狱者抓获后立即处决。50名越狱者当中，除3名逃回盟军占领区外，全部再次被德军抓获，并于当月被全部杀害。3年以后，英国皇家空军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此案。经调查取证，有72名德军（包括盖世太保成员）参与了此次犯罪行为。审判之后，21人被判死刑，17人被判有期徒刑，11人在狱中自杀；其余罪犯，或死去，或失踪，或被判无罪。

(五) 约翰内斯·哈塞布略克审判案

约翰内斯·哈塞布略克是党卫军中校，纳粹设在波兰的四大集中营之一的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最后一任司令官。主要罪行是在他任内(1943—1945年在任)，该集中营有10多万犹太人和苏军战俘被杀害。1948年，英军军事法庭在汉堡对他进行了审判，并判处他终身监禁，不久改判为15年监禁。于1954年9月17日获释。

(六) 瓦迪斯瓦夫·德林审判案

1964年，英国法庭在伦敦对一度漏网的纳粹战犯瓦迪斯瓦夫·德林进行了审判。瓦迪斯瓦夫·德林本是波兰公民，职业是外科医生。1940年因违反德国占领当局的法律，被押送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次，他吸取了教训，处处模范地遵守集中营的各项规矩，并多次向集中营当局举报违规、捣乱的囚犯，从而得到纳粹主子的赏识，从重体力劳动改为干轻活，又被调到集中营囚犯医院当护士。他对纳粹主子的百般迎合，使他最终调至被集中营当局视为核心机密单位的主营10号楼和比克瑙分营28号楼，协助霍斯特·舒曼等恶魔医生对男女囚犯进行惨无人道的绝育实验手术。他同被迫担任恶魔医生门格尔助手的匈牙利医生尼斯利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被逼无奈，出工不出力，经常磨洋工，同时尽量保护被迫充当实验对象的男女囚犯，力争让他们活下来，至少也要减轻他们的痛苦。而德林却甘当舒曼之流的鹰犬，助纣为虐，不仅自己疯狂地宰割男女囚犯，而且为主子多方出谋划策，极力增加实验对象的苦难，目的是使自己的地位不断改善和提高。正因为如此，舒曼之流对他非常信任，经常授意他独当一面，听任他独自操刀，肆意摧残男女囚犯的生殖器官，直至把他们折磨致死。仅举一例，即足以证明此人的凶狠歹毒；为取悦纳粹医生，德林竟然提出同他们打赌：在一个上午给10名年轻女囚做完卵巢摘除手术。这种连纳粹医生们都觉得毫无把握的事情，德林却倚仗“偷工减料”式的手段做到了。他不给接受手术的女囚注射麻醉剂，不认真缝合伤口，给下一个女囚做手术时，不洗手，也不对手术刀消毒，不采取止血措施……他当然获得了主子们一片喝彩声，而那些可怜的女囚，却因为内出血不止或伤口感染，两三天内

全部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战后，据奥斯维辛幸存的囚犯们揭露，德林大约给 1 700 名年轻的男女囚犯进行了强行摘除卵巢或睾丸的手术，而被实施手术者不是丧命，就是终身残疾，失去生殖能力。正因为对囚犯的凶狠恶毒赶上了他的纳粹主子，他有幸被集中营当局释放，并介绍他到克劳贝格医生设在戈尼斯堡的妇科诊所就业。战后，他自知罪恶难逃，于是改名换姓，四处躲藏，最后流落到英国，以为总算逃离了法网，但到底还是被揭露出来。不过，德林终究算是幸运者，未及法官对他进行宣判，他便因心脏病猝发死于狱中。

2005 年 11 月 7 日，英国报刊宣布：英国审判和关押的最后一名纳粹战犯安托尼·萨瓦纽克已经死于狱中，终年 84 岁。该犯原籍波兰东部，纳粹德国入侵后，他便参加了亲纳粹的一支部队，并积极助纣为虐，一次就杀害了 18 名无辜的波兰犹太人。“二战”后，他隐瞒身份移居英国，定居苏塞克斯郡。1999 年，东窗事发，他被一家英国法院押上法庭，并判处有期徒刑。

#### 四、苏联政府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1943 年至 1952 年，是苏联审判战犯的高潮时期，总共审判纳粹战犯 9 626 人。

1945 年 12 月至 1946 年 1 月，苏联政府分别组织了基辅、明斯克、里加、列宁格勒、斯莫棱斯克、布良斯克、大卢加、尼古拉耶夫等地区法院对在当地犯下罪行的纳粹战犯的审判。被告共 85 人，包括 18 名将军，28 名军官、党卫军军官、警察及宪兵和 39 名军士与士兵。基辅审判案的被告有纳粹德国陆军中将布尔卡德特、警察中将谢尔等，明斯克审判的被告有警察少将海尔夫、陆军少将埃尔曼斯多尔夫等，里加审判的被告有纳粹德国党卫军和警察部队驻波罗的海地区总司令埃凯尔恩、陆军中将卢夫和德戎·冯·门特瑙恩等。上述审判案共询问证人 300 多位。判决的结果是：66 人判处死刑、19 人判处 12 年至 20 年劳役。

1946 年 8 月 1 日，苏联最高人民法庭判处祖国的叛徒、苏联陆军中将安德烈·伏拉索夫及其 11 名下属死刑，1947 年 3 月执行绞刑。安

德烈·伏拉索夫 1890 年出生于下诺伏格罗德贫农家中，内战时期参加红军，在讨伐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等白卫军的斗争中表现出色，接连得到提升，并于 1930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但是，面临苏军在卫国战争中连连受挫的险恶形势，他对前途丧失信心，遂于 1942 年被俘后投靠德军。同年，他出面组织了与苏联政权为敌的“俄罗斯民族解放军”，公开打出叛国的旗帜。此后，他不仅死心塌地地与红军和游击队员作战，而且积极协助镇压东欧国家的抵抗运动。1944 年秋，他率部赶往华沙，充当德军镇压起义者的帮凶；其部下滥杀无辜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共杀死华沙居民数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老人和伤员。1945 年 5 月初，他还奉纳粹主子之命，率部赶到布拉格，准备配合德军镇压布拉格人民的大起义。直到最后一刻，他才决定阵前倒戈，向美军投降。以后，美军依照苏联政府的要求，将伏拉索夫引渡给苏联政府。

其他主要审判案包括：

#### （一）弗兰茨·耶克伦审判案

弗兰茨·耶克伦是党卫军将军、党卫军和军事警察在苏联北部的最高领导。1946 年 2 月 3 日，一个苏联军事法庭在里加以屠杀大量苏联犹太居民的罪名，将他判处死刑并迅即在他曾肆虐多时的一个犹太区遗址执行死刑。

#### （二）科尔斯曼审判案

科尔斯曼是党卫军将军，1942 年 11 月至 1943 年 11 月任党卫军和保安警察驻俄罗斯罗夫诺地区最高负责人。因残酷屠杀俄罗斯抵抗战士和平民，被苏联政府抓获后经审判枪决。

#### （三）奥斯维辛灭绝营焚尸炉设计师审判案

1946 年 3 月 4 日，驻德苏军当局根据缴获的纳粹德国党卫军中央建造管理局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档案，逮捕了德国机械设备制造商——托普夫父子公司的 4 名高级工程师布劳恩、普吕夫、舒尔茨和桑德，并随即在苏占区城市埃尔富特组织法庭对其进行审判。原来，这 4 名看起来老老实实的高级知识分子，竟是在奥斯维辛开展大屠杀的刽子手们的帮凶。

## 第六章 各个盟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从1943年初起，他们受纳粹德国中央保安总局的委托，几次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现场。在亲眼目击纳粹分子用毒气杀人和确认设计焚尸炉的目的就在于焚烧受害者尸体的情况下，依然积极效力，为集中营当局设计并监制了至少20座高效率的焚尸炉，为纳粹分子成倍提高杀人能力提供了技术手段。以后，该公司总裁被判处死刑，4名高工被判处监禁。

### （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审判案

20世纪40年代晚期，苏联驻德占领当局组织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审判案。该案的被告均为该集中营的看管人员及纳粹医护人员，为数240多人，大多数属于党卫军第九预备营。他们被控以毒气室、注射毒剂、枪杀、锐器击碎头部、活人试验及其他残酷手段杀害了关押在该集中营的97 000多名苏军战俘和苏联公民。起诉方对被告之一、集中营看守布鲁诺·弗什提出的罪名是杀害1 207名苏军战俘和苏联公民。他虽百般辩解，但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杀害了800人。另有数十名被告，也供认自己杀害被囚的苏联人均达百人以上。

### （五）德军高级将领审判案

1952年2月，苏联最高法院对曾经率部入侵波兰、南斯拉夫和乌克兰等国的纳粹德国陆军元帅埃瓦尔特·冯·克列斯特和前纳粹德国陆军元帅、入侵波罗的海和白俄罗斯、俄罗斯的前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菲迪南德·舍尔纳进行了审判。

比较小型的审判主要针对沦为纳粹帮凶的本国叛徒、卖国贼，主要有以下各案：

1952年，苏联高等法院将苏军的叛徒、法西斯刽子手尼古拉·什莱耶夫判处死刑。他被德寇俘虏后立即叛变，并沦为纳粹集中营看守。他在特列勃林卡灭绝营受到德国主子的高度信任，被司令官斯坦格尔任命为单独启动毒气室开关的专门管理员，在一年多时间内杀害了上万名犹太人。

1955年以后，审判纳粹战犯的次数和规模明显减少，但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1962年，乌克兰地方法院在基辅对11名主要的卖国贼和纳粹帮凶进行了审判，其中10人被判处死刑，1人被判处15年徒刑。

1964年，克拉斯诺达尔地方法院对曾在索比博灭绝营担任看守并积极参与杀害犹太人的前苏军叛徒多人进行了审判。

1967年，乌克兰地方法院将前乌克兰傀儡政权的伪警长格奥尔基·索科洛夫判处死刑，并在他杀害了大批游击队员和犹太居民的卢甘斯克执行枪决。

1969年，乌克兰哈尔科夫地方法院将纳粹侵略者的合作者和出卖地下组织的告密者克里莫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政府审判纳粹战犯最突出的一例是对安东尼娜·马卡洛娃的审判案。安东尼娜·马卡洛娃受审时已然60多岁了，虽然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不少，但她的灵魂却是丑陋不堪。卫国战争初期，她所在的部队被德军猛烈的炮火击溃后，她不仅没有像卓娅那样勇敢地为祖国献身，也没有像一位正直的苏联农妇那样，坚决不同占领军合作。仅仅因为耐不住饥寒，她便无耻地主动投靠德寇，当上一名被广大苏联人民嗤之以鼻的走狗。她拿起德寇发给她的手枪，开始放肆地杀害被俘后坚贞不屈的红军战士、游击队员甚至无辜的平民百姓。几年间，被她残杀的苏联公民竟达1500人左右。为了追求花天酒地而不是仅仅维持温饱，她不惜卖身，又当上了德军的军妓，可谓丧尽廉耻。战后，她远远地逃离了作恶多端的现场。由于她没有使用父亲的姓氏，而用了一个上小学时老师随便给她起的姓，这无形中给司法当局造成极大的麻烦。当时，在苏联全境，姓马卡洛娃的30多岁的女性多达三四百人。而此时，她又嫁人了，随丈夫使用了金斯伯格的姓氏。这样一来，战后30年内这个罪恶累累的战犯仍未能落入法网。然而，终有天理昭彰的一天：1976年的一天，一位准备出国的女官员，在填写出国申报表时，按照要求填写了自己全部亲属的姓名。“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她的姓氏跟你不一样？”“她是我的姑姑，至于为什么她姓这个姓，我也不清楚。”这个细小的情节很快传到同时也掌管缉拿漏网战犯的克格勃耳朵里，年龄与逃犯非常相仿的这位姑姑很快被置于严密的监

控之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她就是那个罪恶滔天的马卡洛娃。她很快走上了法庭，正当她做着“反正都是多少年前的老皇历了，无非蹲上三五年牢房就可以回家”的美梦时，庄严的判决书下达了：“判处死刑，而且是最终判决”。1978年8月11日，这个丑恶的灵魂，终于被无情地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宣扬所谓“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新思维。此期间，苏联司法部们对当时发现的少数战争罪犯，一般都大大从轻发落，对于自首者则往往免予一切刑事处分。

### 五、波兰政府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根据以切斯瓦夫·比利霍夫斯基教授为首的波兰国家调查纳粹战犯罪行委员会提出的名单，在波兰境内外对波兰国家和公民犯下罪行的纳粹战犯共计7405人。自1944年到1970年，波兰国家和地方法院共审判纳粹战犯5450人，其中135名罪大恶极者被判处极刑。对于在集中营内犯罪的战犯，共有300余人受审，35人被判处死刑。从1946年6月21日到1959年3月8日，波兰政府和中央、地方两级法庭对主要的纳粹战犯进行了12次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大的审判。它们分别是：

#### （一）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霍斯审判案

1947年3月11日至29日，波兰法庭在华沙对前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霍斯进行了审判。由于霍斯同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乙级战犯的典型。所以，这里有必要对他详加评介。

#### 鲁道夫·霍斯（1900—1947年）

首要纳粹乙级战犯之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头号刽子手。霍斯于1900年11月23日生于巴登一个商店老板家中。其父母均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衷心希望他长大后当一名牧师。霍斯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只上了6年的文法学校。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促使他谎报年龄参加了德皇的军队，尽管他当年还不满15岁。三次负伤使他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战争结束后，霍斯同许多贫困



潦倒的退伍军人一道加入弗里科集团，致力于寻找和惩办“祖国的叛徒”。1923年5月底，霍斯因杀害一名揭发军国主义集团不法行为的共产党员，被判处10年监禁。1928年，霍斯因大赦而被释放。1932年霍斯加入纳粹党，党证号码是3240。此时，他已被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理论深深地吸引，他把《我的奋斗》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二十世纪的神化》视为精神食粮。他确信德国的民族利益同世界犹太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所有的日耳曼人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犹太人的危害和起来抵制他们。1934年4月1日，霍斯获准加入党卫军并在三周后成为党卫军军官。由于希姆莱的大力推荐，霍斯于1934年来到达豪集中营工作。上级告诫霍斯：任何一个党卫军成员均必须绝对服从命令，只要有人违抗元首的命令，就必须消灭他们，即使自己的亲属也不例外。这种精神训练使得霍斯成为一个草菅人命的职业屠户。霍斯坚信：为了民族社会主义的长期存在，就必须建立集中营。他认为：“把国家的敌人关押起来是为了防止他们的魔鬼行径，保护全国人民。”1936年，霍斯被提升为党卫军二级突击队中队长，还被誉为老战士，他在纳粹党中的地位明显提高。1938年8月1日，他被任命为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负责人。1940年夏，希姆莱亲自下令提升霍斯为党卫军高级军官，并当面指示他：“东部的集中营还不适于进行大规模的行动，我只有在奥斯维辛这一地区实行这项计划了，因为它地处一个偏僻的地方。我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你，你必须绝对保密，甚至对你的上级。”他还向霍斯宣称：“我们必须消灭每一个犹太人，如果我们发发慈悲，漏过一个犹太人，没有从种族上消灭他们，有朝一日，他们一定会对德国造成危害，或者消灭德国。”随后，霍斯陪同艾希曼一同考察了奥斯维辛的地形地貌，又讨论了各种大规模杀人方法的利弊，最后决定只能使用毒气。未几，集中营尚未正式开张，霍斯又被晋升为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相当于上尉）。霍斯在屠杀设备方面的考虑很是周全，他设计了一套合成体系，包括脱衣室、毒气室和焚尸场。新官上任三把火，霍斯此时迫切地希望上级了解他的新式屠杀方法——他选择的杀人气体是杀虫用的齐克隆-B，而不同于克里斯蒂安在特列勃林卡等

## 第六章 各个盟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灭绝营早已使用的一氧化碳。经过一场为时不短的争论，霍斯压倒了克里斯蒂安，他提倡的齐克隆-B 开始在许多集中营和灭绝营广泛使用。霍斯在奥斯维辛的工作很受希姆莱一伙的赏识，他很快又一次升官了，这次的官衔是党卫军中校。他手下管辖着 2 000 多名党卫军男女官兵，看管着 12 万以上的囚犯：在奥斯维辛主集中营，有 25 000 名左右的男女囚犯；在比克瑙分营，有 3 万名女囚和 6 万名男囚，在莫诺维茨分营则有 1 万名男女囚犯。从 1940 年 6 月 14 日第一批囚犯入营，到 1945 年 1 月 17 日集中营总撤退，平均每天都有数百人因饥饿、疾病、劳累过度 and 不堪虐待而“自然地”死去；许多囚犯来到奥斯维辛不到一个月，就被恶劣的环境夺去了生命。此外，还时常有不少囚犯因各种过错被枪毙或绞死；从 1942 年夏到 1944 年 10 月 31 日，平均每天有 2000 人被骗入毒气室杀害。对于那些已经因劳累过度而身体垮掉丧失了生存价值的囚犯，是要经过司令官的批准才能送入毒气室处死的。对此，霍斯是异常“慷慨大度”的，有一次他一下就核准了对 1 万名囚犯的死刑判决。1943 年 11 月，在希特勒最亲信的马丁·鲍曼的极力推荐下，霍斯升为纳粹集中营副总监，负责指导其他一切集中营的工作，并有权安排人事任免。霍斯的重大罪行之一是他参与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局 1944 年夏季对 40 万名匈牙利犹太人的大屠杀。当时，他虽然已不再担任该集中营的司令官，却亲自赶回奥斯维辛，到现场监督将犹太人赶进毒气室达半个月之久，与现任司令官利勃亨舍尔一道研究如何更高效地杀害犹太人。

只是到 1945 年 4 月下旬，苏联红军已对柏林形成合围之势，霍斯才感到有必要放下屠刀，希冀借此保全自己的性命。他下令尚未解散的集中营停止屠杀囚犯，并邀请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长官前来共商大事。不久，霍斯在一次车祸中受伤，随即神秘地失踪。第三帝国彻底崩溃时，他身穿普通水兵的制服，出现在基尔港口。以后，他化名弗兰兹·勒居，伪装成农民，在一个农场中工作到 1946 年 5 月 11 日身份暴露，被英军抓获。

几个星期后，霍斯被押送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作为证人出庭。在

纽伦堡被关押期间，他写下大量供词，承认了人们指控他的所有罪行；同时，他交代希姆莱曾说过柏林总部下达的关于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命令必须尽快无误地执行，而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忠实的执行者，他企图以上述手法取悦英国人，从而保住自己的性命。1946年4月15日，霍斯出庭作证，他交代，在希姆莱的指示和督促下，他在奥斯维辛建立了两个能够容纳2000人的大型毒气室，而特列勃林卡灭绝营的毒气室只能容纳200人；“另一个我们超过特列勃林卡的地方是，在特列勃林卡的每一个受害者都知道自己将被送进毒气室处死；而在奥斯维辛，受害者并不知道自己将被送进毒气室，只是以为自己在走过一条走廊去淋浴……多次进行之后，囚犯们才弄清我们的意图。”他毫不犹豫地供认250万犹太人死在奥斯维辛的毒气室里，另外还有50万人死于饥饿、劳累、疫病以及枪杀。当法官问及怎么可能杀死那么多人时，霍斯回答所有这一切并不困难，“即使要屠杀更多的人也不是难事”。他说：“一个大型毒气室能在24小时内消灭10000人。这简直容易极了，甚至不需要卫兵去驱赶，犯人们都会乖乖地走进去，整个过程非常迅速。”即使英国法官有意开脱他，深受奥斯维辛摧残的波兰人也不会饶过他。1947年4月2日，华沙人民法庭判处霍斯死刑。因绝望而懊丧的霍斯，只能借助不停地吸烟来排遣。4月15日，霍斯被波兰法警押解到原奥斯维辛集中营内专门为他设立的绞架上，并毫不客气地踢倒了他站立の木凳，送他去见上帝。要知道，几年前，根据霍斯的命令被送上绞架的各国囚犯多达数百人；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经他下令处决的苏军战俘多达几千人。他的冷酷无情还表现在，他一次就核准把1万名失去劳动能力的男女囚犯赶进毒气室，而这类的核准多达数十次。

## （二）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

1947年12月，波兰最高人民法庭在故都克拉科夫庄严地开展了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战犯的审判。此次出庭的罪犯共64人，波兰司法部门抓获的有关战犯全部到庭。此时，重要的乙级战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头号战犯鲁道夫·霍斯，已由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由波兰政府引渡回国，于1947年4月在他犯下最严重罪恶的奥斯维辛集

中营主营执行绞刑。所以，这次在法庭上露面的级别最高的战犯是霍斯的继任阿尔图尔·利勃亨舍尔，1944年夏天，奥斯维辛集中营灭绝35万多名犹太人的空前罪恶行动，就是经他一手策划组织的。第二号罪犯是集中营政治部主任马克西米连·格拉布纳，他主管的政治部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囚犯们被带进去之后凶多吉少，不死也得掉层皮，也有的终身致残。他不仅指示部下行凶，而且亲自动手，用大针刺男囚的睾丸，把坐药塞入女囚的阴户。第三号罪犯叫汉斯·奥麦艾尔，第一监护营司令官，他应对每天几千名囚犯的死亡负责，特别是对十几万名被蓄意杀害的苏军战俘负责。1944年他因为工作出色，升任驻爱沙尼亚的韦瓦拉集中营司令官，1945年又调任驻挪威的格里尼集中营司令官，身上沾满欧洲各国人民的鲜血。第四号罪犯是一名女性，玛利亚·门德尔。她是女囚营的看守长，也是铁十字勋章的获得者。就凭这一条，便可知道此人绝非善类。别看她生得秀美可人，平时很少高声说话，但她的凶恶之处在于，挑选女囚送进毒气室，总是宁滥毋缺。有时，她竟感觉医生们的“挑选”速度太慢，程序过于烦琐。于是，1943年5月，她一次就亲手挑选了540名被苦役摧残得筋疲力尽的妇女，驱往毒气室处死。她也曾煞有介事地抱起一个4岁的犹太男孩走来走去，跟他说笑话，给他糖果。但这一切不过是猫在捉弄临死前的猎物，玩够了小男孩以后，她又亲手把他抛进毒气室。被告中还有4名女性——泰莱莎·布兰德勒、露易丝·丹茨、希尔德加特·莱歇尔特和阿丽萨·奥尔洛夫斯基，都是如狼似虎的党卫军女看守。营中的纳粹医生，只抓到59岁的约翰·保罗·克莱莫。不管他认罪不认罪，他几年来详尽的日记本，已经成为给他定罪的有力依据。其内容反映出，他至少参加过几十次“挑选”，至少给五六十个刚刚来到集中营的荷兰犹太妇女注射致命的毒剂处死她们，任凭她们百般求饶也不为所动。可惜的是，比他更可恶的纳粹医生门格尔、舒曼、科尼希、蒂洛、克莱尔等早已先期逃跑了，卡尔·克劳贝格已被苏联当局判刑25年，主任医官爱德华·维尔茨则已畏罪自杀。同年11月22日，波兰克拉科夫最高人民法庭庄严宣判：判处阿尔图尔·利勃亨舍尔、马克西米连·格拉布纳、汉斯·奥麦

艾尔、玛利亚·门德尔、戴莱莎·布兰德勒、约翰·保罗·克莱莫、艾利希·穆斯菲尔德、海尔曼·莫施纳、艾利希·约斯、威廉·格哈德·戈林、库尔特·胡戈·廖勒、路德维希·普里雅戈、奥托·莱奇、弗里茨·威廉·本特洛克、奥古斯特·雷蒙德·波古什、保罗·格策、保罗·舒莱克、尤塞夫·科勒麦尔、赫伯特·保罗·路德维希、阿尔图尔·约阿希姆·勃雷特维策、汉斯·舒马塞尔 21 人死刑，立即执行；判处露易丝·丹茨、汉斯·科赫、安东·莱希纳、迪特莱夫·奈比、阿道夫·梅迪芬德 5 人终身监禁；判处希尔德加特·莱歇尔特、阿丽萨·奥尔洛夫斯基、爱德华·劳仑茨、利哈德·施罗德、汉斯·霍夫曼、亚历山大·比尤洛夫、弗兰茨·洛梅辛特、约翰内斯·倍倍尔 8 人 15 年监禁；判处艾利希·丁格斯 5 年监禁，卡尔·耶施克 3 年监禁；宣布汉斯·明希医生无罪释放。

### （三）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审判案

从 1944 年到 1950 年，波兰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对于马伊达奈克集中营罪犯的审判。在总共 1037 名集中营党卫军官兵中，波兰审判了 108 名，其他国家审判了 7 名。该营的 5 任司令官因故全部未能到庭：马科斯·科盖尔被盟军抓获后在狱中自杀；阿尔图尔·利勃亨舍尔后来调任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在 1947 年克拉科夫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被判处死刑；马丁·维斯在达豪集中营审判案中先期已被美军司法部门处决；卡尔·科赫与赫尔曼·弗罗尔斯泰特因欺诈和腐败罪，被党卫军内部法庭处死。1944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2 日，波兰军事法庭在卢布林举行审判，判处该集中营副司令官安东·费尔奈斯及其他 4 名主要负责人伏格尔、赫尔施泰梅耶尔、施麦伦、施塔利斯死刑。1947 年 12 月 23 日，波兰最高法院在克拉科夫对该营焚尸场负责人埃利克·努斯费尔德宣判死刑；1948 年该法院在卢布林宣判该集中营女囚营看守长爱丽莎·埃利希死刑。她是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审判案中唯一被判死刑的女被告，原因是她不仅参与策划了 1943 年 11 月 3 日对 17 000 多名犹太囚犯的集体屠杀，而且多次亲自挑选了大批妇女、儿童赶进毒气室处死，并且亲自拷打和折磨许多囚犯，罪行累累。

## 第六章 各个盟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 (四) 摧毁华沙犹太区的首恶——于尔根·施特鲁普审判案

于尔根·施特鲁普是党卫军旅队长（相当于少将），老牌纳粹党员。

1943年3—5月，他是纳粹德国摧毁华沙犹太区罪恶行动的现场总指挥。在这次行动中大约有20万犹太人罹难（其中56000多人被押送特列布林卡灭绝营的毒气室杀害），仅有千余人死里逃生，整个华沙犹太区化做一片废墟。为了镇压犹太人的抵抗，他下令使用重炮和火焰喷射器。由于此次行动的成功，他被晋升为驻希腊的党卫军和保安警察总指挥。1947年3月22日，他因下令在希腊大批杀害人质，被一个美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根据波兰政府的要求，他于1948年被引渡到所犯罪行最严重的华沙受审。他再次被判处死刑，并于1951年9月8日在华沙犹太区遗址执行死刑。

### (五) 华沙保安警察司令尤塞夫·梅森格审判案

1946年12月17日至1947年2月24日，波兰法庭在华沙举行了对纳粹战犯——纳粹德国驻华沙保安警察司令尤塞夫·梅森格、治安警察首领马·道麦、华沙郊区区长勒·菲舍尔、华沙市市长雷斯特的审判。他们被控推行纳粹暴政，大批杀害波兰居民，迫使当地居民到德国从事奴隶劳动，毁坏波兰的民族文化。在杀人方面，道麦是最为凶恶的一个。1939年，他为了两名德国人被波兰居民杀死一事，向波兰人加倍报复，一次就枪杀波兰人107名。判决的结果是：梅森格、菲舍尔、道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雷斯特判处8年监禁。

### (六) 莱奥珀尔特·阿蒙·果特审判案

莱奥珀尔特·阿蒙·果特生于1908年12月11日。“二战”后期因忠实执行希特勒、希姆莱关于“对犹太人问题实施最后解决”的指示，晋升为党卫军中校和驻波兰东部布拉朔夫犹太人劳动营司令官。1943年他带领党卫军部队摧毁了波兰克拉科夫和塔尔诺夫两地的犹太区。1943—1944年担任布拉朔夫犹太人劳动营司令官。在此期间，他以残酷折磨和疯狂屠杀犹太囚犯而著名。世界闻名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的纳粹集中营司令官，就是以他为生活原型的。战后，被引渡回波兰受审。1946年9月5日，克拉科夫法庭依法判处果特死刑，并于9月

13日将他执行枪决。

#### (七) 纳粹瓦尔特省总督阿尔图尔·格莱泽尔审判案

格莱泽尔在“二战”前即是活跃的纳粹党员、格丹斯克市市长，积极为把该市并入纳粹德国奔走呼号。“二战”爆发后，他又当上了瓦尔特省总督。他一手组织了对数十万波兰居民的恐怖行动和大屠杀。突出的一例是，他曾于1943年3月底亲抵纳粹设在西里西亚的灭绝营——海乌姆诺（库姆霍夫），对一支特别行动分队训话时，代表元首感谢他们大肆屠杀犹太人的行动。1946年7月，他在波兹南被判死刑。同案犯、克拉科夫附近的强迫劳动营司令阿·海特，被控建造犹太人隔离区，以后又大批杀害这些犹太人。1946年，海特被判处死刑，并在克拉科夫执行枪决。

#### (八) 纳粹党格丹斯克大区书记长阿道夫·佛尔斯特审判案

他被控竭力促成格丹斯克并入纳粹德国，组织和实施对波兰居民的大规模屠杀，或对他们实施强行迁徙，掠夺波兰国民的财富，摧残波兰文化传统，对该总督区内的波兰人强制推行日耳曼化。波兰格丹斯克地方法庭判处佛尔斯特死刑并迅即执行。

#### (九) 克拉科夫总督区政府首脑尤塞夫·比勒审判案

1948年6月17日至8月5日，波兰最高人民法庭在克拉科夫举行了最后一次对主要纳粹战犯的审判，被告席上站立的罪犯是克拉科夫总督区政府首脑尤塞夫·比勒。此人乃是前克拉科夫总督区总督汉斯·弗兰克最亲密的助手，在权力和罪行方面也是仅次于弗兰克的第二号人物。他被控有系统地践踏国际法准则，对广大波兰居民实施法西斯恐怖，强行把波兰青年驱赶到德国从事奴隶劳动，蓄意毁灭波兰的传统文化。此外，在1942年1月20日召开的万湖会议上，他是“对犹太人问题实施最后解决”的狂热的拥护者。1948年7月20日，这个纳粹统治者理所应当地被处以死刑，并于同年8月份执行。

本来，该法庭还准备审判党卫军将军巴赫·捷列夫斯基和莱因法尔特。但是，美英政府拒绝从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向波兰移送这两名在波兰领土上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因此对两人只进行了缺席判决。

## 第六章 各个盟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 (十) 汉斯·比波夫审判案

汉斯·比波夫于1940—1944年任纳粹德国保安警察驻波兰罗茨犹太区行政长官。他被控对摧毁罗茨犹太区和这里的十余万犹太人被押送奥斯维辛集中营等地杀害负有罪责。战后，他被引渡回波兰，并在罗茨接受审判。1947年4月24日，他在罗茨被执行枪决。

### (十一) 恩斯特·波普勒审判案

恩斯特·波普勒是纳粹德国克拉科夫总督区政府国务秘书。他的主要罪状是积极协助该总督区党卫军和保安警察格罗勃赤尼克，把波兰犹太人强制性集中到犹太区并押送到灭绝营杀害。1950年2月，在克拉科夫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 (十二) 对第三帝国东普鲁士行政区总督埃利希·科赫的审判

纽伦堡审判结束13年之后，波兰最高法庭于1958年10月29日至1959年3月8日，对主要的乙级战犯之一的埃利希·科赫进行了严正的审判。

埃利希·科赫是老牌的纳粹党徒，其党证的号码是第90号，入党时间比大多数纳粹高官都早。自1939年起，他先后被委任为东普鲁士行政区总督和乌克兰行政区总督（兼管比亚威斯托克行政区）。有鉴于他对波兰人民、乌克兰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仅波兰政府即指控他应对40万波兰人和波兰犹太人的死亡承担罪责。“二战”结束后，他凭借伪造的假护照，以罗尔夫·拜格尔的化名隐藏了4年之久。他在汉堡附近的哈森莫尔的一家农场中当农工，直到身份暴露，于1949年5月底被美军逮捕为止。1950年1月14日，他被引渡到波兰，关押在华沙的莫科托乌监狱。1959年3月8日，他被判处死刑。但由于他供出了举世闻名的稀世珍宝——琥珀房屋的藏匿线索，被从宽判处终身监禁。关押期间死于波兰巴尔柴沃监狱。

### (十三) 斯图特霍夫集中营审判案

1946年5月31日，波兰格但斯克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前纳粹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的罪犯。罪犯包括5名女看守、6名男看守和一批助纣为虐的卡波（被集中营当局挑选出来作为帮凶的集中营囚犯）。经审理，所



有的被告被确认有罪，其中 11 名男女看守均被判处死刑，所有卡波被判处有期徒刑；这 5 名穷凶极恶的女看守是：

格尔达·施泰因霍夫（1922—1946 年）

她是生于但泽（格但斯克在划归波兰之前的名称）的德国人。1944 年她成为斯图特霍夫集中营下属的一个卫星营的看守，从同年 10 月起，担任该营一个囚舍的舍长，管理 400 多名妇女和儿童。从此，她大施淫威，多次将不适合高强度劳动的妇女和儿童挑选出来，送入毒气室杀害。由于她积极杀人的功劳，10 月底，即被提升为另一个卫星集中营——但泽—霍尔姆营的看守长。12 月，她又被派遣到规模更大的比得哥煦卫星营担任要职，直至 1945 年 1 月 25 日该营被迫解散。她潜逃回家，但是难逃法网，同年 5 月 25 日被波兰司法当局逮捕，并受到严正审判。

燕妮·婉达·巴克曼（1921—1946 年）

她从 1944 年开始到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第三区担任看守。千方百计地虐待女囚，甚至把她们折磨致死是她的拿手好戏。当然，在挑选女囚进毒气室方面，她也绝不逊色于任何其他女看守。敢怒而不敢言的女囚们暗中称她为“美貌的幽灵”。1945 年 5 月，正当她企图逃到一个更加安全的地点时，在火车站被早有安排的波兰司法当局抓获并送上法庭。

婉达·克拉芙（1922—1946 年）

她也是生于但泽的德国人。1938 年中学毕业后，当过火腿厂工人。以后为了追求高收入，于 1944 年当了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的看守（月薪大概是普通女工的几倍），先后在普劳斯特和卢索欣两个卫星营任职，以残酷虐待、折磨女囚著称。后来，她在法庭上供认：“每天，她至少要毒打两名女囚。”因而，女囚称她为卫星营中的撒旦。1945 年 6 月 11 日，被波兰司法机关逮捕，并送上法庭。

伊丽莎白·贝克尔（1923—1946 年）

她生于波兰小城诺依泰希，但是一个地道的德国人。她于 13 岁时（1936 年）参加了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德国少女联盟。1944 年 9 月 5 日，她穿上了党卫军的制服，成为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第三区的看守。到

任以后，她便以穷凶极恶地挑选妇女和儿童送进毒气室著称，女囚们对她唯恐躲之不及。1945年1月15日，她看到苏联红军逼近集中营，便匆匆逃走，回到诺依泰希老家。4月13日，她被波兰司法当局追捕归案，送上法庭。令人惊讶的是，她不顾自己的累累罪行，竟异想天开地致信当时的波兰总统贝鲁特，要求对方看在她年纪轻轻，政治不够成熟的份儿上饶她不死，允许她将功赎罪。但是，法律是不相信眼泪的，每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士都不会将她从死神手中夺回来。

埃娃·巴拉迪雅斯（1920—1946年）

她生于德国小城劳腾堡新道尔夫大街100号一个信仰新教的家庭。1935年中学毕业，先后在伍佩尔塔尔、埃尔富特和本市担任公交车售票员，终身未婚。1944年8月，她参加了党卫军，到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第三区充当看守。同年10月，调至布隆贝格—奥斯特卫星营做看守；1945年1月，又调回第三区，直到同年5月该集中营解散。

在担任看守期间，她的许多行径恶得出奇：例如，她经常逼迫某个女囚脱光衣服跪到泥塘里，并将一桶桶冷水泼到她们身上。当集中营解散，囚犯们被押解到劳腾堡途中，她又将其中许多无力跋涉的女囚枪杀。战争结束，她回到家乡到一个邮局干了几个星期后，即被逮捕归案。1946年5月31日，她被波兰司法当局判处死刑。

1946年7月4日，这5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女罪犯被押往格但斯克郊区的比斯库皮亚山下，公开执行绞刑。下午5时，埃娃·巴拉迪雅斯最后一个登上绞架。此前，她的4个同案犯刚刚丧命。

截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波兰司法部门仍遗留有关纳粹战犯的未决案件4000起以上，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多达15000余人。

### 六、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 （一）伪“斯洛伐克独立国”审判案

该案件的首恶分子有两人，即伪“斯洛伐克独立国”总统尤塞夫·蒂索及其伪总理贝拉·都卡。

尤塞夫·蒂索（1887—1947年）

伪斯洛伐克独立国总统，纳粹德国的主要帮凶之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头号卖国贼。

尤塞夫·蒂索曾为天主教神甫、神学教授。斯洛伐克人民党首领。1938年以来积极从事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的活动，慕尼黑协定签字后出任斯洛伐克民族分裂主义者建立的斯洛伐克自治政府首脑。1939年10月又粉墨登场，出任纳粹德国保护下的“斯洛伐克独立国”总统。1940年加入轴心国，并对英、法宣战。1941年6月，又追随希特勒参加反苏战争。除向纳粹德国不遗余力地供奉自然资源和炮灰外，还积极支持和配合艾希曼之流在斯洛伐克大力推行旨在灭绝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政策，造成近10万名犹太居民惨遭屠杀。在他的纵容下，其爪牙强征了数千名14—18岁的犹太少女，将其强暴后虐杀。1944年夏，斯洛伐克人民不堪暴政，揭竿而起。他却丧心病狂地呼吁德军前来镇压抵抗运动，并尽全力配合德军。1945年4月，在德军保护下逃亡奥地利。不久，向美军签署投降书。战争结束后，于1945年6月8日被美军逮捕，不久引渡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捷克斯洛伐克最高法院对蒂索的审判始于1946年12月2日，1947年4月15日判处死刑，4月18日在布拉迪斯拉发被执行死刑。

贝拉·都卡

伪斯洛伐克独立国总理，纳粹德国的主要帮凶之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主要卖国贼之一。

贝拉·都卡是蒂索推行法西斯统治和亲德卖国政策的最得力助手，他参与了蒂索从事的几乎所有罪恶活动，并始终追随蒂索。1945年6月，逃亡中的蒂索和都卡均被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美军逮捕，随后移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审判。都卡于1946年8月14日被捷克斯洛伐克最高法院判处死刑，8月20日被执行死刑。

## （二）利迪策村惨案审判案

捷克斯洛伐克司法部门于1946年对制造利迪策惨案的元凶及主要刽子手进行了审判。纳粹政权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代理总督卡尔·赫尔曼·弗兰克，作为下达“惩罚捷克人”命令的最高负责人，

被判处死刑。同年5月22日，在布拉格近郊公开执行绞刑。该保护国卡尔斯巴德和克拉德诺地区刑事警察和盖世太保首领、党卫军上校哈拉德·维斯曼，是第一个到达利迪策村的纳粹官员。正是根据他的判断和建议，纳粹当局实施了对利迪策村的大屠杀。1947年，维斯曼在布拉格被判处死刑，同年早些时候在捷克国家庞克拉茨监狱被执行绞刑。党卫军上尉马克斯·罗斯托克，是带队到利迪策村实施大屠杀的一线负责人。此后，他还曾奉派到匈牙利布达佩斯，执行艾希曼下达的驱除匈牙利犹太人到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的命令。罗斯托克于20世纪50年代初才被捕归案，并于1952年5月2日被判处死刑；但于1953年10月改判终身监禁。两名积极参与抓人和杀人的从犯、党卫军班长赫尔曼·克鲁麦和歌德·恩格尔，则被判处8年监禁。

### （三）库尔特·达吕格审判案

库尔特·达吕格是党卫军将军，纳粹德国保安警察总负责人。正是他于1941年10月签署了将纳粹德国的所有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的法令。其后，继海德里希之后任纳粹德国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签署了大量屠杀捷克人民和镇压抵抗运动的法令。“二战”结束后，被引渡回捷克进行审判，并判处死刑。1946年10月20日在布拉格被执行枪决。

### （四）亚历山大·凯拜莱茨审判案

1966年，布拉格法庭指控已被捕到庭的前特列森施塔特集中营负责人之一的亚历山大·凯拜莱茨，参与对该集中营的犹太人囚犯进行大屠杀，并将他判处极刑。

### （五）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女看守审判案

1948年，捷克政府将索菲娅·尼舍芙、安娜·达维多夫、英格贝格·维尔纳、埃玛·佛克、菲蕾米娜·恩格斯、赫尔米娜·布吕克纳6名前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女看守引渡到捷克首都布拉格进行审判，她们被指控应对关押在该集中营的5500多名捷克斯洛伐克妇女惨遭杀害负有直接责任。其中，索菲娅·尼舍芙的罪行最为突出：仅在1943年2月，她伙同该营医院的纳粹医生，一次就给100名犹太妇女注射了致命

的毒剂，使她们全部死亡。经审判，索菲娅·尼舍芙和安娜·达维多夫被判处死刑，并于同年10月7日在潘克拉茨监狱执行死刑。英格贝格·维尔纳被判处终身监禁，埃玛·佛克被判处25年监禁，赫尔米娜·布吕克纳和菲蕾米娜·恩格斯被判处20年监禁。

## 七、民主德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民主德国在其存在期间，始终是纳粹战犯的克星。除去极个别的例外，绝大多数纳粹战犯都受到应得的惩罚。从1945年9月到1964年，民主德国各级法庭共审判纳粹战犯16827人，内12807人被宣判有罪，其中判处死刑者118人，判处终身监禁231人，判处有期徒刑12458人。直至1966年，他们还顶住了所谓“违反人权原则”的外部压力，断然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杀人医生弗里茨·菲舍尔处以极刑；并将3名被西方“从宽”处理的、民愤很大的集中营女看守重新逮捕入狱，判处终身监禁（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此3人中已有2人死去，1人在两德统一后被释放）。1983年，民主德国某地方法院又将近期被揭露出来的、曾在“二战”时期杀害大批犹太妇女儿童集中营看守弗利茨等3人判处8—15年监禁。直至1988年，民主德国地方法院还在积极查处纳粹战犯。值得指出的是，在民主德国审判纳粹战犯的前期，也发生过某些冤假错案。突出的一例是：1953年下半年，将“6·18”事件的组织者之一的爱尔娜·多恩，当做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血债累累的党卫军女看守格特鲁德·哈勃施泰因，两罪并罚，将其判处死刑。

### （一）泰奥多尔·奥勃伦德审判案

1959年7月1日，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发表文章，题为《杀人犯奥勃伦德在工作》，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窃据西德联邦政府移民部部长要位的泰奥多尔·奥勃伦德的纳粹战犯身份，并于同年4月20日至29日对此案进行了审判，缺席判处他终身监禁。“二战”前，奥勃伦德即是纳粹德国军事情报局（简称“阿勃维尔”）国外二处的官员，先后担任专门从事对德国的东方邻国进行入侵准备的特工组织德意志东方联盟、夜莺大队、山民团的领导人，在乌克兰的利沃夫、高加索的纳尔奇

克等地大肆进行间谍、破坏、骚扰和屠杀活动。其中最突出的一桩罪行是，他于1941年7月3日夜间指使夜莺大队，在利沃夫罗曼诺维奇大街一间地下室内秘密杀害了当地波兰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36人，包括波兰前总理卡吉米日·巴特尔，著名教授雷斯基、克鲁科夫斯基、奥斯特罗夫斯基、斯托耶尔和女作家加利娜·古尔斯卡雅。

### （二）汉斯·格罗布克审判案

曾在西德联邦政府内政部长长期担任国务秘书的汉斯·格罗布克，竟是一个长期隐瞒罪恶历史的纳粹战犯。他在纳粹统治时期曾任内政部部长助理和总顾问，是甲级战犯、内政部部长威廉·弗利克的得力助手。他亲自参与了迫害犹太居民和被占领国家居民的《纽伦堡种族法》和《国籍法》的起草工作；后又代表内政部出席了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还曾到东欧一些国家，协助艾希曼督促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甲级战犯，战后初期，曾被盟国有关机构列为第101号战犯。他在战后依然怙恶不悛，积极庇护和串联了大批纳粹战犯，仅在联邦外交部内，他就安插、推荐了相当一批纳粹战犯，其总数竟占到官员总数的2/3上下。

为了狠煞这个纳粹战犯的嚣张气焰，民主德国首先公开披露了他的主要历史罪恶，又于1962—1963年在证据确凿的前提下，对格罗布克缺席判处无期徒刑。这一判决对西德、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引起了正义力量和反法西斯人士对纳粹战犯阴谋活动的警觉，促使西德政界对本国惩办纳粹战犯严重滞后状况作出反思，推动了西德和欧洲国家追缉纳粹战犯的进程。

### （三）霍斯特·齐尔维斯特·菲舍尔审判案

霍斯特·齐尔维斯特·菲舍尔在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即分配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主营和莫诺维茨分营医院的主任医生。他伙同几个党卫军护士，对囚犯经常进行死亡挑选、注射毒剂和活人试验，导致上万名囚犯痛苦地死亡。由于屠杀犹太人和战俘有功，他的军衔由党卫军中尉晋升为上尉。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苏军解放前夕，他逃离奥斯维辛。经过多方波折，他潜回故乡——民主德国，并且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隐姓埋

名，潜伏了20年之久。1966年3月25日，民主德国最高法院经过广泛调查取证，确认他犯有重罪，以反人道罪判处他死刑，并于同年6月11日执行。

#### (四) 瓦赫霍尔兹审判案

瓦赫霍尔兹是前党卫军军官，他是1944年纳粹分子摧毁捷克境内的特列森施塔特犹太区杀害数千名犹太人的主犯之一。民主德国司法机关在掌握了其所犯罪行的确凿证据后，于1968年12月13日宣布判处他死刑。

#### (五) 保罗·尼彻审判案

1947年7月7日，民主德国德雷斯頓地方法院以违反人道罪和谋杀罪判处纳粹医生保罗·尼彻死刑。该医生是“无痛死亡纲领”的参与起草者之一，也是T-4行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还曾任佐恩施泰因处决中心最高负责人。经他下令杀害和亲手杀害的重残病人多达3万人以上。其同案犯卡尔·艾哈德、恩斯特·L（博士）、赫尔曼·F三名医生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罗伯特·H医生被判20年监禁，君特·L（博士）、女医生爱尔萨·S被判15年监禁，女医生希尔德嘉特·A和玛丽·W被判8年监禁，女医生玛丽-露易丝·P和克拉拉·F被判3年监禁。

#### (六) 爱丽卡·勃格曼审判案

1955年11月12日，民主德国新布兰登堡专区地方法院以违反人道罪判处爱丽卡·勃格曼终身监禁。爱丽卡·勃格曼是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女看守，1943—1945年在该营任职。她对待女囚极端凶残，被她严刑殴打或百般折磨而死的女囚多达30人以上。她特别喜欢唆使警犬咬人，有些女囚竟被恶犬咬出肠子，最后仍被勃格曼拖进毒气室杀死。

#### (七) 约瑟夫·布略什（1912—1969年）审判案

约瑟夫·布略什生于捷克苏台德地区。该地区被纳粹德国兼并后，加入纳粹党和党卫军。入侵苏联之后，他又加入特别行动队，成为疯狂屠杀和平居民的刽子手。1943年5月，他又参与了摧毁华沙犹太区的

罪恶行动，至少亲手杀害5名波兰平民。“二战”结束后，先在西德受审，被判处20年监禁，但数年后即被释放。1969年，在民主德国落入法网，作为重要纳粹战犯受审。同年，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绞刑。

### （八）对T-4医务人员审判案

1947年9月，民主德国德雷斯顿地方法院对被捕归案的15名以安乐死名义，于1939—1945年期间在安斯道尔夫、莱比锡、格罗斯施维迪茨医院以及佐恩施泰因处决中心，以注射毒药等“医疗手段”杀害大批精神病患者的纳粹医生、护士（T-4医护人员）进行了审判。其中，纳粹医生赫尔曼·费尔夫、卡尔·艾哈德·戈贝尔、恩斯特·雷昂哈特（博士）、赫尔曼·保罗（博士）被判处死刑；威廉·保罗·莱普克被判终生监禁；艾哈德·罗伯特被判20年监禁；君特·鲁道夫被判15年监禁；女医生爱尔萨·格特露德被判15年监禁；女护士希尔德加特·克拉拉、路易丝·玛丽均为8年监禁；约安娜·玛丽·路易丝和路易丝·玛丽均为3年监禁；其余3名女护士因证据欠缺被宣布无罪释放。

### （九）罗斯托克集中营女看守审判案

1966年11月由罗斯托克地方法院审理，3名被告分别是乌拉·埃玛·弗里达·居尔斯、伊尔斯·果里茨和弗里达·沃采尔。3人被指控在1942—1945年供职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及其附属的诺依勃兰登堡、巴尔特、根廷卫星营时进行过多次杀害（“挑选”）、毒打和折磨、虐待女囚的大量罪恶行径，判处3人终身监禁。

这是民主德国对纳粹战犯进行的最后一次影响较大的审判。

## 八、法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 （一）奥拉都尔惨案审判案

1953年1月12日，法国军事法庭在波尔多开庭审理涉及奥拉都尔惨案的22名纳粹战犯。这22名案犯均为前党卫军帝国师的官兵，其中11名是德国人，11名是“二战”中被第三帝国吞并的阿尔萨斯人。法庭审理延续了将近一个月。最终，2名被告被判处死刑，2名被判处12



年苦役，17名被判处5—10年监禁，1名被告被宣判无罪释放。

### （二）赫尔穆特·克诺亨审判案

赫尔穆特·克诺亨，重要纳粹乙级战犯之一，大肆屠杀法国抵抗战士和爱国人士的主要刽子手。

赫尔穆特·克诺亨于1910年3月14日生于马格德堡的一位很有名望的教师家中。其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任后备军上尉，具有浓厚的狭隘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对克诺亨思想的逐步纳粹化有很强烈的影响。受父亲影响，他16岁时就参加了右翼民族主义组织青年钢盔团。1932年加入冲锋队和纳粹党。1933年纳粹党上台时，克诺亨正好考上来比锡大学，1935年获得哲学博士的学位。1936年他进入官方的德意志新闻社，当上一名编辑。军衔晋升为中尉并抵达巴黎任职。同年，经过去的教授、现任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官员希克斯介绍，他也加入了保安勤务处。1937年克诺亨已经晋升为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在本系统内专门负责研究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三国问题。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进攻，并于一个多月后占领法国全境。6月，克诺亨随着纳粹德国军队抵达巴黎。有鉴于克诺亨血腥镇压法国人民，并把大部分犹太居民驱赶到集中营和灭绝营，他逐步晋升为盖世太保驻巴黎的总头子，直至1944年8月离开巴黎。1946年他被捕并判处死刑。后经法国总统戴高乐说项，于1962年被释放。

### （三）奥博格审判案

卡尔·奥博格于1897年1月27日生于德国北部的大都市汉堡，父亲是医学博士。他17岁高中毕业后，当即参加了战时志愿兵，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9月，因战功在法国前线被提升为陆军少尉；战争结束时还曾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1931年6月，奥博格加入纳粹党，党证号码为575205。1932年4月，他又参加了党卫军。1933年7月1日，其军衔晋升为党卫军少尉；不久，又成为海德里希的亲信，并参加了筹建保安勤务处总部的工作。1935年，奥博格已晋升为党卫军中校；此后，相继担任梅克伦堡、茨维考、汉诺威、不来梅等地方党卫军负责人。1941年9月，出任波兰拉多姆地方的党卫军旅队长兼警察

局局长。在此，他参与了屠杀犹太人和镇压波兰工人运动的一系列行径。1942年4月，经希姆莱委派，出任党卫军和保安警察驻法国的最高负责人，军衔也升为党卫军少将，直至战争结束。奥博格在法国很快建立了11个分支机构，不遗余力地捕捉犹太人并押送到波兰等地的集中营和灭绝营；同时，他极其凶狠地镇压法国遍及全国的抵抗运动。在他任职期间，至少有77 000多犹太人被驱赶到奥斯维辛等集中营，有29 660名人质被杀害，4万多名抵抗战士不堪虐待和严刑拷打而死于狱中，25万名抵抗战士被押送德国的集中营或军工厂从事奴隶劳动。

1945年7月底，化名阿尔布雷希特·海因茨的奥博格在其隐藏地——奥地利蒂罗尔省基布厄尔的基施贝格村被美国军事警察逮捕。8月7日，根据法国政府的要求，美军当局将奥博格移交法国司法部门。法国司法人员对奥博格进行了386次预审后，于1954年2月22日在谢尔施-米蒂监狱军事法庭对奥博格和后来追捕归案的克诺亨开庭审判，并于同年9月20日判处2人死刑。死刑迟迟没有执行，1958年4月10日，戴高乐总统下令将2人的判决由死刑改为终身强制劳动。1959年12月31日，又对2人减刑为20年强制劳动。1962年11月28日，法国政府宣布大赦，将2人释放回德国。

#### （四）罗伯特·瓦格纳审判案

罗伯特·瓦格纳是纳粹德国驻（法国）阿尔萨斯总督区的最后一任总督，在任期间罪恶多端。1946年8月14日，法国司法当局对他的审判结案：他和4名主要助手均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押送刑场执行枪决。这个怙恶不悛的纳粹顽固派，死到临头还呼喊“德意志的阿尔萨斯万岁”。

#### （五）克劳斯·巴比审判案

克劳斯·巴比于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波恩附近的小城巴德-戈戴斯贝格。是“二战”期间盖世太保驻法国里昂地区的负责人。纳粹上台后，巴比首先参加了希特勒主义青年团；1935年9月26日，又成为党卫军保安勤务处的成员，1937年5月1日，他加入了纳粹党。1940年4月20日希特勒51岁生日那天，巴比晋升为党卫军少尉。不

久，他先后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任职，又被选拔到准备入侵英国的一支部队待命，直至希特勒下令取消了这次行动。他对杀害、拷打和虐待法国抵抗战士与和平居民、对把数万名法国犹太人驱赶到奥斯维辛等灭绝营负有直接责任。从1942年11月到1944年9月，在他担任盖世太保驻里昂地区总负责人的21个月时间内，1万多名法国人被逮捕，1046人被枪杀，6000人死于狱中或失踪。他还对杀害法国“二战”期间抵抗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让·穆兰负有直接罪责。“二战”结束后，他于1946年11月被英军情报人员逮捕，但是在押解汉堡途中逃脱。从此，生活转入地下状态。后来，他又被美军情报部门抓获。他因积极为美国驻德占领军效劳而被保护起来，经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法国当局说项，巴比逃脱了被判处死刑的应得惩罚。1949年他通过党卫军残余人员建立的秘密地下航线出逃到拉丁美洲，1951年3月抵达玻利维亚隐藏起来，更名为克劳斯·阿尔特曼。1968年，他创办了一家规模很大的木材加工厂。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的踪迹被追缉纳粹战犯的专家贝阿特·克拉斯费尔德夫妇发现，自此法国和世界反法西斯主义者展开了一场追捕巴比的战役，直到1983年将他缉拿归案，引渡到法国。因法国早已于1954年废除死刑，他以戕害人类罪被判处终身监禁。1991年死于狱中。

#### （六）波尔多审判案

1953年1月，法国波尔多地方法院对缉拿归案的21名制造奥拉都尔惨案的凶犯进行审判。由于英国驻德占领当局的庇护，该惨案的最高责任人、党卫军师长拉麦丁等人未能到案。而在战后，涉嫌该案的责任人至少有66人健在。

在该惨案中幸存的3名村民之一的玛格丽特·洛芳什夫人满身烧伤疤痕出庭作证。2月13日下午2点10分，法庭进行了宣判：党卫军上士伦茨和自愿加入德军效力的阿尔萨斯籍法国人乔治-勒内·布斯被判处死刑，4名德国籍党卫军士兵被判处10—12年苦役，9名阿尔萨斯籍党卫军士兵被判处5—12年苦役，1名德国籍党卫军士兵因提出他当时确实不在现场的有力证据，被宣判无罪释放，德国籍党卫军士兵保罗·

格拉夫已经因其他罪行被判刑。其他4名被告因证据不够充分，暂未宣判。1958年，法国政府将该案在押的案犯全部释放。

(七) 格拉夫和图普诺夫人审判案(1946年5月14日，法国凡尔赛)

1946年5月14日，法国凡尔赛法庭宣布：对德国军官格拉夫和女法奸图普诺夫人判处死刑(不久即执行枪决)；同案犯维希政权军官比沙尔、阿珀斯托里戴分别判处15年和8年监禁。他们被指控是酿成1944年8月沙都惨案的元凶。1944年8月25日，当一支游击队同前来进犯的盖世太保部队和维希政权部队在沙都进行谈判时，这些内奸和叛徒突然刺杀了游击队队长托尔塞，并制造混乱，向德军提供游击队的军事秘密，使这支游击队全部被敌人消灭，其中26名游击队员被俘后遭枪杀。

### 九、南斯拉夫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从1944年起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南斯拉夫对数百名纳粹战犯及其南斯拉夫籍帮凶进行了审判，至少有10%左右的被告被执行死刑。

(一) 对头号纳粹战犯亚历山大·略尔(将军)的审判

前纳粹德军驻塞尔维亚和希腊战区总司令亚历山大·略尔将军被控在南斯拉夫和希腊犯有参与屠杀犹太居民的罪行。1948年2月27日在贝尔格莱德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二) 对赫尔曼·贝伦茨的审判

南斯拉夫法庭审判并处决的另一个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是赫尔曼·贝伦茨(1907—1946年)。他是党卫军保安勤务处的高级官员。有谁想得到，这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还是一个法学博士。1933年加入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后任东部大区保安处处长，并获党卫军旅队长军衔(相当于少将)。1937年参与了诬陷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国防部部长)图哈切夫斯基“私通德国、图谋推翻斯大林取而代之”的阴谋活动，并亲自将所谓证据面交苏联方面委托的代理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二战”期间，出任纳粹德国驻南斯拉夫“德意志人援助办公室”负责人，积极参与灭绝犹太人和血腥镇压抵抗运动的罪恶活动。战后，

被南斯拉夫政府引渡归案，在贝尔格莱德受审并执行死刑。

### （三）对哈拉尔德·图尔纳的审判

哈拉尔德·图尔纳是党卫军将军，纳粹德国驻塞尔维亚军政长官。他被指控策划参与了1941—1942年对贝尔格莱德犹太区数万犹太人的集体屠杀。1947年3月9日，他在贝尔格莱德被南斯拉夫法庭判处死刑，不久执行。

此外，1946年，在南斯拉夫犯下严重罪行被缉拿归案，经审判后被处以绞刑的重要纳粹战犯还包括：党卫军欧根亲王师师长奥古斯特·施米特胡贝尔（少将），德军陆军第78师师长汉斯·弗尔特纳（少将），第11师师长弗利茨·诺依霍尔德（将军），第118师师长兼贝尔格莱德城防司令约瑟夫·吉勃勒（将军），阿达尔勃特·隆卡尔（将军），君特·特里布凯特（将军）。在南斯拉夫联邦所属的黑山共和国，1946年7月19日，铁托格勒法庭判处纳粹占领时期的克恩腾总督区总督弗里德尔·莱纳死刑。遭到同样下场的还有：占领军首领丘布雷（将军），行政高官奥勃斯特·福莱克纳，冲锋队执法首领约瑟夫·福格特，瓦尔特·霍赫施泰纳以及莱茵霍尔德·格拉赫。在该共和国审理的其他案件中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的重要纳粹战犯还有：赫尔穆特·格拉塞博士、汉斯·海斯林中将、奥勃斯特·海因利希·克莱斯特尔、君特·诺伊博特、雷奥·库斯。

1947年，南斯拉夫司法当局在贝尔格莱德对归案的重要纳粹战犯进行了审判。陆军将军海因利希·丹克尔曼、上校卡尔海因茨·埃格伯茨-希尔克、雅科布·采戈尔，党卫军首脑兼保安警察司令赫尔曼·贝伦斯、党卫军高级将领奥托·赛佛特被判处死刑，将军级高参弗兰茨·诺依豪森被判处20年苦役。

## 十、匈牙利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1944年夏秋，纳粹德国将80万匈牙利犹太人强行驱赶到奥斯维辛等集中营杀害，这是纳粹分子欠下匈牙利人民最大的一笔血债。由于作案者在逃，案件未能在本国审判。1960年前后，匈牙利有关当局多次

## 第六章 各个盟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就该案案犯逍遥法外或在其他国家关押，通报西德、奥地利等国政府，要求引渡下列战犯（当时，该案首犯阿道夫·艾希曼尚杳无音信）：

埃德蒙德·维森梅耶尔，党卫军少将，纳粹德国占领匈牙利时期，希特勒在匈牙利的全权代理人。他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是纳粹德国对匈牙利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主要依据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他担任德国一家化妆品公司驻达姆施塔特市总代理。

奥托·文克尔曼，党卫军及保安警察驻匈牙利最高领导。他是大批驱赶匈牙利犹太人的一线总指挥。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西德领取高级警官的退休金，并担任基督教民主联盟什勒苏伊格-荷尔斯坦因州某市议会的党团代表。

库尔特·克隆霍尔茨，党卫军旗队队长，党卫军及保安警察驻匈牙利总部参谋长。20世纪60年代初，担任西柏林警察局上校衔警官。

艾哈德·奥尔布利希，党卫军旗队队长，党卫军及保安警察驻匈牙利副司令。20世纪60年代初，担任慕尼黑市警察局上校衔警官。

赫尔曼·克鲁梅，党卫军旗队队长，艾希曼在匈牙利实施灭绝犹太人行动的副总指挥。20世纪60年代初，被关押在西德法兰克福监狱。

奥托·亨舍博士，党卫军旗队队长，艾希曼在匈牙利实施灭绝犹太人行动班子的主要成员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被关押在西德法兰克福监狱。

弗兰茨·诺瓦克，党卫军旗队队长，艾希曼在匈牙利实施灭绝犹太人行动班子的主要成员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被关押在奥地利维也纳监狱。

卡尔·威尔克麦斯特博士，1938—1944年3月担任纳粹德国驻匈牙利使团首席参赞。20世纪60年代初，担任西德驻瑞典大使。

库尔特·布伦霍夫，1942—1945年4月担任纳粹德国驻匈牙利使团新闻出版事务专员。20世纪60年代初，担任西德驻澳大利亚悉尼市总领事。

由于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匈牙利政府的行动没有得到响应。

因而，匈牙利当局审判战犯的主要是纳粹德国在本国的法西斯主义

帮凶。

继 1946 年审判并处决了希特勒在匈牙利的头号帮凶沙拉希·费伦茨之后，匈牙利司法机关相继审判和惩处了一大批法西斯组织“箭十字团”的骨干成员。截至 1968 年底，匈牙利共审判了 20 941 名犯有破坏和平与反人道罪的纳粹战犯，其中 380 人被判处死刑，18 331 人被判处各种期限的监禁，2 026 人被强制执行不同期限的劳役。

#### （一）伊姆雷迪·拜尔审判案

“二战”期间，伊姆雷迪任匈牙利政府经济部部长。他完全听命纳粹德国的旨意，把匈牙利国民经济紧紧拴在希特勒的战车上，听任本国人民遭受德国侵略者的剥夺。他还极力促成匈牙利加入法西斯三国轴心协定。

1946 年，他不得不出庭接受匈牙利人民法庭的审判，并且被判处死刑，不久即执行枪决。

#### （二）雅洛什·安多尔审判案

雅洛什·安多尔是霍尔蒂和沙拉希政权的内政部部长，曾积极参与迫害和屠杀犹太居民的活动。“二战”后，被匈牙利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并于 1946 年 1 月在布达佩斯执行绞刑。

#### （三）费伦奇·拉什洛审判案

弗伦奇·拉什洛，匈牙利军队少校。他在“二战”后期担任匈牙利保安队与艾希曼率领的对匈牙利犹太居民进行“最后解决”的党卫军和保安警察之间的联络官。对 40 万名匈牙利犹太人惨遭纳粹杀害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1946 年 1 月，被布达佩斯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执行。

此外：1967 年 8 月 20 日，匈牙利法庭将本国的法西斯组织、前“箭十字团”首脑之一的克略斯尔·维尔诺什及其下属拉约什·内梅特、拉约什·山多尔押上审判席，并宣布将此 3 名战犯判处死刑。1970 年 12 月底，匈牙利一家法庭对纳粹帮凶阿帕柴勒·尤塞夫进行了审判。他被控在“二战”期间在乌克兰的一个纳粹劳动营内杀害了 45 名囚犯；此外，他还杀害过犹太居民。

## 十一、荷兰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 (一) 对阿尔宾·汉斯·劳特的审判

阿尔宾·汉斯·劳特是党卫军将军，党卫军和保安警察驻荷兰最高领导，奥地利人。“二战”结束后，被英美盟军引渡给荷兰。荷兰司法当局认为他应对大批驱逐荷兰犹太人到波兰东部的灭绝营和残酷杀害荷兰抵抗战士承担罪责。1948年4月3日，海牙特别法院判处劳特死刑，并于同年11月执行。

### (二) 对弗兰茨·舒恩嘎特的审判

弗兰茨·舒恩嘎特，党卫军将军，1941—1944年任党卫军和保安警察驻克拉科夫总督区最高首领。此后升任党卫军和保安警察驻荷兰最高代表，直至战争结束。1946年2月11日，在荷兰恩舍德被一个英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不久即执行。

### (三) 赫伯图斯·比克尔审判案

赫伯图斯·比克尔是党卫军校级军官，党卫军驻荷兰某地区司令官，曾下令和指挥部下对抵抗运动人士、犹太人与和平居民进行血腥屠杀。1949年6月29日，被荷兰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不久冷战爆发，该犯侥幸逃脱了死亡。然而，当他88岁高龄时，居住地德国哈根的地方法院以纳粹战犯的罪名再一次对他提出起诉。

此外，“二战”结束后，荷兰审判乙、丙级纳粹战犯204人，其中19人被判处死刑。

## 十二、奥地利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应当指出的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前期，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鼓舞下，在四大盟国的指导和支持下，在本国大批进步人士的努力下，奥地利审判纳粹战犯还算是取得了一定成绩。

1945年夏，苏联首先在苏占区的维也纳设立了人民法庭。还在纽伦堡国际法庭开庭之前3个月，该人民法庭就于8月14—17日开庭审



理恩格劳强制劳动营案件。该营是纳粹德国设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一个准集中营，该营关押着2 000多名匈牙利犹太人。其中，460人死于超负荷劳动、饥饿和残杀，102人死于1945年3月撤离时的死亡行军。法庭最后宣判：对鲁道夫·克隆贝格、阿洛伊斯·弗兰克、威廉·曼托费尔等对此负有直接罪责的党卫军看守被判处死刑，党卫军看守康拉德·帕利诺夫斯基被判处8年监禁。

继苏联之后，英国、美国、法国分别在格拉茨、林茨和因斯布鲁克建立了人民法庭。在战后各个盟国政府的主持下，在奥地利政府出台的《惩办战争罪行法》的作用下，人民法庭对137 000名涉嫌战争罪行者启动了法律程序。到1948年初，已经对其中108 000人立案调查。他们当中有28 000多人被提交法庭，其中13 607人被判刑：判处死刑者43人（立即执行30起，另有2人在走向绞架前自杀），判处终身监禁者27人，判处10年及以上监禁者350人。

往后，以奥地利政府于1957年对纳粹战犯实行大赦为转折点，该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工作急剧减速，基本上刹了车。人民法庭被撤销，其职能移交各个刑事法院。由于以往对纳粹战犯的审理和判决被重新评估（绝大多数是低估和撤销），1955—1975年仅作出39起裁定，对46个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审理，只对其中18人判刑。而在1945—1955年期间，人民法庭作出了23 000起裁定，审判了数万名犯罪嫌疑人。

1962年，以色列对纳粹战犯艾希曼进行审判后，这种状况略有改变，许多逍遥法外的纳粹战犯又时常被人们提到，联邦内政部也增设了一个以纳粹战犯为工作对象的专门机构。该机构就涉及5 000多名嫌疑人的1 000多起案件进行了侦查。不过，毕竟是时过境迁，总体趋势已无法逆转，这些侦查大多以虎头蛇尾告终。1975年以来，奥地利几乎连一起纳粹战犯审判也不曾进行。

#### （一）齐格弗里德·塞德尔审判案

齐格弗里德·塞德尔是纳粹大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属下的党卫军司令官，曾先后担任特列辛施塔特、施特拉斯霍夫、贝尔森等集中营司令官，而死于这些集中营内的各国犹太人和战俘多达5万多。1946年

10月4日，他被维也纳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并于不久后执行。

#### (二) 莱奥·皮尔茨审判案

莱奥·皮尔茨是党卫军中校、纳粹党克莱姆大区（今奥地利的一部分地区）书记。纳粹政权崩溃前夕，施泰因监狱负责人决定将囚犯（主要是政治犯）撤走，而皮尔茨及其死党却下令将200多名囚犯全部处决。1946年8月6日，维也纳人民法庭判处皮尔茨和14名奥地利地区纳粹党的高级领导人死刑，并且迅即执行枪决。

#### (三) 恩斯特·格拉布纳审判案

恩斯特·格拉布纳是奥地利纳粹分子，党卫军上校。他在纳粹统治时期先在德国刑事警察总部担任秘书，此后又在盖世太保驻奥斯维辛集中营政治部任总负责人，直至1943年。任职期间，以频繁杀害波兰政治犯、苏军战俘和以五花八门的酷刑逼供囚犯而臭名昭著。战争结束后逃回奥地利，被美军执法人员抓获。1946年5月7日，维也纳人民法庭以谋杀罪和非人道罪判处格拉布纳死刑，不久执行。

#### (四) 赫伯特·安多尔费尔审判案

1967年7月8日，维也纳法庭开始审判前盖世太保驻捷克布拉格分局犹太人事务科长赫伯特·安多尔费尔。他被控在南斯拉夫任职期间，对杀害3000余名犹太人负有责任。

#### (五) 格哈尔德·梅耶尔审判案

1969年1月20日，奥地利格拉茨市重罪法院以谋杀罪对前党卫军军官格哈尔德·梅耶尔等人开始进行审判。他的同案犯包括：阿尔弗雷德·鲁塞尔、卡尔·珀普、库尔特·马赫和格奥尔格·文特贝格。其中，对前党卫军上尉库尔特·马赫的审理于1970年5月11日判决，以施暴和枪杀波兰托马硕夫犹太知识分子的罪名，判处5年监禁。他们的犯罪地点主要集中在波兰的基耶尔策、欧帕托夫、布斯科日德罗伊和耶德日尤夫。

#### (六) 维也纳儿科中心审判案

1948年，维也纳人民法庭判处该中心主任、纳粹党员伊令死刑并立即执行，判处副主任、女医生玛丽安娜·裘尔克10年监禁，但两年

即被取保释放。另一名女护士卡岑卡被判处8年监禁。她们被控在战争期间使用注射毒剂、喂给掺毒食物和注入剧毒灌肠液的手法杀害了数百名患有精神病、肺病和其他重症的奥地利儿童和犹太儿童。

#### (七) 弗朗茨·诺瓦克审判案

弗朗茨·诺瓦克是纳粹德国中央帝国保安总局犹太处处长阿道夫·艾克曼于1944年对80万匈牙利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行动的主要助手，证据确凿，不容置辩。然而，在“二战”后的奥地利，由于亲纳粹势力的一再干扰，对他进行的审判一波三折。

由于种种原因，对他的第一次审判始于1964年12月17日，他因上述重罪被判处8年监禁。但是事后，在奥地利最高法院的审判人员中就有人为他鸣不平，认为他仅仅是从犯，判他8年监禁已属轻罪重判。这就为日后右翼势力为他翻案提供了依据。1966年10月6日，维也纳法院陪审团作出决议，认为诺瓦克在各个方面均属无罪。因此，诺瓦克一度获释。后来，对该犯的调查取证重新启动，并大获进展。奥地利最高法院下令对诺瓦克一案进行重审。充足的罪证，使全体法官一致确认诺瓦克有罪，1969年12月18日，法庭判处该犯9年监禁。但是，诺氏的律师再次提出申诉，因而诺氏暂时没有入狱。直到1972年4月，诺瓦克才第三次被法庭传唤，并以执行命令的从犯的身份被终审判处7年监禁。

### 十三、意大利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由于纳粹德国情报机关、梵蒂冈天主教反动势力与伪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互相勾结促成的B-B航线的开通，在意大利犯下严重罪行的纳粹战犯大部分未能缉拿归案。已经审结的案件如下：

#### (一) 赛法罗尼亚半岛惨案审判案

1943年9月，意大利的巴多格里奥政府对纳粹德国宣战后，驻扎在希腊科林斯湾赛法罗尼亚半岛的德军第一山地师向被其视为叛逆的意大利军阿奇师发动了猛烈袭击。炸弹和炮弹顿时交织成一片火海。侥幸逃到爱奥尼亚海上几艘船上的意大利军官兵，也被德军的炮火击沉，纷

纷葬身海底。总计 390 名意大利军官和 9 646 名士兵惨遭杀害，幸存的 3 000 多名官兵则被德军押送到本国服苦役。这一罪行被希腊和意大利视为“二战”中本国最为惨痛的一幕。

这一罪行的首犯、少校哈拉尔德·希什费尔德因屠杀有功，破格晋升为准将。后来在 1945 年 1 月发生的华沙战役中毙命。该师师长胡伯特·兰茨准将在美军组织的第二次纽伦堡审判中被判 12 年监禁，但在 1951 年即获释放。在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参与此案的 3000 多名德军士兵和 189 名军官被陆续押送意大利的巴里军事法庭受审或作证。2002 年，德国司法当局对此案再次开庭审理。该师仍然在世的 300 多名官兵中的 10 人被传唤到庭。其中最老的一人已经 93 岁，最年轻的也高达 81 岁了。

### （二）埃利希·莱亚科维奇审判案

1963 年春，意大利司法部门逮捕了在米兰经商的钢材贸易巨头埃里克·莱亚。经审查，发现他就是党卫军上尉埃利希·莱亚科维奇。“二战”期间，他是党卫军和保安警察驻荷兰总部的重要成员。他曾参与将 11 万多名荷兰犹太人驱赶到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罪恶行动。1945 年 5 月以后，他逃到意大利。在胡达尔主教协助下，他得以逃到阿根廷。1955 年，他自认为风头已过，便重返意大利，并成为百万富翁。在审理过程中，莱亚科维奇越狱逃走（后来向奥地利司法部门自首，被判处两年半监禁）。然而，通过该案的调查和审判，意大利司法部门彻底搞清了纳粹战犯通过 B-B 出逃拉美以及党卫军金库的重要脉络和情节，亦属于大有收获。

### （三）党卫军上尉埃利希·普里布克审判案

党卫军上尉埃利希·普里布克是 1945 年 3 月发生在罗马郊区的阿尔戴阿蒂纳山洞惨案的元凶之一、杀人现场的指挥、监督者。1996 年，被意大利当局引渡归案。次年，因意大利早已废止死刑，法院依法判处他 20 年监禁。同案犯、其上司、党卫军和保安警察驻罗马总指挥，被判处 10 年监禁。

#### 十四、挪威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从战争结束到1948年10月，挪威司法部门共审理了89 406宗涉嫌纳粹战争罪行或叛国罪行的案件，其中48 212宗认定有罪，12 000多个被告被判处年限不同的监禁，38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审判德国人侵者80人，其中16人被判处死刑。

#### 十五、希腊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希腊对德国占领时期的傀儡首相、助纣为虐的卖国贼、不战即降的前皇家陆军兵团司令官左罗科格鲁（将军），其继任罗果泰托珀罗斯（其妻是德国人）和约翰·拉利斯进行了审判。

#### 十六、其他国家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二战”结束后，在三大盟国军事执法人员的支持和配合下，其他被占领的国家均开展了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丹麦审判80人，其中4人被判处死刑；比利时审判75人，其中10人被判处死刑；卢森堡审判68人，其中15人被判处死刑。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也对纳粹战犯及其本国帮凶进行了审判。

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真正被各国立案审判并判决的纳粹战犯不足5万人，其中被处死刑和死于狱中的合计不过数千人，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重罪轻判或提前释放，有些嫌疑人根本未予立案，据国际追捕纳粹战犯组织的统计，受到审判和惩处的纳粹战犯不足战犯总数的2/3；而且，即便是受到审判的纳粹战犯，只要未被立即处决，他们的命运往往大有改观。

#### 十七、被害国军民对纳粹战犯的自发复仇行动

死于被害国军民自发复仇行动的纳粹战犯为数不多。战争末期和战后初期，大约有3 500—5 500名纳粹战犯死于战火或被盟军官兵、战争受害者杀死，其中绝大多数是丙级战犯，只有极少数乙级战犯。

出于义愤，英、美、苏军官兵均曾自发地处决过纳粹战犯。突出的一例是：1945年4月29日，美军第42、第45步兵师解放了德国西南部小城达豪及其附近的达豪集中营。看到集中营内被杀害的犹太人和战俘的尸体堆积如山，幸存者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他们惊呆了，义愤填膺，怒火万丈。第42师的一支小分队自发地处决了122名由他们看押的纳粹战犯；第45师的一些官兵也把他们看押的4名集中营看守交给集中营的囚犯们，听任他们处死这4个看守。英军某部所属的犹太旅官兵，由于其中不少人的亲友惨遭纳粹杀害，更是咬牙切齿，要手刃纳粹战犯，为亲人报仇雪恨。以少校巴姆·拉斯科夫·卡米（20世纪60年代后期曾任以色列军队总司令）为首的一支小分队，在先后驻扎的意大利北部、奥地利西部和德国南部，查获和处决了200多名党卫军军官和集中营看守。以阿巴·科夫纳率领的一支50余人的犹太人复仇组织“DIN”也通过明察暗访，揭露出十余名纳粹战犯的真实面目，并将他们审判后私刑处死。其中罪恶昭彰的至少有两人，其一是德军驻波兰切斯托齐瓦军工厂的领班尤塞夫·贝尔基。他强令大批在此处从事奴隶劳动的犹太妇女、儿童不戴面具和手套用双手接触强酸类物体。待到他们的身体遭到腐蚀而致残时，他就把他们统统杀死。其二是克罗地亚乌斯塔什军官阿洛伊斯·高恩达。他是一个狂热的反犹太分子，经常抓捕大批犹太人，将他们驱赶到纳粹集中营。他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从犹太妇女手中夺过她们的婴儿，不容分说对准婴儿的头就是一枪，或者倒提起婴儿的双腿，把他们的头使劲往岩石上摔，直到脑浆迸裂。还有一名独往独来的犹太人复仇者，他的全家都被纳粹杀光。他借助各种各样的身份出现，想方设法套出纳粹战犯的真言，再把他们一一送回老家。

不过，这种自发的惩罚纳粹分子的风潮为期并不长，而且基本上是很少几支小部队甚至个别人的孤立行为，很快就得到纠正。同是解放达豪集中营的美军，另一支部队就曾多方阻止囚犯们杀死党卫军看守的过火行动，使20多名党卫军女看守保全了性命。

“二战”晚期，由波波维奇和兰科维奇指挥的南斯拉夫人民军某部也曾未经审判处决过至少上百名被俘的乙、丙级纳粹战犯，其他部队在

克罗地亚的一个喀斯特山洞内处决过为数更多的伪克罗地亚独立国战犯。

在被侵占国家居民的自发惩罚行动中丧命的纳粹战犯估计有2 000—3 00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名不见经传的丙级战犯，其间又以直接杀害和虐待囚犯的集中营看守、特别行动队队员为最多。

此外，还应扣除掉在战争期间即被抵抗运动人士处决的战犯。当然，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被占领国家的游击队和抵抗运动处决的纳粹战犯十分有限，总计只有战犯总数的1%左右。这其中的“巨无霸”，当属纳粹德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兼纳粹德国驻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总督莱因哈特·特里斯特兰·欧根·海德里希。

莱因哈特·特里斯特兰·欧根·海德里希（1904—1942年），首要纳粹战犯之一，被称为“欧洲刽子手”，曾任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兼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

海德里希于1904年3月7日生于萨克森州的哈雷，父亲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祖母汉娜是犹太人，妻子莉娜·奥斯丁也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海德里希早年兴趣广泛，他学过音乐，代表德国参加过国际击剑比赛，还是一个不错的业余飞行员。20岁时他加入海军，成为德国海军情报部的官员，1926年晋升为海军上尉。1928年，在聆听了一次希特勒的演讲后，海德里希对他心悦诚服，认为他“将会拯救德国”。不久，他参加了党卫军。1931年他受到希姆莱的接见，并从此成为党卫军的情报官员，并做出相当出色的成绩。1932年，海德里希已成为党卫军保安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在1933年开始的纳粹协调运动中，他作为希姆莱的高级助手，把全国各邦的警察部门组织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海德里希的作为赢得了希特勒的重视和赏识，他不仅极力压下了有关海德里希的祖母汉娜是犹太人的众多指控，而且当面告诉海德里希，认为他具有未来帝国元首的所有品质。经元首大力提携，1934年海德里希成为柏林市盖世太保的首脑。由于他及时向希姆莱和希特勒禀报了有关帝国冲锋队领袖罗姆对元首不满，企图进行第二次革命的预谋，希特勒抢先下手，在全国范围内清洗了罗姆及其冲锋队的势力。这使得希

特勒对海德里希的信任和器重更加深化。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海德里希指挥全国的纳粹暴徒，有计划地捣毁了100多所犹太教堂，捣毁和洗劫了数千家犹太人经营的商店。1939年8月31日，海德里希又策动了“波兰军人袭击德国边境地区的格雷维茨广播电台的事件”，为希特勒发动对波兰的入侵提供了难得的口实。海德里希不仅是希特勒诸多暴行的策划者和执行者，而且在“二战”之初，他还是第三帝国负责情报战和间谍战的主要负责人。带有1/4犹太人血统的海德里希，为了保住自己在纳粹党内的地位并谋求更高的权位与更大的发展，便只能以一个不遗余力的极端反犹太主义者的面孔出现在上司、同僚和部下眼前，显得比任何人都更加不能容忍“卑劣到极点”的犹太人。在1941年5月召开的普雷希会议上，海德里希组建了四支专事屠杀苏联犹太人的特别行动队。从1941年6月开始，这四支队伍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杀害了近百万名苏联犹太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1942年1月20日，海德里希受戈林委托，在柏林近郊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全面部署了对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实行“最后解决”的各项事宜，从此欧洲各国犹太人被党卫军、盖世太保和保安警察置于血海之中，足足有将近600万犹太人惨遭杀戮。1941年9月，希特勒再次召见海德里希，称他为帝国保卫者，任命他为第三帝国驻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并授权他彻底摧毁捷克国家，同化捷克民族。海德里希上任后，立即开始建立恐怖统治，对抵抗运动人士进行了三次大屠杀，从此获得“捷克刽子手”和“布拉格屠夫”的恶名。1942年5月27日，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郊外出行时，被捷克爱国志士扬·库布里斯和约瑟夫·盖布茨克行刺重伤，6月5日因伤重而毙命。

其他被反法西斯斗士消灭的主要纳粹战犯还包括：

1. 纳粹德国先后驻塞尔维亚、莫希列夫和华沙的党卫军司令官兼保安警察首领弗里茨·库切拉。他对待波兰人民十分凶残，上任5个月即下令处死了4300个波兰抵抗战士及无辜平民。1944年1月31日，在华沙被抵抗运动战士处决。20世纪60年代曾在我国放映的波兰影片《暴行的答复》，就是该事件的真实写照。



2. 纳粹德国驻卢西尼亚总督威廉·库伯，1943年9月22日在白俄罗斯被抵抗战士击毙。
3. 纳粹德国加里西亚省省长维希特（博士）。
4. 纳粹德国加里西亚省副省长鲍埃尔，1944年被苏军侦察员库兹涅佐夫击毙。
5. 纳粹德国加里西亚省秘书长施乃德尔，下场同鲍埃尔。
6. 纳粹德国乌克兰省第二把手、副省长保罗·达格尔。
7. 纳粹德国乌克兰省副省长赫尔曼·克努特。
8. 纳粹德国乌克兰该省首席法官阿尔弗雷德·冯克。
9. 党卫军将军、乌克兰讨伐队总队长于尔根。
10. 党卫军少将、特别行动队阿支队队长施塔勒克。
11. 党卫军上尉、奥斯维辛集中营比克瑙分营焚尸区第四焚尸场负责人舒伯特。

## 第七章 纳粹战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奥地利战犯

并入希特勒德国之后，奥地利军队中90%以上的军官自愿宣誓加入纳粹德军，甘当希特勒的炮灰；共有150万奥地利官兵（占总人口的1/4）改编为35个德军师，作为侵略军的成员，参加了一系列侵略其他欧洲国家的罪恶行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背上了战争罪责。仅在入侵苏联的战争中，基本上由奥地利官兵组成的师团即达17个，超过了德国对苏作战投入总兵力的10%。

“二战”期间，当纳粹德国对欧洲的600多万犹太居民狂舞屠刀时，各级魔头和屠夫中经常出现奥地利人的身影，而且其积极参与和凶残毒辣的程度，并不比他们的德国同伙逊色：首先，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被处以极刑的11名首要战犯中，至少有两名奥地利人。他们是专事屠杀犹太居民和各国抵抗战士的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卡登博伦纳与帝国驻荷兰总督赛斯·因夸特。二人都是希特勒制订和发动旨在灭绝犹太人的“最后解决”行动计划的重要参与者，应对欧洲数千万和平居民的惨死承担罪责。在仅次于首要战犯的乙级战犯中，奥地利纳粹分子也不乏其人。例如，在被盟国判处死刑并执行绞决的极少数纳粹高级将领中，就包括奥地利人亚历山大·略尔。他本是奥地利空军军官，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他自愿加入德国空军服役。由于他效忠希特勒，积极推行纳粹主义，被一再提拔，直至晋升为空军上将。“二战”期间，他奉命指挥德国空军第四航空队参加侵苏战争，对基辅等地实施狂轰滥炸；1942年夏又去支援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德军，虽竭尽全力却未能奏效。以后，又被调至巴尔干战场，疯狂镇压南斯拉夫和希腊

的人民军和游击队，血腥屠杀抵抗战士。战后被南斯拉夫政府引渡到本国，作为战犯处决。再有，战争后期盖世太保驻荷兰的最高首领汉斯·罗德，正是在他的直接命令下，《安妮日记》的作者、一位年仅14岁的犹太天才少女安妮·弗兰克及其一家被抓进集中营，并因非人待遇被折磨致死，只有其父一人死里逃生。其次，在组织和领导令人发指的纳粹灭绝营的战犯中，奥地利人也曾“大显身手”：波兰总督区内三大灭绝营——特列博林卡、锡比堡和贝乌泽次的总指挥，就是奥地利人格罗波赤尼克，经他一手策划和亲自指挥，至少有125万名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犹太居民惨遭杀害。上述特列博林卡灭绝营，是纳粹建立的十几个灭绝营中最大的一个，在两年左右时间内，竟有70万名犹太人被赶入毒气室杀死，仅有9人因种种意外幸免于难。其司令官是奥地利纳粹分子弗兰茨·史坦格尔。还有一个嗜杀成癖的奥地利纳粹头目——伊姆加德·埃贝尔。他学的专业是医学，职业是医生，但实际干的却是杀人的勾当。他担任特列博林卡灭绝营司令官期间（系史坦格尔的前任），仅在1942年8月，就下令屠杀了21.5万名囚犯。以后担任贝恩堡灭绝营长官时，又指令纳粹医生和护士用毒气和注射毒剂的手段，杀死了大约5万名重病人。在犹太人“最后解决”的罪恶行动中，第一线总负责人是艾希曼，而他的第一助手阿洛伊斯·布鲁纳就是奥地利人。从1938年到1944年年底，他追随艾希曼或亲自到被占领各国驱逐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经他本人驱赶的犹太人，至少达到128500人。其他货真价实的纳粹战犯还包括：

奥托·施科尔兹，内党卫军上校，中央保安总局高级官员。他在纳粹德国被视为传奇英雄。有几件事突出地反映出他的过人才干；对盟国而言，当然也就是他的严重罪行。其一，他曾受希特勒本人的重托，率领一支由18人组成的精悍小分队，乘坐直升飞机，于1943年9月12日中午避开意大利军队的多重防线，制伏了看守墨氏的250名意大利士兵，从设在亚平宁山主峰萨索峰上悬崖峭壁之间的关押室内救走了纳粹德国的头号盟友墨索里尼。其二，1944年10月，当希特勒秘密获悉他的匈牙利伙伴霍尔蒂准备背叛轴心国，与苏联签订停战协定时，他再一

次召见了他的奥地利老乡斯科尔兹内。后者果然又一回不辱使命，他暗中潜入布达佩斯，在几乎一枪未发的情况下，生擒了霍尔蒂及其子米克洛什还有他们在军队中的台柱子——第一军团司令鲍伊考，并把他们押送回德国，从而使匈牙利在纳粹德国的战车上继续效劳了4个月。其三，在1944年12月的阿登战役中，他带领一支近千人精通英语的别动队，身着美国军装，冒充美军在各个交通要道指挥交通，并散布谣言、制造事故，造成美军大量兵员和物资走入歧途，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德军在战役初期的顺利推进。战后，美军执法部门将他抓获，出于对特工才干的爱惜和争取，并未给予他应有的惩罚。出狱后，他进行了整容手术，人们长期未能发现他的踪迹。

爱德华·罗施曼，1908年8月25日生于奥地利的格拉茨城，奥地利人。其父是一名酿酒工人。从格拉茨的中学毕业后，未能通过法律学院的考试，只好在其父的工厂里当一名酿酒工人。1937年他参加了当时处于被取缔状态的奥地利纳粹党和党卫军。一年以后，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罗施曼作为一名老党员受到迅速提升的犒赏。1939年“二战”爆发时，他自愿参加了武装党卫军并被送往德国接受军事训练。1940年纳粹德国侵占法国后，他在武装党卫军驻法国的一支部队中服役。1940年12月，他从法国被调回柏林。1941年1月，罗施曼奉命调至帝国保安总局三局保安勤务处。1941年7月，根据帝国保安总局的派遣，罗施曼抵达里加，在此建立了驻拉托维亚的第一支特别行动队特遣支队；同年8月，他出任里加犹太区司令官，直至1944年10月回柏林党卫军总部工作为止。在此期间，他至少应对杀害8万名来自德国、奥地利等国的犹太人负有直接的责任。故此，他被囚犯们冠以“里加的屠夫”的绰号。从1943年秋天开始，按照帝国保安总局的命令，罗施曼又着手销毁罪证，他强令数千名犹太囚犯日夜加班地把被枪杀的8万具犹太人的尸体挖掘出来，架在木柴上焚烧或者用生石灰铺在尸体上面，把尸体烧成骷髅。1944年春天，当这项工作基本完成后，罗施曼又下令毁灭里加犹太区，居住在里面的3万名犹太人绝大部分被枪毙，只有极少数人被押送到德国西部的那些集中营。1945年春末，罗施曼

化装成一个德国陆军下士，潜回家乡奥地利。战后，东欧好几个国家将他列入战犯名单。

值得一提的是，在纳粹政权执行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指挥所——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犹太人事务处的几十名大小官员中，70%以上是奥地利人。

在层次较低的战犯中，奥地利人也为数不少，甚至还有异常残忍的女性。在第三帝国最大的屠场奥斯维辛集中营内，其女囚营的看守长是奥地利妇女玛利亚·门德尔，她曾在一日内亲自挑选出540名被苦役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女囚，赶到毒气室中杀害；还曾把一个年仅三四岁的犹太男孩亲手扔进毒气室。另一个疯狂的奥地利女杀手名叫赫尔米娜·布隆施特奈尔瑞安。她在第三帝国第二大集中营——玛伊达奈克集中营任女囚营副看守长期间，先后亲手挑选出1700名女囚用毒气杀害，并参与策划和指挥了1943年11月3日屠杀18000多名犹太人的惨案。甚至在直接对和平居民进行射杀的特别行动队内部为数只有几十人的女队员中，也有奥地利女性在其中。

早在战后初期，一位德国哲学家就指出，德国公众对于纳粹的战争罪行也应承担责任，因为他们对纳粹的所作所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一论断同样并且更加适用于奥地利公众。在希特勒政权统治奥地利的七年内，纳粹党徒的数量从80000人左右激增到688000人以上，占到总人口的11%以上。这一比重居然与德国纳粹党徒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持平；须知，纳粹党在德国存在了25年以上，而纳粹党在奥地利存在的时间却只有不到10年。究其原因，在于希特勒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对奥地利绝大多数居民发生了作用。一方面，固然是法西斯暴政的高压手段；另一方面，纳粹德国也给予奥地利人以等同于德国人的公民权，准许奥地利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共同参与对欧洲的掠夺，也允许奥地利官兵在被占领国家为非作歹，大肆抢夺。再者，希特勒政权以从被占领国掠夺来的巨额资产作为资本再投资，大肆扩军备战，确实在战争爆发后的若干年内扩大了就业岗位，降低了失业率。这样，从表面上看，从眼前看，奥地利人似乎得到了实惠，满足了虚荣心。因而，纳粹党在

同共产党争夺群众的宣传战中一时占了上风，大多数公众对纳粹党采取了默许、观望乃至支持的态度。不仅战争期间是这样，战后也是如此。例如，许多居民对被镇压的纳粹战犯持同情态度。女战犯玛利亚·门德尔因罪恶累累，理所当然地于1947年12月被波兰政府在克拉科夫审判中处以绞刑。但她的一些同胞，不知是出于无知或者偏见，却叹息她是一个善良的女性，甚至说她对集中营里的犹太儿童也很疼爱。另一个女战犯赫尔米娜·布隆施特奈尔瑞安，战后潜逃回故乡维也纳。尽管不少邻居对她的罪恶均有不同程度的知晓，却没有一个人到盟军占领当局去举报她，使她逃脱了被处决的命运。还有一个披着儿科医生外衣的战犯玛利安娜·图尔克，她亲手用注射毒针的手法，残酷杀害了数十名精神病患者，实属罪大恶极；然而奥地利法院只判处她10年监禁，并且服刑仅两年即提前释放。在臭名昭著的T-4护士中，也不乏奥地利女性。图尔克的同伙和下属安娜·卡岑卡就是一例。她接受伊林院长、海因茨和图尔克两名医生的指令以及自行做主而通过注射毒药杀死的重病儿童达30人。正因为如此，明显偏袒纳粹战犯的当事法庭，也不得不判处她8年监禁。前任奥地利总统瓦尔德海姆，明明在“二战”期间作为纳粹德军的情报军官参加了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战争，理应深刻悔悟。但大批国人却以争国权，不受外侮为名，对其百般庇护。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有一些有识之士断然站出来，呼吁奥地利应对战争罪行负责，应向欧洲被占领国和犹太人认罪并予以赔偿。

更为根本的因素还在于，奥地利没有经历广泛、深入的“非纳粹化”运动。德国因为盟国驻军长期驻扎，该项运动进行得比较广泛、深入，被法办的纳粹分子数以万计，被清理的纳粹分子数以百万计，全国民众基本上受到一次否定纳粹暴政、建立民主政治的大是大非的教育，纳粹的影响总体上不复存在。而在奥地利，整肃纳粹的运动不深不透，当德国的非纳粹化已近尾声之时，奥地利才姗姗来迟地于1947年2月出台了非纳粹化法案，而且只法办了13 000多个战犯（其中仅43人被判处极刑），只解除了两万多个纳粹分子的公职。所有在1938年德奥合并后入党者，基本被视为胁从分子不予深究。这样，纳粹势力并未

受到沉重的打击，其影响依然严重存留。加之，美英出于冷战方面的考虑，力求将奥地利纳入马歇尔计划的体系之中，遏制苏联的影响；故此极力拉拢奥地利，避而不谈奥地利在战争中为虎作伥的恶劣表现及战后对纳粹势力的庇护，违反三国 1943 年莫斯科宣言的立场，单方面宣布奥地利为希特勒德国的受害国，不再追究奥地利在“二战”中的罪责。对于唯一抵制德奥合并的共产党，却横加迫害，千方百计削弱其影响。造成社会上善人不香，恶人不臭的畸形状态。凡此种种，使得奥地利民众对纳粹的罪恶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本国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更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观点。而那些“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记事伊始，对纳粹主义和侵略战争的观念，就往往接受颠倒黑白的谬论。因而，海德尔一伙能蒙蔽成千上万的公众，是有其广泛社会基础的。

不过，历史在发展，人民在进步。当时间进入了反侵略、反霸权、反法西斯、反种族歧视已成为世界政坛与舆论导向主流的 21 世纪，当全球各地竞相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海德尔之流再想愚弄、蒙蔽奥地利人民是越来越困难了。加上欧盟从各个方面予以的坚决抵制，海德尔及其自由党的如意算盘更难实现。试看，20 世纪 90 年代初奥地利已有一些有识之士断然站出来，明确宣称奥地利应对战争罪行负责，应向欧洲被占领国和犹太人认罪并予以赔偿。而自由党上台几天后，在只有 80 多万人口的维也纳，竟有 20 多万人走上街头，举行严正的抗议示威游行。更有说服力的是：2001 年 5 月 5 日，在每年一度的庆祝毛特豪森集中营解放的周年纪念大会上，奥地利总统托马斯·克里斯蒂尔亲自到会致辞，号召奥地利人民同欧洲各国的进步人士一道，为制止新纳粹的种种犯罪活动进行不疲倦的斗争。这些事实表明了奥地利公众同新纳粹分子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

## 第八章

### 灵魂错位，救死扶伤竟成屠杀专业

古往今来，身披白色长衫的医生护士，始终以救死扶伤为天职，成为备受世人尊敬的楷模之一。谁曾想到，20世纪30年代像瘟疫一般席卷德国的纳粹主义，以其有史以来罕见的异端邪说，摄取了数千万德国居民的灵魂，使他们沦为跟在纳粹侵略战车后面狂奔的炮灰。更有相当一部分德国人，积极追随希特勒的大屠杀国策，甘心为虎作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大屠杀的方方面面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可悲的是，其中就包括大批医生护士在内。1933年1月底，在德国全部52000名获准开业的医生中，有2786名是民族社会主义医生联盟的正式成员。以后，同希特勒站在一条战壕中的德国医生日见增多。纳粹统治后期，大约有45%的德国医生参加了纳粹党；10%左右的医生是党卫军的成员；2/3的女护士加入纳粹党或其妇女组织——全德少女同盟。那么，究竟有多少德国医务人员堕落成为战犯呢？大致看来，有1000多名医生（其中350多人曾在集中营或灭绝营参与了“挑选”、死亡注射与活人试验；600多人参与了“种族卫生”与“无痛死亡”）和近2000名护士。从犯罪行为看，他们大都参与了与“种族卫生”有关的各种罪恶活动。种族理论是纳粹主义的理论基础：由于以德意志民族为主体的雅利安民族具有非凡的能力和才华，他们具有领导全世界的神圣职责，是不容置疑的统治民族。而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卑劣、无耻、恶毒、贪婪、淫荡的民族，他们只能给世界带来灾难，是必须立即加以根除的败类。吉卜赛民族对人类的危害只比犹太人稍好一些，可以缓期执行死刑；斯拉夫民族不具备任何创造力，只有在雅利安人管理下，才不会对世界发生负面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只配当奴隶。世界上最危险、最可



怕的事情就是种族间的不负责任的混交，德国妇女只要同犹太男子发生一次性关系，她的后代就会全部退化为杂种。因此，纳粹的理论家告诉德国的医生护士，他们的首要任务还不是为病人解除病痛，而是维护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因此，医务人员中的忠实党员应当不遗余力地从事以下四大任务：一是确保种族卫生，限制和缩小犹太人和其他各种劣等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能力，最终使用医药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二是研究各种科学高效的杀人手段，尽快推进“最后解决”；三是对那些暂时还需要他们的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和苏军战俘、异族劳工，必须对他们实施强制绝育，确保他们不致玷污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四是利用犹太人、茨冈人和斯拉夫人进行新技术、新疗法、新手术、新药物的试验，哪怕这些劣等种族在试验中死去。上述3000多名医生护士，就是以上4类非人道活动的组织者、执行者、参加者。种族卫生科学研究的全国性总负责人是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他对雅利安民族的极端盲目崇拜，促使他于1935年创立了遗传研究基金会，作为全国各个相关研究单位的领导和协调机关。希姆莱自任基金会主席，秘书长则始终由党卫军上校沃尔弗洛姆·希维尔斯担任；最关键部门——科研部，由忠实的纳粹党徒、党卫军准将瓦尔特·乌斯特担任，他也是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慕尼黑大学校长。他们依靠一个由相关学术领域内的一流学者、专家组成的顾问班子提供咨询和参谋，以研究种族卫生为主旨，立时使该基金会在党卫军内部处于中心地位。该基金会也是党卫军内部最机密的机构，进入其本部和下属各个研究所工作的成员均需经过特殊审查，并进行忠诚宣誓。即使到了21世纪之初，该系统究竟从事过多少罪恶勾当，世人也未必全部知晓。

遗传研究基金会成立不久，又建立了“人种研究中心”。它拥有50个分支研究机构，在其学术研究骨干中，大学教授和讲师占了很大比重。该中心的医学部由沙尔勃鲁赫教授领导，它在各大学有214名男性和179名女性研究人员，在各研究所有81名男性和141名女性研究人员。这还不包括党卫军武装部队、三军以及私人工业企业部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战争爆发后，遗传研究基金会进一步扩大了规模，又成为进

行军事科学特别是军事医学科学的研究中心。它与武装党卫军卫生保健学院合伙，成为党卫军内部最恐怖的一个部门，其基本任务就是经常性地使用非自愿的活人（主要是集中营囚犯和战俘）进行罪恶的非人道医学试验，而完全不考虑接受试验者的基本权利。纳粹的研究人员甚至设计出许多“终极试验”，即这些试验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试验对象死亡。纳粹医生与科学家进行的活人试验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服务于种族卫生的医学试验。绝育即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政权即将绝育作为一种国策加以推行，实施于那些被认为患有难以治愈的疾病人群身上。而在战争期间，被纳粹政权认为不允许繁殖的种族——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斯拉夫人，在被其占领的领土上为数众多，使用传统的绝育方法对付他们变得既昂贵又无效率。因此，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下令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以求发现一种快速进行绝育同时又使受害者难以觉察的方法。国际知名的妇产科专家、党卫军少将卡尔·克劳贝格致信希姆莱，他可以通过将一种名叫贝母制剂的化学物质注入子宫的手段达到使大批妇女简便地被进行绝育的目的。由于宫内注射往往是常规妇科检查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使偷换注射液的种类，受害妇女也不易感觉。这样，一名医生带领10名助手，在一日内即可给至少1000名妇女做完绝育手术。元首府办公厅负责人维克托·布拉克则向希姆莱推荐另一名研究绝育新方法的医生——霍斯特·舒曼。他使用X光照射的办法对大批男性进行绝育，后来又把妇女也作为绝育对象。这两名专家均先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对数以千计的男女囚犯进行了反复试验，导致他们丧失生育能力、伤残甚至死亡。门格尔等纳粹医生也使用注射新制剂的办法，对女囚进行绝育试验。除上述两个集中营外，布亨瓦尔特、达豪、毛特豪森、弗洛森堡、纳茨维勒和贝尔森等集中营的纳粹医生和科学家也利用男女囚犯进行各种方法的绝育试验。尽管绝育试验造成男女囚犯大量伤亡，预期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舒曼的方法首先宣告受挫，但没有一个纳粹医生和科学家停止绝育试验，一直干到第三帝国覆灭。限制“非优等种族”的人口增长，是纳粹党征服欧洲庞大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

因而，如果第三帝国继续延续几年，斯拉夫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等都将成为大规模绝育受害者。同时，纳粹医生们进行的绝育试验也是为纳粹德国化工与制药垄断财团服务的：直至“二战”爆发前夕，德国始终未能研制出具有广泛开发前景的避孕药剂，而全靠从英国进口。战争开始后，有眼光的德国垄断资本家发觉，开发研制国产避孕药的天赐良机已经到来。因此，他们不惜花费重金，委托许多纳粹医生和专家学者们积极进行开发。上述克劳贝格医生和门格尔医生都是直接的接受委托者。第二类医学试验的目的在于为纳粹德国的军事作战服务，并且是在武装部队或党卫军医学部门指导下由纳粹空军在达豪集中营进行的高压仓和人体忍受低温极值的试验；纳粹海军在达豪集中营进行活人饮用海水可能性的试验。武装党卫军在布亨瓦尔特和纳茨维勒集中营试验抗伤寒、霍乱、天花、白喉以及黄热病的疫苗，同时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纳茨维勒集中营试验抗传染性黄疸病疫苗。党卫军的医生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利用女囚的身体试验治疗外伤的新手段，他们在试验对象身上故意制造创伤，再使用磺胺类药物进行治疗，从而测试药物的有效性；党卫军医生的试验还包括测试骨骼、肌肉、神经组织的再生能力以及接骨和骨骼移植；他们在萨克森豪森和纳茨维勒集中营测试人体抗御芥子气和碳酰氯气的方法，在布亨瓦尔特试验治疗黄磷烧灼人体和毒气弹损伤的新疗法。他们的试验当然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数以千计的男女囚犯为此惨死。

从此，党卫军的医务人员被称为“民族社会主义的生物学战士”。党卫军的医生大部分在武装党卫军各正规部队供职，只有350名左右被分配到各集中营工作，统归党卫军上校厄诺·罗令调遣使用。上述研究直接置于希姆莱的严密控制之下。在柏林，负责指导全国“科研”工作的是帝国卫生部专员卡尔·勃兰特和党卫军卫生处主任医师卡尔·格布哈特；协助此二人工作的是武装党卫军柏林卫生研究所所长约阿西姆·姆鲁果弗斯基。

英美等盟国专司调查纳粹战犯罪行的机构提供的报告表明，参与纳粹集中营各种犯罪活动的医生共计350人左右，他们进行“挑

选”——把老、弱、病、残、孕等不适合劳动的囚犯挑出来，送往毒气室杀害；他们监督毒气室内的处决情况，发现有幸存者，则提醒有关党卫军把他们杀害；他们使用注射器直接杀害重病人和刚出生的犹太儿童；他们利用男女囚犯的身体，从事各种骇人听闻的残酷试验。在所有的供职于集中营中的党卫军医生中，只有威廉·明希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宁可受到党卫军处分，也断然拒绝参加“挑选”、死亡注射和活人试验。战后，几十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囚犯，听说他被美军占领当局列入战犯名单，急忙联名致信有关方面，坚决把他保释出来。而那另外的 349 人，恐怕都是战犯或犯有罪责的人。除此之外，战犯还应包括那些虽不曾在集中营工作，但积极支持上述医生的各种犯罪活动的医生，例如门格尔的恩师奥特马尔·冯·弗许尔。

由于人们对白色工作服的传统理解，有半数左右的罪行达到战犯标准的纳粹医生逃脱了法网，至少是在 10 年、20 年甚至更长时间后才受到应有的惩罚。下面就是几个比较典型的事例。

### 第一节 门格尔追捕记

在作为战犯的纳粹集中营医生中，尤塞夫·门格尔的知名度大概是最高者之一。他被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男女囚犯们称为“死亡天使”、“死神医生”、“屠夫”、“一个杀人的行家，一个以杀人为乐的恶魔”。“门格尔进行医学试验的诊所，也就是那些被迫接受试验的人们的刑讯所。”

门格尔于 1911 年 3 月 16 日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京茨堡一个富有的企业主家庭。其父卡尔·门格尔自 1930 年即积极投靠希特勒；其母瓦丽·门格尔也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积极支持纳粹发动的侵略战争。门格尔本人才智过人，先后获得哲学和医学两个博士学位。受父母的影响，门格尔自幼就接受了反共产主义和反犹太的思想，从 1931 年开始，他先后参加了“钢盔团”、“冲锋队”等法西斯组织；1937 年自愿加入纳粹党，次年又加入纳粹党的核心组织党卫军。在法兰克福大学

医学院学习期间，他的导师是狂热的纳粹分子、新人种学权威、医学教授奥特马尔·冯·弗许尔。“二战”爆发后，门格尔作为武装党卫军维金师的一名军医，参加了对波兰、法国和苏联的侵略战争。由于在东线负伤，不再适合重返前线，于是1943年5月，他志愿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医生，成为当时该营22名纳粹党卫军医生之一。此时，门格尔的官衔是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从此，门格尔一步步走上了成为战犯的道路。门格尔第一条罪状是“挑选”，即从新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中，挑选出所有不适合劳动的人去毒气室消灭。战后，该营的囚犯和党卫军官兵作证指出，他至少在该营火车站的站台上，进行过74次挑选。此外，他在铁路支线两侧，还多次进行挑选。至少有38万人经他挑选走上了通往死亡之路。曾经被迫给门格尔担任翻译的意大利犹太囚犯阿尔米尼奥·瓦赫斯伯格在法庭上证实：门格尔并非机械地执行上司交给他的挑选任务，而是积极地、创造性地对待这项工作。希姆莱需要充分的奴隶劳动力，因此集中营的长官规定，被允许参加劳动者一般应占到新到囚犯总数的1/5到1/4；可是门格尔时常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只允许1/10到1/5的囚犯去劳动，而把80%—90%的囚犯送去毒死，因为他本人极度仇恨和鄙视犹太人。即使获准入营劳动的男女囚犯，以后也还会遇到一次次的挑选，说不定何时还要被门格尔推进阎王殿。除掉每月一两次的例行内部挑选外，门格尔还往往利用每天的囚犯点名之机，尽可能多地杀害不能劳动的囚犯。他抓住一些年老体弱的囚犯难以适应寒夜里时间漫长的点名的心理，以改换新的更轻松的工作为诱饵，欺骗这些人自动出列，叫他们自投死亡的罗网。1943年10月的一天——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赎罪节，门格尔特意来到关押2000个犹太儿童的地方进行挑选，整整一半的儿童被他挑出来杀害了。对于新近怀孕的女囚，一经被门格尔发现，其命运只能是进毒气室死路一条。1943年夏，门格尔染上了斑疹伤寒，他刚一痊愈，马上以惯用的报复性的狂暴手段来对付传染病源——他把比克瑙分营整整10个囚舍的1500多个女囚，不分清红皂白全部赶进毒气室杀害，而其中大部分人身体健康。对于其大规模挑选杀人罪恶，门格尔竟有一套诡辩理论：“当一个

犹太人孩子出世时，或者当一个妇女来集中营时即已怀孕，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孩子。我不能给孩子自由，因为已经没有任何犹太人可以再自由地生活下去。我不能让孩子留在集中营，因为这里没有能够使孩子们正常成长的便利条件。把孩子送进焚尸炉，而不让母亲在一旁亲眼目睹孩子的死亡，是不人道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母亲和孩子一同送进焚尸炉的原因。”其罪行之二是亲手杀害患病或接受其手术的女囚，多数人是被他注射了致命的毒剂，两个匈牙利犹太少女被他通上高压电流，电击而死，一位吉卜赛少女在手术时昏迷，竟被他切下了脑袋。其罪行之三是给3 000—6 000名犹太女囚强行绝育，使用法本、拜耳刚刚研制出来且未经动物试验的避孕药或毒剂在她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进行注射；大部分人以后又被杀害，侥幸活下来的女囚也大都丧失了生殖能力。门格尔最感兴趣的科研活动是进行孪生子女的研究，其目的是发现一种简捷的途径，使德国妇女普遍生出双胞胎或多胞胎。为此，他对2 200多个孪生子女逐个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除掉抽血和各项常规化验外，还要别出心裁地抽取骨髓和脊髓，切割他们的性器官，刺穿他们的眼睛。经过上述极为残酷的试验，90%以上的孪生子女均因不堪折磨而死去，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苏军解放时，只有180多个孪生子女还活着。而据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现居美国纽约的前罗马尼亚籍犹太人艾娃·莫泽什证实，自从她和孪生妹妹米丽雅姆被纳粹保安警察抓走、送进奥斯维辛比克瑙分营内门格尔的试验室以来，总共有1 500对孪生子女被送到这里。不仅如此，他还不放过孪生子女的母亲，经过百般测试后，还要对她们进行活体解剖，仔细研究其子宫的结构与特征。曾经长期负责处理门格尔及其同伙进行试验后死去的囚犯尸体的前特别行动队员菲利普·米勒在战后作证说：“许多尸体惨不忍睹。这些尸体一般都被肢解，或经过解剖。许多是青年男女的尸体，身上留下各种各样的灼伤，睾丸上或躯体的较下各部位有溃烂处，或者腹部和大腿上有脓肿。另外一些尸体则呈红中透青色；或者面部发青，牙关紧咬。”此外，门格尔堪称一条失去自制能力的色狼。他不仅千方百计地诱奸集中营中的党卫军女护士、女看守，就连相貌出众的女囚，包括犹太和吉卜

赛女囚也从不放过。他口口声声地污蔑犹太女囚是“烂婊子”，可是一旦发现有姿色的犹太女囚，他就会不顾纳粹的王法，把种族卫生抛到九霄云外，迫不及待地奸污她们，甚至把她们发展为长期供养的情妇。为此，他又故意践踏纳粹灭绝犹太人的宏旨，私自保全她们的生命，把她们弄到自己的试验室里当助手或杂役，为的是随时可以发泄兽欲。突出的一例是，他长期的管家兼情妇维尔玛，就是一个美貌出众的波兰犹太女囚。被门格尔糟蹋的犹太妇女至少有近百名。就在苏军的坦克冲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的前10天，自知罪大恶极、天理难容的门格尔从集中营里失踪了，他出逃时没有忘记带走同自己的感情已达到如胶似漆的波兰犹太情妇维尔玛。两人穿着十分破旧的衣服，见到村落就去乞讨，装扮成一对刚刚从纳粹党卫军的虎口之中侥幸逃生的年轻犹太夫妻。门格尔听从了维尔玛的意见，他们没有直接往西逃回德国，而是先往东，再往南，接着再往西北，通过波兰、捷克、奥地利，然后才潜回巴伐利亚的老家京茨堡。据说，门格尔在逃跑途中，曾被美军的一支小部队抓获，而且人们发现“他就是那个给3000名妇女做了绝育手术的王八蛋门格尔”，并且威胁说要绞死他。据2001年4月份美国解密的“二战”机密档案，门格尔经过同美军情报人员搞了某种不可告人的交易，他最终安然无恙地出现在老家的故居内，安安稳稳地度过了一年时光。直至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的后期，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后两任司令官霍斯、利勃亨舍尔以及政治部长官格拉布纳等主要罪犯分别供出门格尔的大量具体罪恶后，对他的通缉令出现在包括巴伐利亚许多城市在内的德国全国各地，这名医生才感到大事不妙，决定离开德国，也离开欧洲。在热心肠的“奥德萨”弟兄们的大力帮助下，门格尔沿着早已开拓好的B-B交通线道路，登上阿尔卑斯山，潜入奥地利，又进入意大利。到了巴里港，他提着两个装满从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金银财宝的皮箱，登上一艘直抵阿根廷的客轮，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钻进了希特勒的崇拜者胡安·庇隆的保护伞之下。一经站稳脚跟，门格尔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维利·奥利兹大街970号开办了一家流产诊所。他在集中营曾给数百个犹太、吉卜赛妇女做过各种各样的流产、绝育手术，现在干这一行

真是轻车熟路，收入自然也相当可观。不过，有关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种种传说，却使这名医生坐立不安。稍有风吹草动，他马上停止营业，溜之大吉。所以，他又干过整容医生、兽医、客栈老板等行当。1959年，西德政府向阿根廷政府提出了引渡门格器的要求。虽然阿根廷政府不予理睬，门格器总觉得是块心病。1960年，又发生了他的老友阿道夫·艾希曼被摩萨德抓捕并引渡回国的严重事件。于是，门格器当机立断——移居巴拉圭。在这个国度，门格器摇身一变，又成了军事独裁者阿尔弗雷德·施特雷斯纳将军的座上客。据“大赦国际”的工作人员发现，门格器曾为他潜身的巴拉圭军事独裁政权出谋划策，为他们灭绝印第安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方案。真是冤家路窄，门格器在巴拉圭竟遇到了被他做过绝育手术而大难不死的比克瑙女囚诺拉·莫多克。那是1961年夏天，在一家夜总会里，门格器发现一个年轻漂亮的黑发少妇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以为人家是迷上了自己的翩翩风度，便主动上前邀她跳舞。跳着跳着，门格器觉得似乎这个女人有些面熟。女郎忽然热情地发问：“您是医生吧，先生？”门格器做了肯定的回答后，她的问题忽然加大了力度：“您好像对孪生子很有研究？”“您擅长给妇女做绝育手术，对吧？”“您是党卫军上尉，在比克瑙的医院工作过？”门格器猛地发现女郎左臂上的刺字号码，他不禁大吃一惊，“不，不，您认错人了。我是瑞士人，跟纳粹从来没有关系。”说着，连忙走出夜总会。刚一坐上出租车，门格器就发现一辆小汽车紧随其后，你开快车，他也加速。门格器付出三倍的车费，老练的司机才把跟踪的汽车甩掉。门格器不敢回家，找到一家宾馆借宿。“坏了，准是被摩萨德盯上了，我可千万别落得艾希曼的下场”，门格器惊慌得彻夜未眠。他到底回忆起来：在同维尔玛姘居之前三四个月，门格器正发愁夜里没有佳人在侧。就在第二天的挑选中，他发现了美得出奇的小诺拉，她当时只有17岁。门格器毫不犹豫地打发她的双亲进了毒气室，而把诺拉带到了自己的寝室。他以人格保证诺拉的生命安全和面容不会受损，换取了诺拉充任他的临时情妇；但还是给她进行了绝育注射，使她长期遭受烈性药物的折磨。谁想到，当年的弱女子今日竟成了索命的仇



家。次日，门格尔也没敢露面，第三天，他才壮着胆子，悄悄溜出宾馆。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奥德萨的弟兄们。把情况一摆，哥几个笑了起来。他们认为，那女人充其量是个业余侦探，跟摩萨德没有联系。几天后，一个大个子的弟兄前来报讯：“放心吧，医生，我已经把那个犹太小妞收拾掉了。”“事不过三呀”，门格尔还是心有余悸，他打发大个子回他的居所取出那两个价值连城的皮箱，自己又租下一套新宅。“杀了摩萨德的人，他们难道会善罢甘休？”门格尔依旧放心不下，他又向奥德萨的弟兄们提出迁居巴西的要求。这回，他不敢在大中城市里露面了，而是辗转搬到一家亲纳粹的匈牙利人斯坦默夫妇经营的山庄农场里安了家。他屈尊给房主的牲畜当兽医，这对夫妇则免收他的房租，还要一日三餐保证他吃得顺口。生活刚刚安定下来，门格尔寻花问柳的老毛病就又复发了，他不仅时常对女主人动手动脚，还多次诱奸女管家爱尔萨。当女管家要求同他名正言顺地结婚时，门格尔却迟迟不肯答应。他担心结婚登记时出示自己的真实身份证明，会再一次暴露自己。气愤的女管家离他而去，不久忍无可忍的男主人也于1974年对他下达了逐客令。时至20世纪70年代，奥德萨组织已经做鸟兽散，孤立无援的门格尔，又搬进圣保罗郊区米苏里大街一座难见阳光的旧楼里，化名戈雷格里，隐居起来。1979年2月的一天，在家里憋得无法承受的68岁的门格尔，下定决心到海滩上洗洗海澡，彻底放松一下。多少年来，总是在惶恐不安中度过，门格尔一踏入淡蓝色的大海，顿时感到就像幼儿投入久别的母亲的怀抱，他时而蛙泳时而仰泳，一口气游出3000多米，才略感有些疲乏。他回到海岸边的沙滩上，刚想躺下休息一会儿，忽然听到了意地绪语，回头一看，是一个30多岁的犹太妇女和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在嬉笑。他不禁打了一个寒噤，猛地想起，30多年前，他曾不知多少次地把这样的犹太人母女打发进毒气室，现在，该不是她们的灵魂前来索命吧？再向四周环视，几个身高力壮的小伙子正向自己走来。他们仿佛个个鹰钩鼻、扇风耳、黑头发，啊，摩萨德，他们到底还是发现了自己，那母女俩是在给他们发信号。不能再迟疑了，否则就是第二个艾希曼。门格尔拔腿就跑，钥匙串掉在沙滩上。“老先生，你的钥匙”，

一个小伙子拾起钥匙，跑向门格尔。门格尔一看有人追他，跑得更快了。他好容易奔到海边，一个猛子扎下去。任凭岸上的人们怎样叫喊，他头也不回，径直向远处游去。他只顾夺路而逃，竟没有仔细观察前面的水势，一下子游进一个汹涌的大旋涡里头。门格尔改游自由泳，拼命拍打水面；但以一个年近70岁的老人，又已是筋疲力尽，虽然使出浑身解数，依然是越陷越深，最后身葬海底。几天后，这个纳粹战犯以沃尔夫冈·格哈德的名义被葬在离海岸不远的小镇恩布。

外界，世界各国仍在不遗余力地通缉门格尔。以色列、美国、西德、苏联、法国……悬赏金额直线上升，从1万美元暴涨到200万美元；各项悬赏的总额高达340万美元。1985年1月27日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40周年纪念日，一些集中营的幸存者从世界各地来此进行纪念活动，从而把追捕门格尔的工作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自诩为人权卫士的美国抢先动手，在里根总统授意下，司法部部长威廉·弗伦奇·史密斯下令他所管辖的情报机构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不仅包括“二战”后美军是否曾将已经抓获的门格尔释放，还要求情报人员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拉丁美洲搜查这个杀人医生。史密斯部长并指令美国专门负责追捕纳粹战犯的特别调查局局长尼尔·谢尔为总负责人。有鉴于过去各国分散作战，缺乏配合，以致效率不高，几次追捕门格尔失之交臂的教训，有关各国决定加强合作。西德联邦情报局、以色列摩萨德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执法官员就追捕门格尔一事举行了联席会议。同年5月31日，西德刑警局的执法人员根据确凿的举报材料，对长期负责与门格尔秘密联系的门格尔公司前董事汉斯·泽德麦尔在京茨堡的家进行了搜查。从查获到的密码材料中确认门格尔现在的藏身处是在巴西的圣保罗。6月5日，顺藤摸瓜的巴西刑警对门格尔在拉美时的密友奥地利人勃塞特夫妇进行了突击审问；次日，警察又传讯了门格尔的前女房东吉塔·斯坦默。他们供出：1979年2月在圣保罗海滩淹死并埋葬在恩布的沃尔夫冈·格哈德就是尤塞夫·门格尔本人。1985年6月21日，又是一个令世界受纳粹迫害者和进步人士扬眉吐气的日子。这一天，经过国际知名法医学家的认真鉴定，确认这具尸体生前就是臭名昭著的纳粹战

犯、号称“死亡天使”的尤塞夫·门格尔。虽然以色列等国对此尚持保留态度，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多次出现过门格尔已经死亡的消息。但是这次，结论是不容置疑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验室前主任戴维·克朗和美国移民与归化局法庭文件实验室主任吉迪恩·艾珀斯坦（二人均为国际知名的笔迹专家）称：他们“完全相信，毫不怀疑”，从斯坦默夫妇和勃塞特夫妇那里查出的信件均出自门格尔的手笔。另外，法医学专家确定这具尸体的确切身高与门格尔的身高恰好相符；死者死亡时的年龄也与门格尔相一致；法医报告指出：“骸骨的迹象表明，死者上门牙在拔除前中间曾有一条宽缝。”这一标记从门格尔的多种照片上不难发现，他的许多熟人也都指出了这一点。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证据是，用照片所做的一系列头颅、面部重叠的分析，包括嘴、鼻子、下颌、眼睛等在内的24处特征完全相符。最后，由17个法医学、人类学、放射学、齿科学和笔迹分析学专家组成的国际调查组认定：“从科学判断的合理范围看，我们认为，这就是尤塞夫·门格尔的遗骸。”以色列负责追捕纳粹战犯的警官麦那克姆·鲁塞克最初认为这是一个骗局。然而，当他千里迢迢来到正在进行验尸的圣保罗海滩，他便逐渐相信，这具遗骸生前确是门格尔。西蒙·维森塔尔以及另外两个侦缉纳粹分子的著名人士——塞尔日·克拉斯费尔德与比特·克拉斯费尔德夫妇，也赞同国际调查组的结论。

在一片兴高采烈的欢呼声中，也夹杂着一些不协调的舆论误导——一些报刊想当然地称门格尔为最后一个纳粹分子或最后一名纳粹战犯。这只能助长人们天下太平的麻痹思想，客观上为那些尚未被揭露出来的纳粹战犯充当保护伞。

## 第二节 极端残忍的恶魔医生——霍斯特·舒曼

在纳粹医生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大概是号称“死亡天使”的尤塞夫·门格尔。其实，像他这样血债累累的纳粹医生，至少有几十个。以对待囚犯和精神病人凶残毒辣而闻名的霍斯特·舒曼，又是一个突出的

典型。

舒曼于1906年5月1日生于德国西部萨尔河畔哈勒城的医生家庭。其父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受父亲的影响，舒曼早年就参加了右翼的政治组织，1930年又参加了纳粹党（党证号码为190002）。1933年7月18日他当上了内科医生，后来也在故乡担任过市政府公共卫生部门的公务员。“二战”前夕，他应征入伍，在纳粹空军中担任军医。1939年10月初，他被招收进元首府工作。他的长官维克托·布拉克向他介绍了“安乐死”屠杀活动的基本情况，并邀请他加入。正中下怀的舒曼一口答应，并随即于1940年1月担任了纳粹德国第一个处决中心——格拉芬奈克处决中心（位于弗腾堡州）的主管医生，并充当中心主任恩斯特·鲍姆哈德医生的助手。从此，舒曼医生开始了他的杀人生涯。经过精神病学的短期培训，他于1940年9月被调到杀人规模更大的处决中心——佐恩施泰因担任主管医生。此期间，他经常行使杀人的权力——到各个集中营——奥斯维辛、布亨瓦尔特、达豪、弗洛森贝格、格罗斯罗森、毛特豪森、瑙因加默和尼德哈根挑选不适合从事劳动的病弱囚犯，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处决中心，用毒气和针剂加以杀害。1941年7月28日，舒曼第一次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的到来，给575个囚犯带来了死亡。在大规模屠杀精神病人的同时，他对通过X光照射生殖器官的绝育手法兴趣益浓，并有志于发明一种经济而又高速的X光照射绝育方法。经过纳粹高官布拉克向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大力举荐，舒曼如愿以偿，于1942年10月，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医院上任。此后，他便一步步成为专门以摧残青年男女囚犯的生殖器官而臭名昭著的恶魔医生。一时间，他成为奥斯维辛主营10楼——专门对男女囚犯进行绝育试验的诊所的主人，决定着成百上千个囚犯的生死存亡；直到另一个比他更有来头的知名妇科专家卡尔·克劳贝格将他挤出10号楼为止。但是，执著地探索绝育新技术的舒曼，很快又在比克瑙分营女囚营的28号楼和30号楼建立了具有同样设施的诊所。

极为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使他不相信也不允许敌对种族中存在英俊少年和绝色美女，特别是在被纳粹认为属于十恶不赦的犹太人当中。因

而，当他挑选用以作为试验对象的人选时，他尽可能地把所有犹太美男子和美女首先挑出来，这样他们的生命很快即将不复存在，至少美貌将荡然无存。据说希腊与荷兰盛产美少年和美女，他就把选择对象集中在这两个国家的青年男女囚犯身上。的确，这些美貌的犹太青年男女只有10%得以活到战争结束。他们纷纷死于伤痛、并发症、手术失误、体能耗尽和休克。一进入手术室，舒曼立即收敛起温文尔雅的假面貌，顿时变得凶狠、粗暴而野蛮，男女“病人”动作稍微慢了一拍，或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他马上就要高声呵斥，对一丝不挂的男囚拳脚相待，对脱光衣服的少女推推搡搡，强使他们站在特制的X光菱形灯泡前接受超剂量的照射，对男性照射睾丸，女性则照射下腹和盆腔。为测试不同强度的辐射效果，他经常变换照射剂量。经过5—15分钟的“治疗”，这些青年男女的生殖能力即遭破坏，不少人的阴囊或外阴被严重灼伤，变得发黑并很快溃烂。因白细胞大量受损和激素紊乱，接受手术的少女们呕吐不止，腹部皮肤被大面积烧伤，疼痛钻心，在地上打滚。然而，对这些不幸的男女而言，这不过才是第一关。此后，接受手术的男子在一个多月后，女子在3个月之后（此期间，不少少女和少年已经因照射过量而虚脱死亡），还要对他们再进行两次检查性手术，每次切除受害者一侧的睾丸或卵巢，送往柏林进行高倍显微镜下的病理病变研究。被摘除了一侧卵巢的姑娘们，通常在三四周之后，刀口刚刚有所愈合时，又必须接受第三次手术，即切除另一侧卵巢。摘除性腺本是一项高难度的妇科手术，但由于纳粹医生根本不把受害者当人看待，手术做得敷衍了事，往往造成感染或大出血或腹膜受损，因而又造成病人新一轮的死亡。来自希腊萨罗尼卡的17岁犹太少女贝拉，被舒曼做了辐射手术。在一侧卵巢被摘除还不到一个月，又被他强行摘除另一侧卵巢，结果几天后就死去了。舒曼甚至纵容属下的波兰医生德林的毫无责任心和同情心的冒险之举——在100分钟之内给10个犹太少女切除一侧卵巢。手术是完成了，但因时间短促，只好既不消毒，也不注射麻醉剂，刀口也缝合得极不仔细，乃至10名少女在手术后全部因内出血死去。即使通过了两次手术切除，受害者仍然难逃死亡的劫难。男女病人在手术后往

往面容憔悴，疲惫不堪，甚至行走困难。他们已经变得既无医学试验价值又无劳动能力，绝大多数人的归宿只能是被赶进毒气室。有些女囚被送回比克瑙分营后，因身体极度虚弱，行走困难，竟被焚尸场的负责人奥托·莫尔抛入火坑中活活烧死。舒曼究竟用绝育手术害死了多少人，显然已难以估算出准确数字。但根据舒曼医生的惯例——每周工作3天，每天可以给30名囚犯进行照射来估计，可以大致估算出，在他从事此项科研活动的两年半时间内，大致有六七千人被他和他的助手实施了这种极其残忍的手术，其中至少有3000多个男女死亡。仅在1943年11月1日，舒曼及其助手们就给201个经过照射手术的青年男子摘除了睾丸。1943年8月，在比克瑙分营医院的中央病室，舒曼一伙一次也给60多个希腊青年男子做了摘除睾丸的手术。尤为残忍的是，舒曼在给男性囚犯摘除性腺时，经常不预先使用麻醉剂，使他们遭受长时间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其他囚犯证实，受害者的凄惨号叫声传遍了整个营区。实践证明，这种绝育疗法不符合纳粹既要灭绝犹太人又要尽可能保存劳动力的初衷。1944年4月29日，党卫军医务局局长维尔那·布兰肯堡向希姆莱提交专项报告，认为借助X光照射实行大规模绝育的方法是不适宜的。后来，舒曼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绝育新方法未获成功，一是试验对象在手术完成后非死即残，不能继续充当劳动力；二是成本太高，许多集中营拒绝使用、推广。但舒曼仍不死心，1944年6月他调到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继续进行这种害人的勾当，他行医的9号楼立时变成残害数百名女囚的刑场。这一次，他的试验对象中，不仅有犹太姑娘，也包括吉卜赛少女和女孩，其中最小的只有6岁。作为多年医生的舒曼，头脑中却全无保护儿童的观念，他把幼女和成年妇女同样作为试验对象。结果是，接受X光照射试验的15岁以下吉卜赛女孩几乎无一生还；1945年1月的一个下午，舒曼在9号楼给两名15岁的吉卜赛女孩进行下腹部照射，结果她们都在声嘶力竭的哭叫中丧生。两人的腹部均被严重烧伤，情景惨不忍睹，就连党卫军女护士也不愿意多看一眼。而那些年龄大一些的少女即使能够侥幸活命，也永远被剥夺了生育的权利，她们所得到的只有更多的下地狱的机会。1945年4月30

日，当苏军解放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之时，罪恶累累的舒曼医生早已不知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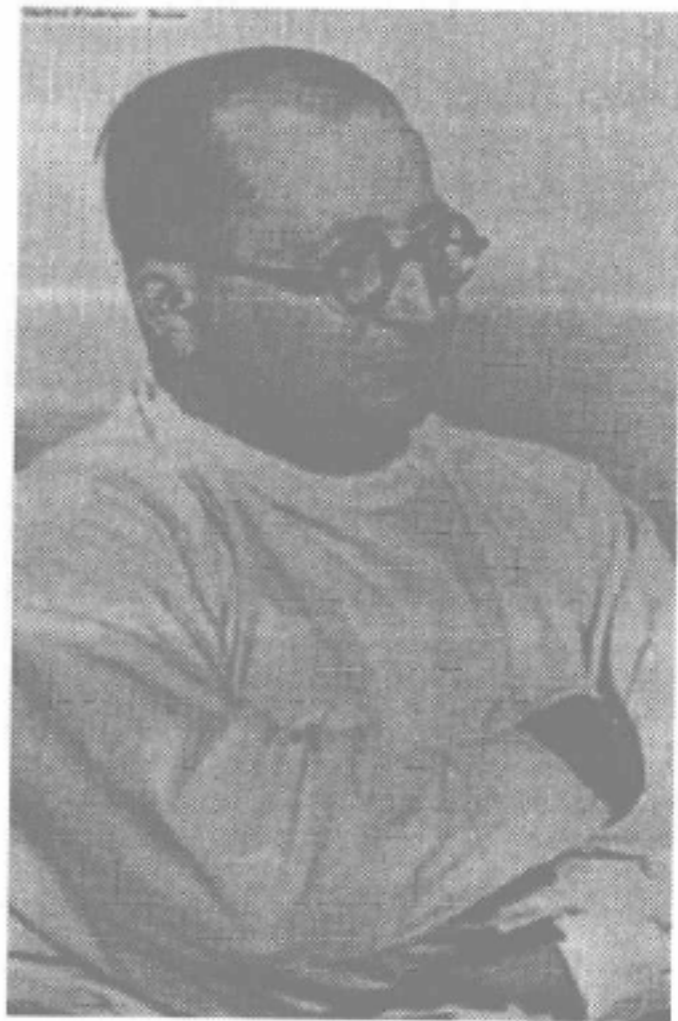
经过几个月提心吊胆的奔波劳累后，舒曼在德国西部小城格拉德拜克露面了。他先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警察，接着又恢复了本行，在一个运动队当医生。这里追捕纳粹战犯的空气很是淡薄，舒曼又是一个尽职和热心肠的医生，因此他很快与当地居民融合在一起。洋洋得意的舒曼，在1949年举行的一次同人聚餐会上暴露了自己的庐山真面貌，但周围人们对他的态度并未发生变化。直到1951年，不断接到举报的盟军和德国司法当局终于找到了这名纳粹战犯的足迹。然而，神通广大的“奥德萨”组织及时向舒曼报了警。在警察敲他家院门的前几个小时，他又一次逃之夭夭。不过，在德国已经没有这个恶名昭著的纳粹医生的藏身之地，他于是仓皇出逃到法国。在电影城戛纳，他巧遇T-4同行卡尔梅尔和他的妻子弗罗丝（夫妻两人也都是纳粹战犯），并得到他们的资助。如此，他得以远走高飞。1955年以后，舒曼医生又出现在苏丹，他成为一艘客轮上的医生。直到1959年，舒曼才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他在苏丹结识了当时的加纳总统恩克鲁马，并被后者聘为自己的随身医生。此期间，尽管欧洲许多国家均对舒曼发出通缉令，但恩克鲁马根本不为所动。舒曼躲在戒备森严的总统府内悠然自得，被奉为上宾，锦衣玉食。较之东躲西藏的另一个纳粹医生门格尔，不知要强多少倍。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2月24日，恩氏大总统在出访越南、中国和苏联的旅途中，被国内一场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赶下台。舒曼顿时失去保护伞。恩克鲁马的继任者接受了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引渡要求，把舒曼和另一个被恩克鲁马长期视为座上宾的纳粹女战犯汉娜·莱奇驱逐出境，舒曼并且被押送回西德。由于一些同伙和同情者的暗中庇护，对舒曼的审判姗姗来迟，直到1970年9月才开庭。此时，能够以亲身受害经历控诉这个恶魔医生的115位证人中，已有54人作古，从而造成舒曼的大量杀人罪行变成难以落实的悬案。次年，法庭宣布暂时中止审判，因为被告患有高血压。满打满算，这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医生只在狱中度过了6年时光，随后于1977年即被宣告获准保外就医，

而再未重返监狱。他一生中的最后5年定居在法兰克福的塞克巴赫区，直到1983年5月5日病死。有的评论家认为，是高超的医术和医学教授的证书保护了舒曼医生，使他免遭一次又一次的审判和惩罚。这当然不代表反法西斯人士和集中营受害者的观点。

### 第三节 专家屠户——卡尔·克劳贝格

一方面，他是国际知名的妇科专家，在国内妇科界则是数一数二的高手，曾给数百名德国妇女带来希望，治愈了她们多年难治的不育症；另一方面，他又是党卫军少将，用医学手段给数以千计的犹太、吉卜赛妇女造成极大的痛苦和死亡，残酷地剥夺了她们的生育能力，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纳粹战犯和刽子手。这种貌似矛盾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在纳粹医学界其实屡见不鲜。这里讲的是卡尔·克劳贝格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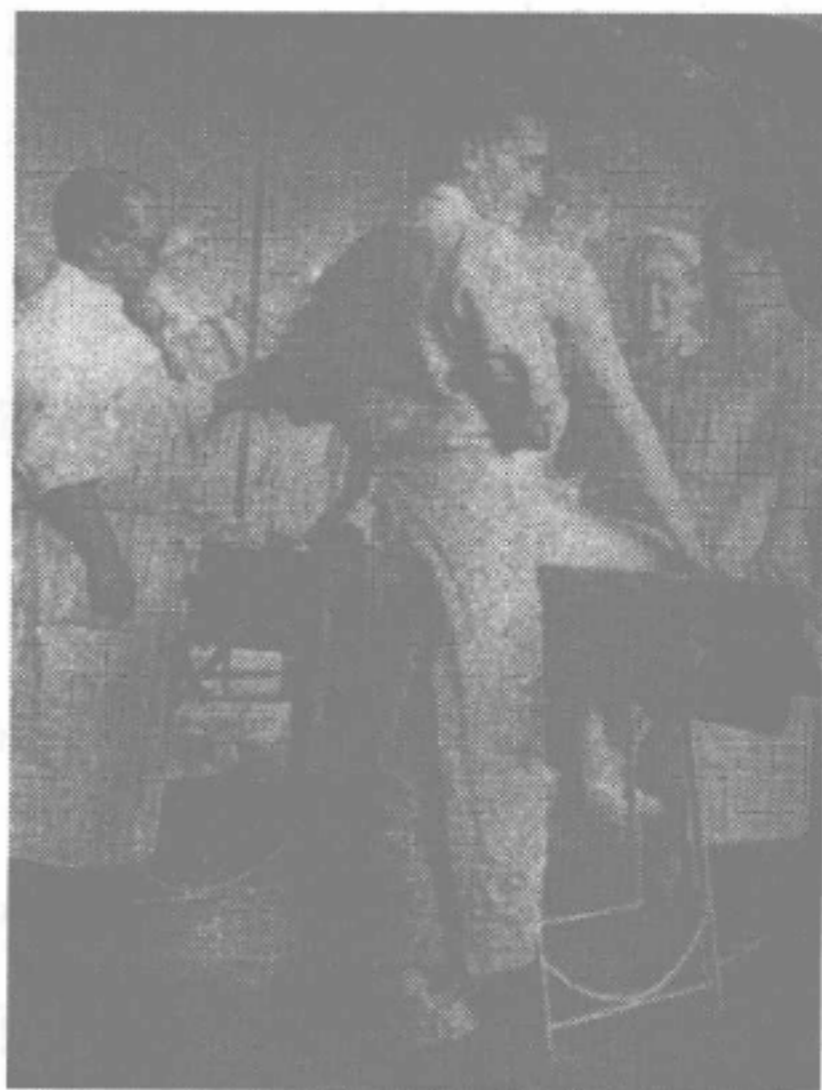
克劳贝格于1898年生于科隆，父亲是一家狩猎用品商店的店主。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他应征入伍，后来做了英军的俘虏。战争结束，他获释回国，考入医科大学妇科专业。通过不懈的努力，他成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妇科专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在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开设了一家妇科诊所。没出几年，他便以善于治愈不育症的高超技术，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确立了自己在德国和欧洲妇科界的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但是，他又从骨子里嫉恨和仇视他的一些犹太同行，他们的医术也相当高超，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赶超自己。他也仇视那些犹太银行家、房地产商人，认为他们夺走了本来属于德国人的财富。进而，他开始仇视所有的犹太人。纳粹的主张与他不谋而合，这促使他很快就加入



党卫军旅队长、专门从事女囚试验性绝育手术的魔鬼——卡尔·克劳贝格



了纳粹党，成为纳粹在德国医学界早期的党员。自1942年秋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之日起，克劳贝格就一步步蜕变成折磨和残害女囚的特大屠户、一个专家型的纳粹刽子手。起初，他被安排在条件较差的比克瑙分营女囚营第30号楼从事绝育科研活动，因为条件最好的主营10号楼已被另一个绝育专家舒曼所占据。但是，无论是在德国医学界还是在纳粹党内，前者的致命度均比后者高得多。因而，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霍斯于1943年3月裁定，两名医生的科研场所应当易位。从此，克劳贝格成为10号楼



一场绝育手术即将开始

楼唯一的主人，而10号楼也被人们称为克劳贝格诊所。经常在此楼行医的纳粹医生包括：克劳贝格的头号助手、法本公司的主任化学家格贝尔，克劳贝格的其他助手、党卫军医生维贝尔、布宁和考夫曼。后来，为加强10号楼的科研力量，党卫军卫生部门又派来3名经验丰富的妇科医生。从他们从事的医学活动来看，个个都够得上纳粹乙级或丙级战犯资格。一些党卫军护士也是克劳贝格医生的帮凶。因经历复杂而难以确定身份的是一个名叫希尔维亚·菲尔德曼的护士。她本是一名被强迫来此工作的女囚，但不少受害的女囚证明，她曾积极主动地协助克劳贝格干了许多罪恶活动。从1942年秋开始，10号楼也就成了众多女囚受苦遭难的活地狱。先是遭受舒曼医生的宰割，以后又受到克劳贝格的摧残。克劳贝格医生的试验对象基本上是女性，只有在十分需要时，才临时拉来几个男囚进行睾丸切除或强迫他们同那些做过绝育手术的妇女性交，以验证绝育手术是否灵验。10号楼是主营内被许多男囚营舍围绕的一座红色三层楼，砖木结构，从外表上看同其他集中营管理人员办公用的楼房没有什么差别。但是，通过以下现象，囚犯们还是发现了它

的神秘性：当局不允许任何囚犯接近 10 号楼，10 号楼的各扇窗户除了被条条木板钉死以外，还要挂上厚厚的窗帘；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无论白天黑夜，这里时常传出妇女们声嘶力竭的尖厉哀叫。此外，医生和专家们到来时，所坐的汽车也要挂上窗帘，不使外人知悉。这里经常住着三四百个女囚，她们都是克劳贝格一人的试验品。克劳贝格医生选择试验对象的标准与舒曼医生不尽相同，他需要的是 20 岁以上、40 岁以下有过生育经历的妇女，而不是妙龄的少女，也不很计较试验对象的相貌如何。不过，她们的结局往往也不比舒曼医生的试验对象更好些。克劳贝格医生究竟是怎样以妇科检查为由来残害众多的集中营女囚的？由于大多数受害者已在战争结束前惨死，人们主要是通过一名主要的纳粹知情者、前任奥斯维辛主营司令官霍斯在纽伦堡法庭上的供词，来了解这一过程的概况的：克劳贝格为他的试验，挑选了一批又一批年龄在 20—30 岁的妇女，她们都已经生育过，并且在集中营还来月经。被选中的妇女按照住院手续转到 10 号楼。根据 1943 年 4 月 30 日至 10 月 31 日之间纳粹医务人员张贴的接受试验者真实名单，10 号楼里通常要保持 200—400 名妇女，她们被登记在“供试验用女囚”的栏目下。由于有法本公司的大量赞助，克劳贝格医生出手大方，一次就向集中营当局买进 150 名到 200 名健康的青年女囚（有时也购买一些中年女囚）。一进入 10 号楼，这一群女囚就会遭受终生难忘的凌辱：衣服不容分说就被值班的党卫军扒个精光，随后党卫军护士剪掉她们的头发、剃光她们的阴毛，还要侮辱性地在她们的外阴部涂满所谓的消毒药膏，然后才准许她们住进病室。在此期间，经常有一些面貌娇好的青年女囚，遭到党卫军官兵和男性纳粹医生的无耻猥亵。就是在医生和护士对女囚进行常规的妇科检查时，一些党卫军色鬼，也趁机去窥视，一得手就对女囚们的裸体动手动脚。其实，这不过是悲惨遭遇的发端，更倒霉的痛苦还在进入克劳贝格的诊室之后。一开始，克劳贝格还会奈着性子，比较和蔼地对充任试验对象的女囚进行询问，收集到详细的情况后，就命令该妇女躺在妇科手术椅上接受“妇科检查”。他使用一根针头很长的注射器往该妇女的输卵管内注射对比物质。这个用电控制的注射器与 X 光仪

器相连通，因而他可以从屏幕上了解输卵管的导通性能。当输卵管被证实完全畅通时，他又命令这位妇女离开手术椅，在房间里跑上一阵。同时，克劳贝格又给下一个妇女进行同样的检查。第一个妇女跑步完毕，就又一次被要求躺在手术椅上，重新用 X 光进行检查，给她往输卵管内注射一种类似甲醛溶液的黏稠液体——贝母制剂。这种液体具有很强的腐蚀性，进入输卵管之后，它就会使管壁遭受严重创伤并粘连起来，不再通畅，从而达到绝育的目的。但是，另外，它也使接受手术者带来极大的疼痛，迫使她们拼命地喊叫哭号，以求稍微缓解一下小腹内部难以忍受的伤痛。这时，克劳贝格就会恶狠狠地威胁她们：谁不听话，就立刻把她们送进比克瑙的毒气室去，迫使她们就范。克劳贝格医生知道，在对妇女进行贝母溶液注射后 6 周之内，输卵管会逐渐自行堵塞，因而，在此期间克劳贝格还要对上述妇女进行多次检查性研究，再次向妇女们的输卵管内注射对比溶液。所有做过这种手术的妇女，都出现了输卵管堵塞，也不再来月经。她们在手术后全部被留在 10 号楼内，以供克劳贝格医生继续观察。由克劳贝格做绝育手术，已属相当的不幸；但谁要是碰上格贝尔做手术，她就会十倍百倍的不幸：这是因为格贝尔根本不是医生，对妇科更是明显的外行。但是克劳贝格信任他，竟毫无根据地授权他给被试验的女囚进行宫内注射。他的第一次注射实践在一名年轻的荷兰犹太女囚身上进行。格贝尔拙劣地给她注射，竟因为紧张刺穿了她的子宫和腹膜，一眨眼的工夫，荷兰姑娘尖叫个不停，疼得在手术椅上翻来滚去，满身都沾上自己的鲜血。根据克劳贝格的研究计划，在未来一年内，这些接受了手术的妇女应当同他选择出来的男子进行性交，以便证实这种绝育方法的有效性。另据美国的学者研究成果，克劳贝格也曾往接受试验女囚的卵巢中注射有害物质，以破坏其排卵功能。最终，她们的卵巢也要被一侧或全部摘除掉，用于观察手术的效果。1943 年，经过几个月的试验，并付出十几名女囚死亡的代价，克劳贝格为已被绝育的妇女恢复生殖能力的试验又告成功。但这对于接受试验的女囚，并不是福音，因为她们接受“治疗”的疗程明显地延长了，接受注射和照射的次数也更加频繁，痛苦和死亡的机会更多了。不

久，他又突发奇想，把一个刚刚被切除掉两侧睾丸的犹太青年，同一名丰满美貌的犹太妇女，一丝不挂地一起关在一间小屋里；并同他的助手考夫曼一起透过观察孔，一连几个小时地观察，以求了解刚刚被绝育的青年男子是否还有性欲，是否在短期内还具备残余的生殖能力。克劳贝格还有一个恶毒的计划，他要使那些不顺从或犯有重罪的犹太和吉卜赛妇女在倍加的痛苦中屈辱地死去，为此，他多次进行向被试验女囚的子宫内或宫颈部位移植癌细胞的试验，企图使她们染上各种妇科癌，在极度痛苦中丧命。根据他的要求，到1944年年底，集中营当局还为克劳贝格的新试验课题研究专门建造了一座新营舍，里面装配了X光机和一系列手术装置、器械等。这些设备专门用于给女囚进行人工受孕的新试验目的。不过，由于苏军向波兰方向的迅速推进，克劳贝格匆忙撤往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这些器械原封未动，没有能充当克劳贝格进一步残害女囚的工具。曾被迫在10号楼内担任医生助手的女囚克莱恩博士在纽伦堡法庭作证时证实了那些接受绝育试验的女囚们的最终命运：那些被医生们认为已丧失掉被试验的条件，不再适合充任试验对象的妇女，比如已经失去生育能力的妇女，很快就会被送到比克瑙分营的女囚营区。由于她们中的大多数已因试验的摧残不再具有劳动能力，所以毒气室便成为她们的最后归宿。她还证实，即使还活着的10号楼女囚，身心也已受到极度的损害：“在10号楼里，不论是党卫军官兵，还是纳粹的医生、护士，对待被试验的女囚们都极为粗野甚至是极端残酷的。我们这些‘人鼠’、‘试验用兔’，都意识到了谁也无法抗拒的被宰割的命运，前途难料。一种永恒的恐惧感，在每个人心中日益加深着。”

克劳贝格从事这种惨无人道的绝育试验，得到了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的指导、赞许和全力支持。纽伦堡审判档案证实：1942年6月7日，希姆莱接见了克劳贝格，两人就绝育问题进行了长谈。他们深入讨论了制定消除“劣等种族”生殖能力方法的各方面细节。希姆莱当面答应克劳贝格，党卫军当局将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他提供任何数量的女囚供他做试验。同年7月6日，希姆莱的秘书兼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

为此致信克劳贝格：“尊敬的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委托我向您转达他的希望，您在和党卫军副总指挥波尔与集中营主任医生商讨问题之后，将奔赴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并在那里从事对犹太妇女的绝育工作。帝国司令官特别提醒您，在开始试验之前能够通知他，为了给数千名妇女做绝育手术您需要多少时间。帝国司令官认为，绝育工作进行得应该使妇女们无所猜疑。您可托词在进行普通的妇科检查时，做必要的注射。对实施手术的结果应认真地加以研究。绝育后经过一段时期，应拍X光片，以便弄清妇女体内发生了何种变化。还需要进行这样的试验：绝育后经过一段时间，您安排做手术的妇女与男人同房。并将结果报我们知悉……”克劳贝格之所以异常卖力地进行绝育手术，是因为他不仅得到纳粹党和帝国的赏识和支持，可以升官晋级，扬名四海；而且还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收入：他也是受法本康采恩等德国化学公司的委托从事绝育试验的，他使用的新制剂正是这些公司的新产品。新药能否推向市场，全靠名医的荐举。因此，每当克劳贝格往一个妇女的输卵管中注射进这种溶液，不管这个妇女是否死去，也不管成功与否，他都将得到30—50马克的酬劳。克劳贝格升官发财的代价是：据有关专家估算，经克劳贝格及其助手们做过这种绝育手术的女囚多达六七千人，她们绝大部分是犹太妇女，其中至少有700名妇女被克劳贝格及其助手们实施的手术直接摧残致死。当年为10号楼进行专项服务的党卫军小队长贝格尔在战后的一次审判中作证说，从1943年开始，他每周都按照克劳贝格医生的指示，把四五具已被解剖的女尸拉出10号楼，送到焚尸场去；另外有四五千人被送往比克瑙分营后，因未能通过医生们的挑选，在八大毒气室中丧命。确有上百名经过克劳贝格式绝育手术的女囚在战争结束后依然活着，但也被伴随终身的病痛不断地折磨着。波兰调查纳粹罪行全国委员会提供的权威性资料指出：由于遭受克劳贝格反复的长针注射，输卵管受到极为严重的创伤，幸存的女囚100%患有难以治愈的输卵管炎，绝大多数幸存的手术受害者普遍患着子宫炎、盆腔炎、卵巢炎和腹膜炎。

战争终止后不久，在盟军调查人员掌握的犯有严重罪行的纳粹医生

名单中名列前茅的克劳贝格，很快落入法网。鉴于他的受害者大部分是东欧国家的犹太妇女或女战俘，苏联政府把握了他的命运。在苏联受审后，他被判处25年徒刑。这在当时是仅次于死刑和终身监禁的第三项重刑。克劳贝格顿时万念俱灰，自感不久将化做西伯利亚的粪土了。接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受害国联合对他进行了严正的审判，幸存的手术试验对象一个接一个上台，以血淋淋的事实，声泪俱下地控诉他的滔天罪行。正当克劳贝格做好上绞架的打算，准备给妻子写遗书时，约瑟夫·斯大林与世长辞，克劳贝格的后半生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斯大林的继承者赫鲁晓夫不打算进一步为难这些在押的纳粹战犯，而是希望用他们作为争取西德政府与苏联改善关系的一个重要筹码。1955年9月，当时的西德政府总理阿登纳访问苏联，两国关系发生突破。由于西德方面一些要员的关注，苏联方面同意将克劳贝格作为战俘而不是继续作为战犯对待。同年10月，克劳贝格就以自由人的身份出现在西德。被突如其来的幸运冲昏头脑的克劳贝格，很快就在西德大放厥词，矢口否认自己有罪；并要求西德卫生部门继续推广他那臭名昭著的克劳贝格式绝育方法。可是，这一次幸运之神摒弃了克劳贝格。不仅欧洲各国，即使西德也有众多的群众，对他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坚决要求把这个罪恶滔天且又死不悔改的纳粹战犯重新收监。政府难敌众怒，于是把他逮捕，关进基尔市的一家监狱。1957年8月7日，这个纳粹医生因心脏病死于狱中。临死前的几十天，他也受到了惩罚性的折磨，由远而近的一阵阵当年受害女囚凄烈的哭号声不绝于耳，使他得不到片刻的宁静，他的病情一再恶化，罪恶终于把他推向地狱。

#### 第四节 大规模挑选和活人试验的集大成者 ——爱德华·维尔策

他的知名度远不如“死亡天使”门格尔那么显赫，甚至也不如绝育专业户克劳贝格那么容易引发人们的憎恨。然而，他对集中营囚犯的

危害程度，却不知比前两个人严重多少倍。他就是爱德华·维尔策。

爱德华·维尔策于1909年生于德国西南部城市维尔茨堡附近的村庄的一个世代以石匠为业的艺人家中，是三个男孩中的长子。他父亲经多年钻研，成为高超的石雕艺术家，遐迩闻名。在父亲的指引下，他和大弟弟赫尔穆特，先后考入大学医学专业，以后均成为造诣高深的妇科专家。

1933年，维尔策读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加了纳粹党和冲锋队；次年，又置身党卫军的行列。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他投身“祖国的种族卫生事业”，到东部地区从事对属于“劣等种族”的居民设施强制绝育活动。1939年，他又主动参加了元首最信赖的武装党卫军，以后到被占领的挪威；再往后，成为达豪集中营和诺因加莫集中营的医生。1942年9月，他长期以来对帝国的忠心换来破格晋升，被提拔为正式运转不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医院的院长，直到1945年1月集中营解散。

他的“突出政绩”至少有两项：一是把众多的被极度恶劣的环境摧残得未老先衰的囚犯挑选出来送往毒气室杀害的这种做法，由某些纳粹医生的个人行为变为一项严格执行的规范的经常性制度，每个有权力对囚犯进行“挑选”的党卫军医生、护士、男女看守必须照章办理，从而使该营囚犯的死亡率成倍增长；二是他推广、完善了对囚犯实施活人试验的做法，把实施活人试验的场所从奥斯维辛主营的10号楼一处，骤然扩展到主营、比克瑙第二分营和布迪第三分营的十几处；并邀请全国各地的医学专家和医生甚至医学院的学生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把广大男女囚犯作为医学、药学和生物化学试验动物的廉价代用品，把奥斯维辛集中营变为一个从事活人试验的基地，一个囚犯们的活地狱，从而大大加剧了囚犯们的苦难。

爱德华·维尔策曾长期担任门格尔、蒂洛、恩特莱斯等杀人医生的有权威的上司，对他们的罪责自然应承担直接的领导责任。

他的另一桩重罪是，在各个纳粹医生提供的准备送往毒气室杀害的囚犯名单上核准签字，呈送集中营司令官霍斯批准实施。这种死亡名单的规模，少则数十人，多则上千人。有时，他感到这类名单上报得太

少，便要督促手下的医生加紧进行。至于挑选体弱病重的囚犯送进毒气室，注射毒药杀害已经失去劳动能力的囚犯，倒不是他的日常事务。不过，有时他在办公室里工作得感到疲劳或乏味，也会走出来帮一帮那些搞上述两项工作而忙得不亦乐乎的部下，一下就打发几十个囚犯见上帝。

他的主要罪状之三是，对于女囚而言，他也是一名令人畏惧的超级屠户。他把关押十几万名各国女囚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视为千载难逢的试验基地，把她们视同试验手术用的廉价豚鼠。他的主攻方向是妇科癌症的诊治，尤其擅长宫颈癌的诊断和手术。自1943年12月开始，他先后堂而皇之地征集上千名女囚到自己的诊室内进行妇科病症“普查”。在他的研究室和诊室附近的多处房间里，经常安置着350名左右等待“普查”的女囚。这对许多女囚而言具有很高的吸引力，因为不管是否查出病症，反正可以逃脱令人疲惫不堪的奴隶劳动了，须知妇科检查可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了结的。她们密切配合维尔策而获得的“报酬”却是始料未及的：不仅反复进行的X光照射检查难以忍受，而且不少确诊患病的女囚被他草率地切除了宫颈，遭受了大出血的苦难，相当多的人还因此丧命。许多仅仅出现阴道分泌物过多，又带上一点颜色的症状，其他纳粹医生认定无须进行切除手术的患者，他却千篇一律地切除她们的整个宫颈，目的不过是获得尽可能多的活体组织，使自己的眼界更加开阔。对于许多仅存在初期征兆的女囚，他不但不采取任何措施进行医治，反而要在她们的宫颈部位注射病毒、霉菌或某些刺激性很强的化学药品，促发宫颈癌变，再进行手术切除。这个精心设计的致病过程，往往要持续几个月。这意味着，这些不幸的女囚要长期遭受到不亚于下地狱般的煎熬，最后的结局往往还是难免一死。至于那些本来健康的女囚，反倒可能因为过量的X光照射检查而患上癌症。经过“普查”，即使最为幸运的女囚，也往往会因为插入阴道镜时宫腔组织遭到创伤而发生感染，平白增添了种种妇科病。在维尔策医生眼里，根本用不着为受检者采用任何防护措施，反正这些女囚的命运早已注定，她们是不可能活着走出奥斯维辛的，无非是早死还是晚死一些时候，就跟其



他试验用动物一般。为了自己的这项试验能够深入、全面地推进，他还邀请了奥营的两个精通生物化学的纳粹医生——毕宁和戈贝尔博士予以协助。此二人也是著名的纳粹绝育医生克劳贝格从事通过阻塞妇女的输卵管实现绝育试验的可靠助手，也是摧残集中营女囚的老手。他的这项研究，基础性的化验分析由设在奥营第三分部——布迪营的拉伊科的研究基地进行；更深层次研究，则是同他的同胞弟弟赫尔穆特密切配合进行的。每当他切除的宫颈达到一定规模，就精心包装好送往汉堡的由赫尔穆特担任最高领导的阿尔托那妇科化验室。赫尔穆特会认真反复地观察、分析各个样本的癌变时间、程度和原因及提出治疗对策后，再呈送自己的哥哥，供他作为进一步研究的依据。鉴于宫颈检查的初始作业——插入阴道镜是一项非常仔细的工作，稍不留意就会造成出血，影响观测效果，令操作者劳神费心，维尔策从集中营内征集了两名犹太人妇科专家来打下手，他们是罗马尼亚籍囚犯萨姆埃尔和他的女儿。他们除担当这项基础工作外，还按照他的命令，给受检女囚实施宫内造影和宫颈部位专项药物注射。出于保命的需求，父女二人的工作十分卖力，以致不少受害的女囚已经把他们视为维尔策残害自己的帮凶。但是，维尔策对此毫不领情，集中营解散前夕，他出于灭口的需要，将二人秘密处决。

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自然难逃上绞架的下场。对此，维尔策倒是颇有自知之明。1945年夏天，远远逃离集中营的他被英军逮捕归案。没等到盟国法庭传讯到庭，他就在囚室中自缢殒命，时间是1945年9月。

### 第五节 残害儿童的恶魔医生——库尔特·赫斯梅耶尔

在以儿童为试验对象的纳粹医生中，除掉门格尔之外，最突出的当数库尔特·赫斯梅耶尔。这名医生本是纳粹德国红十字会所属的霍亨利欣试验医院的医生（该医院的许多纳粹医生因从事人体试验而成为战犯），1944年被派驻到汉堡附近的瑙因加默集中营供职，军衔是党卫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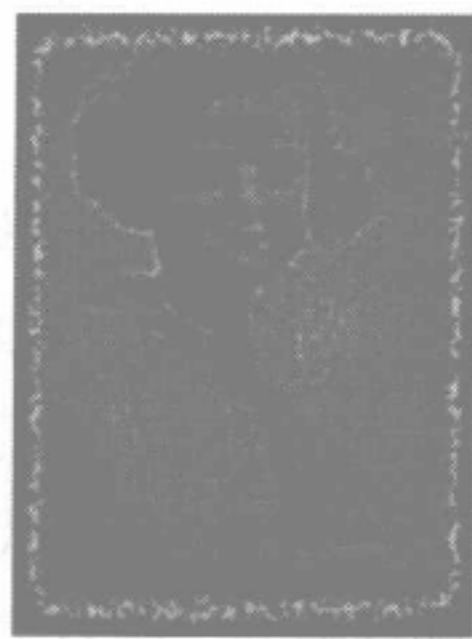
中校。他从集中营内被关押的波兰、捷克、匈牙利、俄罗斯和法国的犹太儿童中，精心挑选4—12岁的男女儿童各10名充当试验对象，把他们从各自的母亲身边强行带走，名义是给他们医治慢性病。以后便经常地给他们定期注射剂量和浓度不同的肺结核病菌。试验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当英国军队逼近璁



一群被赫斯梅耶尔医生反复“治疗”的儿童骨瘦如柴

因加默集中营之时，上述20名犹太儿童已被严重的肺病折磨得骨瘦如柴，呼吸艰难。但是，孩子们痛苦万状的景况并没有丝毫打动这位医生的良知，他仍然不肯放过这些幼小的生命。1945年4月20日，就在集中营面临解放的前夕，孩子们被带到汉堡市郊外布伦豪泽镇国民学校的一间地下室内。赫斯梅耶尔给儿童们每人注射了一针吗啡，使他们昏睡过去。随后并恶狠狠地下令党卫军士兵将他们逐个勒死。同孩子们一起被杀害的还有24名苏军战俘。这样，英军得到的只是20个儿童的尸体，而赫斯梅耶尔踪影皆无。战后的大部分时间，赫斯梅耶尔是在民主德国的马格德堡市度过的。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他以一个医术精湛、服务周到、态度热情的肺结核病专家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相当成功地掩盖住自己的罪恶历史，直到1964年12月13日被当地法院拘留为止。

1966年6月21日，马格德堡地方法院开庭审理这起隐藏了20年的谋杀儿童案件。经过严正审判后，这个恶魔医生在铁证如山面前，不得不连连



法国女孩——赫斯梅耶尔医生的医学试验品

认罪，恳求宽大处理。同年7月5日，马格德堡地方法庭以谋杀罪依法判处他终身监禁。

1967年8月27日，库尔特·赫斯梅耶尔因心脏病突发死于狱中。

应当指出，上述杀害儿童案件的凶手并非库尔特·赫斯梅耶尔一人，而是与霍亨利欣医院的另一个纳粹医生汉斯·克莱因共同完成的。但是，后者却未得到应有的审判：战争结束后，汉斯·克莱因从瑙因加默集中营逃到了德国的美军占领区。头两年，美军占领当局搞的人人过关式的非纳粹化运动，使克莱因医生每天心惊胆战，一听到汽车停车的声音就吓得一身冷汗，唯恐是美军宪兵对他实施逮捕来了。孰料这场运动竟是虎头蛇尾，除去一批臭名昭著的头面人物外，对于大多数丙级战犯和大批乙级战犯，往往是重罪轻判甚至不予追究。克莱因不久就到海德堡大学任教，并成为病理学专家。以后，他又晋升为教授，他教过的学生多达万人以上。无论是同事还是学生，谁也想不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曾经对无辜的儿童狠下毒手。他的后半生真可谓风平浪静，即使赫斯梅耶尔被民主德国判了重刑的消息，也没有把他牵连出来。一直到1985年他病死后很久，媒体才披露了他在纳粹时期的庐山真面貌。

## 第六节 解剖刀也是屠刀——希尔特医生的“科研活动”

1940年秋天，解剖学专家希尔特作为战胜国的接受大员来到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院，从此开始了一番雄心勃勃的科研事业。他有一句名言“科研事业是神圣的，而‘劣等种族’的生命不值一顾”。因此，他要求学生和助手们放手大干，不要受那么多伦理道德的束缚。在当时的特定年代里，这句话的话外音乃是，不能仅仅满足于使用尸体进行解剖，一旦需要进行解剖研究或制作人体标本时，就应该杀死那些劣种，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希尔特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创立一个劣等种族骷髅和头骨收藏馆。这里，收藏品的内容之丰富达到了举世无双的地步，

不仅包括犹太人、吉卜赛人，还应当涵盖拉丁人、斯拉夫人、希腊人、中亚人、亚洲人直至黑人。以官位只及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的希尔特个人的力量，显然很难实现这个目的。但是，他有望得到一位强权人物的大力支持——那就是种族卫生研究事业的创立者和积极支持者，同时也是自己的最高司令官希姆莱。1941年12月27日，满怀希望的希尔特致信党卫军帝国司令官：“我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几乎把人类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头颅都已收集得完备无缺。不过，提供给科研使用的犹太人头骨还少得可怜，那是因为以前不太容易得到和对此进行加工。现在，东线的战争却给我们提供了消除这种缺陷的机会。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的政委表现出一种令人厌恶的、但又典型的低等人的性格，我们可以设法弄到他们的头颅，以求获得一份具体的科学数据。”希姆莱果然不孚众望，他见信后立刻同希尔特达成协议：今后，凡是抓到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政委，均应活着交给保安警察，由他们严密监禁起来，直到希尔特的特使到达并将他们提取走。特使收到犹太布尔什维克政委后，要给他们逐个拍照，进行人体测量，并汇编有关他们职业和出身的全部资料，然后把他们杀死，并把他们的头颅割下来，经防腐处理，保存在特制的密封金属罐内，送往斯特拉斯堡大学。1942年，希尔特升任斯特拉斯堡大学病理解剖研究所所长。从此，该研究所就连续不断地收到用活人制成的材料。不过，仅仅得到犹太人的头颅，只是这位教授的最低限度的目标。他进而又向有关方面要求得到犹太人完整的骨架。希姆莱再次批准，希尔特有权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得到150副完整的犹太人骨架。不过，奥斯维辛当局不具备将骨架制成标本的能力，而希尔特自己也不打算由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对被杀害者进行活人躯体测量，所以，最佳方案还是由奥斯维辛方面把活着的“材料”运送到距斯特拉斯堡大学不远的纳茨维勒集中营，交由希尔特自行处理。1943年9月，奥斯维辛集中营根据希尔特的要求，挑选出115名囚犯押送纳茨维勒集中营。这些“活材料”包括79名犹太男子，30名犹太妇女，2名波兰人和4名中亚人。活材料运抵纳茨维勒集中营，希尔特立即赶来，亲自对每个人逐项进行人类学的测量。可能是出于对犹太人很高的繁殖能力的恐惧

和仇视，希尔特对30个犹太姑娘特别“关照”，除进行例行的检查外，又对她们专门做了妇科检查，并把有毒的制剂注射进每个人的卵巢内，以确保她们即使侥幸逃生，也不能再生育子女。至此，115名材料的使用价值已经完结，在此后的一周内，他们被分批驱赶进纳茨维勒的毒气室，用希尔特亲自配制的氢氰酸毒剂杀死，一个也没有剩下。使用这种毒气杀人，可以收到死亡迅速而又不损伤尸体的效果。

希尔特的另一个嗜好是收集人体的性腺。不论男女老幼，哪个民族，他都不辞辛苦地逐项收集。“二战”结束后，法国调查人员在他的一处秘密收藏室内，发现了数百副睾丸和卵巢；其中的七八副小得出奇，只有樱桃那般大小，格外引人注目。以后，经过审问其助手才获悉，这是从四个未成年的犹太幼童和幼女身上摘除下来的。为了获取众多的性腺，希尔特教授对数百名犹太男女囚犯进行强制性手术摘除，对于愈后工作却极不在意，导致许多人因大出血、内出血或感染而意外死亡。与希尔特异曲同工的是另一个纳粹医生——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主任医师海因茨·鲍姆柯泰，他的兴趣是收集各个民族、各种年龄段男子的阴茎。他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终于将从初生儿到80多岁的老人的男性犹太人的阴茎收集齐全。有的纳粹医生提示他，最便捷的办法是从焚尸场内待火化的尸体上取得。然而，鲍姆柯泰却不屑一顾地使劲摇头：“尸体上的器官往往已经失去生理特征，价值太低。”“那么你如何能搞齐全？”对方还是不理解。“从犹太人身上割，集中营里的犹太男人还少吗？”鲍姆柯泰信心十足地回答。一发现合适的目标，这名医生就会把倒霉的囚犯强行拉去体检并随即宣布他们是“花柳病患者”，从而理直气壮地把他们的阴茎剪下来。至于受害者的死活，他丝毫不加考虑。

1944年初秋，美国和法国的部队已逼近斯特拉斯堡。希尔特已收集得包罗万象的收藏室，眼看要成为反映他的一系列罪行的确凿证据。根据希姆莱的指示，他下令把研究所地下停尸室内刚刚杀死不久的80具尸体剥去肌肉，使死者的本来面目难以辨认，企图嫁祸给法国人。死到临头，希尔特教授还夸下海口说，盟国司法人员永远也不可能抓到

他。后来，他确实失踪了。在纽伦堡医生审判以及后来各个受害国对纳粹战犯的历次审判中，人们都没有看到他那可憎的身影。不过，他的下场未必有多好，在各国受害者和正义人士的众目睽睽之下，当时的整容技术又不像现在这般发达，因而他的豪言壮语不过是自杀身死、主动见阎王的委婉说法。

## 第七节 行径令人发指的两名恶魔医生

### 一、汉斯·艾塞尔医生

党卫军中校汉斯·艾塞尔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医生，先后在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供职，以对男女囚犯进行活体解剖而臭名昭著。他的名字在他供职的集中营的囚犯眼中简直就是恐怖和死亡的象征。他的拿手好戏是活体解剖。他时常守候在囚犯们上工的路边，遇到他感觉良好的男女目标，他马上命令他们出列，在他们的大腿或臀部使劲拧一把。只此一举，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凡是他认为达到标准的男女，就被党卫军士兵押进他的专用汽车送进他的手术室，从此踏上不归之路。他那无情的手术刀上下飞舞，使受害者们因极度痛楚而发出阵阵哀叫，但这丝毫也不能打动他那颗冷酷的心。他会毫不介意地继续进行切割手术，几个小时之后，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已被他分解成头颅、四肢、躯干、乳房和内脏，随后兴致勃勃地把这些器官一件件装入装满福尔马林的玻璃器皿中。不过，也不排除艾塞尔有发慈悲的时候，有几次他对试验对象的惨叫感到腻烦。于是就给他们注射了致命的苯酚，立刻送他们回了老家。他不仅自己喜欢使用注射毒剂的手法杀人，还经常指使和鼓励党卫军女护士效仿他。他会不厌其烦地教那些刚出道的党卫军女护士如何欺骗病人接受注射，如何调整最适宜的杀人剂量。不久以后，集中营的医院里就形成一股不给病重的囚犯进行治疗，而是用毒针注射快捷地打发他们的风潮。

战后，无论是美军或者英军主持的集中营审判案中，有关艾塞尔医

生的判决只有唯一的下场——绞刑。1947年在达豪集中营审判案中他被判死刑。照理说，艾塞尔该是死定了，但冷战救了他的性命，对他的惩处一减再减，直至1952年获得释放，总共坐了八年监狱也就完事大吉，出狱后照样领取养老金。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面临另一法庭的起诉，他被迫出逃埃及，在德国移民中行医。

## 二、希劳医生

希劳医生的专业是研究不足月婴儿的健康状况。他在集中营里设立了一个很大的候诊室，收容的对象均为不同孕期的犹太孕妇或吉卜赛孕妇。他安排大部分孕妇早产，残忍地给她们注射各种催产剂，或者敲击她们的腹部，强令她们流产。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分析和对比，产妇和婴儿的使用价值也就基本枯竭了。现在轮到希劳医生出手的时候了，当他收集了产妇最后的一次尿样后，一根长针就会毫不犹豫地刺入她们的静脉，随即毒液流遍周身，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婴儿的命运常常比他们的母亲更悲惨，希劳不屑于给这些小不点注射，他往往委托纳粹护士来执行。有时候，希劳心血来潮，又会抱起婴儿，径直跑到焚尸炉前，把婴儿抛入火势熊熊的炉膛里。

## 第八节 嗜杀成性的 T-4 医生

1939年冬至1945年春，以消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为宗旨的 T-4 屠杀行动在纳粹德国的许多医院中进行着，其中少数医院还专门从事屠杀残疾儿童的勾当。这些医院披着正常医务活动的幌子，变成一个个屠宰场，其情况与后来的灭绝营十分相似。战争期间曾在艾希贝格医院住院的一名女病人，又曾几次被转到集中营。她在战后作证说：“在艾希贝格的遭遇同在集中营一样糟糕，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1941—1945年期间，总共有2272名病人死在艾希贝格，它只不过是在安乐死屠杀行动中一个并不起眼的处决中心。杀人规模比艾希贝格还大的医院多达十几所。例如，位于下奥地利的国营古金医院。1943年10

月1日，奥地利医生艾米尔·格尔尼经下奥地利州内政部部长尤塞夫·麦尔保举，出任古金医院院长。之所以选择他，并非因为他医道高超，而是因为他是一名纳粹党上台之前即已入党的老党员，对犹太人无比憎恶，对元首的忠诚则到了盲从的地步。格尔尼上任后果然不孚众望，医院里的恐怖气氛明显加剧，安乐死的进程大大加快：格尔尼不仅使用毒剂注射的传统安乐死方法，而且引入了将T-4治疗与屠杀融为一体的许多项新发明。例如，通过使用电椅，在完全没有上级下达指示的情况下，格尔尼授意下属的医生、护士使用电击治疗的手法杀害了至少几十个残疾病人。纳粹医务部门终于发现了格尔尼对于T-4行动的重大价值，1944年11月，他的职权扩展到兼管国营毛尔-奥林医院；此前，他还被网罗进T-4医学行动的核心层内。

普鲁士大区波美拉尼亚省的梅舍利茨-奥布拉沃德医院被T-4医学官方指定为梅舍利茨附近的奥布拉沃德省立精神病院。该院也是实行“任意”安乐死屠杀的最为声名狼藉的一家医院。在“停止安乐死屠杀”的命令下达以前，该医院只是一个从德国向东部转运病人的中转站。1941年11月，波美拉尼亚省党部负责人弗兰茨·施维德·科堡任命沃尔特·格拉布斯基为该医院的管理员。随即，格拉布斯基迅即在此大开杀戒。大批残疾病人从德国各地的至少26个城市运抵该医院，抵达时间通常是在午夜。医生们很快将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病人挑选出来通过医疗方式杀害。实际上，被杀害者远比没有劳动能力的病人为多。因为被医生挑选出来的还包括所有给护士造成额外麻烦的病人、聋哑病人、正在发病的病人、妨碍他人的病人、不遵守纪律的病人，甚至包括被医务人员厌烦的病人。此外，曾经逃跑又被抓回来的病人以及那些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的病人，也属于被尽先处决的对象。

被医生们选中的病人很快被护士们带进处决室进行治疗。他们被医生、护士们强令大量口服药或接受注射、灌肠。十几分钟至多个把小时，毒性发作后，被害者便成批地死去。大部分尸体被一丝不挂地草草运到公共墓地，也有一部分被送往法兰克福的火化场焚尸。以后，刽子手认为外运尸体有可能暴露事情的真相，于是决定在本医院内建立焚尸



场。但是，这一工程尚未完工，苏军已于1945年1月29日解放了该医院。这个名为医院的屠场究竟杀害过多少病人，恐怕谁也讲不清楚了。只知道，1939年9月以前该医院收容病人900人，战争爆发后的收容病人数量骤增到2000多人。专家们凭借残存的一小部分医院文件推算，最保守的数字也达到6991人，是该院收容病人最大量的3倍以上。以后，根据德国司法部门的估计，该院被杀害的病人数量超过1万。

哈达马尔医院是唯一一家在安乐死计划第一阶段使用毒气室处决病人并在“任意”安乐死屠杀行动中继续使用药物屠杀病人的医院。该医院由黑森-拿骚省医疗护理机构的总负责人弗利茨·贝诺塔特负责。它与另外两家医院——艾希贝格医院和卡门霍夫-伊德斯滕医院一起，构成一个疯狂吞噬生命的特大屠场。哈达马尔医院不仅接受从包括汉堡在内的德国各个城市运送来的残疾病人并加以杀害，而且它还是一个屠杀其他受害者的处决中心：贝诺塔特在哈达马尔建立了一个专门屠杀带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健康儿童的特殊病房；但是，该医院最重要的罪行还在于它屠杀了数以千计的患病的东欧劳工。

大量屠杀东欧劳工，是纳粹德国卫生当局从1944年开始的，受害者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由于劳动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数以万计的东欧劳工染上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其中大部分是因肺结核而丧失了劳动能力。纳粹德国不肯把他们送回家，因为他们的家乡大多被苏军解放；纳粹德国当局也不愿把他们送进早已人满为患的各个德国医院。有鉴于此，德国医务部门的领导人做出决定，将所有患上肺结核的东欧劳工统统处决；由T-4组织完成这项任务。1944年9月6日，帝国内政部通知所有的地方政府，必须将由于精神疾病而无法劳动的东欧劳工接到指定的各个地方医院。11个被帝国内政部指定的医院包括东、西普鲁士和瓦尔特兰地区的蒂根霍夫医院、巴伐利亚的考夫布伦医院、奥地利的毛尔-奥林医院、黑森的哈达马尔医院。

从1940年1月到1941年8月，共有14名年轻的纳粹医生效力于各个处决中心。其中有4人担任主管医生：恩斯特·勃姆哈德、伊姆弗里德·埃贝尔、鲁道夫·洛劳尔和霍斯特·舒曼。由于在1941年夏即

脱离 T-4 而加入海军，后来又丧生于战火之中，勃姆哈德看来是战争罪行最轻的一个，而且也无须盟军司法人员去审判他。另外的 3 名纳粹医生则属于罪恶累累、杀人如麻的那一类。埃贝尔一开始主管勃兰登堡处决中心，后来又调到贝恩堡；洛劳尔则负责哈尔特海姆；至于舒曼，他开始在格拉分内克处决中心，后来又调到索内斯泰因，在往后又成为奥斯维辛和拉芬斯布吕克两个集中营的医学刽子手。其他 10 名医生则是 4 个主管医生的助手，分别在各个处决中心效命。在哈达马尔处决中心工作的弗里德里希与京特·亨内克后来离开 T-4 任职，丧命于东线战场；库尔特·施马伦巴赫曾长期在 T-4 任职，日后也亡命于战火。其他 7 名医生在“二战”结束后，都面临着审判：库尔特·勃尔姆、海因里希·本克、克劳斯·恩德鲁维特、汉斯·博多·格加斯、格奥尔格·雷诺、阿奎林·乌尔利希和埃沃尔德·沃斯曼。他们当时都非常年轻，最大者只有 33 岁。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不是少数几个而是数以百计的女医生、女护士积极参与了 T-4 杀人行动。其中至少包括：乌什茨普林格医院主管医生希尔德嘉特·维斯、梅舍利茨-奥布拉沃尔德医院主管医生希尔德·维尔尼克、卡门霍夫医院主管医生玛蒂尔德·维波、巴伐利亚的安斯巴赫医院主管医生伊蕾妮·阿萨姆·布鲁克穆勒、维也纳的安斯皮格尔格伦德医院高级医生芭芭拉·维勃拉克、格拉芬奈克处决中心的负责人之一玛尔塔·富泽医生、艾希堡儿童处决中心护士长海莱娜·许尔克。她们都曾指挥、部署、指导甚至直接从事以医学手段杀害重残病人甚至儿童的罪行，均以堕落为够格的乙级或丙级战犯，也都受到过盟国或德国本国法庭的审判。

## 第九节 纳粹杀人医生的下场

### 一、T-4 医生的下场

哈达马尔屠杀中心的两个杀害病人最为凶残的纳粹医生高尔加斯和

瓦尔曼于1947年被判处死刑，他们二人亲手杀害的重残病人均在1500人以上。但死刑未及执行冷战即已开始，他们得以改判有期徒刑。

鲍姆哈德、梅内克、施马伦巴赫在战争结束前即已死去；罗瑙尔、埃贝尔自杀。施泰因梅野尔和米勒医生在战后畏罪自杀。贝尔那和乌尔利希失踪；勃纳逃到阿根廷，从此下落不明。维斯和韦伯在1947年被判处死刑，不久分别减刑为6年和9年监禁。1948年，纳粹医生托特和泰尔通过篡改文件和拉拢证人，使德国科布伦茨地方法院宣判他们无罪释放。纳粹医生伦茨和帕勒曼也使用同样手法逃脱了惩罚。T-4行动的四五个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海德，在战后隐居中东，改名萨瓦德，并接受了伊斯兰教，从而在长达14年的时间内逃离了法网。但是，上帝之鞭在1959年还是降临到他的身上，西德执法机关经过长期追踪，揭露了他的本来面貌，并将他引渡回本国受审。就在审判开始的前夕，海德自知罪孽深重，从而选择了自杀的道路。他的主要助手尼彻教授远没有他幸运，1946年即落人民主德国的法网并于同年被判处死刑。令他庆幸的是，以后他并未走上绞架，而是走进了终身监禁的牢房。普凡缪勒医生由于杀害大批的患病儿童，于1947年被驻德国盟军的一家法庭判处死刑；然而1949年同一法院又宣称他之所以杀害儿童不过是奉命行事，因而改判他6年徒刑。纳粹医生伦诺于1963年在法兰克福北部被捕，1975年开始受审判。令众多受害者愤慨和大惑不解的是，T-4行动主角之一的卡泰尔、吉恩、海因茨、维茨勒等教授在战争结束后，一直安静地在德国生活着，根本没受到惩处，连审判也不曾触及他们。

## 二、各个集中营的纳粹医生的下场

嘎贝尔，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医生。在1961年举行的明斯特审判案中被判处3个月徒刑；

卢卡斯，先后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比克瑙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毛特豪森集中营任职。1963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中，被判处3年徒刑；

乌伦道夫，1949年在法兰克福审判案中曾被判刑；后改判缴纳

## 第八章 灵魂错位，救死扶伤竟成屠杀专业

50 000 马克保证金后获得假释。

鲍姆科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主任医生。在该集中营审判案中被判处 8 年监禁，以后不曾减刑。

波本迪克，以从事对集中营囚犯强制绝育而声名狼藉的纳粹医生。战后被判处 10 年监禁，以后不曾减刑。

达豪集中营的 12 名纳粹医生战后都只受到象征性惩罚，例如霍夫曼、朗、劳厄、姆尔麦尔斯塔特、姆提克、帕普、拉姆索尔、舒尔茨、沃尔特等人。在布亨瓦尔特集中营案件中受审的纳粹医生，诸如班德尔、布兰克、布利斯、霍佛尔、卡特、克里格尔、库尔次克、罗日等，均被判处时限不同的监禁。

集中营医生罗利克、诺伊曼、文克尔曼、波德曼、里哈德、沙贝尔，从未受到审判，属于漏网之鱼。

## 第九章

### 凶狠歹毒、罪恶累累的纳粹女战犯

自古以来，德国就是盛产美女的地方。德国人的主体——日耳曼民族自远古时代从斯堪地那维亚半岛南下，定居在欧洲大陆中部。在这里，他们又吸纳了来自东部的哥特人、马扎尔人、斯拉夫人，吸纳了从西部迁入的高卢人、色尔特人，吸纳了从南部到来的罗马人、伦巴地人、萨宾人等各种民族成分，造就了具备众多人种优势的特征，孕育出一代又一代举世闻名的美女。大多数德国妇女身材修长而丰满，却又不显赘肉；淡粉色的皮肤与一头浓密的金发相得益彰；较长的蛋形脸线条分明，鼻梁高挑，碧蓝色的大眼睛好似秋波荡漾，两片红唇构成的嘴较大，但又没超出得体的范围。再配上丰乳圆臀，即使最强调禁欲的清教徒，也难免要多看上两眼。难怪当年叱咤风云、不可一世，令欧洲各地居民无不谈虎色变的匈奴首领阿提拉，经历了几十年戎马生涯后，英雄气短，不禁拜倒在一位日耳曼少女的石榴裙下，乐极无悔地在她的怀抱中溘然长逝。数百年后，又是一位来自德国黑森公国的小公主索菲娅，孤身一人来到异国他乡，凭借美貌与计谋，征服了俄罗斯帝国的君臣，摇身一变而成为令整个欧洲刮目相看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然而另一方面，远在中世纪就有这样的传闻：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是男人比女人残忍；只有德国相反，那里的女人比男人还要凶残。在纳粹当道的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妇女为希特勒蛊惑人心的说教所迷惑，大约有2300万名德国妇女加入了纳粹党及其所属的希特勒主义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等各种各样的法西斯团体，数万名中青年妇女穿上了褐色的党卫军制服，戴上了主体为万字符号的袖章，狂呼：“哈伊，希特勒”，4000—5000名女青年充当了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看守，抡起皮鞭和棍棒，

对无辜的犹太囚犯大打出手，直至把他们赶进毒气室。数以百计的德国、奥地利女护士，直接投身于T-4行动，把注射器、灌肠器变成杀害重病患者的凶器；还有数十名凶悍的德国、奥地利少女，直接开枪杀害无辜的犹太居民，成为臭名昭著的特别行动队的一员。此时，德国妇女的美貌已黯然失色，她们的负面因素却无以复加地恶性膨胀，演变出来一大批穷凶极恶的女战犯。下面则是几个突出的典型。

### 第一节 伊尔玛·格蕾泽——酷好杀害美女的美女

伊尔玛·格蕾泽，生于1923年，1945年被美国占领当局组织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时，只有22岁。她并非出身名门，却以小小年纪就成了一名狂热的纳粹党徒。她所学专业是护士，却选择了集中营女看守的行当。凭着虐待、折磨、杀害犹太女囚的异乎寻常的热情，她十八九岁时就获得了令众多女看守羡慕不已的铁十字勋章，在20岁之前又被破格晋升为女囚集中营的看守长。从相貌上看，她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美女，不仅她所任职的拉芬斯布吕克、奥斯维辛、贝尔森三个集中营的男女看守这样评价，就连被她毒刑拷打的女囚，也众口一词地承认这一点。但若从心灵上看，她所具备的无疑是蛇蝎一般的心肠，就是在以凶狠成性的纳粹女看守当中，也是相当突出的。她出言粗鄙，姑娘本不该说的淫秽话语常常脱口而出；她放荡成癖，先是在男性看守中物色过几个小白脸，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同风度翩翩的门格尔医生做了露水夫妻；以后发现门氏用情不专，甚至



伊尔玛·格蕾泽，明星般的美貌与蛇蝎般的心肠集为一身

同犹太、茨冈女囚私通，她气得要命，同他一刀两断。最终，她追随粗壮如牛的比克瑙男囚营长官克拉莫来到贝尔森集中营，成了他的情妇。但是，这些劣迹并不构成罪行。她之所以被推上断头台，还在于她极其残酷地杀害了成百上千的女囚。在比克瑙分营的女囚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美女见到门格尔，可以起死回生；美女见到格蕾泽，却要出生入死。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出于好色，门格尔把不少美貌的犹太女囚，从毒气室前拉到自己的诊室，使她们至少是暂时逃离了死亡；而更多的犹太女囚，仅仅因为自己的美貌，被忌妒成性的格蕾泽无端杀害。据传，门格尔和格蕾泽断绝露水夫妻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让一个绝色犹太女囚是生还是死的分歧上。那是194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门格尔照例在执行“挑选”的公务，3000多名刚刚走下火车的荷兰犹太人挨个从他面前走过，并按照他的手势分别走到左边或者右边。忽然，一个身材高挑、留着棕红色披肩长发的姑娘，猛然一下子跪在门格尔面前，抱住他的皮靴，苦苦哀求道：“救救我吧，仁慈的医生，我才23岁呀。”门格尔低头一看，不禁心花怒放，他感觉今日总算找到了“倾城倾国”一词的真实写照。这个姑娘，粗看很像自己曾经朝思慕想的党卫军女医生赫尔塔·欧勃霍泽；细看起来，却比后者更年轻，更白嫩，一双大眼睛也更加深邃动人，乳房则更加高耸丰满……在众人面前，他不得不压抑一下满腔的欲火，用力将她拉起来，和颜悦色而又庄重地说：“放心吧，姑娘，你一定会得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真的吗，医生？”姑娘还是有些不放心。“当然，我门格尔医生向来一言九鼎。等我把这些人安排好，马上带你去报到。现在，你先站在我身后等一等。”他用力握了握姑娘的手，“只管放心，我是绝对可以信赖的”。这一幕，被十几米开外的格蕾泽看得一清二楚，她顿时醋意大发，一个箭步奔了过去。她的从天而降，使门格尔不禁大吃一惊。他深深知道，格蕾泽对其他美女的忌妒简直到了病态的地步。一旦发现集中营里出现了跟自己相差不多甚至胜似自己的美貌女囚，她就要歇斯底里大发作，千方百计地把她们折磨死。想到这里，他本能地感到，他的好事要吹。“格蕾泽，你好呀。好几天没见了……”“好个屁，你心里还有我，今

晚上等着金屋藏娇吧。”话锋一转，她冲着那个心魂甫定的犹太姑娘吼起来：“好一个美女，居然连医生也要勾引，今天老娘叫你舒服个够。”说着，一个箭步蹿到姑娘面前，抡圆了皮鞭向她的脸上猛抽，姑娘脸上顿时出现了一大条紫痕。门格尔连忙上来劝解：“她哪里得罪了你，我罚她关刑罚室还不行。”“哼，你能罚她，鬼才会相信，八成罚她进了你的被窝。”门格尔一阵脸热：“你说话不能有点分寸吗？你我都是有身份的人，当着那么多囚犯……”“老娘今天豁出不要脸了，非要她的命不行。看哪个犹太女人、茨冈女人还敢勾引德国医生”。她怒火万丈，一把推开门格尔，挥舞皮鞭向姑娘脸上不停地抽来抽去。没有多一会儿，姑娘的脸已经肿成一个紫茄子，血珠不停地往下滴。格蕾泽的火并没有消去，鞭子倒是停下来了，一个更恶毒的念头又映入脑海。“来人，把她的上衣扒下来。”两个女看守立刻跑过来，迅速地执行命令。“你这对大奶子也不能留下，省得你又去找那些不要脸的德国男人卖弄风骚。”她用手一指姑娘的胸部，吩咐那两个女看守：“给我使劲地抽，什么时候我叫你们停，你们才能住手。”女看守上下扬鞭，很快招致姑娘声嘶力竭的哭号。不知抽打的时间持续了多久，但见姑娘的胸部血肉模糊，两只高耸的乳房早已不知去向。“住手吧，怎么样，小姐，今天夜里去敲门格尔医生的房门吧，你知道你现在有多么美。快去拿镜子给她照一照。哈哈……”格蕾泽觉得总算出了满腹的怒气。“滚吧，看你也没有几天蹦头了。”“不行，”格蕾泽心中暗想，“门格尔是个挺高明的医生，他会不会给她治愈呢？”想到这里，格蕾泽不禁打了几个寒战，“这太可怕了，看来斩草还得除根”。她向刚刚缓缓离去的姑娘大喊一声，“你回来，犹太婊子，事情还没完”。“我要叫你彻底死了这条心”，“现在躺在地上，两条腿叉开”。姑娘使劲瞪了她一眼，极不情愿地落实她的指令。“你他妈快一点”，格蕾泽上来又是一脚，把被折磨得浑身虚软的姑娘踢倒在地。姑娘的两条腿刚刚分开，格蕾泽端起手枪对着她的阴部就是三枪。血乎乎地浸红姑娘的裤子，她尖叫了一声，再也不动了。

不仅俊俏的女囚会被格蕾泽无端害死，即使长相一般但拥有一双丰



满的乳房的囚犯，也会被格蕾泽视作大逆不道而狠下毒手，千方百计把她们的这个优势毁掉。有时，她亲自动手，把女囚的乳房抽烂；有时，她把这个问题交给女看守；有时，她还会请来一个绰号叫“神鞭”的党卫军恶棍。他的绝技是在几米之外，用一根极长的牛鞭，把女囚的奶头抽断，而且迄今为止保持百发百中的纪录。在比克瑙分营，至少五六十个女囚的乳房被她无情地毁掉，而且其中大多数人仍没有逃脱被杀死的命运。

怀孕的女囚也是格蕾泽打击的重点，她的逻辑是：说不定这个犹太娘们会生出一个长大后比我还美的小崽子。她一旦发现某个女囚有怀孕的迹象，马上就打发她进毒气室；有时还要朝孕妇的腹部一阵猛踢，直到把她踢得流产或者被折磨死。

至于挑选出已不适合劳动的女囚进毒气室这个主要业务，格蕾泽反倒不是很热心，因为那些衰老、干瘦、拖儿带女的女囚，无论哪一个也不会再在相貌上对她构成威胁。她不止一次把这项工作交给对此津津乐道的女营副看守长哈斯女士。但是，有一点她绝不含糊，那就是，无论哈斯准备把多少名女囚送进毒气室，她都会毫不犹豫地签字表示同意。

直到被押上贝尔森集中营审判案的被告席，格蕾泽才领会到惊恐和忧愁的滋味。她曾经大喊冤枉，因为所有一切的罪行都是按上峰的指令执行的，她作为一个小女子怎能抗命不遵；她也曾效法那个曾被她鄙夷不屑的犹太姑娘的做法，在死神降临之前自报“我才22岁呀”的妙龄，企图引起人们的怜悯；她也曾破釜沉舟，在一个难得的瞬间悄悄地拉着一个英国老法官的衣袖，用不流利的英语说，我愿意当你的女仆，伺候你一辈子……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甚至连强调应用德国的法律对纳粹战犯进行定罪和量刑的英国法官，也认为格蕾泽十恶不赦。那位上了年纪的法官，望着格蕾泽如花似玉的美貌，未尝没有一丝心动。然而，按照哪一国的法律，格蕾泽的罪恶都只能判处死刑。他万般无奈地对格蕾泽说：“姑娘，我实在无法帮助你，你的罪孽实在太大了。在你心中，到底还有没有上帝呀？”1945年12月的一天，因忧郁而面容变得十分憔悴的格蕾泽，万般无奈地走上了绞架。

## 第二节 荷尔塔·欧勃霍泽——以宰割活人为乐趣

盛夏已悄然离去，施维德湖边一排排高大的白杨开始落叶，躲藏在树叶下面的蝉，啼叫声也由声嘶力竭变为有气无力。女看守们也已换上带有骷髅标志的党卫军黑色秋装。这一天，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气氛与往常不大相同。看守们早早就把囚犯们赶起来打扫卫生，而且要求苛刻；破旧的囚衣被崭新的替换，饭食也比平日好得多。这是怎么啦？10点左右，一个党卫军卫生考察组从两辆高档的大巴中走出来，30多个人，男的女的都有。集中营司令官科盖尔、看守长奇默尔女士、医务主任特罗麦尔都来陪他们参观。这些人哪里都要看，对各类囚犯都要询问。他们的口气倒是挺随和，不似盛气凌人的男女看守，看来都是些医生教授。很快，周围人们的眼光就凝聚在一个女客人身上：她看上去25岁左右，典型的北德美女，身材在1.75



荷尔塔·欧勃霍泽被押进纽伦堡审判庭

米左右，皮肤比德国女人惯常的浅粉色还要白些，一头齐肩的深黄色发髻，深邃的水蓝色大眼睛俏丽动人，颧骨稍稍鼓起，夹着高耸的鼻梁，下面是两片薄薄的朱唇。使人略感不舒服的是，她的脸上冷若冰霜，没有一丝笑容。女郎对被找来谈话的女囚们很是关注，认认真真地记录她们的每一句回答，还有她自己的发现和观感。看守们、囚犯们都在注视着女郎，其中一个个头不高的小伙子，为了看清女郎，只得踮起脚来。

他看得出了神，竟忘了干活，招来看守劈头一鞭子，还喃喃地说：“美，真是女神一般。”“美什么，那是条美女蛇。”一位头发花白的囚犯不以为然，他是德共党员，“再美的女孩子，一穿上那身黑皮，心就变黑了。”“我不信……”忽然间，女郎一阵笑声远远传来，声音很大，也很瘆人。“你笑什么，荷尔塔？”考察组的领队、一位50多岁的党卫军军官问道。“我看到了事业的光明前景，格哈德老师。这儿有那么多的豚鼠，足够我练手用，我很快会成为一名高明的外科专家的。”“豚鼠？噢，对，对，公的，母的，还有小的，利用他们的骨肉，你无疑会成为德国，不，全世界最出色的女外科专家。”“哈，哈，哈……”女郎和长者一齐狂笑起来，长时间的狂笑，连那个对她的美貌赞不绝口的小伙子，都觉得毛骨悚然，突然脑中闪现出一种不祥的征兆。也就是两个多月以后，令人仰慕的女郎又一次出现在拉芬斯布吕克，不过这次常住下来了。她穿上白色的长衫，坐在集中营医院的诊室里，成为负责全营女囚也包括后来入营的少数男囚健康的两名女医生之一。不过，女囚们很快就领教到她的厉害。几年后，当年的集中营女囚海伦、芭芭拉和玛格达莱娜在纽伦堡医生审判案的法庭上作证揭露欧勃霍泽：当你急需她的诊治时，诊室不是铁将军把门，就是被她冷嘲热讽地拒之门外。求诊的女囚如果是身高马大，她就依然抱着大部头的外科专著，头也不抬，冷冷地说“你壮得像头牛，还吃什么药，忍着点儿吧。”要是来者又瘦又小，她照样有话说：“你知道这药有多贵，你两条命也抵不上，不给。”你要是坚持不懈，拒不离开诊室，把她惹急了，她就会随手拿过锥子，往你腿上乱刺，拿起手术刀在你腿上开几道超长的口子，然后再用药棉蘸上酒精使劲地擦拭伤口，并且恶狠狠地问：“看你下次还来不来？”当你最害怕见到她时（指的是进行挑选时），她却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她只在女囚的裸体上打量几眼，看一看乳房是否发达，便冷笑着对那些她看不上眼的女囚说：“你早就该换一种轻松的工作了。”说着，不容分说就吩咐女护士或女看守把这些人逐个用力拽出囚室。不一会儿，就会驶来一辆卡车，将门外的女囚全部送往新的劳动岗位——其实是几十里外的贝恩堡灭绝营的毒气室。对于该集中营内为数不多的

男囚，特别是其中的非犹太人、非共产党员，她的态度要好一些，至少是耐心地听他们陈述完自己的病状，有时还或多或少给一些药。有一个年轻的法国中尉，因为精通艺术，又能讲德语，更可以说是得到她的青睐。他每次来到诊室，不仅回回如愿以偿地拿到药，还可以坐在那里侃上半晌文艺复兴的绘画艺术，由此还能看到女医生脸上罕见的笑容，听到她温存的细声细语。有一天，中尉谈到自己倾心的绘画大师拉斐尔的得意之作《西斯廷圣母》，竟忘掉自己的囚犯身份，谈了将近一个下午。看到天近黄昏，他才害怕起来。“不要紧，你不会挨鞭子的。”善解人意的女医生笑吟吟地递给他一张重病假证明，又拍拍他的肩膀，亲热地说：“有我的假条，什么倒霉事也不会发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直到医院院长希特劳斯基找到女医生，严肃地指责她：“欧勃霍泽小姐，你怎么能和一个法国战俘鬼混到一起，简直是堕落，亏你还是我党党员，我可不想在集中营里观看一场《法国中尉和他的女人》。”欧勃霍泽小姐顿时满脸绯红，不过她发誓说这纯粹是恶意的诬陷，她和中尉从来只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并不曾越雷池一步。院长依然冷冷地说：“当然不能排除这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但重要的是，要证明自己的纯洁和对党的忠诚，你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举动，同那个法国人彻底决绝。”她咬了咬嘴唇，要求长官三天以内看她的行动。头两天内，女医生对中尉依然亲热如故。她还要最大限度地使用“资源”为自己排遣孤独，寻欢取乐。第三天，当中尉又来看病时，欧勃霍泽脸上显露出阴云：“女囚当中已开始流行斑疹伤寒，亲爱的，为了你的健康，我必须给你注射一针预防针，好吗？”中尉笑着满口答应，望着美似天仙又关爱自己的异国情人，他觉得自己肯定是全集中营里最幸福的男囚。注视着针头已刺入中尉的静脉，她轻轻地说：“这是当前效力最高的药剂，只是会出现一些反应。”“那怕什么，没关系。”注射后不一会儿，中尉感觉头晕乏力，不久又流出鼻血。女医生用手帕轻轻拭去中尉脸上的血，但中尉嘴里也淌出血来，接着就身子一斜，重重地倒在地板上。女医生俯身捧起中尉的头，依然带着依依不舍的情感，抚摩着死者的头发，猛然一下站起来，毅然决然地说：“没有别的办法，你只有

去死。”她随即打电话请来了院长。“误会消除了，你确实是我党合格的党员。”院长看到法国中尉的尸体，不禁称赞道。此时，欧勃霍泽心中仅有的一点儿人性也完全泯灭了。



经荷尔塔·欧勃霍泽“治疗”后致死、致残的前集中营波兰女囚

从1942年夏天开始，欧勃霍泽医生的工作更加繁忙，她再也挤不出风流一下的时间。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的医疗顾问卡尔·格布哈特博士，也就是上文中那个和女医生一起放声大笑的长者，对他的学生欧勃霍泽下达了新的任务：挑选出数百名健康的女囚，进行取骨和接骨试验，同时证明新型磺胺类药物的效能；杀死犹太女囚生下的婴儿，给茨冈姑娘和女孩做强制绝育手术。于是，她时常出现在女囚们的劳动场所，仔细观察她们的体力状况，悄悄记下健康女囚的囚犯号码。越是相貌姣好的女囚，就越是容易被欧勃霍泽医生选中。因为她以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的第一美人自居，容不得别人动摇她的这一地位。一旦被她选中，等待美貌女囚的命运不是悲惨地死去，便是缺胳膊短腿，变成终身残废。不久，被选中的女囚就接到去集中营医院外科报到的命令。医生们告诉她们，她们已患有骨髓炎、股骨头坏损等重症，如不及时治疗，肢体就有可能瘫痪或残废。为了她们自身的利益，必须尽快动手术。紧接着，她们就被送上手术台，意想不到的终生难忘的苦难由此发端。后来，幸存下来的受害者控诉说：“经常给我们做手术（实际上是任意宰割她们）的是两个医生，格布哈特主刀，欧勃霍泽辅助；时间不太长以后，欧勃霍泽入了门，她就自己主刀，由两个男医生特雷特和菲舍尔打下手。”由于欧勃霍泽迫切希望早日充当独当一面的外科专家，她参加手术最积极，做手术的次数也最多。作为手术护士参与过多次取骨、接骨手术的党卫军女护士格尔达战后在“医生审判案”受审时供认：“格布哈特和欧勃霍泽为了掌握病人接受手术时的真实感受，往往在手术前拒绝使用麻醉剂，使女囚们突然遭受刻骨铭心的疼痛，她们的尖声惨叫，使手术室之外的医生护士们也感到胆战心惊。”受害者在法庭上愤恨地控诉：“格布哈特和欧勃霍泽这两个魔鬼，故意使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折磨。我们的伤口还没愈合，他们就把不干净的木条和碎玻璃条往伤口里狠命地钻，顿时让我们感到钻心般的疼痛，全身淌汗，衣服和被单都湿透了……欧勃霍泽还利用换绷带之机滥施淫威。猛地撕开绷带，把血淋淋的皮肉一起带下来。谁因为痛喊得声音越大，她就撕得越带劲。”被接骨的女囚还算不幸中的万幸，因为纳粹医生们要

通过她们的肢体观察手术效果，故此她们能够较长时间地活下来，伙食也相对可口一些。至于那些贡献出骨骼的女“病人”，一旦骨骼被截断、取出，她们的生存价值即告消失。所以，主刀医生很快会下命令，把她们送进灯光昏暗的32号房间——后来许多女囚才发现这里乃是通往地狱的入口。不给饮食，更不给治疗。夜深人静之时，欧勃霍泽就带着党卫军护士长伊丽莎白·玛赛尔，像幽灵一样来到这里。一把拉起已经半死不活的妇女的手臂，强行注射进大剂量的毒药。被送到32号房间的女囚，没有一个活着走出来。“欧勃霍泽，你这个恶魔，还我的女儿”，在“医生审判案”进程中，一个来自斯洛伐克的茨冈妇女声嘶力竭地哭喊着。1943年她带着8岁的小女儿被关进拉芬斯布吕克。几个月后，从柏林来了一个吉卜赛人种女专家爱娃·尤丝丁，由欧勃霍泽陪同来到她的囚室。她们发现了这个小女孩，异口同声地说她是什么好材料。接着不容分说把女孩带去硬性做“妇科检查”。检查进行了好几天，女孩被抬回来时已不能行动。她断断续续地一再说明，那两个凶狠的女医生，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按在床上，反复给她的身体各部位拍照。以后，用很长的针刺进阴道，还用刀剖开她的小腹。她好几次疼得昏了过去。没过几天，女孩就死在母亲的怀抱中，内裤几乎全被鲜血染红。看到她整天哭哭啼啼，一个党卫军女护士禁不住走来“安慰”她：“其实，我们的医生并没打算弄死你女儿，你们又不是犹太人。医生只是摘除了她的卵巢拿去研究，谁让你女儿太娇嫩，人家那十几个大一点的女孩都还活着。”被迫在女囚医院担任辅助工作的苏联、波兰、捷克的女医生还证实：欧勃霍泽还积极地贯彻执行纳粹当局对犹太人的灭绝政策，当然，她用的不是冲锋枪和毒气，而是用注射针、手术刀等。一听到哪一个女囚快分娩了，欧勃霍泽就会不请自到。但她不是来助产的，而是要注射毒剂扼杀新生的婴儿。在劳动力不太紧缺时，欧勃霍泽一发现女囚中的孕妇，就毫不犹豫地叫来看守把她送到一间“预备室”暂时储备起来，待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再统一用卡车送到贝恩堡一起灭绝。以后，劳动力出现短缺，这位女医生就采取留下母亲、除掉婴儿的办法。她会采用宫内注入流产药物，敲打、挤压腹部等非人道的疗法，

企图使孕妇生下死婴。倘使婴儿仍顽强地出生，女医生马上就会给他注射毒药，让小生命浑身青紫、窒息而死。罪行与欧勃霍泽类似的，还有一名党卫军女医生——格尔达·容塔克，党卫军两任护士长伊丽莎白·玛塞尔和玛格丽特·霍夫曼。但她们均不如前者那般穷凶极恶，因而知名度也远不及前者。

说实在的，欧勃霍泽事业有成，却情场失意。她还在23岁时就拿下了医学博士头衔，不久当上了德国少女同盟的地段负责人，又不费力地加入了纳粹党。倚靠少有的美貌和令人羡慕的医学博士学位这两笔雄厚的资本，她婉拒了不知多少个追求者，其中有党卫军上校，有中央保安总局的某局副局长，也有西门子公司的部门经理；即使风度翩翩的“死亡天使”门格尔，一次想对她动手动脚，也遭到她当众严厉斥责，简直无地自容。她的心目中，有地位的只有3个人：元首，听到元首逝世的噩耗，她一连几个小时地哀号，她觉得世界不复存在了，地球行将毁灭，人类的末日到了。她遇到了一个从前的长辈和老师，见面后劈头就骂：“你这头蠢猪。”她永远也不能原谅他，因为他参与焚烧了元首的遗体，虽则她也知道他是奉元首本人的命令才这样做的。第二位是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她常常喃喃地说：“我们的海因利希”，这道出了发自内心的呼声。同不少年轻美貌的党卫军女官兵一样，她暗自希望有朝一日能与自己心目中的大英雄朝夕相处，永不分离。在她随身携带、须臾不离的乳白色挎包中，保存着一件比什么都珍贵的物品：1942年希姆莱视察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时同女党卫军官兵的合影。而她，有幸被帝国司令官叫到身边，亲切地问长问短，还一笔一画地记下她的名字。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难忘时刻呀。第三位则是比较现实的情人，这次不是单相思，是她崇敬的导师卡尔·格布哈特，她的杀人理论和杀人技巧，有相当一大部分得益于此君的言传身教。尽管他长她近10岁，她却觉得他身上没有一处不令人满意。1942年8月，刚刚调到他身边工作，荷尔塔就深深地为他所吸引，不能自拔。她认为，做他的助手，是自己三生有幸。要是能时时在一起就好了，永不分离。遗憾的是，自感德高望重的格布哈特，不打算同自己的结发妻一刀两断，她也就不得不



继续充当这种半是助手半是学生，同时又兼秘密情人的微妙角色，随时听从他的召唤，随时准备跟他到天涯海角。在霍亨利欣医学研究所，她的格布哈特老师是这里的主宰，她也以自己这个没有任命的内当家身份而自豪。她从内心深深地忌妒那些各方面条件不如自己，却早早过上美满的家庭生活的女同事、女同学、女朋友。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同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医院工作的另一个纳粹女医生格尔达·维根德。不，人家现在姓容塔克了，比自己资格更老的纳粹医生容塔克已经娶了她。她把满腔的无名怒火和仇恨，最后统统发泄在那些丝毫没有阻碍她运程的女囚身上。失衡的心态还促使她养成一种嗜好：她截长补短地找来不少犹太儿童，给他们蓄意注射超剂量的种种化学药品，使他们痛苦不堪地死去，以便了解这些药品的毒性。随后，要切除他（她）的性器官，珍藏起来进行深入的研究。

后来，她真的跟着格布哈特走上了纽伦堡医生审判案的法庭。格布哈特被判死刑并执行绞刑，先她而去，使她更觉孤独，感到在世上无依无靠。直至她在纽伦堡受审，法官们还是称她欧勃霍泽小姐，而不是某某夫人。

在1947—1948年举行的“纽伦堡医生审判案”的23名被告中，欧勃霍泽“荣幸”地成为唯一的女性，也是量刑中法官们争议较大的一个被告。她被控对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六七百名女囚的非正常死亡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这还不算以后在霍亨利欣医学研究所的罪恶行径。面对几十名受害者声声泪、句句恨的证词，连她的同伙——党卫军医生和护士也无法庇护她。她当年的助手、党卫军医生菲舍尔在法庭上发誓说，1942年冬，他亲眼看见欧勃霍泽给十几个女囚注射过致命的针剂，其中至少有一种是柴油，因为他嗅到了气味。注射后三五分钟，那些妇女全部倒在地上，嘴角和鼻孔淌出鲜血，再也未能醒过来。揭露她给未成年的吉卜赛女孩做过绝育手术的，则是党卫军女护士格尔达。欧小姐几次感到末日来临，死神的召唤近在咫尺。好几个法官主张判处欧勃霍泽绞刑；但也有其他法官指出，她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依照格布哈特、希特劳斯基、特罗麦尔之流的命令与指示进行的，只是一个从犯。欧小姐

也自我辩解说，她执行命令是认真的，但从未有过头的行为。例如，上级要求处死一切犹太婴儿，她当然一五一十地照办了；但上级没有要求处死吉卜赛儿童，她便没有杀害他们，充其量是给他们做绝育手术。在关键时刻，一名曾证实她一次挑选了30多个重病女囚进毒气室的集中营幸存者，在尚未完成书证前，即因集中营后遗症死去，造成这一罪行死无对证的场面。再者，她坚决否认亲手对女囚实施强制性绝育手术（不包括对中、晚期孕妇实施强制性人工流产），而控方却未能做出有力的否定性举证。最后，她沾了女性的光，法官们不能不考虑这一层，判处她仅次于死刑和终身监禁的重刑——20年监禁。

冷战使幸运又一次光顾欧勃霍泽，由于美国占领当局蓄意开脱，以及她的一些故旧的疏通，她坐牢7年后即获释放。加之得到由克拉伏特等漏网战犯盘踞的联邦劳动部的推荐，她不是作为女战犯，而是作为被盟国推迟遣返归国的战俘来求职，并将优先得到就业的机会。几经周折，她来到对自己的经历一无所知的荷尔斯泰因—什勒苏益格州，到主管部门哭诉自己的境遇，年已40多岁了，依然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其实自己没犯多大罪过，只不过给犹太、茨冈女囚看病时漫不经心，发生了几起死亡事故。所以，希望长官给一碗饭吃。“你打算搞什么工作？”主管官员显然被她打动。“当然是行医啦，我23岁就拿到了医学博士，哪一科的病都能治好。”“好吧，让我们研究研究。”几个月以后，欧勃霍泽兴冲冲地拿到了儿科医生的行医执照，并选择了在该州东北部的普伦市施托克镇一个风景秀丽的湖旁，修建了一家诊所，在这里未受任何干扰地工作了一段时间。居民们只是称颂她对患病儿童如何认真、负责、尽心，而没有人去追究有关她在集中营里残杀病人的种种传闻。欧勃霍泽心中暗喜，觉得终于躲过了苍生的眼睛。可是，欧小姐高兴得早了些。她不想追忆往事，而欧洲各国却有千百双满怀深仇大恨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她。她的诊所开张的消息渐渐地传到国外。不久，德国政府和荷什州政府就收到雪片般的抗议书，强烈要求把这个恶贯满盈的女战犯再度收监关押。还有些苦大仇深的受害者打算带上子女，从千百里之外赶到荷什州，准备把她痛打一顿并捣毁她的诊所。她不得不发出

求援的呼叫。一个晚秋的深夜，秋风怒号，湖水翻腾，行人匿迹。一个身披风衣、戴着墨镜的“奥德萨”的成员，幽灵一般蹑手蹑脚地来到湖边。凭着“哈伊，希特勒”的老规矩，敲开了欧记诊所的门。他告诉欧勃霍泽现在情况是如何紧急，必须尽快逃离此地，犹豫不决就要完蛋。随后，他引导着女医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中，来到一片湾汊处的芦苇丛旁边。他划出早已准备好的小船，两个人从湖面上悄然离去，消失在茫茫夜雾中，从此离开世人的视野。1960年，当地市政部门吊销了她的行医执照。然而，起码是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各国追缉纳粹战犯的组织都没有再发现欧勃霍泽小姐的准确踪迹，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多年之后，才有人在一家不太引人注目的杂志上，看到两行小字：“前纳粹集中营女医生荷尔塔·欧勃霍泽已于1978年1月病死，终年67岁。”（照片见 p. 295）

### 第三节 伊尔丝·科赫——酷好杀人剥皮

20世纪60年代初期，鄂华先生的反法西斯主义名篇《刺花的灯罩》问世，给一两代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作品中女主人公海林格夫人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纳粹女战犯。她为了获得人皮做艺术品，竟惨无人道地注射毒药杀害了无数的青年战俘。这个故事其实确有其事，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只不过，海林格夫人的生活原型名叫伊尔丝·科赫。

作为布亨瓦尔特集中营的头号女战犯，身高马大的伊尔丝·科赫，站立在达豪集中营旧址举行的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审判案的被告席上。人们，包括审判席的法官惊奇地发现，在纳粹战犯中又出现了一个美女。她不但具有德国美女应具有的一切，而且还十分强健，像一名久经锻炼的健美女运动员。只是，如果近距离地盯着她，会发现她的两颊已开始略略发胖，眼角已出现了浅浅的鱼尾纹。不过无关宏旨，说什么她也够得上半老徐娘。她今年毕竟已然39岁，早已不算年轻姑娘了。

与其他被告不同的是，人们指控她的主要罪证，不是哪一类凶器，

也不是杀人的数字统计，而是堆成一个小丘似的精美艺术品：有钱包，有书籍的封套，有灯罩，有票夹，有手套，有画面……所有这些艺术品的质地均属上乘，光滑细腻，富有弹性，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开庭前，这些艺术品引起听众的很大兴趣，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名贵材料呢？开庭以后，大家听到科赫夫人的供词，不禁大吃一惊。那材料竟是人皮，一张张从尚未完全断气的活人身上硬剥下来的人皮。而亲手将那些悲惨的青年男女杀死并剥下人皮的残酷杀手，不是旁人，就是美貌的科赫夫人，一个货真价实的女战犯。科赫夫人难道自幼就是一个女魔吗？当然不是，她本是一个德国工长的女儿，性格豪放，热爱自然，兴趣广泛，待人热情，整天跳呀唱呀，好像从不感到疲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父亲失掉了工作岗位，母亲的女红也日益失去销路。她不得不放弃当运动员的理想，去当一名伺候重危病人的护理员，虽然工作又脏又累，总可以帮助父母养家糊口。可就连这样的日子也维持不了几天，她被解雇了。伊尔丝姑娘沉默了，从天而降的苦难究竟是谁造成的，她真想咬他一口。后来她听到一种宣传：灾难是万恶的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带来的，只要把这两种人消灭光，德国马上就会有工作、有面包、有前途。她听得十分入耳，不由自主地跟那些人一块大干起来。开始打骂犹太人，还觉得心软手不狠，可在战友的带动、督促下，她也就进入了情况。后来，她遇到了一个名叫汉斯·科赫的战友，他是一个极端狂热的纳粹党员，但也没忘记随时向她献殷勤，对她体贴入微。这样，伊尔丝很快就投入他的怀抱，改用他的姓氏，成为科赫夫人。对纳粹党的无比忠诚和对犹太人的异常凶暴，使汉斯的官职一路高升。他先后担任了萨克森豪森、玛伊达奈克和布亨瓦尔特三个主要集中营的首任司令官，军衔晋升为党卫军上校。依照党卫军的惯例，作为一个集中营的司令官，上校已属最高级别的军衔。夫贵妻荣，伊尔丝作为集中营司令官的夫人，也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一名普通女看守逐步荣升为党卫军上尉；而且，在丈夫的言教身传下，伊尔丝在囚犯面前变得越来越狂妄，越来越凶残，越来越丧失人性。随夫到布亨瓦尔特集中营上任不久，伊尔丝就对那里的一种例行公事——“裸体检阅”发生了浓厚兴趣——强令

新来到集中营的囚犯，不论男女老幼一律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地列队从医生面前走过，以便医生们把其中的老弱病残孕等缺乏劳动能力的人挑出来，送到毒气室内处死。这本来只是党卫军医生们的职责，与尚未在营内安排具体职务的司令官夫人毫不相干。可是，当她有一次偶然看到“检阅”的场面时，她顿时感到开心极了。由于许多囚犯或多或少了解“检阅”的含义，他们千方百计谋求过关，而不被医生揪出队列。于是，老头们抬头挺胸，阔步前进；老太太竭力模仿少女的姿势，步履轻盈地往前走；小孩则学着大人的样子，尽量迈开大步，甩开两臂；孕妇装扮起来最为艰难，但也拼命地收腹挺胸，跨步向前。但是，绝大多数囚犯都难逃医生们犀利的眼光，他们照例被拽出队列。可有几个纳粹医生肯饶过他们呢？他们就使出最后的招数：跪在地上求饶，拼命地哭号，倒在路上打滚，力图跑回到队伍中去，接二连三出现惨不忍睹的场面。伊尔丝却看得心花怒放，兴奋得手舞足蹈，还不时提醒医生哪个囚犯在捣鬼作弊，甚至不顾可怜的老妇人百般挣扎，奋力将她们拉出来，再朝她们身上恶狠狠地踢上一脚。翌日，集中营医院一开门，伊尔丝就来找主任医官：“我搞过医务工作，给病人检查过身体，所以我有资格参加裸体检阅，就像你们医生一样。”“那当然太好了”，主任医官一口答应。何必不通过这个顺水人情取悦司令官呢？从此，参加检阅的行列中，就增加了一位业余女医生。“夫人，您一加入我们的行列，这帮贱货就难逃法网了。”主任医官不失时机地恭维道，而夫人也越干越带劲。有一次，一个比较强健的荷兰犹太孕妇，出于求生的本能，同强拉她出列的司令官夫人较起劲来，不小心踩了她的脚。这下子冒犯了雌老虎的威严，她立即叫来几个粗壮的男看守，狠命地用皮鞭抽打她。还不解气，又把孕妇绑在树上，踢她的肚子，用大棒猛敲，用木条戳入阴道，连夫人自己也累得出汗。最后的成果是，鲜血遍地流淌，孕妇和即将问世的胎儿都死了。

在布亨瓦尔特集中营，资格老一些的囚犯都知道伊尔丝的诨号：“布亨瓦尔特的娼妇”。只要司令官大人三天不在营里，她便会不顾一切地寻找情人，而丝毫不顾忌司令官夫人的尊贵身份。警卫该集中营的

党卫军部队中，第三班的官兵大部分是年轻的靓仔，因而经常接到司令官夫人的宴请。当然，都是在司令官大人不在家的时候。这十三四个小伙子，不但可以尽情地醉醇醴饫肥鲜，而且还可以一个接一个地上床，同这位风情不减当年的丰满美人共度良宵。如果碰到第三班值勤、无法前来伺候的时候，司令官夫人就会找一批囚犯中的潘安、宋玉来过瘾。她仅仅戴着乳罩，便同小伙子们搂抱在一起跳舞。每当性欲达到高潮时，她还要揭开乳罩，让小伙子尽情地抚摩她的丰乳，直至投入他的怀抱。不过，你也别以为这帮小伙子占尽了便宜。一旦某个小伙子的某一个动作不那么利索，使她略感不适；或是哪一句话与自己的囚犯身份不太相符，她那无名怒火就会火山般地迸发，你就要倒了十八辈子血霉。那时，她就会像那些交配过后格外凶猛、反噬老公的雌螳螂、雌蜘蛛一样，用手指直戳半分钟之前还如胶似漆的性伙伴的脑门，指责他“怀着淫荡的眼光看她，动手动脚，千方百计地企图强奸”，或者“肆行暴力、野蛮地奸淫她”。然后，她会怒冲冲地宣布：“你休想占便宜，我要你百倍地偿还，要你的小命。”随后便毫不留情地命令手下割掉这位倒霉蛋的性器官，再将他乱棒打死。眼看着几分钟以前的情人像杀猪般地号叫，痛得在地上翻滚，她的脸上才再一次显露出笑容。

其实，在伊尔丝的罪行中，这还只是小菜，大头还在后面。半年以后，科赫夫人又发现了“新大陆”。在一次检阅中，她不解地看到医院病理部的卡尔·艾利希医生，竟挑选出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但是并没有送他们进毒气室，而是和颜悦色地把他们带进自己的诊室。一连几次，艾利希医生如法炮制。这些小伙子是些什么人，他们究竟到哪里去了？伊尔丝问了好几个医生，可他们也不清楚。去问艾利希本人，他却支支吾吾不肯讲。夫人再也憋不住了，她冲进艾利希的办公室，厉声质问道：“你是不是把那些小伙子私自放走了，我要告诉汉斯严厉查办你。”“您误会了，他们绝对跑不出集中营。”“我问的是他们到底在哪里，你不要躲躲闪闪”。夫人的嗓门越来越高，步步紧逼。艾利希医生万般无奈，不能不向司令官的夫人交底：“别着急，他们在这儿”，他带领夫人走进一间暗室的门，一股福尔马林的气息扑鼻而来。昨天抵达

集中营的三个法国小伙子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不过，他们已经变成了尸体。“你杀死了他们？”夫人不解地问。“不是杀死，而是解脱。为了艺术，我给他们注射了一种毫无痛苦就可以长眠不醒的药剂。”“为了艺术？”夫人更加困惑不解。“您没有注意吗，他们背上的皮，已经被我剥了下来，上面都刺上了精美的花纹。您想，如果让他们去干重活儿，皮肤就会变得又干又皱，完全失去弹性和光泽，其艺术价值不就丧失殆尽了吗？”“这么说，你带走的那些小伙子都是有艺术价值的，这里面学问还挺深。这样吧，我跟你学这门技术，要不给你打下手，这总行吧？”此后，夫人按照艾利希的嘱咐，穿上白大褂，挂上听诊器，语调尽量变得温和，以取得受害者的配合。好不容易等待猎物又一次出现了，远不是每次检阅都能发现文身的男女。一看见艾利希又一次带走了5个男青年，伊尔丝就情不自禁地跟了过去。可低头一看，自己还是一身党卫军制服，科赫夫人只得回去换装。她对着镜子照了半天，直到确信自己像个医生，才来到艾利希的诊室。这时候，小伙子们刚刚洗了澡，正光着身子接受艾利希的体检，看到来了一位女士，顿时感到很不自然。“不要紧，这位是科赫医生，也是来护理你们的。”“你们好，”科赫夫人尽量热情地同“猎物们”打招呼，“最近集中营里流行瘟疫，有必要给你们打预防针。”面对美貌、温存的女医生，小伙子们很快消除了戒心。艾利希拿起注射器，科赫夫人用蘸上酒精的棉棒轻轻涂抹他们的手臂。“玛格丽特，”夫人喊来一名党卫军女护士，“注射后，他们会感到疲倦，你把他们一个个搀扶进休息室。”半小时过去了，艾利希已开始剥小伙子的皮。“剥皮要尽快进行，当他们还有体温、心脏还在微跳时就要开始；身体一旦僵硬后，不但皮不好剥，皮的质量也会下降……注射的时候，剂量必须适中，小了，猎物会挣扎，必然对皮肤有损；大了，皮肤又要发青，价值就要贬低。注射的针眼要尽可能地小些，尽量扩大可利用的皮面。有时你可能遇到质量极其上乘的皮肤，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在哪个部位扎针，都会造成浪费。”他略做停顿，“最佳的办法是，注射的部位改在龟头上面。哎，失礼了，但这是学问的真谛。”“哪里的事，您把真功夫传授给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

您”，伊尔丝笑得满脸放光，她一边侧耳恭听，一边力图一字不落地记在本上。晚上，科赫夫人反复玩味着艾利希送给她的一块方方整整的有如一本杂志大小的人皮，上面刺着一艘扬帆待发、驶向大海的帆船。她小心翼翼地把它缝制成一个票夹。然后经过反复思考，又用别针工工整整地刺上两个名字：汉斯，格丽特尔。格丽特尔，这是小时候父母对自己的昵称，也是当年热恋时，汉斯亲吻她时对她的爱称。她无疑希望，自己和夫君的前程就像那艘帆船一样。

科赫夫人对艺术的追求永无止境。从理论上，她算是掌握了这门技术。可重要的是实际操作，准确地把握注射的火候。想到这里，她又有些着急，这个艾利希，他真的让我打起下手来了。要知道，注射之前给病人涂酒精杀菌，只是护士的入门功夫，他却让我干了十多天，没完没了。哼，我非要亲自试试手。终于，又一批猎物走进了“屠宰场”。他们共有4个人。当玛格丽特搀扶走第三个猎物后，科赫夫人突然说艾利希医生太累了，不由分说接过了注射针，心中说道：有什么了不起，老娘十年前就给几百个病人打过针，这还会有多大难度？她于是又当护士，又当医生。可是，意想不到的事出现了。挨了一针的青年，没有平静地随护士去休息室，而是心慌、流汗，呼吸急促，走路脚发软，一屁股径自坐到诊室的圈椅上，再也站立不起来。一会儿，身上就显出一块块青斑。“这是怎么回事？”夫人慌了。玛格丽特也吓了一跳，“幸亏那三个人都离开了，要不就露馅了”。只有艾利希神色依旧，他不慌不忙地说，“夫人，这不是注射盘尼西林，你推进的速度太快了，人的心脏承受不了。火候还不到家呀”。伊尔丝只得又硬着头皮继续充当拿棉签、涂酒精的角色。她观察得更为细致入微，晚上还常常模仿注射的力度与角度，甚至要夫君汉斯充当她的病人。“你真是走火入魔了。”“为了艺术，要肯于吃苦，舍得流汗。”最令她洋洋得意的是，一次艾利希医生醉酒后同她跳舞时，竟吐露了那种“使人毫无痛苦地长眠不醒”的神秘针剂的配方，而艾利希本来打算要到希姆莱挂帅的全国遗传研究基金会申请专利的。这分明是天公助我，另起炉灶、独撑门庭的日子已为期不远。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伊尔丝在汉斯已准备销毁的党卫军



内部通讯上发现一则简讯。设在德国慕尼黑郊区的达豪集中营新设了皮肤病研究所，它将向有关部门批量提供新鲜的人皮。伊尔丝兴奋得热血沸腾，她再三缠着丈夫，带自己去达豪取经。她终于作为贵宾出现在皮肤病研究所所长安德雷阿的接待室里。“我们称猎物为水貂，它们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向人类贡献自己的皮，这不是很形象吗？哈哈……我们所饲养的水貂几乎全是女的，不过，青年男子的皮有时也不比女人差。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比其他入皮生产基地更深入。比如，不能急于求成，你要得到高质量的人皮，就必须先喂饱她们，而且不能让她们忧愁和害怕。这样，皮肤才会有很强的光泽，好像自身在发光，不要吝惜成本。另一个要点是，要得到上乘的人皮，就不能过分抑制人的生理机能。青年男女做爱时的刺激和运动，会导致肾上腺等激素的加倍产生，这些激素能够提高皮肤的透明度，使双方的皮肤更加明亮透彻。青年男女如果几个月得不到做爱的机会，激素的分泌就会扭曲失调，皮肤也会早衰，变得干燥粗糙。所以，我们尽量为水貂们提供同集中营里的青年官兵取乐的机会，只不过要适可而止，一般也就是让她们痛快一个多月。一旦出现怀孕的征兆就麻烦了，马上就得给她们过电，即使一断气立刻剥皮，质量也要降等。至于青年男性的皮肤，也适用于上述道理。”伊尔丝觉得自己真是三生有幸，得以聆听大师的教诲，这下子自己的本领可就凌驾于艾利希医生之上了。为了酬谢艾利希对自己妻子的教诲，更重要的是满足妻子垄断本集中营的人皮艺术制造，汉斯·科赫司令官下令提升艾利希医生为集中营医院的二把手，分管人体试验的副主任医官。伊尔丝踌躇满志，她很快在起居的5号楼内建立了自己的诊室。现在，是她本人而不再是艾利希，掌握那些有文身的青年男女的命运了。伊尔丝依旧每天参加检阅，但她关注的焦点已不再是那些企图蒙混过关的老太婆和孕妇，而是身上刺有精美图案的青年男女。当然，猎物不会每批都有，失望也是常有的事。如果一连几天空手而归，科赫夫人就会脾气火暴，随时迁怒于其他犯人。她看到一个五六岁的犹太小男孩，哭闹着大喊大叫，死活不肯出列，便气不打一处来。她找来一根粗实的马鞭，抡圆了狠命地向孩子头上抽下去。孩子狂叫一声，连吓带

痛，晕厥在地上。科赫夫人又狠狠朝他身上猛踢一脚，吩咐身边的看守说“谁也不准放掉他，苏醒过来再打，要他的小命”。机会终于来了，一批法军战俘从德法边界的战俘营转到了布亨瓦尔特。他们当中有一些来自普罗旺斯省山区，那里许多男子都有在身上刺花纹的习惯。在检阅中，身上带花纹的8个人被纳粹医生命令出列，“到5号楼检查身体，”随即由两个持枪的党卫军看守把他们押走了。终点是一幢乳白色的2层小楼，处在绿树掩映之中，它的斜侧面40米处，另有一幢外表简易得多的2层楼——6号楼。楼前的花坛鲜花盛开，发出一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正对楼门处有一座很大的水池，一股股水柱不时高高喷起，落下后又形成一片片洁白的水花。红色的小鱼在水中漫游，无忧无虑。被关在铁闷子车厢达两天之久的法国战俘，被眼前的美景所陶醉，尽情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不知他们可曾想到，死神已经向他们步步逼近。“你们好哇，小伙子们。”一声甜蜜的女高音从背后传来，一位身穿白色长衫的年轻女医生悄然出现。“德国女人，可倒不像那些女看守，满脸杀气”，“模样还蛮标致呢”，小伙子们低声议论。“是这样，我是科赫医生，是专门护理你们的。”女医生亲热地讲起法语。她并不在乎这群一丝不挂的异性，只带着一个女护士，就大步走进他们中间，“首先去洗澡，然后换衣服，吃午饭，接下来，我为你们每个人检查一下健康情况”。女医生的声音还是那样温和，青年们不能不照她的要求办。体检的结果如下：5个小伙子健康尚可，一会儿就可以打预防针，办入营手续；3个最英俊、皮肤也最光滑白皙的小伙子因为比较消瘦，需要疗养一段时间。女医生和玛格丽特护士带着前者去打针，另一位护士把后者引向6号楼。夜已深了，四下万籁无声，只有科赫夫人还在手术室内忙着做手术，确切地说，是在剥那些下午还好端端的5个法国青年的皮。这毕竟是自己头一次辛勤劳动的结晶啊，难怪她是如此地投入，夜以继日，不知疲倦。至于另外3个小伙子呢？科赫夫人要运用新近从安德雷阿所长那里学到的新思路解决他们：先要养肥他们，让他们欢乐一场，再把他们收拾掉，以求获取上乘的人皮。昂德雷、吕西安、雅克被安置在不同楼层各自的房间内，护士会按时送来可口的佳肴，可以看画报，

可以听电唱机，也可以到门外的小院子里散散步，但禁止互相来往。反正比在战俘营当牛做马强多了，就听凭女医生安排吧。一个多月后，他们的身体完全复原，红光满面。女医生又出现了，是来检查身体的。什么医疗器械也不用了，她只凭两只手和一双眼睛。她的一双光滑柔嫩的手，不停地在三个人身上摸来抚去，从脸颊摸到小腹，从后背摸到小腿，弄得小伙子很是不好意思。“没关系，我是医生，又是你的姐姐，这有什么？”她一边抚摩，一边若有所思，有时还在小本上记些什么。一周后，雅克被护士叫走去打针，从此没有再回来；半个月后，昂德雷的房间也丢失了主人。“他们也不打个招呼，说走就走”，6号楼内只剩下吕西安孤身一人。一天夜里，司令官的汽车没有回家，女医生的诊室兼居室5号楼一片漆黑。吕西安从玻璃窗发现，女医生从小楼内走出来，她在向自己的房间走来。“难道晚上还要体检？”他有些不解。此时，科赫夫人已推门而入，一下子抓住他的手，她的声音有些激动，“雅克和昂德雷已经回法国去了，我只剩下你一个人了。我真是太想他们了。”声音带着无限的无奈和凄凉，像是在怀念自己的亲人。吕西安对她已不怀戒心，反倒来安慰她。“再让我给你检查一遍身体吧，我只有如此才能表达自己对你的……”她此时脸上泛起红晕，神情倒像一个初恋的少女。夜深以后，科赫夫人并没有离去，她利用即将被处理的牺牲品来满足自己的淫欲。经过反复的体检，科赫夫人终于发现，在她手心中，就存在一个安德雷阿所长所形容的最佳质量的皮肤，它就长在吕西安的躯体上。一夜，两夜，整整三夜云雨交欢。伊尔丝感到，他的性机能已经得到充分满足，明天该是取皮的最佳日期。况且，汉斯也该回家了。明天，对，就是明天。受检阅的囚犯大队刚一走出医生们的视野，科赫夫人几乎一溜小跑来到吕西安的住地。她面带眼泪，呜咽着说：“明天，他们要送你回法国，我可怎么办呀，真是又高兴又伤心……我送你到威玛，不，斯特拉丝堡，可千万别忘记我，你的德国姐姐……”看着吕西安满脸愁容，难舍难分的样子，科赫夫人知道自己的演出成功了，于是趁热打铁地说道：“我还要最后为你服务一次，给你打一针壮阳针。我期待早早有一天，一位像鲜花那样美的法国姑娘坐

在你身旁，接替我来照料你。”吕西安顺从地伸出左臂，“不，不在这个部位”，“那么在臀部？”“也不是，我不忍心在心爱的人皮上流下一个针孔，哪怕只有一个。”“你说该怎么办，听你的。”“要选择一个隐秘的部位，最好是在两腿之间的那根磁棒上”，她越发神秘兮兮。“你该是开玩笑吧，那会很痛的。”“我当然知道会有些痛，但你不愿意我们在一起时更欢乐、更美满、更尽兴吗？汉斯明天就要回来，我们同床享乐的日子只有今宵一次了。”她从后面搂住吕西安的双肩，把脸贴在小伙子的头上，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哎，也难怪你，法国少年怎么能了解我们德国女人对恋人那颗炽热的心。在古代日耳曼，每逢一个姑娘同情郎吻别，她就会取下头上的别针，在爱人的那个地方轻轻刺一下。这样，她每天都会梦见依偎在情人的怀抱中。另外，我会怀着最炽热的爱心，选最细的针头，用最轻盈的动作……我能忍心让你遭受痛苦吗？”深受感动的吕西安，激情地吻了一下情深意长的德国姐姐，随即顺从地躺在手术台上，听任科赫夫人进行寓意深远的注射。科赫夫人则强行抑制住内心的狂喜，为自己巧妙的长篇大论的超级谎话而赞叹。针头并没有轻轻刺进去，而是一下子刺进很深。“痛！”吕西安禁不住喊起来。“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好。”注射伴随着吕西安额上滴下的颗颗汗珠终告结束。注射器一放下，科赫夫人接着就给吕西安周身按摩，怕的是他痛得四下挣扎，损坏了皮质。小伙子还没有完全断气，女医生已开始切割开他的皮。她还喃喃地说“亲爱的，你放心，我绝不把你的皮送礼，绝不送给任何人，永远留在自己枕头旁边”。此后，科赫夫人至少又给上百个小伙子“检查身体、做手术”，其中像吕西安这样的上乘货色就有十来个。他们的皮制成了不计其数的工艺品，仅仅美军接管布亨瓦尔特集中营时，就发现了两大箩筐。

公诉人刚刚宣读完伊尔丝的罪恶案情，旁听席上已是一片沸腾，“绞死人皮夫人”，“打死这条毒蛇”，口号声此起彼伏。但是，当时已是1947年，美国占领当局已经不再对纳粹战犯满怀仇恨，他们更害怕布尔什维克在欧洲崛起。因而，纳粹战犯往往倒成了可借助力量。法庭匆匆结案，判她终身监禁。在狱中，伊尔丝并不思悔过。她觉得应当

趁着尚未人老珠黄之时，充分利用自己的美貌，或许可以早日出狱。她对看押她的美军少尉频频出击，像当年勾引吕西安那般使出浑身解数，终于把他拉下水，并同少尉生下私生子乌伟。接着，她便借哺乳之机要求美国占领当局实行减刑。驻德美军总司令克莱将军也实在大慈大悲，竟批准将她改判无罪释放。不过，克莱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一个抗议美国占领当局包庇纳粹战犯的浪潮顿时波及全欧，克莱将军释放“人皮夫人”成为千夫所指的话题。无奈之下，美国军管当局只得将“人皮夫人”重新收监，维持终身监禁的判决。这一回，“人皮夫人”可真是无计可施了，一天天茶饭无心，听任脸上皱纹徒增。进入20世纪60年代，一个追捕纳粹逃犯的高潮在全球兴起，大屠杀的主要刽子手艾希曼，纵有三头六臂也难免落入法网。杀人医生门格尔在正义力量缉捕下，有如没头苍蝇，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伊尔丝闻知，实感万箭穿心，精神支柱开始崩溃，一心只求早早同15年前死去的夫君在阴曹地府相聚。一个秋雨连绵之夜，她写完给乌伟和其他子女的遗书，悄悄地用皮带做成一个绞索悬在房梁之上，又搬来凳子，站在上面。人到死时真想活，她几次把脖子伸近绞索，又不甘心钻出来。忽然，她眼前一亮，仿佛出现了数百个身刺花纹的小伙子。他们揪她的头发，朝她脸上啐吐沫，骂她是“阴险狠毒的荡妇”，“杀人不见血的恶魔”，并向她索命。太可怕了，她不得不再次钻入绞索中，极不情愿地用力蹬倒了凳子。此时是1961年9月7日后半夜。

#### 第四节 索菲·艾哈德——以给儿童绝育 为科研目标

算来，索菲·艾哈德真够幸运的。尽管战后美国人严厉地盘问过她，西德司法部门多次找她核实情况，法院也传讯过她，但最终谁也没有把她怎样。她在“二战”前的所具备的医学知识不过相当于一个护士的水平，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她于1983年荣获图宾根大学人类学教授的桂冠。这可能同她的美貌有关，当年，在纳粹德国从事“种

族卫生”研究的女医务人员中，她也算得上是一个美女。然而，年龄越大，她也越容易感到寂寞和孤独，甚至可以说有些胆怯不安，尤其是当她一个人在夜里度过的时候。她总是影影绰绰地感到，有一群吉卜赛儿童跟在她身后，有时低声哭泣，有时指着她的背愤恨地说些什么；她走到哪里，这帮孩子就跟到哪里；她加快了脚步，孩子们也一溜小跑跟过来。终于有一天夜里，女儿听到她惊恐地大喊一声，待赶到她身旁，只听她说：“吉卜赛小孩又来了，真可怕。”说罢，竟溘然长逝。经过多年的困惑不解，女儿无意中在一本《对儿童的战争》，发现了自己母亲的名字，不过她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她和一个男医生、一个女护士，被描写成利用吉卜赛儿童做不人道的人体试验并对他们实施强制绝育的凶犯。

纳粹执政时期，希姆莱领导的人类遗传研究基金会内，有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小组——罗伯特·里特教授领导下的吉卜赛人（苏联和巴尔干地区称之为茨冈人）生理和心理研究组。他有两个聪明能干而又不知疲倦的女助手——爱娃·尤丝丁和索菲·艾哈德。鉴于他们的研究宗旨是用科学的数据和事实证明吉卜赛人种族上的缺陷和劣根性，证明这一种族集团对欧洲各民族特别是对雅利安人的极度危害性，他们的研究受到希姆莱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的研究小组被升格为帝国卫生部办公厅下属的一个研究站，他们的研究也受到获得遗传研究基金会和政府更多的资金支持。持有党卫军帝国最高司令官的授权证明，他们在大德意志帝国境内畅行无阻，帝国的各个大区负责人，吉卜赛人隔离居住区的党卫军头目，集中营的司令官，有关医疗机构的主任，无不把他们视为贵客，全力予以支持。他们进入吉卜赛人的家中，可以提包罗万象的问题，包括被视为绝对个人隐私的夫妻性关系问题，毫不顾及对方的尊严，而被询问者却必须一五一十地如实回答，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处；他们有权把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吉卜赛居民甚至儿童强拉去住院、进观察室或健康检查，甚至强行对学龄前幼女进行妇科检查。不仅吉卜赛居民必须遵命，就是集中营的司令官也要满足其科研需要，必要时也可以暂不处决有研究价值的囚犯。里特小组的研究是纳粹当局

实施歧视、迫害和灭迹吉卜赛人政策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其研究成果同时为帝国侦查组织办公厅和中央保安总局办公厅所借鉴。里特小组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绘制全部吉卜赛人的世系表，追寻吉卜赛人家庭成员的去向，吉卜赛人与外族的通婚情况，他们的健康状况、教育状况、犯罪记录和社会适应能力，等等。里特小组的最后结论是，吉卜赛人作为一个种族，是堕落的、具有犯罪倾向的和反社会的，而且这些特性均为遗传性的。他们将与异族通婚的吉卜赛人的后代定性为反社会分子，又将现存吉卜赛人的90%界定为非纯种吉卜赛人。正是基于里特小组的研究成果，纳粹当局出台了将吉卜赛人强行关入隔离区、集中营或驱逐出境的政策。肯定同三人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有关，纳粹德国和党卫军对吉卜赛人的印象更加恶劣，既然从历史、文化、教育、心理，特别是从种族和生理方面都是不可改造的社会害虫，留下他们只能是祸害。从1943年年底起，各个集中营中吉卜赛人的地位急剧下降，基本上已同犹太人持平。1944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利勃亨舍尔、政治部主任格拉布纳以及比克瑙分营医生门格尔策划下，该分营中已存在多年的吉卜赛家庭营被解散，所有成员，不分男女老少，统统被赶进正在积极发挥作用的8个大型毒气室内，尸体也在几天内化作一阵阵难以消解的黑色浓烟。在奥斯维辛，在其他大中型集中营，总共50万吉卜赛人被残酷地杀害了，大部分被毒死，一部分被注射进致命的药剂，还有一部分死于各种各样的医学试验。在这股吞噬生命的恶浪中，当年的美貌小姐索菲·艾哈德和爱娃·尤丝丁发挥着别人无法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索菲·艾哈德的工作是繁忙的，有时是超负荷的。她往往要既当医生又做护士还兼任化验员。检查身体、做脊椎穿刺、拍X光透视片，是医生的工作；抽血、注射、灌肠、洗胃、量体温，当然是护士的职责；化验吉卜赛人的血、尿、粪便甚至孕妇的羊水，又分明是化验员的业务。此外，还得给那些愚昧无知、散漫、任性的吉卜赛儿童安排食谱，拟定他们的疗养、体检日程，这又像幼儿教师的任务。依照她的眼光，这些孩子真是不堪造就，什么新事物也不懂，不听话，也不讲卫

生。对他们只有一种办法：打，耳光不够，还要用竹鞭，罚站，不给饭吃，终于把小孩子们制伏了。为了研究的目的，她辛辛苦苦地收集吉卜赛人的各种物质，拔他们的头发，拔他们的牙齿，切除他们的阑尾，摘除男童的睾丸和阻塞女孩的输卵管。穿刺提取脊髓，也是一项高难度的手术。依照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医疗规定，非专业医生无权做这项手术。可是，里特教授鼓励她大胆实践，不失败几次怎能成功。反正那些吉卜赛人、吉卜赛儿童都是劣等种族，死上几个根本不算什么。这样，女医生艾哈德果然不再手软，她不顾儿童们的大声哭叫，把手术针死劲捅进去，拉大吸管用力抽。真的有几个小孩被她“抽”死了，还有几个手术后，直不起腰来。对他们该怎么办，里特说得很干脆：“再往他们心脏上补上一针就行了，送这些废料回老家。”一般情况下，对吉卜赛儿童的使用期为三四个月，至多半年。一旦他们被彻底地检查了身体，他们体内的万般机密被纳粹医生掌握之后，他们立时就变得一文不值。算起来，这已是艾哈德接待的第15批吉卜赛儿童了。“里特教授，明天可以把他们送给比克瑙了，所有的项目都测试过了。”“不，你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项目没进行，他们都被净身了吗？”“这倒还没有，可您并没有交代我们呀。”“你呀，小索菲，难道连这一点也要我一说再说吗？”里特教授有些激动，“我们是帝国站在最前线的种族战士，肩负着那么神圣的使命，绝不能出现半点疏漏。你不给他们净身，万一他们活着逃离了集中营，就要继续繁衍罪恶的后代，帝国的种族纯洁就一日无法实现，这不是我们的失职吗？”“明白了，教授，我们错了。”索菲满脸通红。“知错就好，尽快动手吧。”“我们下午就干。”两个女医生，也许应该说是女魔，来到孩子们的住所。“孩子们，你们两三天以后就可以回比克瑙，同爸爸妈妈见面了。”索菲高兴地向孩子们喊道，看到孩子们显出笑脸，她又加上一句：“为了你们的健康，还要给每个人做一次彻底的消毒，你们吉卜赛人身体里存在有害物体，既害自己，也害别人。我们总不能让你们带着污物回家。女孩们先治疗，基本上不痛；男孩子明天再治疗，有一点痛，可你们更勇敢呀。”艾哈德和尤丝丁在准备手术。“爱娃，我们使用哪一种绝育方法？老办法，还是你那次开



会回来说的什么克劳贝格法、舒曼医生法？”没等尤丝丁回答，里特就抢答了：“当然是克劳贝格法，它只需要几根粗长的注射器，福尔马林溶液和贝母粉。要是用舒曼的方法，不知要花多少钱，相当于给每个人拍几十张X光透视。这些小丫头本身才值几个钱？老办法也不好，还要动刀，时间上也不允许。就这么定了。”“可我们谁也没有使用过克劳贝格法呀。”尤丝丁面带难色。“怕什么，谁以前也没做过，大胆做就是了。就是死了人，我也不骂你们一个字。”“把衣服脱光，躺在手术台上。”艾哈德吩咐第一个被传进来的女孩。为了证明自己不乏勇气，从未进行过宫内手术的艾哈德首先操起针头长长的注射器。由于不知晓输卵管的确切位置，长针一刺入不久就刺破了宫颈好几处。女孩哭叫起来，血也开始流出。“不要紧，一两分钟以后就好了”，艾哈德赶忙安慰女孩。可是，一刻钟过去了，她依然未能往输卵管内注射药剂。女孩已经痛得无法忍耐，她大声喊道：“医生，我不治疗啦，实在太痛。求求你啦，艾哈德阿姨。要是我把什么病带回家，让妈妈打我好了。”“不行”，艾哈德一点不肯通融。“让我来吧”，尤丝丁把注射器接了过来，她当护士的经历到底比索菲长些。又忙碌了老半天，注射终于完成了。女孩已经晕厥过去，索菲和爱娃也忙得满头大汗，雪白的工作服上沾上一片片血迹。候诊室里的18个女孩早已惊骇得浑身发抖，脸色煞白，两腿打战，无论如何也不肯再走进手术室。尤丝丁和艾哈德只好一个接一个往里拖，再由里特死死按住她们的身体，强行把长针刺到底。只是由于研究所的其他医务人员帮忙，研究小组才算给19个女孩做完了手术，基本成功而未招致急剧苦痛的只有最后的3例。给男孩切除时，医生们学得聪明了，把他们的手脚捆绑起来，不怕他们挣扎。“小伙子们，你们都很勇敢，又很坚强，我就不用麻醉剂了，好吗？”艾哈德狞笑着说。她拿起手术刀，一下切开阴囊，摘除了他们的睾丸。十几岁的几个男孩还能强忍住，钻心的剧痛引起浑身流汗。而那个六七岁的男孩，在一阵阵哭叫后突然止住，他死了。当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勉强走路后，艾哈德和尤丝丁乘着一辆大汽车把他们送回比克瑙分营的吉卜赛家庭营，交到那里负责的纳粹医生门格尔手中。见到年轻漂亮的小

姐，门格尔照例要献一番殷勤，冲了咖啡，又冲红茶，还拿出几个在波兰此时很难见到的香橙。两位小姐早知道此君是一个有名的色迷，不想跟他多纠缠，于是就开门见山：“门格尔先生，这些吉卜赛儿童我们已经研究过了，现在奉命转交给你。遗憾的是，一个男孩在手术中死亡。抱歉。”公关经验比较丰富、相貌也稍逊一筹的尤丝丁，站到了艾哈德的前面，不让门格尔再三再四地打量艾哈德，只打算谈完公事就走。“这么说他们已经毫无价值了，你们今后不会再使用他们啦？”“是的。”两个小姐告辞。“约翰内斯，”门格尔喊来一个党卫军看守，“明天焚尸场一开门，你就把这39个孩子全都送进毒气室，一个不留。今天太晚了，便宜他们了。”

### 第五节 赫尔米娜·瑞恩·布隆施特奈尔 ——虐待和杀人狂

1979年，在杜塞尔多夫市高等法院，一场针对前纳粹玛伊达奈克集中营看守、纳粹医生的审判正在进行。被告席上站着一位身材高大、强健的妇女。她，身高1.75米以上，金发披肩，身材适度，面色红润，长眉大眼，鼻梁高挺，朱色双唇；如果不是精神沮丧，不是言语有气无力，或者长时间的缄默不语，人们很难把她与纳粹战犯联系到一起。她看上去也就四十四五岁，实际上已然整60岁了。起诉书上写着她出生于1919年。她的大名是赫尔米娜·瑞恩·布隆施特奈尔。提起这个名字，年轻人可能全无概念，但是读过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一本畅销小说《巴西来的孩子》的人，很可能对书中那位刺穿女孩、扼杀婴儿的纳粹集中营女看守弗丽德·玛隆奈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其实，前者正是后者的生活原型，只不过瑞恩·布隆施特奈尔的罪恶比书中提及的更多、更重，被她折磨、杀害的人，不是几个，而是两三千。

布隆施特奈尔于1919年7月16日生在维也纳，家境一般。历史往往好同人们大开玩笑。赫尔米娜本打算当一名救死扶伤的护士，但是在遍及全国的纳粹主义褐色潮流中，她不到20岁就接受了纳粹主义，并

很快成为一名狂热打手。为了培养她当一名集中营女看守，上级选送她到拉芬斯布吕克接受培训。结业后，她先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女囚营当看守，一年左右又被调到玛伊达奈克集中营女囚营，开始任舍长，以后因忠于职守，升任女囚营副看守长。她拷打女囚之凶狠，在整个集中营里是有名的。对一般的小过失，别的女看守也只不过抽打几鞭子；被她抓住，则非要抽打几十下，不打得皮开肉绽，是断断不会善罢甘休的，以求“好好教训她，让她10年不敢再犯”。除了毒打，她还有许多其他折磨人的花招：比如，在严寒的冬夜，她会逼迫有过失的女囚在室外罚站，一站就是一整夜，第二天还必须照常干活。女囚要是犯了重一点的过错，让她遇到就有丧命的危险， she 会把女囚捆绑在树上，然后往身上大泼冷水，囚犯们称为“穿珍珠汗衫”。十有八九，女囚的结局是活活冻死。对于犹太女囚中的孕妇，她不仅丝毫不照顾，还要千方百计挑毛病，打得她们乱滚乱爬，她自己则在大笑声中扬长而去。“这些其实还都是小菜，”战后一个当年的女囚愤怒地控诉，“更恶毒的是，布隆施特奈尔经常大批挑选精疲力竭的女囚赶进毒气室处死，一年中她就挑选了1700多人。”女囚们不知晓的是，布隆施特奈尔还犯下更不可饶恕的罪恶，她和集中营司令官利勃亨舍尔、女囚营看守长爱尔萨·艾利希一同策划了1943年11月3日对1.8万名犹太囚犯的大屠杀，创造了纳粹分子一日内杀人的吉尼斯纪录。1944年夏，玛伊达奈克集中营因苏军迫近而西撤后，布隆施特奈尔继续在奥斯维辛和德国国内的集中营为非作歹，丝毫不曾收敛。

“二战”结束，布隆施特奈尔回到家乡维也纳潜藏。尽管乡亲们曾看到她穿着党卫军制服回家，但不知她的罪恶底细。同时，奥地利又存在一股同情、姑息甚至庇护纳粹战犯的风气，因而她得以安然地过日子。虽则盟国的调查人员也曾对她严加询问，也曾关押过她八九个月，不过均因证据不足而不能不还她自由。不过，布隆施特奈尔的日子也不大好过；她在集中营任职期间，因为已进入领导层，尽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但如今，一切都得自食其力。劳顿多年，几经波折，她才找到一个稳定的职位——在一家旅馆当洗衣女工。这一行每天要干十来个小

时，收入也不算高；有时顾客太多了还要兼干女招待的活儿。但她靠着身强力壮和眼里有活，居然在不长时间内进入角色。干着干着，她的好运来了。这天天气炎热，到餐厅里喝啤酒、吃小菜的顾客特别多，原有的十二三个女招待已是难以招架。“赫尔米娜，你去餐厅帮帮忙吧。”老板吩咐道。“小姐，要两瓶啤酒，一根匈牙利萨拉米肠。”一位30多岁的美军上士喊道。赫尔米娜见是一位占领军的士官，忙不迭端上来，毕恭毕敬地放到桌上。“您还需要点什么？”“唔，唔，待一会再说。”上士盯着小姐，若有所思地说。好不容易忙到餐厅关门时，赫尔米娜准备打扫卫生，却见到还有一位客人仍没有吃完，正是那位上士。上士见小姐完了活，便同她攀谈起来。得知小姐尚属独身，上士不禁眼睛一亮。此后，上士便成了餐厅的常客。有时，在餐厅找不到赫尔米娜，竟跑到洗衣房去找。赫尔米娜也刻意靠在瑞恩——也就是那位美军上士这棵大树上，伺候更加周到，言语格外温存。经过三个月的交往，二人的感情不知不觉已到达谈婚论嫁的地步。“我希望一个能干、温存、稳重的女人同我共度终身，是不是美国人无所谓。我自己吗，脾气好，会尊重妻子的。我是荣誉军人，将在退伍时得到3万多美元的安家费，足够养活两个人。我搞过电器维修，谋职不成问题……剩下的，全看你的了。”上士终于揭了锅，赫尔米娜也含羞地点了点头，随即投入瑞恩怀中。她太高兴了，到了美国，不但生活比维也纳强10倍，而且更不用担心有谁会揭露自己的老底了。1959年，赫尔米娜随退伍的瑞恩回到纽约布鲁克林区，二人很快到教堂结了婚。赫尔米娜·布隆施特奈尔于是堂堂正正地变成赫尔米娜·瑞恩，成了瑞恩夫人。1963年她又堂而皇之地获得了美国国籍。光阴似箭，一晃12年过去了。瑞恩夫人除了当过几年门房和花草修剪工之外，一直是悠闲自得地当家庭主妇。结婚纪念日快到了，瑞恩决定带爱妻到洛杉矶旅游。这天，瑞恩夫人开着车在洛杉矶郊区游荡。由于地理不熟，拐弯时，竟把一位横穿街道的老太太挂倒，幸而伤得不重。瑞恩夫人急忙下车把她扶起，惊慌之中，她下意识地用德语说了声“抱歉，实在对不起”，不料老太太端详了她老半天，竟问道：“夫人，您是奥地利人吧？”“啊，对，对。”瑞恩夫人回答道。

她忽然觉得不妙，忙改口：“您看，我是慌的，我哪里是什么奥地利人，我不过是在奥地利旅居过几年，我从来就是美国人。”老太太鄙夷不屑地笑了笑，满怀自信地走了，不过她记住了瑞恩夫人的汽车号码“ABCDE5558”。瑞恩夫人突然感觉不对劲，心中暗想：这个老太太我好像觉得眼熟。瑞恩夫人的第六感觉其实没错。这个老太太实际上不老，她比瑞恩夫人只大一岁。不过是当了5年集中营囚犯的缘故，她的年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至少大10岁吧。她曾被布隆施特奈尔踢过，抽打过，那年冬天还被她绑在树上穿“珍珠汗衫”。若不是副看守长临时被司令官叫去，姐妹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她救下来，她早就成为冤魂了。很幸运，她活到了战后。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报仇，要抓到那个女魔——布隆施特奈尔，不管她逃到天涯海角。真是苍天有眼，让她找到了仇人。几经挫折，她终于获悉，该车的女主人名叫赫尔米娜·瑞恩，1952年随丈夫从奥地利移居纽约。至于她更打算知悉的，对方只能以“无可奉告”相回答。眼看到了难以深入的地步，但无法忘却的仇恨鼓舞她在荆棘丛生的荒山上探寻一条新路。万般无奈之中，她想到了维森塔尔中心。果然，与纳粹战犯不共戴天的维森塔尔，热情地接待了她，并一口答应帮助她获取证据。几个月之后，老太太被告知，瑞恩夫人原姓布隆施特奈尔，1919年生于维也纳，曾在多个纳粹集中营任职；她还得到一张瑞恩夫人当年身穿党卫军制服的照片。没错，瑞恩夫人就是布隆施特奈尔。她记得千真万确，尽管布隆施特奈尔堪称美女，但她脸部也有一个不易察觉的缺欠，她的嘴略微有点歪，向左歪。而瑞恩夫人脸上同样存在这个小毛病。深夜，她辗转反侧，宿不能寐，挥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就五六万字的举报材料，矛头直指瑞恩夫人——布隆施特奈尔。1971年4月的一天，她把这份满怀激情的材料郑重地呈交美国移民归划局。将近一年之后，心中时常忐忑不安的瑞恩夫人被传唤到美国移民归划局，一位官员郑重向她宣告：鉴于瑞恩夫人隐瞒了其罪恶历史，美国移民归划局决定剥夺她的美国国籍，并将她驱逐出境。美国移民归划局还将同意西德曼海姆地方法院的请求，将瑞恩夫人引渡回西德。听着听着，由于恐惧与绝望，瑞恩夫人一下子晕倒在地板上。

1973年，垂头丧气的瑞恩夫人——布隆施特奈尔，被两名庄严威武的西德法警押解回法兰克福，继而又来到杜塞尔多夫。1980年5月30日，杜塞尔多夫法庭经多年反复核实，确认了赫尔米娜·瑞恩——布隆施特奈尔的战犯身份；以极为严重的反人道罪，判处她终身监禁——这是当时最重的量刑。1996年，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实行大赦，77岁高龄的布隆施特奈尔走出牢门。

1999年4月19日，瑞恩夫人的生命因糖尿病并发症走到了尽头。（照片见 p. 195）

### 第六节 玛丽安娜·裘尔克——专门杀害儿童

在维也纳市郊一个僻静的街道，欢快的家宴正在热烈地进行。3对中年男女频频向母亲敬酒，并一再称赞母亲烹炒的菜肴美味可口。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虽然一头银发，却精神矍铄，满脸红光，时时发出朗朗的笑声。她一会儿亲吻这个孙子的脸，一会儿拉起那个孙女的手，给他们讲故事、猜谜语、唱歌，多次把巧克力塞进孩子们的口中，显得十分慈祥。正在兴头上，几个法警敲门而入。他们严肃地出示了拘传证，带走了老太太，因为她必须对自己50多年前担任儿科医生时的所作所为负责。进入纳粹战犯审理法院，这位名叫玛丽安娜·裘尔克的老太太与数十年不见的老上司和老搭档、现年88岁的海因利希·格罗斯医生不期而遇。还在纳粹时期，两个人都是疯狂的党员，致力于用医学手段消灭元首要求消灭的“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也就是把所有患有精神病的病人以及犹太人（包括儿童）统统杀死。在安斯皮尔斯医院下属的帕维利翁诊所，这两位纳粹医生，伙同一个名叫安娜·卡岑卡的纳粹护士，给700多个被强制来此治疗的儿童注射、灌注、喂服了致命的毒剂，将他们全部杀死。裘尔克自己生了3个孩子，却不允许犹太儿童生存。至于曾给多少个儿童注射了死亡针，她已经记不清了。但她亲口供认，只记得一次她接待了4个犹太小姐弟，10分钟内就给每个人都打了毒针，一个也没有放过，并亲眼看到他们很快倒地而亡。以上场面绝

非杜撰的侦探小说，而是2000年上半年发生在奥地利的事实，这意味着又有两名潜藏很深的纳粹战犯被揭露出来了。1946年，素来以庇护战犯著称的奥地利人民法庭传讯了安斯皮尔斯医院的全体医务人员。由于美军调查人员的介入，人民法庭不得不把明火执仗地宣扬和实施杀害重病儿童的院长恩斯特·伊陵判处死刑，对直接从事死亡注射的注射室护士安娜·卡岑卡判处8年监禁。至于裘尔克和格罗斯，他们平日总是遵循“治疗一个就干掉一个”原则，又从不当着第三者的面对病儿下手；而他俩当年又是亲密难分的“办公室夫妻”，谁也不会揭发对方。这样，他们究竟害死了多少儿童，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清楚，迟迟不好定案。于是，被判刑10年的裘尔克在坐牢2年后即被取保释放。格罗斯也被匆匆结案释放。“回去做什么工作？”裘尔克出狱后深思良久。还干儿科医生吗？难度大了些。自己当年毕竟是戴着杀害病残儿童的罪名入狱的，患者的家长还能相信自己吗？就是自家的表妹，对自己也是将信将疑：“姐姐，听说你给几十个患病的儿童打过毒药针，把他们杀死了？”“人家还说你把男孩子的‘蛋’也给割下来了，你也真够狠的。”“住口，你少听那些胡说八道。”要不是玛丽安娜大吼一声，表妹还不知会问些什么令人难堪的问题。三思而后，她决定经商，开过食品杂货店，也开过鲜花礼品店。就凭这么一个顺理成章的决定，人民法庭竟确认裘尔克能够深刻悔罪，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于是决定不再起诉她。从而，她怡然自得地度过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原以为今生不会再有人纠缠自己过去的老账了，不意在世纪之交还是被送上法庭，当然，就凭她那一头银发，法院就不一定判刑，只需令她在世人面前显现出纳粹战犯的庐山真面目也就足矣了。

### 第七节 玛格蕾特·敦科夫斯基 ——以杀害病人为己任

玛格蕾特·敦科夫斯基生于1911年，与“死亡天使”尤塞夫·门

格尔是同龄人。她一个人就亲手杀死了220多人，比门格尔还要多，足以登上T-4护士的杀人吉尼斯纪录。但她杀人从不使用刀枪，也几乎不使用毒气。她喜好使用地地道道的医疗手段，以注射器、灌肠器和穿刺针做武器。所以，案发后，舆论界用“果酱杀手”一词来称呼玛格蕾特和她的同伙们。

1964年玛格蕾特在法庭受审时，竟一再对自己的杀人罪行进行表白：除去强调自己杀害病人是根据女医生玛蒂尔德的命令执行的以外，还强词夺理地说：“我是带着爱心给他们治疗的，真正让病人实现了无痛死亡……而且，从不强迫病人接受治疗……他们反正注定要被杀死，在我手里安乐死去，总比在集中营里受罪死去或者枪毙强得多。”

从下面两个事例中，人们就可以发现她的一片“爱心”。对于发生在1944年盛夏那个晚上的事，尽管玛格蕾特没有兴致去追忆，但法官还是给她讲述了故事的梗概：那天下午，一辆卡车运来了46个波兰、捷克的青年男女劳工。由于长期过度的劳累，加上营养不良，心情郁闷，他们成了肺结核患者。监督劳工的盖世太保闻知此事，马上按照既定方针，把他们集中起来，送往“定点医院”去接受治疗——也就是秘密处决的委婉说法。这些青年，个个身体瘦弱，有气无力，不断发出阵阵咳嗽声，有些人还咳出团团鲜血。“明天再给他们体检吧”，不知是出于怜悯还是厌恶，值班医生勃德曼不想马上解决他们。可是，当年女护士中的大美人玛格蕾特，却想在此时有所作为，露上一手。当她弄清勃德曼对青年劳工并无特殊感情后，凭借代理护士长的身份，拉上3个T-4护士，又叫上一名经常给护士们帮忙、一心想要当护士的女清洁工，神秘地向她们交代了任务，分发给每个人注射器和已经她精心配制的毒剂。玛格蕾特还特意交代，对这些该死的东西态度一定要和蔼，千万不要引起他们疑心和反感，反正他们只能活几个小时了。说到这里，5个姑娘一起笑出声来。打开注射楼的大门，玛小姐把4个同伙分配到4间注射室，并再三嘱咐，一定要分开给他们打送命针，每次只进一个病人；必须要等她自己把注射完毕的病人送到休息室安排好，才能给下一个注射。她戴上大口罩，来到青年劳工的临时宿舍。“姑娘们，



小伙子们，实在抱歉。你们的病情比较厉害，院长担心耽搁了你们的病，所以叫我们加班，给你们初步治疗一下。时间不长，一个多小时。真不好意思。”一个小伙子打开门，本来一肚子气，可一看到是一位热情、温和的美貌小姐，不由得露出笑容。没等他张口，护士小姐又补充道：你们在别处可能受了不少委屈，但我们医务人员不会这样对待你们。现在去打针，防止病情扩展，明天还要打“点滴”。“再往后呢？”“送你们去疗养院啊。”“你们跟党卫军到底不一样。”小伙子颇有感触。“走吧，早打完针也好早点休息。”女护士关切地说。几乎没费什么事，46个青年男女都顺从地来到注射室。“你们先打针吧，小伙子们，你们总比姑娘更勇敢些吧。”护士长又热情地提出建议。女劳工们于是来到院子里，坐在石凳上候诊。“别着急，护士们要调换针头，防止交叉传染。另外，针剂的多少也必须搞准，多一点都会出危险。”听到护士们如此负责，小伙子们个个流露出长时间不曾表现出的满意神情，他们怎能设想，自己正在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中越陷越深，最后的结局是死亡。而这一切的主谋，就是那个貌似极富爱心的美女蛇。午夜已过，所有的青年男女劳工都已被注射过，他们静静地躺着，再也不会起来了。玛格蕾特手持一个粗大的注射器，她还要“查铺”，给没有断气的再补一针。她把手按在每个人的胸口，要是还有微弱的跳动，就接着继续“治疗”。突然，一个小伙子猛地睁开眼睛，用力抓住护士长的白大褂，使劲往下揪，吓得玛格蕾特大叫一声，急忙朝外跑，注射器也掉在地上。

还有一件事也表明了玛格蕾特的心地是怎样的险恶。那是一次例行的巡视。一走进儿童病室，她就听到护士安卡的呵斥声和一个男孩的哭叫声。原来，安卡奉医生阿奎林的指示，给这个11岁的男孩灌肠，她已经在灌肠液中掺入毒剂。可是男孩好像洞悉了她的阴谋，说什么也不接受治疗。安卡急了，打了他两个耳光，他还是又哭又叫，死活不顺从。“安卡，你走吧”，玛格蕾特沉下脸来。“她就是不好，会把你弄痛，对不对？”她安慰起男孩。“不灌就不灌，阿姨给你讲故事吧。你喜欢听小红帽，还是白雪公主，要不，讲七个小矮人？”讲完一个，接

着又讲了一个，男孩很快就喜欢上了护士长阿姨。“阿姨，其实我不是不勇敢，我就是不喜欢刚才那个阿姨，她就会打人骂人。现在，你给我灌肠吧，我不会再哭喊了。”“真是乖孩子”，玛格蕾特顺势把橡皮管子插入男孩的肛门，调快了阀门，毒液迅即流进他的肠胃，又进入全身血液中。看着男孩的精神越来越萎靡，呼吸急促，脸色变青，她脸上显出得意的神色。确信男孩已经毙命，她这才狞笑着拔出橡皮管子。“又消灭了一个犹太崽子”，她长长舒了一口气。如此处置苏联、东欧各国的患病劳工，“治疗”病儿，她已经记不得准确次数了，五六次总是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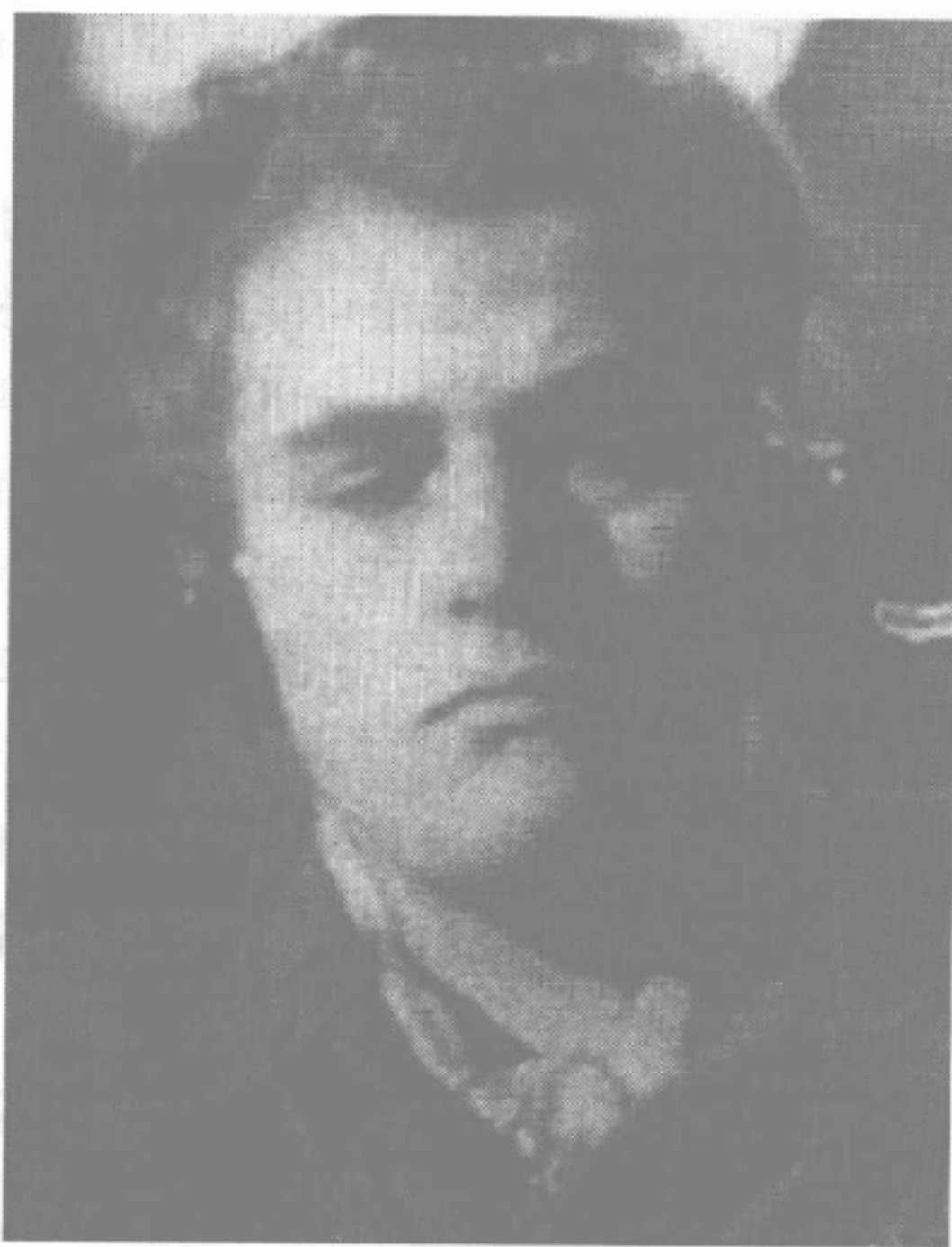
算来该着玛格蕾特福大命大，她的上述“T-4行动”如果在1949年之前被揭露出来，她很可能和她的众多女同行一样——诸如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党卫军护士长伊丽莎白·玛赛尔，贝恩堡处决中心的护士长凯特·哈克巴特等人，走向绞架；然而，现在已是1964年，死刑早已废除了，许多受害者已经死去，人们对战犯的仇恨也不那么强烈。倒是有些人为了已经53岁的玛格蕾特及其62岁的同案犯露易丝·艾哈德等说好话：她们毕竟都是些老太婆了，最年轻的一个年龄也过了45岁，战后也不曾再闹事，况且苦主也大部分不在人世了。恐怕有些法官也同情玛格蕾特一伙，他们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宣判之前结了案，玛格蕾特仅仅被判8年监禁，对其他T-4护士的处罚就更轻。被许多传媒渲染多时的“果酱杀手案”于是即告收场。

### 第八节 玛利亚·门德尔——成批处死女囚

玛利亚·门德尔是奥地利人，生于1912年1月10日，出生在奥地利敏茨奇尔辛一个中等富裕水平的家庭。她本人原来是一名银行职员，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她陷入困境之中。在一位女友的未婚夫指点下，她走上纳粹主义的道路，在1938年“德奥合并”之前，就加入了纳粹党。在奥地利纳粹分子发动的未遂政变中，门德尔扮演了散发传单和运送武器的角色。奥地利纳粹党认为她是勇敢坚定的老党员。

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门德尔作为有培养前途的干部，于1939年5月15日被送到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受训；不久，就担任了女囚营的看守长。1942年10月8日，她与约翰娜·兰格弗里德对调，担任关押女囚人数多得多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比克瑙女囚营看守长。从此，女囚们的大灾难临头了。在所有被杀害的女囚中，竟有3/4死在门德尔担任看守长任内。

应当承认，在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地处决女囚方面，门德尔不愧为一个尽职尽责的看守长。她也因此荣获铁十字勋章。为了缩短被挑出处死的妇女进入毒气室的过程，她下令今后妇女们进毒气室之前不必先剪头发，脱衣后立即进入；待她们被毒死以后、进焚尸炉之前再剪头发。如此，整个进程至少缩短了一两个小时。每天处死女囚的次数也由3次增加到4次。为了保证不让一个应该处死的犹太妇女继续混饭吃，她每每不辞辛苦地带上大狼狗，逐个进入



玛丽亚·门德尔受审

所有的女囚囚舍，对每个女囚仔细地检查盘问，一经发现“漏网”的犹太妇女，立刻把她们送进等候处决的25号囚室。有时候，她竟将整个囚舍的数百个犹太妇女一起搬到25号囚室。1943年秋，她一次就挑选出540名没有资格继续生存的犹太妇女，把她们统统赶进毒气室。在1944年夏天的3个多月里，门德尔忙得吃不上饭，睡不上觉，从接受新到囚犯的站台，到脱衣室、毒气室、焚尸炉，跑来跑去，四处联系

协调，终于把近20万来自匈牙利的老太太、幼女和孕妇、拖儿带女的母亲，全部赶进了毒气室。又眼看她们化作浓浓的黑烟直上蓝天。她的另一项罪恶是，逼迫女囚卖淫。开始，她只选择俄罗斯、波兰、捷克和法国的美女，因为帝国严禁日耳曼人同犹太人发生两性关系。后来，由于党卫军官兵一再要求，她也同意一些绝色的匈牙利犹太少女入选。一旦她发现囚犯中出现了美貌的少女，有时也要一些相貌出众的少妇，就以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岗位诱骗她们去当营妓，拒绝者就要遭到严厉的惩处。不管身体状况如何，这些不幸的女性每周必须接客6次。尽管她们被夺取了青春，但是一旦她们被党卫军嫖客染上性病或者怀孕，等待她们的下场同样是进毒气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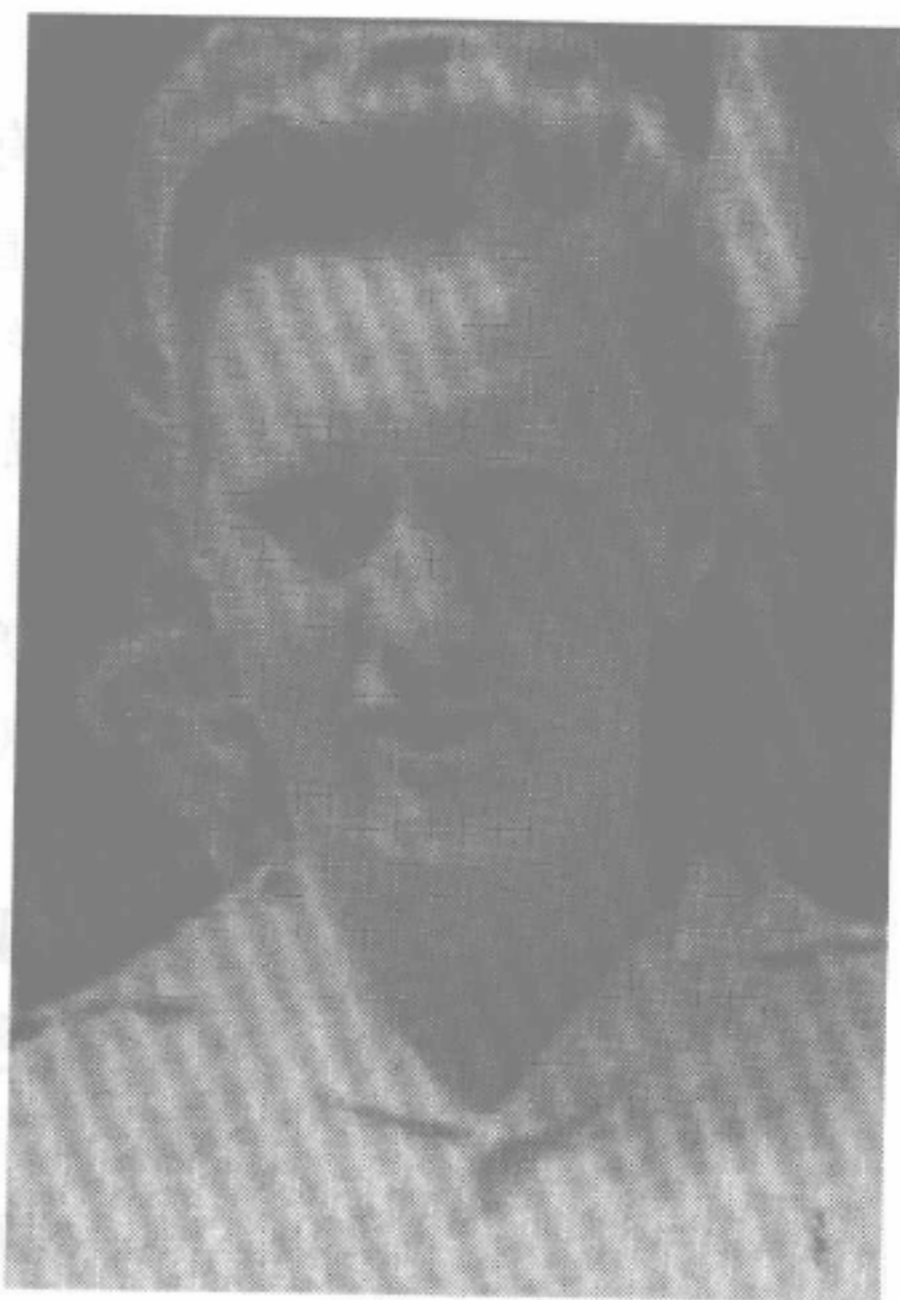
这样一个凶恶的女刽子手，理所当然地被波兰人民法庭处以死刑。

就在她即将走向绞架的前夕，人们意外地发现，她原来还长着一副美女的画皮。称她为美女的不仅有她的同伙，而且有她的敌人。一位波兰记者在报道她受审的情况时写道：一位金发碧眼的美貌少妇站在被告席上，高傲地保持着沉默。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纳西莫夫在其名著《易北河畔的密窟》一书中这样描写她：一位身穿党卫军制服、牵着大狼狗的十分漂亮的女军官。然而，对于美女蛇，人们首先强调她作为毒蛇的恶毒凶狠，而很少考虑她那美貌的外表。因此，当她被押上绞架之时，人们普遍感到大快人心，而没有人为她惋惜。

### 第九节 多萝塞亚·宾兹——专事折磨 和拷打囚犯

“诸位，我宣布以下游戏规则”，一位身材高挑的德国姑娘用银铃般悦耳的声音向一群五六十岁的老妪们宣讲着。若非她那一身黑色的、肩上佩戴着骷髅标志的党卫军制服，还有她手里紧握着的长皮鞭，人们还真以为她们是在做游戏。只是这种“游戏”未免有些残酷。“我一开枪，你们就拼命往前跑，千万别让我追上。3分钟以后，我骑着自行车去追你们。谁要是被我撞倒了，算她倒霉。不过咱们是有言在先，我已

经提醒你们赶快跑了。最后一名幸运者，就是跑到终点也没有被我追上的人，今天将得到双份的午餐”。枪响了，身上只穿着背心裤衩的老太太们，立刻像箭一样飞奔出去。她们清楚得很，今天对她们而言就是一场生死劫。死神很可能就在不一会以后降临。因为这种被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女囚营看守长多萝塞亚·宾兹小姐所谓的“游戏”实际上不过是通往鬼门关的“游戏”。宾兹小姐对这种“游戏”颇有兴致，三天两头就要举行一次，已有不少人在“游戏”中见了上帝。不过，她们毕竟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坚持不了几分钟，步伐就不得不放慢，而且越来越慢。每个人都已是汗流浹背，气喘吁吁。然而，她们突然又一次加速了。因为有人高声喊：“宾兹小姐追上来了。”只见宾兹使劲地蹬踩着自行车，飞快地追来，一下子就把一个老太太撞倒在地。紧接着，又像狂风扫落叶一般，一转眼，她已把筋疲力尽的老太太撞倒了一大片。被撞倒仅仅是厄运的开始。很快地，一帮手持皮鞭或棍棒，牵着军犬的女看守蜂拥而来，对着倒在地上的老太太没头没脑地抽打，军犬也遵照女主人们的口令，使劲地撕咬上气不接下气的老姬们。三下五除二，早有几个比较虚弱的老太太断了气，地上留下一片片血迹。倒也真有一名幸运者，那是一个50岁出头、运动员出身的女囚。她虽然逃过了车撞和鞭打的命运，但也累得虚脱了，刚刚冲过终点，便身不由己地跌倒在地上，恐怕是不能领略双份午餐的恩典了。死于这种“游戏”的老年女囚多达数百人。这种游戏还是宾兹小姐高兴之时的举措，要是她脸上布满阴云时，



多萝塞亚·宾兹——专事折磨和拷打囚犯的美女

她对待女囚便加倍地不文明了，她手中经常提着的皮鞭随时会飞舞，造成十多个甚至几十个女囚血肉横飞；要不就唆使她那两条肥壮而又凶猛无比的大狼狗，一次又一次地扑向的女囚。宾兹从15岁左右就开始接受纳粹主义的思想教育，19岁加入纳粹党；同年，她又来到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穿上骷髅队的黑色制服。她对女囚的凶残，在女看守当中可算得上出类拔萃，因而20岁上下就荣升看守长。

直到被盟军执法人员戴上手铐，宾兹小姐才终止了做“游戏”或肆无忌惮地折磨女囚的勾当。作为对在这种充满血腥气味的“游戏”中丧生的女囚的补偿，宾兹在1947年举行的汉堡“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案”中被判处死刑。被行刑队喝令跪下之时，宾兹这才感到一切都完了，她把流淌着泪水的脸扭过去，以哀求的目光望着已经端起枪的英军中士。美女悲切的脸色可能比欢笑的风采更加打动人，中士的心顿时砰砰乱跳起来，手也变得不听使唤，他向宾兹连发8枪，但不是偏左就是偏右。“真他妈是一个蠢货”，监斩官——一位英军连长，气得火冒三丈，他一个箭步跨上来，一脚踢开中士，对准宾兹的后脑就是三枪，弹无虚发，宾兹扑通一声扑倒在地，她27岁的生命到此告终。（照片见 p. 330）

### 第十节 玛格蕾特·缪斯——令人非死即残

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玛格蕾特·缪斯只是560多个党卫军女看守中的一员。在同事当中，她被认为是一个性格活泼、无所用心的小妹妹。一头金发梳得短短的，一张娃娃脸粉红粉红的，大眼睛蓝得像碧海，高鼻子带一点鹰钩，小嘴红色，牙齿整齐地排列着，好似两串闪闪发亮的珍珠。在她的犯罪行为达到顶点时，她不过19岁。然而，在10万名女囚眼中，她却是一个人人痛恨又人人害怕的厉鬼。在拉芬斯布吕克的四年半时间内，她一个人，始终是一个人，管理着刑罚室，主宰着“犯下过错”的女囚的生与死。一位当年的法国女囚战后回忆刑罚室时，心有余悸地说：“那一年，我偷偷地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谈到在集

中营吃苦受罪的真情。不料被卡波发现我被没头没脑地打了30鞭子，接着又送进刑罚室。整整一天，我什么食物也没得到，开始头昏眼花。忽然间，门被打开，一个女党卫军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虽然她显得稚气十足，但是满脸杀气，她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拼命地把我的头往墙上撞。接着，皮鞭像雨点一样在我身上抽打，我被打得皮开肉绽，昏了过去。后来，我醒了，浑身上下都是冷水。那个德国年轻女人见我苏醒了，满脸奸笑，说什么明天还要请你吃好饭。她一直折磨了我一个星期，直到奄奄一息了，她才允许难友们把我抬走。我们这个囚室的50人里，就有35人在刑罚室里被她严刑拷打过，有的人就死在刑罚室里。”对于那些因眼花耳背或语言不通而犯有“过失”的七八十岁的老年妇女，缪斯小姐同样毫不手软，雨点般密集的鞭子照样会抽打在她们身上。据囚犯们异口同声地说，有一次，她一大棒就结果了一位南斯拉夫老太太的性命，脑浆迸撒了一地；而她仍旧泰然自若地看着警犬舔食死者的肢体。当她遇上特别开心的事情时，刑罚室里的囚犯，皮肉可能好受一些，但最后的结局也不好受：她们会把她们少得可怜的那一点囚粮拿去喂她的警犬，给它们加餐；而听任囚犯们饿得发昏，走不动路，直到饿死。盟军的炮声逼近了德国，到最后，纳粹德国将战败，甚至对于囚犯们也不再是秘密了。缪斯小姐似乎也有所收敛：她从已被关闭的刑罚室内走了出来，当了一名普通的女看守，不过看守的对象却是男囚。现在，她很少打人，很少高声斥骂，甚至看到囚犯“犯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没有看见。一天，缪斯小姐看到两名抬送尸体回来的男囚，他们是捷克人，在新建的焚尸场做工。“坐下来歇歇吧，你们干得够多的了”。缪斯小姐亲热地同他们打招呼。“哦，谢谢，我们还有不少事要做”。“没关系，你们只管休息，我去找你们的舍长给你们请假”。说着一把拽住他们油渍斑斑的囚衣。“这可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两名捷克人暗自寻思。不容分说，两人已被缪斯小姐拉进自己的房间。“我太闷得慌，想和你们好好谈一谈”。“谈什么”？两个捷克人不知所措。刚端上两杯热气腾腾的咖啡，缪斯小姐忽然哭了起来：“我真该死，毒打过那么多人，千不该万不该呀。现在我晚上总是睡不

好觉，我害怕、烦闷、发愁，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呀。给我一个忏悔的机会吧”。说罢，她拉住那个更为年轻的捷克人的手，把头倚在他的肩上，眼泪还是一个劲地流淌。“你有悔改之意就好，只要你今后不再为非作歹，我们会考虑对你从轻处理的。”捷克青年被她的真心所感动，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谢谢你给我指出一条活路。我听你的话，跟你走”。缪斯小姐也倒出自己的心里话，“要是你们不嫌弃，我愿意跟你们私奔，逃出集中营”。“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当然，我早就考虑好了路线、时间、办法，我可以为你们搞几套党卫军制服；每天夜里2—3点钟是最好的时机……我还想救更多的人出去，也好将功折罪”。“这太好啦”，这次是小伙子握住了姑娘的手，“很多很多人都希望你弃暗投明。”“雅诺什，这可是一件掉脑袋的事，风险太大了”，30多岁的捷克人约诺暗中给小伙子递了一个眼色，又使劲地踩了一下雅诺什的脚。“小姐，我刚才净说大话，人家谁肯听我的话。不过，我对私奔还是很感兴趣，你要是不嫌弃，咱们俩今晚就走”。“那一言为定，不过今天仓促一些，后天吧。这位大哥，你可要为我们保密”。她又一次握住小伙子的手。该分手了，缪斯小姐又给俩人端来热咖啡。还没有回到囚室，雅诺什忽感头晕脑涨，一头栽倒在地上。约诺刚想把他扶起来，自己也顿时难受，倒在地上。咽气前他用力对着雅诺什的耳朵说：“那个德国小姐靠不住。”缪斯小姐本来是奉命套取地下抵抗组织的秘密的，不意被约诺识破，本着不能得手就灭口的宗旨，她就下了毒手。

在汉堡举行的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中，缪斯小姐因严重虐待女囚，被判处10年监禁。很多女囚觉得太便宜她了，不过美英法官最重视的罪过是挑选，在这一方面犯有严重罪行者，无论纳粹医生还是党卫军看守，往往被判处死刑。例如，虐待女囚远不如缪斯的另一个女看守露特·克劳修斯·诺伊戴克，因为经常参与挑选，就被判处死刑；而玛格蕾特·缪斯因常年在刑罚室任职，没有机会参加挑选，也就幸运地逃过了死亡的威胁。（照片见 p. 204）



## 第十一节 凯特·哈克巴特——启动毒气室开关

1945年12月，在英国军队占领下的德国小镇贝恩堡郊外的一片空地上，全副武装的军人戒备森严。还在几百米之外，就设置了阻止行人通过的路障，并配置了警卫多人；胳膊上佩戴着特殊臂章的宪兵往来巡视，随时盘问或带走形迹可疑的人。

今天要处决两名纳粹战犯：伊姆弗里德·艾贝尔和凯特·哈克巴特。前者是一个高个子的奥地利人，40多岁，带着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情，从囚车上走下来。后面一个是个最多二十七八岁的妇女，中等身材，满头金发，高鼻大眼，线条分明，体态丰盈。她满脸沮丧，步履蹒跚。忽然，她跪在地上，大声求饶，又哭又喊。一阵排枪齐射，两具尸体躺倒在地。“可惜了，挺漂亮的一个德国妞。”一个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的士兵喃喃地说。“可是她把几万个病人送进了毒气室。”他的长官立即把他顶了回去。这两名战犯是贝恩堡灭绝营审判案中的主犯，因为罪行极其严重，就连以对纳粹战犯手软闻名的英国占领当局也不得不处死他们——至少有5万名来自欧洲各国的重病人，当然主要是犹太人，被这两个魔鬼及其同伙夺走了性命。

贝恩堡灭绝营是一个隐蔽得非常巧妙的杀人魔窟，它距离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七八十公里，就设在一个普通的医院内。党卫军接管了该医院1/4的建筑物，集中在医院的东北角，然后用一堵高墙把它与医院的其他部分相隔离。该灭绝营承担着两项任务：一是杀害德国及其侵占国家的精神病人以及东欧国家被送往德国的劳工中的重病人；二是处死那些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内被纳粹医生挑选出来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女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自身未设毒气室）。

1942年，担任特列勃林卡灭绝营司令官的艾贝尔调任新组建的贝恩堡灭绝营司令官。但是，这里的工作环境与位于波兰东部的特列勃林卡大不相同。在消息阻塞的东部波兰，纳粹分子可以放开手脚，大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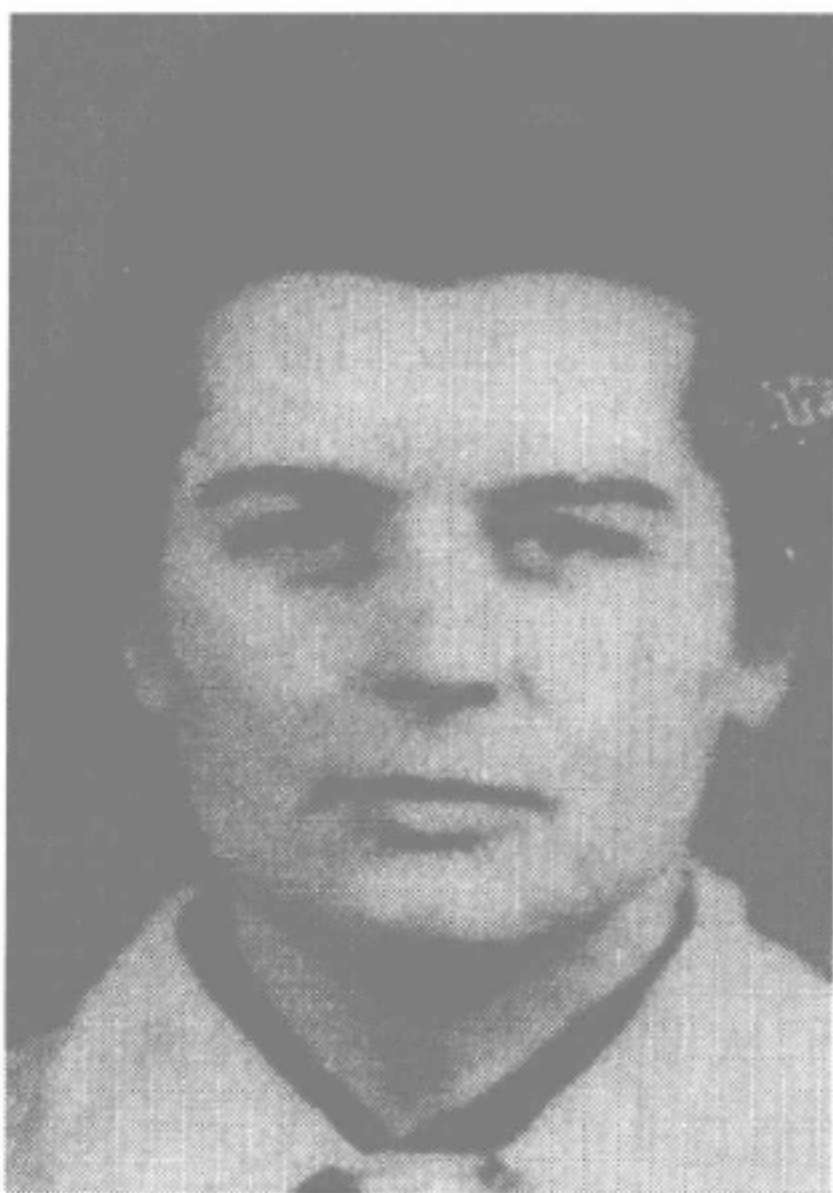
地杀人。而在德国本土，许多居民特别是教会人士，对纳粹屠杀精神病人和重病患者的行为非常反感，甚至进行过强烈抗议。因此，屠杀行动必须进行得十分隐秘，最好是披着医院和治疗的外衣来进行。这样，艾贝尔必须求助于一位既懂得“种族卫生”，又掌握医务技术的助手。他选择了凯特·哈克巴特。哈克巴特有两项一般人不具备的优势：第一，她是全医院中第一个加入纳粹党的护士，又是第一批接受 T-4 训练的护士，在哈达马尔处决中心杀害过各种各样的病人；第二，她年富力强，面貌姣好，能言善辩，具有很强的欺骗能力，足以对付各种场面。如此，一纸调令，哈克巴特随即由哈达马尔处决中心的一名 T-4 护士，晋升为贝恩堡灭绝营的护士长。

像贝恩堡这样一个“医院”，是无须太多的医生的，这里没有进行活人试验的任务，用不着做什么手术，充其量是给病人检查身体。艾贝尔司令官本人又是医生，也就无须其他的医生了。如此，哈克巴特就成了这个医院——灭绝营实际上的第二把手，具有决定病人生与死的大权。灭绝营成立之初，由于人手较少，哈克巴特要承担大量的工作：到火车站去迎接病人，入院后对他们进行分类——决定他们的生死，把准备处死的病人带进伪装成浴室的毒气室，帮助他们脱掉衣服，关闭“浴室”，启动排放毒气的阀门，最后是检查病人是否全部死亡。有时，来医院的病人太少，不值得启动毒气阀门或是毒气装置发生故障，哈克巴克也自有安排，就使用在哈达马尔使用过的老办法——给病人注射毒剂、在灌肠或洗胃药剂中掺上毒药，在输液时做手脚，穿刺时加大力度，总之是使用各种方法打发他们回老家。后来，人手多了，接站用不着她管了，帮助脱衣也交给了一般护士；但是，开启毒气阀和注射毒剂这两项工作，她却无论如何不肯放手，她认为亲手干掉犹太人，不仅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最令哈克巴特得意的事情是，她亲手杀害了曾使纳粹当局长期恐慌不安的德国共产党内的女英雄奥尔佳·普列斯特斯。奥尔佳自 19 岁参加德国共产党之后，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她不顾个人安危，营救了被许多国家的反动政府通缉的巴西共产党总书记普列斯特斯，并与之结成生死与共的终生伴侣；她单枪匹马，化装成

卖笑女郎进入盖世太保的核心机关，在一帮盖世太保高级警官的眼皮底下，巧妙地营救出被捕的4名德共党员。以后，面对全国各地的通缉令，组织上安排她转移到巴西。但是，反动透顶的巴西政权，又把她引渡给纳粹德国。她被关进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之后，领导各国女囚继续同党卫军作斗争，挫败了敌人的一系列阴谋，保护了一批难友。即使是当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视察该营时，奥尔佳冒着随时可能被处决的极大危险，带领女囚们进行了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抗议活动，狠狠杀了这个杀人魔王的威风。1942年6月，被集中营当局视为重大威胁的奥尔佳，随着200名体弱多病的女囚，来到贝恩堡医院进行“治疗”。在医院主楼前面的院子里，女囚们受到一位年轻美貌的护士长的欢迎。她满怀热情地对新来的女囚们说，虽然你们是囚犯，是犹太人，但是在我们医务人员眼里，你们都是我们的病人，都会受到认真负责的治疗。医院可不是讲政治的地方，这里只有医生、护士与病人。说完，护士长就安排女囚们去浴室洗澡，以便住院治疗。奥尔佳当然不相信什么医院不讲政治的欺人之谈，但她这次低估了眼前这条美女蛇的恶毒手段——她将把她们立刻引向死亡。不然她会一个箭步扑上去，掐死这个女魔。不幸，到底是她倒在女魔亲手排放的毒气之下。

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哈克巴特居然把二三百批病人成功地带进了伪装成浴室的毒气室，又带着满脸惬意的表情，看着几分钟以前的病人，一个个倒在地上，变成一具具尸体。加上被她本人或经她授意用医学手段杀害的病人，大概有5万人。世界上护士培训的创始人南丁格尔女士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会对哈克巴特这样的不肖徒孙感到万分耻辱。到底是苍天有眼，哈克巴特这个万人切齿的女魔，还在1945年夏秋之交落入盟国调查人员的手中。由于罪行清楚，证据确凿，曾经轻判了相当多纳粹战犯的英军司法人员也无法对她进行庇护，只能依法从事，判处她死刑。

## 第十二节 爱尔萨·艾利希——深藏杀机、满手血污



爱尔萨·艾利希

大雨已经下过，却未见凉风徐来，天气依然是那样闷热。在一间陈设豪华的房间里，两台落地电扇不停地转动，发出阵阵刺耳的响声。马伊达奈克集中营领导层的碰头会已经开始半小时了，可是因为首长一言未发，其他与会者只好都愣在那里。司令官、党卫军少校利勃亨舍尔，在房间内往返不停地踱来踱去，双手倒背，眉头紧缩，面色阴沉。“哎，”他终于长叹一声，“我们在最后解决方面又他妈的落后了，可人家奥斯维辛的设备比咱们强得不知多少倍；经济管理总局又限制杀掉年轻力壮的犹太人，叫我怎么办才好？”话音刚落，一位身穿党卫军上尉制服的少妇就接上话茬：“我以为是什么难题，就为这么一件事也值得发愁？司令官，我倒有个主意……”“爱尔萨，你快说说看”，司令官看到了希望。“女囚营里不是还有100多个犹太狗崽子吗，咱们不会拿他们开刀？这样干，既凑了数，又不影响劳动力。岂不是一举两得？”“看守长，你真有两下子”，党卫军女中尉赫尔米娜·布隆施特奈尔双手翘起大拇指，连声称赞，“我早就手痒痒了，就等这一天”。“看来，也只好这么办好了”。一向以沉稳著称的集中营首席医官布兰克附和道。“爱尔萨，就照你说的办”。“先别急，听听我草拟的行动方案再表态嘛”，看来她早就动了杀机，想害死犹太儿童是蓄谋已久了。“赫尔米娜，去把门关严”，随后她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她的同伙也无不洗耳恭听，不时发出喝彩声。爱尔萨受到众人的赞赏，脸上不由得绽出笑容，下意识地捋了一下满头的金色发卷；略显丰满的长方脸上露出两个酒窝，高鼻梁上的两只水蓝色的眼睛神采熠熠；注视着长官和同僚们频频点头赞同，她越说越得意，扭动着滚圆的臀部，晃荡着高耸的双乳。忽然间，她两眼现出道道凶光，好似变成一头母狼，恶狠狠地说：“不能拖拉，最迟后天上午给他个一针见血。”

她所说的后天也就是1943年8月24日。这一天，雄鸡刚刚报晓，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女囚营所有带小孩的犹太妇女都被男女看守吼醒，命令她们立即带着小孩到V区的大操场集合，说是长官要训话。等啊，等啊，足足等了6个多小时，还不见长官的影子。妇女们困得哈欠连天，小一点的孩子已经在母亲的怀抱中进入梦乡。猛然间，马达轰鸣，一辆满载党卫军的大卡车开进操场，随即四五十名男女看守跳下车来，把犹太妇女围起来。接着，两辆吉普车开来，女营看守长爱尔萨·艾利希、副看守长布隆施特奈尔、首席医官布兰克出现在女囚面前。布兰克用手扶了扶金丝眼镜，皮笑肉不笑地说：“今天柏林来了几位名医，是给你们的孩子做体检的。医生们很忙，孩子们现在就得去。”没等女囚们反应过来，男女看守已经开始把孩子们从母亲们的身边或怀抱中抢走，用力地丢进卡车里。母亲们心疼地想靠近卡车，却被满脸凶气的爱尔萨拦住。“别不知好歹，体检难道不是好事吗？你们还要捣乱，我看看是谁带头闹事？”说着就扬起皮鞭，众看守也纷纷举起皮鞭，吓得妇女们直往后退，只是依然不肯离去。忽然，一名女囚发现了疑点，她一直注视着卡车的行进。“卡车不是往医院那儿开，怎么开到毒气室那边去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心里始终不踏实的女囚们顿时像开了锅，纷纷吵嚷着要孩子。爱尔萨往前跨上几步，抡起皮鞭就往女囚们脸上抽打，嘴里高声喊着：“谁再嚷嚷，我就把她的孩子抛进焚尸炉，让她的孩子从烟囱里出来见她。”女囚们又气又悲，立时传来阵阵哭泣声，有些女囚竟昏倒在地。爱尔萨见此场面，得意地哈哈大笑：“这下子100多个狗杂种算是上西天了。”接着便吩咐看守们用皮鞭、棍棒驱使女囚们去干活。

没过几个月，欧洲的战局发生了重大转折，苏联红军反攻的大炮轰鸣声，已经历历在耳。囚犯们似乎受到鼓舞，怠工、不听从管教甚至潜逃的事情也多起来了。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情，爱尔萨不仅是从看守们的汇报中听到，也不止一次见到过。她气得咬牙切齿，双手哆嗦：“哼，这帮犹太狗，趁早别做美梦。老娘叫你们等不到俄国人来就变成黑烟。”彻夜未眠之后，她连早饭也没顾得上吃，就跑到集中营司令官那里建议去了。“正合我意”，利勃亨舍尔也是早就憋着一肚子火气了。“你去通知布兰克医生，赫尔米娜，还有焚尸场的申克，警卫连长霍克尔，今天晚上11点到我这儿合计合计，给这帮家伙一点颜色看看。我他妈的这回非要露一手不可。”夜渐渐深了，不仅忙碌了一整天的囚犯们睡下了，就连集中营的警卫们也不禁打起瞌睡。还是在那间豪华却是为谋划罪恶勾当服务的办公室里，6个党卫军男女头目的身影晃动着，一个罪恶弥天的狠毒计划渐渐形成雏形。“司令官，我觉得还有一点要补充，那些负责焚尸的特别工作队，也绝对不能留下，可马上收拾他们又比较麻烦……”爱尔萨在关键时刻总是不甘寂寞。“你的意思是……”，“把他们全部转移到奥斯维辛，车厢上偷偷贴上特种标志，一下车统统解决掉”。“爱尔萨，你可真是女中豪杰，此计甚好，妙。”利勃亨舍尔最后拍了板。

1943年11月2日黄昏，一批从比亚威斯托克来的犹太人被党卫军中央保安总局的警察押送到马伊达奈克集中营。他们总共有4700多人。不一会儿，在一群男女党卫军的簇拥下，一位身着党卫军制服的少妇出现在他们面前。她开始讲话了，满面笑容，声音和蔼：“客人们，我代表集中营司令官欢迎你们的到来。今晚医生有事，例行的体检就免了，你们马上就可以休息了。不过，令我们难堪的是，由于你们来得太突然，你们的食宿还没有准备好，只好委屈大家了。不过，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明天给诸位提供一顿比较丰盛的午餐作为补偿。请大家多多原谅。”犹太人显然被她的热情和真诚打动了，有人竟鼓起掌来。因为他们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和蔼可亲的身穿党卫军制服的人。有个爱开玩笑的小伙子打趣道，要是能跟这位美貌丰盈的党卫军小娘们睡上一夜，也算

不虚度人生一世。一位上年纪的犹太富商流着眼泪发誓说，这位党卫军女士和他30年前的新娘一模一样，就是头发的颜色浅了一些。许多人都知道老人的夫人曾是但泽城数得着的几个走红女演员之一。4700名犹太人怀着各式各样的思念进入梦乡。这是他们在马伊达奈克度过的第一个夜晚，也是最后一个夜晚。另外，党卫军方面的人士对女看守长的言行却大惑不解。一个年轻的女看守追着问她的上司：“赫尔米娜姐姐，看守长今天对犹太人怎么这样客气，犯得上这样吗？”“是呀，她真好像变了一个人”。另一个女看守接茬说。“你们呀，就等着明天看好戏吧。别的，就什么也不要问了”。赫尔米娜显得神秘兮兮的。

第二天，也就是1943年11月3日。谁能想到，它将成为令数万个犹太人家庭、千百万犹太人乃至全世界正义人士刻骨铭心的日子。

一清早，正当4700多名饥肠辘辘的新囚犯刚刚醒来，一队队集中营内部的囚犯，绝大多数是妇女、儿童、老人、病号、带有残疾者，从四面八方的囚室里，汇集到V区的大操场上。“大家注意啦，俄国人快要打到这里啦，我们要把你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谁都不要乱走，有卡车来接你们。”几个党卫军看守，手拿话筒，不停地叫喊着。庞大的人群排成四路纵队，由党卫军警卫带路，缓缓地向前行进。走着走着，来到一条又长又宽又深的沟渠旁边，这是集中营当局命令青壮年囚犯加班加点在一天之前突击挖好的。沟渠的两旁，则是一连串的好似仓库用的旧房屋。队伍被看守们告知暂时休息一下。半小时之后，一辆小汽车带着三辆卡车驶近人群。当人群以好奇的眼光注视着车队的到来时，一个少妇的脸从小汽车的窗口探出，此时，那位犹太老富商恰好站在她的对面不远处，他满怀热切的目光向那张引起他甜蜜回忆的脸庞，试图得到某种希望时，那张美人脸传递给他的信息却是“开火”这个冷酷无情的字眼。这声命令骤然引来一阵暴烈的血雨腥风，机关枪、斯登式手提冲锋枪、步枪，从旧房里、卡车内一齐向外射击，众多的手榴弹也在人群中四处爆炸。毫无思想准备的犹太人成片地倒在血泊中，呼喊声、怒骂声、惨叫声由高渐低，由强到弱，呻吟声慢慢逝去。犹太老富商身中两枪，但惊讶和愤怒使他又挣扎着站立起来，他用手指向那张熟

悉的脸庞，奋力喊道：“万能的无所不在的耶和华啊，惩罚这个女人吧。”“老东西，你还没死”。美丽的脸庞从汽车上跳下来，对着老人的头连发数枪，老人再一次跌倒在地。这时，霍克尔和赫尔米娜带着上百名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男女党卫军，冲进尸体密布的操场，发现少数尚未断气的囚犯，便恶狠狠地将刺刀扎下去。“伙计们，今天大家干得真出色，我请诸位喝啤酒”。美丽的脸庞又喊了一声，刽子手们这才得意扬扬地离开刑场。从待命到结束，他们至少忙碌了12个小时。这一天，大约有17 000多个犹太人丧命在党卫军的枪口之下。这也创下纳粹集中营每日屠杀量的吉尼斯纪录，就连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未能再次超过它。马伊达奈克集中营的司令官利勃亨舍尔终于争得了面子。而那张美丽的脸庞——爱尔萨·艾利希，正是这场惨案的最主要策划者和现场总指挥之一。

1946年，在波兰举行的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审判案中，爱尔萨·艾利希作为该案的第三号主犯被法庭宣判了死刑，并在不久以后执行绞决，终年不满35岁。不少当年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幸存的囚犯，闻此消息笑逐颜开，纷纷端起满杯的香槟酒开怀畅饮，并且奔走相告，欢庆上帝惩罚了那个戴着美女面具的女魔。

### 第十三节 薇拉·莎尔弗夸特——为虎作伥

从她被人们亲昵地称做小薇拉时起，左邻右舍就不约而同地喜欢上了这个漂亮出众的小姑娘。不过，由于父母过分的溺爱，她长大后变得相当自私，薄情寡义。那一年大学毕业，她最要好的一个女友邀她见见自己的男友。她一见到那位英俊的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就为他的相貌与才华所倾倒。第二天，她就给自己的“心上人”（其实是别人的“心上人”）寄去一封毫不掩饰地袒露自己爱情的信。而且，自此一发不可收拾，隔三差五地给那位英俊少年写情书，而丝毫不考虑女友的利益。她如此厚颜无耻地充当第三者，导致了女友同她绝交。后来，她也得到了心仪已久的白马王子。他是一位律师，耶拿大学的高才生；



相貌比起前女友的那一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况且，小伙子很是体贴人，对薇拉关照得无微不至。但是，1933年1月以后，薇拉的丈夫开始运交华盖，因为他是犹太人。起初，薇拉认为，这可能同欧洲各国早就存在的排犹运动一样，闹上一阵就会缓和下来。孰料，自1938年11月以来，犹太人的命运每况愈下，就连同犹太人结婚的雅利安妇女的日子也是日益艰难。这一天，医院院长满脸严肃地对她宣布，莎尔弗夸特女士，鉴于你是犹太人的妻子，不能晋升为主治医生。这是上级的规定，抱歉。聪明、能干又极富上进心的薇拉顿时如同五雷贯顶，痛哭失声。不过，她不是憎恨纳粹制度，而是憎恨自己的丈夫，是他拖累了自己。从此，她不再为他做饭，也很少同他谈话，后来干脆回了娘家。T-4行动开始不久，薇拉就获知到其中的奥秘。她假意带着患有轻微精神病的小姑去看病。眼看着医生把小姑送进“淋浴室”消灭掉，她心里感到出了一口恶气。1943年1月，4000多名同犹太男子结婚的日耳曼妇女，为了保护自己的丈夫免遭进集中营的厄运，勇敢地在柏林的大街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迫使希特勒放回了她们的丈夫。与此同时，薇拉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却毅然决然地宣布同犹太丈夫离婚，听任他被关进集中营。然而，由于有人诬告暗中接济犹太人，她还是被开除公职，并送进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进行“思想改造”。作为日耳曼人，她在集中营的生活条件比其他民族的女囚优越得多，劳动也轻得多，她和所有的德国女囚一样，可以保留长发，每天有充分的水供她洗浴和洗衣服，24小时内可以随时去厕所，不从事累活、脏活，干活可以戴上手套，来月经即可免于出工，餐餐都可以吃到肉食或香肠……非日耳曼女囚简直羡慕死了，但薇拉还是感觉不可容忍，无法承受。她提出要去当营妓，因为干这个行当就完全摆脱了体力劳动，吃穿也会加倍地改善。可是女舍长没等她说完，就给了她一个耳光，并大骂她无耻；因为在那里，甚至立功受奖的非犹太人卡波，都有权获得性服务。最后，她想到了告密。此后，她随时留意女囚们的一言一行，稍微沾边的，她便悄悄地密报给看守长，并且添油加醋。这些被告密的女囚，不是遭到公开鞭笞，就是被送进刑罚室。于是，她受到看守长多萝塞亚·

宾兹的赏识。“莎尔弗夸特女士，”看守长第一次称呼她的姓氏，而不是喊她第36508号囚犯，“看来你的思想大有转变，为了表示对你的奖励，我决定调你去青年集中营卫生所当护士。如果你工作称职，我还要进一步重用你。”薇拉千恩万谢，当天就上任去了。上班的第一天，党卫军护士长玛赛尔吩咐她，去给那三个犹太母狗静脉注射，随后两手叉腰，冷眼看她如何操作。注射后也就是过了五六分钟，那三个犹太妇女很快摔倒在地，嘴角、鼻孔、眼睛都淌出鲜血，几声急促的呼吸后，全部断了气。薇拉没有露出任何惊恐的神色，她用力踢了踢尸体，冷冷地说，“你们早就该死了”。此时，玛赛尔女士发话了：“看来你还有点种族觉悟。你这里的病人基本上都是犹太人。头疼脑热的，还可以给她们一点药；病情严重的，你就送她们回老家。喏，这个灰色纸盒里面的针剂，就是你刚才用过的催命灵丹。哈哈，今后你要是干得出色，我就发给你党卫军的制服；到那时，你的待遇就同我们一样了。”薇拉听完这番训示，乐得心花怒放：这可真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既可以受到重视，提高待遇，又能合理合法地杀死犹太人，解自己心中郁闷多年的恶气。她连忙向护士长深深鞠躬，表示一定照她的指示办理。没多久，薇拉又进一步展示了她的种族觉悟：一天傍晚，230名斯洛伐克犹太妇女被送到诊所附近的一个临时性帐篷中。薇拉发现她们绝大多数是老太太、女孩、孕妇和残疾妇女，知道她们属于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头脑中迅速生成。一经请示，霍夫曼女士连连点头，称赞道：“想不到你还真有两下子。”次日清晨，薇拉和几个党卫军护士来到帐篷中：“营里现在正流行霍乱，为了你们的健康，长官命令我们给你们发预防药，请尽快服用。”说着命令她们10人一组，排队到诊所去服药。当薇拉把一包包掺上氰化钾的粉末发到每个女囚手里，并看着她们口服下去后，她得意地笑了。只有多半天工夫，230名犹太妇女的尸体，已经出现在送往焚尸场的路上。薇拉的心计没有白费，玛赛尔已确信薇拉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同伙，她成了诊所的负责人，甚至党卫军女护士希勒也要听她调遣。她也有了决定犹太妇女生死的大权，现在该淋漓尽致地运用了。从这天起，患病犹太妇女的死亡率更高了。对于来诊

病的犹太女囚，除去极少数身高马大、步履强健的少女，薇拉大都把她们带到注射室。她亲自从灰色纸盒内取出针剂，监视几个女囚护士给她们注射；有时觉得女囚护士手脚太不利索，就夺过注射器，自己给犹太人女囚打针。有一次，一个比较年轻的女囚，经过注射后，居然倒地后没有很快死去，而是喊叫起来，骂薇拉一伙是杀人犯。薇拉急了，硬是把一块抹布塞进她嘴里，使她窒息而死。工作的时间越长，薇拉也就越像一个党卫军刽子手。这天，她接待了一对前来就诊的犹太母女。薇拉感觉那位少女体质尚佳，就给了她一些药，打发她赶快走，留下老太太单独收拾。不料少女已经听到不少集中营医院秘密地注射杀人的传闻，又当过医务人员，非要问清母亲的病情，并且要陪着母亲接受治疗。这样一来，老太太也从注射室里走出来，不肯接受注射了。“简直是没有王法了。”薇拉大吼起来。她喊来两名党卫军士兵，把少女毒打一顿后按在地板上，勒她的脖子，迫使她张开嘴，然后把一瓶贴着骷髅标记的毒液全部灌了进去。看着少女不再喘气，薇拉又转向由于悲愤而不能走动的母亲，“现在该打针了吧，老太婆”，说着她把老人连拖带拽地拉进注射室。“给她点颜色看看，往心脏部位扎”，她气呼呼地拿过一个针头超长的注射器，猛地一下子扎了进去。“刽子手。”老太太喊了一声就闭上了眼睛。那几个女囚护士，看着薇拉的残忍行径，都惊呆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一传十，十传百，闻知薇拉如此残暴，犹太女囚们于是鲜少光临薇拉医院。薇拉自有她的办法，她模仿着希特劳斯基、欧勃霍泽、容塔克、霍夫曼、玛赛尔等纳粹医生、护士的做法，到女囚们的囚舍里面寻找目标，并由党卫军士兵押送到诊所进行死亡注射。在两年左右的时间，经薇拉亲手杀害或由她监督着被杀害的犹太女囚，竟超过500人。她对犹太人横加报复的愿望总算实现了。正当玛赛尔女士将晋升薇拉·莎尔弗夸特为党卫军下士的报告呈送上峰之时，苏联红军解放了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来不及逃走的薇拉，被愤怒的女囚打得鼻青脸肿，若非苏军官兵苦苦相劝，为的是将来审判她，她当时就会见阎王。许多女囚对她的憎恶，甚至已经超过对玛赛尔的憎恶。

只是当薇拉出现在汉堡审判纳粹战犯法庭的被告席上的时候，她才

反复强调自己的女囚身份，强调自己是犹太人的妻子，为的是让法官承认她的受害者身份。然而，没有一个女囚给她作证，承认她是被迫担任护士的普通女囚；相反，人们接连不断地控诉她的一件件令人发指的罪行，证明她并非什么受害者，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战犯，同穿制服的党卫军罪犯并无二致，并一致要求将她处以死刑。法庭经过认真调查取证，接受了众多受害者的强烈要求：1947年，薇拉同她的10多个男女党卫军伙伴一道，神色沮丧地走上绞架，结束了她那年仅27岁却又丑恶不堪的生命。

#### 第十四节 卡琳·玛格努森——以挖人眼睛为业

卡琳·玛格努森是党卫军卫生部门设在柏林以北的霍亨利辛医学研究中心的一名年轻美貌的眼科女医生，生于1908年。1943—1944年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供职，是死亡天使门格尔的老搭档。走进她的办公室，但见四壁墙上挂满了形形色色的眼睛，这不是仿真的工艺品，而是货真价实的人眼，从活生生的人体上挖出来的眼睛。为了实现自己的研究课题计划，她伙同门格尔挑选了至少数百名来自欧洲各国的集中营男女囚犯，年龄从幼儿到老人，并惨无人道地摘除他们的眼睛。每当有密友或贵客来访，玛格努森往往会兴致十足地领着他们参观自己的艺术宝库，让他们仔细地观看四壁上密布的各色眼球，还要兴致勃勃地讲述自己的劳动和见解：“你们看，这些蓝色的、黑色的眼球是常见的大路货，并不罕见。问题在于，我靠熟练的技术把它们分毫不差地挖出来，而不出现任何损坏。要知道，接受手术者的号叫声对医生进行手术的干扰有多么严重。”“这一双黄色的眼珠出奇的大，可惜它的主人是一个犹太老太婆。要是一个大姑娘的，价值就会高得多。”“世界上长着灰绿色眼珠的人太少了，我足足等了三个月才找到目标。只是这是从小男孩身上取下的，还没有发育完全，论价值只达到八成。”殊不知，还没有等她介绍完毕，有的客人已经忍不住要呕吐了。人们曾经困惑不

解地发现，门格尔在比克瑙火车站的月台上进行挑选时，多次违反常规，把好多未成年的儿童和老人带进被允许入营劳动的行列。难道他突发善心，赐予他们生存的机会？但一个细心的女囚护士在多次观察后发现，门格尔是在仔细观看了他们的眼睛后才大发“善心”的，而且每一批被宽恕的犹太人的眼珠的颜色都是一致的。不过，囚犯们也不约而同地发现，这些“死里逃生”的人们并没有出现在劳动大军的行列里，而是在挑选一结束，就被门格尔带走，随即神秘地失踪。其实，门格尔不过是在执行玛格努森的委托，依照她所需要的眼球颜色，把符合要求的囚犯留下来。其实，这些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根本无法改变被杀害的命运，甚至死得更惨，遭受加倍的苦难。自然，门格尔也不会白白尽义务。有一次，女医生拿着刚刚从一个吉卜赛儿童眼睛里挖出的灰绿色眼球，忽然一把搂住门格尔，尽情地亲吻他，嘴里喃喃地说：“真不知怎样感谢你才好，我寻找灰绿色的眼睛已经三个月了，但一直找不到。多亏你帮了大忙，竟然为我找到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双目失明的囚犯是毫无生存价值的废物，他们的归宿只能是送进毒气室。单凭这一条，玛格努森就把自己送上了纳粹战犯的被告席。不过，她仗着一张俊俏的脸庞，又一次次地做出一副被逼无奈才不得不进行眼球手术的可怜相，骗取了盟国法官的慈悲心。仅仅过了一两年铁窗生活，她就恢复了自由，而且又出现在德国一家医院的眼科诊室里。

## 第十五节 伊丽莎白·玛赛尔——丧尽人伦

在众多被认为是美女的战犯中，伊丽莎白·玛赛尔是要打一点折扣的，因为当她作恶多端时，她已经年近50岁了。不过，称她是徐娘半老还是不过分的。要不，为什么好几个当年的男囚保存她的玉照呢？

玛赛尔是一名老牌的纳粹党员，纳粹上台前就加入了希特勒的党组织。除开集中营的前后两任司令官科盖尔和祖伦，再加上医院院长特罗麦尔，她的党龄大概比谁都长。从1943年2月，她就担任党卫军医院

的护士长，接替惯于以注射毒药杀人的护士长玛格丽特·霍夫曼。不过，这只是老虎走了又来了饿狼。据女囚们回忆，玛赛尔只是在1943年刚来时，参加过囚犯们的几次体格检查，其他有关女囚健康的事项，她很少过问，女囚们难得见她一面。不过，没有多久，玛赛尔却频频亮相了。不过，女囚们很快就发现，她的出现比起她不露面更为糟糕：这个相貌秀丽的中年妇女，不仅丝毫不具备护士那种从南丁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职业道德，而且鲜少中年妇女那种惯有的慈爱与同情心。她个头不高，但强健有力；她不苟言笑，但一旦开口，就会让人心惊胆战。她那种少有的残忍，恐怕一般的党卫军女护士也不一定具备。现在，玛赛尔最常见的工作是跟随着欧勃霍泽、容塔克两位女医生在巡视中挑选那些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女囚，以从事轻工作为名，将她们诱骗到毒气室处死；有时到工地，有时去囚舍。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两位女医生已经挑完应该转而“从事轻工作”的病弱女囚，走出囚舍；余下的女囚正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的时候，玛赛尔却站在那里不走，她那满眼凶光扫描着每一个女囚，美貌顿时收敛。突然，她用手一指某些女囚，“你，你，还有你，都出去做轻活”，说着，伸手就把被她点名的女囚往外拽。这种追加的死刑判决的受害者，往往可达七八个，有时达到十五六个。她身穿白衫，头戴白色护士帽，却极端不愿为女囚服务。许多请求她量体温或血压的女囚都遭到她的厉声呵斥：“不长眼睛，你没看见我正忙得不可开交吗？”“没时间，我是你的女仆吗？”可是，如果说玛赛尔女士从来不给女囚诊治，也有点冤枉她。自从特罗麦尔院长颁布了集中营医院有权对重病囚犯实施安乐死的指令后，玛赛尔就忙得经常加班加点，时常不请自到。23岁的波兰女囚玛利亚·盖莱尼克不幸患上肺结核，经常咳血。她不敢去医院，害怕被收拾掉。安乐死指令下达后，她更加恐慌不安。这天下工后，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决定给亲人写一封诀别信，不然很可能就来不及了。刚刚写下三行字，猛然听到一声吆喝：“玛利亚·盖莱尼克，到医院体检。”抬头一看，玛赛尔已经凶神恶煞似的站在自己面前了。“五分钟后我就去”，玛利亚已感到来者不善。“不行，好几个医生等着给你会诊呢。”“求求您了，三分钟

我就走。”“不行就是不行，”玛赛尔的声音更为严厉。女囚们也感到今天要和玛利亚生离死别，纷纷哀求玛赛尔手下留情，给玛利亚几分钟时间。不说还好，说得玛赛尔恼火了，她把玛利亚的信扔到地上，掀起她的头发就往外走。第二天清早，忐忑不安的女囚们急忙跑到医院，一个党卫军女护士冷冷地说，玛利亚的病情太重了，欧勃霍泽医生和玛赛尔护士长抢救了一夜未能奏效，她已经死了。两个女囚费了许多口舌，总算见到了玛利亚的遗体。她脸色狰狞，周身青紫，脸上还带着未擦净的血迹，死前无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瘦如麻秆的胳膊上青筋毕露，上面显出好几个粗大的针孔。“什么抢救了一夜，是折磨了她一夜。”两个姑娘心中愤愤说道。对于上了年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妇女，玛赛尔把她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1944年初秋，800名年纪较大的妇女，被纳粹当局从瑙因加莫集中营押送奥斯维辛集中营处死，途经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医院大厅里过夜。大概是她们中有些人尿了裤子，第二天一早，玛赛尔一进门就叫喊起来，“真是一群肮脏的母猪，把空气搅得混浊不堪，让人没法活”。女囚护士们心里清楚，今天又有人要倒霉了。果然，玛赛尔站在那群老女人面前，逼迫“肇事者”，马上站出来，先跪下认罪，再脱光衣服到院子里洗冷水澡，再回到浴室洗热水澡。老太太们听了，吓得个个面面相觑，谁也不敢站出来。玛赛尔气急了，叫来一帮女看守，用皮鞭把老太太们逐个没头没脑地狠狠抽打了一顿。有的老太太本来就又累又饥，再加上又气又痛，当时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她们做梦也没想到，进毒气室之前，还要遭受如此令人难堪的羞辱。对于刚刚出世的婴儿，玛赛尔的态度是否会手下留情呢？非也。她的纳粹种族观根深蒂固。她认为，犹太人的婴儿反正都是有罪的孽种，现在不除掉他们，他们将来长大后，就必然要危害我们。当法官问她是否杀害过集中营女囚的婴儿时，她很痛快地承认曾给四五个犹太婴儿注射过毒剂，但又强调她只是执行院长下达的命令。但是接着就有与她共过事的女囚护士揭露，1944年冬天，玛赛尔曾经把20多个新生儿集中到一间没有暖气设备的大房间内，不许任何人喂给他们食物。婴儿们啼哭了两三天，声音越来越弱。后来，这位护

士亲眼看到几个党卫军女护士依照玛赛尔的吩咐，把这些瘦得皮包骨的婴儿尸体送到焚尸场。根据集中营当局的统计，1943年至1945年4月，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各国女囚共生下婴儿870多个，但由于遇到玛赛尔及其党卫军女护士这类恶魔的百般摧残，至少有830多个婴儿被折磨致死，只有极少数逃离了拉芬斯布吕克这座人间地狱，见到了明媚的春光。

面对这般毫无人性的纳粹女战犯，等待她的结局自然是登上绞刑架，所有的法官对此都持同样的意见。与众不同的是，玛赛尔面临死亡时，还是那样面无表情，这倒和她的那些要求宽恕或大喊冤枉的年轻女同事不一般。

### 第十六节 玛蒂尔德·维波——身负几百条人命

在《纳粹医生》等好几本揭露纳粹医生和护士利用医疗手段杀害集中营囚犯或重残病人的专著中，读者可以发现一位被作者隐名为M的女医生。她担任一家医院的主治医生，多次给年轻的纳粹医生或T-4护士下达任务，指示他（她）利用何种手段或何种毒药杀害重残病人甚至儿童，不禁令人倒吸一口凉气。她是谁，又长着一副什么样的面孔呢？尽管她现在是否还在人世已经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一睹她的尊容。即使你在审判纳粹战犯时还不曾问世，仍然有机会阅读有关梅舍丽茨-欧布拉瓦尔德审判案实况的历史性照片。请看：当人们看到有关梅舍丽茨-欧布拉瓦尔德审判案的被告们的照片时会发现，在一群凶神恶煞般的纳粹战犯中，坐着一位面貌端庄清秀的中年女士，一头过肩的金色卷发，不长不短的蛋形脸，细嫩的皮肤光滑发亮，鼻子高耸又宽窄得体，两片粉红色的嘴唇，牙齿又白又齐。只是眼角那两道时隐时现的鱼尾纹在向人们暗示，她已经不再是一位青春犹在的少妇了。如果不是法官，也不是受害的当事人，谁也不会把她同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纳粹女刽子手的身份联系到一起来。她就是那个被许多人一提起来就感觉



浑身冒凉气的著名 T-4 女杀手——玛蒂尔德·维波。

1936 年，玛蒂尔德·维波成为助理医师。从此，她步步走红。1940—1944 年，维波女士担任卡门霍夫医院的主管医生，掌握该院中所有病人的生杀大权，掌管医院中所有医务人员的职位升降。如果应予“特殊治疗”的病人太多，护士和一般医生已经人手不敷使用，她也会亲自出马，熟练地拿起注射器，麻利地打发一个个病人走向坟墓。她那副和蔼可亲的面孔、温柔甜蜜的语调，对许多儿童来说，特别具有欺骗性。他们经常向她招手：“阿姨，还是由你给我打针吧，那个年轻的阿姨打得太疼。”这是她一生中最为春风得意的时期，也是她作恶多端、杀人如麻的高潮，险些导致她走上绞架。担任医院负责人期间，她还以全国医学会代表的身份，应邀出席纳粹国家卫生部组织的全国性专业会议达 4 周之久，聆听那些制定“安乐死行动纲领”并指导全国数以千计的 T-4 医生、护士的超级 T-4 的杀手们如卡尔·施奈德之流的真谛，从而提升了自己的杀人水平。

1944 年下半年，维波女士出人意料地被感染上肺结核。这在当时可是一种不易治愈的重病。于是，她的要职被维斯医生取代了。离开实权岗位的滋味别提多么令人伤心了，她想到了报复。当然，替罪羊还是那些倒霉的病人。交接工作的前夕，她召见了被自己视为心腹的护士长 M 女士，命令她和所有的护士星期天统统加班，把几十个本该下个月才决定命运的中等程度的精神病人一律注射倍加剂量的安眠药，打发他们回老家。

听到死刑判决书的宣判，维波女士不禁失声痛哭，悲愤得废寝忘食。她的一个亲戚是律师，探监时告诉她如此这般，或许能逃脱见上帝的厄运。于是，她提出上诉。她声称：她和另外两名被判处死刑的医生的罪行不可同日而语，她不曾参与 1944 年底至 1945 年春组织动员护士大批注射毒剂杀害俄国、波兰重病的男女劳工的罪恶。因此，把三个人一起判处死刑，无论如何是不公正的。紧接着，眼泪又如同断线的珍珠一般纷纷滴落，情景煞是动人。一名老年法官首先被感动了，答应重新考虑她的量刑是否偏重。也许是老法官的怜悯发生了作用，但作用更大

的是前英国首相丘吉尔那篇著名的铁幕演说，它至少使西方盟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对在押纳粹战犯的看法。总之，玛蒂尔德经常在噩梦中见到的绞架没有在现实中显露在她面前，看守她的美军士兵也不再总是怒目相视了。一直拖到1949年，对玛蒂尔德的审判才再次开庭。当法官刚开始宣读时，她的心都快跳到嗓子上了。但是，宣判结果令她高兴得不敢相信。“怎么，才判三年半？判的是我吗？”她太惊讶了。“就是你，维波女士，还要加几年吗？”押解她的美军士兵回答得不乏讥讽和气愤。

#### 附录一：似是而非的美貌“女战犯”莱妮·里芬施塔尔（1902—2003年）

莱妮·里芬施塔尔是德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在表演和导演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公认的天赋和才华。只是由于一念之差，她未能在美国好莱坞上升为奥斯卡影后；而是跻身于纳粹电影工作者的行列，进而升入纳粹党核心层的常客，甚至成为希特勒追求的目标、希特勒的宠儿。正因为她同希特勒过从甚密，国外乃至德国的许多人，都把她视为希特勒的情妇，如同爱娃·布劳恩一般。

《蓝光》这部影片在里芬施塔尔的心目中占有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这不单单是因为自己的超凡表演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也不只是因为她初次担纲制片人和导演即获成功，而更多的是因为元首希特勒也深爱这部影片，对里芬施塔尔的导演才能大加赞赏，并邀请她为纳粹党的慕尼黑代表大会拍摄一部纪录片。

1932年的一天，里芬施塔尔决定参加纳粹党在柏林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希特勒在这次集会上发表了演讲。希特勒讲话的内容，里芬施塔尔感到晦涩难懂，但她却被希氏演讲的风采深深打动。会后，她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表明了她打算进一步了解希特勒的愿望。希特勒给她写了回信，并且同她见了面。两个人并肩在海滩上散步，未来的大独裁者向里芬施塔尔表达了爱慕之情，并要求她为纳粹党上台后拍些电影。她没有答应，但和希特勒仍然时常会面，而且每次都是她主动提出的。

不久，在他们聚会的圈子里，又加入了戈贝尔和戈林等纳粹党的核心人物。与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要人的密切交往，使里芬施塔尔不能不为纳粹党的宣传事业服务。她为纳粹拍摄了两部纪录片，第一部名为《信仰的胜利》，第二部名为《意志的胜利》。此后，里芬施塔尔于1936年又接受纳粹党控制下的柏林奥运会组委会委托，拍摄了极长的纪录片《奥林皮亚》，仅仅拍片用的胶片即达400公里长；而最终剪辑这部纪录片，则花费了里芬施塔尔一年半的时间。这几年的实践证明：里芬施塔尔是一个积极为纳粹党的事业效劳的活跃分子。

同是在1936年，因《奥林皮亚》驰名欧美的里芬施塔尔踌躇满志地开始了美国之行。由于与希特勒的亲密关系，里芬施塔尔在美国所到之处都遇到了强烈的抗议。对纳粹主义持明显批判态度的美国人对她的影片也是口诛笔伐，根本没有人愿意上映《奥林皮亚》这部影片。然而，美国之行并未使里芬施塔尔翻然悔悟。尽管当时的德国正在加速军事化，欧洲正在大踏步地卷入熊熊战火之中，里芬施塔尔还是沉湎于为纳粹服务的电影事业中不能自拔。1940年纳粹德国发动了对西欧各国的侵略战争后，她却毫无觉悟，仍在一心一意地拍摄一部电影《铁弗兰》。

1942年是里芬施塔尔一生的又一个转折点：这年秋天，她在从外景拍摄地返回柏林的途中，亲眼目睹了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到了这个时候，她对希特勒的好感与崇拜顿时烟消云散，而且为自己曾为希特勒所做的一切而倍感悔悟和羞耻。1943年3月30日，这是里芬施塔尔与希特勒最后一次会见的日子。事后，她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次会见的感受：“一方面，我对他心存感激，感激他使我能一心拍片而免受戈贝尔等这类人的干扰；另一方面，当我看到犹太人被残酷杀戮时，我为我认识希特勒这样一个残暴的人而感到愤怒和无地自容。”

虽然里芬施塔尔已经开始悔悟，并试图同希特勒划清界限，但是，她过去为希特勒所做的一切，在德国和欧美各国的影响实在太深了，无不认为她是希特勒的情妇和追随者。正因为如此，战争刚一结束，她就作为一名纳粹分子被美国占领军关进位于奥地利蒂罗尔的一座监狱，并

受到审讯。因为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证据，美军很快于同年6月3日将她释放。当法国人接管蒂罗尔之时，她再次作为纳粹分子被重新投入监狱。两年之后的1950年，她头顶“纳粹同党”的罪名获得自由。在战后的5年中，她饱尝世态炎凉：原来的老搭档诽谤她，原来的故旧弃她而去，丈夫与她决裂，占领军当局禁止各地上映她的影片。2001年里芬施塔尔已近百岁高龄，可是仍然有相当一批人把她视为希特勒的情人，一个跟纳粹战犯差不多的人。

无独有偶，除里芬施塔尔之外，还有一名至死都被国内外许多人怀疑为纳粹分子的美貌绝伦的女演员。她是捷克人，名叫丽达·芭罗娃。她开始曾是希特勒朝夕相伴的情人，后来又与戈贝尔陷入深深的热恋之中，以致惹得希特勒醋意大发，下令禁止戈贝尔同她结婚。有鉴于她同纳粹头子们过从甚密，盟国占领军曾将她拘留审查，但终因抓不到确凿的证据而作罢。带着神秘的传说，她一直活到2000年11月，终年86岁。这一来，不少令世人极感兴趣的事情，也就伴随她的逝世而成了千秋万代也得不到答案的永恒之谜。

当然，纳粹女战犯并非都是绝色美人，长相一般甚至较丑的也大有人在。请参看附录二。

## 附录二：身担要职或罪大恶极的纳粹女战犯简介

### 一、高层岗位中的女战犯

#### 1. 约安娜·玛格达·戈贝尔（1901—1945年5月1日）

1930年约安娜·玛格达·戈贝尔同第一个丈夫、大富豪君特·况特离异，获得巨额财产。不久，她以大量资金和豪宅支持希特勒和他的党，并充当希特勒的亲密助手戈贝尔的秘书，又于1931年12月12日同他结婚。由于希特勒长期未婚，玛格达被称为纳粹德国第一夫人。她还是纳粹党最高层中唯一的女性，党中央委员。纳粹德国崩溃后，与其夫约瑟夫·戈贝尔一道畏罪自杀，誓死为希特勒尽忠。

#### 2. 格特露德·硕尔茨·克林克（1902年—？）

生于德国小城艾尔斯海姆，曾结婚3次，生育了11个子女。纳粹德国全国妇女组织首任最高负责人，直接负责德国妇女的全部事务，包括德国红十字会中的妇女事项部门和德国妇女劳动阵线。1939年，她奉命出访英国后，被赋予“最完美的纳粹女性”称号。1948年，被法国驻德军事当局逮捕，判处18个月监禁。1950年，西德政府将她从政府部门内驱逐。1978年，她所著《第三帝国的妇女》在西德出版。

3. 索菲·罗格·博尔纳

纳粹德国全国妇女组织第二任最高负责人。

4. 汉娜·莱奇

纳粹德国全国妇女组织第三任最高负责人。纳粹德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曾为希特勒侵占比利时出谋划策并且得逞，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战后逃亡非洲，逃脱了应得的惩罚。

5. 阿德勒·施特莱谢尔

纳粹党纽伦堡大区总负责人。

6. 希尔德嘉德·莱娜尔茨

纳粹党柏林大区宣传部长。战后被判处15年监禁。

7. 玛丽安娜·T

纳粹德国中央保安总局高级官员。战后被判处终身监禁。

8. 希尔德嘉德·M

纳粹德国中央保安总局高级官员。战后被判处10年监禁。

9. 阿格奈丝·SCH

纳粹德国中央保安总局官员。战后被判处3年监禁。

10. 爱莱诺尔·鲍尔（1886—1981年）

生于德国奥格斯堡。她是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是参加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发动的啤酒馆政变的唯一女性，后来又成为参加纳粹冲锋队的第一个女队员。长期以来，她在慕尼黑的军事医院中从事伤员的护理工作。1944年调任达豪集中营，参与了党卫军医生们开展活人试验的监管事务。战后，她被盟国逮捕，但长期被搁置，没有按照纳粹战犯定罪。以95岁高龄死于德国欧勃哈兴。

### 11. 英格·菲尔梅茨

种族移民总局出生局某处副处长。美军举行的第二次纽伦堡审判案中的种族移民局案件的被告之一。该案被告共计14人，包括该局正副局长和主要处的正副处长，她是其中唯一一名女性。法庭指控纳粹德国种族移民局应对波兰、捷克、波罗的海国家数十万儿童被从其父母身边强行掠走并进行强迫日耳曼化等罪行负有罪责，其中许多儿童经纳粹种族专家检查淘汰后即遭杀害，只有那些完全符合“优等种族”标准的2—6岁儿童才有资格进入党卫军开办的“儿童之家”接受系统的日耳曼化。法庭并宣布该组织为犯罪组织而加以取缔。英格·菲尔梅茨应对参与上述一系列犯罪行为承担罪责。1948年3月10日，法庭宣判：因证据欠缺，她被宣判不予起诉。

### 二、集中营管理人员中纳粹女战犯

据一名美国学者的研究结果，几乎100%的集中营女看守都毒打过集中营女囚，特别是犹太女囚。“二战”后受审的集中营女看守，也只有极个别的人公开宣称自己从来不曾折磨过囚犯；但是，在这些“善良”的女看守当中，却又有人参与过对女囚进行过是否有资格进毒气室的“挑选”工作，名义上当然是宣布那些不幸者将去从事较轻的劳作。因而，可以肯定，一多半集中营男女看守都是够格的丙级纳粹战犯。

#### 1. 约安娜·兰格弗里德（1900年3月5日—1974年1月26日）

约安娜·兰格弗里德生于德国小镇库普菲尔德雷，父亲是铁匠，民族主义意识强烈。自从24岁离家外出谋生到1935年以前，一直没有固定职业。这一年，她开始在纳粹设在布劳维勒的一个妇女劳改营担任看守。1937年加入纳粹党。1938年，到纳粹政权设立的第一个妇女集中营——利希腾堡集中营担任看守。一年以后，被提升为看守长。1939年5月，该营改为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依然担此要职，并兼任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训练中心主任（1941年5月—1942年3月）。不久，纳粹各个集中营开始推行旨在灭绝波兰犹太人的“莱因哈特行动”，兰格弗里德也在本营积极参与。1942年3月中旬，她被调去筹建奥斯维

辛集中营的女营，并就任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女囚分营首任看守长。此期间，她开始大批挑选体弱多病的犹太人女囚赶进毒气室杀害。由于同奥营司令官霍斯不睦，她去找纳粹德国集中营事务总监奥斯瓦特·波尔告状，争取到调回拉芬斯布吕克担任原职的任命。然而，她以后受到助手玛格蕾特·诺伊曼的指控，被押送到设在布雷斯劳的党卫军法庭受审。虽然她没有受到惩办，但是集中营看守长的要职是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改去慕尼黑市德国少女和妇女同盟任职。

1945年12月，她被美军逮捕。1946年9月美军将她引渡给波兰，准备提交给正在筹备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作为首犯之一，兰格弗里德当然明白等待她的结局是什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同年12月23日，这个女战犯居然从戒备森严的波兰监狱中成功地越狱，以后便长期隐藏在一个修道院里。直到1957年前后，她觉得风头已经减缓，于是悄悄潜回居住在慕尼黑的妹妹家中。1974年1月26日，兰格弗里德在德国奥格斯堡去世，终年73岁。但是，直至20世纪末，她的最后信息才为世人知晓，结束了她“下落不明”的身世。

## 2. 玛丽亚·门德尔（1912—1947年）

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女囚分营第二任看守长，后任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第二任看守长。（详见本章第八节）

## 3. 爱尔萨·玛戈特·德蕾克斯勒（1908年5月17日—1945年8月）

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女囚分营第三任看守长，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女囚集中营的“三大女魔”之一。

生于德国诺伊格尔斯多夫。在成为党卫军的附属人员之前，在柏林一家公司任职。1941年1月31日，来到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接受担任看守的专业训练。此后，在该营充当普通看守。当看守长兰格弗里德对她单独辅导后，她的业绩大增，几个月之后就当上级别较高的点名官。1942年4月27日始，被挑选出来调任成立不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女囚营看守。她极力逢迎、追随女囚营看守长玛丽亚·门德尔，得以进入领导岗位。她勤奋努力地四处巡视，经常亲自动手，把衰弱不堪的女

囚或儿童揪出来，推进毒气室。因积极从事“挑选”和虐待、残杀，致使数千名女囚死于非命，被提升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女囚分营第三任看守长，也因此被盟国列入重要战犯名单。许多女囚把她描绘为“一只消瘦而丑陋的乌鸦”。

1944年11月，她一度调往贝尔森集中营任职，1945年返回；1945年春，又调往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任诺伊施塔特-格莱沃卫星营看守长。1945年4月，由该营潜逃。不久，在从皮尔纳向鲍岑继续逃亡途中，被几名幸存的奥营女囚认出，并扭送驻德苏军当局。审判期间，许多遭她残害的女囚纷纷出庭作证，揭露她的种种劣迹。同年，她被苏军法庭判处死刑，6月在德国东部的鲍岑监狱执行绞决。

4. 伊尔玛·格蕾泽（1923年10月7日—1945年12月13日）（详见本章前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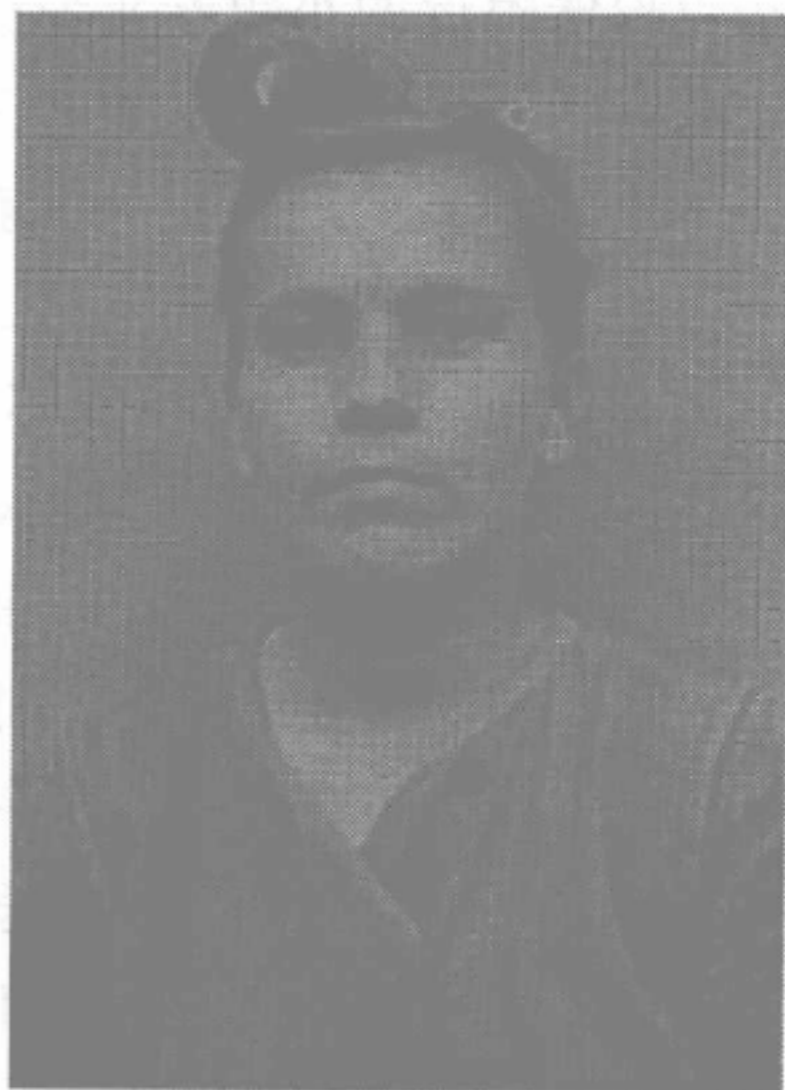
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女囚分营第四任看守长，以后担任贝尔森集中营副司令官（1945年1月—4月）。她是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女囚集中营的“三大女魔”之首，曾创下一天杀害30名女囚的纪录。

5. 伊丽莎白·福肯哈特（1919年9月5日—1945年12月13日）（详见本章前述）

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女囚分营第五任看守长，以后担任贝尔森集中营看守长（1945年2月—4月）。

6. 伊丽莎白·哈斯

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第三分部（布迪农业区）看守长。她一到任，就把令人恐怖的挑选扩展到每天早、晚点名各一次，数以千计的男女囚犯惨遭毒手；她还大大强化了对有轻微过失的囚犯的惩罚，稍有闪失，就会被打得头破血流或送进刑罚室长期关



伊丽莎白·福肯哈特



押且不给饭吃。

战后，她被捕归案，受到一定程度的惩办。

#### 7. 荷尔塔·埃莱尔特（1905年3月26日—？）

生于德国小城利斯。1939年11月15日，作为新上岗的女看守来到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接受培训，事后留在该营担任看守。1942年10月调任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女囚营看守。1943年，再次到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接受培训，受到老牌女刽子手多萝塞亚·宾兹的调教，得以晋升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拉伊科卫星营看守长。1945年初出任贝尔森集中营副看守长（1945年2月—4月），在党卫军所有女性中地位仅次于伊尔玛·格蕾泽和伊丽莎白·福肯哈特。贝尔森集中营被英军解放时被逮捕，在该营审判案中，被判处15年监禁。1951年12月22日获释。以后，更名荷尔塔·诺伊曼，隐居起来。

#### 8. 荷尔塔·波特（1921年1月8日—2005年？）

在集中营女囚中的绰号是“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的撒旦”，可见此人的凶狠不同凡响。她出生于德国北部城市梅克伦堡附近的小镇泰莱罗夫的平民家庭。中学毕业后，从事过工人、护士等收入不高的职业。为了获取高收入，她不顾一些密友的劝告，当上一名集中营看守，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荷尔塔·波特

起先她想：当一个集中营看守有什么不好呢，咱不过是照法律办事吗，又不用打人杀人。但自从1942年4月到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受训后，她就不是先前的她了，对犹太女囚从来不给好脸，稍有失误就是一顿皮鞭；要是谁敢同她顶撞，那非得打得她遍体鳞伤不可。挑选女囚送进毒气室是她的一大乐趣，看到她们拼命地哭喊，她不禁放声大笑。不论是在斯图特霍夫，在奥斯特卫星集中营，还是在最后一个岗位——贝尔森集中营，她都是如此这般。

在1945年12月举行的贝尔森集中营审判中，她被从轻判处10年

监禁，而且到1951年12月即获释放。许多比她罪行轻但是量刑并不轻的同行都感到不服，心中暗想：“莫不是她那高挑、匀称的身材，满头的金发和动人的眼睛对法官产生了魅力？”后来，她便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2005年，人们从德国东北部一家报纸上看到对她的采访，才知道她还活在人世，居住在德国东北部一个不太大的社区里。她一反常态，不像许多老战犯那样躲躲闪闪，而是痛痛快快地供认了自己的全部历史。然而，当记者问她是否对自己在集中营的所作所为感到遗憾时，她表示极端不解：“怎么，这是我本身的过错吗，这要记在集中营的账上。我是身不由己，陷在急流里面不能自救呀。”

9. 爱尔萨·艾利希（详见本章前述）

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女囚分营看守长（1942年10月—1944年6月）。

10. 赫尔米娜·布隆施特奈尔·瑞安（1919年—1999年4月19日）

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女囚分营副看守长。以杀害、虐待致死、严厉惩罚女囚而著名。她是“穿珍珠汗衫”（强迫犯规的女囚脱光衣服跪在冰天雪地里，然后不断往她身上泼冷水，直至女囚冻死）这种酷刑的始作俑者之一。1947年，在波兰举行的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审判中受到严厉制裁。

1980年5月30日，杜塞尔多夫法庭经多年反复核实，确认了赫尔米娜·布隆施特奈尔·瑞安的战犯身份；以极为严重的反人道罪，判处她终身监禁——这是当时最重的量刑。1996年，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实行大赦，77岁高龄的布隆施特奈尔因重病提前走出牢门。1999年4月19日，瑞安夫人的生命因糖尿病并发症死去。

11. 蕾戴丽·埃莱尔特

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女囚分营副看守长。

12. 伊丽莎白·科诺博利希

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女囚分营副看守长。

13. 爱尔丝·维波

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女囚分营看守长第一助理。

14. 约安娜·鲍曼（1893年9月10日—1945年12月13日）

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女囚分营女看守，在贝尔森集中营审判案中被英军法庭判处死刑，并于1945年12月13日在哈默伦监狱执行。

#### 15. 希尔德嘉特·莱谢尔特

拉芬斯布吕克和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女看守，以毒打和折磨女囚而著称，被女囚们憎称为“血腥的布里吉达”。她曾唆使警犬扑咬一名犹太孕妇，使她重伤和流产，最终还将她投入毒气室杀害。其他被她毒打和折磨的女囚多达数百人，其中一些人死去或落得终身残疾。1947年12月，莱谢尔特作为纳粹战犯被波兰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后被提前释放。1973年在西德杜塞尔多夫“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审判案”中再次受审，并判处有期徒刑10年。



约安娜·鲍曼，冷酷无情的老妖婆

#### 16. 露易丝·丹茨

经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训练中心严格培训后，自1943年1月起，先后在普拉索夫、马伊达奈克、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党卫军看守，以后又提拔为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玛尔霍夫卫星营看守长。因时常残酷地虐杀大批女囚，于1947年12月被波兰克拉科夫法庭判处终身监禁；1956年，因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从此，她隐居在德国东南部图林吉亚州的一个小村庄沃尔道夫。

1996年4月，德国梅宁顿地方检察院经过7年调查取证，宣布对长期隐居在沃尔道夫村的露易丝·丹茨提出起诉，并传唤到庭。此次，司法当局又发现了她于1945年4月残杀一名犹太人女孩的罪行。不过，直到2005年，法庭依然没有对她进行宣判。

#### 17. 埃玛·奇默尔（1888年8月14日—1948年9月17日）

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看守长。生于德国施吕赫滕市，原姓梅采尔。1943年6月1日，获准担任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看守。因对

## 第九章 凶狠歹毒、罪恶累累的纳粹女战犯

待女囚十分残忍，被众多女囚视为“女看守中的撒旦”，她也因此迅即被提拔为舍长和看守长。1945年1月，集中营当局将她免职，原因是已超越担任看守长的年龄——45岁，加之她毫不检点地酗酒，以致影响工作。在第七次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审判中，她被判处死刑，并于1948年9月17日在哈默伦监狱执行绞刑。

18. 多萝塞亚·宾兹（1920年3月16日—1947年5月2日）

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看守长。  
于1947年5月2日在哈默伦监狱执行死刑。（详见本章前述）

19. 露特·诺伊戴克·克劳修斯（1920年7月5日—1949年7月29日）

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乌克马尔克分部看守长（1945年1月—3月），以后调任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巴尔特卫星营看守长（1945年3月—5月）。因多次大批量挑选病弱女囚赶进毒气室，在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审判案中被英军法庭判处死刑，并于1949年7月29日在哈默伦监狱执行绞刑。

20. 玛格蕾特·嘉丽娜特  
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福格特卫星营看守长。

21. 苏珊娜·希尔  
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文特吕斯卫星营看守长。

22. 哈洛特·哈纳肯  
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德雷斯顿—乌尼维赛尔卫星营看守长（1944年—1945年4月）。

23. 希尔德嘉德·诺伊曼（1919年—？）  
生于德国加贝尔。自1944年10月起，先后担任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特列森施塔特集中营的看守长以及几个转运营的负责人。从相貌上看，她不愧是一名金发、碧眼、高鼻外加身材匀称的美女，但是对所管辖的女囚十分粗暴、严苛和残忍。在她的统治下，特列森施塔特集中营有包括4万多名妇女、儿童在内的10万名囚犯被押送奥斯维辛和贝尔森集中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久即惨遭杀害或被冻饿而死。该营

本身，也有 55000 名犹太人被杀害或遭折磨、虐待而死。1945 年 5 月，她逃离最后的岗位。从战争结束直至当今，从来没有一个法庭对她提出过起诉。

#### 24. 罗萨丽亚·莱姆勃克

罗萨丽亚·莱姆勃克是恶名昭著的集中营女刽子手多萝塞亚·宾兹一手培训出来的，先后在拉芬斯布吕克、奥格斯堡和达豪三个集中营担任看守和舍长，并出任一次长途转移囚犯行动的总负责人，犯下大量折磨和杀害女囚的罪行。战争结束前夕，她慌忙逃离集中营，东躲西藏，坐卧不安。令人奇怪的是，无论是盟国占领军当局还是两个德国的司法当局，从未对她提出起诉，也不曾对她实施管制强迫劳动、驱逐等惩罚措施。

#### 25. 格蕾塔·勃泽尔（1908 年 5 月 9 日—1947 年 5 月 2 日）

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舍长。因残酷杀害、毒打、折磨和虐待大量女囚，在 1947 年举行的该集中营审判案中被英军当局判处死刑，并于 1947 年 5 月 2 日在哈默伦监狱执行绞决。

#### 26. 格特露德·伊达·塞莱特（1912 年 12 月 27 日—1948 年 9 月 20 日）

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舍长。因残酷杀害、毒打、折磨和虐待大量女囚，在 1947 年举行的该集中营审判案中被英军当局判处死刑，并于 1948 年 9 月 20 日在哈默伦监狱执行绞刑。

#### 27. 爱丽卡·勃格曼

1943—1945 年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担任女看守、舍长。她对待女囚极端凶残，被她严刑殴打或百般折磨而死的女囚多达 30 人以上。她特别喜欢唆使警犬咬人，有些女囚竟被恶犬咬出肠子，但最后仍被勃格曼拖进毒气室杀死。

1955 年 11 月 12 日，民主德国新布兰登堡专区地方法院以违反人道罪判处她终身监禁。

#### 28. 格特露德·拉本施泰因

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女看守、舍长。她的拿手好戏是变换手法拷打

和折磨女囚，动辄把女囚拖入刑罚室肆意毒打，被她严刑殴打或百般折磨而死的女囚多达近百人。

1949年4月18日，民主德国哈勒专区地方法院以违反人道罪判处她终身监禁。1996年，统一后的德国哈勒法院将她提前释放，属于最后一批被德国司法当局释放的纳粹战犯。

#### 29. 索菲·尼舍夫

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舍长。任职期间残酷杀害、毒打、折磨和虐待大量女囚，并于1943年2月协助纳粹医生给100名犹太女囚进行致命的毒剂注射，将她们全部杀害。被指控应对在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关押的5500多名捷克和斯洛伐克女囚惨遭杀害负有直接责任。在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该集中营审判案中被捷克当局判处死刑，并于同年10月7日在庞克拉茨监狱执行绞决。

#### 30. 安娜·达维多夫

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舍长。因残酷杀害、毒打、折磨和虐待大量女囚，她被指控应对关押在该集中营的5500多名捷克、斯洛伐克妇女惨遭杀害负有直接责任。在1948年布拉格举行的该集中营审判案中被判处死刑，并于同年10月7日在庞克拉茨监狱执行绞决。

#### 31. 英格贝格·维尔纳

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副看守长。因残酷杀害、毒打、折磨和虐待大量女囚，她被指控应对关押在该集中营的5500多名捷克、斯洛伐克妇女惨遭杀害负有直接责任。在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该集中营审判案中，她被判处终身监禁。

#### 32. 埃玛·佛克尔

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舍长。她在任职期间残酷杀害、毒打、折磨和虐待大量女囚，被指控应对关押在该集中营的5500多名捷克、斯洛伐克妇女惨遭杀害负有直接责任。在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该集中营审判案中被判处25年监禁。

#### 33. 赫尔米娜·布吕克纳

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舍长。她在任职期间残酷杀害、毒打、折

磨和虐待大量女囚，被指控应对关押在该集中营的 5 500 多名捷克、斯洛伐克妇女惨遭杀害负有直接责任。在 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该集中营审判案中被判处 20 年监禁。

34. 菲蕾米娜·恩格斯

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舍长。她在任职期间残酷杀害、毒打、折磨和虐待大量女囚，被指控应对关押在该集中营的 5 500 多名捷克、斯洛伐克妇女惨遭杀害负有直接责任。在 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该集中营审判案中被判处 20 年监禁。

35. 克丽斯特尔·扬科夫斯基

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舍长。因残酷杀害、毒打、折磨和虐待大量女囚，被盟国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并执行绞决。

36. 玛格特·皮茨纳

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拜尔奇克与维腾堡两个卫星营的舍长。因残酷杀害、毒打、折磨和虐待大量女囚，被抓获她的苏军占领区法庭判处死刑，但不久就减为终身监禁。1956 年获释。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一些极右翼势力影响下，德国某地方当局竟以“遭受斯大林主义迫害”为名，赔偿她 64 350 马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21 世纪初期，她仍然好端端地生活在德国北部一个小城镇内。

37. 玛格蕾特·缪斯

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女看守。她被判处 10 年监禁，1952 年 2 月 26 日获释。

38. 玛格丽特·拉波

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乌克玛尔克灭绝营女看守。她被判处终身监禁，但于 1950 年改判为 21 年监禁，又于 1959 年 6 月 16 日获释。

39. 爱尔弗丽德·莫内克

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乌克玛尔克灭绝营女看守。她被判处 10 年监禁，于 1952 年 6 月 14 日获释。

40. 路易丝·布鲁纳

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集中营看守。她被判处 3 年监禁。

41. 伊尔丝·维特曼

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集中营女看守。她被判处12年监禁。

42. 爱尔娜·罗泽

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训练中心负责人（1944—1945年）。

43. 玛丽·赫罗尔德（1918年7月31日—?）

生于奥地利，党卫军女看守。原本是一家工厂的女工，1944年9月，被集中营管理部门征招到毛特好森—古森集中营接受作为看守的基础训练；又被送往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训练中心深造，在著名女杀手雅娜·贝尔尼高的指导下掌握了一套“管理”（挑选、拷打、刑讯、折磨等手段）女囚的真谛，随后成为该营的女看守。在一次押送上万名女囚到其他集中营的死亡行军后，她逃离岗位，远走高飞。此后，她的命运不得而知，也没有哪个法庭追究她残害女囚的罪责。

44. 欧仁妮·斯凯妮

集中营卡波。判处10年监禁。1951年12月21日获释。

45. 安娜·弗里德里克·玛蒂尔德·克莱因

集中营舍长。因她的犯罪证据缺失，被判无罪。

46. 伊尔斯·果里茨

47. 弗里达·沃采尔

48. 乌拉·埃玛·弗里达·居尔斯

三人均为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及其附属的诺依勃兰登堡、巴尔特、根廷卫星营的女看守。因多次杀害（“挑选”）、毒打和折磨、虐待女囚的大量罪恶行径，1966年11月均被民主德国罗斯托克地方法院判处终身监禁。两德统一后，其中二人已经老死狱中，另一名生存者受到国家特赦。

49. L. 曲格尔

贝尔森集中营博尔肯汉卫星集中营看守长（1942—1943年）。

50. 伊尔丝·科赫

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女囚分营看守长（1944年6月—1945年3月）（详见本章前述）。此前担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女囚分营看守长。



51. 希尔德·施卢瑟尔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女囚分营第二任看守长。
52. 安娜·克莱因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女囚分营第三任看守长。
53. 玛格蕾特·许博  
弗洛森堡集中营首任看守长（1939年4月—1944年9月）。
54. 格特露德·贝克尔  
弗洛森堡集中营第二任看守长（1944年10月—1944年?）。
55. 多拉·朗格  
弗洛森堡集中营第三任看守长（1944年?—1944年?）。此后任霍莱申集中营看守长、奥戴兰集中营看守长。
56. 格特露德·贝克尔·维尼戈尔（结婚后加夫姓维尼戈尔）  
弗洛森堡集中营第四任看守长（1944年?—1945年?）。
57. 玛丽安妮·埃斯曼  
弗洛森堡集中营格拉斯利茨附属营看守长（1944年?—1945年?）。后又担任罗赫利茨集中营看守长。
58. 玛尔塔·戴尔·安托尼亚  
弗洛森堡集中营海尔姆布莱希茨卫星营看守长（1944年夏—?）。
59. 海尔嘉·赫盖尔  
弗洛森堡集中营海尔姆布莱希茨卫星营第二任看守长。
60. 希尔德·哈恩  
弗洛森堡集中营茨沃道卫星营看守长（1944年6月—1945年5月）。
61. 格特露德·贝克尔  
弗洛森堡集中营科赫什塔特卫星营看守长（1944年11月—1945年5月）。
62. 玛格蕾特·弗莱因贝格  
弗洛森堡集中营科赫什塔特卫星营看守长（1944年11月—1945年5月）。此前担任毛特豪森集中营女囚营看守长（1944年9月—1944年

11月)。

63. 维尔豪茨夫人

纳粹设在波兰的雅诺夫集中营司令官维尔豪茨之妻，是一个以“打靶”为名杀害囚犯成癖的女刽子手。战后，她未能得到应有的惩罚。

64. 雅娜·贝尔尼高

毛特豪森集中营女囚营第二任看守长（1944年11月—1945年5月）。此前任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训练中心主任和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看守长。以后还一度兼任圣兰布莱西特集中营看守长（1944年—1945年1月）。她也是一位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并培养、训练出一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女刽子手。

65. 海莱娜·奥布赫

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格鲁什维茨-诺伊萨尔茨卫星营看守长（1943年—1944年6月）。

66. 伊丽莎白·盖尔什

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格鲁什维茨-诺伊萨尔茨卫星营第二任看守长（1944年6月—1945年1月）。

67. 玛丽安妮·许尔斯特

诺因加莫集中营看守长（1944年8月—?）。此前担任汉堡-万德斯拜克集中营看守长。

68. 玛戈特·维波

诺因加莫集中营看守长（1944年8月—?）。

69. 安娜丽泽·科尔曼（1921年3月23日—1977年9月17日）

生于汉堡。还在少女时代即参加纳粹党的外围组织——德国少女联盟，1940年4月又加入纳粹党。自1944年10月30日起，先后在诺因加莫集中营的诺伊格拉本和梯夫斯塔克两个卫星营及贝尔森集中营担任看守，直至贝尔森集中营被美军解放、自己当了美军的俘虏。在1945年12月的贝尔森集中营审判中，许多来自捷克、法国等国的女囚作证揭露她残酷虐待大批女囚的罪恶。她被判处两年半监禁。

70. 安娜·X

纽伦堡 - 西门子卫星营看守长。



格尔达·施泰因霍夫，  
死到临头还顽固不化

71. 阿丽丝·奥尔洛夫斯基

普拉硕夫集中营看守长。此前曾在玛伊达奈克、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看守和舍长，以毒打、折磨和“挑选”女囚赶进毒气室著称。

1947年，在波兰司法当局于克拉科夫组织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中被判处15年监禁。

72. 伊姆嘉德·霍夫曼

奥贝拉尔施塔特集中营看守长。

73. 格特露德·海泽

奥贝恩海德集中营看守长（1944年9

月—1945年4月）。

74. 安娜·菲拜格

格吕恩贝格集中营看守长（1944年6月—1945年1月）。

75. 安娜·雅恩

格吕恩贝格集中营副看守长（1944年6月—1945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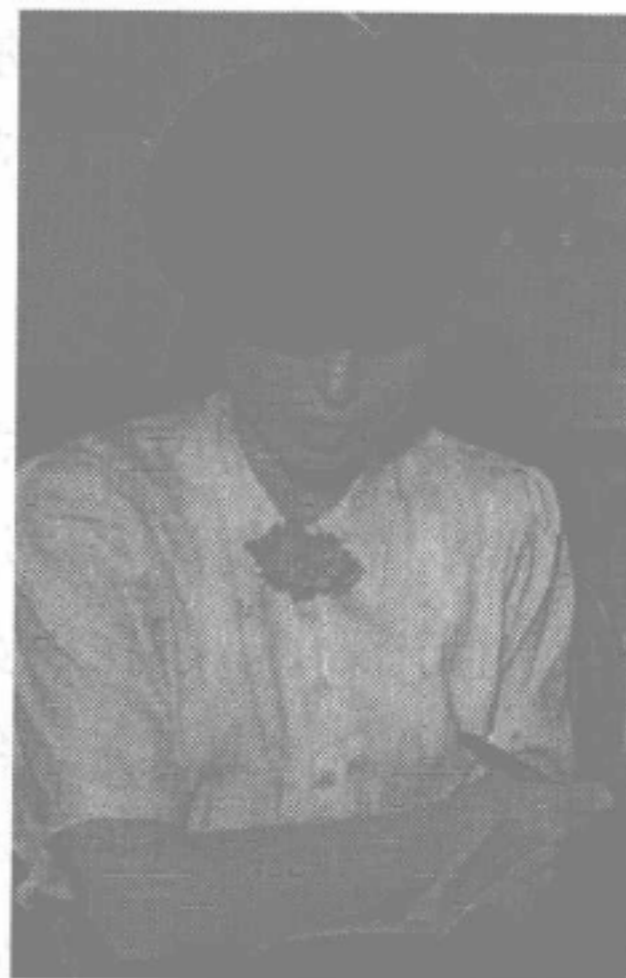
76. 赫拉·米莱夫斯基

格吕恩贝格集中营副看守长（1944年6月—1945年1月）。

77. 格尔达·施泰因霍夫（77—81均详见第六章前述）（见上图）

斯图特霍夫集中营但泽 - 朗格富尔卫星营司令官（1944年10月—1944年12月）。斯图特霍夫集中营女囚营看守长。

78. 燕妮·婉达·波克曼



曾经是个勤奋、热情、  
好思考的姑娘  
燕妮·婉达·波克曼（1）



墮落为杀人不眨眼的女战犯而被收监入狱 燕妮·婉达·波克曼 (2)



法庭不相信眼泪，只有走上绞架一条路。

燕妮·婉达·波克曼 (3)

79. 埃娃·巴拉迪雅斯

80. 伊丽莎白·贝克尔

81. 婉达·克拉夫

82. 约安娜·维佐茨基

斯图特霍夫集中营布隆贝格 - 奥斯特卫星营看守长 (1944年6月—1945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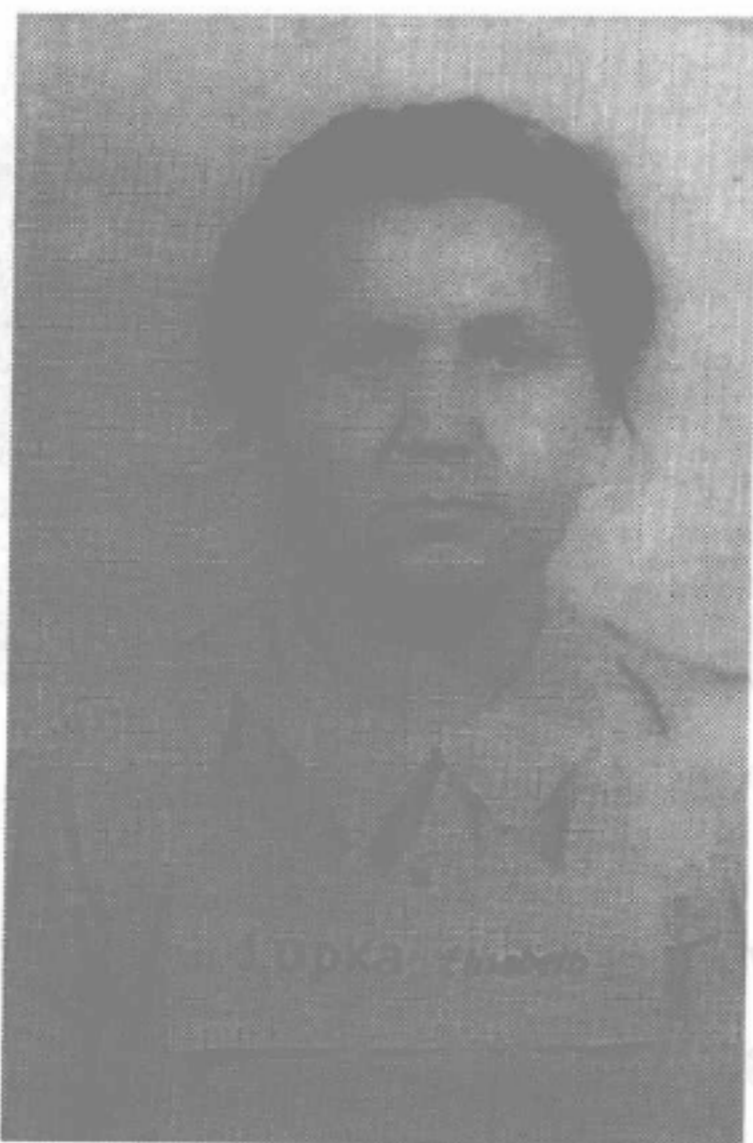
此期间又曾调任斯图特霍夫集中营女囚营看守长 (?—1945年1月)。

83. 露特·爱尔弗里德·希尔德纳

集中营党卫军看守。战后被判处监禁。

84. 伊丽莎白·卢普卡 (1902年10月27日—1949年1月8日)

生于德国小城克莱因 - 达姆纳。原为柏林某航空企业女工。1942—1945年4月先后在拉芬斯布吕克、奥斯维辛两个集中营担任党卫军看守，以“挑选”女囚进毒气室而令众多囚犯胆战心惊。1945年6月6日被捕。1948年7月6日在波兰克拉科夫纳粹集中营审判案中被判处死刑，1949年1月8日执行绞决。



伊丽莎白·卢普卡，又一个“挑选”高手被判死刑



眼露凶光的女刽子手布兰德勒

85. 泰蕾泽·萝希·布兰德勒（1909年2月1日—1947年12月22日）

生于奥地利施陶达赫城。1940年3月即进入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接受女刽子手玛丽亚·门德尔的培训，并迅即出道，担任该营的点名官，负责点名和惩处女囚。1942年3月，她同该营的一批女看守被派往刚刚开始大规模杀害女囚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解决该营女营缺乏骨干的困难，并继续担任点名官的要职。同年10月，又被派往杀害囚犯的主场——比克瑙分营，与玛戈特·

德蕾克斯勒和伊尔玛·格蕾泽并称杀人如麻的三大女魔，并因此于1943年夏获得铁十字勋章。

1944年11月，集中营管理局又将她派往德国本土的达豪集中营下属的穆尔多夫森林卫星营，作为苏军逼近时设在波兰的纳粹集中营的转移后备基地。1945年4月27日，盟军已深入德国本土时，她才最终离开岗位。1945年8月29日在巴伐利亚的山中隐蔽处被美军逮捕。1947年与玛丽亚·门德尔、希尔德加特·莱谢尔特、阿丽萨·奥尔洛夫斯基、路易丝·丹茨等重量级罪犯一同被押解克拉科夫受审。她因积极从事“挑选”

## 第九章 凶狠歹毒、罪恶累累的纳粹女战犯

的主罪被判处死刑，并于同年12月22日绞决。

86. 凯特·霍恩

阿伦道夫集中营首任看守长。

87. 约安娜·赛斯

阿伦道夫集中营第二任看守长。

88. 海德维格·乌尔利希

拜尔奇克集中营女囚分营看守长（1944年夏—1945年4月）。

89. 莉迪雅·诺依戴尔特

哈瑙卫星营看守长。

90. 埃尔娜·佩特曼

多拉·米泰尔堡集中营看守长（1944年10月—12月）。

91. 路易丝·黑格尔

弗洛森堡集中营赫尔姆布列布茨卫星营看守长。战后被判处有期徒刑。

92. 凯特·克诺尔

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看守。战后被判处18年监禁。

93. 爱尔萨·温格尔

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看守。战后被判处12年监禁。

94. 索菲亚·贝拜克

马伊达奈克集中营看守。

95. 路易丝·布鲁纳

马伊达奈克集中营看守。

96. 爱尔弗丽德·科赫

马伊达奈克集中营看守。

97. 格特露德·雷尔

马伊达奈克集中营看守。

98. 赫尔米娜·鲍茨

马伊达奈克集中营看守。1979年在西德举行的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审判案中，被判处10年监禁。

99. 莎洛特·梅耶尔

马伊达奈克集中营看守。1979年在西德举行的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审判案中，被判处10年监禁。

100. 卡尔曼·毛莱

曾经因为参与反抗纳粹的抵抗运动而成为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前囚犯。不久，沦为死心塌地为集中营当局效劳的帮凶，被提升为舍长。在拷打女囚和注射毒剂杀害女囚方面，不亚于货真价实的党卫军女看守。在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审判案中，被英军当局判处死刑。1947年4月9日在狱中自杀。

### 三、医务界人员中的纳粹女战犯

1. 荷尔塔·欧勃霍泽博士（1911年5月—1978年1月24日）

生于科隆一个思想保守的基督教徒家庭，父为工程师。1931年考入杜塞尔多夫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加入附属纳粹党的德国少女同盟，并在该团体的机构内部担任巡回医生。1937年加入纳粹党。经过了一段机关医务室医生的经历后，她决定改行；接受业务培训以后，调任杜塞尔多夫皮科医院当上助理医师。1940年12月，为了给重病长期住院的父亲筹措治疗费，她自愿进入结业后可在“高收入岗位”任职的“妇女再教育培训营”——实际上是党卫军培养集中营管理人员的基地。3个月以后，她便出任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医院的医生，由一般纳粹党员变成一名凶狠的女杀手。1943年7月，调任希姆莱直属的霍亨利辛医学研究医院妇女、儿童部助理医生；以后又兼任医院负责人格哈特医生的助理。

她曾多年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和党卫军霍亨利辛医学研究医院组织并实施多种项目的残酷活人试验，对集中营囚犯进行“挑选”，注射毒剂杀害重病人和失去试验价值的女囚以及新生的犹太婴儿。在纽伦堡医生审判案中被判处20年监禁。她是该案中唯一的女被告，但不是整个纽伦堡审判中的唯一女被告（详见本章第二节）。1951年，她被改判10年监禁，1952年提前获得释放。1958年重新获得行医执照；1960年12月，因遭到许多前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女囚的强烈抗议，地方当局

取消了她的行医资格。以后，她被迫移居小城洪奈弗。1978年1月，在莱茵河畔小城利兹去世。

2. 伊莱娜·阿萨姆·布鲁克缪尔博士

纳粹德国医学专家，巴伐利亚的安斯巴赫医院主管医生，参与制定旨在杀害上百万重残病人的“安乐死行动纲领”的少数高层人物之一，也是唯一一名女性。她还是该医院实施“安乐死”的组织者和重要参与者。战后，被盟国列入战犯名单，并被判处监禁。

3. 卡琳·玛格努森（1908年—？）

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党卫军霍亨利辛医学研究医院从事眼科研究的党卫军女医生。她和门格尔医生狼狈为奸，将数以百计的无辜囚犯诱骗到自己的诊室，强行摘除他们的眼球。这不仅使他们遭受到极大痛苦，而且使他们丧失劳动能力，只剩下被驱赶进毒气室杀害一条路。战后，这位冷酷无情的纳粹女医生长期逍遥法外。

4. 爱娃·尤丝汀（4—5二人详见本章前文）

5. 索菲·埃哈德

希姆莱领导的人类遗传研究基金会下属的研究小组——罗伯特·里特教授领导下的吉卜赛人生理和心理研究组的两名主要成员，其中爱娃·尤丝汀还是里特教授的第一助理。鉴于他们的研究宗旨是用科学的数据和事实证明吉卜赛人种族上的缺陷和劣根性，证明这一种族集团对欧洲各民族特别是对雅利安人的极度危害性，他们的研究受到希姆莱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们的研究小组被升格为帝国卫生部办公厅下属的一个研究站，他们的研究也受到获得遗传研究基金会和政府更多的资金支持。里特小组的最后结论是，吉卜赛人作为一个种族，是堕落的、具有犯罪倾向的和反社会的，而且这些特性均为遗传性的。他们将与异族通婚的吉卜赛人的后代定性为反社会分子，又将现存吉卜赛人的90%界定为非纯种吉卜赛人。里特小组的研究成果是纳粹当局实施歧视、迫害和灭绝吉卜赛人政策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有鉴于此，纳粹当局出台了将吉卜赛人强行关入隔离区、集中营或驱逐出境的政策，1944年以来又实行类似对犹太人的全盘灭绝政策。



支持上述结论的大量数据则是爱娃·尤丝汀和索菲·埃哈德通过常规体检、做脊椎穿刺、拍 X 光透视片甚至对大量未成年的犹太儿童和吉卜赛儿童强制绝育后获取的。而这些儿童却为此付出疼痛难忍后被赶进毒气室杀害的沉重代价。

战后，西德司法当局对里特教授进行了审判和惩办，却以“胁从不问”为名，对这两位手上沾满鲜血的美女不予起诉。1983 年，索菲·埃哈德还被晋升为某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 6. 伊丽莎白·威廉米娜·坎普豪森

德国北部城市什维林附近的萨克森贝格医院 T-4 医生。因积极执行“安乐死纲领”，参与组织并实施以医疗手段杀害精神病人和重残病人的非人道行径，1946 年 11 月，被民德什维林地方法院判处死刑并于次年 1 月执行。

#### 7. 希尔德·维尔尼克博士（1899 年—1947 年 1 月 14 日）

梅舍里茨-奥布拉沃尔德医院负责人，T-4 医生。因组织和实施注射毒剂杀害精神病人和重残病人数百人，1946 年 3 月被柏林地方法院判处死刑，并执行绞决。

#### 8. 爱尔萨·S

#### 9. 希尔德嘉特·A

#### 10. 玛丽·W

#### 11. 玛丽·露易丝·P

#### 12. 克拉拉·F

她们都是在 T-4 总部供职的 T-4 女医生，是“安乐死行动纲领”的参与起草者之一，也是 T-4 行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还曾任佐恩施泰因处决中心最高负责人纳粹医生保罗·尼彻的助手和帮凶，积极参与了经他下令杀害和亲手杀害重残病人 3 万多人的罪恶勾当。1947 年 7 月 7 日，民主德国德雷斯頓地方法院以违反人道罪和谋杀罪判处保罗·尼彻医生死刑并执行。其同案犯卡尔·艾哈德、恩斯特·L 博士、赫尔曼·F 三位医生判处死刑并执行；作为从犯，女医生爱尔萨·S 被判处 15 年监禁，女医生希尔德嘉特·A 和玛丽·W 被判处 8 年监禁，女医

生玛丽·露易丝·P和克拉拉·F被判处3年监禁。

13. 玛蒂尔德·维波 (1909年—?)

原为德国梅舍里茨-奥布拉沃尔德医院T-4医生，后晋升为卡门霍夫医院主管医生。积极执行“安乐死纲领”，组织、实施以医疗手段杀害精神病人和重残病人的非人道行径。1942年，因工作有成绩，应邀出席纳粹国家卫生部在海德尔堡组织、举办的全国心理学专题研讨会，聆听“安乐死行动纲领”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和该纲领的主要组织实施者卡尔·施奈德关于如何高效率地杀害大批重残病人的学术报告达4周之久，从而提升了自己的杀人技能。1945年，在卡门霍夫医院审判案中，美军法院对她判处死刑；后因冷战爆发，1949年改为三年半监禁。

14. 罗丝玛丽·阿尔布莱希特 (1916—2004年)

极其残忍的T-4医生。1941—1942年在她担任图林根地区的施特罗达医院助理医师和正式医生期间，积极参与了以毒气和死亡注射杀害159名精神病人的行动，其中一名儿童年仅11岁。令人感到气愤的是，在杀害这些病人之前，她还对许多病人实施了注射梅毒病菌以诱发病症和抽取神经、截除骨骼等极端不人道的试验。

战后，由于她的母亲是日本人，她生就一副东方人的面孔，又天生机巧善变，伪装进步，很快就赢得民德有关部门的高度信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身处纳粹战犯克星的民主德国，她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而且呈青云直上的态势，先后获得医学教授、耶拿大学医疗系主任、民德科学院院士和国家级具有突出贡献的医生头衔，并于1975年荣获国家自由勋章。直至1994年有关部门才发现了她的蛛丝马迹，2004年1月，她才被押上德国图林根州格拉地方法院的审判席。很有可能，她成了最后一名被押上法庭的“果酱杀手”（女性T-4医生和护士）（详见第十三章第二节）。

15. 希尔德嘉特·维斯

德国乌什茨普林格医院主管医生。

16. 芭芭拉·维勃拉克

维也纳的阿斯皮格尔格伦德医院高级医生，该医院推行“安乐死行动纲领”的领导和组织、实施者之一。战后，其罪恶行径受到法律追究，被判处有期徒刑。

#### 17. 玛尔塔·富泽医生

格拉芬奈克处决中心的负责人之中唯一的女性，T-4 医生。

1949 年 7 月 5 日，设在德国图林根的法国军事法庭以“反人类罪”判处她 18 个月监禁。

#### 18. 玛丽安娜·裘尔克

维也纳的阿斯皮格尔格伦德医院帕维利翁诊所医生，以专门注射毒剂、专门杀害儿童而臭名昭著的 T-4 医生。1946 年被维也纳人民法庭判处 10 年监禁，而后得以减刑。2000 年，因同样罪行受到维也纳纳粹罪行追究法院起诉，被责令出庭接受法庭调查。

#### 19. 安娜·卡岑卡（1905 年—？）

维也纳的阿斯皮格尔格伦德医院帕维利翁诊所 T-4 护士。因使用注射毒剂杀害了大批精神病患者和其他重残病人（包括儿童），1946 年被维也纳人民法庭判处 8 年监禁。

#### 20. 玛丽亚·阿萍捷（1903 年—？）

她可以算是 T-4 护士的元老。生于纽伦堡，父亲是工程师。她中学毕业后到柏林进入一家护士学校学习。以后的经历是当了两年私人护士，随后被威腾诺尔医院所雇用，直到她被 T-4 机构所聘用。阿萍捷早在 1932 年即加入纳粹党。1939 年 12 月，柏林警察部门通知她速去接受一项紧急派遣任务。1940 年 1 月 4 日，她在当时的 T-4 总部哥伦布大厦与其他已被聘用的 T-4 护士会合。在那里，这些男女护士被告知他们未来工作的杀人性质，但没有一个人加以拒绝。随后，他们被派遣到格拉芬奈克处决中心。阿萍捷在此一直工作到 1940 年 5 月。以后，她的工作单位改为索恩施泰因处决中心，在那里工作到 1942 年夏初。以后，派往明斯克一个名为研究所的隐蔽的处决中心工作 5 个月后，又被派到一家儿童处决病房工作，1943 年离去。她的主要业务是押送已被确定为处决对象的病人乘坐汽车或火车到所在的处决中心，然后将受

害者带进毒气室的前厅。间或，她也从事给病人注射各种毒剂的工作，剥夺他们的生命。由于六大处决中心的犯罪事实，只有哈达马尔一家在战争结束不久即为盟军获悉，其工作人员遭到审判；而其他5个大型处决中心的罪恶却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盟国执法人员抓住足够的证据。这样，不曾在哈达马尔供职的阿萍捷等人，也得以长期逍遥法外。

21. 海莱娜·维佐莱克（1904年—1947年1月14日）

梅舍里茨—奥布拉沃尔德医院 T-4 护士。因从事注射毒剂杀害精神病人和重残病人数百人（大部为波兰劳工）的行动，1946年3月被柏林地方法院判处死刑，并执行绞决。

22. 埃玛·L

德国哈尔儿童医院 T-4 护士，曾担任护士长。20世纪40年代前期，伙同本院 T-4 护士玛丽亚·S，使用注射致命毒剂等手段残忍地杀害了住院的332名重病儿童。

23. 玛格蕾特·敦科弗斯基（详见本章前文）

勃兰登堡处决中心 T-4 护士，一度担任代理护士长。数年内，她用饭食中掺入毒药、注射毒液和灌肠液中掺入毒剂的手法，足足杀死了220多个病人，成为创直接杀人最高纪录的女杀手。然而，她直到1964年才被揭露出来，那时德国早已废除了死刑，只能判处她8年监禁。

24. 路易丝·埃尔德曼（1902年—？）

德国勃兰登堡医院 T-4 护士。1939—1945年春，她积极执行“安乐死纲领”，曾以注射毒剂等医疗手段亲手杀害了至少210名男女精神病人和重残病人，本应严办，但该案于1964年才开始审理，德国此时早已废除了死刑，加之年龄的原因，故此受到从宽处理，只判处三五年监禁。然而，这个出庭时已经62岁的老太太，显然对自己的罪恶历史缺乏起码的悔悟，她居然大言不惭地宣称：“我是很喜欢那些可爱的孩子们的，我总是充满爱心地给他们打针（其实是注射致命的毒剂），而且一再寻找合适的注射部位，生怕弄疼了他们。经我注射的孩子，没有一个哭喊过……”如此一席话，居然引起某些法官的理解。

25. 埃尔娜·爱尔弗蕾德·E

勃兰登堡处决中心 T-4 护士。也是玛格蕾特·敦科弗斯基和路易斯·埃尔德曼的同案犯。她被控在 1941—1945 年通过毒气和注射毒剂杀害重残病人 200 人。因西德司法当局迟至 1964 年才开始审理此案，历史罪行已往往不再判处重刑，她只受到 10 年以下短期监禁的象征性惩处。

26. 安娜·G

27. 玛尔塔·W

28. 玛格蕾特·T

以上三人均为勃兰登堡处决中心 T-4 护士，埃尔德曼的同案犯。她们亲手注射毒剂杀害病人的规模均达到 150 人以上。因西德司法当局迟至 1964 年才开始审理此案，历史罪行已往往不再判处重刑，三人只受到 5—8 年监禁的象征性惩处。

29. 玛尔塔·伊丽莎白

30. 贝尔塔·H

以上二人均为勃兰登堡处决中心 T-4 护士，埃尔德曼的同案犯。她们亲手注射毒剂杀害病人的规模均达到 30 人以上。因西德司法当局迟至 1964 年才开始审理此案，历史罪行已往往不再判处重刑，二人只受到短期监禁的象征性惩处。

31. 格特露德·F

32. 玛格蕾特·玛丽亚·M

以上二人均为勃兰登堡处决中心 T-4 护士，埃尔德曼的同案犯。她们亲手注射毒剂杀害病人的规模均不足 10 人。因西德司法当局迟至 1964 年才开始审理此案，历史罪行已往往不再判处重刑，二人受到从宽处理。

33. 伊姆嘉德·瑚勃（1908 年—？）

德国哈达玛尔医院 T-4 护士长。曾协助医院负责人谋划、组织以注射毒剂、灌肠、喂药等手法杀害精神病人和重残病人，并亲手杀害了大量精神病人和重残病人，经她布置杀害或亲手杀害的病人估计为 500 人左右，是 T-4 护士中罪行最为严重的女性。在哈达玛尔审判案中被

美军法院判处 25 年监禁，后得以减刑。

34. 保莉娜·克奈丝勒

德国哈达玛尔医院 T-4 护士。她以注射毒剂等手法亲手杀害的德国、波兰、俄罗斯精神病人高达 150 余人。在哈达玛尔审判案中，被美军法院判处 20 年监禁，后来得到减刑。

35. 莉迪雅·托马斯

先后在格拉芬奈克和哈达玛尔两个处决中心供职的 T-4 护士，也是瑚勃与克奈丝勒的同案犯，她被判处 5 年监禁。

36. 克丽丝特尔·奇尔克

哈达玛尔处决中心 T-4 护士。也是瑚勃与克奈丝勒的同案犯。她被指控在 1941—1945 年通过毒气和注射毒剂杀害重残病人，判处 3 年 9 个月监禁。

37. 阿格奈丝·施朗凯尔

哈达玛尔处决中心 T-4 护士。也是瑚勃与克奈丝勒的同案犯，她被判处三年半监禁。

38. 尤迪特·科尔施

先后在格拉芬奈克和哈达玛尔两个处决中心供职的 T-4 护士。仅在 1944 年末至 1945 年春，即通过注射毒剂杀害了数百名苏军男女战俘和劳工。战后，西德一家法院以“被迫执行上级有关杀人的命令”为由，从宽判处她 3 年 4 个月监禁。出狱后，当局还允许她继续以护士为职业。

39. 凯特·贡勃曼

先后在格拉芬奈克、哈达玛尔和伊尔希三个处决中心或医院供职的 T-4 护士。主要罪行是以注射毒剂、灌肠、喂药等手法亲手杀害精神病人和重残病人，为数几十人。在哈达玛尔审判案中获刑 3 年 1 个月监禁。

40. 玛格蕾特·赫尔米娜·波科罗夫斯基

哈达玛尔处决中心 T-4 护士。也是瑚勃与克奈丝勒的同案犯，她被判处两年半监禁。

41. 米娜·查霍芙

哈达玛尔处决中心 T-4 护士。也是瑚勃与克奈丝勒的同案犯，她被判处两年监禁。

42. 迪特尔·亨凯尔

43. 多罗戴雅·略尔

二人均为哈达玛尔处决中心 T-4 护士。也是瑚勃与克奈丝勒的同案犯，她们被判处短期监禁。

44. 爱尔萨·格特露德·萨克斯

先后在柏林、莱比锡、安斯道尔夫、格罗施维德尼茨等地医院和佐恩施泰因处决中心供职的 T-4 护士长，因使用注射毒剂等手段亲手杀害重残病人，1947 年 9 月被民主德国德雷斯頓地方法院判处 15 年监禁。

45. 海莱娜·许尔克

艾希堡儿童处决中心 T-4 护士长。她是通过注射毒剂杀害 430 名儿童精神病患者罪恶行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和直接实施者。20 世纪 40 年代晚期，被西德法兰克福地方法庭判处 8 年监禁。

46. 路易丝·玛丽·威德金德

47. 希尔德嘉德·克拉拉·弗兰奇丝卡·阿克爾

二人均为先后在柏林、莱比锡、安斯道尔夫、格罗施维德尼茨等地医院和佐恩施泰因处决中心供职的 T-4 护士。因使用注射毒剂等手段亲手杀害重残病人，1947 年 9 月均被民主德国德雷斯頓地方法院判处 8 年监禁。

48. 里娜·克拉拉·弗琳斯

49. 约安娜·玛丽·路易丝·普斯

二人均为先后在柏林、莱比锡、安斯道尔夫、格罗施维德尼茨等地医院和佐恩施泰因处决中心供职的 T-4 护士，因使用注射毒剂等手段亲手杀害重残病人，1947 年 9 月均被民主德国德雷斯頓地方法院判处 3 年监禁。

50. 梅丽塔·R

佐恩施泰因处决中心 T-4 护士。战后潜逃，失去踪迹。

51. 凯特·H

格拉芬奈克处决中心 T-4 护士。战后被判 15 年监禁。

52. 海德维格·M

格拉芬奈克处决中心管理人员。战后被判两年半监禁。

53. 弗萝丝·卡尔梅尔

T-4 女医务人员。战后随同也是 T-4 医务人员的丈夫畏罪潜逃法国等地。

54. 路易丝·布鲁纳

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党卫军医生。1944 年至 1945 年春，参与了以注射致命毒剂突击杀害大批囚犯的行动。战后，她未能受到应有的惩罚。

55. 奇瓦尔特

纳粹集中营女医生，因残酷折磨和残害囚犯，被称为“魔鬼女医生”。战争结束后，逃脱了惩罚。1963 年前后，追随一批顽固的纳粹分子逃往智利。在此，积极协助智利集权政权建立关押进步人士的法西斯集中营，并为智利秘密警察出谋划策，使用各种酷刑折磨犯人。

56. 霍斯特·舒曼医生夫人

她在德国受过正规的护理教育，是霍斯特·舒曼医生在多个集中营和处决中心进行残忍的绝育试验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战后，随其夫负案逃亡，最终逃脱了惩罚。

57. 格尔达·维根德·容塔克

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医院党卫军医生，欧勃霍泽的同伙。她们的做法都一样，基本不给患病的女囚诊治，而是把她们列入应送入毒气室杀害的黑名单或亲手注射毒剂杀害。定期给女囚进行“体检”，及早把其中丧失劳动能力者送入毒气室，也是她的主要职责之一。战后，因故逃脱了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的惩罚。她的丈夫、同事兼同案犯纳粹医生瓦尔特·容塔克以挑选病弱女囚送进毒气室、对女囚进行非人道的人体试验和多方折磨女囚著称，因而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中被判处死刑并于 1948 年 9 月 17 日执行。



58. 伊丽莎白·玛赛尔（1886年5月24日—1947年5月2日）  
（详见本章前述）

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医院党卫军护士长。大批挑选女囚送入毒气室和多次注射毒剂杀害女囚以及虐杀婴儿。1944年，她一次就挑选出800多名高龄女囚，作为“毫无生存价值”的“废料”，送往奥斯维辛灭绝营处理。几天以后，她们一个不剩地化作焚尸炉上空的浓烟。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案中她被英军法庭判处死刑，并执行绞决。

59. 玛格蕾特·霍夫曼

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医院党卫军护士长，伊丽莎白·玛赛尔的前任。她最为突出的罪行是注射毒剂杀害大批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女囚，其中一次即杀死4名犹太女囚。挑选健康的女囚供格布哈特、欧勃霍泽等纳粹医生进行惨绝人寰的活体试验，也是她的经常性工作。战后初期即告失踪，逃脱了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的惩罚。

60. 爱丽卡·米莱维尔

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医院党卫军护士，一度代理护士长。挑选健康的女囚供格布哈特、欧勃霍泽等纳粹医生进行惨绝人寰的活体试验并协助进行手术，挑选年老体弱的女囚送进毒气室或注射毒剂加以杀害，对高月份妊娠的女囚进行强制流产手术、杀害或虐待集中营女囚所生的婴儿等都是她的经常性工作。战后初期被英军抓获，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中受到惩罚。

61. 玛尔塔·宝丽娜·哈克

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医院党卫军护士。积极参与杀害女囚和虐杀婴儿，尽管一时在逃，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时，终于被追捕归案并判处她10年监禁，1951年1月1日获释。

62. 丽泽·L

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医院党卫军护士。因积极参与以注射毒剂的手段杀害女囚和新生婴儿，战后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时被判处数年监禁。

63. 里丝贝特·科尔左克

## 第九章 凶狠歹毒、罪恶累累的纳粹女战犯

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党卫军护士。战后被判处4年监禁，1951年2月3日获释。

### 64. 格尔达·奎因海姆·甘策尔

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医院卡波护士。她虽然是女囚出身，但在参与注射毒剂杀害女囚、对女囚从事残酷的活体试验和虐杀婴儿方面比起不少党卫军护士还要积极、凶狠，因而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案中被英军法庭判处死刑，1948年7月改判有期徒刑。不久，她又被改判为21年监禁，1954年又被改判为12年监禁。最终于1961年6月6日获释，仅仅关押了13年。

### 65. 埃丽卡·科勒

先后在利希滕堡和拉芬斯布吕克两个集中营医院任职的党卫军医生，欧勃霍泽和容塔克的前任。因参与杀害、折磨女囚的罪恶活动不太突出，没有被盟国法院判刑。

### 66. 维拉·莎尔韦夸特（1919年11月26日—1947年）

由女囚出身的纳粹集中营帮凶，后因不遗余力为集中营当局效劳的帮凶，被提升为该营乌克玛尔克营区医院负责人。她使用死亡注射和其他医疗手段杀害的女囚，规模达到数千人，因而屡屡受到纳粹主子奖赏。在拉芬斯布吕克女囚集中营审判案中，被英军当局判处死刑并于1947年5月3日在哈默伦监狱执行绞决。

### 67. 玛丽亚·施特隆贝格

奥斯维辛集中营医院党卫军护士，曾参与挑选“无生存价值”的囚犯并进行死亡注射加以杀害。战后被判处有期徒刑。

### 68. 爱尔弗丽德·卡滕拜克

党卫军直属医疗机构医生，曾参与活体试验。战后被判处有期徒刑。

### 69. 弗里德利希·梅内克医生夫人

党卫军医疗机构化验室专业人员，是其丈夫从事T-4活动的得力助手。她遵照梅内克的要求，解剖和化验被他杀害的大批儿童的尸体和被切除下来的器官、人体组织，并将尸检报告和化验结果反馈给梅内

克，促使梅内克不断改进杀人手段，杀害更多的无辜儿童。战后，因梅内克畏罪自杀，她的犯罪证据也难以收集，故此逃离了法网。

#### 70. 瓦伦蒂娜·比莲

曾担任德国本土的医务人员，后成为德国菲尔普克“儿童之家”负责人。纳粹政权在德国本土和德军占领区大量设立的“儿童之家”其实是法西斯分子关押被强征从事奴隶劳动的大批女劳工和女战俘所生子女的变相集中营。数以千计的儿童因饥寒、疾病或虐待而非正常死亡。战后，她在盟国举办的“儿童之家”审判案中以“非人道罪”被判处15年监禁，1954年1月23日提前释放。

### 四、其他领域的纳粹女战犯

#### 1. 格特露德·施罗特克

纳粹德国帝国保安警察驻荷兰总部秘书主任。曾多次参与驱逐当地犹太人到设在波兰的灭绝营和镇压荷兰抵抗运动的勾当。战后长期未能被捕归案。1967年被判处5年监禁。

#### 2. 玛丽安娜·格特露德·豪勃尔特·梯特格

纳粹德国卡缅甸和岑斯托豪地区强制劳动营总监。她下令部下将上述地区的所有犹太居民以暴力驱赶到强制劳动营从事苦役，尽数剥夺他们的财产；对这些犹太人百般虐待和刑讯，直至强制挑选的病弱者送进灭绝营。在1948年12月22日莱比锡地方法院举行的卡缅甸审判案中，作为五名首犯之一，被判处终身监禁（其余4人均为男性，3名被判处死刑，1名终身监禁）。1994年9月，同一法院将她提前释放。

#### 3. 埃尔娜·曲尔勃斯·佩特利

生于德国，纳粹专门屠杀犹太人的罪恶组织——特别行动队成员。1941—1944年曾在苏联乌克兰共和国境内的伦贝格（现名利沃夫）地区追捕和杀害试图逃脱纳粹分子大屠杀的犹太居民，将其他苏联居民驱赶到集中营强制劳动，并对他们（包括儿童）百般毒打、折磨。1966年9月，被民德埃尔富特地方法院判处终身监禁；她的同案犯丈夫霍斯特·佩特利因罪行更为严重，被判处死刑并执行。

#### 4. 弗丽达·R

## 第九章 凶狠歹毒、罪恶累累的纳粹女战犯

特别行动队队员，曾在苏联等地杀害犹太居民。战后被判处8年监禁。

### 5. 海莱娜·施维采尔

纳粹政权的积极追随者。1944年7月20日，德国陆军实施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她则在莱比锡等地多次举报涉嫌该案的参与者，致使多人被秘密警察逮捕并惨遭杀害。1947年11月被柏林地方法院判处6年监禁。

### 6. 索罗梅雅·罗萍斯卡·玛戈

纳粹政权的积极追随者。她曾在柏林等地多次举报积极从事反法西斯地下活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的地下活动，致使该党的一系列组织被纳粹政权破坏，许多人被秘密警察逮捕并惨遭杀害。1948年11月被柏林地方法院判处15年监禁。

### 7. 伊尔丝·M

秘密警察密探。战后被判处15年监禁。

### 8. 安娜·W

秘密警察密探。战后被判处15年监禁。

### 9. 路易丝·M

秘密警察密探。战后被判处10年监禁。

### 10. 玛格蕾特·N

秘密警察密探。战后被判处7年监禁。

### 11. 爱尔弗里德·SCH

秘密警察密探。战后被判处15年监禁。

### 12. 爱尔泽·M

秘密警察密探。战后被判处15年监禁。

### 13. 海莱娜·H

秘密警察密探。战后被判处两年监禁。

### 14. 凯特·K

秘密警察密探。战后被判处两年监禁。

### 15. 爱里卡·R

秘密警察密探。战后被判处一年半监禁。

16. 伊丽莎白·S

冲锋队骨干分子。

17. 蕾娅·L

冲锋队骨干分子。

18. 吉蒂·施米特（1882—1954年）

纳粹德国盖世太保一家秘密情报站的负责人。原为柏林一家顶尖级妓院（设在吉泽布莱希特大街11号）的所有者。后受聘于盖世太保保安勤务处，将该妓院更名“小猫沙龙”，使用20名经过特工训练的绝色美少女来陪伴顾客（主要是高官、大企业家和外交家），并秘密安置特种器材来套取、获取各种情报。

19. 米尔德蕾德·伊丽莎白·吉拉斯（1901—1988年）

纳粹帮凶。原为生于缅因州波特兰的美国公民。20世纪20年代到德国学习音乐，并在一家教英语。“二战”期间，投身纳粹德国设在柏林的一家对外广播站，专门对美军士兵进行策反性播音。“二战”结束，被美军反间谍机关逮捕，被美军法庭以叛国罪判处12年监禁，关押在美国西弗吉尼亚阿尔德松女子监狱。1961年获得自由。

20. 玛格蕾特·维特（？—1972年）

英国纳粹女党徒，后加入纳粹德国国籍。生于英国曼彻斯特，26岁时嫁与英国民族社会联盟（纳粹党性质的政治组织）首脑威廉·乔伊斯，并担任该组织的助理秘书。1939年8月，随丈夫一起来到德国。从此，以霍霍的化名在柏林为纳粹德国从事对英国的广播。1942年，她以真名出现，一连几周发表有关妇女经济问题的谈话，美化纳粹德国。1945年5月28日，该夫妻均被盟国逮捕，并以“叛国罪”押回本国受审。1946年，乔伊斯被判死刑并执行绞决，她本人则被驱逐到德国，受到短期监禁的惩罚。出狱后，获准返回英国，后死于伦敦。

## 第十章

# 大批战犯曾逃离法网

21 世纪初，世界著名的纳粹战犯调查专家埃利希·罗斯鲍姆精辟地指出：“冷战真正的胜利者是纳粹战犯。由于东西方很快就把矛头对准了对方，他们也就失去了追查纳粹战犯的愿望，于是许多纳粹战犯都得以逍遥法外。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和冷战的某一方结成盟友，参与冷战中的情报工作。”

### 第一节 冷战使大批战犯绝路逢生

“二战”一经结束，各个盟国均曾对纳粹战犯进行过严正审判与严厉惩处。自 1945 年下半年起，四大盟国、两个德国以及东、西欧战争受害国共审判了近 10 万犯罪嫌疑人，法办了两万名左右的战犯，其中上千名被处以极刑。仅美、英、法三国驻德国占领当局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共审判纳粹战犯 5025 人，内 806 人被判处死刑，且大多数人被迅即处决。

遗憾的是，自 1946 年 3 月起，随着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米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冷战”演说，美英和苏联迅即由盟友转变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两大阵营剑拔弩张，各自均把最先进、威力最大的武器瞄准了对方。双方的秘密情报工作也迅速把对方调整为头号目标。自然，东西方盟国审判纳粹战犯的热情和力度、规模急转直下，虎头蛇尾，草草收兵。

当时，是否达标的纳粹战犯已经惩处得差不多了呢？非也。据国际追捕纳粹战犯组织的统计，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受到审判和惩处的纳粹

战犯不足战犯总数的2/3；而且，即便是受到审判的纳粹战犯，只要未被立即处决，他们的命运往往大有改观。许多丙级战犯已经根据西方盟国军管当局的命令填写了罪行调查表。然而交表的期限来临时，军管当局却不曾派人来收回调查表。拒绝填表或蓄意伪报的战犯，也无人对其绳之以法。因此，许多非首恶战犯从此混迹清白的老百姓当中，再也不容易发现其庐山真面貌。正是由于冷战的出现，使大批纳粹战犯绝路逢生，逃脱了站在审判席和登上绞刑架的下场。

## 第二节 B-B 航线，上万名漏网战犯的救命天桥

在逃脱了审判和惩罚的众多纳粹战犯中，大部分罪孽深重的乙级战犯是通过马丁·鲍曼策划和创建的“B-B 航线”于1945年4月至1948年底逃离欧洲，并隐藏到美洲和中东等地的。这些漏网者的规模估计有1.5万—2万人，其中许多人属于血债累累、极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重犯。

甲、乙级纳粹战犯犯下滔天重罪，自知难逃惩罚，因而千方百计地谋求保命的途径。早在1944年德国败局难免的趋势出现后，希姆莱及其副手卡尔·沃尔夫一伙即背着希特勒，妄图与西方单独媾和。但由于纳粹政权罪恶滔天，英美两国也不肯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希特勒德国沆瀣一气，不能不严加拒绝。此后，不少罪恶累累的纳粹分子就开始串联，谋图潜逃。事到如今，老谋深算并早已预做准备的纳粹党中央秘书长马丁·鲍曼，就成为数万名走投无路的纳粹要犯的舵手和大救星，如同当年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摩西一般。在纳粹党上层决策集团中，鲍曼的政治嗅觉之敏锐，可算是绝无仅有的；不仅戈培尔、里宾特洛甫难以望其项背，即使希特勒、戈林、希姆莱也不是他的对手。尽管由于希特勒的赏识和提拔，他爬上了党中央秘书长、政府部长、国会议员、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的高位，成为除希特勒之外实权最大的人，他从内心并没有达到对元首盲从的地步。早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初，虽然战果累累，三支大军分别进抵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之时，他便冷静地预

料到德国已走上一条自取灭亡、有去无回的绝路。与那个只有初中学历和下士军衔的元首相比，他更为崇拜德意志帝国时代的老宰相和老牌外交家俾斯麦。这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曾一再指出，德国如果同时对英法和俄国开战，就必然会导致灭亡。然而，城府极深的鲍曼又深知功高镇主的极端危害性，他在元首面前，总是一副毕恭毕敬、倾慕有加的神情，总是顺着元首的思路略加发挥，而极少显示自己的高明之处。不过，鲍曼也绝不肯为了追随元首而充当可悲的殉葬品，从1942年起，他就开始策划如何保全自己以及自己的忠实追随者，并很快理出一条大思路：第一，要解决往哪里逃的问题。希特勒发动的这场目空一切、四面树敌的战争，很可能导致德国被敌国重重包围，全国沦为大战场的后果。作为知名度极高的大战犯，在本国无疑难以藏身，在欧洲也站不住脚。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北美洲，又苦于无根基，只有南美洲有希望。由于受到美国的欺压和掠夺，不少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把希望寄托到纳粹德国身上，把希特勒视作未来的解放者，因而极端亲德。其中的阿根廷，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即有131个纳粹组织和团体公开活动。1942年1月，第三届里约热内卢拉丁美洲国家外长会议召开，几乎所有成员国宣布同德国绝交甚至对德宣战，唯独阿根廷投了反对票。直至1945年3月，纳粹德国的灭亡只是以天计算了，阿根廷才宣布与德国断交。鲍曼并不仅仅是把未来建立在估计上。他通过贴身的女秘书，极为秘密地调阅了南美各国的详尽档案资料，暗暗下定了决心。第二，确定出逃路线。对整个欧洲的交通地理相当熟悉的鲍曼，很快就制订了B-B（从德国的不来梅到意大利东海岸港口巴里）秘密交通线的计划。第三，在B-B交通线沿途设立联络站，并派遣可靠的人选来实施，这一问题需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但物色人选必须严格保密。第四，出逃人员必须携带的大量资金。这个问题在当时还找不出固定的来源，姑且见机行事吧。

从1942年秋天起，一批批“特殊货物”由党卫军官兵押送，不断地运进纳粹德国的中央银行，每一件货物的包装箱上都明白无误地写着



“奥斯维辛”的字样。不过，对于这批特殊货物中的大部分而言，纳粹德国的国家金库并不是它们的终极归宿，而只是一个过境站。夜幕一落，党卫军官兵又一次将货物装上遮掩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派出重兵护送，由柏林驶向西南，到达德法边境后，再以东北—西南方向的对角线穿越法国，目的地是西班牙的港口加迪斯。货物一进港，纳粹德国驻西班牙大使、党卫军将军威廉·法乌佩尔领导的特工总部就派人前来接应，把货物装上直接由党卫军调遣的潜艇，跨越大西洋，直抵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南240多公里外的偏僻港口詹勃罗伯恩，这才是鲍曼指定的终点。这种秘密的潜艇运输一直进行到1945年夏天才被迫终止。

然后，再经过阿根廷国籍的德国人的秘密间谍组织——火地岛辛迪加，把特殊货物中的高档日用品运到当地德国移民的大地主庄园廉价拍卖，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则使用当地为纳粹德国服务的著名女演员爱娃·杜阿登的个人名义，存入阿根廷的四家大银行。其中仅阿莱曼银行一家，到1944年初为止，已存入价值1.15亿比索的金银细软。火地岛辛迪加还将已兑换成近10亿比索的资金投资到175个工业公司、银行、农场和商场。另据美国情报部门的统计资料，从1944年秋起，党卫军向南美洲331家公司进行了投资（其中98家企业属于阿根廷）。

这笔集中营被害的犹太人财富的去向，完全是由鲍曼一人独自策划、运作的，就连希姆莱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始终认为，这批巨额财富，已经按照他的意愿，完完全全地运到德国南部和奥地利北部高山地区的秘密仓库中保存起来。因而，纳粹德国倾覆后，他只带领着极少数亲信，向这一带转移，企图利用这批财富重振雄风。

日历翻到1943年，战局形势已发生逆转。继在斯大林格勒遭受沉重打击后，德国又于当年8月输掉了库尔斯克战役，战略主动权彻底丢掉。局势有可能急转直下，该是采取具体行动的时候了。一天深夜，鲍曼找来了已经多年考验的老部下——瓦尔特·罗夫，宣布任命他为中央保安总局驻意大利北方组组长，其任务是在意大利开辟一条秘密通道。日后，如果帝国发生危难，即可使用这一通道，使党内同志逃离欧洲，

转危为安。罗夫立即动身前往米兰，在雷吉娜大饭店内建立了联络点。他也经常去罗马，与后来大出逃计划得以实施的关键人物阿洛伊斯·胡达尔主教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胡达尔是亚平宁半岛德国移民中天主教徒的神职领袖，保留了德国国籍，并且是纳粹主义的狂热信徒。胡达尔在梵蒂冈教廷拥有广泛的影响，经他出面，梵蒂冈护照局和有权发放“无国籍流亡者”临时身份证的国际慈善事业管理局，对准备逃亡的纳粹战犯几乎是有求必应。（盟国执法部门后来发现，德国西部、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亲纳粹的天主教势力，也曾向许多准备出逃的纳粹战犯发放过上述临时身份证。持该证件，即可进入阿根廷。）几个月后，经过罗夫不知疲倦的运作，一个以罗马为中心，从德国经奥地利进抵米兰到巴里的广泛联络网已初步建立。在这条特殊航线上，每隔40千米就设有一个中转站。这些中转站大部设在修道院或者天主教会下属的慈善机构内，在这里，逃亡的战犯们不仅可以免费得到食宿，而且可以得到更加与他们当时的身份相符合的衣着，甚至还可以更换汽车，以摆脱盟国执法人员的追缉。

此时，筹措巨额资金问题已成为纳粹战犯大逃亡的当务之急。这一项工作，鲍曼深知自己必须亲自出马，否则那些工、商业巨头，是很难为党卫军弟兄们的安危慷慨解囊的。因此，鲍曼于1944年7—8月两次打着元首的旗号亲自出面，召集了所有能动员到的已加入纳粹党的大亨和大款，到德法边境城市斯特拉斯堡的红房子酒店开会。鲍曼恩威并济、软硬兼施，时而大讲一旦苏联红军攻入德国，将实行对资产阶级扫地出门和共产共妻的野蛮政策，还不失时机地掏出一张张苏军处决或押送德国人的照片；时而又话峰一转，高谈党卫军分子如何忠诚不二、无私奉献，身手不凡，足以充当大亨大款们的可靠保护者；远的不表，就说去年吧，党卫军骨干斯科尔兹内神兵天降，从海拔2000多米的大萨索山顶峰上杀出重围，奇迹般地救走墨索里尼就是明证。最后，鲍曼显出一副万般无奈的可怜神态，泣不成声地呼吁：“我们的党卫军弟兄在奋斗，在流血，可是他们不仅缺乏汽车和电话，而且连必要的给养也常常得不到保障。而一旦他们因饥寒交迫或负伤被俘，就会被当做战犯毫

不留情地绞死，而不是像国防军那样得到战俘的待遇。这个问题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他们为维护大德意志的利益，其中自然也包括诸位切身利益，为维护德意志民族须臾不可或缺的生存空间，为灭绝德意志民族的死敌犹太人，不遗余力地奋战吗？每一个有良心的雅利安人，每一个够格的党员，难道能置之不理、坐视不救吗……”鲍曼话犹未了，一片热烈的响应声已然纷至沓来：“没说的，我们出60万马克”，“我们蒂森集团出150万马克”，“我们再紧张也要捐100万马克”……唯有一位北方轻工集团的代表不为所动，他平静中不乏讥讽地诘问：“秘书长先生，党卫军弟兄们的确不容易，但是元首总不能让他们忍饥受饿吧。我听不少人都说，集中营里那些犹太人的黄金和财产不是都交给党卫军了吗？”“这位仁兄，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这种超级玩笑。请看，这是中央保安总局将集中营犹太人财产上缴国库的全部收讫单。”早有准备的鲍曼，半月前就安排特工人员精心制作了数百张“收讫单”，现在他一下子全甩到桌面上，“哪位要是对党卫军还有疑问，尽可以到元首那里去告发”。秘书长真的动了怒，顿时把到会者全部摆平了。这一天，鲍曼的收获远在1000万马克之上。

在鲍曼一伙的精心策划下，内部的四个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瓦尔特·罗夫又取得了梵蒂冈一些教士和一批同情纳粹的国内外居民的支持。其中，发挥作用最为显著的是自称“矢志不渝的纳粹分子”的克罗地亚教授德拉加诺维奇。于是，他们组建了组织严密、财力充裕、拥有武装的“蜘蛛”、“奥德萨”等秘密团体，开辟了以不来梅为起点，经过奥地利、意大利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纳德乌斯小道，下山后再经波河平原，直至意大利西海岸大港巴里的秘密通道，专事将漏网的纳粹骨干隐蔽地送上海轮，逃到同情第三帝国的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潜藏起来。越境并不是一个重大的困难问题，防守德奥边境的美国驻军戒备疏松，漏洞比比皆是；况且，美军当中许多人见利忘义，没有证件只要肯递上一大笔钱，照样可以放行。至于奥地利与意大利之间的边境线，地势起伏多变，但羊肠小道也不少，只要有熟悉地形的向导，尽可以绕越哨所。

总之，B-B航线这一途径大概使上万名战犯逃脱了惩罚，其中包括甲级战犯、纳粹党秘书长马丁·鲍曼，秘密警察驻法国里昂的头子克劳斯·巴比，里加屠夫罗施曼和赫伯特·库克斯，毒气车的发明者瓦尔特·劳夫，大屠杀前线总指挥艾希曼的副手阿洛伊斯·布鲁纳等。奥德萨建立的第二条秘密航线是由德国出发经奥地利到意大利，再乘船前往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等中东国家；第三条秘密航线的发端自然也是德国，经过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南部再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西班牙，最终遁入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庇护之中。此外，相当一部分纳粹战犯自发地流窜到澳大利亚，另有不少于万人的大批纳粹分子，趁美国对欧洲受纳粹侵占国家的难民入境手续相当宽松之际，化装成难民大量潜入美国，其中许多人还加入了美国国籍。以“恐怖的伊万”闻名几个纳粹灭绝营的乌克兰籍战犯伊万·德米扬尤克就是此时潜入美国的。1988年前后，他的罪行被媒体曝光，很快被以色列政府引渡回去受审，并处以极刑。

这里应当交代一下曾在《奥德萨档案》等纪实小说中被描写得神通广大的“奥德萨”组织。奥德萨与苏联黑海沿岸的工业重镇奥德萨之间毫无关联，它是德语“前党卫军人员组织”的缩写（ODESSA）中文音译。该组织确实活生生地存在过，规模达到过数千人。其精神领袖是马丁·鲍曼，主持日常事物的核心人物则是前党卫军上校弗兰茨·略斯特尔。此人上窜下跳，交际极广，且机警过人，心毒手狠。战后，他逃到叙利亚，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叙利亚公民；他自己也使用了哈达德·赛伊德的这个典型的阿拉伯人名字。至于奥德萨的最高指挥所则飘忽不定，最早设在慕尼黑，以后一度改在斯图加特，又经过汉堡，还曾选择了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奥德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国际性。其上层领导集团中，既有纳粹德国时代的党卫军上校帕乌利·豪谢尔、党卫军上尉弗朗茨·施佩格莱、纳粹党某省党部首脑哈特曼·劳特巴赫，又有意大利新法西斯组织的头脑皮纳特利公爵、阿尔米兰特、米罗杜莱以及达利耶茨。

奥德萨除去建立B-B航线外，其另一个主要任务是为逃亡的纳粹

战犯提供合法证件，以对付盟国执法人员和其他反法西斯势力的追查。这个任务其实早就由纳粹德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卡登勃伦纳于帝国垮台前夕，向临危授命的第六局军事处处长、党卫军上校斯科尔兹内下达了。不料，半个多月后的1945年5月15日，该处长即成为美军的俘虏，直至1948年7月才越狱成功。不过，奥德萨内部人才济济，当年中央保安总局专门负责制造外国货币和假证件的机构（代号为近卫军）负责人弗里德里希·施维德少校就是奥德萨的早期成员，国际谍报组织公认，他们制造的各种假证件确实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他自然不会放弃大显身手的机会。

### 第三节 驻德美军占领当局是庇护纳粹战犯的始作俑者

美国军方蓄意庇护纳粹战犯的态度在1946年下半年已露端倪。当年，继宣布无罪释放首要战犯沙赫特等人后，美军控制下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还对汉斯·弗里茨彻等重要战犯宣布无罪释放。弗里茨彻的官职和地位虽非最重量级，但他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极为恶劣，罪行严重。“二战”期间，他曾任纳粹德国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部务主任兼国内出版司司长，后又担任广播司司长。他是1933年5月加入纳粹党的老党员，曾负责实施全国报刊向纳粹主义接轨的“一体化”，使全国的报刊种类由纳粹党执政前夕的4700多种锐减到1944年的970多种，并主持在全国和所有被占领区内的广播电台中连篇累牍地吹捧希特勒“超凡的历史作用”，宣扬纳粹的侵略战争政策。1947年，驻德美军当局的做法就更加露骨：在“特别行动队案件”中被判处极刑的15名双手沾满和平居民鲜血的主犯，最终只有2人执行死刑，其余13人均被美军当局改判15年以下监禁，有些人并获准保释出狱。

1947年10月31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罗吉奥诺夫在联合国大会第102次全会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军驻德当局违背美国前国务卿贝尔纳斯所做的承诺，拒绝向苏联政府移交1000多名“二战”期间在苏联领土上犯下严重罪行的纳粹战犯。其中包括1941年9月底巴比雅尔大屠杀

的主犯之一弗罗斯托夫斯基、在劳城秘密警察营杀害了20多万名苏联公民的主犯之一雅诺夫斯基以及一名参与制造杀害28 000多名犹太居民的维尼查惨案的告密者。而上述行径是明显违反联合国大会1946年2月13日通过的关于引渡和惩办战犯的决议和同年12月15日通过的关于把战犯从流离失所者居留营内清除出去的决议的。

此后，这种势头愈演愈烈。1949年，美军驻德最高长官卢修斯·克莱将军公然下令，将已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在党卫军系统内权势仅次于希姆莱的副领袖卡尔·沃尔夫等重要战犯减刑释放。同年10月，美国军方公开出面，宣布赦免并释放60名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宣判有罪的大战犯，其中包括屠杀苏联人民特别是列宁格勒人民的元凶李普元帅，应对布亨瓦尔特集中营57 000多名囚犯死亡负责的集中营首席法官、党卫军将军瓦尔德克斯，大规模屠杀战俘和平民的主犯莱因哈特·霍尔特将军和冯·查尔莫特，疯狂杀害苏联和平居民的指使者冯·考勒·霍特、曼托菲尔·勒曼。1949年底，美国占领当局又授意西德政府，赦免了上万名尚未被起诉的乙级纳粹战犯，其中有希特勒私人参谋部要员和他策划在欧洲的一切残暴行为的得力助手瓦尔里蒙特。1951年1月，美国军方又宣布对纳粹战犯进行第二次大赦，对不少战犯的死刑判决也因此取消。其中包括屠杀法国人民的主犯之一、陆军上将维尔盖尔姆·斯派达尔和霍里特·奥托·威勒、恩斯特·冯·雷萨以及数名党卫军将领。1952年7月，美国占领当局又以“鉴于卓越的行为”为理由，非法释放了因亲自下令杀害战俘的纳粹陆军上将汉斯·盖奥尔格·莱因哈特，并安排他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高级指挥官。同年12月，美国军方还以“健康原因”，擅自将纳粹德军元帅威廉·李斯特从兰茨堡监狱中释放。他因对巴尔干各国和平居民进行残酷屠杀被判无期徒刑。1953年，美国占领当局再次释放了650名在押的纳粹战犯，其中军衔为将军的就有伦杜利克（党卫军上将，曾策划、指挥旨在除掉南斯拉夫人民军主帅铁托的战役——“跳马行动”等血腥镇压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围剿战役）、霍特、马肯森、米尔希、法尔凯霍尔斯特等。在美国驻德军事占领当局的授意下，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

首要战犯——冯克、纽莱特、席拉赫、雷德尔、施佩尔等均被提前从柏林的施潘道国家监狱释放，仅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纳粹党第三号人物赫斯例外。

这是因为，战后很快到来的冷战迅即使原来的反法西斯盟国分化为苏联东欧与北美西欧两大对立阵营，彼此间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审判战犯的工作不能不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被一再推迟，直至被中断。西方国家对审判战犯的工作变得虎头蛇尾，对战犯们的量刑大大放宽，许多战犯只受到象征性惩处，甚至被大批宣布无罪释放。具有戏剧性的一幕是：1948年夏，在意大利的海港巴里的边防检查哨所，一群神色紧张的德国中年汉子，正在接受驻意美军2677团的安全检查。忽然，一名美军上尉指着一位德国人的腋下大笑着说：“你好啊，党卫军先生，可惜你隐藏得还不彻底。”看着那个德国人惊恐万状的样子，上尉挥挥手，意味深长地说：“别害怕，你尽管放心地上船，我绝不为难你，可别叫俄国人逮住。现在我们已经不是敌人了。要是两年前你落到我手里，我非把你送上绞架不可。”这伙德国人正是一群沿着B-B交通线逃亡的党卫军战犯、前特列勃林卡灭绝营的看守，人人都亲自动手杀死过无辜的犹太妇孺。

苏联在这一方面同样有所动作，与西方大国相比，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这里至少可以指出一个线索：1946年10月22日，驻德苏军根据苏联政府的命令，将5万多名德国各方面专家和技术人员用92列火车车厢强制运往苏联效力。从1953年11月15日起，苏联政府改变了要求他们定居苏联的初衷，允许其陆续返回德国。这批人里面肯定有相当一部分具备战犯的资格，但苏联政府出于希望他们提供技术合作的目的，放弃了对他们战争罪行的追究，更没有进行审判。这样，估计至少有数百名纳粹乙级战犯漏网。

#### 第四节 纸夹计划——专家型纳粹战犯的保护伞

冷战刚刚在孕育，一些颇有战略眼光的美国情报界人士就意识到尽

可能使用纳粹战犯中各种类型专家的必要性，认为这是美国在未来战争中战胜苏联的重要保证。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军事情报部门联手，精心制订了名为“纸夹计划”的秘密方案，准备把数以千计犯下严重违反人道罪的形形色色纳粹专家都搜罗进由美国政府精心制作的这个巨大的无形纸夹中。

对于战犯中的核物理学家、生物学家、航空医学家、尖端武器设计师、高级情报人员等，美国有关方面均给予极为宽松、优厚的待遇：除因直接杀害集中营囚犯而臭名昭著的阿图尔·鲁道夫1人外，不仅全部豁免了其战犯身份，而且按专家待遇予以留用，准许他们加入美国国籍，就连他们的家属甚至情妇也获准定居美国。突出的一例是后来成为美国“航天医学之父”的纳粹医生胡贝图斯·斯特鲁格霍尔德，他在达豪等纳粹集中营策划的高空高压实验，曾造成至少120名囚犯在肺部大出血后极为痛苦地死亡。对于身体十分强健的实验幸存者，这位医生仍不放过他们，还要剥光他们的衣服，赶到严寒下的室外冷冻10个小时左右，再驱赶进充满八九十度高温蒸汽的室内“加热”，然后继续在严寒与高温之间摧残他们，直至最后一名被实验者肺部大出血后气绝身亡。显然，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乙级战犯。但是，他由美军情报部门掌握后，不仅没受到任何惩处，而且有职有权，步步高升。直至功成名就，荣获美国航空医学之父的美誉后，才踌躇满志地闭上双眼。

1945年5月19日，一架所有的玻璃窗均被严实遮盖着的美国军用运输机飞抵华盛顿郊区的某个军事基地。飞机上走出3个德国人，他们是按照“纸夹计划”被送到美国的第一批纳粹科学家——赫伯特·瓦格纳及其两名助手。他是德国亨舍尔能源公司的导弹项目总设计师，也是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第一种应用于实战的火箭HS-293的发明者。他们也是“二战”结束后首批来美国定居的纳粹科学家。瓦格纳鬼鬼祟祟地飞抵美国，标志着纳粹科学家大批移居美国的开端。瓦格纳无疑地全部隐瞒了他在德国非纳粹化法庭上被审讯的罪恶历史。为换取他和他的同事们将对“纸夹计划”所提供的丰厚利益，美国情报部门公然触犯美国官方的有关政策，向纳粹科学家提供了使他们逃脱司法



惩处和在美国重新大显身手的机会。瓦格纳的到来使“纸夹计划”付诸实施的日期提前了，虽然使用纳粹科学家的智力和资源的意图早在纳粹德国崩溃前即已制定。1944年当盟军部队从诺曼底半岛推进到德国本土之后，一支调查纳粹科学家下落的特遣小分队跟踪追击，在全德国范围内搜查纳粹德国的各个研究机构并获取希特勒的科研成就和专家顾问团。

“纸夹计划”招募的纳粹德国火箭专家盖奥尔格·里克海，在战争期间担任大量使用多拉集中营囚犯从事奴隶劳动的V-2火箭制造厂最关键的车间总管，他安排的超负荷苦役，使数百名囚犯因劳累过度致死。后来，里克海的罪恶历史被揭露出来，美国当局不得不允许他回德国接受多拉集中营战争罪行法庭的审判；同时却做了大量工作，使他被法庭宣布无罪释放。第三帝国时期的V-2导弹研究所负责人多恩伯格将军，自1947年起成为美国空军顾问。纳粹德国的火箭专家阿尔图尔·拉尔夫，战后不久即由美军情报部门根据“纸夹计划”送到美国，逃避了盟国的正义审判。他在美国一直无忧无虑地生活到1990年。同年，因身份被媒体广为揭露，才依依不舍地移居加拿大。

1986年4月26日，被“纸夹计划”雇用的前纳粹德国火箭专家组的22名成员在亚拉巴马州汉特维尔城的宇宙火箭博物馆前合影留念，至迟到那时，他们始终逍遥法外。其中著名的乙级战犯包括：艾勃哈德·雷斯、康拉德·丹农贝格、维尔纳·齐贝尔、哈奈斯·利勃斯腾、卡尔·海姆堡、奥托·席尔施勒、哈奈斯·吕尔森、瓦尔特·豪瑟曼、赫尔穆特·霍恩、艾利克·瑙伊勃特、维尔纳·弗斯、贝尔那德·台斯曼、君特·豪科扼、恩斯特·朗格、威廉·昂格尔、泰奥多尔·佛沃、赫伯特·贝尔格勒、维利·库伯格、瓦尔特·雅科比、赫尔穆特·措伊克、罗勃特·派茨等。

生物、化学领域也是美军当局积极使用纳粹战犯的重要领域。

除头号纳粹细菌战犯施莱伊伯格（详见第五节）外，经美军占领当局批准，参与细菌武器研究的纳粹战犯还包括：汉堡伯恩哈特-霍赫特研究所负责人亨利希·里宾尔特教授，他曾任第三帝国卫生问题顾

问；设在伍佩尔塔尔的法本化学工业康采恩卫生研究所所长瓦尔特·基库特教授；设在吕纳堡的德国国家医学问题研究院负责人库涅尔特，他在纳粹德国时期就是著名的细菌问题专家。“二战”期间，他即参与大规模杀害和平居民的细菌武器的研制。从1940年出任设在波兰罗兹的国家医学研究所所长起，他便同希姆莱领导的党卫军卫生研究所紧密合作，并进行了无数次以集中营囚犯为试验对象的大规模伤寒及其他传染病的研究。设在弗莱堡的国家实验研究室，其领导层中也包括一些曾使用医学手段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战犯。

“二战”期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莫诺维茨分营主持法本公司设立的综合橡胶工厂、对大批囚犯因充当新药试验对象而致死负有直接责任的乙级战犯奥托·阿姆布罗斯，战后被美国接纳入境。至少在1986年，他还在为一家美国化工企业服务。

根据美国著名法学家约翰·洛夫特斯长期的研究结果，美国至少招募了4000名纳粹战犯，将他们编入“弗兰克·威斯纳的地下军”，以便从事反对苏联的“密而不宣的战争”。洛夫特斯还指出：“二战”后，“数百名曾与纳粹合作过的东欧国家战犯被秘密运往美国，在那里受到保护”。

### 第五节 殊途同归，美、苏共同庇护纳粹医学战犯

无奇不有。“二战”结束后，居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名民愤极大的纳粹医学战犯先被苏联重用，又被美军庇护，直到20世纪80年代依然逍遥法外。他便是前纳粹德国军事医学院保健部负责人、军医少将瓦尔特·施莱伊伯格。

纽伦堡法庭认定该研究院负责人之一的施莱伊伯格曾多次下达指令，在好几个集中营内利用战俘和犹太人囚犯进行过传染疟疾、天花、霍乱及其他传染病的无数次试验，而且了解纳粹德国准备进行细菌战的全部内容和每个环节。施莱伊伯格也是纳粹德国帝国研究会议的成员，他支持、资助和监督这些“医学试验”。一方面，他亲自指派医生们到

萨克森豪森和纳茨威勒集中营进行传播流行性黄疸的试验，使那里的囚犯们由于感染上黄疸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施莱伊伯格是出席一次纳粹医学家会议的级别最高的官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上级机关向与会者丁·舒勒医生下达命令：给布亨瓦尔特集中营的囚犯注射毒剂苯酚，以便观察他们究竟要过多长时间才会死亡。5名囚犯通过这种方法被杀死了。丁·舒勒事后描述说：“他们迅即倒在椅子上，脸上不带任何表情，在注射过程中，除发生短暂的全身痉挛外，他们不曾出现丝毫疼痛的表示。”他提示施莱伊伯格在柏林的研究小组：“这意味着接受注射者在不到半秒钟死去。”这次研讨会不久，纳粹德国便崩溃了，丁·舒勒医生被盟军抓获，于监狱中畏罪自杀。参加该会议的级别次高的官员、党卫军旅队长约阿西姆·姆鲁郭夫斯基医生，后来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医生审判案”时被判死刑并迅即执行绞刑。显然，施莱伊伯格对集中营囚犯被残杀也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由于上述种种严重罪行，施莱伊伯格理所当然地被列入战犯名单。

施莱伊伯格于1945年被苏联红军俘获，作为战俘被关在各种各样的战俘营内，甚至还曾被关进著名的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以后，他被送入反法西斯学校学习，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并被培训成东德警察卫生部门的首脑。1946年，他来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作为苏联方面的证人出庭作证，以便对纳粹医学战犯提出起诉。美国方面的副检察长亚历山大·哈迪在法庭上见到施莱伊伯格感到震惊，因为他的名字早已被盟国执法部门列入应予逮捕的200名参与了医学罪行的战犯名单。哈迪和在纽伦堡法庭任职的其他美国司法人员告诉苏联方面，施莱伊伯格应接受审讯甚至被送上法庭。但是，苏联方面迅即将他送回莫斯科。哈迪不久向美国政府报告：“苏方非正式地告知我说，施莱伊伯格现在正供职于苏联的某些热点部门，苏联人需要他不间断地提供服务。”两年以后，施莱伊伯格重新出现在西柏林。在一次会议上他告诉记者，他已经奇迹般地从苏联人的控制下逃走了。然而，他的到来很快导致一系列传闻出现：他早已沦为苏联人的暗探。一位前苏军战俘向美军情报部门的代理人密报，在施莱伊伯格被俘期间，已经自愿地同苏联方面合作，他

投奔自由其实是负有特殊使命而来的。尽管如此，美军情报部门还是雇用他干了几年，让他担任驻德美军奥贝鲁萨尔营地的医生。他也是中央情报局有关一项在审讯中使用毒品套取被审讯者口供的计划的理论技术的提供者。

不久以后，他依旧恢复了从事军事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不同的只是他所服务的主子由希特勒变成杜鲁门，他所穿的制服由德国式改换成美国式。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此人的经历，引起正在积极策划细菌战的美国军方的高度兴趣。因此，这个被集中营囚犯称为“有学问的吃人野兽”，不但被豁免了战犯身份，而且被送往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朗道尔夫-菲尔特美国空军学院从事细菌战的筹备工作。1951年9月，美国联合情报行动处依照“纸夹”行动计划将施莱伊伯格带回美国，安排他在设在得克萨斯州朗道尔夫基地空军航空医学学校任教。在这里，美国将军哈利·阿姆斯特朗正在保护纳粹战犯胡贝图斯·施特鲁格霍尔德，使他免于被揭露到光天化日之下。施莱伊伯格就职于全球预防医学教研室，研究在世界上极其遥远的地区开展对细菌战幸存者的救护、营养和卫生等有关军事医学方面的课题。不过好景不长，在美国出现了施莱伊伯格指名道姓的控告。前文所述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美国方面副检察长哈迪以及前纽伦堡法庭医学犯罪调查人员雷奥·亚历山大向白宫就美军聘用施莱伊伯格一事提出指控，并提交了以纽伦堡审判的证词为基础的证实施莱伊伯格的纳粹战犯身份的长篇报告。与此同时，一名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幸存者向波士顿的移民当局报告，她亲眼见到施莱伊伯格出席了一次在该集中营召开的医学会议，议题就是讨论以她本人充当试验用豚鼠的手术试验的成效。这位名叫雅妮娜·伊万斯卡的前女囚，是被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医务部门用做进行毒气坏疽和骨骼移植试验对象的74名波兰女抵抗战士之一，这些妇女在试验手术中大腿被深深地剖开后，又被充填进玻璃碴、木屑和糜烂性毒剂——芥子气。其中一些人的腿骨被整个截除掉，移植到其他妇女的腿上。经过上述试验的妇女，有5人死于手术，6人手术后被枪杀，其余的63人尽管活下来，但也导致终身残废，其中一些人在战后不久因手术后遗症

而死去。施莱伊伯格是美国实施的“纸夹计划”行动中所涉及的最大的纳粹战犯之一。面对数不胜数的指控施莱伊伯格犯有反犹太人和其他集中营囚犯罪行的证据，美国联合情报行动处和空军官员表现出蔑视美国法律的冷漠态度，完全缺乏道德方面应有的重视，以致“纸夹计划”被舆论界烦扰了几十年。上述冷漠态度的突出例证之一是当时任美国空军外科总监的阿姆斯特朗将军，他竟然信口雌黄地对一批美国军医称：“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施莱伊伯格战时在德国的所作所为是有罪的，他与我在美国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不同。”人们还记得，正是同一位阿姆斯特朗将军，他在担任得克萨斯航空医学机构负责人期间，先是庇护了纽伦堡法庭的被告斯特鲁格霍尔德，继而又起用纽伦堡审判的另一个战犯康拉德·色弗尔。

1952年2月，五角大楼由于施莱伊伯格的劣迹被新闻媒介披露而遭到舆论界的围攻。主管空军的国务秘书托马斯·芬莱特尔最终向美国公众宣告：他已经命令空军将施莱伊伯格从职员名单中除名，空军将不准继续雇用他。他还宣布施莱伊伯格将处于军事管制状态中直到他在未来几周内被驱逐出美国。然而，美国空军并不曾驱逐施莱伊伯格，他的纸夹合同继续有效。而且，当他的合同期满之时，美国联合情报行动处主任本杰明·海克梅耶尔大笔一挥，又签发了准许他参加该单位所辖的另一个项目“63计划”的短期合同。此外，施莱伊伯格也并没有被军事管制，而是躲藏到加利福尼亚州他的女儿家中。尽管芬莱特尔断言：施莱伊伯格将很快离开美国，但没有一个官员被告知应对他采取何种措施。出于对施莱伊伯格可能被苏联人绑架的担忧，美国中央情报局阻止了将他遣送回德国的计划。朗道尔夫基地的最高领导奥迪斯·本森将军甚至试图送他到一家学院任教。他对许多大学的主管人员称，施莱伊伯格不过是一个有组织的排斥有犹太人血统的医务人员的运动的牺牲者，请求他们收留他。直到施莱伊伯格告诉美国空军当局，他打算移居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他的另一个女儿在那里居住。1952年2月12日，美军有关负责人委托美国联合情报行动处主任海克梅耶尔·沃尔什将军帮助施莱伊伯格寻找一个工作岗位，使他有可能在阿根廷重新定居。就在

当天，沃尔什即开始为解决问题而奔忙，直到施莱伊伯格在阿根廷定居的手续全部办妥，美国军方这才算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

此后，施莱伊伯格在阿根廷怡然自得安度晚年，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也没有人来打扰他。

### 第六节 放手使用纳粹战犯，将其推上反苏第一线

为了对抗同样拥有核武器和现代化装备的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美国积极唆使和支持法国总理提出的组建一支欧洲军的计划，力图把前纳粹武装力量名正言顺地变为西德国防军，使其充当对抗苏联军事集团的骨干力量。为此，驻德美军当局开脱、释放了大批纳粹军队中的战争罪犯。

在美国的默许和庇护下，前纳粹重要军事情报局东方处处长盖伦出任西德联邦情报局局长，纳粹高级将领汉斯·斯派达尔（曾任纳粹德军驻法国部队参谋长，是隆美尔元帅的主要助手）和阿道夫·豪辛格（曾任纳粹武装力量大本营作战处长，是纳粹德国侵占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在北约总部中担任要职；纳粹坦克部队中将路德维希·克吕维尔被美军内定为西德国防军总司令；纳粹海军上将赫尔穆特·海耶与弗里德里希·卢格，则被美军占领当局委以制订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同苏联东欧国家作战计划的重任；希特勒时代的海军中将勃格尔，则被美军当局内定为西德海军总司令的最佳人选；纳粹空军将领艾森霍威尔、查伊德曼、曼施泰因和驱逐机王牌驾驶员阿道夫中将，依照美军占领当局的指令重建德国空军。

至于西德国防军的 4 个主要军团的司令官，美军占领当局决定全部由纳粹将领担任，即冯·曼托菲尔、冯·施威林、迪特洛弗森和冯·斯文宾伯格。1953 年 2 月，西德国防军成立了遴选委员会，负责遴选未来的各级军官。其主席不是别人，而是前纳粹陆军人事局长（后又升任兵团副司令官）孔岑。在克里特岛战役中对平民与战俘犯下残暴罪行的纳粹空降兵将领施图加特，也奉命出任前伞兵联盟两主席之一；曾

在柏林战役中被希特勒寄以厚望的纳粹德军第九集团军司令官文克，受命赴阿根廷招募前纳粹将领、军官和党卫军军官回国服役；前纳粹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被美军驻德总司令部战史局招聘，并兼管情报工作。曾在纳粹德军总参谋部担任过要职的冯·波宁、冯·基尔曼塞格、乌尔利希·德·密兹埃尔这三位陆军上校，被美方安插在西德陆军部负责研究未来对苏联进行战争等核心机密问题。类似他们这样的前纳粹德国总参谋部军官，在西德陆军部当中多达七八百人，占到总人数的2/3以上。在希特勒参谋本部作战处长勃兰特将军领导下，在西德卡塞尔成立了德国军官团。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指挥西德边防警察的主官是第三帝国时期的军事情报首脑之一格哈德·马斯基；在西德东、西、南、北四个方面的边防警察首脑中，除东部外，全部是前纳粹德国高级将领，他们是汉斯·布隆、格尔贝尔特·希捷和安东·格拉塞。

在美军管制当局的默许和配合下，西德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向法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派遣了多达700人的非正式军事使节团，其中的纳粹战犯至少包括200人，例如前纳粹陆军将领赫尔穆特·冯·法尔姆巴赫、蒙采尔，炮兵将领尤利乌斯·布劳恩，党卫军将领卡茨曼等，以及费歇尔上校等几十名党卫军校级军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指挥国防军的将军们绝大部分为希特勒军队中的上校以上军官，其中45人的军衔已经达到将军。西德的将领中有70%曾在希特勒德军的总参谋本部工作过，或者就是纳粹前国防部最高统帅部的领导成员。当时有7名西德国防军的将军曾被判决为战犯或被列入盟国战犯名单。

## 第七节 西方盟国紧步美国后尘

“二战”结束后多年，世人似乎觉得法国政府包庇纳粹战犯的问题不很明显。其实，这只是表象而已，法国与英美的做法，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间的关系。正是依照20世纪50年代初期法国总理提出的欧洲军计划，法国同德国“化敌为友”，进而将一批批死有余辜的纳粹战

犯减刑甚至干脆释放。这个进程大致从1954年就开始付诸实践。只不过整个西欧都在因“共产主义的威胁”而谈虎色变，大部分人的注意力早已偏离了追捕纳粹战犯，所以直到很久以后，一些有识之士才回过头来追溯当时的法国政府庇护纳粹战犯的问题。1983年4月5日，法国《世界报》刊登署名文章《法国特工部门曾起用过去的纳粹分子》。它披露：“法国的秘密情报机关在‘二战’后起用了熟悉情况的前纳粹分子，这些人过去曾是第三帝国的秘密情报人员，多数是在1945年以后在战俘营内发现的。对前纳粹分子的招募，是以反间谍机关缴获的德国特工档案以及前线军事侦察部门收集的文件为基础进行的。该项工作是由1944年11月成立的研究与调查总部（现今法国对外安全总部的前身）的人员实施。一些法国特工也承认，招募对象主要是曾在以下两个部门工作过的纳粹分子：1. 中央保安总局第六局（国外情报局）。它由两个科负责受苏联影响的地区，包括伊朗、土耳其、某些阿拉伯国家和东欧国家，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2. 中央保安总局谍报局（原属总参谋部，‘七·二〇’事件以后并入中央保安总局）。”“二战”一结束，法国秘密情报机关立即着手招募了近百名前纳粹情报官员，目的在于恢复或新建必要的情报来源体系。法国特工们企图通过这些纳粹分子作为中介，以便同这些人昔日物色的谍报员和特情网挂上钩。当时，纳粹德国情报部门“二战”前和战争中在东欧各国建立并已使用过的谍报员和特情人员大部分尚未被苏联驻军发现。‘布尔什维克的急剧扩张’，使法国同昔日的仇敌德国站到同一条战壕里。法国政府还秘密地从德国招募了V-2火箭技术小组的重要成员沃尔夫冈·皮尔茨教授，他后来成为法国的‘凡隆尼克’火箭之父，而这个火箭是戴高乐总统的空间计划的基础。”

法国驻西德高级专员弗朗索瓦·庞塞，在他写给当时的西德总理阿登纳的信中讨好地说，“在对待纳粹战犯方面，我使用了1500次赦免权”。1951年6月，法国当局从狱中提前释放了重要的纳粹战犯贝伦加特·兰凯，他曾任纳粹德军伞兵部队的将领，后又担任驻法国布列斯特要塞司令。他的罪行是野蛮地迫害和侮辱法国和平居民。1954年更加



出格的事情令国民大惑不解，法国司法机关又悍然释放了两名为举国上下切齿痛恨的顶尖级刽子手、盖世太保驻法国总头目奥伯格和克诺亨以及一大批原来已被判处死刑的重要纳粹战犯。

澳大利亚也存在这方面的劣迹：藏匿在澳洲的纳粹战犯，不仅有德国人，还有不少克罗地亚独立国时期的乌斯塔希分子，其中一些人身上沾满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的鲜血，早就为南斯拉夫联邦政府所通缉甚至缺席判处死刑。据1999年8月16日出版的《悉尼先驱晨报》报道，1946—1951年期间，在政府明令禁止德国人进入澳大利亚境内的那段时期，出于英国1945年9月18日的要求，竟有至少127名德国科学家秘密进入澳大利亚，以防他们为苏联争取。其中，31人是纳粹党员，12人属于纳粹其他组织，10人曾在为纳粹集中营提供杀人毒气的化工企业中担任职员，6人是党卫军成员。在这批科学家当中，有7人曾被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作为战犯加以通缉。澳大利亚政府的目的是利用这些人参与当时极为机密的火箭研制计划。在当时，澳国家安全机关曾极力反对这项计划，但执政的工党政府根本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此外，澳大利亚也多次对抓获的纳粹战犯实施重罪轻判：1953年2月，澳大利亚法庭对纳粹战犯布赫马埃尔宣判无罪释放。事实上，该犯曾直接参与对波兰拉当集中营内囚犯的屠杀，使该集中营的3万名囚犯中，仅剩下5000名得以生还。该法庭对设在荷兰安亨纳粹集中营的司令官、党卫军少校弗兰茨·多宁格尔也只判处两年半徒刑。而他在该集中营任职3个月期间，曾下令处死了数千名囚犯。直至20世纪末，维森塔尔中心还向澳大利亚政府通报了46名现在仍生活在该国的证据确凿纳粹战犯的名单。与美国的做法稍微不同的是，澳大利亚政府收罗纳粹科学家的计划名为“火柴盒”计划。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的胁迫下，西欧各国也出现了一股化敌为友、姑息纳粹战犯的潮流：1951年10月，英国占领当局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释放了前纳粹德军元帅阿尔伯特·凯塞林。他原本因为屠杀意大利和平居民和其他严重罪行，被判处终身监禁。英国军方还庇护了另一名恶贯满盈的乙级战犯亨利希·罗杰。他曾担任纳粹德

国的什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州长，后又担任“奥斯特兰”（今白俄罗斯及波罗的海三国）帝国专员。他不仅领导了对该地区残酷的经济掠夺，而且下令屠杀了数万名和平居民，仅在拉托维亚，经他授意杀害的苏军战俘即达5万人以上。党卫军中将、卢卑克警察局长施莱德尔本是一名重要战犯。在英军当局的蓄意庇护下，他不仅在整肃纳粹分子的运动中顺利过关，而且被列入领取津贴人员的名单。被英国军事占领当局委任为什-荷州副州长的瓦尔德马尔·克拉夫特，也是一名犯有重罪的党卫军战犯。

比利时政府则提前释放了前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驻该国的首领康斯坦丁·卡纳里斯。他因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被布鲁塞尔法庭判处20年监禁。不久，被提前释放的还有前纳粹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最高军政长官法肯豪森。他被认为是纳粹德军在比利时的头号战犯，被判处12年徒刑，结果只关押了3年多即获释。纳粹德军驻在比利时的军事管理局长雷德尔，曾因重罪被比利时法庭判处12年苦役，结果不仅提前获释，而且得到比利时政府30万比利时法郎的补偿。

1952年2月，希腊政府则赦免了前纳粹将领安德列，他因犯有战争罪被希腊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1952年7月，丹麦政府宣布释放前盖世太保驻丹麦的最高首领卡尔·亨斯·霍夫曼。本来，因为他拷打、流放和杀害丹麦人民，丹麦政府曾认为他是必须严厉惩办的纳粹战犯。

加拿大政府也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将被加拿大法庭判处终身监禁的重要乙级战犯、屠杀东欧国家人民的著名刽子手库尔特·梅耶尔秘密释放回西德；美国军事占领当局还准备安排他在拟议中的“欧洲军”中担任要职。

苏联政府是审判纳粹战犯的创始国，在1955年之前，其审判纳粹战犯的态度是坚决严厉的。从1945年至1949年底，已将45000多个纳粹战犯审判并惩处，其中1/3被送到苏联西伯利亚强制劳动。

1955年下半年，苏联也开始同西德政府搞缓和，放弃了坚持多年的“苏联政府早已将全部在押的德国战俘释放，现在关押的只剩下战

犯”的立场，将一批原来已经判处重刑的9 626名乙、丙级战犯作为因特殊原因滞留的战俘释放回西德或民德，其中竟包括纳粹陆军总司令菲尔迪南德·朔尔纳和声名狼藉的纳粹杀人医生卡尔·克劳贝格。前者对侵犯波兰、希腊和苏联负有重要责任；后者在奥斯维辛、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专事绝育新方法试验，致使上千名女囚致病、致残、丧失生育能力直至死去，民愤极大，苏联法院原本判处他25年监禁，许多受害者是准备看他身葬异乡下场的。另一个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25年监禁的重犯奥斯瓦尔特·卡杜克，也于次年被释放回西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和另一个党卫军小队队长勃格尔，被囚犯们称做“魔鬼中的魔鬼”，人人见了他们心惊胆战。他们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种又一种酷刑，对那些略有小错或是他们看着不顺眼的囚犯横加拷打，昏死过去用冷水浇醒后再打。除非发生奇迹，不把人折腾到死，他们是不肯善罢甘休的。

但是，苏联政府对于本国的纳粹战犯，还是认真追查、从严惩处的。1943年至1955年，是苏联审判战犯的高潮时期。在此期间，苏联高等法院于1952年将苏军叛徒、法西斯刽子手尼古拉·什莱耶夫判处死刑。他被德寇俘虏后立即叛变，并沦为纳粹集中营看守。他在特列勃林卡灭绝营受到德国主子的高度信任，被司令官斯坦格尔任命为单独启动毒气室开关的专门管理员，在一年多时间内杀害了上万名犹太人。以后，审判纳粹战犯的次数和规模明显减少，但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1962年，乌克兰地方法院在基辅对11名主要的卖国贼和纳粹帮凶进行了审判，其中10人被判处死刑，1人被判处15年徒刑。

## 第八节 拉美国家对纳粹战犯的庇护

在阿根廷，庇隆总统聘请到纳粹德国的一批技术专家，帮助他实施雄心勃勃的国家航空工业计划。

纳粹科学家去阿根廷主要通过两条道路：其一是通过设在法兰克福的旅游服务局。这个旅游服务机构实际上是一个秘密招募纳粹科学家的

据点。其二是通过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负责人是一个纳粹德国军队驻丹麦总司令的前丹麦帮办。他帮助库尔特·唐克等100多名纳粹科学家安全地通过哥本哈根国际机场的边防检查，顺利抵达阿根廷。不久以后，又有60名唐克在纳粹德国时期的同事，沿着他的足迹，通过丹麦这条非法的途径来到阿根廷。这些人当中包括汉斯·伯特、威廉·班塞米尔、保罗·克拉盖斯、路德维格·米泰尔胡勃、赫伯特·沃尔夫以及奥托·帕波斯特博士。他们所有的人都在阿根廷的航空研究所找到了专业对口、待遇优厚的岗位。

几十名纳粹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康拉德·唐克领导下，设计出阿根廷的新式“普尔吉”战斗机。另一名科学家战犯、国际著名的大众汽车和虎式坦克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菲迪南德·波尔什，同阿根廷政府签订了为该国大规模生产汽车的协议。另据柏林《自由报》1951年1月4日报道，仅仅1950年10月底到11月底的一个月间，就有400多个纳粹德国时期的火箭和军事化学方面的专家和党卫军军官直接从阿根廷回国，其中有戈林在纳粹空军中的重要帮凶加兰特、卢德尔、鲍姆巴赫等，来到斯图加特76号兵营要求参军服役。这批人当中，大部分都是够格的战犯，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追捕纳粹战犯的“严冬”已过，于是便明目张胆地回国了。

1960年7月，阿根廷司法当局拒绝了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引渡同处死5万名捷克斯洛伐克游击队员有牵连的前党卫军扬·杜尔坎斯基的要求，因为该国法律规定，对纳粹战犯可提出诉讼的决定期限只有15年，过期自然免于起诉。纳粹战犯在阿根廷找到收入有保障的职业后，安安稳稳地生活10年以上是不成问题的。只消追诉期一到，尽管踏踏实实地返回德国。阿根廷的警察当局也常常帮助纳粹战犯逃跑，使国际追捕组织的不少行动落空。1977年，阿根廷军政府宣布已将“里加的屠户”罗施曼抓获，并准备引渡回国。但是，有关国家的起诉书尚未提出，罗施曼已经越狱成功，逃到了巴拉圭；后来又以弗里德里克·维格那的假名在此生活多年，直至患重病死于巴拉圭的一家医院中。

20世纪90年代，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赫尔格·麦丁在查阅了德国、

奥地利和阿根廷大量档案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二战”结束后的10年内，有80 000名左右的德国、奥地利居民抵达过阿根廷，内19 000人左右在此定居，而其中5 000—8 000人与纳粹战犯有牵连，至少500人存在战犯嫌疑。

其他的纳粹德国和奥地利科学家也最终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定居下来。弗朗茨·格拉赫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细菌研究所内领导了一个生物武器室。1945年战争结束后，格拉赫由于其在战争时期的纳粹历史，曾被她所在的奥地利兽医学流行病学研究所开除。弗里德里希·弗莱什哈克尔则在巴西的一家外资工厂工作。

### 第九节 西德政府如何对待纳粹战犯

德国是绝大部分纳粹战犯的故乡。战争结束后，战犯们不约而同地返回故乡；然后，或者从德国起程出逃，或者潜藏到某个小城市甚至小山村，埋名隐姓深藏起来。绝大多数丙级战犯和相当多的一批乙级战犯，都没有离开德国，至少是没有长期离开德国。因此，德国政府对待纳粹战犯的态度，就成为这些战犯能否被绳之以法的关键。

联邦德国—西德，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和惩处，可以分四个阶段来评价：

一、20世纪50年代之前，德国各级司法机关在盟国军管当局的监督下，还是将相当多的知名度较高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处以比较严厉的惩罚。仅对在各个集中营犯下罪恶的纳粹战犯，就审判了1 941人，其中324人被判处死刑，247人被判处终身监禁，946人被判处有期徒刑，367人无罪释放。

二、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忽紧忽松，各个地方法院宽严各异，整体上失于宽纵。直至身为社会民主党党魁的勃兰特于1969年上台，政府对纳粹战犯和极右翼势力的惩处，才趋于严厉。1945—1955年，西德处于被管制状态，诸事均须听命于美英法占领当局，没有独立审判和惩处纳粹战犯的资格和权力。1949年，盟国开始

将审判纳粹战犯的权力移交给西德两个州的法院。从1955年起三国逐步还政于西德，1958年12月1日，西德司法机关开始独立审判纳粹战犯。由于三国防范苏联甚于纳粹的心态和原则立场，严重地影响着西德政府和司法界对纳粹战犯的公正审判。

截至1982年底，西德联邦政府司法部长宣布：在西德经过侦查或法庭审理的86463名战犯中，受到惩治的只有6432人，尚不足审理总数的8%。而且无论罪行多么严重，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而涉案的战犯总数却高达16万人。这种根本不成比例的状况背后，是美国占领当局的态度在起作用。早在1949年，在驻德美军最高长官克莱将军的纵容下，受右翼势力强烈影响的西德当局作出废止死刑的决定。在当时，其基本受益者只能是大批等待判决或负案在逃的纳粹战犯。此外，为取悦于西德右翼势力，克莱将军悍然下令，将党卫军系统的第二号战犯卡尔·沃尔夫和血债累累的女战犯伊尔丝·科赫减刑至释放。

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西德政府和司法界中隐藏的纳粹分子甚至纳粹战犯，本来就长期未曾得到肃清。甚至存在不止一两个地区、部门出现缉捕纳粹战犯的机关反被纳粹分子甚至纳粹战犯控制的怪现象。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西德联邦政府的17个部长当中，有8人曾在纳粹德国国家机关中担任过领导职务，或者担任过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的负责人：内政部长施罗德，从1933年起就是纳粹党员和冲锋队队员。他曾担任纳粹德国财政专家沙赫特的法律顾问，多方为服务于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拨款寻找法律依据和形式。正是他于1937年7月17日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文章，鼓吹：“德国的哲学是建立在流血、土地和斗争之上。”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在希特勒执政时期曾在经济部任职，担任专员，后来又在纳粹国防军任“民族社会主义”训练方面的教官。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艾哈德，自1930—1943年领导过纳粹政权下的行情研究所，并担任过纳粹党大区书记布尔克里的经济顾问；司法部长弗·舍费尔曾支持过纳粹党并加入“志愿兵团”。1946年，美国占领军当局撤销了他的巴伐利亚总理职务，就因为他丑恶的纳粹历史。交通部长汉斯·西姆堡同德国最大的康采恩过从密切，在纳粹

党统治时期，他是党卫军的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作为“德国空军俱乐部”的总负责人，积极支持戈林建立纳粹空军。全德事务部长艾·勒麦尔，在1933年作为德国国会议员，曾投票赞成纳粹党关于“充分权利”的法案。此法案成为希特勒独裁的“法律”基础。联邦参议院（西德议会的第二议院）事务部部长汉·麦卡兹，1945年之前曾在纳粹党“最高法律委员会”工作，后来又在希特勒的外交部任职，为法西斯间谍机关提供过有关拉丁美洲各国的情报。他于1935年发表的论文中极力推崇希特勒：“人民的意志只是由天生的领袖一人来体现的。”难民部长特奥多尔·奥勃伦德，已被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公布的大量材料所证实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分子和在北高加索等被占领区进行过大规模屠杀罪行的刽子手。在他主持的难民部里，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都是纳粹战犯和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该部的一个秘密的司即西柏林司司长就是纳粹德国时期的罗兹市长和波兰第二大集中营的典狱长维尔涅利·维特茨克。外国难民司的司长乃是曾任匈牙利萨拉希政权民政部副部长的格尔施米特。住宅建设司的负责人则是党卫军的突击队长沃尔伏鲁姆。在当时的西德内阁中，纳粹中、高层官员勒尔、格罗布克、奥伯伦德和克拉夫特担任了西德联邦政府中的部长或部长级国务秘书。

20世纪50年代末期，西德司法界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前纳粹分子多达9000余人。据民主德国争取统一委员会当时的统计，曾在纳粹德国司法部担任过领导职务或曾在各个特别法庭和军事法庭任职的1000多名法官，彼时在西德的司法系统中发挥着领导骨干作用。而在纳粹时代，数十万反法西斯主义战士曾根据上述法官的判决被长期监禁，有6万人被判处死刑。

汉堡警察局就曾是一个为众多的纳粹乙级、丙级战犯盘踞的地方：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担任该局督察长的波伊森，曾任纳粹德军参谋总部军官，后调任党卫军某团团长，在列宁格勒附近驻扎时曾对和平居民犯下罪行。1945年作为战犯被捕，但不久即被英国占领当局释放，并安排他到汉堡警察局任职。该警察局下属的刑事警察分局局长古斯塔

夫·施普列德、该分局重要官员奥托·贝尔卡、该分局下属某所长胡戈·莫里夫等人均为曾在被侵占的苏联领土上对和平居民犯下大量严重罪行的党卫军中级军官。

再有，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西德外交部，在全部9个司57名负责人当中，竟有46人是前纳粹党员，46人是第三帝国时期的外交部官员。其中政治司的10名负责人，全部是双料的纳粹党员加第三帝国外交官。再如维尔纳·冯·巴根所在的西德外交学院中，相当一批战犯窃据了教授或副教授的职位。例如，副教授埃利希·科尔特，第三帝国时期先是外长里宾特洛甫的得力助手，后又在党卫军总参谋部中担任少将职要员。副教授艾米尔·冯·林泰伦则是党卫军保安勤务处驻外交部的全权代表。此二人的名字，在纽伦堡审判中不止一次被证人控诉。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当长的时间段内，担任设在路德维希堡的西德追缉纳粹战犯中心总负责人的艾尔文·许勒，本身就是一个罪恶多端的潜藏战犯。他出于保护同伙与自我保护的本能，擅自将来自苏联、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等战争受害国的大量揭发举报材料扣押甚至销毁，有时竟然蛮横地拒不接受，造成对相当多的一批战犯不能立案或重罪轻判。最令西德政府丢人现眼的是，身为联邦政府国务秘书的汉斯·格罗布克，竟是一个长期隐瞒罪恶历史的纳粹战犯。他在纳粹统治时期曾任内政部部长助理和总顾问，是甲级战犯、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的得力助手。他亲自参与了迫害犹太居民和被占领国家居民的《纽伦堡种族法》和《国籍法》的起草工作；后又代表内政部出席了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还曾到东欧一些国家，协助艾希曼督促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乙级战犯，战后初期，曾被盟国有关机构列为第101号战犯。他在战后依然怙恶不悛，积极庇护和串联了大批纳粹战犯。仅在联邦外交部内，他就安插、推荐了相当一批纳粹战犯，其总数竟占到官员总数的2/3左右。然而，直到前民主德国把这件事的真相公布于众，西德政府才于1963年夏天将他免职。

还有一大批从事过活体试验、无痛致死、化学战、细菌战的纳粹战犯，因为拥有教授、专家、学者、博士、研究员等显赫的头衔，“二



战”后仍然在西德各大学执教，逍遥法外，无人问津：汉斯·于尔根占据着教育部部长级官员的高位，威廉·海尔米什在基尔学院任教，奥托·希勒、维尔纳·马凯尔特、汉斯·格里姆、莱因哈特·霍恩、克劳斯·希凯尔特、盖尔哈特·门德、弗里茨·阿尔特、康拉德·梅耶尔、赫尔曼·奥宾、保罗·里滕布什、诺伊曼，普雷耶尔等人也都在高校任教。

另一桩案件涉及鲁道夫·陶厄，他是纳粹德国的一名医学专家。战争期间，陶厄在法兰克福的海军航空材料学校供职。战后初期，有鉴于他的纳粹党员、党卫军成员和冲锋队的身份以及参加另外5个纳粹组织的不光彩历史，他被“非纳粹法庭”列入二类战犯的行列。他因此被所在的研究所解雇。但为时不久，他就被法庭改列为第四类纳粹分子，成为所谓“受蒙蔽的追随者”。不久，陶厄却轻轻松松地拿到获准出国定居的证件，以技术移民的身份前往美国。抵达美国后，他改行到设在菲拉德尔菲亚的一家化工研究所工作。从此，再没有纳粹战犯的调查人员上门找他的麻烦，无论是美国方面的，还是西德方面的。

其实，就连1963年被任命为西德政府总理的库尔特·基辛格，也是一个政治历史值得打问号的人。他不仅加入了纳粹党，而且于1940—1945年长期担任纳粹德国外交部负责对外宣传广播的官员，同时还是第三帝国宣传部与外交部之间的联络官。这种姑息纳粹战犯的做法，不但遭到欧洲各个战争受害国的强烈抗议，而且引起本国进步人士的反对和不满。

三、20世纪60年代中期特别是1969年以来至80年代末期。在国际反法西斯势力的影响下，德国国内的进步势力也不甘落后，掀起了一轮缉拿漏网纳粹战犯的高潮。当时执政的以勃兰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支持和推动了这一高潮，法院、检察院系统的进步力量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继法兰克福组织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和哈根市举行索必博灭绝营审判案后，又在杜塞尔多夫举办了玛伊达奈克集中营审判案，在斯图加特等地举办了其他主要集中营审判案。

在这股浪潮中，相当一批漏网多年的纳粹战犯受到了罪有应得的惩处。例如，汉堡的路德维希·哈恩落入法网。路德维希·哈恩在战争期间曾担任纳粹德国保安警察与保安勤务处驻华沙的司令官，军衔为党卫军上校。他是镇压华沙地区抵抗运动和对犹太居民推行“最后解决”的最主要的少数几个刽子手之一。由于他狡诈机警，再加上英军占领当局的蓄意庇护，使他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曾多次逃脱掉进法庭和上绞架的厄运。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73年，汉堡重罪法庭在暗中掌握了他战争时期犯有罪行的充分证据后，以他曾在战时下令大肆杀害华沙帕维亚克监狱的政治犯的罪名，判处他12年监禁。1975年，汉堡法庭又获得他参与摧毁华沙犹太区、烧死上千名犹太居民的证据，因而再次将他押上被告席，改判他终身监禁。

四、基督教民主联盟执政时期，德国追捕和审判纳粹战犯的力度逊色于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但是并未发生本质上的倒退。1998年社会民主党再次上台，德国国内反法西斯势力重趋高涨，加之国际舆论的压力，德国惩处纳粹战犯更趋积极。1997年4月，德国梅宁顿地方检察院经过7年调查取证，宣布对长期隐居在沃尔道夫村的前纳粹集中营女看守露易丝·丹茨提出起诉。丹茨女士因在马伊达奈克和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看守时残酷地虐杀女囚，于1947年12月被波兰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但是10年以后，因东西方关系缓和即被开释。此次，梅宁顿检察院又发现了她的新罪行：1945年4月，党卫军当局将柏林以北的马尔科集中营及其他集中营的17000多名女囚押送德国西部的集中营。丹茨是负责押解的女看守之一。半途中，一个犹太女孩要求和母亲一起走，而不要分开她们。丹茨闻讯大怒，决定好好教训这个不懂规矩的劣种。她对女孩拳打脚踢，又加上鞭笞，直到女孩倒在地上停止呼吸。1999年4月26日，德国斯图加特法院对现年79岁的纳粹战犯阿尔方斯·戈特弗里德进行了公审。他本是乌克兰农村一个德国移民的后代。纳粹德军侵占其家乡后，他很快参加了秘密警察部队。以后，又被调至马伊达奈克集中营任党卫军小队长。1943年11月3日，受希姆莱的指示，他直接参加了代号为“感恩节行动”的罪恶行动。这一天里，党

卫军将犹太人分期分批驱赶到一条沟壕旁用机枪扫射。其中，戈特弗里德一人就杀害了500多人。

值得提出的是，在德国对缉拿、审判纳粹战犯日趋积极的大气候下，也存在与主旋律相悖的不和谐音：两德统一之际，又有些别有用心官员，借庆典为名，将狱中关押的纳粹女战犯不问罪行轻重而一概释放，即使是判处终身监禁的重犯也轻松地出狱回家。不过，这毕竟是一股难以改变大趋势的余波甚至暗流，不能掩盖日益向前发展的德国社会风貌。

## 第十节 各大洲都潜藏着漏网的纳粹战犯

然而，半个世纪以来遭到法办的纳粹战犯仅仅是应予惩办的战犯总数中的一部分。另有数以万计的大批纳粹分子，趁冷战之风，漂洋过海，隐藏到五大洲的各个角落。

纳粹战犯首选的避难处所是拉丁美洲，特别是其中的阿根廷。据有关专家分析，潜藏在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等拉丁美洲国家的纳粹战犯多达万余人。因为在拉丁美洲各国都有相当多的德国侨民，他们的地位也很高。在阿根廷，德国侨民人数最多，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巴拉圭也有不少德国侨民。纳粹战犯逃亡到此地，即可免去更换拉丁美洲居民身份的麻烦；同时，早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分子在拉丁美洲就曾建立了许多组织和支部，具有比较深厚的社会群众基础。

除去拉丁美洲之外，纳粹战犯最为喜爱的藏身之地是美国。借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洲受纳粹侵占国家的难民入境手续相当宽松之际，化装成难民大量潜入美国，其中许多人还加入了美国国籍。以“恐怖的伊万”闻名几个纳粹灭绝营的乌克兰籍战犯伊万·德米扬尤克就是此时潜入美国的。1988年前后，他的罪行被媒体曝光，很快被以色列政府引渡回去受审，并处以极刑。

前文所述的纳粹集中营女战犯赫尔米娜·布隆施特奈尔则是通过嫁给美国驻奥地利占领军军士瑞恩，变成瑞恩夫人而定居美国并获得美国

国籍的，一直潜藏到1972年才被一名前集中营女囚揭露，1973年引渡回西德归案。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和波兰政府曾联合向美国政府提出引渡以下5名重要纳粹战犯的要求，他们是：纳粹德国倒数第二任总参谋长、入侵波兰和苏联德军集团军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党卫军中将、党卫军帝国师师长海因茨·莱因法特，纳粹德军驻巴尔干集团军指挥官恩斯特·罗德，入侵波兰的德军高级指挥官海因利希·冯·莱特维茨和尼古拉·冯·弗尔曼。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曾向美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当时已定居美国的苏联籍战犯100余人名单，其中包括白俄罗斯傀儡政权首脑拉多斯拉夫·奥什托罗夫斯基和伪“陆军部长”弗兰茨·库谢尔，要求引渡。两次引渡要求，均被美方拒绝。据美国司法部门估计，“二战”后大概已有1万名纳粹分子披上美国公民的合法身份在美国定居。根据美国著名法学家约翰·洛夫特斯长期的研究结果，美国至少招募了4000名纳粹战犯，将他们编入“弗兰克·威斯纳的地下军”，以便从事反对苏联的“密而不宣的战争”。洛夫特斯还指出：“二战”后，“数百名曾与纳粹合作过的东欧国家战犯被秘密运往美国，在那里受到保护”。

中东地区也是纳粹战犯较为满意的一个避难所。1947年5月，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成为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不到10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的战火再度点燃。“敌人的敌人便是我们的朋友”这一古训，将大批纳粹战犯吸引到中东各国去避难甚至谋职。几年间，大约有数千名纳粹战犯改头换面潜藏在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其中一些人甚至完全阿拉伯化。其中包括制定和组织实施专门针对精神病人和重病病人的“无痛致死纲领”的罪魁祸首之一的维尔纳·海德医生。战后，他潜逃到中东，更名萨瓦德，改宗伊斯兰教，并接受了阿拉伯人的生活习惯。直到1962年，他才被揭露出来，逮捕归案。

20世纪40年代晚期，当法鲁克王朝还统治着埃及的时候，数以千计的纳粹战犯便逃离了欧洲，在尼罗河畔、红海之滨找到了安全可靠的避难所。在这批战犯中，有若干从事尖端武器研究的科学家，其中有两

个人于1952年受法鲁克王朝的委托，开始研究如何建立一座火箭工厂。他们是两位德国教授：保罗·格尔克和罗尔夫·恩格尔。当埃及共和国总统纳吉布及其继任纳赛尔掌权后，该计划曾一度被搁置。1961年当纳赛尔向苏联要求获得重型火箭遭到最后拒绝后，格尔克-恩格尔计划在同年重新上马。经过埃及政府大量投入经费，德国教授带领埃及工人终于在开罗以北的海尔望建成了333座工厂，并且开工。当时埃及的决策集团中的一些人，早在“二战”期间就是倾向纳粹的，很久以来即同“奥德萨”驻埃及的代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埃及人通过“奥德萨”得到一批前纳粹科学家，从而解决了制造火箭的关键问题。“奥德萨”向埃及政府的代表表示：埃及所需要的那种火箭，在体积和射程方面，与维纳·冯·布劳恩的研究班子在佩尼明德为夷平伦敦而制造的V-2火箭非常相似；而布劳恩的研究班子在当时还不难找到。1961年晚些时候，招聘德国科学家的工作开始实施，其中不少人曾被列入战犯名单。“奥德萨”在德国指定一个成员专门负责，而此人又雇用了前党卫军军士海因茨·克鲁格具体承办。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搜寻愿意为埃及制造火箭的科学家。1962年初以来，有相当一批德国火箭推进器专家应聘抵达埃及。其中的纳粹战犯和积极为第三帝国的军事工业服务者包括：欧根·申克与伊伦娜·申克夫妇，沃尔夫冈·皮尔兹教授，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均与维尔纳·冯·布劳恩的V-2班子存在密切的关联。此外，隐居在中东但身份已被查明的纳粹战犯至少还包括：

#### 1. 弗朗茨·阿普罗梅特

他是阿道夫·艾希曼在纳粹德国和被占领地区推行对犹太人问题最后解决的主要助手之一。因罪恶极其严重，“二战”后，他分别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和西德缺席判处死刑。20世纪60—70年代，他仍在与埃及情报机关合作。

#### 2. 汉斯·阿佩勒

他是首要纳粹战犯尤塞夫·戈贝尔的亲密助手。战争结束，他逃离德国；1945年4月24日抵达西班牙，在此定居4年。1959年之后，他成为埃及情报部官员。为逃避以色列的追捕，他更名萨拉赫·沙法尔，

生活方式也趋向阿拉伯化。

3. 弗朗茨·巴尔泰尔

盖世太保驻波兰卡托维兹负责人，被控谋杀了数千名犹太人。1959年以来更名埃尔·胡塞因，指挥着埃及情报部犹太人事务司的工作。

4. 鲍曼

党卫军下级军官，驻波兰保安勤务处审讯组组长。在纳粹德国侵占波兰期间，他先后杀害了近万名波兰公民和犹太居民。战后，曾受到波兰政府多次通缉，并被数次缺席判处死刑。来到埃及后，成为国防部高级官员。

5. 汉斯·贝歇尔

前盖世太保驻维也纳地区负责人，被控在特列森施塔特集中营供职期间犯下多起谋杀罪行。战后曾受到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通缉。20世纪60年代前后成为埃及亚历山大市警察局负责人。

6. 伯恩哈特·本德尔

前党卫军少校，盖世太保驻华沙的负责人之一，犹太人问题专家。他曾参与党卫军和保安警察摧毁华沙犹太区的罪恶行动。战后更名为萨莱姆上校，成为阿拉伯驻瑞典斯德哥尔摩使团的职员。1961年抵达埃及，成为埃及警察部门的政治事务官员。此外，他还领导着近东地区纳粹分子的团体——近东德国人联盟。

7. 维尔纳·比尔盖尔

党卫军军官。战后抵达埃及，更名埃尔·加敏，成为埃及国家情报部官员。

8. 威廉·勃克莱尔

党卫军少尉，盖世太保驻华沙官员。波兰政府以多项罪名对他加以通缉，并缺席判处死刑。1949年来到埃及，担任国家情报部犹太人事务司负责人。

9. 沃尔曼

前盖世太保的地区分支机构负责人，党卫军少尉。捷克政府指控他在捷克的布吕恩地区杀害了2000名犹太人。1949年以来定居开罗，成

为埃及国家情报部顾问。

10. 威廉·勃热纳

党卫军少校，被西德政府以多项重罪通缉并判处死刑的战犯。1956年来到埃及，并担任开罗附近的第333号工厂的人事监督官员。

11. 阿洛伊斯·布鲁纳

纳粹大屠户艾希曼在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犹太人事务处的副手，对屠杀希腊和斯洛伐克的数千名犹太人负有罪责。战后来中东，时而住在大马士革，时而住在开罗。更名格奥尔格·菲舍尔和阿洛伊斯·沙尔丁斯特。

12. 弗兰茨·本驰

首要纳粹战犯施特莱彻和戈贝尔的重要助手。1946年以来定居在埃及亚历山大，担任宣传品发行负责人。

13. 埃利希·本采尔

纳粹德国时期曾长期在戈贝尔的宣传部负责情报工作。战后来开罗，成为埃及国家情报部犹太人事务司官员。

14. 汉斯·埃塞尔

布亨瓦尔特集中营纳粹医生，曾使用上百名囚犯进行各种残忍的活体试验，致使其中绝大多数人身死。曾被不止一个欧洲国家缺席判处死刑。他曾长期同埃及军事科研部门在火箭研制领域进行合作。西德政府曾向埃及政府提出将他引渡回国的要求，但被后者拒绝。作为党卫军上尉和医学专家，他在埃及受到极度的欢迎和优待，最终死于埃及。

15. 欧文·弗莱斯

党卫军少尉，他因对奥地利犹太人犯下许多重罪而受到奥地利和西德政府的通缉。战后来埃及塞得港，指挥一个警察局。在埃及，他已更名为阿赫梅德·萨达特。

非洲亦有数十名纳粹战犯藏身，其中有一批研制V-2火箭的专家，还包括专门以照射超剂量的爱克斯光来摧残犹太男女囚犯生殖器官的恶魔医生霍斯特·舒曼；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名列前茅的甲级纳粹女战犯、纳粹妇女联盟首领汉娜·莱奇，曾在黑非洲的加纳隐藏多年，直

到追捕的风头过去。

即使在远离欧洲的中国，“二战”后也至少抓获过一名万里迢迢潜逃而来的纳粹战犯：党卫军远东地区情报负责人、国际间谍查理斯·米斯因在欧洲到处遭到通缉，便经日本潜逃到自以为无人可以发觉的中国。他来到北京市崇文门内麻线胡同33号一座四合院内，投靠一位嫁给中国留德学者唐某的表姐唐格利丝。米斯在地下密窖内藏身数月后，还是被富有正义感和警惕性的中国人民在1946年8月29日夜间擒获，并将其引渡正在缉拿他的美国军方归案。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上述纳粹战犯中的不少人由于自认为冷战一起，他们的危险已不存在，于是不再夹着尾巴做人，甚至跳将出来，拼命为自己翻案、正名，因而露出庐山真面目。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并未被缉拿归案。这首先是因为美英等西方大国的多方庇护；其次，自20世纪60年代起，许多国家已明文规定不再追究纳粹战犯的罪责；同时，受害者和证人又不断逝去。因此，要揭露上述隐藏的战犯的庐山真面目，无疑是极端困难的。所以，当人们在阿根廷某地同一位白发苍苍的开朗的老翁攀谈时，你很难想象他当年竟是一个挥舞机枪向手无寸铁的犹太妇孺狂射的特别行动队员；当你在德国的中小城市遇到一位热情而慈祥的兜售葡萄酒的老妪，你也绝不会把她同纳粹时期的一大群恶狠狠地将充满毒剂的针管刺向重病儿童的T-4护士联想到一起。

截至20世纪70年代，真正被各国立案审判并判决的纳粹战犯不足5万人，其中被处死刑和死于狱中的合计不过数千人，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重罪轻判或提前释放，有些嫌疑人根本未予立案，有些更逃之夭夭，干脆漏网。例如，前索比堡灭绝营和特列勃林卡灭绝营的长官弗兰茨·施坦格尔，罪大恶极的纳粹医生门格尔，以不科学的人工流产手段和滥施外科手术肆意残害男女囚犯的纳粹医生、另一个“死亡天使”科尼希，毒气车的发明者瓦尔特·劳夫等著名的乙级战犯，均得以在未受惩罚前了却余生。罪行累累的马依达奈克集中营副看守长赫尔米娜·瑞安，是1943年11月3日屠杀18000名犹太囚犯大行动的策划者和现场指挥之一，1979年虽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服刑10年多即因两德统一的



盛世被保释出狱。至于那些被称为“果酱杀手”的T-4护士，因为她们的作案手法很阴险，是借助注射、灌肠、喂药等正常医疗活动之机以毒药杀害重病人（包括儿童）的，不易被局外人察觉；即使有人追查，她们也完全可以推说是失误或医疗事故。她们为数不多，又经过保密宣誓，外界知情者极少。另外，她们的工作岗位在平常的医院里，而不在集中营或灭绝营；她们身穿与一般医务人员并无二致的白大褂，而非党卫军制服。凡此种种，无不成为她们的保护伞。因此，直至1964年勃兰登堡疗养院审判案开始才被大批揭露出来，共计14个案犯。当时，她们中的不少人已年过六旬，西德又早已废除了死刑，故此受罚也较轻。加之，关于对重病患者实施无痛致死以及人体实验是否属于犯罪行为，几十年来各国之间一直争论不休，这也使不少以医疗手段行杀人之实的纳粹集中营医生、种族卫生专家、党卫军护士、T-4护士抓住了护身符，得以减刑甚至无罪释放。在民主德国时期，德国东部获释战犯的日子不太好过，但两德统一后，对这些人的限制和歧视立即在“人道主义”的旗号下被一风吹掉，照旧可以不受歧视地领取养老金，安度晚年。在没有物质困难困扰和精神压力的情况下，大多数纳粹女战犯不难活到德国妇女的平均寿命——80岁以上。至于男性纳粹战犯，活到80岁以上高龄者也大有人在，更有甚者，个别人已经成了跨世纪的百岁老人。

## 第十一章

### 众志成城，追捕纳粹战犯再起高潮

西方大国对纳粹战犯的曲意庇护和苏联政府的过分退让，引起国际民主进步势力的不满，更激起战争受害者的无比愤慨，形成一股强劲的潮流。人们强烈要求将一切在逃的和漏网的纳粹战犯缉拿归案，绳之以法。同时，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色列情报机关频频出击，连连得手。他们以高超的技能，将乙级战犯中名列前茅的大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从阿根廷缉拿回国，将另一个重要战犯弗兰茨·拉德马歇从中东缉拿归案，并在乌拉圭将“里加屠户”库克斯神不知鬼不觉地送进天堂。此外，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世界各国人民对纳粹战犯的认识不断趋于深刻和明确，追捕纳粹战犯已成为进步人类共同的事业。这三股力量互相促进、彼此支持、协调行动，形成20世纪60年代以来追捕纳粹战犯的高潮迭起。

#### 第一节 大智大勇，千里外擒拿艾希曼

曾在纳粹暴政下饱经屈辱、奴役、折磨和屠杀的犹太民族，继纽伦堡审判之后，经过多年的沉闷与失望，终于又一次迎来了扬眉吐气的一天——1960年5月23日。这天下午，耶路撒冷时间4点整，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十分郑重地宣读了一份全国人民期待已久的重要声明：“今天，我要向诸位郑重宣布，不久以前以色列国家安全机关抓获了最大的纳粹战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该犯罪恶昭彰，罄竹难书。正是他伙同其他纳粹首领，负有他们称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罪责，即600万名居住在欧洲的犹太人惨遭灭

绝性杀戮的滔天罪行。阿道夫·艾希曼目前正关押在以色列，并将根据1950年颁布的惩治纳粹分子及其合作者的法律，立即在以色列受审……”霎时间，热烈的欢呼声，雷鸣般的掌声，激动的哭泣声，奔走相告声传遍全国，经久不息，到处都像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气氛中。

提起艾希曼，在以色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不要说那些饱经战争创伤的中老年人对他咬牙切齿，就连刚刚了解国际事物的中学生，说起他也是满腔怒火，义愤填膺。这位艾希曼虽然官职只是一名处长，军衔只及党卫军中校（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党证号码为889895，党卫军号码为45326），远没有参与发动侵略战争、制定重大决策的资格，因而未能戴上甲级战犯的“桂冠”；但他任职的中央保安总局却是第三帝国和党卫军从事大屠杀的极为关键的主要部门；由他担任处长的犹太人事务处的基本职能，又是直接捕杀帝国的头号敌人——犹太民族。加之艾希曼对于犹太人又是刻骨仇恨，对捕杀犹太人异常卖力，他事实上成了“最后解决”也就是对犹太民族进行灭绝性大屠杀的前线总指挥。自1940年以来，几乎每一件大规模杀害犹太人的事件，都与他存在不同程度的牵连。还在战争爆发之前，艾希曼就参与制订了把欧洲犹太人全部驱赶到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罪恶计划；此计因战争打响作罢后，他又向希姆莱献策，将犹太人有计划地安置到波兰东部严寒的不毛之地，建立所谓的“犹太家园”，实际上是要将他们不流血地冻饿而亡。由于纳粹头目认为该计划效率不高，杀人速度太慢，艾希曼又不遗余力地投身将全部犹太人抓进集中营，首先将不具备劳动能力的犹太人通过毒气室迅速处死的“莱因哈特行动”。他参与、策划了波兰总督区内三大灭绝营——贝乌泽茨、索比堡、特列布林卡的建立；他参加、监督了奥斯维辛、玛伊达奈克、拉芬斯布吕克、布痕瓦尔特、毛特豪森、达豪、纳茨维勒等大型集中营增设灭绝区域的改建工程；他不顾匈牙利政府许多官员的激烈反对，强行把四五十万匈牙利犹太人押送到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加以杀害；1944年9月，他冒着被胜利挺进的盟军抓获的风险，到荷兰督战，保证了最后一批犹太人按期被驱赶到灭绝营处决。为了贯彻落实元首的指令，艾希曼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他不止一次地下令干掉

## 第十一章 众志成城，追捕纳粹战犯再起高潮

还在母亲怀抱中吃奶的婴儿，他纵容非日耳曼部下蹂躏即将分娩的孕妇并杀死她们，他还不厌其烦地督促杀手们消灭白发苍苍、步履艰难的老人。面对尸体如山的屠场，他还是放心不下，命令刽子手仔细检查，及时补枪，不许放过一个活人。他还有权指导和安排集中营中活体试验，他曾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学试验指定研究项目和试验规模，也曾批准希尔特医生关于获得男女囚犯并杀害他们以取得人体骨骼标本的要求，一次就使 115 名奥斯维辛的年轻男女囚犯被送往纳茨维勒集中营处死。艾希曼奋斗的结果是，万湖会议和“莱因哈特行动”的目标和规划大部分得以实现，最后解决的对象至少包括近 580 万名犹太人，其中包括 100 多万名儿童；爱沙尼亚等一些国家的犹太居民几乎被杀绝。这是犹太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血仇。不少死里逃生的犹太人，后半生唯一的愿望就是除掉艾希曼，为亲人、为朋友，为了整个民族报仇雪恨。但是，艾希曼也并非等闲之辈，战争刚刚结束，他摇身一变，装扮成一个伐木工人，1950 年，在奥德萨组织的帮助下，他带着家人，通过 B-B 航线秘密抵达阿根廷，化名为里卡多·克莱门特，深居简出，很快消失在欧洲诸多追捕纳粹战犯的组织 and 个人的视线中。他依靠狡诈多变的手段和分布广泛的关系网，一次又一次逃脱了盟国和犹太复仇者的追捕。另外，新建国的以色列也一直不曾放松对他的监视和追踪。1951 年 9 月 1 日，以色列全国性的情报安全机构建立起来——它就是不久即以身手不凡的业绩驰名遐迩的摩萨德。把在逃的纳粹战犯缉拿归案，是该组织当务之急的首要任务之一，并专门组建了负责追踪、缉拿纳粹战犯的 301 特遣队，由父母惨遭党卫军杀害的波兰犹太人施米尔·托莱达诺任队长，下辖 450 名精兵强将。由摩萨德制定的 10 名最急需抓捕的战犯名单中，艾希曼的名字高居榜首，只是他的线索多年来不曾发现。首任局长伊萨·哈雷尔每当下达任务时，总是语重心长而又充满激情地嘱咐部下“犹太人不能永远做任人宰割的民族，600 万亡灵的鲜血不能白流，我们必须向纳粹屠夫讨还血债”。从此以后，301 特遣队成员矫健的身影，随时出现在五大洲，不放过任何一点可疑的线索，在全球范围内织下一张无形的正义巨网，只待纳粹战犯一露头，就随时指向他们，把他

们押上历史的审判席。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7年秋末，猎手们终于发现了大刽子手艾希曼的蛛丝马迹，线索来自数千里之外的阿根廷。该线索的最初发现者是一位18岁的带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姑娘罗泽·赫尔曼。罗泽姑娘住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奥利沃斯区，是全区公认的貌似天仙的“皇后”。几乎所有未婚的小伙子，都把同她喜结连理视作自己最美好的愿望。为此，他们用尽了浑身解数：或是抬出百万富翁的父亲，或是炫耀自己有望去美国继承大笔房地产，或是亮出医科大学的硕士文凭，一个一文不名的建筑工人则表示了自己无比的真诚，他愿同姑娘浪迹天涯，愿做世界上最体贴妻子的模范丈夫。罗泽姑娘没有高傲地拒绝某一个追求者，但也不曾轻易地选定自己的终身伴侣。1957年秋天，一个20岁的德国移民小伙尼古拉斯（爱称为尼克）·艾希曼，加入了追求者的行列。他的自我表现形式比较独特，他不是夸耀自己家庭的当今和未来，而是称颂父亲的历史。“我父亲当年是德国军队的一位高官，他不仅指挥陆军，还能调动党卫军……”“那么他是一位将军了？”“不，不，不过他的权力比将军大得多，他足足可以掌握上百万人的命运……哎，他的命运实在太差，立下那么大的功劳，人们却不了解他，甚至还嫉恨他。”“他想必是‘七·二〇’事件的参加者了？”善良的姑娘总是把人往好处想，如果这位老人真是一位刺杀希特勒的英雄，倒足以在自己心目中占据崇高的地位。不料，尼克急乎乎地反驳起来：“哪里的事，我父亲哪能跟那些败类搅到一起。他绝不是叛徒和懦夫。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全部完成元首交给的任务，把犹太人统统消灭掉。”“你说什么？”姑娘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喔，喔，我是指那些贩毒、拐卖人口、诱奸女孩的犹太人，他们难道不是犹太人中的败类吗？”望着罗泽的金发碧眼和高挑的鼻梁，尼克说什么也料想不到他的小仙女会是半个犹太人，更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成了父亲的第一个掘墓人。罗泽回家之后，一股脑儿把自己的困惑与气愤全都对父亲讲了，他父亲是个地道的犹太人，也是达豪集中营的幸存者。听到尼克对犹太人的敌对情绪，又联想到尼克的姓氏也是艾希曼，赫尔曼先生油然感到此中必定大有文

章。虽则尼克尚未邀请女儿到家中见父母，赫尔曼还是悄悄找到尼克的家门口。一跟邻居打听，这家的主人不姓艾希曼，而姓克利门特，赫尔曼心中的疑团更是大大扩展。他随即给西德黑森州检察长弗利茨·鲍尔写信，揭发那个所谓的克利门特极有可能就是大战犯艾希曼。鲍尔检察长是德国犹太人，纳粹执政时期曾备受迫害，最后九死一生，故此他同赫尔曼一样迫切希望抓获艾希曼，将他绳之以法。但他深知，西德的司法、执法部门中，隐藏着不少纳粹分子，稍不留心就会打草惊蛇。他把希望寄托在摩萨德身上，很快向他们进行了通报。时值1957年秋，摩萨德一接到鲍尔的通报，很快派出干练的侦察员于1958年1月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进行调查。不料，狡猾的克利门特似乎听到了风声，离开了原住址而不知去向。鲍尔检察长锲而不舍，亲抵摩萨德总部，通报了艾希曼现在使用里卡多·克利门特的化名这一重要线索。摩萨德战士穷追不舍，经过将近两年的查询，经过1958年1月、1958年3月和1960年2月的3次调查，以色列特工以代罗泽姑娘给尼克送生日礼物为由，首先找到了尼克的工厂，继而找到尼克本人，再通过他的摩托车牌号终于找到了艾希曼的新住址，它位于比奥利沃斯区更为偏远的圣费尔南多区的加里波第街的一座砖房内。经验丰富的侦察员凭借克利门特于艾希曼与其妻维拉结婚25周年之际给其妻献花一事，最终确定克利门特就是大屠户艾希曼本人。

1960年4月，一个由9名特工人员和1名医生组成的特遣小组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其指挥官是加比·埃勒达德。动手的日期为5月11日。这一天傍晚，天气阴冷，下着小雨。特遣队员们分乘两辆汽车，按时进入预定地点举行布控。就在艾希曼从公共汽车的末班车走下来，即将走进家门的几分钟内，特遣队员闪电般地将他擒获。进而，他们将艾希曼押上以色列特工部门派来接应他们的专机。这次行动的保密性可谓是滴水不漏，以至于艾希曼的家属、奥德萨组织和阿根廷警方，还未判明事情的性质，特遣小组已于5月22日胜利地回到特拉维夫。由于人证、物证、旁证一应俱全，艾希曼毫无可以抵赖的余地，只得老实地供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1961年8月14日，以色列高等法庭经过14周的审理，参阅了1500份记录和来自16个国家的近百份辩方证词，听取了100名指控证人的控诉后，宣告审判终结。同年12月11日，该法庭宣判以4项重罪判处艾希曼死刑：

1. 杀害了数百万犹太人；
2. 将另外数百万犹太人置于迅速导致死亡的条件和环境之中；
3. 从身体上和精神上严重伤害犹太人；
4. 禁止犹太妇女怀孕和生育。

1962年5月31日夜，艾希曼被以色列法警带出牢房，执行绞刑；随后法警又迅速将尸体火化，在大海上扬灰。

继艾希曼之后，以色列特工又频频出击，在叙利亚查明并擒获了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弗兰茨·拉德马歇。战争期间，他虽然在纳粹德国外交部官拜高级专员，却不止一次地参加中央保安总局召开的有关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机密会议。他并不仅仅甘心于充当纳粹德国外交部与中央保安总局之间的联络员，而且积极参加对犹太居民的大屠杀。在南斯拉夫他留下劣迹斑斑，策划和督促特别行动队杀害了躲过第一轮屠杀的3万余名犹太妇女和儿童。

以色列的特工队员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乌拉圭首都蒙德维地亚，在周边任何邻居均未被惊扰的情况下，干掉了号称里加两大刽子手之一的名牌乙级战犯库克斯。

艾希曼被捕归案，使世界各国领悟到，像他这样罪大恶极的纳粹战犯还有相当一大批。对他们进行追捕和审判，将是一个许多国家都很可能遇到的国际性问题。因此，一些国家此前出台的关于自战争结束起20年后不再对纳粹战犯进行追诉的法律显然已经不适应当前的潮流，它已经成为无形中庇护纳粹战犯的保护伞。于是，政治家在行动，法学家在行动，人权组织在行动，红十字会和妇联在行动。人们共同的呼声是：修改法律，绝不让一个漏网的纳粹战犯逃离法网。公众的意志如愿以偿：1966年3月28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由奥地利、法国、以色列、新西兰、荷兰和美国六国联合提出的关于对战犯（主要指纳

粹战犯和日本战犯) 的追诉不受时效限制的提议。此举对国际反法西斯人士和侵略战争受害者缉拿纳粹战犯的斗争不啻为一个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使得世界性追捕纳粹战犯的潮流再次高涨，将漏网的残余纳粹战犯一个接一个地揭露出来。

## 第二节 机关算尽 50 载，老战犯终落法网

“二战”期间，在法国维希政权统治下的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市，曾发生过法国帮凶主动协助纳粹德国占领当局，将居住在该省的 1560 名犹太人押送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中绝大多数人惨遭杀害的罪恶事件。谁是制造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人们理所当然地将怀疑的目光指向伪省长。他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当这个卖国贼受到正义的惩罚后，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至于前吉伦特省府秘书长莫里斯·帕蓬，尽管也有人认为他可能也是帮凶之一，然而，一则人们拿不出确凿证据，二则他在战后是以打入伪政权内部的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出现的，而且受到戴高乐政权的信任。这样，人们的疑心到此不得不打住。

帕蓬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到底对此案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人们还须了解一下他的人生轨迹。帕蓬生于 1910 年，毕业于巴黎一所知名度相当高的中学。1940 年 7 月维希政府成立后，毫无民族气节的帕蓬抱着先捞一把再说的念头，跻身伪吉伦特省省府谋取了一个秘书之类的职务。有鉴于“出色的工作”，他仕途亨通，也就是两年左右的时间，他便爬上了伪省府秘书长的高位。当时，吉伦特省是贝当傀儡政权的太上皇——德国占领当局信得过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纳粹德国准许其对当地犹太人居民自主支配。这样，负责向伪省长呈报本地区犹太人人数及处理意见的帕蓬，就成为少数几个掌握犹太人生杀予夺大权的官员之一。出于不断向上“进取”的贪欲，他在有关处理犹太人的意见书上频频签字，把一批批犹太人推向死亡的深渊。据 20 世纪 80 年代对他暗中进行调查的一位人士讲：帕蓬担任伪省府秘书长期间，曾经多次下达逮捕和驱逐犹太人的命令，上述 1560 名受害犹太人，大部分是经他一



手操办批准手续，而后被运往奥斯维辛的。更令人气愤的是，1942年8月26日，帕蓬还亲自将本该协助逃脱盖世太保魔掌的11名犹太儿童拱手转交给盖世太保。正因为如此，法国波尔多受害犹太人家属米歇尔·斯利汀斯基曾愤怒地指出：“帕蓬虽然不是一个手持屠刀的刽子手，也不是一个施虐狂，但是他手中的那支笔，比屠刀更加锋利。只要轻轻一挥，几条人命，甚至几百条生命就没有了。难道他的亲笔签名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帕蓬虽则罪恶累累，却也精通权谋。还在1943年下半年，嗅觉灵敏的帕蓬就已经觉察出欧洲的政治风向发生了大变化。他感到如果死抱住纳粹德国的一条船不放，难免落得名败身裂的倒霉下场。只有左右逢源，才可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并求得更大的发展。于是，帕蓬白天还是大摇大摆地出入伪省政府，对德国主子毕恭毕敬；暗中，他却设法与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在波尔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并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了若干价值并不太高的情报，秘密释放了一些知名度并不高的抵抗战士。如此，帕蓬捞取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地下组织秘密情报员的身份，从而为自己在战后继续占领政治舞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1944年8月，伴随着自由法国的部队开进巴黎，帕蓬也摇身一变，从伪政权高官转变为抵抗战士的一员。当时，百业待兴的法国急需各种管理人才。帕蓬年龄只有34岁，而且精明强干，才华出众。这使得他不仅逃脱了正义的审判，而且被新政权委以重任。从1945年到1980年这35年间，帕蓬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从巴黎市警察局长，到市长，再到国家司法部要员，最后一直当上法国国会议员，继而被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委任为内阁预算部长，达到权力的顶峰。

1981年，对帕蓬而言是命运发生急剧逆转的开端。就在德斯坦开始了第二任总统任期，帕蓬又荣幸地被总统遴选为财政部长的时侯，帕蓬政治掘墓人已经破土挥锹了。正当帕蓬为自己再任高位而暗自庆幸之时，波尔多大学历史学教授米歇尔·伯杰斯也获得突破性的意外发现：他和一位同事在波尔多地方档案馆查阅资料时，不经意地从50摞被绳索捆绑的卷宗中随意抽出了一张，结果却发现自己手中的这份资料竟是

## 第十一章 众志成城，追捕纳粹战犯再起高潮

一份有关波尔多地方当局在1942年7月至10月驱逐犹太人的文件。文件落款处的签名不是别人，而是当今的财政部长莫里斯·帕蓬。这是揭开帕蓬庐山真面目的起点。与此同时，另一位波尔多人也在数十年如一日地对帕蓬暗中进行着调查。他是犹太人米歇尔·斯利汀斯基，一个深受帕蓬之害的犹太人：他父亲本是一位乌克兰犹太人，后来定居波尔多，并开了一家皮货店。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血统，父亲竟遭到杀身之祸。他毕生也不会忘记1942年10月的那一个晚上：两名维希政权的伪警察，不容分说地破门而入，抓走了他的父亲和妹妹，自己则是因为机智地逃脱，才幸免于难。但是，他从此再未能见到慈祥的父亲，他的骨灰已经化作纳粹集中营的灰土。法国刚一光复，斯利汀斯基就挺身而出，着手状告助纣为虐的帕蓬，要求将他绳之以法。然而，官官相护的官场，使他的努力一次接一次受到挫折。志同道合使两位米歇尔携手共进，联袂作战，一定要把帕蓬老牌纳粹走狗、法国犹太居民刽子手的丑史公诸于天下。随着他们不懈的奋斗，富有正义感的法国人一批又一批地聚集在他们周围，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终于在1998年将帕蓬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使这个老牌的纳粹战犯受到终身监禁的应得下场。

### 第三节 史海沉谜有望揭开——海因利希·密勒

时至21世纪之初，几乎所有的甲级纳粹战犯都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至少也被四大盟国和战争受害国查获到一定线索。然而也有一个罕见的例外，那就是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的最高首领——海因利希·密勒。

在“二战”期间，在纳粹德国和所有被占领区，盖世太保都是一个令当地居民、德军官兵直至本系统以外的纳粹高官大员们谈虎色变至少是充满神秘感、畏惧感的字眼。它不仅伙同保安警察把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抓进集中营和灭绝营，而且也是抵抗运动的心腹大患；它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破获朔尔兄妹领导的反法西斯秘密小组——“白玫瑰”，而

且有能把苏联“格鲁乌”在西欧各国经营多年的情报网——“红色乐队”一网打尽；它打击的目标不仅局限于穿便衣的国内外反叛者，而且可以把包括隆美尔、贝克、维茨勒本三位德军元帅在内的数千名试图推翻希特勒的德国军官抓捕归案。正因为如此，一位欧洲评论家不无道理地指出：“在盖世太保全体成员中，至少有一半够得上纳粹战犯资格。”

密勒并非一名老牌的纳粹党员，而是一名老资格的德国刑事警察。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他才姗姗来迟地跨进纳粹党的大门。他之所以能够在纳粹德国登上显赫的高位，跻身纳粹党和国家的核心圈，当然是由于他对希特勒狼狗一般的忠诚，但更是因为他对付高智商敌手那种无可替代的才干与本领。这位服务于罪恶目标的极其出色的秘密警察总头目，理所当然地成为各个盟国情报部门首当其冲的捕获对象。可是，当盟国军队冲进秘密警察总部的办公大楼之时，他早已渺无踪影；当追捕人员来到他的住宅时，遇到的只是人去楼空的情景。盟军审讯了成千上万的秘密警察，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地说出其领导人藏身的具体方位。久而久之，就连盟国执法人员也越来越倾向于原来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传闻：他或许还没等到战争结束，就投靠了苏联红军的情报机构，为新主子效劳去了。

直到1987年，世界闻名的纳粹战犯追捕者西蒙·维森塔尔公布了当前执法人员最想弄清底细的10名纳粹战犯，密勒仍旧名列其间。维森塔尔中心以色列办事处负责人埃弗拉伊姆·苏罗夫近年在耶路撒冷也曾表示：密勒的下落至今依然是“有关大屠杀施暴者的一个不解之谜”。

起初，大多数专家学者倾向于接受苏联和美国官方的记录：密勒已于1945年5月1日夜死于苏军的炮火。然而，1966年开棺验尸的结果表明，位于柏林市郊的密勒墓肯定是假的。里面躺着的并非党卫军将军密勒，而只是两名名不见经传的党卫军士兵。那么，密勒究竟躲到哪里去了？美国“二战”史专家拉尔夫·皮肖维亚克首先发现了线索：他在为美国《历史》进行为期数月的专项调查中，在查阅华盛顿国家档

案馆解密资料时，找到了美国军事情报机构 CIC 的两张曾经高度涉密的索引卡片。这两张卡片毫不含糊地证明：“二战”结束之后，盖世太保的总头子密勒曾在美军设于图林根的伊尔默瑙和上巴发利亚的阿尔腾什塔特的拘留营待过，他在那里接受了美军为期 4 周的审讯。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首席管理员乔治·沙卢证实说：“这些是真的。密勒曾经被捕。1946 年 1 月 29 日结案。”此外，1967 年，曾经参加领导追捕艾希曼的以色列特工人员彼得·马尔金奉命在慕尼黑的博登湖监视密勒的儿子过生日时，发现有一名前纳粹军官走出家门。他跟踪这名德国军官一段时间。不久，马尔金不得不返回其隐蔽处；后来，他又被召回以色列。在“摩萨德”总部，马尔金看到了追捕对象密勒的照片，他马上确定他曾跟踪过的那个德国军官不是别人，而正是密勒本人。但是，这名来访者再也未返回过博登湖大街。然而，活着的密勒究竟躲藏到哪里去了？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的不少研究人员倾向于他已经置身于苏联阵营。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著作是前纳粹德国中央保安总局国外反间谍局局长瓦尔特·舒伦堡的《回忆录》。舒伦堡认为，密勒还在“二战”期间即已经投靠了苏联，他曾经向苏联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有关纳粹德国政治和军事的机密情报。柏林战役刚刚结束，他就被苏联官兵护送回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一位前盖世太保的重要军官瓦尔特·霍特完全赞成舒伦堡的观点。10 余名在 1953 年之后被苏联当局释放回国的德军战俘也不约而同地发誓说，他们先后在莫斯科亲眼看见密勒曾与一批苏联军官一道出现在红场的检阅台上。以后，不少作家、记者均争先恐后地表示，他们已经掌握了有关密勒生活在东柏林、布拉格和莫斯科的充足论据。

2001 年 4 月 8 日，这是密勒追捕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天。就在这一天，德国 ZDF 电视频道记者拉尔夫·皮尔科维克报道了一则足以令世人震惊的爆炸性新闻：“二战”结束后，密勒曾经成为美国情报机关的特工人员。缜密和细心使得命运之神选中了皮氏。2000 年美国国家档案馆对 135 页美国陆军情报部门的有关密勒的战时秘密档案实行解密。然而数以百计的美国历史学家，却无人能够从中受到任何收益。

当皮尔科维克来到美国国家档案馆，为制作一部有关“二战”人物的电视片寻求素材时，却能通过逐字阅读发现了3张至关重要的小纸片。在这3张记录卡的背面，有美国国家档案馆首席档案专家乔治·夏洛的签名，以证明这3张卡片的内容绝对可靠。第一张卡片表明的时间是1945年12月26日，其内容是：美军谍报人员在德国一个平民拘禁营中发现了海因利希·密勒，于是派重兵将其秘密押解到德国西北部美军控制的集中营内。此次，押解的绝密令上特别注明：鉴于海因利希·密勒身份特殊，手中掌握大量对美国有益的情报，所以有关他被捕的消息绝对保密。第二张卡片注明的日期是1945年12月28日，其内容为：盖世太保的首脑密勒在盟国战犯名单上名列第七，罪名是谋杀。美国中央情报司令部（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早在战争后期就奉命秘密对他进行追捕。此卡片还详细地描述了密勒被捕时的模样：身高5英尺，头发黑而细，眼珠非常灵活，一脸笑容，非常活跃，看起来非常聪明。第三张卡片标明的时间是1946年2月1日，其记录内容是：美国情报人员对密勒进行了审讯，所获情报已通过绝密渠道转交给美国陆军司令部和中央情报司令部……本案于1946年1月29日告结。

21世纪开始后，美国已经陆续公布了篇幅长达300多万字的机密程度更高的档案，其中也还会有事关密勒的材料。可以预见，彼时世人对密勒的下落将会得到一个更具体、更清晰的了解，甚至可能基本揭开有关密勒去向的大部分机密。

#### 第四节 追捕纳粹战犯的天罗地网正在形成

在国际反法西斯势力的影响下，德国国内的进步势力也掀起了一轮缉拿漏网纳粹战犯的高潮。

突出成果，便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德进行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审判案以及一系列其他集中营审判案。

时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缉拿纳粹战犯的活动出现了显著的新特征，即这一正义之举突破了意识形态束缚和两大阵营的界限，冷战的对

手们开始携手合作，为伸张正义不懈奋斗。首先，英国放弃了几十年来奉行的庇护纳粹战犯、利用其充当反苏反共别动队的立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认真查办隐藏在各个角落的纳粹战犯。例如：1986年11月，英国成立了以里斯为主席的调查在英国居住的纳粹战犯委员会，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1986年10月，设在洛杉矶的追寻纳粹战犯中心向英国提交了一份17名在英国的纳粹战犯名单以及他们的详细情况。该委员会迅速对上述名单进行调查，一旦主要证据落实，就毫不客气地向司法机关申办拘捕证。

1989年，苏联首次向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寻人服务中心组成的代表团开放设在莫斯科的“二战”中心档案馆（自1964年上述两组织获悉苏联将拥有的有关档案存放在莫斯科以后，即多次向苏联政府提出查阅的要求）。苏方提供了46本奥斯维辛的死亡记录本，包括74000人的姓名、出生日期、国籍、民族、家庭住址、父母姓名与职业以及纳粹医生所提供的死亡原因，并允许代表团缩微拍摄。苏方还提供了有关13万名在集中营以外的德国工厂做工的受难者资料。该代表团进一步要求查阅苏军解放的其他纳粹集中营的资料，也获得苏联政府的允诺。

1970年12月，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华沙犹太区遗址后，两国执法机构和“二战”史专家加强了在有关纳粹战犯档案资料和最新动向方面的情报交流。

与此前后，美国和一些东欧国家在跨国追捕纳粹战犯方面的合作也有所增加。

就连长期以来顽固追随纳粹德国、多方庇护纳粹战犯的阿根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极力改变先前的“纳粹分子的天堂”的不光彩形象：除政府方面多次表态要全力追捕隐藏在本国的所有战犯外，也积极接纳欧美各国反法西斯人士和战争受害者的来往，多方向他们提供有关线索，并出动警力全力配合。

不难发现，隐藏在世界各地的纳粹战犯已落入由反法西斯人士、战争受害者与富于正义感的人们组成的天罗地网之中，想要长时间地隐藏自己的庐山真面目是越来越难了，大有难于上青天的感觉。

## 第十二章

### 纳粹战犯远未绝迹，也不肯冬眠

“二战”结束已历时 60 余载，是否纳粹战犯所剩寥寥无几？非也！请看下列事实与数字：即使 1987 年 8 月 7 日纳粹党副领袖鲁道夫·赫斯在德国的施潘道监狱中死去，也只不过标志着纳粹首要战犯已基本归天。至于乙、丙级战犯的近况，只要穷追不舍，就依然广有线索可寻。据德国一位专门以纳粹战犯为研究目标的学者阿·阿达尔贝特计算，1961 年已查明身份的现存纳粹战犯的平均年龄为 52.7 岁，1971 年为 61.7 岁，1978 年为 66 岁。依次类推，到 2000 年，这一指标应在 88 岁左右，而这显然是大多数人无法达到的。同时，再附以 1995 年德国男性居民的平均年龄为 73 岁，女性为 81 岁这一现实，估计 75% 以上的纳粹战犯已经作古。然而，即使如此，以 15 万人做基数，以最保守的估计：只有 5% 的战犯还健在，那么仍然在世的纳粹战犯的数字应为数千人以上，其中女性大概接近半数。其原因在于：一则纳粹女战犯大多为丙级战犯，职务较低，年龄一般也比男性战犯低 10—20 岁。杀人逾百的女战犯伊尔玛·格蕾泽，“二战”结束时仅 22 岁。另一个穷凶极恶的集中营女看守希尔德加特·莱歇尔特，当时也只有 25 岁；大多数集中营女看守、党卫军女护士、T-4 护士的年龄也同她们相仿，有的战争结束时还仅仅是希特勒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二则女性的平均寿命明显高于男性。三则世间对女性尤其是对老年女性的同情心往往高于男性，而德国社会对女性的权益保障又十分关注，女战犯们也因此受益匪浅：如纽伦堡医生审判案中唯一的女性被告赫尔塔·欧勃霍泽，仅被判处 20 年监禁。她除对女囚进行挑选的次数较少和规模较小外，其他罪行并不比臭名昭著的纳粹医生门格尔逊色，在活体试验方面的罪恶比门

格尔大得多。但她仅仅在监狱中度过7年后即获释放，并于1958年获得德国什·荷州地方当局的准许继续行医。党卫军女护士科尔施，因注射毒剂残杀了几十名战俘，以违反人道罪被判长期徒刑，但她在40个月后被释放，继而又获准戴上护士帽，重操旧业。露易丝·丹茨是一名血债累累的集中营女看守，曾被判处终身监禁。然则，她不仅早早提前出狱，而且在晚年同退休职工一样领取养老金和享受医疗保险。诸如此类的纳粹女战犯，包括1999年揭露出来的克罗地亚籍女战犯娜塔·沙基奇，以及上文所述刚刚被奥地利正义公众揭发出来的披着儿科医生外衣的纳粹杀手玛丽安娜·裘尔克，健在者无论如何也有上千人。在生活无忧无虑的条件下，女战犯们活到80多岁无疑是很有可能的。曾在图宾根大学担任人类学教授多年的隐藏女战犯索菲·艾哈德（详见第九章）就活到了85岁以上。

近10多年来，世界各国的报刊媒体一直不厌其烦地炒作“最后一名”纳粹战犯被捕归案的爆炸性新闻。然而，“最后一名”却层出不穷，门格尔之后又出现了巴比，巴比之后还有普里布克，接着又揪出来沙基奇夫妇；2000年春天，奥地利又揭露出纳粹杀人医生格罗斯和裘尔克。2002年伊始，英国又揭露出为数多达上百人的涉嫌参与特别行动队罪行的前乌克兰移民。2005年，美国旧金山市执法部门当局将84岁的老妪爱尔弗丽德·里娜·林克尔驱逐出境。60年来她对自己曾担任纳粹集中营看守并残忍地虐待、杀害女囚的罪恶历史守口如瓶，甚至对自己的犹太人丈夫弗莱德也只字不提……

### 第一节 进入新千年之际又揪出老纳粹战犯

让那些“最后一名”论者始料不及的是，就在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各国媒体纷纷炒出澳大利亚籍纳粹战犯康拉德·卡列基斯落入法网的消息：2000年1月6日，涉嫌在“二战”中参加党卫军拉托维亚军团、积极协助特别行动队杀害了3万多犹太居民的澳大利亚籍拉托维亚人康拉德·卡列基斯被英国警方和移民局官员押解出境，拉托维亚



当局已开始调查他的历史问题。现已查明：康拉德·卡列基斯原籍拉托维亚，生于里加，1941年7月，纳粹德国侵占该国不到1个月，他就参加了由当地纳粹特别行动队操纵的拉托维亚保安警察，成为纳粹分子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得力帮凶。战后移居美国的一位纳粹受害者鲁道夫·索姆斯证实，1942年2月，康拉德·卡列基斯带领的一支特遣小分队，曾在靠近拉托维亚东部边境的扎波雷特村杀光了全村所有的吉卜赛人。以后，他又加入党卫军，并在里加附近的萨拉斯皮尔斯集中营担任看守。他对该集中营六七十名犹太人囚犯与苏军战俘被杀害或虐待致死负有罪责。1950年他冒充难民潜逃到澳大利亚，并于1957年获得该国国籍。1959年他又移居美国，在那里生活了30年以上。但随着世界各国追捕纳粹战犯的深入发展，其罪恶身份逐渐败露。1993年，常驻芝加哥的美国第七巡回法庭揭露了他于“二战”期间曾在设在里加附近的萨拉斯皮尔斯集中营参与杀害数十名囚犯的罪恶历史。1994年，美国移民当局据此将他驱逐出境。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又被加拿大政府驱逐出境。

2000年1月从英国被赶走，他不得不返回澳大利亚。然而，今天的澳大利亚再也不是他的避风港了。

2000年12月13日，澳大利亚警方已根据拉托维亚政府的引渡要求，在墨尔本将他逮捕。一场正义的审判行将降临到他的头上。

即使时光进入21世纪，揭露和审判纳粹战犯的消息依然不断传来：2001年1月，英国独立电视公司在一个国际性节目中披露：1947年大约有8000名前党卫军第14分队的乌克兰籍官兵（原属以杀人累累著称的乌克兰警察“夜莺”部队，1942年前后被特别行动队第14分队收编）获准在英国定居，目前其中的1500人左右仍然在英国生活着。这些人中有许多亲身参加过特别行动，自1941年至1944年在波兰屠杀过数千名犹太人和近千名波兰和平居民。英国司法部门正准备对他们的大屠杀罪行提出起诉。2006年，德国慕尼黑地方法庭又抓获了年龄已达89岁的丙级纳粹战犯安东·马洛什。4月23日，该法庭已开始对他进行法庭调查。“二战”期间，马洛什曾加入党卫军，并且是一名积极的

杀手。在某纳粹集中营担任看守时，他先后杀害了 700 多名犹太人囚犯。1944 年他调任纳粹德国下属的捷克保护国的一家监狱内担任盖世太保的狱警，以对囚犯凶残而闻名。他曾惨无人道地在两名囚犯的腹腔内进行喷水器效果的试验，导致 2 人当场身亡。慕尼黑法庭指控他一项谋杀未遂和三项谋杀罪，他正在狱中等待即将来临的严正审判。几乎与此同时，在汉堡的一家监狱中，也羁押着一名白发苍苍的高龄老汉。他就是“二战”后期曾在意大利格努阿地区担任党卫军首脑的纳粹战犯弗里德里希·昂格尔，时年已然 92 岁了。意大利有关部门指控他应对杀害 246 名意大利爱国者承担责任。战争结束后，他潜逃回德国。从 1954 年起，他使用化名弗里德里希·施罗登贝格，在一个只有 80 000 人的小城市内栖身避祸。1997 年，意大利都灵地方法庭揭露了他的历史罪恶，并于 1999 年进行缺席判决。在意大利司法机关的带动下，2000 年，汉堡地方法庭宣布将他收监审查。与他前后不久被起诉的还有前党卫军中校、在镇压游击队方面独当一面的哈斯以及曾亲手枪杀了 16 名抵抗战士的盖世太保警长舍尔费克。更富有戏剧色彩的是，在德国某城市，由于一名百岁老人做寿，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失踪数十年的纳粹战犯。这位名叫卡尔·普拉格的白发老人生于 1897 年。2000 年时已 103 岁。记者采访时，兴奋得忘乎所以的普拉格说走了嘴，居然谈到自己在 1941 年曾来到过被侵占的立陶宛瓦尔纳。机警的记者不动声色，以恭维的口吻诱他往深处发挥，终于套出他曾参加特别行动队 A 支队，对当地犹太人大肆屠杀的经历。记者在此基础上内查外调，查明他在瓦尔纳犯下滔天罪行，他所在的小分队先后杀死犹太人和共产党员、游击队员 57 000 人，其中他一人亲手处死的就达 562 人之多。而远在数千里之外的维森塔尔中心也因此发现了一名深藏几十年的纳粹战犯的下落。

## 第二节 最后一个“果酱杀手”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真是无独有偶，就在各国媒体纷纷扬扬地炒作慕尼黑法庭审判隐藏

了60余年的老牌刽子手尼兹南达西这一突破性新闻的2004年，德国图林根州格拉地方法院也在开庭审理另一个隐藏了60余年才被曝光于天下的纳粹战犯——年届89岁的德国老妪罗丝玛丽·阿尔布莱希特。

不过，这两名战犯的犯罪行径确实也有明显的差别，尽管其实质均为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前者犯罪是明的，是身着令人恐怖的党卫军制服，使用机关枪、刺刀，明火执仗地制造大屠杀；而后者犯罪则是暗的，身披令人宽慰的白大褂，以医务人员的身份，使用医疗器械和药品为凶器，十分诡秘地袭击、杀害病人。这后一类杀手在研究纳粹“无痛致死”罪行的著作中被称为T-4医生和T-4护士，即专门杀害被希特勒认为身属毫无使用价值的生命的精神病人和重残病人的医生和护士。由于这类杀手中的许多人是年轻美貌的女性，人们又称她们为“果酱杀手”。“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各国已多次开庭审判“果酱杀手”，将她们绳之以法。

罗丝玛丽·阿尔布莱希特是在1941年她25岁那一年开始其犯罪行径的，她当时在德国图林根州立施塔特罗达疗养院担任助理医生，而且很快成为一名合格的T-4医生。仅据不完全的证据，她伙同该院负责人格哈德·克罗斯以及护士长G女士等数人，在为期一年多的时间内，就杀害了至少159名在此疗养、就医的精神病人和重残病人。他们都是根据纳粹当局的种族政策被强行送往各个名为医院、疗养院实为处决中心内逐步处死的。罗丝玛丽“治疗”的第一个病人是来自萨尔州璘姆堡的精神病人塞尔玛·阿尔布莱希特，当年34岁。她对这位500年前是一家的本家毫不手软，后者于1941年3月12日来疗养院，在一个多月里，罗丝玛丽先后对她实施了脊柱穿刺、抽取脑液、新药临床试验等多种原本应以动物为试验对象的非人道试验。塞尔玛被折磨得脸部变形、膝盖大面积脓肿，终日高烧不退。眼看这个可怜的女人没有多大试验价值了，罗丝玛丽便决定于4月20日将她处死，以便向希特勒的52周岁献礼。那天，她不顾塞尔玛的苦苦哀求，硬是把一根导管插进她的胃部，灌入比最高剂量还要高数倍的安眠药。病人被自己杀死了，医生的脸上却露出阵阵狞笑。更令人气愤的是，塞尔玛被害死以后，罗丝玛

丽伙同克罗斯主任居然还写信给她的丈夫，谎称尽管塞尔玛的病情一再恶化，他们仍将尽最大的努力进行抢救，谨祝愿她早日康复。塞尔玛的命运还不一定算最悲惨，其他遇难者包括一名年仅11岁的儿童死得更加惨不忍睹：他们被赶进伪装成浴室的毒气室内窒息而死，或被注射毒剂或被使用毒剂灌肠而痛苦不堪地断了气。在被处死之前，罗丝玛丽这帮白衣杀手还不肯放过他们，分别给他们切除睾丸、腐蚀粘连输卵管以进行强制绝育；给他们注射梅毒病菌、高强度刺激神经系统、强行摘除骨骼或移植骨骼等惨绝人寰的人体试验。当时，受害者的尖叫声不绝于耳，罗丝玛丽等医生却显得异常开心。因此，疗养院主任在罗丝玛丽于1942年调往另一个杀人场所时，给她写的评语充满了“工作勤奋，尽职尽责，一丝不苟，富有创意”等褒奖的字眼。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罗丝玛丽在“二战”后一直藏身在前民主德国，而民德被世人公认为是全球范围内追捕和惩处纳粹战犯最为严厉、最为坚决、最为彻底的国家之一，包括不少纳粹医生在内的120名战犯被毫不犹豫地送上绞架，数以万计的战犯被送进监狱，更多的人因纳粹时期的历史问题被强制劳动至少被开除公职。直到1966年，民德司法部门还处决了新近被揭露出来的纳粹集中营医生菲舍尔，他的罪行较之死亡天使门格尔轻得多，在西欧国家也就是最多关押十来年。而罗丝玛丽不但丝毫没有受损，还一再受到信任和提拔。其原因何在？首先就是她并不纯正的血统救了她、帮了她。尽管其父是100%的日耳曼人，母亲却是日本人。出席审判的公众毫不费力地就可以看到，该被告虽然身材高大，却很少具有标准德国女人那种脸形修长、线条分明、高鼻深目的面孔，而更像一个东亚国家的老太婆。正因为纳粹政权用人的首要标准是种族纯正，非纯正雅利安人不准参与重要事项，更不得担任要职。从这一条出发，民德许多司法官员想当然地认为，罗丝玛丽不可能具有参与大屠杀的资格。如此，她便相当顺利地通过了战后初期民德和许多欧洲国家实施的几乎是人人过关式的“非纳粹化”政治、历史审查。其二，在纳粹推行的“无痛死亡”大屠杀行动中，罗丝玛丽所任职的施塔特罗达疗养院的罪恶相比较小，远不那么引人注目，比起杀人逾万

的哈达马尔、格拉芬奈克、勃兰登堡、佐恩施泰因、贝恩堡、哈尔特海姆六大处决中心，它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因此没有被盟国调查人员列入战争罪行的重点单位。其三，T-4 医生、T-4 护士上岗前均需经过忠诚宣誓，不得向任何人吐露其工作情况，指派任务也往往只同上司一人见面，而且一般也不参与其他杀人活动。因此，除非其内部被攻破，外界很难了解其罪恶真相。其四，罗丝玛丽确实具备许多德国人那种埋头苦干、工作尽职的特性，而且医术也比较精深。其五，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她紧跟民德政府的各项战斗号令，积极参加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面对政府最经常抨击的西德政府，她能够奋力批判，上纲上线。1965 年 3 月 6 日，她以全国科学院院士、医学教授的名义，公开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笔锋尖锐的抗议书，严厉谴责西德政府伙同美国千方百计地庇护成千上万的纳粹战犯，拒不进行像样的战犯审判，听任对战犯的追溯期到点。从此以后，她被民德党和政府视为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许多机密都允许她知晓。所以，早在 1948 年，她便获得了在大学任教的资格；此后，她几十年平步青云，接连窃取了种种崇高的声誉和头衔、地位，她先后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医生”、耶拿大学医学系主任、医学教授、科学院院士，又于 1973 年获得令人羡慕的“祖国功勋勋章”，并且被赐予一个带有美丽花园的大型别墅。尽管神通广大的“斯塔西”（民德的秘密情报机构）在 1965 年察觉到她在施塔特罗达疗养院的罪恶历史，但考虑到此人已成为党和国家树立了近 20 年的一面旗帜，将她送上法庭无疑将成为莫大的讥讽，便又把这些材料密封，存放到最隐秘的档案室内。直到两德统一，民德司法机关从未触动过她。

1994 年，罗丝玛丽几十年披挂的德高望重、救死扶伤的面具被无意中戳开一个洞。这一年，德国医学史专家雷纳特·莱娜因课题研究需要，赴设在路德维希斯堡的纳粹战犯档案中心查阅资料，在纳粹医生格哈德·克罗斯项下，意外地发现了有关罗丝玛丽的蛛丝马迹。以后，死于罗丝玛丽之手的另一个受害者玛丽特·奥普菲尔曼的外孙女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起诉材料。2000 年，检察机关决定对她立案侦查。经过近 4

年的秘密调查，2004年1月，这位隐藏了60余年的女战犯，终于被押上法庭。尽管由于法律追溯年限和年迈等原因，她不会被杀人抵命，也不会被判处长期监禁，但她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到各界唾弃的命运是无可挽回了。

60年过去了，战犯们早已超越古稀之年，对罗丝玛丽的审判很可能就是对“无痛致死”杀手们的最后一次审判了。但是，类似罗丝玛丽和尼兹南科之流这样隐藏着的纳粹战犯，目前还数以百计，估计要到2015年之后才会死光。

显然，“最后一名”的到来为时尚早。其实，在今天，至少还有数千名纳粹战犯藏匿在世界各地安度晚年。不过，只有极个别人不甘寂寞而跳将出来，而大多数人则采取了深沉不露、绝口不谈以往的人生哲学。这正好似“平静的水面不等于没有鳄鱼”。

### 第三节 至今依然踪影难觅的纳粹战犯

经过盟国执法人员、纳粹战争受害者与各国正义人士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德国和外籍纳粹战犯的一半以上受到惩处，95%已被查明下落。但是，要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则只是善良的人们特别是大屠杀幸存者们的良好愿望。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1世纪之初，依然有上千名纳粹战犯的踪影尚未被纳入战争受害国执法人员的视线之中。仅仅在意大利政府于“二战”后初期确定的在意大利犯下罪行的2 274名纳粹战犯中，至今仍有100多人尚未落入法网。

#### 一、寥寥可数的漏网甲级战犯

有资格名列甲级战犯的人员中，生死全然不被世人所明了的至今只剩下2人：马丁·鲍曼和海因利希·密勒。鉴于海因利希·密勒的踪影有望因美国机密档案即将解密而大白于天下，这里只需介绍鲍曼一人。

“二战”结束之后，几乎所有甲级战犯的踪影，都很快被查清；而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身居纳粹党中央秘书长高位、被许多纳粹显贵称

为“希特勒影子”的马丁·鲍曼。直到现今，无论是司法官员还是历史学家，谁也说不准他的准确去向，甚至也不能肯定他究竟是已追随他的元首而去，还是仍然活在南美洲某一个罕为人知的角落。

鲍曼于1900年7月17日生于德国西部的哈尔勃施塔特，父亲是一位中层职员。人们很少发现有关鲍曼在学习期间成绩优劣的记载。1924年是他的本命年，运势格外不佳，作为庄园管理员的鲍曼，竟卷入了一桩谋杀案内，被法院逮捕并判刑。一出狱，他就下定决心，从此开始了冒险的政治生涯。1926年，鲍曼的人生轨迹出现转折。这一年，他作为纳粹党的代表，出席了德国民族主义工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结识了希特勒，并从此成为希特勒掌管财政的得力助手。直至1941年党的三把手赫斯出逃前，鲍曼始终属于处在工作层中的中高级官员。赫斯出走之后，鲍曼马上被希特勒选中，从此开始执掌大权。他起初接替赫斯担任元首的代表和党中央办公厅主任，1943年3月12日，又兼任元首秘书。此后，又晋升为党中央秘书长。自此，党内外的达官显赫，工商巨头无不对他另眼相看。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鲍曼就把持了纳粹党最高层的大部分实权。任何人、任何文件、任何报告，不经过他本人，都休想送达元首那里。他与元首的极为亲密的关系一直维系到元首的末日。1945年4月29日早晨，鲍曼和戈培尔主持了希特勒与爱娃的死前婚礼。婚礼一结束，希特勒立即向鲍曼口授了关于将戈林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解除一切职务和权力以及任命海军元帅邓尼兹为帝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总统的遗嘱。在遗嘱的第二部分关于他私人的遗嘱中委任鲍曼为希特勒1945年5月2日遗嘱的执行人。但是，当希特勒自杀身死后，鲍曼却没有同戈培尔一样为希特勒殉节。他带领希特勒身边的400多个残兵败将，于5月2日从总理府的地下室里摸索出来，借助3辆坦克和几辆装甲汽车，试图在夜幕掩护下进行分头突围。没有多久，鲍曼的生死存亡就成了难解之谜。不止一两个人认为，鲍曼突围未获成功，即将靠近苏军防线时即被苏军投掷的手榴弹炸死。见证人是希特勒的司机艾利希·肯普卡和希特勒主义青年团首领阿图尔·阿克斯曼等。持相反意见的人更多：鲍曼的私人司机格拉斯肯定地说，就在人们盛传鲍曼已被

苏军炸死后不几天，他在慕尼黑大街上见到了鲍曼。不久，德国作家亨利·森纳在报刊上撰文称，1945年7月末，他在汉堡到弗伦斯堡的列车上见过鲍曼。有鉴于鲍曼生死未卜，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缺席判处鲍曼死刑。从此以后，有关鲍曼仍然健在的信息从世界各地不断传来。乌拉圭首都蒙德维地亚的电台首先报道，它明确宣布鲍曼现正隐藏在阿根廷北部米西奥那斯省某镇。警察闻讯，立即前往搜捕，但空手而归。1946年，从纽伦堡又传来一则爆炸性新闻：已有人查明，鲍曼现在就在西班牙萨拉曼卡省的一个小村庄藏身。西班牙警察闻风而动，但又以扑空而告终。1947年，一个隐藏在意大利伦巴地两年多的前党卫军分子供称，鲍曼已在其藏身的意大利某修道院内病故，并指出了坟墓的具体位置。意大利调查当局乘兴而去，但结局是不能不否定这个党卫军成员的说法。不过，调查人员根据线索，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交界地带的的一个托儿所内，成功地拘捕到鲍曼的妻子海达，但她不肯坦白丈夫的去向。1948年，曾经见过鲍曼的智利籍德国侨民海因茨确认，不久前，他本人在智利、阿根廷交界的一座小城的街道上，明白无误地看见鲍曼骑马而过，并认出他来，同他打招呼。不过，透过这些纷纭复杂的信息进行分析，鲍曼的藏身之处是越来越集中到南美洲了。进入20世纪60年代，证实鲍曼在南美生活的证据进一步得到落实。

以色列特工部门生擒艾希曼，促进了对鲍曼下落的调查。艾希曼被押解回以色列接受司法当局审判时，仍收到大量信件。其中一件署名“马丁”的明信片，公开要他顶住。经笔记专家鉴定，这是鲍曼的笔迹。以色列情报机关成功抓获艾希曼的举动，在全世界掀起一个追捕纳粹分子的新高潮。各国有关鲍曼的情况再次源源不断地汇总到法兰克福检察院。德国黑森州总检察长鲍尔，足足花费了两年时间，查阅完上千份有关鲍曼出逃的材料。其中有两份看来最有价值：最可信的是鲍曼长子的证词，他承认曾多次到南美与父亲见面。另一份材料证实：鲍曼是1947年8月16日从奥地利经过意大利逃亡南美洲的。检察官们发现，艾希曼事发后，作为反调查的预防措施，藏匿在南美的纳粹分子成立了一个“1972年自卫组织”，鲍曼便是其中的主要负责人。1972年11月



17日，英国《每日快报》经过长达数月的寻踪追查后得出结论：鲍曼依然活在人间。它提供的思路是，鲍曼出逃的计划蓄谋已久。早在1944年，鲍曼从中央保安总局卡登勃伦纳处获悉，帝国银行储藏了大量从被杀害的犹太人那里掠夺到的巨额黄金、珠宝和货币。他立即想方设法搞到其中的价值两亿美元的大笔钱财，并通过安插在中央保安总局的亲信，趁当局下令用潜艇把犹太人财宝财富偷运到阿根廷之机，把自己的这笔私人财富也借机偷运到阿根廷藏匿起来。当鲍曼于战后逃到意大利之时，正赶上阿根廷总统夫人爱娃·庇隆出访欧洲。鲍曼于是赶往罗马同这位故友密谈。双方商定，鲍曼拨出其财富的3/4给庇隆夫人，夫人则帮助他到阿根廷避难。此后，鲍曼于1948年5月17日持爱利森·赫恩斯坦的护照抵达阿根廷。至此，鲍曼出逃计划成功了。由于他既有的地位和才干，鲍曼很快成为“奥德萨”和“蜘蛛”等纳粹余孽组织的负责人。以上还属于得到佐证的鲍曼生平，至于再往后呢，那就主要是执法部门官员和“二战”史专家的联想和推论了，而这些论断又往往是彼此大相径庭和互相矛盾的，让人们不得要领甚至无所适从。由于鲍曼超人的狡诈，难于比拟的高瞻远瞩，再加上他深藏不露，行无定踪，他的下场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待他自己或者其最亲近的纳粹战友出版了回忆录，人们才有望掌握其人生轨迹的奥秘。

## 二、漏网的乙级纳粹战犯数以百计

由于乙级纳粹战犯往往拥有较高的地位，他们不仅掌握实权，而且消息灵通，足以及在敌人尚在千里之外时便逃之夭夭，至少有优先获得假证件和出资买通敌手的便利。故而数百名乙级纳粹战犯负案在逃、至今全无消息，也并非出人预料的事情。这些失踪的乙级战犯主要包括：

理哈德·格吕克斯

名列前茅的纳粹乙级战犯，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局长兼党卫军集中营事务总监，党卫军上将。大屠杀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在西德和以色列政府的战犯通缉名单上，他名列第三，仅次于被缺席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马丁·鲍曼和盖世太保的总头子海因利希·密勒。在战后成立的党卫

## ❧❧❧ 第十二章 纳粹战犯远未绝迹，也不肯冬眠 ❧❧❧

军成员秘密组织“奥德萨”中，他位居第二，是盟主马丁·鲍曼的直接代表。

泰奥多尔·丹奈克尔

党卫军将军，他的主要罪行是1942年和1943年先后担任在法国和比利时驱逐犹太居民到波兰境内的灭绝营行动的最高负责人。被他间接杀害的犹太人多达15万人以上。“二战”结束后，他立即销声匿迹，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维尔纳·布兰肯贝格

“二战”爆发后，出任纳粹德国元首办公厅主任，之后继维克托·布拉克担任专事杀害精神病人和其他重病病人的T-4行动的负责人。1942—1943年，他负责波兰境内灭绝营管理人员的招募工作。战争结束后，他再也不曾露过面。

阿道夫·艾希曼（1912年—？）

奥地利人。阿道夫·艾希曼是从事灭绝犹太人的“最后解决”行动的两大助手之一。他被控于“二战”期间将来自希腊、法国、斯洛伐克、匈牙利的十余万犹太人驱赶到奥斯维辛等灭绝营。“二战”后，在叙利亚隐藏了数十年。最近一次露面是在2001年。

2007年，在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每年发布的全球纳粹战犯通缉名单上位居榜首。

汉斯·波特曼

党卫军中级军官，1942—1944年任纳粹设在波兰的四大灭绝营之一的海乌姆诺灭绝营司令官。此期间，大约有35万犹太人在该营惨遭杀害。战后，波兰等受害国均对他发出通缉令，但未能发现他的踪影。

阿尔弗雷德·瑞约克斯（1911年—？）

1931年加入纳粹党，并成为一名职业杀手。1944年10月在试图潜入英国后方基地时被捕，受到军事情报五处的审判。他作为战犯曾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被提审，但后来逃走，此后再也未见踪影。

欧文·卡尔·爱德华·阿尔布莱希特

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屠杀捷克人民的血腥刽子手。1900年2月

11 日生于杜塞尔多夫。1941 年 12 月 1 日至 1942 年 3 月 31 日任捷克保护国布尔诺市特别法庭法官。1942 年 7 月 1 日至纳粹德国灭亡，他一直担任纳粹德国驻布拉格特别法庭庭长。捷克政府认为他是一名噬杀成性的大刽子手。1943 年 5 月 18 日，他一次即判处 18 名布拉格居民死刑，仅仅因为他们的犹太血统或援救危难而走投无路的犹太居民。阿尔布莱希特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死硬纳粹分子，直到布拉格被苏军解放的前一天，他还将一名捷克居民判处死刑。

捷克共和国复兴后，其司法部门曾对阿尔布莱希特多次发出通缉令。美、英和西德当局也曾协助搜捕。但其踪影始终未被各个盟国发现。有些专家认为，该犯已畏罪自杀。

在下落不明的非德国籍纳粹战犯中，重量级的不多，因为他们同德国籍纳粹战犯不同，被他们出卖的祖国和同胞很难放过他们。其中，至少有两个人值得一提：

法国的纳粹帮凶保罗·图维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众所周知，克劳斯·巴比是一名疯狂镇压法国抵抗运动和屠杀法国和平居民与犹太人的刽子手。但是，人们未必想得到，法国那些助纣为虐的卖国贼，在其中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在众多的法奸当中，保罗·图维大概是名列前茅的一个。保罗·图维于 1913 年 4 月 5 日生于法国下阿尔卑斯省雅布隆河畔的圣文森特（现属上阿尔卑斯省）。1942 年 12 月底，因被维希政权招募到外省治安局而成为该傀儡政权伪军事组织——国家保安队的常备军官。因为竭尽忠心为伪政权效力，1943 年图维晋升为国家保安队负责训练与行动的第二局负责人，专事破坏爱国的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络网络。戴高乐将军的得力助手、国内抵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让·穆兰，就是被图维一伙发现了踪迹出卖给纳粹秘密警察的。不久，他又担任了驻里昂的国家保安队第二区域局局长。1943 年 12 月，伪保安队参谋部首脑勒居桑因贪污腐败被处决。他的庞大职权被多人瓜分，其中图维是分到权力最多的人之一。他已经直接听命于国家保安队总司令。利令智昏，大权在握的图维开始无恶不作。1944 年 6 月 29 日，他居然亲手挑选出 7 名坚强不屈的抵抗战士，作为被处决的人选。图维能够讲

一口流利的德语，这也是他很快取信于巴比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们时常看到：他和巴比并肩行走，有说有笑，一起大吃大喝，共同策划破坏抵抗运动的罪恶勾当。

由于图维民愤极大，罪不容诛，里昂法院于1945年9月10日对他缺席判处死刑；1947年3月4日，香贝利地方法院再次缺席判处他死刑。1947年7月8日，图维逃离了豪华的住宅，从此转入隐秘的地下生活。1960年，他又更名柏尔泰特，如此，罪孽深重的图维在地球上彻底地消失了。1971年11月23日，有关保罗·图维的案卷呈送到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办公桌上，蓬皮杜总统亲自签署了在全法国对图维进行通缉的法令。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一家地方法院宣布：已将该犯缉拿归案。

其二是罗马尼亚的二号卖国贼霍利亚·希马（1906年—？）。他是纳粹德国在罗马尼亚的主要帮凶之一，罗马尼亚法西斯组织铁卫军的一号首领。

1939年，罗马尼亚政府宣布取缔铁卫军，希马被迫流亡德国。次年初获得赦免，回国。此后接替已死于狱中的铁卫军首领科尔内留·科德里阿努成为铁卫军第一号头目，并加入安东内斯库政府。安东内斯库实行独裁统治后，铁卫军成为全国唯一的合法组织。该组织曾制造“长刀之夜”，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41年1月发动叛乱，夺权失败后再度流亡德国。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人民举行大起义，推翻安东内斯库政权后，希马逃到维也纳，建立由纳粹德国操纵的傀儡政权。“二战”结束后下落不明。从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到1989年12月建立的罗马尼亚共和国，历届政府的安全部门均未获得有关该犯的确切线索。

### 三、漏网的纳粹丙级战犯多达万人左右

20世纪50年代中期，波兰政府调查纳粹战争罪行全国委员会曾宣布，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进行过严重犯罪活动的12名纳粹医生中，只有9人被追捕归案并受到惩处，另外3人依然在逃，他们是：门格尔、舒

曼和科尼希。后来，舒曼已于1966年被西德政府引渡回国，并被判处监禁；门格尔虽然至死也未能逮捕归案，但基因测定这种不容置疑的科学鉴定方法已确认，1979年2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附近海滩被淹死的那个老头，正是门格尔本人。只有科尼希，他的真正去向至今还是一个谜；有人称亲眼在瑞典某小城见到了他；也有人说，他躲进了南美洲安第斯山的一个隐秘的峡谷；还有人一口咬定，他在某个中东国家的一位亲王身边服务，早已改换了阿拉伯名字，适应了当地的风俗习惯。然而传闻毕竟是传闻，直至20世纪末，在各个有关国家追缉纳粹战犯的档案中，科尼希的下落仍属生死未卜的悬案。

科尼希在纳粹集中营各位医生中，属于资历比较浅的一个。不要说比克劳贝格，就是比舒曼他也是晚辈，就连年轻有为的门格尔，也曾是他的师长。但是，科尼希又是一个肯于钻研业务、不甘人下的青年。所以，不论是对囚犯进行挑选，还是参与活体试验，他都积极投身，不愿默默无为。对于新到来的囚犯中的那些大腹便便的孕妇，科尼希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虽然是医学系毕业，却并非妇产科专业出身，但他又有掌握人工流产技术的强烈愿望。于是，这些孕妇就成了他练手的绝好试验品。1943年6月，他在挑选一批从波兰克拉科夫来的犹太人时，发现了68个孕妇。这真使他喜出望外。他马上安排她们住进医院，从当天起奋战一周，使用不同的方法，给她们全部实施了人工流产，促使她们过早地产下婴儿。对于婴儿，他却没有多大兴趣，很快就交给了党卫军护士们，听任她们给婴儿注射毒剂。他更感兴趣的是截取囚犯们的肢体，摘除她们的器官。这样，来到奥斯维辛一年多，他已经学会了做胃切除、肾切除、子宫切除和卵巢摘除等难度较大的外科手术，付出的代价自然是由囚犯们承担，几十人死于他那不够成熟的手术。他还多次配合门格尔，给年轻的犹太女囚做惨无人道的电击疗法，毫无医学意义地把她们弄死，而对任何医学难题的解决也没有推进一步。他有一个与门格尔不同之处，那就是严格遵守种族卫生纪律，他不是那种登徒子似的好色之徒。为此，他也曾不知不觉地得罪了门格尔。1943年9月，门格尔要给8名来自匈牙利的年轻犹太姑娘进行电击治疗，其结果将很可

能是8个女囚全部死去。他要科尼希来当助手。体检时，门格尔一眼看见其中一个美似天仙的16岁姑娘尤迪特，顿时改变了主意：留下她的性命，让她充当自己的临时情妇。于是，门格尔命令她到诊室外面的候诊室等候，先量一量体温，再去化验尿样，嘱咐她待晚上到另一个诊室给她作了进一步体检后，明天再进行治疗。其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占有这个姑娘。他告诉科尼希，先给那7个妇女治疗，随后去取一样器具。可是，科尼希却不明事理。他把7个妇女电死之后，看到还有一个姑娘在等候，就迫不及待地把她拉进诊室，立刻给她通上了高压电。事情就发生在门格尔外出的10多分钟内。待他回到诊室，心爱的少女已经断了气。眼看到手的尤物居然不复存在，他无名怒火顿时燃起，借故把科尼希狠狠地训斥了一大顿。从此，门格尔不再同科尼希合作进行手术。

还在门格尔偕同波兰犹太情妇维尔玛出逃之前，科尼希已经不知去向。无论医生们还是集中营司令官，谁也不清楚他的行踪。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波兰，许多盟国调查战犯专门机构，均将科尼希列入战犯名单，但对他的审判无一不以缺席判决而告终。进入21世纪后，科尼希仍将成为有关人员关注的焦点之一。

T-4护士中漏网的女战犯比较多，其中著名的一个是玛丽亚·阿萍捷，她是第一批宣誓加入T-4护士行列中的积极分子（详见第九章）。

至于作为纳粹德国帮凶的克罗地亚乌斯塔什伪军或伪俄罗斯民族解放军抑或匈牙利箭十字团的杀人凶犯，因为不属于盟国缉拿的重点，因此，许多成员逃脱惩罚，至今逍遥法外。

#### 第四节 纳粹余孽并未全部冬眠

上述女战犯露易丝·丹茨是一名比较“安分”的纳粹余孽。曾被波兰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的她，提前获释后万分庆幸，只想伴随着清泉、峡谷和葡萄园了此残生，根本无意问政。但她并不代表全部女战犯的心态，更不能与许多男战犯同日而语。早在纽伦堡审判期间，就有一

批死硬的希特勒主义青年团骨干，策划了从盟国法庭手中营救首要战犯，到巴伐利亚深山区重建纳粹政权。开辟 B - B 航线，更是纳粹战犯公开对抗审判的疯狂挣扎。继奥德萨等前党卫军人的组织步入低潮后，一些前党卫军骨干又在瑞典的第三大城马尔默建立了遍及欧洲的秘密组织，继续负隅顽抗。以后，潜藏的纳粹战犯的主流也大多采取对抗盟国和各个受害国惩处的立场，拒不悔过自新，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1999 年落网的克罗地亚籍女战犯娜达·沙基奇，就认为她当年杀害大批塞尔维亚人是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壮举。盖世太保的头子巴比，即使被法国人关押入狱后，也依然称自己并没有做什么有损法国的事情。更有甚者，那位因镇压“七·二〇”反希特勒政变立下汗马功劳，从而被元首破格提拔为柏林警备司令的奥托·雷莫，至今不仅不低头认罪，反而一再策划反犹、排外和翻案的罪恶勾当。还在 1949 年，盟国大批审判、惩处纳粹战犯的高潮刚刚过去，他便同几个纳粹骨干组建了纳粹党的变种帝国社会党，并担任该党的副主席。1952 年，该党因倒行逆施，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雷莫只得逃亡埃及和叙利亚，直至德国宣布大赦后，才返回故国。1983 年，不甘寂寞的雷莫再次跳上政坛，组织了极端右翼的组织“争取自由德国运动”，并担任首领。从此，他上蹿下跳，四处活动，忙得不亦乐乎。1986 年，他公开宣称“在最近 18 个月中，我参加了 300 多个新纳粹组织的会议……”1992 年 11 月，他又跳出来，公然为纳粹集中营翻案，宣称毒气室的用途只是给囚犯消灭虱子，而不是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杀人。并一再鼓吹排外，认为外籍工人夺走了德国人的饭碗，以至德国一家地方法院以煽动暴力和种族主义的罪名判处他 22 个月监禁。由于他负隅顽抗，逃窜到西班牙，德国警方至今还在通缉他。这些纳粹余孽的参与，无疑会给日益猖獗的新纳粹活动推波助澜。更有甚者，还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有一批死不悔改的纳粹战犯试图克隆希特勒，谋图重建第三帝国。当然，由于当时科技条件的限制，这种阴谋只能停留在幻想中。然而，在 21 世纪之初，当克隆技术已经相当完备的情况下，我们对此就不可掉以轻心了。试看，就在 2001 年 8 月，加拿大一个邪教组织“飞碟”已公开宣称准备克隆希

特勒。显然，对于纳粹战犯的动静，世人不可等闲视之。

### 第五节 揭露和惩办纳粹战犯离不开德国

#### 人民的觉醒与参与

有鉴于绝大多数纳粹战犯隐藏在德国或者同德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揭露和法办纳粹战犯工作的顺利进行，从根本上说，是离不开德国人民的觉醒、支持和参与的。

德国人民对纳粹战犯的认识存在一个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由极少数先贤的见解变为举国上下的共识，经历了数十年的漫长时期。

战争刚刚结束，德国杰出的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便在其传世名著《德国的罪责问题》一书中毫不含混地指出：凡是不曾以实际行动制止纳粹党上台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德国人，均应对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承担责任。然而，他的这种深邃见解，在当时不过是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他所赢得的赞誉甚少，而受到的攻击和漫骂不知要高多少倍。

1950年，德国著名导演阿兰·雷奈拍摄成德国“二战”后第一部揭露纳粹分子在被占领国家的滔天罪行的纪录片《夜与雾》。这充分体现了德国进步势力与纳粹主义的决裂。以后，另一位德国导演又摄制出纳粹德国推行对犹太人进行“最后解决”罪恶的纪录片《德国人灭绝犹太人面面观》。但是，这一种力量在德国还相当单薄，尚未获得大多数德国居民的认同和支持。以后，《安妮日记》发表，曾在相当一部分德国青年的心中引起震动，促使他们对希特勒发动的侵略战争对欧洲各国造成的深重灾难的重新反思，坚定了同复仇主义和新纳粹势力进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这本书在德国已经销出200万册以上，2000多名德国青年参加了在埋葬安妮的贝尔森集中营的万人坑旁举行的悼念大会，表示要坚决清算纳粹分子的战争罪行。可以说，《安妮日记》在德国形成了一次批判法西斯主义、清算纳粹战犯的高潮。

自从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为首的左翼政府于1969年上台后，德国公众反思过去、清算战犯的觉悟不断提高，在文艺、影视界尤为突



出。伯恩哈特·恩格尔曼发表的作品《我们臣下》《星级联邦大十字勋章》，彼得·韦斯发表的《追究》，均为力度很大的揭露法西斯战犯罪行的杰作。1986年春，深刻揭露纳粹战犯灭绝犹太人的美国名片《大屠杀》在德国开始上演，掀起了一股反省战争、清算战犯的空前未有的浪潮。青年男女纷纷责问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外祖父母，剧中的事情是否曾经发生过，他们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他们手上是否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随之以后，伯恩哈特·金克尔导演的电视连续剧《父亲们和孩子们》及另一部电视连续剧《贝尔提尼家的人们》在1938年“水晶之夜”50周年后的1988年11月9日在全国上演，把德国公众反对侵略战争、追究战犯罪恶的情绪进一步推向更高潮。

另外，反法西斯主义作品的问世，也加速了对一些纳粹战犯真面目的揭露过程。例如，《大屠杀》在德国上映时，有这样一个镜头出现在公众面前：马尔堡大学的纳粹卫生专家威廉·普菲奈舍迪尔，兴致勃勃地通过观察孔观看犹太人在毒气室中痛苦挣扎和悲惨死去的情景。就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德国浴场、游泳场和温泉疗养地联盟设备卫生委员会主席的纳粹战犯庐山真面目，便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出几天，这个老纳粹气急败坏而死的消息便四处传开了。再有，1985年前后，作家罗尔夫·霍赫夫特在揭露纳粹德国劣迹的作品《审判官》一书中指名道姓地将一个老牌纳粹战犯作为“恐怖的审判官”的丑恶历史曝光，迫使这个窃据巴登——符腾堡州州长的罪犯菲尔宾格辞职。菲尔宾格在“二战”后期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海军审判官，他积极迎合希特勒的口味，下令将逃兵一律作为祖国的叛徒处以死刑，严惩不贷，并且还要亲自监督执行死刑的过程。

同纳粹战犯进行英勇不屈斗争的传统，20世纪80—90年代在德国公众中继续发扬。德国妇女贝蒂·克拉斯菲尔德为全国人民树立了同纳粹战犯进行坚持不懈的英勇斗争的榜样。她于1940年生于柏林。她的丈夫是法国犹太人，公公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经过近10年的奔波劳碌，她同丈夫并肩作战，揭露了里昂刽子手克劳斯·巴比的本来面貌，将他绳之以法；她经过百般努力，在国际进步势力的广泛声援下，促使

西德政府通过了重新审判曾被法国法庭缺席判罪却躲在西德逍遥法外的纳粹战犯的相关法令。紧接着，她把曾经将 73 000 多名法国犹太人驱赶到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前党卫军驻巴黎司令官科特·里什卡送上法庭。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她又多方奔走，力图说服叙利亚政府引渡一名在该国潜藏多年的重要纳粹战犯。因此，贝蒂曾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1984 年获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并受到当时的法国外长的高度赞扬，她还多次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犹太人组织的表彰。

在青年当中，突出的一例是帕骚市的女民间历史学家安娅·罗斯姆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上大学时起，她就十分留意收集和调查纳粹战犯的种种罪行。90 年代，她顶住极大的压力，毅然揭露了一批父母的熟人、同时也是纳粹战犯的真实身份：帕骚市一名已退休的医生，在“二战”的最后阶段，他在就职的帕骚附近某集中营内，曾残暴地对一大批即将分娩的波兰和俄罗斯女劳工强制实施堕胎，使她们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两名仍然健在的神职人员，在纳粹德国时期，曾卑鄙地向当局出卖好几个邻居的犹太人身份，造成他们被捕并在集中营内遭杀害。尽管她受到市政当局、教会势力甚至一些熟人的责难和排斥，她依然坚持追缉纳粹战犯的正义行动。1993 年，她荣获德国进步势力颁发的朔尔兄妹奖。

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玛丽雅姆·普莱斯勒也是一位为揭露纳粹战犯罪行、唤起公众反法西斯意识而倾注几十年心血的杰出战士。普莱斯勒女士在大学时所学专业是造型艺术，但她面对许多国人特别是青年受纳粹主义毒害甚深、对纳粹战犯持袒护甚至包庇态度时，便决心以主要精力投身于揭露纳粹战争罪行的正义事业。她选择了最能打动人们心灵的文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她成为全德研究《安妮日记》的权威人士。她不仅出版了深受欢迎的《安妮传略》，而且也是最新版本的《安妮日记》的编辑者和增订者。她的作品唤醒了成千上万的德国青少年，使他们能够正确对待历史，认清纳粹政权对欧洲各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从而投身追缉纳粹战犯的斗争中。为此，她的作品获得了德国青少年文学奖。

居住在汉堡的德国社会教育学家汉内洛蕾·维特科夫斯基女士，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问题专家。她的研究特色是深入实际，与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交朋友，通过与她们的交流，获取第一手资料，从而以不容置辩的铁证将纳粹战犯的滔天罪恶昭示于众目睽睽之下，迫使那些顽固的战犯认罪。她的老朋友佩尔拉·奥维茨，是死亡天使门格尔残酷的活人试验的幸存者，她以自己身上的众多手术伤痕和多种手术后遗症，揭露了门格尔的恶魔真面目。维特科夫斯基的众多研究成果，为德国和战争受害国以及国际组织追捕纳粹战犯提供了大量有力的证据。

面对国内和法国极右翼分子勒庞之流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纯属子虚乌有”的谬论，德国女学者古德隆·施瓦尔茨经过多年的奋战，撰写出德国第一部系统论述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发展、职能和罪恶的专著《纳粹集中营》，于1990年问世，给予统一后的德国再度抬头的新纳粹思潮以当头棒喝。

最使原战争受害国公众感到欣慰的是：德国最为各界公众看好的周刊《明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每隔一二期，就会刊登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揭露纳粹战犯的滔天罪行或是报道有关追捕或审判纳粹战犯的最新动向。这种做法，无疑潜移默化地促进了德国各阶层尤其是青年的觉醒，使之积极投身于同隐藏的纳粹战犯以及新纳粹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2001年上半年，德国贝尔特斯曼、布尔达、莎西埃德以及阿克塞尔等大型出版社联合发出倡议：捐资250万马克给国际知名电影导演和反法西斯和平战士斯皮尔伯格，赞助他继续拍摄揭露纳粹罪行的纪实片。不久，这笔资金便派上用场，斯皮尔伯格在第4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推出了揭露纳粹分子在1944年疯狂屠杀犹太人的纪实片《最后的日子》。

以上介绍的仅仅是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进步人士的代表而已，这样的人目前在德国数以百万计。正是由于这批进步力量的长达几十年的努力奋斗，德国社会的主流今天已经同纳粹主义划清了界限，使纳粹战犯在

本国越来越难以藏身。

### 第六节 纳粹战犯的奥秘有望基本揭开

2001年4月27日，是纳粹战犯追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里程碑。根据美国政府制定的《2000年纳粹战犯解密法》，美国国家档案部门公布了刚刚解密的20个文档、1万页材料，并宣称，在不久的将来，还将解密并公布300万页有关纳粹战犯的档案资料。其中，有关盖世太保总头目海因利希·密勒的档案明确指出，密勒在“二战”后曾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这对于揭开密勒50多年来谜一般的生涯，无疑具有突破性进展。6月21日，俄罗斯政府宣布，自即日起，对卫国战争时期的所有机密档案全部解密。上述档案分别属于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国防部、安全局、中央档案馆、国家图像文件档案馆等单位，规模数以十万计。这样，几十年来出于为尊者讳而被迫束之高阁的有关纳粹战犯的许多关键材料，将大白于天下，为进一步深入追捕纳粹战犯发挥应有的作用。伴随着美国和俄罗斯的举动，英国、法国等几十个握有大量有关纳粹战犯秘密档案的国家，很可能起而效法，解密并公布本国的秘密档案。这样一来，许多有关纳粹战犯的去向的机密文件将披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许许多多的纳粹战犯的命运也将不成其为秘密。很有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绝大部分纳粹战犯的身世将为世人所知晓，其中的健在者也很难再逃脱历史的审判。

2005年，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批关于纳粹的珍贵历史档案，这些解密的珍贵档案共有20份。其中有15份是所谓的“个性档案”，即专人档案，包括了纳粹头号恶魔希特勒，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亡大夫”约瑟夫·门格尔等人的材料。“个性档案”的其余主角也全部是参与过战争和情报活动并且在战后逃脱惩罚的纳粹要员。档案主要内容是关于纳粹分子在战后为西方国家情报部门效力的详细记载，他们因此躲过了正义的审判。其中有9人与由美国占领军一手创立起来的并且在1949年由中央情报局接管的前西德情报机关有密切联系，他们利用自己的经

验和技术协助前西德情报部门收集苏联的情报。然而，美国媒体报道称，中央情报局拒绝向联邦政府的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公开其历史上招募德国纳粹内幕的档案文件。这一事件顿时引起了美国舆论的高度重视。

### 第七节 追捕纳粹战犯的急先锋——维森塔尔中心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隐藏在全球各地的纳粹战犯遇到了一个异常严厉的克星——维森塔尔中心。它的创办者和领导人是一位在13个纳粹集中营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犹太人西蒙·维森塔尔。他和他的同志都是自愿为追捕纳粹战犯无偿奉献毕生的志愿者。他们之中，既有饱经风霜的反法西斯斗士，也有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几十年来，他们通过不懈的奋战，已经将数以千计的暗藏的纳粹战犯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各国司法当局特别是追捕纳粹战犯的专门机构的强有力的不可替代的合作者。2007年，鉴于绝大多数纳粹战犯的年均已达80岁，随时可能一命归西，他们决定大大加快追捕残余的纳粹战犯的步伐，断然发起“行动：最后的机会”。发誓要将尽可能多的纳粹战犯，在死亡以前逮捕归案。现在，该项行动已经推进到整个欧洲。从德国和所有被纳粹德国侵占过的国家，他们发掘到几百条重要线索。到2007年年底，这项工作拓展到大量纳粹战犯藏身的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由于信息革命的爆发，网络技术广泛运用，为这项追捕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物质基础。一位在维森塔尔中心工作的年轻人，凭借网络的力量，查找到一个被该中心追查了很多年的原籍立陶宛的纳粹女战犯的确切居住地址，她早已归化为美国国籍。维森塔尔中心耶路撒冷办公室主任、当今世界头号追捕纳粹战犯的英雄埃弗拉伊姆·苏罗夫对此充满信心。积极参与追捕纳粹战犯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肖维茨指出：由于网络的出现，纳粹战犯“藏匿的日子基本上结束了”。

当然，除去信息技术之外，追捕纳粹战犯还有赖于人心向背。尽管新纳粹当前很活跃，但是坚决支持缉拿老纳粹分子归案、全力制止大屠

杀悲剧重演的进步人士则更多。例如，为追捕纳粹设在巴黎附近的德朗西转运营司令官、党卫军高级军官布伦纳（他是将7万多名法官犹太人驱逐到奥斯维辛等灭绝营杀害的罪魁祸首），不遗余力的法国老年夫妇塞尔日·克拉斯费尔德和比特·克拉斯费尔德（她是纳粹德军士兵的女儿）。有这样一大批与老纳粹不共戴天的斗士经久不懈的奋战，残余的纳粹战犯自然会日益陷入绝境。

## 尾 声

2007年9月中旬，居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一个退休人员社区的88岁老汉马丁·哈特曼忽然“失踪”了。几天以后，9月23日的美国《每日邮报》揭开了这个谜。原来，他因为充当前纳粹集中营看守的罪恶历史，已被美国移民部门驱逐出境。哈特曼是1955年初移民美国的。当时，移民机构的有些官员即对他的身份产生怀疑，但缺乏有力的证据，因而才同意他入境。但是，对他的调查并未终结。而哈特曼却以为自己把过去掩盖得天衣无缝，不会有人再去追查他了。他究竟是何许人也？从1943年起，哈特曼就是纳粹德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看守兼行刑队成员，经他的手处决的犹太人、盟军战俘和反法西斯人士至少在百人以上。而且，他是自愿担任这一血腥的职务、而主动放弃其他从业岗位的。经过多年安分守己的日子后，由于没有人出来揭露他、惩办他，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后来，他居然把当年在集中营供职时身着党卫军制服的照片挂在住宅墙上，来了客人也不避讳。然而，这只不过是时候不到。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调查后，美国移民部门掌握了他在集中营作恶的确凿证据后，断然对他采取了措施。这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又一例证吧。

无独有偶，在2007年10月1日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作出将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都会区居民保罗·亨斯驱逐出美国的决定，原因是他长期隐瞒充当希特勒主义青年团员、纳粹党员和在两个纳粹集中营看守的罪恶历史。他是1979年美国成立特别调查办公室以来，驱逐出境的第106名与纳粹罪行有关的前美国公民。

2008年4月30日，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照例公布了当年主要在逃纳粹战犯名单。其中的前十名分别是奥地利人阿里伯特·海姆、乌克兰人伊万·德米扬尤克、匈牙利人桑多尔·凯普伊洛、克罗地亚人米利沃伊·阿斯纳、德国人瑟伦·卡姆、德国人海因利希·波尔热、匈牙利人卡罗伊·赞泰、爱沙尼亚人米克海尔·戈尔什科夫、德国人阿尔吉曼塔斯·戴里德和爱沙尼亚人哈里·曼尼尔。

在榜上名列第一的阿里伯特·海姆，还在21世纪初即已受到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关注，在2007年的通缉名单上已然名列第二。这位先生生于1914年6月，1935年加入纳粹党，算来2008年已经94岁了，但是维森塔尔中心依然悬赏48.5万美元追捕他。负责该案件的德国主审法官海因茨·海斯特在巴登-巴登法院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也坚决表示：“经常有人说，海姆都是90多岁的人了，放他一马吧。但是我认为年龄不是关键问题，竭尽所能地抓住他才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罪行实在是穷凶极恶、令人发指。据当年被关押在阿里伯特·海姆供职的纳粹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卡尔·罗特1950年所作的证词，一名年仅18岁的犹太囚犯来到集中营医院治疗脚部感染，而整体健康情况良好。按照纳粹集中营的规定，仅有轻微病痛的囚犯，是应该给予治疗的，因为他们还不属于“毫无价值的生命”。然而，毫无人性的海姆仅仅为忌恨这个犹太人是个有发展的足球运动员，又兼游泳运动员，就下狠心结束他的性命。他对青年实施麻醉后，首先切除了睾丸，继而摘除了两个肾，然后切下他的头颅，加工制成用作展示的标本。这仅仅是他全部罪行中的一例。另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揭露，幸存的该营囚犯多人证明：海姆伙同另一党卫军医生艾利希·翁西斯基，共同残杀犹太囚犯多人。二人合作进行的一项医学试验

是使用何种毒剂才能尽可能快捷地杀死犹太人。为此，他们使用许多种性能各异的溶剂对上百名犹太囚犯的心脏部位进行了注射，而这些受害者无一生存。因此，海姆在集中营囚犯眼中成为“所有纳粹医生中最可怕的一个”。

战后，恶魔海姆却长期逍遥法外。1946年，他的同案犯翁西斯基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处决。而同为美军战俘的海姆，却阳差阴错地因为他的档案中缺少他在集中营最后两个月的工作业绩（这段时间恰恰是他杀人最多的时期之一）而逃脱了审判。执法部门的疏漏，使他不仅敢于招摇过市，而且在德国西南部的巴登-巴登明目张胆地开办妇科诊所。直到1961年，德国政府部门才对他的历史罪行着手调查。1962年，正当警察即将逮捕他的前夕，海姆却神奇地从人间“蒸发”了。此后的40多年，海姆再也没有露面。他的家属曾于1993年宣称，他已死于阿根廷。但是，这个说法不能使人信服，尤其是执法部门。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现任主任艾尔弗莱姆·苏罗夫表示：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至今不曾宣布继承他的遗产，而这笔遗产至少达50万美元。再者，西班牙警方于2005年发现：2000—2003年，海姆的家人与西班牙东部一个小镇存在固定的钱款往来，达100多次。然而，当西班牙警方于当年9月5日对该镇居住的德国人进行搜查时，却一无所获。2007年，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宣布，将海姆的藏身之地锁定在南美洲四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并发起旨在追捕在逃纳粹战犯的“最后机会行动”，却又一次无功而返。不过，除非海姆确实见了阎王，否则以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为代表的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和进步人士是绝不会放过他的。

西蒙·维森塔尔中心还对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东欧国家追捕纳粹战犯力度欠缺作出批评，其中“最令人失望的是匈牙利至今未审判‘二战’期间在塞尔维亚屠杀了1000多名平民的桑多尔·凯普伊洛（名列第三）”。名列第四的米利沃伊·阿斯纳，“二战”期间曾任伪克罗地亚独立国波瑞加市警察局长和盖世太保的情报员。他被控曾亲自下令将辖区内大批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塞尔维亚人驱赶到亚塞诺瓦茨等死



亡集中营。战争结束后，他逃离克罗地亚，其家属则对外宣称他已经辞世。几经辗转，他于2006年迁居奥地利南部城市克拉根福，化名乔治·阿辛纳，定居在该市大球场附近的一所住宅内。2007年，克罗地亚政府曾对他举行缺席审判，并要求奥地利政府将其引渡归案。然而，奥地利政府却以阿斯纳“年老体迈”为名加以拒绝，使他至今逍遥法外。2008年6月8日，尽管他已经95岁，仍然精神矍铄地与第二任妻子手挽手地观看欧洲杯足球赛开幕式，不意被一名英国记者一眼认出。维森塔尔中心闻讯后立即表示，将再次提请奥地利司法部长，要求立即将他引渡。

与此相关，自认为追捕纳粹战犯力度最大的美国，还对英国追捕不力严词抨击。美联社2008年4月30日报道：“1991年，英国通过了《纳粹战犯法案》，但调查了300件案件后却只有一个人被认定有罪，专门成立的一个特殊战争犯罪调查机构在工作8年后就解散了。英国人总是推托说‘没有预算和人力’，据专家估计，英国的纳粹战犯嫌疑人现在仍达50—100人。”

看来，追捕、审判纳粹战犯的斗争，仍然“正未有穷期”，全球正义人士为此进行的奋斗起码还需要再投入5—10年吧。

## 附录：各主要集中营、灭绝营司令官简历

### 一、达豪集中营

泰奥多尔·艾克（？—1943年2月）

党卫军副总指挥，党卫军上将，党卫军骷髅师师长。

1933年6月底，希姆莱任命他为纳粹德国第一个集中营——达豪集中营首任司令官。后升任全国集中营事务总监。1943年2月，在苏联哈尔科夫防御战中，乘飞机赴东线视察时被苏军炮火击中，机毁人亡。

海因利希·多拜尔（1933—1962年）

集中营第二任司令官。

威廉·维特

该集中营司令官。

希尔马尔·威克尔

该集中营司令官。1941年在作战中阵亡。

戈特弗里德·马丁·维斯

该集中营司令官（1942—1943年9月在任）。1945年在达豪集中营审判中被美军法庭判处死刑，并于1946年5月28日执行。

阿莱克斯·比奥尔科夫斯基

该集中营司令官。1948年10月被美军法庭判处死刑并执行。

### 二、奥斯维辛集中营

鲁道夫·弗朗茨·霍斯（1900—1947年）

首要的纳粹乙级战犯之一，奥斯维辛集中营首任司令官和头号刽子手（详见第六章）。该营在他管理和监督下，杀害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各国战俘、平民达160万人以上。根据霍斯的命令被送上绞架的各

国囚犯多达数百人，经他下令处决的苏军战俘多达几千人，他一次就核准把1万名失去劳动能力的男女囚犯赶进毒气室，而这类的核准多达十数次。1947年4月2日，华沙人民法庭判处霍斯死刑。4月15日，霍斯被波兰法警押解到原奥斯维辛集中营处以绞刑。

阿尔图尔·利勃亨舍尔

霍斯的继任，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二任司令官（1943年11月10日—1944年5月在任）。

1944年夏天，奥斯维辛集中营灭绝35万多名匈牙利犹太人的空前罪恶行动，就是以他为主而策划组织的。

1947年12月，波兰最高人民法庭在故都克拉科夫庄严地开展了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战犯的审判，将他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

利哈特·鲍尔

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三任司令官（1944年6月—1945年1月下旬在任）。党卫军少校。先后在多拉、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司令官，应对20万以上的囚犯之死承担责任。自战争结束到1960年，一直逍遥法外。1961年在西德被捕，1963年死于狱中。

马克西米连·格拉布纳

罪恶仅次于霍斯和利勃亨舍尔的该营第三号罪犯，集中营政治部主任，盖世太保在该营的总负责人。

他主管的政治部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囚犯们被带进去之后凶多吉少，不死也得终身致残。他不仅指示部下行凶，而且亲自动手。每天杀害违规囚犯的行刑队，也归政治部所属。

1947年12月，波兰最高人民法庭在故都克拉科夫举行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将他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

### 三、玛伊达奈克集中营

卡尔·科赫

马伊达奈克集中营首任司令官（1941年9月—1942年6月）。后调任布亨瓦尔特等集中营任司令官。因欺诈和腐败罪，被党卫军内部法庭

处死。

马科斯·科盖尔

马伊达奈克集中营第二任司令官（1942年8月—10月）。1946年在达豪集中营审判期间自杀。

赫尔曼·弗罗尔斯泰特

马伊达奈克集中营第三任司令官（1942年10月—1943年9月）。1945年4月，因渎职罪被党卫军内部法庭判处死刑并执行。

马丁·维斯

该集中营第四任司令官（1943年9月—1944年5月）。1946年5月在达豪集中营审判案中已被美军司法部门先期处决。

阿尔图尔·利勃亨舍尔

该集中营第五任司令官（1944年5月—7月）。由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二任）司令官任内调来。在1947年克拉科夫奥斯维辛审判案被判处死刑并执行。

安东·费尔奈斯

该集中营副司令官。连同该营其他4名主要负责人伏格尔、赫尔施泰梅耶尔、施麦伦、施塔利斯于1944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在波兰军事法庭卢布林审判中被判处死刑并执行。

#### 四、施图特霍夫集中营

马科斯·鲍勒

施图特霍夫集中营首任司令官（1939年9月—1942年在任）。

保罗·维尔纳·霍普

施图特霍夫集中营第二任司令官。在他的任期（1942—1945年5月）内，至少有10万名犹太人和战俘被杀害。战争结束后，他逃过英军的追捕，以化名隐居到瑞士。1952年回到家乡。1953年被司法部门逮捕。1957年，西德一家法庭以“非人道罪”判处9年徒刑。1962年获释，在一家保险公司做事。

## 五、格罗斯-罗森集中营

威廉·吉戴欧恩

该集中营司令官。战后被英军逮捕后关押，后获释。

阿尔图尔·略代尔

该集中营司令官。1945年自杀。

约翰内斯·哈塞布略克

党卫军中校，纳粹设在波兰的四大集中营之一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最后一任司令官。主要在他任内（1943—1945年），该集中营有10多万犹太人和苏军战俘被杀害。1948年，英军军事法庭在汉堡对他进行了审判，并判处他终身监禁，不久改判为15年监禁。1954年9月17日获释。

## 六、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

马科斯·科盖尔

该集中营的首任司令官（1939年5月—1942年8月）。后调任马伊达奈克集中营司令官。1946年在达豪集中营审判期间自杀。

弗里茨·苏伦

该集中营第二任司令官（1942年9月—1944年10月）。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开始之前一度逃脱。但于1949年落入法国占领区当局手中，并被押上审判台，在德国拉施塔特市举行的另一次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案中受审，被判处死刑，并于1950年6月12日执行枪决。

阿尔伯特·措尔

该集中营第三任司令官（1944年—1945年4月）。1945年被盟军处决。

约翰·施瓦茨胡贝尔

集中营副司令官，第二把手。因指挥1944年12月—1945年3月对集中营内女囚的大规模屠杀（该集中营死亡的女囚，有一半以上是在

## 附录：各主要集中营、灭绝营司令官简历

这4个多月被杀害的)，在第一次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审判（1946年12月5日—1947年2月3日）中被英军法庭判处死刑，并迅即于哈默伦监狱执行绞刑。

### 七、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卡尔·科赫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首任司令官（1936年9月—1937年）。后调任马伊达奈克、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司令官。

赫尔曼·巴拉诺夫斯基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司令官（1939年—？在任）。1939年死亡。

瓦尔特·埃斯费尔德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司令官（1940年—？）。1940年死亡。

汉斯·罗利茨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司令官。1946年在美军监狱中自杀。

安东·坎德尔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司令官。被苏军法庭判处终身监禁，1947年11月死于狱中。

### 八、毛特豪森集中营

阿尔勃特·措尔

毛特豪森集中营司令官（1938年8月—？）。在1946年3—4月举行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审判中被美军法庭判处死刑，并于1946年5月11日执行。

弗兰茨·奇莱斯

毛特豪森集中营司令官（？—1945年4月在任）。1945年5月试图从美军监狱中逃跑时被击毙。

### 九、布亨瓦尔特集中营

赫尔曼·比斯特尔

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司令官。1948年9月被美军法庭判处死刑并执行。

卡尔·科赫

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司令官（1942年7月—1944年12月）。

### 十、弗洛森堡集中营

马科斯·科盖尔

弗洛森堡集中营司令官。

卡尔·昆斯特勒

弗洛森堡集中营司令官。

在1946年6月12日—1947年1月19日进行的弗洛森堡集中营审判期间死亡。

雅克布·维泽波恩

弗洛森堡集中营司令官（？—1939年）。1939年死于心脏病。

埃贡·奇尔

弗洛森堡集中营司令官。

卡尔·弗里彻

弗洛森堡集中营司令官。1945年4月在柏林战役中被击毙。

### 十一、诺因加默集中营

马科斯·鲍勒

诺因加默集中营司令官。战后被英军法庭判处终身监禁。

### 十二、贝尔森集中营

鲁道夫·哈斯

贝尔森集中营首任司令官（1943—1944年11月在任）。1945年3月被击毙。

尤塞夫·克拉麦

贝尔森集中营的第二任司令官，因残酷折磨和杀害囚犯，被囚犯们

称为“贝尔森的猛兽”。在1945年5—12月举行的贝尔森集中营审判中，连同集中营副司令官温加特纳、伊尔玛·格蕾泽以及女囚集中营负责人赫斯勒，一起被英军法庭判处死刑，并于1945年12月在哈默伦监狱执行绞决。

### 十三、纳茨维勒集中营

弗里德里希·哈尔特延斯泰因

纳茨维勒集中营司令官。此前任奥斯维辛集中营比克瑙分营司令官。战后先后被英军和法军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行刑前，于1954年10月因心脏病突发死于囚室。

汉斯·许梯克

纳茨维勒集中营司令官。战后被法军法庭判处终身监禁。1956年3月获释。

尤塞夫·克拉麦

纳茨维勒集中营司令官（1941年4月—1944年5月）。1945年12月被英军法庭判处死刑。

埃贡·奇尔

纳茨维勒集中营司令官（1944年5月—1945年3月）。1955年被慕尼黑地方法院判处终身监禁。后提前释放。

### 十四、多拉-诺德豪森集中营

奥托·佛尔什纳

多拉-诺德豪森集中营司令官。1946年5月被美军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执行。

库尔特·马代修斯

多拉-诺德豪森集中营司令官。于1947年5月在盟军狱中自杀。

汉斯·缪泽尔

多拉-诺德豪森集中营司令官。库尔特·马代修斯的继任者。在1947年7月31日开始的多拉-诺德豪森集中营审判中，于12月30日



被判处死刑。

### 十五、特列申集中营

奇格弗里德·采德尔

特列申集中营司令官（1941—1943年）。后又担任施特拉斯霍夫、贝尔森等集中营司令官，而死于这些集中营内的各国犹太人和战俘多达5万人以上。1946年10月4日被奥地利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并于不久以后执行。

安东·布格尔

特列申集中营司令官（1943年—？）。

卡尔·拉姆

特列申集中营司令官（？—1945年4月）。战后被美军法庭判处死刑并执行绞决。

### 十六、韦瓦拉集中营

汉斯·奥麦艾尔

驻爱沙尼亚的韦瓦拉集中营司令官（1944年升任），1945年又调任驻挪威的格里尼集中营司令官。原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一监护营司令官，他应对每天死亡几千名囚犯的死亡负责，特别是对十几万名被蓄意杀害的苏军战俘负责。由于身上沾满欧洲各国人民的鲜血，1947年在波兰克拉科夫审判中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 十七、萨拉斯皮尔斯（里加）集中营

爱德华·罗施曼（1941年8月—1944年10月）

萨拉斯皮尔斯集中营司令官。战后潜逃至拉丁美洲，1977年在巴拉圭病死。

### 十八、雅诺夫集中营

维尔豪茨

## 附录：各主要集中营、灭绝营司令官简历

雅诺夫集中营司令官（1942—1944年）。

战后被盟军法庭判处死刑。

### 十九、布拉朔夫犹太人劳动营

莱奥珀尔特·阿蒙·果特（1908年12月11日—1946年9月13日）

布拉朔夫犹太人劳动营司令官（1943—1944年在任）。因忠实执行希特勒、希姆莱关于“对犹太人问题实施最后解决”的指示，晋升为党卫军中校和驻波兰东部布拉朔夫犹太人劳动营司令官。1943年，他带领党卫军部队摧毁了波兰克拉科夫和塔尔诺夫两地的犹太区。1943—1944年担任布拉朔夫犹太人劳动营司令官。在此期间，他以残酷折磨和疯狂屠杀犹太囚犯而著名。战后，被引渡回波兰受审。1946年9月5日，克拉科夫法庭依法判处果特死刑，并于9月13日执行枪决。

### 二十、特列勃林卡灭绝营

伊姆弗里德·埃贝尔

特列勃林卡灭绝营司令官。以后调任贝恩堡处决中心主管医生。

弗兰茨·施坦格尔

特列勃林卡灭绝营司令官（1942年9月—1943年8月在任）。1967年被判终身监禁。死于狱中。

库尔特·弗兰茨

特列勃林卡灭绝营司令官（1943年8月—？在任）。

1964年被西德一家法院判终身监禁。

### 二十一、索比堡灭绝营

利哈特·托马斯

索比堡灭绝营司令官。作战中被盟军击毙。

弗兰茨·施坦格尔

索比堡灭绝营司令官。

弗兰茨·莱希莱特纳

索比堡灭绝营司令官。1944年在第里雅斯特同南斯拉夫游击队作战中被击毙。

卡尔·弗兰采尔

索比堡灭绝营司令官（1942年—？在任）

## 二十二、海乌姆诺灭绝营

汉斯·波特曼

海乌姆诺灭绝营司令官（1943年1月—1945年1月在任）。1946年4月畏罪悬梁自尽。

赫伯特·朗格

海乌姆诺灭绝营司令官（1941年12月—1943年1月在任）。党卫军上尉。1945年4月，在同盟军作战中被击毙。

## 二十三、贝乌泽茨灭绝营

克里斯蒂安·维尔特

贝乌泽茨灭绝营司令官（1942年3月17日—1942年11月在任）。1944年在意大利作战中阵亡。

戈特利普·海零（1887—1945年）

生于斯图加特。贝乌泽茨灭绝营司令官（1942年12月—1943年6月在任）。后又在佐恩施泰因、哈达玛尔和贝恩堡等杀人机构担任要职。1945年在德国斯图加特附近被杀。

## 二十四、贝恩堡处决中心

伊姆弗里德·埃贝尔（1910—1946年）

勃兰登堡处决中心主管医生（1940年1月—？在任）。后来又调到贝恩堡处决中心任主管医生。医学博士。在他任职期间，杀害了从拉芬斯布吕克等集中营转运过来的女囚和重残病人达5万人以上。1946年被英军法庭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 二十五、格拉芬奈克处决中心

霍斯特·舒曼主管医生（该中心最高负责人）（1940年1月—？在任）。后来又调到佐恩施泰因处决中心担任主管医生，再往后又成为奥斯维辛和拉芬斯布吕克两个集中营的医学刽子手。战后先后潜逃到法国和非洲的苏丹、加纳。1966年被押解回西德受审，1970年9月才被押上法庭，1977年又获准保外就医，从此再未入狱。1983年5月5日病死于法兰克福。（详见第八章第三节）

## 二十六、佐恩施泰因处决中心

恩斯特·勃姆哈德

佐恩施泰因处决中心主管医生（1940年1月—？在任）。

1941年夏脱离T-4而加入海军，后来丧生于战火之中。

## 二十七、哈尔特海姆处决中心

主管医生鲁道夫·洛劳尔（1940年1月—？在任）。

## 参 考 书 目

### 法文：

1. Philippe Aziz. *La Criminels de Guerre*. paris, 1974. 7
2. Denoël, France, Jacques Delarue. *L'Histoire de Gestapo*. Paris, 1964
3. Henri Michelle.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 Paris, 1968
4. <加> Andre Brissaud. *Histoire Secrète de Gestapo*. Geneve, 1971
5. *Dora*. 1976, Genève
6. JEAN DUMONT. *Les SS et La GESTAPO*. Genève, 1978
7. *2194 Jours de Guerre*. Paris, 1980
8. Alexandre Blank. *Le FASCISTE ALLEMAND POLitique et idéologie*. MOSKOW, 1983

### 德文：

1. Barbara Bromberger. *Feinde des lebens, NS - Verbrechern an kindern*. Frankfurt, 1947
2.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KZ - lager*.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 - Anstalt, 1997.  
11. Ebehard Kolb. *Bergen - Belsen*. Hannover, 1966
3. Karl Sauer. *Die Verbrechen der Waffen - SS*. Frankfurt, 1977
4. Alexander Mitscherlich, Fred Mielke. *Medizus ohne Menschlichkeit*. Frankfurt, 1979
5. *Organisierter Massenmord an Juden im Nationalistischen Vernichtungslagern*
6. Zacheusz Pawlak. *Ich HABE ÜBERLEBT...* . . . Humburg, 1979
7. *Kinder im KZ*. Humburg: ELEFANTEN Press, 1979
8. Kurt Nowak. "Euthenasie" und Sterilisierung im "Dritten Reich". Weima, 1984
9. Pierre Durand. *Die Bestie von Buchenwald*. East Berlin, 1985,
10. *Psychiatrie im Hadamar*. Born, 1986
11. Gudrun Schwarz.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lager*. Frankfurt, 1990
12. Ernst Klee. *Persilscheine und falsche Pässe*. Frankfurt, 1991. 11
13. Ursula Büttner. *Die Deutschland und Judenverfolgung im Dritte Reich*. Hamburg, 1992
14. *Hitlers zweimal getötete Opfer*. Berlin, 1994
15. Claudia. Taake. *Angeklagt; SS Frauen vor Gericht*. 1998
16. *SS Frauen am Galgen*. . . Google Intnet, sep. 2007

### 俄文：

1.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Р. А. Руденко. *НЮРНБЕРГСКИЙ ПРОЦЕС*. МОСК-  
ВА, 1958

2. ПРЕСТУПНЫЕ ЦЕЛИ - ПРЕСТУПНЫЕ СРЕДСТ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 1963
3. Лев Бержыменский. ВОЕННЫЕ ПРЕСТУПНИКИ НОМЕР 239. МОСКВА, 1983
4. Н. С. АЛЕКСЕЕВ. ЗЛОЦЕЯНИЯ И ВОЗМЕЗДИЕ. МОСКВА, 1986

英文:

1. Randolph L. Braham. *Eichman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ungarian Jewry*. New York, 1961
2. Edited by Jeno levai. *Eichmann in Hungary*. Budapest, 1961
3. (匈) *CRIMINALS at LARGE*. Budapest, Pannonia Press, 1961
4. Raul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Chicago, 1961
5. Szymon Datner. *Crimes against Pows - Responsibility of The Wehrmacht Zachodnia Ageneja Prasowa*. Warszawa, 1964
5. Isser Harel. *The House on Garibaldi Street*. New York, 1976
6. David Irving. *Hitler's War*. London, 1977
7. Adalbert Rucker. *The Investigation of Nazi Crimes 1945 - 1978*. 1979
8. *War Criminals must be Punished*. Moscow, 1981
9. Gerald Fleming. *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Ltd, 1985
10. Martin Broszat. *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London, 1985
11. Gerald Astor. *THE "LAST" NAZI*. New York, 1985
12. Norman E. Tutorow. *War Crimes, War Criminals and War Crime Trials*. London, 1986
13. *GERMAN DOCTOR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1986
14. Christopher Simpson. *Blowback*. New York, 1988
15. *Who's who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5
16. Lifton. *Nazi Doctors*. New York. 1986
17. *A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18. HENRY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OF NAZI GENOCIDE*. 1995
19. BRONWYN REBEKAH MCFARLAND - ICKE. *NURSES IN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99
20. VIVIEN SPITZ. *DOCTORS FROM HELL*. NAOMI BAOMSLAG:
21. *MURDEROUS MEDICINE*. New York, 1998
22. MAX WEINREICH. *HITLER'S PROFESSORS*
23. JAY KATZ,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EXPERIMENTS WITH HUMAN BEINGS*
24. JACK G. MORRISON. *RAVENSBRUCK EVERY DAY LIFE IN A WOMEN'S CONCENTRATION CAMP 1939—1945*
25. (POLAND) JADWIGA DZIDO . *HUMAN GUINEA PIGS AND THE ETHICS OF*

- EXPERIMENTS. warshawa, 1977
26. *DEATH OF MEDICINE IN NAZI GERMANY*
  27. *THE NAZI DOCTORS OF THE THIRD REICH*
  28. *Nazi doctors in AUSCHWITZ*. New York, 2001
  29. *THE EXPERIENCES OF WOMEN DURING THE HOLOCAUS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0. SIMON POZENKIER. *X - RAYS SURVIVOR OF NAZI STERILIZATION EXPERIMENTS SAYS*. London, New York, 2003. 11

中文:

1. 巴金. 《华沙城的节日》,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1
2. 峻青. 《欧行书简》, 上海: 新文艺出版社, 1956
3. 鄂华. 《女皇王冠上的钻石》,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4. [法] 西蒙娜·戴丽. 陈占元、齐放译. 《心里充满了阳光》,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
5. [美] 威廉·夏伊勒. 《第三帝国的兴亡》,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74
6. 李巨廉、金重远主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4
7. [英] 伊恩·克肖. 《希特勒》,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